

高岗文集

GAO GANG WEN JI

编辑 薛骏富 白浩亭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高岗文集

GAO GANG WEN JI

编辑 薛骏富 白浩亭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高崗同志對中央紅軍和抗
戰斗争立了大功，這種功勞與我
黨我們軍隊的歷史所共有。在座
的同志不要忘記了他的好意啊！
不管是誰，只要對革命作過貢獻，
我們就永遠記着他。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邊區黨代會上演講）



高角

目 录

- 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讲话记录
- 边区党政联席会上高岗同志讲话
- 延安干部会关于运盐工作的问答
- 为实现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
- 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
-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词
- 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
-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宣言
- 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 在县书联席会上关于时局问题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总结报
告
- 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 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
- 今冬工作中心
- 关于建立模范支部的意见
- 号召英雄们推动集体英雄事业
- 突破一点影响全区
- 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 春耕领导的两个典型
- 在延安县民众反对日特国特动员大会上讲词

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

在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会议上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感言

财经工作的全面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

对外贸易管理工作

向刘志丹同志学习

进一步发展生产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结论

在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边区和大后方两种道路两种结果

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在“三八”妇女节集会上的讲话

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答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国记者问

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

在西北局办公厅欢宴政府委员及常驻议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在边区仓库主任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干部教育头等重要

在党务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方针的指示(摘要)

边区的主要任务和作风问题

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

在历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何转变作风完成土改在热中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在内蒙干部会上的讲话

在沈阳人民纪念“五一”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

荣誉是属于谁的？

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在沈阳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会上的讲话

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东北总工会执委扩大会上就工会工作的讲话

实施共同纲领的伟大一年

在东北荣军劳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今年经济建设计划讲话
巩固国防发展经济

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在沈阳市“三八”节大会上的讲话

向东北全体工人的广播讲话

在沈阳人民庆祝“五一”节大会上的讲话

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深入进行“三反”斗争

在建设西部防护林带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总结摘要

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

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

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

在东北工业部和东北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先进生产经验推广大会上的讲话

在中央代表团访问东北欢迎会上的致辞

对肇源县增产经验总结的批示

全体文艺工作者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掌握技术精通业务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在东北亲赴机器一厂检查工作讲话

关于工资控制数字向毛泽东报

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

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我们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这两年半期间，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伟大时期。是抗战第一阶段由此经过，而抗战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由此开始的

时期。

两年半以来，中国抗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抗战三个发展阶段的预见。

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上，党中央曾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全国进步，才能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抗战第一阶段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英明的指示。

现在是抗战第二阶段的开始，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已爆发了世界大战，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中央十月十日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大会上的报告，指明了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特点，指明了由这些形势所造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与倒退危险，成为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而目前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因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是“要切实执行‘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与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与抗日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危害中国民族抗战的突然事变，而使党与中国民族抗战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中央十月十日“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党中央的这个英明的指示，完全适用于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大会，就用此方针来解决边区在当前情况中所提出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并规定今后奋斗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边区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奋斗，是与全国抗战的利益不可分离，且服从于全国抗战的利益的。因此，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就要说到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它在全国抗战中已经起过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目前形势下所处

的环境是什么样，而当前的任务又是什么样。

由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由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与国民党国军的转变，还在抗战开始时，党中央的代表就同蒋委员长商定，将陕甘宁苏区改为特别行政区，管辖二十三个县。并直接归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并在二十六年冬季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了。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应该改为特别的行政区，正是由于它具有优良的且对于坚持抗战与建立民主共和国有很大意义的历史特征和政治特征：一、这个区域过去是苏维埃区域，由十年艰苦奋斗所造成，由抗日统一战线而改为民主共和制度的；二、在这个区域里，已经彻底实行了三民主义；三、在这个区域里，有最能彻底实行抗战国策及国民政府一切进步设施的民主政府；四、在这个区域里，广大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五、这个区域是保卫西北的前卫，是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大后方；六、这个区域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而中共中央是在全国人民中有无比的广泛的信仰的。综合这些特点，使陕甘宁边区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先进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一部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蒋委员长得承认边区为特别的行政区域，决不是依从一党一派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整个抗战建国的利益。因为从抗战建国的利益着想，从全国大多数人的要求着想，从国民政府领导的威信着想，无疑应该承认这个边区，保护这个边区，使之能够无阻碍的发挥抗战建国伟业中的先进作用，应该积极辅助与提倡边区中许多优良的进步的设施，以供全国参考和仿效。

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上，本着抗战建国的国策，本着中共中央的政治方针。曾经在坚持全国抗战、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进步的伟大斗争中，尽了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们来看一看边区在两年半以来，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一)在黄河边上，我们打退了日寇的五次进攻，胜利的保卫了

边区，保卫了西北的重要门户。

(二)我们在民主政治的运动上，起了先进的模范作用。

(三)我们以精诚团结的精神，同边区邻近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蒙古人和同人，建立和坚持了统一战线。同时，又严肃的反对了同边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各式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破坏边区的危害分子与反动分子的阴谋企图。

(四)经过八路军，经过边区派出的干部，经过友党友军的以及其他各界的先进人士，把边区游击战争的、政府工作的、民众运动的、文化教育的、经济建设的经验，传播到战区与敌后方，而对于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在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事业，给了很大的帮助。

(五)从边区抽调了数千百个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前线去。这些干部，或者属于党的工作的，属于军事工作的，属于政治工作的，属于民运工作的，供给了前线的需要。

从上面这些方面看来，就可以知道，边区的土地虽是不大的，人口虽是不多的，可是由于边区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及其在民主政治上的特点，它在抗日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曾经起了而且带继续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边区在全国人民面前，在世界人民面前，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先进人士和先进党派的面前，获得了广泛的关怀与称誉，从他们方面获得了精神的、物质的以至人力的许多帮助。边区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在扩大起来。

上面这些，就是我们边区向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坚持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所获得的成积与光荣。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已经到了万事大吉、高枕无忧的时候了。不，决不是的，我们以往的环境是困难的、复杂的；而现在，正

因为边区在坚持抗战中起着先进的、模范的伟大作用，正因为抗战处于困难更多、危险更多的相持阶段，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比之过去阶段是更加困难、更加严重了。

前面说过，边区是“中华民国一部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因此，边区是与全国不可分离的。边区的进步与巩固，可以影响全国进步；而全国的进步或逆流，又可以影响边区的进步与巩固。所以，我们应当从全国的形势来估计边区的环境。

从中央“七七”，十月十日决定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边区目前所处的环境是严重的。

(一)日寇进攻边区的危险依然是直接的危险。因为边区是中华民国一部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正因为这个缘故；一方面，日寇难以进攻它；又一方面，它却处心积虑的要进攻它，要破坏它。

我们说战略上的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日寇进攻长沙等地和进攻西北的可能依然存在着。事实上，日寇并没有停止突破河防的军事企图，黄河沿岸的炮声是经常听到的。

日寇不但没有停止对边区军事进攻的企图，且更加强了对边区的政治进攻，例如最近同盟社的造谣，说共产党要赤化西北，例如派遣敌探、奸细、汉奸、托派等暗害份子到边区来实行阴谋暗害的活动等，就是敌人企图消灭边区的明证。

所以，相持阶段的到来，并没有取消日寇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的危险，同时，加速了他对边区的政治进攻的危险。而这个危险，又正是内投险反共的活动或明或暗的互相呼应着。

(二)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动集团加紧进攻边区的危险。一切投降份子都把取消边区当作他们实行对日投降的重要步骤之一。最近几个月来，边区不断发生的动乱行为与磨擦事件，决不是由于偶然的错误与误会，而恰是一种有计划的进攻，所以才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而且越来越凶恶，越来越严重。我手边有无数的材料，证明我们应当这样提出问题。我想我有责任来向你们揭露投降份子进攻边区的阴谋诡计，至少应当把主要的方面揭露出来。

这些主要的方面是什么呢？

他们用尽造谣污蔑的手段，挑拨边区人民、边区政府、友军、部队、哥老会以及少数民族和外国教堂，对于边区的恶感，以掀起危害抗战、危害团结的磨擦，直至挑拨起军事冲突。

他们不但在边区周围建设特务机关，实行所谓暗中包围边区，而且还在边区内部，经过所谓“点线工作”，混入民众团体、政府机关、武装部队以至党的组织，企图从内部来瓦解边区。

他们组织土匪来扰乱边区，抢边区人民，掠夺边区党政人员，曾经有一个时期这类土匪达到四十余股之多。

他们用暗杀逮捕来残害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民众积极分子。

他们用封锁的办法，绑票的办法，来阻断边区同邻区的交通。

他们不但在边区周围实行严重的包围，而且在有机可乘时，在能够挑起事变时，便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例如关东事件、枸邑事件、瓦窑堡事件、杨家园事件、延川事件、靖边事件、神府事件等等。

他们不断的侵占边区的行政区域。两年以来，他们侵上了边区十个区，七个半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并用强力把这些地方变成破坏抗战与反对边区的黑暗据点。

在八路军驻防区域，他们强迫取消民众抗日团体，禁止抗日书报，断绝部队采买来源，挑拨居民同部队的恶感，暗中破坏我部队，捕杀我工作人员。

他们组织无数的机关，出版多种刊物，耗费无数金钱，但不是用去反对日寇，而是用来进攻边区，反对共产党，他们甚至不惜同汉奸

土匪勾结一起。

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权力，来压迫我们。边区政府和人民一切合法的声诉，被他们从中阻隔，抑压下去，甚至假造文件、证据，反转来诬陷我们。

他们在边区内组织暗杀，被他们暗杀了的共产党人前后共计七十余人之多。现在他们的阴谋机关竟欲暗杀边区重要人员，这种最卑鄙下流的勾当，正在他们阴谋机关的布置中。

同志们，请你们看一看，上面这些不都是完完全全的事实吗？谁到陕甘宁边区来查一查，谁就会知道这些事实的严重，谁还能否认这些事实呢？

我们边区共产党处在这种事实面前，是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是曾经反抗了他们的进攻并且曾经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我们为什么能够打退他们的进攻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打退他们，是在于我们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只要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不惜委曲求全。我们曾经用尽了和平讲理的办法，以求揭破挑明阴谋，以求消灭磨擦。其次，是在于我们依靠了边区和邻区广大人民的援助，依靠于友党友军中先进人士的公道与同情，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与同情，我们是难于胜利的。最后，被迫到不得已的时候，在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向我们开枪的时候，他们竟至于硬欲消灭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生存权利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采用坚决的自卫的手段，这种坚决的自卫手段是正常的，是必需的，是决不可少的。同志们，经过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承认而为全国人民所爱护的中华民国一部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决不能让投降分子与反共分子来侵占的。已经获得解放的边区人民，是决不能让他们来压迫的。为了坚持抗战，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三民主义国策，正是为了这些，我们必须坚决保卫这个边区。

所有这些情形，充分的证明了投降分子与反共分子对边区实行有

计划的进攻，造成了边区周围的严重形势。这种进攻实际上是同敌人的进攻相配合。

(三)就是边区内部封建残余分子企图复辟的危险。这些封建残余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同汉奸分子、“内线分子”勾结一起，成为日寇和国内反共集团进攻边区的最便当的内应。

由此可见，边区是没有最后巩固的。边区的最后巩固，要在全国范围内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胜利的斗争中才能求得。

依据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与边区的环境，党必须坚持下列的任务，以保卫这个中华民国，部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边区。

1. 与全国一切拥护抗战、团结、进步的抗战领袖，抗战将士、抗战党派与最大多数人民在一起，克服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以达到准备反攻力量，争取反攻阶段到来。

2. 与西北及华北一切抗战领袖、抗战将士、抗战党派和广大汉人、回人和蒙人一起，粉碎日寇的进攻，以达到保卫西北、保卫边区的目的。

3. 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进攻的立场上，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上，协同一切同情边区的人士，以与进攻边区破坏边区的反动势力作严肃的坚决的斗争，以达到巩固统一战线、巩固团结、坚持国共合作的目的。

4. 进一步的团结提高与巩固边区党、政府、军队和人民，以达到进一步帮助全中国、推动全中国的进步，以准备对付出能危害边区严重的重大的突然事变，而使边区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在这咱突然事变如果发生，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二、进一步的巩固边区与提高边区

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就是要总结两年半期间边区内部的工作，就是要根据边区过去的工作的经验与当前状况的特点，来提出今后的任务。

民国二十六年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人民党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区域”的口号，这就是边区共产党的总方针。

实现这个总方针并不是很容易的。

从内部的情况来说，党的边区刚才从内战中摆脱出来，边区的经济文化又本来是落后的，更在长期内战中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破坏。大多数的人民虽然获得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但缺乏工具、牛、羊和种籽。大部分民众虽然组织起来了，并且武装起来了，但这些组织和武装还是散漫的，不巩固的。武装部队虽然发展了，并在内战中锻炼了，但还没有正规化，军事的、文化的、政治的水平都还很低。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巩固起来。社会秩序虽然大体上建立起来了，但土匪的扰乱和封建残余份子的破坏还相当严重。

从外部的情况来说，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最后的正式的形成，而对于边区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任务。随后，统一战线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顽固份子的破坏，地主残余的捣乱，又接踵而来。同时，“七七”事变后，华北战争的展开，敌人到了黄河边上，又使边区迅速的转为抗战的前线。

所有这些情况，使边区内部的建设必须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问题配合起来，迅速的把自己提高到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的地位。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边区内部的建设，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过去是如此，在今后也将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过去两年半期间内边区内部工作的状况。

民主政权是更加巩固了。边区的更加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在民主政治方面，采取了下面的基本办法。这些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实行，而为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且为推行党政所必须实现的。

(一)我们依据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民主的原则，在边区内实行了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

(二)我们建立了全权的参议会制度。

(三)乡村问题取决于乡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

(四)我们建立了简明灵活的制度与廉洁奉公的作风。我们这里没有薪俸制度，而只有一元至五元的津贴。

(五)我们建立了严密的锄奸制度，它打击了敌探、汉奸、托匪、土匪等暗害份子破坏抗战团结、破坏边区的阴谋。它是完全依靠于人民的拥护的。

(六)我们的政府给人民以尽可能的便利与帮助，使他们能够充分享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迁移和信仰的自由权利。所有这些设施，正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遗教。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权制度，曾规定了如下的基本原则。一、民权不能为少数资产阶级所独有，而应当为平民所共有。二、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三、人民有集会、结社、会讨、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四、剥夺卖国亡民的人们关于上述的权利。

因此，两年半来更加团结了边区的人民，更加提高了和发扬了他们参加政权与保护政权的积极性，更加扩大了边区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全边区人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参加了选举。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民，经常参加村民大会。

有百分之八十的壮丁，参加了人民自卫军。百分之四十的公民，参加了锄奸组织。

边区人民以自己的劳动，帮助缺乏劳动力的抗日军人家属及政府工作人员家属的生产。

两年半以来，仰慕边区文明，自由移住边区的邻居人民达数万之多，其中有少数民族数百人。

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弱点吗？有的，主要的弱点是在于：

(一)封建残余分子、汉奸分子、反共分子的破坏活动，还未肃清。

(二)一部分党员与行政工作人员的政治远见不够，他们对民主工作方法的认识与熟练不够，官僚主义的作风存在于一部分党员与行政人员之中。

(三)由于文化方面的落后，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优点，还不能充分的发挥。

所有这方面的弱点，是尚待今后的努力去克服的。

三、 抗日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是更加提高了

在两年半期间内，我们的留守兵团与保安部队，曾经五次打退进攻边区的日寇，曾经肃清了扰乱边区的四十余股土匪，曾经打击了武装进袭边区的反共份子，因此胜利的保护了边区。警卫部队在保卫边区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两年半的进步，保证了党在留守兵团和保安队中的正确领导。整个部队，尤其是留守兵团，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都比以前提高了，留守兵团已经上了正规兵团的道路。保安部队也已经大体上肃清了游击主义现象的残余，奠定了正规化的基础。

这是我们在提高部队、巩固部队方面的巨大成绩。

我们在这方面的弱点，主要的是在于：

(一)部队的人数还不充实，动员民众参加部队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二)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还不够。

(三)部分部队的群众纪律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有时发生。

所有这些弱点，今后应当着重去克服。

四、 边区的经济是在发展中

边区人民在苏维埃时代，已经解除了地主的剥削与苛捐杂税的重担。但由于边区内经济的落后与内战的影响，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依然是处在贫困的状态中。为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许多积极的办法，例如扩大耕地，加修水利，改良技术，保护耕牛，保护羊圈生产，发展合作运动等等。而我们的党和政府就已经采用了这许多办法。不但如此，我们还采用了奖励、展览等等办法以鼓励人民生产的热忱。因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了。而且所有各战斗部队的指战员，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各学校的青年学生，都参加了生产。就是向来以参加生产为羞耻的边区妇女群众，现在也涌出了六百零七个劳动女英雄，工人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同样是提高了，例如机器工人会自动于礼拜六做义务工二小时，印刷工厂、难民工厂的工人，会自动增加工作一小时，青年工人要求增加二小时劳动等等。

在生产运动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不远千里万里而来的青年男女学生们。他们是来边区学习真理的，但是他们也同边区的工作人员同八路军指战员一样，积极的参加了生产运动，

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手执铁锄汗流浹背地从事耕种与收获，而真正得到了宝贵的粮食。他们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只要艰苦奋斗，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他们从自己的经验感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的前途。

现在我来分别的报告一下经济战线上的情况。

(一)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大大增加了

耕地面积，从民国廿五年的八一五〇〇〇〇亩，扩大到廿八年的一〇〇七六〇〇〇亩两年半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〇水利增修方面，从民国二十六年的八。一亩，扩大到二十八年的八〇一〇亩。增加了十倍。

牲畜方面，两年半中增加了牛、羊、驴一百六十一万一千头。

这种成绩，不能不说是显著的成绩。

(二)边区工业原来是很落后的，两年半的时期中，经过政府苦心的经营与提倡，也收获了初步成绩。

私人手工业增加到一倍以上。

生产合作事业，在抗战前只有四处，而到今年底，则可增加至一三七处。

政府直接经营的小工厂企业，已有了十个，比之民国二十五年(只三处)增加三倍以上。二十八年建立了每月可出布六〇〇疋，呢百疋，毛巾二百打的毛织棉织工厂，还有一个农具工厂。一个月可出纸六万张的制纸厂。一个月可出肥皂六万条的肥皂厂。此外，政府还在极力扩大采煤企业，使之能够供给更多人民的需要。

(三)商业是大大地发展了。

据一般的估计，边区商业资本在两年半以来，增加了十倍以上。从三五百元资本发展至三五千元乃至三五万元的商业，为数不少，边区亦有数十万至百余万资本的私人大商业，边区已发展了一个规模不

小的商业网，这是由于边区人民生活改善，生产增加与购买力提高的结果。商业的发展曾经出现了奸商偷贩仇货的现象，但经政府和人民的努力，这种现象已逐渐绝迹了。

(四)消费合作事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平均每个区有一个合作社，已经大体上消灭了朽木现象，至于机关部队学校的工作人员，则大都加入了合作社。

(五)为了发展经济建设，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农业学校与模范场。

以上就是两年半以来边区经济发展的概况。

总结边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值得指出以下的问题：

(一)和平与民主是边区经济发展的两个政治前提。如果边区是敌人后方，则经济方面不能有这样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则边区经济也不能发展。谁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请把边区和边区以外的地方比较一下，就会明白的。

(二)边区经济中，中农的个体经济占主要的地位，这表明边区自土地革命后，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是大大改善了。

(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商业资本和富农的经济，已经在边区内开始活跃和发展起来，部分中农以至个别中农上升到了富农的地位。

(四)合作社经济的意义与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因为消费合作社是便利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与在经济上组织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武器。而工业合作社是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武器，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差，特别是消费合作社中跟着商人跑的“发财”思想，违背了合作经济的本意，这是要马上加以改革的。

(五)边区经济虽然有了空前的发展，但对全国经济发达的区域说来，仍然是很落后的。工业方面，我们这里还差不多是一块处女地。农业方面，还有四分之三的可耕地未曾开盘。特别估计到边区经济的

半自给地位及其对于全国市场的依赖性，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和更大的努力，必须有更多的计划性和动员人民的生产热忱，以实现计划的工作，使边区在经济建设上成为坚持抗日的模范区域，保证抗战供给和人民生活继续改善。

五、 边区人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改善了

由于经济的发展，主要的是农业的发展，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边区内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比过去大大不同。我手边有一个关于延安南区的报告，不妨念给大家听：

“我们这里是延安市南区的第一乡，共有居民二百二十余人。从民国二十六年后，我们差不多每人有了一身新衣服，冬季还有棉袄和皮袄。我们能够经常吃上面和肉，这在革命前，我们是连想也不能想到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姓张名达万的，他以前是一个贫农，家有六口人，只两个能劳动，共种地三十余垧，收粮二十余石，但每年除交纳租税、公粮、利息外，所剩不过五六石，因此经常吃不到一餐饱饭。但是，现在情形大非昔比，他自己已有六十余垧地，两头骡子，一匹马，七八十只羊，已经变成小康之家了。”

我想不必再举多的实例，因为这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事情。总而言之，边区大多数农民已经成了这个报告中所讲的“小康之家”了。中农和富裕的中农，就是我们边区经济的和人民生活的的主要特征。

再看看工人方面的情形。

失业工人在边区是没有的。而店员手工工人的工资，比较民国二十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泥木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雇主供饭食外，过去每天给工资二毛至二毛五，现在增至四毛至五毛)。煤矿工人的工资，比二十四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农村手工艺

工人的工资，由二毛增至四毛至八毛。

因此，边区的老百姓，对我们边区的这种情形发生羡慕，常常一批一批的跑到边区来。

六、文化教育、主要的是小学教育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文化教育上，边区这个地方过去简直是一块荒地。一般的县份，百人中难找到二百识字的，有些县(如华池等)两百人中只有一个识字的，当然还不是贫寒子弟。现在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每百人有五个能识一千字的了。延安县有些区乡，已有百分之十的人民达到了消灭文盲的初步准备(识一千字)。就整个数量上说，当然还是很落后的。但两年半的识字运动，在边区内增加了两万以上的非文盲，是不易的事。

而特别有成绩的，是小学教育的发展。两年半来，小学校的发展有如下表：

年份	学校数	学生数
民国二十六年前	一二〇	约二〇〇〇
民国二十七年	七七三	一六、七二五
民国二十八年	八八三	二〇、四〇一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两年时间内，小学生数目增加了十倍以上。

中等学校之鲁师、边中，先后训练了学生六百名。边中附校现有男女学生三百左右。此外边区还有在八路军与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办的学校——抗大、陕公、鲁艺、女大、青训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可作为边区学生升学的地方。

必须着重地指出，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依然是很落后的，依然还

远赶不上他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需要。

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文盲，学龄儿童吸收到学校来的还不及百分之二十，国民教育方面的适当的师资还是很不够的。与迷信还束缚着人民。这是边区建设事业上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障碍，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七、 民众抗战动员的成绩

边区的抗战动员，是与整个抗战的需要联系起来进行的，是与边区内的各种建设任务联系起来进行的，如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的宣传，开展讨汪锄奸斗争，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帮助友军运输，接济边区食粮，以及边区的生产运动，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慰劳抗日军队等，都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与抗日热忱，因而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与其大者而言，如前年十一月敌人进攻非常紧张时，各县一次动员了一万牲口到山西帮助运输。去年十月到十二月曾经整营的动员了自卫军，在寒冷的冬天参加在河防上工事的建筑。这时妇女做了四万双鞋袜送上前线。两次救国公粮，在群众热烈拥护下，超过了政府的计划。今年伟大的生产运动，已经胜利的完成了。而最近对于救济清绥乡后区的粮食运动，又已表现出他的成绩。

在抗战动员中，整理了和扩大了群众，我们已使群众团体从过去比较散漫的零乱的状况，转变为统一的有系统的组织，转变到适合于统一战线原则的组织。并使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拥有比以前更加广大的会员。同时自卫军、少先队也在动员中扩大和整理。

总结两年来民众动员的经验，需要指出以下的几点：

(一)边区的抗战动员已有成绩，是与广大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分不开的，是与他们的生活改善分不开的，边区的经验证明了我们党的论断：只有同时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才能发挥与

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

(二)人民自卫军与少先队，是民众组织中的骨干，在配合主力部队保卫边区的斗争中，自卫军曾经起了英勇的巨大的作用。

(三)但在各群众集体工作的深入与检查以及自身经常性质的工作上说来，是做得很不够的。乡村群众组织的形式也过于复杂，不适宜于边区地广人稀的条件。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工作与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重大的弱点、党、政、军以及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同群众的关系上，部分的还存在着强迫命令方式。对群众日常生活问题的关心还很不够。这些都是应该切实改善的。

以上就是两年半以来边区内部工作的概况。

根据以上所说的状况，我们已经可以作出结论。这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交给我们的“使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的任务，由于党、政、军、民的努力，同时也由于中外许多先进团体和先进人士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已经大体上把这个任务实现了。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自满，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但都不够。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正处在日寇与反共分子的包围中，正处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危险的关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提高边区与巩固边区，使边区在继续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斗争中，起着更大的模范作用。为达此目的，党须实行以下的任务：

(一)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的抗日部队，使八路军留守兵团提高到更加正规化的兵团，使保安部队提高到正规兵团，警卫部队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部队。

为此目的，必须：1. 加强部队中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特别注意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与马列主义水平；2. 充实部队；3. 巩固部队与民众的联系，一方面严格的肃清部队中脱离群众的现象，又一方面加强部队的群众工作；4. 加强人民自卫军的工作，创造基于自卫队，使之成为有相当军事、政治训练的能够随时动员的预备队。

(二)巩固边区的民主政治，力争全国施政的实施。

为此目的，必须：一，加强边区各级议会的工作。二，使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制度与工作方式更加民主化，更加接近群众，政府人员不可一刻不关心民众的利害。三，加紧人民中的民主政治教育，以充分发挥人民参加政府工作与监督政府工作的能力。四，广泛的吸引人民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五，加强优待与教育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纠正对抗伪工作的忽视与敷衍的倾向。

(三)进一步的发展边区经济事业，并使之有利于广大人民。

为此目的，必须：一，在农业方面，注意扶助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的发展，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畜牧业与棉麻业，培植水利与林业，并尽可能的改善生产技术。二，在工业方面，继续扩大政府企业，奖励私人手工业与生产合作社，注意生产技术的提高。三，加紧指导和辅助人民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使之成为广大群众性的，能调剂物价和供给人民日常用品的，在经济上团结和教育人民的组织。四、制定合理的地方租税条例、土地条例、借贷条例与劳动保护条例，以调节工商业的发展，以抑制封建性的剥削。五，政府办理的商业和银行，应对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事业给以尽量的扶助。六，欢迎实业家来边区开发工农业生产，优待来边区帮助工农业生产的专家。

同时，我们必须普遍和深入的向广大民众解释，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利与自由的保持，他们的政治的、文化的、物质的生活之继续改善，只有争取全国的进步与胜利，在胜利的保卫边区的斗争中，才能求得。因此，他们必须比今天以前更努力更热烈的参加全国反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参加抗战动员，参加边区的一切建设事业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斗争。

(四)大大的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从普及识字教育与民主教育的艰苦工作中，使边区人民成为识字的、知识丰富的、文化的公民。

为此目的，必须：一，认真的改进小学教育的实施，提高质量，

逐渐消灭儿童的退学现象。二，有计划的推广成年识字教育，逐渐的消灭文盲。三，加强社会教育，特别是卫生清洁的，保护妇女儿童，消灭边区与会习惯的教育。四，改善和提高师范教育，大批培养优良的师资。五，坚决有系统的培养边区自己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六，欢迎外来文化干部参加边区文化建设和经济事业的建设工作。

(五)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巩固群众组织。

为此目的，必须：1. 普遍的、深入的在群众中解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提高群众对于长期战斗的认识与准备，特别提高群众对于抗日军队及其家属的经常关心与爱护的程度。2. 大大发扬群众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大大留心群众生活的日常需要，严格尊重群众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彻底肃清动员工作中的强迫方式与命令主义的残余，坚决的反对党、政、军人员中任何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3. 明确规定各群众团体自身生活的内容，充实每个群众团体中的经常工作。4. 清除工会中的坏份子，保持工会的纯洁性。5. 保证各个群众团体中的领导成份，使之掌握在真正为群众所信仰的人的手中。6. 深入乡村工作，改善乡村的群众组织方式与工作方法，并把组织工作的中心放在团结教育与提高积极分子的上面，这是巩固群众组织的主要关键。那种满足于数字的形式主义，应当坚决的改正过来。

(六)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彻底肃清敌探奸细。

为此目的，必须：一，加强群众中锄奸保卫教育，提高民众的自觉性，活跃民众锄奸保卫组织，开展广泛的群众锄奸运动。二，加强锄奸保卫机关的组织，建立有系统的工作。三，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须在实际上经常有系统的加强自己对锄奸保卫机关的组织，建立有系统的工作。三，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须在实际上经常有系统的加强自己对锄奸工作的领导。四，坚决的发止肉刑，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对一切被欺骗的犯罪分子与轻罪分子实行感化工作。

八、 进一步巩固边区的党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的两年半内，边区党的建设，同样有了很大的成绩。

边区党的基础的特点，是从土地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正是党从内战环境过渡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关头。当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党员和相当普遍的组织。但是党员的流动性还很大，党的组织还有许多的不健全，党内生活还缺少经常性。当时党已有了一批经过锻炼的坚定的干部，但是他们还缺乏马列主义的教育，他们更没有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因此，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着重地指出了巩固党与提高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的任务。

以下的事实，表现党在两年半以来重大的进步。

(一)党员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党的组织也增加了。

(二)大部分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从统一战线斗争中锻炼出来了。

(三)洗刷了一批自首份子、投机份子和堕落份子。

(四)提拔了一批新干部，提高了一部分老干部。

(五)发扬了党内民主，改善了党的组织制度与组织生活。

(六)党比以前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

(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的提高了。

这一切，说明边区的党是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以下的情形：

(一)目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使边区党所负担的责任，比过去更加严重了。

(二)由于边区人民生活地位的改善，政治、文化的提高，对我

们党的要求也更加高了，因而党的责任也更加大了。

(三)边区内部商业资本和畜农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反映到党内，开始发生滋养资本主义的思想。小部分党员和个别的干部开始发生着阶级地位的蜕化。同时，资产阶级营中的投降份子与反共份子，正在有组织有计划的企图混进我们党内来，破坏我们的党。

(四)虽然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干部，在文化上、在理论水平上，较之过去是提高了，但是大部分的党员、大部分的干部，在这方面的进步还不够得很。

因此，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更加巩固我们的党，仍然是今后边区党的极重要的任务。

为此，在我的报告中，需要提出以下的任务，作为进一步巩固边区党的基本方针：

(一)继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翻查党员的成份，坚持党内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纯洁性。继续揭露和洗刷暗藏在党内的坏份子和奸细。应当及时的克服党内开始生长着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同时对于在阶级地位上开始发生蜕化的党员和干部，应当加紧教育他们，并在组织上分别采取谨慎的妥当的处置。

(二)提拔新干部，提高老干部，正确的团结新老干部，适当的配合新老干部的长处与克服彼此的短处。要采取必要的办法，使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及其他重要环节中，在最近期间内，对于实际工作有充分经验的人和马列主义理论有相当基础的人，加以调剂与配合，这从党的目前状况说来，有重大的意义。

(三)开展党内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提高党内切实执行党的决议的统一纪律，同样是进一步巩固党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最后，而最重要的，是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

列主义理论的水平，这是提高党与巩固党的主要关键。

在干部教育方面，必须：一，有计划的抽调干部到马列学院与中央党校去学习。二，扩大和提高边区党校，轮流的训练区级干部以及乡级主要干部。三，各分区及中心县设方下级干部训练班。四，有系统的认真的开展在职干部的学习，实行中央号召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设法充实各级组织的教育干部。学习辅导员，并加强各级宣传部(科)的工作。

在普通党员教育方面，必须实行：一，由县委直接帮助区委到乡上办理党员训练班。二，由边委供给党员训练班的适合教材。三，从区级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党员中，选择党员训练班、教员。

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一，有计划的在短期内克服区级以上不识字现象。二，动员支部中所有党员参加当地的识字组与补习学校。

必须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使他们认识以下的道理：

“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的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愈高，则工作本身也愈高和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反之，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愈低，则在工作中也就愈会发生延误和失败，则工作本身也愈会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和堕落为只图眼前利益在事务主义者，则他们也就蜕化变节”。(斯大林)

“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的学习理论，就无法决定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才有我们的胜利”。(毛泽东)

使干部与党员懂得在理论上、文化上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重要性，是解决学习问题的先决条件。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要经过全体代表的推动，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认真的学习，努力的学习，看谁学得更好更多，谁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最好的拥护者。党、政、军、

民领导机关，须把学习成绩当作检查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在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前进吧!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 报告、讲话记录

(一九四〇年三月)

同志们，这次党代表大会给我们两个任务，大家先后找了二千扩兵，五万石救国公粮，在方式方法上都有了进步，不过还不够深入，各位同志的报告我大概都看了一下，特别是谭政文的三本报告，我仔细看了，工作方式，有了转变，在这报告里都可看出一个精神，就是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真正的执行大家工作积极、情绪也很好，真正深入群众到各区乡老百姓内，各组织内去进行工作，过去大家没这样深入动员过，今天去深入工作完成并超过了任务，带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来总结，我相信这次会议，会有圆满的结果，正像党代表大会一样。特别有林主席在这儿领导，我相信这大会一定能胜利的成功，这次要大家讨论的。

第一、依据扩兵和微粮的经验。

第二、怎样提高自己，现在我们的文化还落后，有很多报告上，也说到这点，这是群众落后，那是相信迷信、缠小脚等。虽然我们教育有了相当进步，但还不够，经济建设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加强文化、经济建设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他们团结在我们周围这是很重要的。

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大家已进行了扩兵队和微收口粮两大任

务。这个工作完成了以后，要做什么呢？要深入动员工作。过去有许多地方开过了会，就无事了，天下太平了，他们不知通还要让老百姓怎样去上学，喂猪、养羊、修路等，所以我们不仅一个数目字，而且要天天讨论，这次文化经济建设老百姓动员，不是讨论空的理论，而是要真正去做，这次除了总结扩兵微粮外，还要讨论经济文化建设，必须深入工作，有很多报告上说到，因工作不深入而受的损失。我们要多多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真正巩固边区在文化上经济上，不使一个坏分子混入做破坏的工作，这就是提高自己。

怎样帮助别人呢？过去有许多县长、保安队在边区捣鬼，如米脂、吴堡、清涧、绥德、安定、郃县、庆阳、合水、镇原、富县、旬邑原来是我们的老区域，但是来了些顽固分子不遵守三民主义，不服从蒋委员长，要把这些县一点点搞掉，我们为了抗战，为了进步，为了团结，为了要使这些县变成模范，还要使实际上变化我们的区域。过去名义上是我们的，但实际上还有他们的县长，保甲特务。一个县内有两个县长，真是古今奇闻，我们要使这些地方都变成好的进步的团结的地方。我们有二百万人口，这些地方有八十万人口，我们要使这八十万人口和我们一样好。顽固分子要破坏扩兵工作，破坏微粮工作。竟有个混蛋为了来拦我们下乡的同志哎呀哎呀的，妨害了我们扩兵工作，他们又大造谣说我们收救国公粮，弄得十室九空。他们最无耻，我们要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把那地方变成进步的。如郃县他们，但攻略缺乏，来搞我们，但老百姓去请愿要求团结，要求抗战，要求进步。他们起来要求把枪交给广大人民来保卫国家，要求减少苛捐杂税，要求保甲民主，顽固分子虽然口头答应了，但这些口号是违反了他们的倒退，不合于倒退原则，老百姓要求抗战，他们说老百姓如何能抗战？老百姓要求团结是违反了他们的反共主张。于是，郃县常留了特务，使用屠杀老百姓，奸淫妇女，抢东西，真正是杀人放火，天下那有这种事情？他们反对进步反对抗战反对八路，倒说是八路军迫得他们这样搞的，真是辱耻至极。结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反对，八路军是为了抗战，进步为了群众利益，在人民要求下消灭打击了这些顽固分子，这样才是提高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了人家。这不是失了我们的立场去

帮助，而是变化自己立场进步方向去帮助。

再看看绥德何绍南在搞什么？他这次派了保安队来搞我们，组织黑军捣乱，纵匪殃民，贩卖大烟，贪污公款，收买硬币，暗杀八路，反对边区一切事，都是他搞的。我们说你(指何)既然在边区范围以内就应受林主席的领导，服从边区的法令，而他不这样，引起广大人民反对，清涧人民起来，把女县长包围在碉堡内，几天也没饭吃，要求减少苛捐杂税，要求民选。何绍南压迫工人，修公路时，把二万八千块工饷未发给工人，放在自己腰包内，有一千二百个工人来到我们司令部，要求我们警备司令去讨要，何非把钱发给工人不可，结果何没法，只得给了。工人做了两面大旗子，上面写着“为民造福三五九旅，为民除奸的三五九旅”。在大街上转了几圈，送去警备司令部，工人是这样，再看吴堡的农民，要求组织农会，县长不让农民起来，把县长指导员一起赶走了，成立了农救会，使最坏的联保甲都滚了蛋。何绍南看见农民点一个灯，就说是开会，要禁止看见和八路军在一起的人就说是共产党，要押起。现在可不了，人民不理他这一套，大胆的都选给三五九旅一万双棉鞋，三万斤药，过年时还送了许多卤馍，他们不要什么。何绍南做专员，要求王震做专员，他们不能接受何的压迫了。过去何绍南以中央大员军法官的地位来吹牛，现在人民都说他是个无耻的家伙，把何的像片画的不像样，骂何的标语到处贴，你看他要不要脸，他还说人民拥护他呢？(轻笑)

县代专员贪污了四万八千块钱，给他老婆收着，他老婆引来她的相好刘清立，一走了急得县代专员人财两空。到西安已买了僧衣、僧帽、要当和尚去(哄笑)这样的人，违反抗战，违反群众利益，所以人民说他不是边区的人，是顽固派，我们三五九旅，要提高自己的，帮助别人，打击反动，把反动的气焰灭下去。过去，何绍南时，倒是要赶走三五九旅，现在他们却跑到一个什么地方的娘娘庙，筑起了工事，不敢出来，因为跑出来到处都要是反对他的人。以前何在时，叫老百姓人家门口放一盆水，一面镜子，意思是说，明如镜，清如水，现在老百姓都说他是“二袖贪污，一盆臭水”(哄然大笑)，过去到处是何

专员，何大人。今天，一般绅士们倒过去，不反对边区了，就是等县长来了，也不敢说反对共产党的话。他们觉得靠何专员靠不住，高双成、邓宝珊也靠不住，往何靠呢？还是和八路军好吧。过去和何绍南好的今天屁股也转向王震了。(笑声)

四大罪人之一叛徒杨璞，原来何绍南派他去榆林赶走三五九旅，毫无成就，不敢回绥德，于是有人引去见王震。王震对他说：你是反共专家，鼎鼎有名的，他说，王司令，我不敢。(笑)绥德师范王校长我看见过这人，三尺高，顶没出息，没有任何能力，只有奔走钻营的本事，这次我那儿，他来找我三次，说是有话和我谈，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乡，王司令叫我是反共专家，原来何绍南让我赶走三五九旅，但我没那么做，请你转告王司令一声。

我问他：“何专员怎样？”

“还不错。”他答

“但他不是贪污了吗？”

“那倒是事实。”

你对共产党怎样，来了我问他，他怎样回头，他说，最后我管理了一个支部，没去破坏。(哄然大笑)是这么一个卑鄙的家伙，这个说明了教育界内有了一个转变。

本来各县的保安队，自何绍南来后，都换了他自己的人，一个保字队换了二十个连长，连排长也换了，但人民把他的特务工作人员赶走反动组织内也起了变化，动摇的动摇，塌台的塌台，分化的分化，这促成那里的党政军民真正主张团结抗战进步，把反团结、反抗战、反进步打击下去，像他们的学校，保安队，群众组织上全起了变化，我们反摩擦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我去清涧，他们县长和我谈话，说给我们三个保证：一保证民选，二成立群众组织，三保证保安队以后不发生任何事变。我说我们的人给你杀了，还是请你到我们营部里来住，他们的反对保安队于二十九日五时全部叛变，我们

的土地给我们要回了，边区是巩固了，把对人民的不好的特务赶走，这样才是帮助了别人。

你们大家要把自己的区域搞好，还要把我的地域也搞好，这是大会上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热烈的鼓掌)。

边区党政联席会上高岗同志讲话

(三月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讲几个问题，这次会开得很久，中央一些同志对我们一些指示特别林主席、高主席对工作方法的指示都很宝贵。这一次会是有成绩的。我讲的很少，因为组织问题张邦英同志讲，宣传问题李部长讲了，财政经济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很多问题大家都讲过了，我在这里讲的很少，讲三个问题。

(一)党代表大会后我们工作取得什么成绩？

(二)我们今天严重情况下存在的严重缺点。

(三)我们今后怎么办？

第一、一般的问题我不讲了，新的问题讲一讲，究竟在党代表大会后到现在边区党获得了什么成绩呢？高主席已经指出，这个问题，我们完成扩大新兵与微收救国公粮的任务。这个在国民党一搞就有乱子，我们扩军都是父亲送儿子，‘老婆送老公去当兵，这不同我们这里都是青年人，共产党多；开小差的少，就质量说：微粮出的都是小米，不要粗的都是细的，这是真正的完成了扩军微粮的任务，这是一个成绩。

第二、工作比过去深入了一步，有什么可证明呢？过去下面有好多问题就不知道，比如二百多个坏份子混到党的组织里面来，这次下

去发现了这些人，这个工作比过去是深入了一步，在组织上开除了二百个坏家伙，这是边区党代表大会后作的事。还有重要的一点基本上在边区内部肃清了反动武装，大家看一看廊县、合水、庆阳、蒙霸这些地方就是我们边区的宁县。也是我们边区，比较靠近我们区域的反动武装都搞掉了，我们把这些地方的反动武装抢夺了过来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同留守兵团破坏了反动的政权，老百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何绍南搞垮了，那里的人民组织起来了，他们参加农会自己要干，这个说明，正像苏联出兵到西乌克兰解放了西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人民一样，我们这里老百姓同留守兵团起来肃清了这一带的反动武装，把专门摩擦的特务的特务组织搞垮，把人民组织起来了，这是我们获得的成绩。大家想这些成绩是从什么地得来的呢？这是在党代表大会后得到的，大家在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三十多天工作的深入，对于群众利益的关心不够，边区没有最后巩固提高自己帮助人家，同顽固份子作斗争，提高自己帮助人家，这说明了我们的干部基本上了解党代表大会政治路线精神，因此，在政治方向上来作工作，扩军微粮就是提高了自己。牺牲小的利益为了大的利益，干部了解了政治基本方针，使他们能走路有所根据的干。对于事情了解了就好办，干部了解还不够，还要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白天夜里的搞，干部有积极性，老百姓拥护这证明党代表大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相信党的号召是对的，培养这个号召马上拿实际行动来回答党的号召。

第三、不光有政治路线，干部党员的积极性，还有全边区二百万人民，全边区广大群众拥护党的主张，所以勇跃出粮，到处送粮，这说明群众的积极性，群众拥护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指党的决定成为群众的决定就是这样子，是完成扩军微粮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我们在这个动员进程中进行了斗争，蒋鼎文派人来捣乱，边区四周的顽固份子到处企图活动，不要我们扩军，不要我们吃饭，来破坏我们。在内部有动摇，逃跑，对于两大任务没有信心的份子，在外部有顽固分子，我们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结果打破了阻止工作开展的障碍，打破了他们，所以任务是在斗争中完成了，这是在党代表

大会后获得的这些成绩，这个斗争明显的表现在都县、延长、延川、甘泉。打破了反动家伙，结果使那些县长先枪缴给你们，叫我们走，就是那些特务工作进行暗杀也被打破了，在斗争中进步的势力压倒，倒退的黑暗的势力。这是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主要的原因，这中间得到这样的结论。

A、每一个动员时。

1、在政治上有充分的动员，使干部、党员、群众懂得这个东西，了解政治动员的意义，所以才能有积极的行动。

2、了解不够，首先要党员干部起核心作用，使群众团结在党员的周围，党员团结干部的周围。

3、党员干部，动员广大的群众把政治主张变成实际行动。

B、深入工作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如不深入工作，不能完成像何绍南的事，实际上是领导斗争把何绍南搞垮了，如工作不深入就不成。工作深入可以破坏一些反动的组织，工作深入，使复兴有斗争，老百姓与老百姓有斗争，这样问题都搞出来了，如果不深入什么就没有办法，深入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了解问题，知道干部中间有多少是坏分子，哪些是坏家伙。才能知道干部群众有脱离的现象，才能使群众团结在我们一旁，脱离了群众什么都不能解决，我们党成了光杆子党，就不能完成任务。

C、又一次证明了我们边区是有力量。有人说边区尽是山，老百姓落后，不讲卫生，外面又有顽固分子搞。边区有什么用，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发财的思想，过去张国焘就是这样的认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现在还有人说，边区不好，搬到外面去好，这种思想不对，他没有把边区的力量来一个足够的估计。有些人对于这次的两大任务没有信心，实际上结果完成了，而且超过了。应该看得宽，看到边区的实际，是有力量的。看看日寇五次进攻黄河，叫我们打退了，后来又两次进攻黄河，叫我们的三八五旅打垮，在扩军微粮中顽固份子内外来搞我们，结果在内部打破了他们的阴

谋，完成了任务。总之，打垮了那些反动的势力，打破了顽固份子来搞我们，说明边区是有力量，所以说边区基本上是巩固的，我们对于边区应该有足够的认识，纠正那种轻视边区的观点，这种轻视的观点是减低我们的积极性。消极怠工，一定也要纠正。把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改正了，我们更要发扬我们的优点，积极性好的工作作风，我们党政军民要更好的去作边区党代表大会所指示的工作，更要坚决的去作，林主席讲我们边区没向巩固发展的道路迈进，我们应使边区向着巩固发展的道路前进。这就是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所作的事光明的一方面、好的方面。我们看另外还有黑暗的一方面，还有许多不好的地方。不好的环境中，还存有严重的缺点。

(二)在严重的环境下，我们存在的严重缺点。

A、在整个方面来讲，全国妥协投降的危机还严重存在，上次党代表大会指示全国的妥协投降危机存在，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政治上配合顽固份子来搞边区，这样边区那能算得最后巩固。全国妥协投降的存在增加了边区的困难，党代表大会已经指出了。现在的严重局面并没有减少，郟县反动武装搞垮了，庆阳何绍南搞垮了，便以为和平了，大家就什么不管，那不行，大家应该认清楚，这是暂时的，我们看过去的大的反动武装是搞垮了，现在还有些地方是反动的武装，反动地方武装，何绍南的反动的武装是搞垮了，可是由何绍南那个反动武装变成了反动的游击队来破坏我们的边区。过去在内战时的反动的家伙在都县，我们消灭了一部分，还有很少的跑到马林那边搞我们。宁县也有反动的武装天天来搞我们，我们看现在还有这些小的反动武装来进行破坏我们，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周围的中央军加多了，在洛川增加了六个师团军队加多。虽然不打就是逼拉杂牌军，军队就是这样子，过去与我们打，结果他们吃亏，现在马林拿中央军把杂牌军拖下水，引起杂牌军和我们打，企图拿杂牌军替他们打下，他们好建立新的政权。

第三、到处造谣，企图准备一个政治基础来打击我们。

第四、在新的区域反革命的势力还没有肃清，反动的组织还存在着，他们在各种形式掩盖下来进攻我们，在那里作坏事，配备反动的游击队。四周作破坏我们的工作。现在在新的区域也围环一样，仍然进行着坏的事情，何绍南是公开的跑了，但是和何绍南一伙的秘密的还没有跑。还在作坏事，破坏我们，我们应该看到他骨子里面去，不要只看大的公开的反动的武装打垮了，就是和平了。因此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严重的斗争环境当中，应该估计这样的问题。现在局面还是很严重，但是有好转的可能，也是要去争取。

B、在主观上还有严重的弱点。

1、在工作上的弱点。一般的弱点在平时不容易看得出来，但是这一次工作比较深入，大家下去，工作团下去工作搞得深入完成了任务。另一方面暴露了我们工作严重的缺点，我们这些缺点是什么呢？主要的是工作不深入这次工作比较过去深入，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也是咱过去工作是不深入。工作不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领导不深入，一般化，不具体，在组织上是形式，在工作方法上是老一套，没有新的创造，什么叫一般化如讨论妇女的问题，如果深入的讨论了为什么妇女工作做不好？还是认真的讨论了吗？恐怕是没有，今天妇女工作搞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怕离婚，普遍的各个都是这样子，妇女工作做不好。如果妇女一身扬霉，有名的土婊子，要他做妇女工作，群众都找不来，这样能算工作深入吗？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不深入，为什么工作搞不好，找出真正的办法，这样工作就搞了。比如宣传教育就要研究实际的宣传材料。比方老百姓说“快快，”你要说“迅速”，老百姓就不懂。下面常常把民主当作是保定，还就根本不深入，比方在自卫军武装部队来讲，还没有组织，人都跑了，这样的工作算得深入吗？比如在工会内有富农是工会会员，这样能说是深入，不能叫深入。比如在青年里面建立广泛的民主的活泼的工作作风。但是下面青年根本同你没有来往，这是民主？青年把老百姓吊起来这算民主？譬如建立一个俱乐部，妇女儿童、青年都不去，这能是青年民主活动。工作那能成为深入，如区委书记贪污腐化，

这些都不叫深入，不论党政军民学说保卫党巩固党，实际的问题在哪里，就在工作深入，深入群众。如果只是讲着深入那是骗人的深入，所以工作深入不是喊的。而是根据上面的指示，下面的讨论研究出新的工作方法代替旧的工作方式方法，过去老一套是相当顽固，应该真正的动员来改变这老一套，不要满足过去的形式方法。组织也是这样，假使真正的把二十万妇女组织起来，那就把问题解决了，现在并没有把二百万妇女组织起来，即有些妇女组织也没有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领导方面，究竟怎样深入，即使说跑到老百姓中，真正的做好事，替老百姓解决问题，创造出一个模范。党对这个有讨论，关于怎样才能作为模范，准备以后吸收各个县去，过去只是喊建立模范乡，模范支部，模范小组。但是没有建立起来，今年要真正的搞一个模范，把自己建立模范的经验教训拿去影响别人，把这经验教训推广到各地。

有些地方的深入工作只是派巡视员下乡，巡视员到一处时间短又是走马看花，这样怎能够反映下面的情形，巡视员回来又不检查，这样怎样能够了解下面的情形。这不叫深入。自己不下乡，只靠巡视员，走马观花，回来又不检查，因此不能反映下面实际的材料，结果是空洞的。各地方给边委的报告都是一般，所以有时有报告就是让别人先看，是不是下面发生了问题，有没有作坏事，有了新的问题我就看。可是都是一般的没有抓住中心工作，深入只有常去接近老百姓，同他讨论，老百姓有了问题，我们替他解决，这样才能把老百姓的事一下搞出来。替老百姓作好事，是很困难，我们应怎样做呢？在这方面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反映下面的事情，那么工作就深入，在群众中有问题就要解决。一般的领导不深入，正因为领导不深入，平时感到没有问题，一到斗争激烈时到处出乱事，干部动摇、逃跑。如果要是领导深入，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次说明了这样的问题。

组织工作不深入，我们组织工作不深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讲起来，群众团体组织很多，究竟这些组织是不是有力量，可以说现在所有的群众团体组织，不能够起作用。这次我们安塞去，召集青年、妇

女、工会都召集不来，从这里看到他们没有他们的工作，这些组织都是形式的，这些组织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实际需要而建立。因此，它是空的，没有实际内容。因此，发生了问题，实际上就是旧形式，求数目字，结果是普遍的一般的而忘记积极分子。过去在群众中也讨论过，要同落后的封建意识作斗争。这方面要组织积极分子发扬他的进步思想，去与落后的意识作斗争，与不卫生、缠足、不识字作斗争，把妇女组织起来，与旧的力量作斗争，使妇女与老百姓作几件事，使老百姓说妇女出来不是离婚，这样妇女工作才能做好。在党方面还没有发扬党与坏的份子作积极的斗争，肃清坏份子，上面是有这样的指示，实际上没有能够很好的组织进步力量和打破旧的力量，比如在延川好多的落后份子搞到我们党内来，就没有同他们斗争，在军队内有赵老五部队的坏家伙，还是组织工作上表现的缺点。组织工作不深入还表现在各个组织对于自己的干部了解不够，党对所有干部的了解，我们相信不够，就我们说对边区一级干部的了解，就不够(对边区比较重要那是知道一些)。对于下面的干部了解很差，对于下面财政经济的干部也是了解很马虎，对于群众团体的干部就更差了。一般的对群众团体干部就是看他们做什么，就让他去，对妇女干部，好的不出来，就把不好的摆在那里。现在只就党的来说，究竟对于下面的干部是不是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上面干部的可以说还是过去了解的，我们说事情是有变化，像张国焘过去好，现在就不好了，所以了解干部应该从历史上了解，全面的去了解，如不解决容易有毛病就出乱子。对于干部不了解，工作不深入也不能发现提拔新干部，国人满足现状，对事疏忽就会出乱子。工作不深入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上面的决定到了下面成了官样文章。决定到下面去讨论不讨论很成问题，往往决定发下去，就不再发下去进行讨论，这样不能把决定变成生动的，也不能实际的解决问题，使坏的意识，坏的份子依然存在，使组织工作不能进步。

再表现于干部远离群众的现象，仍然存在。洛甫同志讲我们提拔干部，为了提高干部，教育干部成为群众的领袖，但是结果干部要贪污腐化，叫老百姓说“只有上面民主”。这说明了干部与群众脱离了，

党要没有群众变成了光杆，党是很危险，所以反对官僚主义，过去在安塞到处老百姓杀那些贪污腐化坏的官僚，假使我们变成那样，老百姓也敢杀，所以变成官僚离开群众是很危险的。根据以上所说的，不能组织积极分子打击坏的份子，组织的决定变成了官样文章，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对于干部不了解，对于干部了解提拔不够，结果出乱子。干部存在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因此，说明我们的组织基础还不够巩固，不够坚强，应该注意这点，我们应该把全边区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因为这是全边区的最坚强的力量。

③宣传教育工作不深入，是文件不下区乡打折扣。这些东西下了乡，老百姓不懂，我走几个县就是这样子，在安塞有一个兴采区那个区委出去传达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第二个阶段就是如此。像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传达决议，怎样能传达下去呢？还有一个乡长去传达决议“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你们收的菜粮很多，你们要多出救国公粮，我的报告完了。”还有××传达，他说“芦沟桥打了一炮，双十二开除了一个张国焘。”像这样传达决议，在县打折扣，到区打折扣，决议到了乡里就折扣光了。所以我们说决议文件不下乡叫做打折扣。所以宣传工作不下乡，去克服他们的思想意识很成问题。文件决议下乡，只是讲上面决定的东西，不懂把决议与老百姓实际生活中一点配合起来向他讲。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主观的，不具体，只靠主观的，下面就另外一套。党宣传部门对于乡村教育太差，宣传部门对于学习的教材教育应该帮助。如果是搞得他们糊涂什么不懂，还怎样称作模范。我们边区政治上正得到了自由，主要的是搞经济文化，如果不实在的搞老是空喊，有什么用？所以宣传部门这方面应注意。

④对于民主主义的作风发扬不够，为什么把这一点放在这里来讲呢？我感觉深入工作才能发扬民主。一般的下面的人对于民主怎样了解的呢？他们错误地机械地了解民主是党的保证，这次我走了几个地方，看到好多的“破鞋在我们党内。说是党的保证，过去安塞一区区委出征也是一样人们都不选他，后来说是党的保证。我们党的保证是

保证不要坏份子到我们党内来，党不是保证坏份子到党内来，党保共产党为人民拥护。党并不是保坏份子，如果这样那保证都起了反作用。有人把党选举认为是民主的全部内容。要党保证选举过去是这样。如果要党保证，还是得民主，假使选举没有民主，那可以作坏事，天天耀武扬威，那这个人的工作方式方法一定是强迫的，这不叫民主。像在微粮中有一人出粮，不能按照数目字出，但少出点，组织部长动手就打，人家还骂，后来乡长就说看面子不打你。粮食加倍，像这种打人骂人叫民主吗？总之强迫命令不知道有多少，恐怕在不管党政军民学内多的很，干部对于下面的事，根本不理老百姓，也不敢讲，他们都是有事保存起来，等到民主选举时再来讲这些事，这样就阻止了民主的发扬，当然也不是乱发扬民主，而是在正确的领导下发扬民主。

其次，工作不深入也是阻止了民主的发扬。不能够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团结积极的份子去打击坏的份子，两个坏分子把持领导机关，如果工作深入，坏的份子不能存在，这样老百姓当然高兴，这是发扬了民主。再我们教育不够，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民主，这说明我们阶级教育很差。他们不知道民主，说觉得保证就是民主，民主教育实际采取我们上面的领导联系着民主，正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工作之风——工作深入不够，结果在党内形势。主管力量的领导，不能够发扬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因为没有深入不能把坏的家伙搞出去，有些人觉得马马虎虎了吧，结果变成官僚主义的领导阻止了党员干部的进步。我们看在上面许许多多的弱点，各种现象，总结起来，基本上有两个弱点，两个中心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阶级教育，思想斗争的薄弱，因此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使得党员干部有许多坏的表现，有许多非常坏的行为，这些事实表现在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互相包庇，强迫命令，而今叛变潜逃，第二，客观上坏的还有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发展，阶级变化，顽固分子的破坏，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个着重在因为和平的环境。党员干部有发财的思想，这些外面资产阶级的勾结，也有关系。

有些干部说，富农少出粮，假使将来国内战争时，他可以帮助我

们。这个说明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在阶级上动摇，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便在党员干部中间发生。

贪污腐化，用各种形式贪污，在卫粮中用大斗小斗贪污，很多形式，贪污腐化是什么呢？堕落、自私自利、假公济私。譬如，我当乡长，你是我弟兄，我可以不让你的弟弟去当兵，我当支部书记，我的亲戚朋友可以不出粮，或者是作了合作社主人，领公家的钱，给自己作买卖。这些发财观点，互相包庇，共同贪污，这些不能使党员干部进步，这些是党员干部不敢有的。有些共产党员，在卫粮中不愿意出粮。在某一个地方富农不出粮，富农与富农联合起来，同贫农进行斗争，仓库主人还向贫农说富农出了，你们应该出些，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够资格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些不是共产党人的，这是国民党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他要团结群众，脱离群众是资产阶级的行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叛变逃跑这些坏的意识现在在共产党员内还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收集起来，给一个严厉的教育和斗争，所以发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证明对于阶级教育，思想斗争的发扬，我们共产党员今天应该把他赶出去。

组织不严密，在阶级教育上，还有自守份子，阶级罢工份子，叛徒混到我们组织内来，是组织不够严密。发生逃跑叛变也是由于组织不够严密，过去在统战区，有一个县委书记把他的工作计划及党员名单由信封寄来，像这样的能谈到是秘密工作，照这样下面还没有能把秘密工作看作重要的事。这是教育工作组织工作，群众工作，对群众切身利益关心不够。这是我们上面说的几个缺点。从上面这些缺点，我们得出结论，可以这样讲，边区组织还不够巩固，在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边区还没有最后巩固，在全国讲不够巩固。在边区内部也是不够巩固，在全国范围，边去四周顽固分子的包围，在内部还倾向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边区内外都不够巩固。

在这次扩军卫粮，我们有很大的成绩，像关中有一百多个干部，参加部队，我们要更加发扬，但是还有严重的缺点，现在我们是在两种不同势力斗争当中。

三，我们今后怎样办？如何克服我们的缺点，发扬我们的优点。这个问题讲得很简单，我只原则上讲几点：

A、要发动全党，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要认识我们的缺点，是相当严重，党代表大会指出我们估计到和平环境中党内混进坏的分子是难免的，当时指出边区党是可以赶出去这些混在党内的坏分子。这个就是我们干部要认识这个弱点的严重。同时有勇气的有决心地克服，这次应该把他们当作深入工作与群众工作做好是有信心的，要决心的干，要动员一切力量看来实现转变，现在要真正的转变工作作风。真正的替老百姓解决问题，不是一面了事，应该作的事情。

1、工作深入进行全党的教育，根据各个组织检查干部各方面实际的材料和实际联系起来，证明这些缺点严重的现象，同时要指明发生的根源以及如何克服他要全党都要这样来做。并且更应当这样来作，强迫命令都是由于工作不深入产生的，我们要从主观上努力打破这种坏的影响。

2、要各个组织由上而下开讨论会，党的组织部宣传部许许多多部门讨论自己的工作，这样来一个动员，各县、各分委都要来深入的检查工作，认真的切切实实的讨论，要克服缺点严重的地方，各组织自上而下的讨论，具体的检查把坏分子赶出去。

3、边区党校各个训练班教导营各分区训练班都要拿这个材料，党内发生的问题作为主要的课程，党报为主要的中心，拿这个无产阶级基本的内容使党的各个组织上，日常生活，工作上都一致巩固党，把坏分子搞出去，也都是一致的，有这样的条件才能转变。

4、由工作团下去帮助工作的进行，是不是真正这样的转变，现在边区分区各级都应该这样子一定下去帮助工作的转变。

B、从上而下开展反倾向斗争，我们看有贪污腐化的有脱离群众的，不堪教育的坏分子怎么办呢？

1、要抓住他们要党员群众认识清楚这是坏的意识行为，要大在

沈阳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集会来热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的签订，这是由于这些条约与协定，不仅对于进一步巩固中苏友好与合作，对于进一步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对于发展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与经济繁荣，有极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于巩固远东与世界和平的事业，也起着伟大的作用。这些条约与协定表明：中苏两大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都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与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都知道：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就存在了极为深厚的友谊，苏联一贯地以其热情而无私的援助给予中国人民，这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的签订，则将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谊与团结用新的条约固定下来了。这个条约不仅表现在共同反对侵略与保护和平建设的政治活动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与文化的互助上。这个条约乃是中苏人民永久合作，真诚友谊的伟大指标。

这个条约关于中苏反对侵略的同盟作了这样明确而有力的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同时在群众反对反动武装的积极性上建立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这样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反动武装就垮台了，我们才能争取新的政权，新的组织。

建立统一战线的模范政权，毛主席指出，我们边区可以要清一色，但是统一战线区一定要容人家的人工作，因为我们是反对包办独裁，如果我们在统战区工作只要自己人，不要别的人工作，那人家全反对我们，这个影响很大，可是我们的干部没有根据这一条。以后我们要建立真正的模范政权，赶走坏分子让人民自己起来管事。如果全国都是这样子，那就好了，顽固分子反动分子都不会来打击我们。我们党

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党有枪有军队，实际上就是这样搞了。这个问题提出应该讨论研究，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模范的统一战线区，真正保持团结抗日，反对倒退，分裂。我们要争取进步分子，团结进步的力量，打击顽固分子。如这一次，我们发动老百姓的力量与老百姓一起一下子就把何绍南搞走了，反动势力打垮，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就按今天具体情况说，要一定有一区半个区是我们的，半个区是人家的，那些顽固分子坏家伙在那搞我们，应该像过去土地革命时，把土地分配给老百姓，多给他们些利益，把他们发动起来，群众的力量就可以把他们搞垮。三边以及离内蒙古近的地方，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顽固分子，挑拨我们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利用他们来破坏我们，如果他们来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初来时，向他们解释，真没有办法时就把军队配备好，同他搞一下，搞来训练他一个月，再让他回去，让他们想想那方面好，感到是自己受骗了。对于马鸿逵马义，都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

注意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党员不要搞得全部暴露，过去的红色干部，今天可以公开，真正的过去搞秘密工作的，就不要暴露，但是还要注意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灵活的联系。开展家乡新区工作，要调动工作能力强的人去，但是调动人时，不要以为我这里的干部不能走，干部少。我们干部是少，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应该提拔一批新的干部。但同时也不要以为没有干部，就不去发展新区。毛主席说“干部要分送到全国。”

以后更加依靠群众，这次你们回去不要向群众要东西。因为是刚刚向他们要过。你们回去以后少向他们要东西，要在群众中间多做好事，多讨论些群众日常生活的问题，多解决些与他们切身有关的问题。把这些工作应在你们议事日程上列为一项。比如老百姓，难民没有地、耕牛、种子怎么办？就替他们找地，帮助他们找耕牛、种子，把劳动力来个适当的配备。比方老百姓中扬霉的现象很严重，假使我们把老百姓的迷信搞来组织一个医务队，在乡下给老百姓看病，也是很好。像这些都是老百姓具体的问题，要依靠群众就要真正替他们做

好事。注意他们小的切身的问题。现在老百姓在政治上已得到自由了，所以应该是着重在经济上、文化上。不要以为政治搞好了，就不管他们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事。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你们每个县的附近的地方真正的建立起一个模范乡。边委要下最大决心，准备建立一个模范乡。

充实各个组织，譬如乡的俱乐部，要研究是不是能搞起来，我想主要的以行政村为单位搞一个俱乐部。过去组织是空的，没有人，没有工作。今后应该先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其他的人就会跟着来(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后讲关于妇女工作，这个问题过去党政讨论过。要帮助教育妇女干部，关心妇女工作，但是这方面做的非常不够。最近妇女工作搞得不好，主要的一环就是干部问题。过去提拔妇女干部都是看漂亮不漂亮。有些地方，就是干部提拔了漂亮的做了自己的老婆。再不是叫人家打游击，这样就不好一方面对党不好，另一方面对妇女本身不好。这样满身扬霉到处打游击的妇女干部怎样能把工作做好。提拔好的干部提不出来，可是党对这都马马虎虎的过去。

妇女工作中，中心的一环是干部问题，我想以后要叫妇女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所有的分委、县委、区委及乡的委员，你们的老婆能够做事的把他提出来。这样子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让自己的老婆出来工作，老百姓看区委书记的老婆就出来工作，跟着别的妇女也出来。一般人也就转变了过去的观念，党政对妇女也就注意了，你们回去一定要这样做。谁的老婆做妇女工作，一定寄在工作报告上。

关于妇女组织过去的有名无实的组织就不要了。过去那些坏的人把他赶出去。好的说说给他们组织起来。也让他们参加生产，种菜，种地。参加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活动。究竟怎样做妇女工作要大家动员所有的党员的老婆参加妇女工作。如果一个村有二十家其中有六个共产党员参加，那么这个工作就容易搞起来。现在就是要你们的老婆下乡去，去真正的替妇女做些好事。

保护干部，爱护干部，要在你们的议事日程上列为一项。如果说领导人什么事不管，看到别人做，那结果变成了尾巴，要领导人真正的起作用。以求得妇女工作有大的转变。

大家回去好好的研究讨论使妇女工作有转变，把过去坏的完全赶出去。可以教育的还要教育。同时还要纠正过去对于提拔妇女干部的缺点，纠正党员对妇女的落后意识，在党内进行教育。

以上这些工作，希望大家回去真正的去做。要做的深入，真正替群众做好事。老百姓的工作做好，才能够保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做好。我们要把那些传达及所有决议要好好的研究讨论。并且与实际联系起来。保证提高边区去巩固边区，保证提高自己帮助人家，以求得到党的最后胜利。(大鼓掌)

延安干部会关于运盐工作的问答

(一九四一年)

问：动员大批人和牲口去运盐，家里草没人锄，地不能翻耕，荞麦、春麦、菜都种不下，那就误了农时，误了大事，怎么办？

答：我先说锄草。头次(最难锄的一次)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次，比较容易。我们要有组织的来补充新的劳动力。

强壮妇女可以锄草。延安壮年妇女一万以上，除去妊妇三分之一，带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强力壮的总还有两千个，可以动员组织她们上山。这时候我们同志的家属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动，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传鼓励，妇联会也努力加油，不会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会也应努力动员一下，青年应该成为锄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点轻松的事。

还有难民，他们除照顾自己的庄稼以外，劳力还有剩余，可以组织扎工队到各家锄草。许多难民借了附近老户的粮，用自己的力去还清借粮岂不两得其利。

照计算延安一县动员六千牲口去运盐，不过抽动二千个壮丁去赶牲口，如果有办法把妇女、青年、老人、难民都组织起来，保证能够抵得上两千个壮丁吧，锄草是决不会耽误的。

再说耕麦地，这就首先要将麦地到底有多少垧数，所要留的每头牛力到底有多大，计算得完全切实，要对老百姓说明白，是为的最恰当的解决牲口，把必需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误了运盐，留少了耽误了种麦。则尽量把所有强壮有力的牛上路运盐，母牛、比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够才留下少数壮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组织，互相调剂，彼此照顾运盐，彼此照顾翻地，彼此照顾锄草，要双方都顾及到，不但运盐计划要完成，而且庄稼也必须锄好，绝不能因运盐耽误了庄稼。我们的老百姓如此的团结一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问：运盐路费太贵，赚不了钱，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办？

答：运盐贴本，这个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长得迟，不能放场；路上自己不带吃粮，用费成本高等等。

现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打算松开要除上边有一二站路没有草，现在麦割了，所以装两袋麦穗、一点麦麸带去。还不放心，再做些准备，往上走时带点草，到一个地方留下来，记下账，存在那里，牲口回来时吃，也就解决了。

至于人的粮食，在家时也不是一样要吃？一个人带八升粮米，午饭锅，自己做得吃，也不会比家里吃用贵多少。

一乡一区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赶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栈，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来做好饭，等得牲口队到了，松下驮子，牲口放青，人吃饭，老实一点用钱，路费决不会很大。

每人赶三个牲口，自带粮食都算钱，也不过花费百元左右，三驮盐起码卖上四百元，运盐是有钱赚的，赔本是例外。

问：给公家运盐，只给二十元脚费，尽吃米也不够。

答：这或许是真的。但要知道，盐本不要钱，由公家出，草料放青不算钱，人在路上吃粮食，再吃他一回羊肉，所花的钱不多，可要大家公摊，不过要保证不乱花钱，乱花的钱大家不负责。

问：有牲口没有钱，怎么办？

答：这要采取互助的办法，有钱的借些钱给他，盐贩了还账。

问：牛驴驮一慢一快，走不在一起，顾得牛顾不得驴，怎么办？

答：当然不能把驴去迁就牛，要采取变通合作的办法，如有张王二人，各有牛驴，则张赶牛(包括王的牛)，王赶驴(包括张的驴)，这样互相照顾，问题就解决了。还有更好的合作办法，如一个行政村内，把所有运盐的人组织起来，牲口用具集合起来，一部分人随牲口去运盐，一部分人留在家里照看庄稼，利害共同担负，这样还可节省人力，而事情可以办得更好。

问：一家仅一头牛或一头驴去驮盐了，岂不会荒了地？

答：这还是要互相调剂，采取合作的办法，把牛或驴捎给别人带，出米数升，作照顾牲口的酬劳，家里的地用人力换牛力，自己走了的也由大家互助，你捎我的牲口驮盐，我的牲口就替你耕地来解决，不能荒一亩地。

问：牛不惯驮盐，如何办？

答：没有一头牛是生来惯的，第一次要把鞍架口袋绑结实些，让他跳两下，硬把他的劲揉下去，再在前面有驮惯的牛带路，不惯的牛也就跟上走了。

问：牛驮盐走长路，把腿驮硬了，不好耕地。

答：一年驮五次盐，是决没有什么牛腿变硬的事实的，这个疑虑

是不必有的。何况路又修得很好，不会出岔子的。

问：路上拉差如何办？

答：现在已明令禁止拉差，非军事紧急动员，或救灾的急迫任务，由政府负责动员民众外，所有运盐牲口，都不准乱拉差。

问：动员工作太多，顾不来怎办？

答：现在以保证农作，保证运盐为第一重要工作，其他动员一般的要禁止，必要动员的也要和运盐工作配合着做。各方面都照顾到，而以运盐为中心。

问：盐销不出去，如何办？

答：按过去每年计算也要销盐二十多万驮，外边还是要盐，只要我们成本低，盐价贱，多想方法向外运，是不会销不出去的。

问：有些人不想去驮盐、卖柴(在延安能赚钱，并且当天就能回家不难，有钱人怕苦，动员不来)。

答：卖柴固能赚钱，运盐也可赚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边区大家过好日子是每个人的责任。对富有的人应该向他说，“你的生活已经比别人好，别人都运盐，你个人破坏这个运动也不好。并且运盐也并不怎苦，很多人同伴走，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路，说笑唱歌有什么苦？八路军在前线打仗，牺牲性命，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幸福，运盐就算得苦吗？”他们也就明白过来，愿意去运盐了。

问：有少数人故意破坏运盐，有的是反革命分子造谣言，有的是公务员图私利，怎样克服？

答：对反革命分子要查出来，在群众中揭破他们的阴谋，和他斗争。

只顾私利的公务员，应教育他说服他，不服从的应给以制裁。我们的干部党员要起模范作用，首先要把自己的牲口动员去运盐。

抗属也要参加，这样民众看见干部抗属都运盐，就都服气了。

问：有些人把牲口卖去，躲避运盐怎么办？

答：这是因为他们把运盐和运公盐混淆起来了，要向那样人解释清楚，运盐是有利的，并举出实例给他看，他就不会卖去牲口的。

问：干部跑不来怎么办？

答：干部跑要有计划，要使乡级干部有很好的了解，大家只有一个意见，说话一致，精神一致，能够答复百姓所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且和群众共同讨论，向群众学习，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大家有决心，困难能解决，自然兴趣就更多了，工作也容易推动了。只凭少数上层干部跑是不成功的。

运盐是边区目前第一等重要工作，干部认不清楚这点，就缺少信心，不认真对民众解释，是运盐的极大障碍，现将高岗同志在延安答复干部的疑难问题记出，借作各地运盐干部的参考。

为实现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

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我党所提出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来，迄今已两年多了。在这时期中，我边区的全体人民秉着热烈拥护和忠实于这一纲领的精神，尽了极大的努力，不管日寇汉奸如何处心积虑的破坏，不管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在军事上的多次进攻及其在经济上的限制封锁并企图窒息与困毙边区的一切阴谋，我们毕竟是胜利地坚持了我党中央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执行了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政策，在边区内部的政策、经济、

文化、建设各方面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当着孙中山先生关于实现民权主义的遗教已为国内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践踏与破坏无余的时候，我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愈是蒸蒸日上。在彻底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确定了“三三制”的具体政策；健全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组织机构。在绥德分区 75 名参议员中有 50 个是国民党员与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分区的最高政权机关——专员公署已有国民党 3 人及当地绅士 7 人参加领导；绥德、米脂两县县长均系国民党员充任；其他如陇东、郃县等地的参议会或政权机关内亦同样的有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及无党无派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光辉例子。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虽有客观方面的不少困难与限制(如资金之缺乏，人口之稀少，交通之不便，以及对边区之封锁破坏等)，两年来所获得的成绩虽还不够，但亦可差强人意。根据我手边不完全统计材料，18 个县的耕地面积，已由 8994487 亩扩大到 11717762 亩，畜牧由 938685 头增到 1932036 头；在工业上国营企业的工人已增加 4 倍，边区的难民工厂已成为纺织业中心，它所生产的毛布、棉布、毯子等均已相当精致；生产合作社于二十九年内即由 10 处增至 17 处，股金由 57740 元增至 65166 元。商业的发展更属显然，如延安市的商业资本两年中约增加 10 倍以上，商店数二十七年只 90 家，至二十九年则已达 320 家。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生活大大地改善了，广大的贫苦农民已逐渐转变为饱食暖衣的家庭。根据最近延安、甘泉的 14 个村庄的精确统计，过去 77.57% 的贫困农民已上升为中农，2.56% 上升为富农，雇农有 37.74% 上升为贫农，49.05% 上升为中农，1.98% 上升为富农。又据延安 4 个行政村 228 户去年春的调查，二十五年前中农 10 户占总户数 6%，现在中农 126 户，占总户数 55%；又延安西区四乡，土地革命前中农 10 家，现在中农 64 家，增加 6 倍以上。从这些铁的事实中看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农村经济是向着繁荣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区域广大农民群众的日趋贫困破产的情形比较起来，恰是一幅动人的

对照。

讲到文化建设问题，两年来的成绩亦颇有可观，十年前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大众化”的口号在我们边区是真正的实行起来了。在这里早已实行了向广大劳苦群众开门的免费的国民教育。小学校在民国二十九年一年内已由 863 所扩大至 1342 所，学生由 22516 名扩大至 41230 名；半日学校的两年中由 256 处增至 359 处，人数由 3994 名增至 5741 名；民众教育馆在二十七年只有 2 处，现已增至 17 处；民众剧团亦已由两个增至 11 个；民国二十九年春在边区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出版了为边区老百姓所欢迎的报纸及各种通俗刊物；去年冬在延安全县采用新文字，扫除文盲收效甚大，边区教育原只有两所，现已增至六所。特别是在抗战文化发展中心的延安，对于全国的抗战文化事业更有巨大的贡献，如军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女大、抗大、陕公、自然科学研究院、医科大学、行政学院等培养各种抗战建国干部学校的创立与发展，数十种进步报刊杂志的出版，数百种革命理论书籍的印行，不仅可以满足全边区人士的要求，而且能供给全国各界的需要。此外还值得指出的，就是在边区的文化教育界充满着民主的自由空气，这不仅表现在各学校学生均有参加学校管理和自由研究的权利以及学生中包括着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级的青年，而且在教职员中同样容纳着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人士参加，如边区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的校长均是无党无派人士，在绥、吴、清 3 县的小学教员 328 人中共产党员只占 13 名，而国民党员则有 18 名。这些事实不仅有力的击破了某些反共顽固分子的造谣污蔑，而且清楚的证明了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才能真正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

两年来事变的发展与上述各方面成绩证明了第一届参议会所通过之施政纲领是正确的。但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的发展和要求，由于我党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丰富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指明着这个过去是正确的纲领在今天已是有些不够了。而适时地代替与补充它的，正是本党于本年五一劳动节向全边区人民所颁布的新的边区施政

纲领。

(二)

新的施政纲领的重要性及其严重的政治意义，不仅由于它是吾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纲(十大纲领)之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不仅由于它总结了吾党将近二十年的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尤其重要的是因为当此国内外形势正处在极端严重的转折关头，吾党适时的正确的指出了全边区与全中国人民共同一致奋斗自由与强盛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战斗旗帜。它的全部内容显现着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各方面的具体化，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迫切利益和要求。

它首先代表着本党向全国人民再一次的表明我党愿与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行为的一贯态度；表明边区人民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一切有意破坏或进攻边区的企图，都只有利于日寇灭亡中国的行为。

它代表着全国人民反对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排斥异己、以及“限制异党活动”的种种错误政策。纲领第五条指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它代表着全国人民反对国内统治当局之践踏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以国法为儿戏、视民命如草芥的黑暗横行。纲领第六条指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利。除

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第七条指出：“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纲领中第八条指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这对于一切痛恶大后方官场中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发国难财及其他种种黑幕的正义人士实是一个有力的”。

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纲领的第十四条指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业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行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所有这些，不仅充分表现着边区文化教育政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而且若把这些规定同目前大后方所盛行的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特务密探满布于各个学校中，以及进步青年大批被赶入集中营内的种种奇形怪状比较起来，实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发展与奖励农工商业，保障抗战需要，调整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实行合理负担，适当的改善人民生活，推广卫生行政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诸问题上，纲领的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条文中均有明确而恰当的规定。要之，在整个纲领的字里行间，充分的显示着新的施政纲领是完全根据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吾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是完全符合于我中华民族的全

体利益的。

(三)

新的施政纲领的内容及其严重的政治意义既如上述，则置在全党同志面前最紧迫而最重大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去发动与组织全边区与全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为此，我认为必须：

第一，全党的干部及每个党员必须切实执行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首先在党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讨论，一切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应该对纲领作逐条、逐句、逐字的研讨，并加以熟读；每个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党员应以之作为教材，要记着，如果党员自己还不了解这个纲领，就说不上怎样认真的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而只有认真的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在党外组织对这个纲领的报告、讨论、研究。在民主的选举运动中，即以此纲领作为我党参加竞选的政纲，在讨论与谈话中，应欢迎与尊重党外一切人士的批评，而且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帮“好”或“赞同”的意见，必须进一步的发动他们说出老实话，提出批评意见来。只要他们是善意的批评，不管其方式与态度如何，均须加以虚心的考虑与采纳。

第三，在党内及一切为本党所领导之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需根据这纲领的每一条文来检讨其本身过去的工作。如发现违反这纲领原则或细目的任何倾向与表现——哪怕是最小的表现，均应立即加以纠正。并应向群众作公开的检讨及承认自己所犯的过失。

第四，在讨论与执行这纲领的过程中，必须防止与纠正一切有碍于纲领全部实施的各种借口或倾向，如说：“我们这里已没有党外的公正人士。”或在实际上表现对于党外人士的不尊重，商慢自大，

把持包办，及其他缺乏民主作风的倾向，均须及时的加以解释克服。有意违反与不愿意改正者，应受到党内严厉的纪律制裁。要帮助每个同志明白我们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向全边区及全国人民所提出的纲领，是党的郑重诺言，而实行党的诺言是每个党员神圣的责任，谁违背了这点，谁就是破坏了党的威信，触犯了党的纪律。

边区的全体同志们!让我们同全国同胞更加紧紧地握起手来，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吧!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胜利定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

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

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全边区二百万人民的努力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上，都有着不可否认的成就。边区是在不断地提高与巩固自己，使自己在抗战建国的事业中，能够发生更伟大的作用。

全中国的人民关怀并爱护着边区，因为他们知道边区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全国抗战建国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的有机部分；他们欣喜于边区在建设上有所成就，因为他们知道边区的成就不但是边区人民的幸福，而且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绝不会像亲日派反共派那样，视边区为眼中钉，天天叫嚣着：“取消它，取消它!”把边区当作封建割据，要对它来一个进攻，又来一个封锁；相反的，他们认识到边区是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是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一个支柱。

憎恶边区，天天苦思梦想要来进攻边区的是另外一些人。首先，日本帝国主义者及汉奸是不高兴边区的，因为边区是它灭亡中国的障碍；其次，顽固反共派的先生们，对边区也心怀不满，他们不是说边

区是“新的封建割据”，就是说边区是“不合法的存在”。对于这些先生们的造谣与污蔑，只要举出抗战四年来边区各方面建设上成就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他的叫嚣是毫无根据不值一驳的。

现在，让我们展开四年来边区在建设上的成就的这一幅图画吧！

四年来怎样保卫了这一块根据地

边区地濒黄河，和山西隔河相望，河东的敌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打着算着偷渡过来向边区进攻的。所以巩固河防，粉碎敌人进攻边区的企图，就成为边区人民的伟大任务之一。而这一任务的主要负担者，则是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同志们。四年来，敌人曾十几次地进攻宋家川，几次地进攻马头关、凉水崖，而且在民国二十七年底三月，敌人还曾经一次地进攻过神府城。然而这一些进攻，都被边区的全体人民配合友军友区人民击溃了。在执行保卫河防的战斗任务中，边区的河防队伍都表现了他们的英勇坚决、吃苦耐劳的精神，××旅×部的河防队伍，曾经在半夜里牺牲睡眠的时间，连修了一个多月的河防工事。当敌人某次进攻康家塔的时候，驻防在这儿的某团的一个连，已经有三十几个人中了敌人的毒瓦斯，然而并没有一个人畏缩退却，仍然是镇定、坚决地把敌人打垮了。敌人首次进攻河防时，×部队伍曾派出了一部分队伍到河东汾离公路一带袭击敌人，结果我们除击溃进攻之敌而外，还缴获了步枪四十余支，轻机关枪两挺及电话机、望远镜等军用品，并消灭敌人二百余人。正由于边区的部队、人民坚决英勇地保卫了河防，所以才巩固了边区也巩固了西北。可是，边区的武装部队、边区的人民不仅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过战，而且还和许多扰乱边区的社会秩序为日寇作内应的土匪作过战。这些土匪有的是日寇、汉奸直接派遣来破坏边区的鹰犬，如日伪指使的薛芝茂股匪，托派勾结的李钦武股匪等，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破坏边区的秩序，而且与敌人对河防的进攻取了配合作用。要巩固边区，那就不能让这些鹰犬

存在。算到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时候为止，边区的部队和人民已经经过数十次残酷的战斗，消灭了大小四十余股土匪，如甘泉的刘庆五股，安定的刘子清股等等，击溃击伤的有八百余人，俘虏的约有四百余人，缴枪一千多支。肃清了这些土匪，就使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秩序能够安宁下来。

然而为了保卫边区，还得反对顽固反共派的无理磨擦。有这么一些反共分子，他们明目张胆的公开进攻边区，因而造成许多不幸的事件，如：陇东事件、郃县事件、靖边事件等。边区队伍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的进行了反对无理磨擦的斗争。而在这些斗争里，打退了反共分子的无理进攻，这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边区民主建设的必要步骤。

反共分子向我们进行的武装磨擦，不仅为边区人民、全国人民所反对，而且就是被反共分子命令来进攻边区的部队中，大部分的战士与军官也都是不愿意执行这种有背于抗战利益的“任务”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反共分子的某一部分驻防在某地时，有一排人驻扎在离边区很近的一道防线上，准备进攻边区。有一天，这一排战士互相闲谈起来了，大家都表示不愿意打边区。有一个战士说道：“我们不怕前面的八路军，因为八路军不会乱打人的，而只怕后面的长官来命令我们向前打。”这时，排长恰巧来到了，听见了这个战士的话，就说道：“真冤枉，我也不愿打八路军呀！”由此，我们可以见到真理是在哪一方面。

敌寇、汉奸、反共分子对于边区的破坏，除了采取公开的军事进攻的方式，还进行了另一方面工作——派遣侦探、奸细到边区内部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这一条战线上，边区也与乱人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而且取得了相当的胜利，譬如说单是民众的锄奸组织，就已经破获了数百件的奸细活动。这一方面斗争的胜利，无疑对于边区的巩固也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

保卫边区的斗争，首先自然不能不依靠于边区武装部队——留守

兵团与保安队。这样，建设、提高这些部队的工作，就有其重大的意义了。四年来，在这一方面，边区是收获了许多成绩的，其显著者如部队游击习气的克服，正规化基础的奠定，各种制度、组织的建立，新的兵种——骑兵之组织，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等等。保安部队战斗员从前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现在战士中百分之八十可识二百字以上，干部大都能看懂《解放日报》。这一些都是武装建设方面之一般的成绩。

武装建设的成就不仅是在正规部队上面，而且是在民众武装上。例如说自卫军，据不完全的统计，全边区的自卫军有二二四三二五之多，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妇女。这一种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组织，在平时警戒放哨，战时则配合主力军作战，并经常成为主力军的补充者。他们在保卫边区的斗争中，常起着重大的作用，如二十七年敌人进占神府时，延长、固临一带有四千多自卫军，一千多牲口，配合主力军开赴前线，并曾渡过黄河去扰乱、钳制敌人，在火线上运回胜利品近六十万斤。四年来，自卫军是有了进步，这表现于自下而上的指挥系统的建立，军事、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每人保证有一件武器及担架、运输工具等等。

保卫边区，不仅有赖于武装部队，而且还得依靠于人力及物资的动员。四年来，边区的抗战动员，收获了许多成绩，例如说兵役动员，那么在第一次参政会的两年，就曾经先后动员过自卫军、少先队八千名加入抗战部队；二十九年冬又动员了将近五千人参加八路军中。又如粮食动员，二十六年开始征收救国公粮，收到一万三千八百石，二十七年收到一万七千石，二十八年收到五万二千石，二十九年收到九万七千石，都超过了预定的数目。再加二十年冬募寒衣捐时，单是延安商人，就捐了九万元。此外如运输动员、做鞋动员等等，每次都得到很大的成绩。而这些成绩之所以获得，主要是由于人民已经获得了民主权利，而且生活改善了。这是不能够不着重指出来的。

以上就是边区四年来在参加抗战、保卫边区、武装建设、抗战动员方面的成绩。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吧。

民主政治建设上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在抗战的四年中，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巩固着、发展着。边区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上，已获得了许多的成绩。这些成绩首先表现在边区各级政府的产生上，边区的各级政府——由乡以至于边区，都是由各级参议会产生出来的，而各级参议会又是由人民普选出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到十一月，边区就曾经举行了一次普选，成立各级民选政府。二十八年春，又正式成立了边区参议会；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也进行了改选。本年从一月开始，又进行了一次新的选举运动，现在还在进行中。这些选举都正如《边区选举条例》第二、三各条所规定的那样，是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选举时，没有党派及阶级之限制。《边区选举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各抗日党派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运动。”共产党边区中央局所提出的《边区施政纲领》第五条也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人占三分之一。”边区各级政府，是在人民自己的热烈选举中产生出来，而不是自上而下“委任”的。

边区民主建设的成绩表现在第二方面——政府的组织的成份上。边区各级政府，并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的，而是各阶级各党派共同参加的，例如二十六年选举结果，在当选之各级参议员中，其成份有如此之比例(百分比)：

	工人	贫农	中农	富农	商人	知识分子	地主
县级	4%	65%	25%	1%	1%	2%	2%

区级	4%	67%	22%	2%	1%	2%	2%
乡级	5.6%	71.4%	17%	2%	2%	1%	1%

在本年最近的这次选举中，各地选举出来的参议员也包含了各阶层的人士，例如绥德各保参议会共选出四百六十位参议员，共产党员只占四分之一，其余为商人、地主、开明士绅等。又如清涧城关参议员一五一人，内有共产党员二十七人，国民党员十六人，其余为无党无派各界人士。总起来看，这次选举初步结果，被选人的成份：士绅名流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团体占百分之四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五，国民党员占百分之五〇。

边区各级政府的行政人员，不仅有男子，而且还有好些妇女，例如清涧城关一五一参议员中，女性占二十七人，绥德四六。参议员中，女性占八十人。而边区安塞县长邵靖华，也是一位女性；这是大后方所不能看到的事呵！

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成绩表现在第三方面——人民获得了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在《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七、八条上，与现在《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上都明确规定了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边区人民是真正获得了这些权利的，例如人权，正象《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的那样：“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若说政府，则边区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而且政府不好，人民还有罢免弹劾的权利。若说财权，如《边区施政纲领》第十条及第十一条所规定的那样，并不侵犯私有财产。边区人民真正的集会、结社的权利，譬如群众都有着自己的组织，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入工会，百分之七十的妇女加入妇救会，农民组织成自卫军等；又如边区一个成年人一年中约参加一五〇次会议，

边区人民现在嫌会多(这点，我们正在设法改善)，而决不会象大后方那样感到不能开会之苦。边区人民有思想、信仰等等自由权，譬如边区靖边、定边、延长等地还有天主教徒，甘泉、郎县等地还有基督教徒。

边区不仅把民主权利给予人民，而且更在物质上保证人民行使民主的便利，在边区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尽一切可能以房屋、纸张、金钱等来供给人民的集会、结社、出版等等的需要。

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成绩表现在第四方面——边区的少数民族也和汉人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利。边区少数民族多分布于关中分区的新正县，庆环分区的曲子县，三边分区的定边、盐池等地。边区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正如《边区施政纲领》所规定的：“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其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少数民族在边区同样有选举权，边区选举条例还对他们的选举有特殊的规定。他们同样能参加政府工作，如新正县第一乡有两个回民参加区政府；他们同样有信仰、组织等权利，譬如清真寺、回教救国协会等组织。他们有营业自由，政府竭力帮助蒙回群众改善其生活。总之，他们跟汉族一样有着民主权利。

边区民主建设成绩表现在第五方面——政府不是高高在上，与人民脱离了关系的政府，它是与人民紧相联系着的，它是关心下情，留心民意，体恤民艰的。人民的呼声，政府决不充耳不闻；人民有困难，政府决不袖手旁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赈抚灾难、救济流亡的工作来说，边区政府曾经免征过遭受天灾的靖边、环县的公粮，曾经拨款三万元救济过绥、吴、清等县的灾民，曾经颁布而且实施了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的决定。政府的工作人员决非尸位素餐的官僚，而是关心民间痛苦，刻苦耐劳，一心为公的人民的公仆。

由上所述，可见边区的四年来对民主政治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劳绩。同时我们可以见到边区的政权，是真正的民主的抗日民主政权，

边区人民，得到了民主，边区政治是真正符合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现在我们再来看边区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

在经济战线上

陕甘宁边区本来是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方。革命前，浓厚的封建残余在这儿存在着：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苛捐杂税达八十余种，放债利息高到每元每月一角五分，广大的贫苦人民呻吟于封建势力的淫威之下，终岁所入，不够温饱，若遇天灾人祸，则流亡失所，死于沟渠。革命后，广大贫苦人民分得了土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过去内战时期不断的战争环境里，要有计划地从事于经济建设，当然是极端困难的事情。停止内战，国内和平之后，边区经济建设才迅速发展起来。为了抗战需要，为了改善民生，边区经济建设更须要大大开展。自然，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遇到了些困难，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克服困难的优越条件，如政治上的保证，人民的觉悟，某些丰富资源的存在等等。进行边区经济建设，须估计到发展的前途，不废除私有财产，又要顾到多数人民的利益，四年来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表现在哪呢？

先看农业。农业建设成绩之第一方面是耕地面积之增加，四年来耕地面积之扩大有如下表：

二十五年四三一〇〇〇亩

二十六年八六二六〇〇六亩

二十七年八九九四四八三亩

二十八年一〇〇七六〇〇〇亩

二十九年本定开荒一百万亩，结果完成了百分之八十，有的地区

耕地的扩大更为速迅。

安定五个区五年内耕地增长表：

年份	可耕地(垧)	熟地(垧)	荒地(垧)
二十五年	85000 垧	5000	35000
二十六年	同	523000	32700
二十七年	同	53000	297000
二十八年	同	723000	127000
二十九年	同 80900	4100	

就在这数年内，安定五个区，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

农业建设成绩之第二方面表现在水利之增修上。二十六年修水利八。一亩，二十八年则为八。一。亩，二十九年因洪水冲毁，原定修水利一万亩之计划虽未全部完成，但也得到了一部分成绩。

农业建设成绩之第三方面表现在牲畜之增加，其增加数如下：

年份	牛	驴	骡马	羊
二十七年	102676 头	70801 头	1568 头	761464. 头
二十八年	123963 头	97407 头	2040 头	1012786 头
二十九年	148408 头	94334 头	1817 头	165120 头

(上半年九个县的统计)

牲畜是边区的主要财富之一，牲畜数目的增加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农业建设成绩之第四方面，表现在农民生活的改善，如据安定四个行政村二二八户，二十九年春调查，二十五年前有中农十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六；现在有中农一二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十五强。又如农民蒲正盛，二十四年到郭梁畔时一无所有，现在有地八垧，牛三条，羊十七只。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

农业建设成绩之第五方面，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之某些改善。譬如政府提出深耕，甘泉深耕结果，平均每亩可收一斗八升至二斗(以前只收一斗六升)。又如现在设立模范农场，研究农业生产的改良。现在农业生产技术还颇落后，但是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而且着手来提高生产技术了。

农业建设成绩之第六方面，表现在人民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上，譬如自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进行生产运动以来，边区的人民都热烈的卷入到生产的浪潮里，连许多从来老守在家里的妇女，都参加了生产；二十八年延长等八个县的妇女就开垦了三万零六百二十六亩荒地。

上面我们大概地叙述了农业方面的情形，现在转过来看看工业建设吧。

在工业建设上，旧社会遗留给边区的是如此的菲薄啊!抗战以来，边区这块工业的荒原上创立起一些初步的工业建设。边区在保证自给自足这一个方针之下，着手来创办一些这一地区所未有的工厂。在轻工业方面，有纺织厂、印刷厂、造纸厂、造革厂等。重工业则有机械厂等。这些年来工厂的产量都有着显著的增加，如兴华制革厂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九月，硝制面皮三八。二张，而四一年一月份即产一二六五张，二、三月份共产二四五〇张，副产品毛包四五〇对；又如难民纺织厂，三九年产棉而三〇〇匹，四。年产棉布二一〇〇匹，毛呢二百余匹，毛毯四百多床，四一年仅是一、二、三三个月即产棉布一二三〇匹，共值三四六〇〇〇元，同时出产毛毯一。七七床，共值三三六四四三元。量上增加，质上也有进步，如难民纺织厂所出毛毯，开始

甚松，现已较密；如制革厂之硝革，柔度与去脂都日益改善。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些公营工厂里，工人与厂方之间存在着新的生产关系，工人不是作为一个被雇佣者而参加工作的，他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翁。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工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工人们对于生产就采取了新的劳动态度，劳动的积极性增高了。许多工人日夕思量怎样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生产更多的东西，如制革厂过去为每人每日七十张弱，现在九十张强；过去推毛六十张，现在九十张。又如难民纺织厂四。年每日每人织毛毯半床至一床，现在则最高的达八床；四。年一月平均日产棉纱五三二尺，今年一月产九四五尺。

以上所说的都是公营工厂。除此而外，私营手工业也有些增加，二十九年边区私人手工业较二十八年增加一倍。

除了创办工厂而外，边区还注意到地下资源之开采，如盐、煤、石油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边区在工业方面还有些新的创造，如新华化学厂能在物质缺乏的条件下，自制苛性纳、小苏打、芒硝等用品；又如造纸厂，试用马兰草制纸成功等。

虽然边区的工业建设主要还是手工业生产，但是总算在这一块地区已撒下了轻工业的种子，等待相当的时日吧，种子总会开花结果的。

商业是经济建设之另一环节，由《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边区施政纲领》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自由贸易是加以保护的。实际上，边区商业也日益在发达中，以延安而论，私人商店二十七年九。家，二十八年一四九家，二十九年三二。家；两年以内，商业资本增加十倍以上。此外有公营商店，公营商店不仅把眼光放在营业上，而且保证边区贸易政策之实行。

工商业发达了，需要便利的交通来运输产品于各地，边区当局也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四年已经开了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最近又完

成定庆、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绥靖等一千里大车路。

合作事业之发展是边区经济建设成就之又一方面。单以二十九年上半年而论，社数由一一五处增到一三〇处，新社员增两万多，全部股金达二十万元，公积金达一万八千多元。办得好的如延安南区合作社，二十六年股金一五九七元，社员八。人；二十七年股金一五〇〇元，社员四〇〇人；二十八年股金、社员均增加了一倍，公积金一千二百元；二十九年股金一一〇〇〇元，社员一〇〇〇人，净利九千六百元；三十年股金二二〇〇〇元，社员包括了南区所有的每一家人。

除消费合作社而外，也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剥削人民的工具，而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经济建设之发展，跟合理之财政政策有极大的关联。边区财政政策一方面要适合抗战需要，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人民的负担。这一政策之具体施行，首先就是废止过去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而实施合理的税收制度。所谓合理，即是“取之有道”。边区的税约有公粮、商业税、货物税等，征收时注意实际情况及征收方式。至于支出，则边区的支出主要是用在抗日军事需要及文化教育的需要上。

边区的金融政策，也是要符合于抗战需要的，银行投资主要地日益转到生产方面来，并用合作社、公营企业及广大民众的力量来保证边钞的信用。

总起来讲，边区的经济建设在抗战四年中得到不少收获，而现在还在发展中。边区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边区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那么文化呢？边区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四年来边区的文化建设有了怎么样的一副面目？

四年来的文化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地区以前在文化上说，是一片荒漠的地带，人民被

关在落后与愚昧的圈子里，得不到一点文化的滋润，小学校不过一百二十处，学生仅两千人，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二。

然而自革命与边区建立以后，文化上也可说来了一个革命。延安，这一个本来是荒凉的小城却一跃而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各种文化人才——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聚集到这里来，各种出版物在这儿出版，各种文化活动在这儿举行。

学校教育也大大发展了，有许多干部教育学校，培养出许多人才；同时也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许多儿童、青年到学校里来，其增加的数目则如下：

	二十六年秋	二十七年秋	二十八年秋	二十九年
学校	544 所	733 所	883 所	1341 所
学生	10396 名	15348 名	22089 名	41458 名

在边区，中学有边区师范、第二第三师范、陇东中学，四校合计学生六一六名，绥师学生二七六名，米中学生一七〇名。

学校里的教材是适合抗战需要的教材，学生有民主权利。这里的学校没有“强迫入党”的现象，没有学生饿着肚子上课的现象，学生与学校不是对立的，而是一家人。

教师也是民主自由，生活上受到保障。

社会教育也有了一些成绩：二十八年共有识字组三八五二组，男女组员二四〇八九名；半日校二〇二年，学生三三二三名；夜校五四八所，学生八〇八六名；冬学六七三所，学生一三六〇九名。二十九年夜校半日校入学人数共一四〇〇〇人，识字组员二四〇〇〇人。新文字运动在这里得到政治上的保障，并大大推行起来。大众读物不断出版，供给大众以精神食量。

民主政治给予文化的发展以极大便利，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爱护人才。这与大后方之思想统治，摧残文化，是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文化是真正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克服缺点向前迈进

以上，我们对边区四年来在各方面建设的成就作了一番鸟瞰，边区建设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其发展虽还不够，但是就是这一些成就已有着它的重大的意义了。

可是，我们应该坦白的承认，在边区的建设上，除了成就还有缺点，甚而是严重的缺点。缺点有哪一些呢？

首先，在武装与武装动员方面，部队的新的战术训练还很不够；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常识、自然科学的常识以及文字知识，还在部队中教育的很不够；一部分中下级干部的军事素养还比较差，部队在各方面的正规化还不充分。此外，抗日自卫军与少先队的训练，还不很经常与充实，保证部队给养的工作，还须有计划的统筹组织与调剂。这些是巩固与加强边区武装所必须克服的缺点。

其次，政治建设上也有缺点存在着。民主制度的正规化还不够，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尚未能按期开会，驻会委员的职权尚未充分发挥，一部分不民主的现象还存在着，例如少数人以命令代替政治动员，一部分地区与工作部门尚存在有官僚主义倾向，如某些人不经常关心群众生活，不经常问民众疾苦，不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缺乏自我批评等。最后；还有些人表现对于上级指示、决议等不重视，采取马虎应付态度。这些现象损害边区民主主义的作风，压制了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而造成了个别地方群众的不满，使反革命

分子得以乘机活动(如环县事变)。

边区经济建设也有着缺点的：工业虽然也有了些发展，并有着发展的前途，但是，它还比较是薄弱的。应该说我们在工业上还只是有了萌芽，还需要有更大的严重的努力。在经济建设上我们的另一方面的缺点是在可能范围内的调剂、组织与计划还不够。去年水利建设、种棉任务之未竟全功即其一例。我们还未能充分地各方面地有组织地来实行克服经济困难的对策，譬如最近物价的高涨，虽有敌伪破坏、顽固派封锁及某些奸商从中作祟的影响，然而我们自己有组织的调剂不够。某些公营企业商店，也只图赚钱的倾向，尚未能成为实行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模范。诸如此类的缺点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

文化建设上也同样有缺点值得我们注意，如学校教育制度之不够正规化，如所教的东西过于单纯，关于中国各方面知识教育的不够，自然科学教育的不够，如妇女教育之落后等等，这些缺点，是需要注意改进的。

总的来讲，边区四年的建设，其总的缺点，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如下三点：

一是革命新的秩序之建设还差，这指若干东西尚未法定与正规化而言。二是统一战线工作还做得少了些，这如“三三制”之执行还不够等即是。三是官僚主义倾向还多了一点，这已如前述。

边区建设工作上的缺点是存在着的，它们需要被克服，而且一定能被克服，其关键则在工作者更好的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好的学习革命的理论，并把所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全中国的人民仰望着陕甘宁边区！

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与困难，更加向前迈进吧！让我们更加提高与巩固边区，使它成长得更壮大吧！让我们更加建设边区——使它成为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更有力的支柱吧！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各位参议员，各位政府委员，各位来宾：

今天是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典礼，我首先向各位参议员和政府委员表示诚恳的慰问，同时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这一次参议会准备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慰劳。

这个参议会与上届参议会会有很大的不同。时间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当中，不管在国际上，不管在中国，不管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各方面都和过去不同了。

在国际上正是德意日法西斯结合起来向全人类进攻，企图毁灭全人类，企图把全世界变成黑暗的世界。在这两年当中，德意法西斯已经灭了西欧十四个以上的国家，两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在他们的铁蹄下当了牛马。到今年六月二十日，德意法西斯又发动了进攻和平的苏联的侵略战争，现在正企图想把莫斯科列宁格勒打下来；另一方面苏联、美国和英国团结的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阵线，特别是全世界人民都热烈拥护苏联。许多被压迫的民族是站在民主国方面反对法西斯，最近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也是表示这一点。现在是处在人类存亡成败的关头，这一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希特勒拿了两万五千辆坦克，二百万机械化师团，以及四分之三的飞机向着苏联进攻。正如希特勒所说的：“这一次战争，是空前的，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但是英勇的苏联红军，勇敢的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为了反对全人类的敌人法西斯，英勇的在那儿作战。他们有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结合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许多被压迫的民族也非常需要这一个统一战线。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应该巩固扩大这一统一战线。打倒法西斯，是我们的任务，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在中国方面，我们看一看：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今天已经五个年头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他所谓“中国事件”解决，我们倒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腿拉住了。日本内阁一次又一次的倒台，最近内阁又倒台了，组织了军人的东条内阁，这一次的内阁更积极的准备扩大战争，参加世界的掠夺，但在今天它究竟是南进呢？还是北进呢？南进呢？“中国事件”还没有解决，它惧怕中英美澳联合起来包围它。北进呢？西伯利亚远东苏联还有强大的红军，另一方面西伯利亚很冷，现在的西伯利亚，倘若人们不注意，把鼻子都会冻掉的。俄日战争时，日本为此吃了很大的亏，所以它要南进、北进，都得考虑一下。它要考虑行得通、行不通，打得了胜仗、打不了胜仗。所以南进北进都有可能，但都有所顾虑。

自东条组织内阁以后，表现了更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长沙、郑州、宜昌等地的战役，以及最近的黄河边上六七千军队天天在军渡、碛口、宋家川、丁家坪、禹门口等地方炮击，天天在答答的放机关枪，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其侵略了，它想迅速解决他们所谓“中国事件”。它的主要目的是把西南搞一下，把滇缅路的国际路线切断，同时它也想把西安搞下来，把通苏联的国际路线也割断，企图把中国与英美苏的交通割断，使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发生关系，把中国装在一个布口袋里面，没有人援助，使中国孤立起来。在这种压力之下逼迫中国投降，因为在那个时候，它可以说，苏联帮你不上，英美也帮你不上，你不投降？这是日本法西斯的企图，它企图把它的泥脚从中国拔出去，参加其他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全中国更加团结，我们的抗战就是由于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民族的团结，所以才能够在坚持五年的今天。因此在今天我们的任务还就在于全国团结一致，坚决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

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全国的人民，进步的人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最近有民主同盟组织的发起是完全必须的。只有在中国大大的发扬民主，才能发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

的进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决的主张中国的民主，我们和全国人民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讲到边区，我们先说一说边区这两年来所处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我们边区是西北国防的最前线，我们边区也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地区，在西北有广大的蒙古族、回族和广大的汉人同住杂处，在这一个地区里，过去我们的政治是民主的，对友党友军蒙回族一般的说也是团结的；但在另一方面，当着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更加紧急的时候，在抗日的堡垒里面还不免有少数亲日分子的活动，他们企图在边区，在全中国，打一打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造谣、挑拨，打算把团结阵线搞垮，使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趁机侵入西北，侵入西南。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边区该伸出手和西北所有的党派，所有的军队，所有的民众，所有的民族团结得像铁一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自己里面，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是最愚笨的最有害的办法，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办法，也是我们边区所坚决反对的办法。今天最好的办法是更加把民主巩固扩大，更加把民主提高一步，把西北的抗日阵线更加巩固起来，这样我们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有力量。这两年多以来的世界和边区有这样的变动，我们所处的形势就是这样。

诸位参议员先生：我们要看到这个战争，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结束的，这个战争是长期的，因此我们以后就要讨论如何能够坚持抗战到底，储蓄力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困难中，今后还要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

其次，我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届参议会应该做些什么事？首先是要检讨政府工作。固然在两年多以来，边区政府进行了不少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们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拿这点成绩，就很容易的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诸位参议员先生，这是决不能够这样估计的。要知道我们政府工作仍然有许多缺点，需要我们各位参议员指出来，批评、指责。我们民主的政府，是不怕人批评的，因此我们要把缺点错误一点一点的指出来，使政府以后能够改正和避免这些毛病。第二，这届参议会是要确定我们今后的大政方

针，我们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团结西北人民，积聚我们的力量，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当前要着手的工作，就是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军事建设，把这些工作质量提得更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物质的保障，这就是我们这届参议会所要确定的大政方针。第三，在确定大政方针以后，要什么人来做，谁能做得更好，这就是必须要这届参议会上产生更好的更健全的更有威信的政府机关，也就是要改选政府，这个政府不是那一党包办，更不是独裁，所有边区各个抗日党派、各个阶级、各个民族都有参加这个政府的权利，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全边区二百万民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最后，希望各位参议员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一切意见都很好的说出来，使以往的错误能够改正，使政府今后工作有明确的方针，有健全的领导机关，把边区这块地方提得更高，团结得更好。这样才能够保卫西北，打退日本法西斯、求得最后的胜利(大鼓掌)。

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位参议员：

现在我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向本届参议会提议，请大家采取本中央局在今年五月一日所发布的二十一条纲领为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我不准备把它逐条解释，因为从发布的时候到现在已有半年多，各位参议员对它的内容已很熟悉，同时国内外各处对它都表示了很大的注意。我准备讲到下面几个主要问题，也就是对于这个纲领颁布后各界人士提出的一些意见和问题加以解答。

首先，我要说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施政纲领，它的基本精神在什么地方？它的基本精神说来很简单，只有七个它，就是“团结，抗战，

救中国。”我们看一看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上给我们的教训，在国家民族危难时，要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团结得好就有出路，如果分裂就没有出路。我们看，当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全国团结，所得到的是北伐胜利，就有力量摧毁北洋军阀的统治，收复过武汉九江的租界。而团结破裂的时候呢？所得到的是东北四省被日本帝国主义拿去，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化基础的建立，以至日本这一次进攻中国，使我们民族遭受了千古未有的磨难！我敢说，假如我们全国在当时一直团结下去，有很强大的力量，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所幸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又能团结起来，以此坚持了五年的抗战，重新奠定了民族解放的基础。由此可见，团结和分裂，利害是很分明的！所以我们的施政纲领开头就主张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纲领是经过我党二十多年的斗争经验，探讨总结而制定的。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至今还是半封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国家里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是屈指可数，无产阶级也不过是几百万；但是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其中的绝大多数乃是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独裁，而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大家来赶跑日本，大家来治理国家。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统治，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等许多条件，又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赶出去的，全国民主化的实现，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正因为这样，就需要全中国的人民长期的团结，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共产党从二十年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无论什么人物，要想违反这个结论来办事，都一定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一定要坚持这个方针，无论什么阻碍，什么波折，都不能使我们动摇的。

有些人说，施政纲领好虽好，怕只是口头上宣传号召的东西吧。我可以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郑重宣布，我们共产党不但要宣传这个纲

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坚决贯彻这个纲领。我们共产党一向最反对的就是言不履行，行不履言。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保证这个施政纲领的实现呢？我以为要保证这个纲领的实现，首先就要保证政权三三制。谁都知道，一切实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我们要彻底的实现团结抗战，要真正的实现施政纲领，就要作到政权三三制，要大家都来参加政权，而不是一部分人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显然绝不是请非党人士来装门面，而是真正的要共产党外的人士有实际作事的权力。中国是这样大，这样复杂的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口，共产党员才有五十万，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包办的。全国的人才多的很，不让他们进来实际管理政权是要不得的，共产党绝不这样作。谁要是这样作了，谁要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了，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三三制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这是不是在法律上的规定呢？不是的。如果共产党做事不好，在选举时，老百姓可能不选一个共产党员，反过来说，老百姓也可能选很多的共产党员。不过如果共产党员当选过多，党可以决定党员退出，让出位置给其他党派或无党无派的人士。

今后政权三三制究竟怎样作事呢？共产党的斗争批评，党外的人士搞不惯，那么应该怎样呢？我们说，大家办事，大家负责任，大家都各有自己的意见，也可能发生争执，因为党派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习惯不同，自然会各有不同的主张。那就要有意见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商量。假使有意见闷在心里不讲出来，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党外人士要敢于提问题，敢于讨论、辩论，而共产党员则应该虚心倾听旁人的意见，竭力注意不要乱用党内的工作方式来对待旁人，使旁人感到拘束。只要是为了抗战，为了民主，为了边区的进步，在这样的总的原则下，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政治方面，或者其他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为要保证实现施政纲领，还要保证各级参议会确实成为一个有力的机关而不是请客吃饭的摆设。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解之权。比如有的参议员讲某些区县的工作人员作风不好，强迫命令，不民主，把持包办，耍私情，这样不称职的人，参议会可以罢免他。参议会还有检查督促政府的权利。检查政府对参议会的决议案是不是执行了，执行的程度怎么样。参议会的一切决议，政府必须完完全全的实行。

现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里面，不管是共产党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也好，有没有缺点呢？诚然，如各位参议员在昨天的质问当中所讲的，缺点错误是有的。我今天代表共产党来向大家声明，假使各级政府机关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疏忽职守违犯法令的，不仅可由各级参议会弹劾罢免，不仅可以由高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惩办处分，而且大家还可以向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部告发，还可以直接向西北局乃至共产党中央告发，由党给以党纪的制裁。因为施政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如果共产党不遵守，还教谁来遵守？所以那些贪污、腐化、不称职、耍私情的共产党员，应该受党纪和法纪的双重制裁。

在这次参议会上，各位参议员已经提出政府检查工作不够，对各种干部的了解不清楚，因此形成上下不通的现象，并且提出了各种检查工作的制度办法，这都是很好的，可以作为我们检查工作的根据。这个问题林主席已经讲过了。

为要保证实施行政纲领，还要各方面合作。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保留着“关门主义”的恶习，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这是我们必须负责努力纠正的。但是这种毛病可能一下还不易完全克服，还希望各抗日党派，各阶层的人士大家来多多的批评，帮助这部分党员的转变，指出我们一切不好的地方。只有大家推诚合作，共同努力奋斗，互相检查、督促，施政纲领才能完全实现。

最后，我讲几个具体的问题：

关于土地的问题。没有分配的怎么办?我们党主张没有分配的土地谁的就是谁的，一方面交租交息，一方面减租减息。早已分配过的土地也是不动，维持现状。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对双方有利的办法。

关于负担的问题，如果因为过去是富农，今天就要他负担重些，这是要不得的。我们主张除了极少数最贫苦的人民不负担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都要负担，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使负担合理公平。如有耍私情不公平的事情，大家应该揭发纠正。

还有一个问题，非共产党的人士到政府工作时待遇的问题。有人问，像共产党员一样一月三五块钱津贴，怎样能够养家呢?到政府工作，还能不能请假回去，能不能有交际的余暇呢?我们主张政府工作人员采取薪水制度，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能够维持。至于其他一切私生活上的自由，只要不十分妨碍政府的工作，政府都一概不加以干涉。

总之，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就是要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打日本，一切问题，都以团结的利害为依据。整个施政纲领的立场，就是要加紧团结。我现在正式向大家提出这个加紧团结的纲领，请全体参议员讨论，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作为全边区政府与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宣言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国同胞们：全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们!

今天的世界，民主和法西斯两大营区的决斗，是更加分明和剧烈了。一方面是德意法西斯匪帮在欧洲灭亡了十四个国家，现在正疯狂地进攻民主和平的苏联；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进攻了中国五年，现在又企图在远东更加扩大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民族，已经团结起来，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

心协力地制裁国际法西斯匪帮。全世界已经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叉点上。我们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前卫，是挺立在反法西斯最前线的民族，在今天，日本强盗正在我国南北战场上和一切抗日根据地，用更大的兵力，进行新的进攻和毒辣的“扫荡”，我们只有全国更加团结，才能发挥更大的抗战力量。只有民主才是巩固团结的武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就是在这样总的目的和精神之下来进行的。

我们这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正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宣布陕甘宁边区五一施政纲领以后，是在认真实行三三制的原则下进行的。被邀到本届参议会的议员，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工农的代表，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蒙少数民族的代表，并有住居边区的东方民族的代表(日、韩、荷印人士均有)，他集合了全边区二百万人民的优秀代表，精诚团结的聚于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大会在听取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并详细加以检讨之后，一致认为边区政府在这三年期间，是忠实执行第一届参议会所指示的三民主义方针，不但克服了一再笼罩着边区周围的危机，渡过了重重的难关，并且发展了边区的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增进了边区人民的福利，坚持了团结抗战，坚决保卫了边区，保卫了西北。但是应该看到：目前边区东面日寇军队无时不在企图渡河进犯，而边区侧后，又遭受反共势力的包围封锁，必须更进一步去提高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才能巩固边区内部，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

这次参议会最大的成就，第一是全体一致的接受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认为这个纲领，不但完全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大会号召我全边区二百万人民紧紧的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共同加紧努力，把它加以全部实现。

第二个伟大的成就是依据“五一施政纲领”的原则，又通过了许多有利团结抗战的决议和条例。其中最主要的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保

障人权财权条例”，确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及依法使用自由权。在土地已经分配的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确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有“确定税收原则案”，指出抗日经费应由全体人民负担，不分地主、佃农、自耕农、或雇主、工人，除极贫者外，均应按照现有的财产等等，或所得多寡，缴纳统一累进税，并确定负担人口，应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决议和条例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过去边区已经实行了的，而在这次参议会上，更加使之发展和完备，保障了边区广大民众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同时也增强边区内部各阶层的团结。

第三个伟大的成就，是大会详细查了边区政府三年来的财政收支，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的民国三十一年度总概算书，责成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本开源节流原则，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厉行节约，避免浪费，推广土产出口，争取出入口之平衡，平抑物价调剂市场，提高边币，巩固金融，并须经常检讨工作，确实执行计划，以期达到收支平衡，不超出预算。

第四个伟大的成就是改了边区政府并选出了本届参议会的常驻委员会，在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和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共产党员都只有三分之一，真正符合于“三三制”的原则，这是保证全体抗日人民坚固团结最好的组织形式，也是上述一切政策和决议能彻底执行的最大保证。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有经常督促检查和帮助政府工作的责任和权力。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不是单纯咨询和建议的机关，它不仅仅有创制权和复决权，而且有选举和罢免行政长官的权力，它真是边区人民自己的最高权力机关。

以上就是我们这第二届参议会的特色，也是它伟大的收获和成就，这是新民主主义伟大的胜利，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边区的具体实施，我们将坚决的遵依着大会指定的方向，保卫边区，提高边区，为建立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而奋斗到底！

我们很高兴，在大会闭幕的今天，恰逢国民参议会开会，我们仅代表边区二百万民众，敬祝国民参议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全国民主团结抗战力量，更加发扬，并愿在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下与全国同胞亲密团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共同努力。

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

甲、要迎接一九四二年新的更艰苦的环境必须完成下列当前的四大任务：

(一)征收公粮二十万石，公草二千六百万斤。

(二)运输食盐三十万驮，平衡对外贸易。

(三)准备春耕，明年增加熟粮二十万石，增植棉田十万亩。

(四)大量制造手榴弹，武装五万个基干自卫军，准备随时随地迎击敌人。

边区财政经济还处在困难当中，机关部队仍须继续生产，财政上统筹统支，经济建设上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是既定方针。过去机关、部队在生产上有成绩，但已发生许多不良现象。今后确定机关、部队生产以农业为主，至于商业则只是限于县级、旅级以上，可统一领导，集中经营带供给性合作社性的商业和运输业。要反对违背政策，侵犯民众利益、本位主义现象，此外要认真提倡节约，停止新的建筑和非

招待外宾的宴会，精干各级领导机关，节省粮食。

乙、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认真加强党的领导。

边区党是经过土地革命斗争的，是坚强的。但由于干部党员质量的提高还不够，由于五年和平环境和边区经济的发展，许多干部党员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因此发生部分干部党员思想蜕化，政府公务人员包庇贪污腐化等现象，这对于党是危险的，必须下决心纠正。教育党员起模范作用，出粮在前，驮盐在前，生产在前，执行政府法令在前，帮助与拥护部队在前，学习在前。在实际工作中考验党员和干部，很慎重的将不可救药的不肯改正错误的分子清洗出党。

要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取消脱离群众，专门向群众要东西的方式。为了使党在群众中起真正的核心作用，必须：

(一)在照顾全部革命利益的基础上，照顾群众利益，关心其生活。

(二)取消支书以指导员包办一切的方式，必须经过党团领导政府工作，政府中的党员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支书在行政关系上应受乡长领导。

(三)党员在群众中不能特殊化，应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

(四)学习与非党人士合作，纠正关门主义。

(五)为了转变领导作风，目前两年内要全力有计划的提高干部。

丙、要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赖于党内的坚强团结。

边区的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由于几年来的和平环境和经济的困

难，在党内和党政军民之间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应该认识，困难主要是敌人造成的，再就是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和敌人与顽固派的封锁。应积极的想办法渡过难关，互相埋怨与发牢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党政军民基本任务是一致的，党政军民关系从领导上讲都是党内关系。党政军民在解决问题时应慎重听取多方意见，反对主观主义，责己从(严)，责人从宽；反对互相埋怨。同时要认识军队是政权的支柱，军队又是为了政权，党政民应关心部队，部队应爱护地方。

丁、要完成上述任务还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以理想当现实，以感想代政策。边区在历史上虽受过主观主义的血的教训，但并未引起应有注意，主观主义仍严重的存在。目前边区党内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粗枝大叶的计划，照例老套的报告，不切实的指示，怕发展自我批评等现象，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的危险是可以招致“亡党亡国亡身之祸的”，必须痛加纠正。首先在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内来一次认真的检查，提倡自我批评。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检查我们的工作，帮助每个党员首先是干部清楚了解上述决定。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情况；只有了解情况，才能掌握政策；只有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才是真正好的干部。也只有依靠这样的干部，党的任务才可以顺利完成。

在县书联席会上关于时局问题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总结报告

(一九四一年)

一、 帝国主义战争发展的趋势与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

从前年帝国主义战争已成为全面战争了，就毛主席的第二帝国主义报告提纲这一战争的结果是德帝国主义大大的获胜了，整个欧洲大陆地方除外差不多完全被希特勒控制了，这种情形引起了下面两个事情。

①由于希特勒在欧陆的大胜利，引起了美帝国主义极大的恐慌与不安，因此就使美要实际上参加战争，使欧战更加扩大与持久了。

但由于美帝主义的军事准备计划到明年二月才能完成，因此他又不愿意马上就大闹起来，他希望战争还是缓和一点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德帝国主义在这一年多的大规模战争的环境内，本身也需要有一个休息和整顿的机会，因此这也可能产生出帝国主义战争的暂时和平局的。

②在帝国主义战争扩大与持久的另一方面是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一九四一年五月斗争的显著特征，就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大战而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力量联合动员的开始，这一种进展还是在第一阶段，不过它已具有十分实在的形式。”（见艾佛林战争中的第二个五一节，这一文章全部可作参改）。

因此目前世界正像毛主席指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还是帝国主义的暂时和平？是世界和平人民的和平？还是帝义内部帝国主义的和平？

抗日战争的趋势：

日本想在最近将来最后解决它四年来企图解决而未得解决之中国问题它的计划一方面是军事进攻（进攻西安、洛阳、昆明）主要是想截断我国的两条国际路线，另一方面他又不放松政治诱降。

因此，这两个问题就尖锐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

世界，中国，这样两种可能在世界可能是用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和平来结束帝义的战争取得真正的永久的世界和平，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中国是全中国抗日的人民的中国这种可能是大些，我们需要争取这种可能实现同时我们有条件争取这种可能的前途。

总之，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正像铁木辛哥指示“国际局势异常复杂”与真理报说世界到处伏有突变一样。

二、 国际(国内)局面的三个特点：

①德国的大胜。

②中国的大革命(历史上曾未有遇的大革命)。

③苏联胜利的和平政策。

这三个特点贯彻着全世界每一问题的变化，这三个特点里一个特点之变化都可以震惊世界。这给了我们以后分析与研究世界问题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概念。

三、 下边就是这三个特点的解释。

两个帝义战争的结束，德国大胜，这表现在整个欧陆的控制权(制陆权)获得了一早已获得了的控空权的德国，近来在海上也异常活跃。虽然现在制海权还掌握在英美帝义的手中，但德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有了：

第一个影响，美要积极的参加对德作战。

第二个影响它(德国)同时也威胁着全世界人民和苏联，固然欧陆

统一及又向东方发展了他的战线又愈接近苏联了。加上陆军的强大与战略地点和经济基础(包括它掠夺的资源)所有巩固。虽然目前与苏联的关系还继续维持着友好。

第三个影响可能产生出帝战的暂时和平，希特勒希望有一暂时休息机会，以便巩固他已得战果，而便进一步称霸世界，这可以从松岗摆出的和平方案看出，(这一方案也有几方面目的：一分配世界霸权，二、避免全世界人民革命，三威胁苏联)。

帝国主义和平将是希、罗出台，(希以罗为张伯伦第二)因此就有了欧洲的第二次慕尼黑但这一和平运动据我们看有困难，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些与上次慕尼黑不同的就是这次是在战争中的，是在全面性战争中的是在德国大胜利的情况下的因此德要求就要高，但美由于他本身也还有力量他对德的过高要求是不会愿意的，他决不愿将世界霸权让给德国。但这并不就是完全没有可能，因此我们还要反对，怎样反对呢?有条件一、苏的和平政策不断胜利(像正当欧战扩大威胁到苏的西方战线时由于日本订立了日苏中立条约)，正当战火烧到远东他下令运军火等。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和平运动。三、中国抗战强大的向前发展。四、帝义内部的矛盾更加深了。

四、 日本研究：

日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三个同盟里它占有怎样一个位置?

日是带有丰独立性的国家，三个同盟国内德国是支配意大利，“墨是希的勤务兵”(毛主席)因为日本有海军(过去五五三之比)有相当数的陆军，但因为他没有重工业基础，因此他还要依赖德、美等的原料(特别是战争原料)这种情况就产生了。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要听希的话，但另一方面它可以不完全听希的话，那么谁可以决定日本呢?第二，决定日本发展方向最主要

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这从日本众议员征中利一的论文里就可看出), 另一方面对英美的关系也是一个条件(因此有东方慕尼黑危险)。三, 苏联和平政策也是一个条件。四、是德国的继续胜利。

这里谈一下远东慕尼黑的问题(新的远东慕尼黑)。

这次新的远东慕尼黑是在英美集中全力对德, 而在远东采取对日让步的条件下产生的, 但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呢?是日本将从中国华中华南撤退; 不侵犯荷印, 承诺日在华的特殊权, 但这样条件日本是决不能接受的。

五、 苏联:

地位, 它是解决世界问题的“自动机”。苏的和平政策可能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西方慕尼黑)。

它的动向: 对中国抗战是要继续帮助到底的, 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但是无时无刻都在赞助着的(像承认希南为正义战争), 以后苏与英美的关系可能有转化, (像苏美商务谈判)但这些我们都不要过份的估计它。

六、 中国革命形势:

皖南事变是国共两个力量的大检阅, 谈判的结果是共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成为中国抗战的决定力量了, “抗战力量已逐渐由国移到共的身上了。”可是这一特点, 今天许多人都看不出来, 甚至我们一部分同志也是如此, 原因是: ①国民党现在还是代表着国家(它有国民政府)。②它的地方比我们大。③军队的数量比我们也多。④因此它在形式上还是起着决定作用可以这样形式的逐渐发展下去就可以

看得见更明白，这点我们要特别认识的。

七、中国革命强大的向前发展，逐渐会使日对英美的激进派可能转转方向把力量集中到对中国革命问题上来，但我们有把握消灭此种企图：

因为①有文武双全、顽强的和政策灵活的中国共产党。②日本人是不能采取先对共而后对国的(这时机已经失掉了)。③英美在某些条件下也不希望中国完全交，因此最后日本只能是一面对共一面对国。当然他可能在一定时期侧重一方面，像最近两年侧重敌后扫荡。今后可能侧重在对国民党，如像最近又要进攻西安昆明洛阳等地，如这一计划实现那时可能发生一种新的投降危险不过目前我们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粉碎它新的企图。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会破坏战略相持与能够重新组织新的战略进攻呢?一句话主要是由国民党的两面政策造成的，他没有利用这一相持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反而消耗自己的力量制造内战，因此给敌人一有机会与空隙，但今天我们这样还不够，我们的任务，还是要用全力打破日寇的新进攻，注视投降的新阴谋坚持独立的抗战前途用什么办法呢?只有继续发展抗日力量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抗日人民的抗日运动，要达到此目的，对国民党的批评还是很必要的(五月二四号解放日报，评论家意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日本军队内部也有变动(动摇了)， “中国革命与日本革命是正比例”(毛主席)。

八、中国抗战目前是什么局面在此局面下面我们有些什么任务：

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我们击退了克服了继之而来的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继续抗战新局面，(详可参看政治情报 P1)。

从这些问题来看中国问题，可以看到远东新的慕尼黑是目前局面里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要揭露它，集中力量来反对它，解决中国是中国人民的问题。

九、目前工作新方向：

一、加强敌伪军工作，二、加强经济建设工作。附带对施政纲领意义毛主席提到两点：

一、他剥夺了国民党一切欺骗人民与破坏我们的武器(纲领特别照顾到中国的中间阶层)。

二、总结了我党过去十年斗争经验特别是四年来的抗日战争经验。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之总结

一、中国的两大矛盾(民族与阶级的两大矛盾)中间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存在，即是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革命，也不会造成像过去“马日事变”与“四一二”事变的可能。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来时我们有些同志就不是这样想法，这次亦然。他们以为过去河北山西大的摩擦以及这次皖南事变，就是马日事变又来了，因此他们得出了这样错误的结论，说“分土地、打土豪”的苏维埃革命又来了，这次皖南事变，充分证明了这种想法与结论完全与事实不合的。

二、指导着中国政府与中国政策的英美资产阶级，他们还是继续他们的两面政策与两面战争，一面抗日，一面反共，但在抗日这点上他们还是两面，就是对日与投日，又打，又不积极的打(如对汪精卫汉奸也不积极反对)在反共上也同样是两面性，又反与又拉，(表现在他还不愿意与我们最后破裂)因此中国的政治是非常复杂，我们同志与全党必须注意此复杂政治之变化，因此就有了我们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国的两面政策不变，我们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也是不会变更的。

三、对国的反共政策我们同他斗争时一定要小心，不要粗心大意，我们也得要有一套办法，同时我们要认清蒋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本质，要认识他对中国革命仇恨性与残酷性，（抗战四年国对我一贯政策就可以清楚看出），因此要想使任何中国的革命力量要避免他消灭这种种的残酷性，并且要迫使与革命一合法地位，除了一打一拉政策外没有别的，但斗争必须是在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下。

四、在与顽固派斗争中我们要将带买办性资产阶级与没带买办性或比较少带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开。要把顶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的一般地主与绅士加以区别(这也是我们实行三三制与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理论根据)，这些为事实证明了的道理，今天还没有被我们同志很好的掌握，因此德就把许多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同志没有懂得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阶层的“梭形”。

五、由于一些同志对中日矛盾在整个抗日过程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观念的动摇因此就有了阶级矛盾又成为主要的(在目前)论断，因此就觉得党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各种政策的指示不适用了。他们不知道只要中国民主革命没有完结，统战政策我们是绝不会放弃的。(虽然在不同时期内容上可能有些不同)。

六、也由于上一原因，因此把中央对时局估计可能前途之一，就是坏的逆转，认为只有逆转了，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七、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民族政策与阶级政策的一致性，不了解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这主要是不懂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对抗战中的一切阶级只有一个完整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政策就是已含着又要联合又要斗争两面政策，这政策对一切愿意自新的汉奸地方份子也还是有用的，这教育政策在党内党外是一样的，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抽象的阶级教育民族教育了，换句话说，是两者不可分割。

八、边区、华北华中在社会性质的问题：

边区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一些同志认

为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地方的就不是新民主主义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们说看这一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就是看他政权在什么人手中，中国这些地方的政权是在抗日人民手中。

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咋样的呢？主要指出：政治，是一切抗日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与改良了半封建的剥削形式与制度；文化，是大众的民主的科学的文化。

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廿五周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苏联一区，终于挡住了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及其欧洲匪帮的疯狂进攻，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使纳粹的战略进攻归于破产，认定了同盟国转变主动的局面。为什么苏联能替全人类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因为苏联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党，斯大林领导的一元化的联共党。

在保卫苏联的战争中，全苏联的人民都在联共党的领导之下，无论前方和后方，士兵和工人，老人与小孩，像一个人一样的和法西斯德国搏斗着。这次斯城战役中，斯城的人民最好的表现了布尔塞维克这样优良的品质，创造了人类新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样坚强团结，步调一致，就是苏联能够战胜纳粹的最基本的条件。别的国家没有这个条件，就吃了纳粹的大亏。

今天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边区党要向联共党学习的主要就是这布尔塞维克的一元化、统一性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步伐不齐，各自为战，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在边区的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和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本位主义，门户之见，以及党员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妨害抗战，妨害根据地的建设，妨害党员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一个人、一件事闹独立性，其影响决不止一个人、一件事，甚至会影响到全党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与负责人员，更要注意。今天战斗所处的环境更困难，党的任务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大，所以就更要求党的领导的一元化。

党领导的一元化，首先依靠于思想上的一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要求全国党员的思想、观念一致。而反对宗派教条主义，就是在党内的上下以及各部门相互关系上，求得上下步调上的一致。在党政军民各部门党员中，要承认我们边区党普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作风，对危害党的言行熟视无睹，对“不利”于个人的小节，却斤斤计较，这种自由主义不克服，领导的一元化也是无从实现的。

我们边区党比其他根据地的党都要更幸运些，我们更应亲近的在中央领导之下。此纪念十月革命廿五周年之际，我现在向我们全边区的党员号召，向所有党政军民各部门工作中的党员号召，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我们一定要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领导这方面做模范！

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引言

同志们：

关于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的内战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争论问题，这次高干会讨论了十天，讨论得很好、很详细。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争论了很久而未彻底解决，经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可以说是在基本上把问题搞清楚了。边区党这一段历史争论问题，不能把它孤立的只看做是肃反错误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曾经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过去所执行的路线是右倾取消主义，然而历史证明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方面，恰恰相反，错误的是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他们所执行的不是什么“马列主义”的路线，而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以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现在当我们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这个问题若不检讨清楚，就不能贯彻整风学习和根绝三风不正的残余，就不能获得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就不能获得团结全党的巩固基础。所以我们把这次高干会对于这段历史问题的检讨，看做是边区具体的整风学习，看做是对于每个干部和党员最大的最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是完全有理由的。为要有系统的说明边区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就不能割断历史，就必须从整个陕甘党与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明它。因此，我的讲话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

一、 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

陕西自一九二二年及二三年起，即已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由旅京旅沪陕籍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少共(SY)团员，把共产主义思想散布于陕西青年学生及文化界，先后在渭南交界之赤水职业学校，

华县咸林中学，三原渭北中学，西安一中及二中，绥德四师，榆林六中等校建立了党和团的支部。这时陕西在北洋系军阀刘镇华、吴心田统治之下，政治环境异常恶劣。党除以先进知识分子为对象在各地学校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与建立党的下层基础支部外，并在党外进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组织了许多青年学生的革命团体，如共进社、青年社、学生会、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发行革命的书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在这些政治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党曾经领导了两次有名的政治运动：一是骗刘(刘镇华)骗吴(吴心田)运动，一是非基督教运动，前者是反封建运动，后者是反帝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带有普遍的性质，是陕西党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开始。经过这些运动，党内已涌现出了当时知名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如西安之魏野畴同志及陕北之李子洲同志等。

上述时期是陕西党的创立时期，亦是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在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上准备了基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由共产主义的思想到共产主义的组织，由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但均尚未超越知识分子范围。

大革命时期，陕西革命运动会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六年秋冯、于入陕与西安解围(西安被刘镇华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围起直至十月国民军入陕始解围)，是陕西大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标志。当时北洋军阀在陕西的支派刘镇华、吴心田的势力被驱逐了，代之以冯、于国民军的势力，冯、于在当时是代表国民党进步势力一方面的。因此，陕西由反动局面转入革命局面，成为西北以至整个北方革命的中心，所谓“南有广州，北有西安”，这就是指当时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可以与广州相比拟的。为什么革命运动能够在陕西比别的地方更为发展呢？是有其客观有利条件的：第一、陕西有革命的历史传统，如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反满运动，袁世凯反动时期靖国军的反袁运动，以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军的反北洋系军阀运动等等。第二、陕西有利革命进行的地方特点，陕西自民国以来，长期处于军阀土匪割据状态，群众的革命要求是很高的。第三、当时冯、于是进步的，我

党与冯、于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遂推动革命运动在陕西迅速发展起来。

陕西党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一)在军队方面，党积极的参加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选派了若干干部党员到国民军中去负政治工作，刘伯坚、邓小平、李林、刘志丹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国民军政治工作者。同时西安创办了政治保卫部及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由共产党员史可轩担任部长及校长，其中亦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参加。

(二)在政权方面，党积极参加了改造各级政权的工作，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为国民党之左派于右任。同时有共产党员参加省政府任厅长，从省政府到各县县政府，亦有若干共产党员参加或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

(三)在文化教育界方面，由于党在文化教育界中有相当的基础，故经过各中等学校及各县教育机关培养了大批的进步青年，而各种文化活动，基本上也是在党领导之下，如当时民国日报及西安著名的廿八书店，各种革命团体所办的刊物，大都有党员参加。

(四)在国民党方面，在西安围城之前及围中，在我党党员推动之下建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当时还是半公开的。在西安围城解围后，陕西各地国民党，更积极与公开的活动起来。当时省党部的刘含初、李子洲、张含辉、王授金等，都是共产党员。关中及陕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亦有共产党员参加。

(五)在学生运动方面，更有了广泛的发展，许多中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该地区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如西安之一中、二中，三原之渭北中学，华县之咸林中学，渭南之渭阳中学，绥德之第四师范，榆林之六中，延安之四中等。在学生中普遍建立了各种进步团体，并经过这些团体及广大学生，在城乡群众中进行了革命的宣传与组织活动。

(六)在工人运动方面，当时党在西安建立了若干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并建立了陕西省总工会。

(七)在农民运动方面，当围城前后，由广东农运讲习所派回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参加了各地农民运动，并于国民军人陕驱逐刘镇华的战争中，由党员经过各地红枪会发动农民配合冯部作战，参加反刘运动，如在郃县、三原、蓝田等地农民会袭击刘镇华的粮台兵站，并于蓝田解决了刘部一营武装。由于农民的积极援助，才使冯部驱刘解围战争迅速的走向胜利。其后在革命高潮之下，长安、蓝田、渭华、三原、绥德等地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起来，并进行了反苛杂反土劣的斗争。如长安农协农民自动的逮捕并打死了当地大土豪徐大汉。一九二七年召开了陕西全省农协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省农协。

(八)党的组织于此时有大的发展，并在领导上也统一起来了。一九二七年春，开了全省党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区委，统一了陕北与关中党的组织及领导，出版了党报《西北人民》，党员数量由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其成分虽然大部分还是青年学生及参加党政教军民各项活动的知识分子，但在农民士兵及工人中也开始发展了一些党员，使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

一九二七年的郑州会议，是陕西大革命阶段结束的标志，因为从这时起，国民党实行清党，地主向农民反攻，于是结束了大革命发展阶段。总结大革命发展阶段中，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显著的成绩有三：第一、建立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同时相当普遍的党，散布了共产主义思想及影响。第二、培养了党的骨干，特别是军事干部。第三、在相当限度内发展了农民运动。这三项就成为党在下一阶段进行武装斗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检查，又是有缺点的，主要的缺点是：第一、党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有右的倾向，这就是以当时省委书记耿炳光为代表的“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性，只看到革命方面，忽略了反动方面。因而就看不到严重形势的到来，没有适应环境的变

化来转变党的工作，使西北党与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第二、统一战线中的下层工作即农民运动发展的不足，尤其是没有注意土地问题。第三、武装工作虽然做了，但只做上层政治工作，不注意掌握实权，不懂得自己组织军队，未能取得确实的基础。这些缺点就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所受损害的根源。

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

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党外情况是由革命局面转入反动局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随着全国反动逆流的弥漫，在陕西亦进行“清党运动”，将大革命时期在军队政权国民党部及文化教育界服务的共产党员，一律洗刷或迫走，若干共产党员被屠杀(如刘含初等)，工会农会被解散，青年学生的一些革命团体，或被解散，或被迫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反动局面的开始。但这只是矛盾的，在当时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北系与国民党中央间仍存在有矛盾，这种矛盾以后会发展为军阀战争。

在这一反动潮流袭击之下，当时党内情况是如何呢?由于耿炳光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没有过渡到反动时期的准备，当着反动局面已经到来的时候，党又没有适时的有计划的组织退却，故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造成很混乱的状态，党员大批的退党或消极，一部分党员被捕或被杀，少数愿意继续革命的党员，也一时失掉方针和自信。这种混乱状态，直到八七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传达到陕西后才被逐渐克服，才使坚决革命的党员获得了自信和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在党的工作方向上发生分歧，就是说，情况已经变了，党应向何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呢?一部分党员主张党的方向应由城市转入乡村，应拿起枪杆子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说，党的方向应以乡村与武装为主，刘志丹同志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为这个问题曾和当时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对的，许多党员在这一思想和方针下走入农村和武装部队中去，开始了党的武装活动。但有不少的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领导机关，还不认识党的方向应转入农村和武装斗争的重要与必要，仍迷恋于城市，舞弄文墨，进行空洞的宣传号召。他们在思想上是以城市与非武装的秘密的工作为主的，这就一方面使党不能聚集更大的力量于武装活动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无保障的脱离群众的秘密工作之下，使党的组织不断的遭受破坏，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历史完全证明了当时把党的主要方向放在乡村与武装方面是正确的。正是这一正确方针，使党创造了革命的武装与根据地，而把党的主要方向，放在城市和非武装方面则是错误，正是这一错误使党不断的遭受损害。

我们现在不来详细总结秘密党的经验，这件工作以后有时间时再做。现在我们专来讲一讲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这个时期，党虽然确定了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也有武装斗争的条件(大革命时期党所创造的一些军事工作基础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党不断的派干部到军队中工作所创造的基础)，但如何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同志还是没有经验的。自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党曾领导了多次的武装起义，著名的有清涧兵暴、渭华兵暴和旬邑农民暴动。清涧兵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唐澍、谢子长等同志领导下发动的。清涧李象九旅(当时李亦为党员)兵暴，暴动由清涧开始，南下进攻延长、宜川、韩城等县，结果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政治上没有把枪杆子与农民结合起来，形成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依靠农村而企图攻占城市。在军事上不懂得打游击战而只是进行阵地战。渭华暴动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刘志丹、唐澍等同志领导下发动的许全忠旅的暴动(当时许亦为党员，其基础就是史可轩同志领导的中山学院学生及政治保卫队队员，后归李虎臣编旅)，发生于潼关、渭南、华县一带，暴动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并发动了渭华广大群众参加暴动，坚持了一个半月之久，最后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中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虽然开始懂得了枪杆子要与农民结合，懂得了要依靠农村，但是认识还很肤浅，并且发生了盲动倾向，如片面的强调“以赤色恐怖对白色恐怖”

“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等口号，如地点选择在西潼大道的要卫，如在军事上(和清涧兵暴一样)还不懂得进行游击战，仍是打阵地战，如没有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等等。旬邑暴动是渭华暴动之后不久由许才升同志领导的旬邑农民暴动，暴动的农民攻下了县城并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但却没有彻底收缴地主豪绅的武装来武装农民，也没有深入农民斗争；结果在地主豪绅以牢笼计诱杀了许才升同志后就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虽然有了农民，却没有枪杆子，同时不懂得如何深入斗争与依靠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此外还有大大小小许多次的武装斗争(如在关中之礼泉、扶风、乾县，陕北之绥德、横山以及甘肃之靖远、两当等地)，或因是单纯兵暴，或因是单纯农暴，二者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并且在路线上多带有盲动性，所以没有例外的都失败了。

上述这些兵暴农暴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党内培养了一种坚定的武装斗争的决心，并且由失败中获得了经验，就是：(甲)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单有武装没有农民不行，单有农民没有武装也不行。(乙)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打阵地战不行，在城市要道不行。(丙)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盲动主义不行。

真正领悟了上述兵暴农暴失败教训的，首先是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同志熟知地方情况和群众条件，有长期军事斗争经验，并亲自参加了渭华暴动。他在这些暴动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要胜利的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因此，刘志丹同志于一九二九及三〇年间就独立的奔走于陕甘边境一带，进行军事活动，夺取军阀土匪部队的武装，来进行游击战争，虽遭多次挫折以至被捕下狱，毫不灰心。他的这种坚定的方向与斗争的收获，终于成为党建立陕甘革命武装与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当时陕甘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些经过多次失败所得来的教训。相反的却执行了极“左”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以杜衡为首于一九三〇年秋组织行动委员会，毫无根据的要在关中陕北和甘肃建立三个军，并提出于是年十月革命节召开陕西苏区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计划。到处空喊暴动，甚至在西安市内也要号召暴动(当时西安只有二三十个党员和数十个所谓赤色群众)。这些计划有的因为受到下级党员的抵抗没有实现，有的因为根本没有根据无从实现，所以没有看到什么暴动出现，反而使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四中全会后党开始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实际上只纠正了立三路线某些比较突出的部分，并未根绝立三路线“左”的思想，所以后朱理治、郭洪涛的路线比立三路线还有了新的发展)，正在这时，陕西环境起了变化，由于蒋、冯战争的结束，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倒台，代之以杨虎城的统治，同时陕西农村经济经过几年大旱灾后，亦于此时有了某些开始复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党内滋长了一中的倾向。这一右倾当时是以张文华、张资平等为代表的，后来这种右倾思想又为黄子文利用来一贯的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认为在杨虎城统治之下，由于实行经济改良与政治欺骗，陕西群众斗争情绪已降低了，革命已进入低潮时期，并诬蔑南方红军的发展为“流寇行为”。认为是“没有出路的”。这一右倾在实质上是想否认陕西武装斗争有利条件，并取消党的武装斗争方针。但这一右倾立刻受到打击，一九三一年四月的省委全体会议坚决与这一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开除了张资平、张文华等的党籍，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面，并于是年十月正式决定成立反帝同盟军。总结这一时期党的基本特点是转入地下活动与武装活动的时期，当时党虽已部分转入武装活动，但一般的还是以地下的秘密活动为主，这是不正确的，其思想根源是对武装斗争的重要与有利条件估计不足，而党的武装活动虽均失败，但由这些失败中却积累了经验，摸索到了正确的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没有这一时期武装斗争的失败，就不会有下一时期武装斗争的胜利。陕甘红军与苏区的创造是与这一时期党的武装斗争不能分开的。这就是这一时期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

从一九三一年反帝同盟军的成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的肃反事件以前，是党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其中又何分为五个阶段来说明：

(甲)反帝同盟军成立与土地革命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首先应说明反帝同盟军(即以后的陕甘红军)成立于九一八事变后不是偶然的。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当时西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加深(这种矛盾一直到西安事变以后还继续存在)，使西北阶级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抗日倾向，中下层则要求抗日。这一变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许多军队的中上层分子找党的组织和红军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许多地方著名人士倾向抗日与接近共产党员。西安、汉南、渭华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游行示威。打国民党部，西安全市学生于四月二十五日把戴季陶的讲演变为反戴季陶的斗争，包围戴季陶并焚毁其汽车。二十六日全市学生进行抗日驱戴运动，发生了枪杀学生的事件(四二六惨案)。这一切都是说明新的形势到来了，可是当时党对于这一有利形势估计不足，形势已经向前发展了，而党的观点还停留在原来位置上。党虽然利用了这一形势在发展红军这一方面有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却拒绝与一切倾向抗日的中上层谈判与合作。这就是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来到陕北才被克服。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月，党决定以刘志丹等同志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武装和由山西过来的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反帝同盟军，不久又改为陕甘红军游击队，以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新宁、宁县一带为活动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陕甘新苏区。这是第一次在陕甘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开始一个时期，部队成份较复杂，以后在斗争中逐渐淘汰了无法转变的土匪成份，同时吸收新的积极农民参加，使部队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逐渐巩固起来。当时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积极行动与直接领导之下，发动了旬邑、淳化、三原、耀县、正宁、宁县一带

农民的各种斗争(如分粮抗捐税反豪绅等),并开始分配地主豪绅的土地给农民。在群众斗争发展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发展了地方党组织,游击战争的局面日渐扩展起来。这一时期陕甘红军游击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一时期。

(乙)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红二十六军的失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

一九三二年的中央北方会议后,决定把陕甘红军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二团作为二十六军之骨干,并派杜衡为政治委员。杜衡是一贯的“左”倾空谈家,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四中全会后并没有彻底转变。他参加了北方会议,携带着北方会议的精神到了二十六军,从这时起,二十六军就在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以至最后遭到失败。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打倒一切反对一切,拒绝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土匪民团不加任何区别一律主张肉体消灭。即使当时真正愿意和我们合作并在物质上援助我们的民团土匪(如夏老么等)也是如此。对白军进步的军官,拒绝谈判合作,并辱骂当时与白军进步军官建立统一战线的某些同志是“勾结军阀”,结果就造成了所有白军民团土匪部队与我们的对立,使自己孤立起来。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农民运动中执行过“左”政策,火烧香山寺(这就是有几百和尚道士,几省知名的大庙),引起农民不满。在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下,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的打击。无计划的号召农民来分粮,地主富农的粮不够分,结果把中农的粮也分了,侵犯中农利益。这样反对地主、打击富农、侵犯中农的政策,就使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缩小到只有贫农雇农,甚至使贫农雇农对党也抱有疑虑。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军事上的冒险行动,他初到红军中主张坚守照金根据地,在庙湾雨原两次战争失利后,又主张无目的的乱窜,违反省委决定和部队多数同志意见,主张北上,

并提出计划要组织骑兵师，打通所谓“国际路线”。这一行动遭到省委及部队同志反对后，又主张南下，提出在渭华建立新根据地。其理由是“渭华有华山之险，群众斗争条件好，且为敌人交通大道，给敌人威胁更大”等，不管北上南下，都是纯粹主观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动。北上计划，虽已阻止，但南下计划，未能阻止，结果红二团渡泾河、渭河由高陵、临潼转入渭华，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中全部失败，只跑出刘志丹、王世泰等几个同志。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间的事。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四个表现，就是实行宗派主义，对于一切不赞同不执行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完全采取打击政策。打击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同志是机会主义动摇。打击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等同志，把谢子长、阎红彦同志以派赴上海受训名义调开部队。我也是受到了杜衡打击的一个，当时把我调开部队，派到陇南做兵运工作。这种宗派主义执行的结果，就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使歪风压倒正风，而杜衡最后亦由动摇被捕而叛党。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二个时期。

(丙)恢复红二十六军继续展开陕甘游击运动与反右倾斗争(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

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省委恢复二十六军整顿陕甘边党的任务委托于我，这时正是陕西党与部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二十六军全部失败了，由王太吉骑兵团暴动过来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也失败了，(由一千六七百人的部队只剩下几十个人)。陕西党的领导机关及各地组织，差不多破坏光了。敌人天天在报上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

“刘志丹梟首了”等，叛徒杜衡的自首宣言也接二连三的在报上发表出来。当我到达陕甘边时，只有王太吉一点残部和渭北几个小的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人枪约七八十)。由于继续的失败与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这些部队的士气当时是很低的。可是部队中和地方上党的骨干还保留着，如张秀山、杨森、张邦英、习仲勋、强世清等同志。依靠他们把部队在照金集中起来，重新整顿，继续游击战争。当时行动方针是打小仗不打大仗，由小胜变大胜。在这一方针下，慢慢的打了

若干次胜仗，把部队情绪提高起来。但这时部队中发生了以黄子祥(当时渭北游击队长)为代表的右倾，他认为省委破坏了，二十六军义勇军失败了，游击战争没有出路了，由于对当时形势悲观失望的估计，就主张把部队解散，把枪隐藏起来，宣传所谓“不成不成，回家务农”。或者主张把部队分开行动，各干各的，或者主张先找省委关系，找到关系后再谈别的。这些意见显然的是悲观失望的右倾表现。当时在陈家坡会议上受到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于打击了这种右倾思想。这个斗争的胜利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如不战胜这种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情绪，则二十六军的恢复与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陈家坡会议之后，干部的信心增强了，战士的情绪提高了，一、三、五、七、九、十一六个游击支队建立起来了。接着就攻下旬邑，消灭了全部民团的武装，扩大了部队。这时刘志丹同志和王世泰同志由南山失败化装跑回来了，部队增加了新的力量，继续攻占合水，又在庆北毛家沟打了胜仗，故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拈花寺正式恢复了四十二师。并根据退出照金苏区的经验，决定游击队根据地不能只是一个，应当多建立几个根据地。当时在关中、陕北及陇东各建立一个根据地，每一根据地组织一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四十二师则不固定地点而灵活居中策应。这时黄子文又由西安跑来了，他提议要成立陕西省委，名单是些什么人呢？他提出李桀夫、张文华、蒲建生，还有他自己，并且要我参加。我晓得这些人全是右派分子，可以看出黄子文当时是想进行右派活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同意他，而且把他留在苏区，加以考查。并写了反对右派活动的文件派骑兵团到处散发揭破其反革命活动的阴谋以后，黄子文就到处散布谣言，如说刘志丹和我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专政”，说我们“不要陕西省委会走到反革命道路”等等，于是我们就将黄子文关起来进行考查，并揭破了黄子文的政治面目。这就是继陈家坡会议后第二次反右倾的斗争。可以看出在恢复红二十六军的这个期间，主要的是反右倾的斗争，并在反右倾斗争基础上展开了陕甘边及陕北一带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华池、庆阳、合水、保安等苏区(即第二路游击活动区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党的特委。不但恢

复与发展了二十六军，并且更加扩大了游击战争区域，奠定了陕甘苏区的基础。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三时期。

(丁)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与反郭斗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涛同志回到陕北，这时，不仅陕甘一带红军与游击战争已有很好的发展(如上所述)，而且陕北之吴堡、清涧、安定、神府各处，也已经开始了游击运动。红二十六军不断的到安定、安塞、保安、郿县、甘泉、延长一带活动，直接推动与组织陕北游击运动的发展。陕北特委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就有开展游击运动的决议，陕北有党与群众斗争的历史，有过去二十六军不断的直接行动并派送干部和武装的扶植，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发展是势所必然的，然而，郭洪涛同志在瓦窑堡时所写的陕北党史中，却把自己描写成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造者，这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不对的。郭洪涛同志回来是拿着北方会议的决议当做自己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武装。首先，他对于当时形势，有一种极“左”的估计，认为“西北和全国一样，已经到了两个政治前途决定的关键，一个是苏维埃的前途，一个是殖民地的前途”。认为“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斗争与胜利，苏区的空前扩大与巩固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工农生活的改善，继续不断的前仆后继的在暴动着，在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三月扩大会议决议)。认为“西北劳苦群众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开展与扩大，游击运动普遍的汹涌的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运动烈火般的扩大”(同上)。认为白区群众“只有站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誓死为争取工农政权与土地革命而斗争，以求得劳苦群众的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同上)。认为白军士兵“斗争与哗变的潮流，广大的发展，士兵群众日益深刻了解白军长官是反动的压迫群众的，他们只有打死反动长官投降到红军中来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同上)。显然这些都是片面的夸大的甚至是全无根据的估计。

郭洪涛同志从对政治形势极“左”的估计出发，来检查陕北党当

时的情况，自然是完全不能令他满意了。郭洪涛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党的扩大会议上是如何估计陕北党呢？他认为“陕北劳苦农民的英勇的斗争当中，党的富农路线的领导，障碍了实际工作的推进，使党远远的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充分地表现陕北党对于领导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同上），对游击队也认为“各支队都充分的表现对于领导游击队的保守消极与怠工，都充分表现富农路线的右倾残余仍然残存在各支队的实际行动中，领导中”（同上）。不过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所谓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后，“各地工作已由富农路线部分的转变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去”。就是说在郭洪涛同志未回来前，陕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给当时陕北党的主要领导者马明方同志带上右倾富农路线的帽子。而自郭洪涛同志回来后才部分的转变了富农路线，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呢？是不正确的。因为陕北党在郭洪涛同志未回来前，即已开始领导群众斗争，并发动游击战争。既然是富农路线，为什么还要领导群众斗争和发动游击战争呢？只不过陕北党在当时还没有执行像郭洪涛同志那样“左”的路线罢了。在郭洪涛同志看来，这就是因为受到“富农路线”的障碍，于是就举起反富农路线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

郭洪涛同志的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是继续发展的，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阎家窑子会议上对二十六军的估计是“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森林主义”（见郭著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对杜衡领导红二团走到失败的“左”倾机会主义，还认为“左”的不够，而估计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四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所谓渭北苏区不过是三原武字区二三十里的一个平原地区）估计为“逃跑主义”。对领导骑兵团全都哗变成立义勇军并最后为革命牺牲的王太吉同志估计为“没有丝毫的阶级立场”，“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与勇气”，“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对在一时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苏区而同时向新的地区发展的方针，估计为是“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是“招兵买马的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批评当时还是游击状态中的革命委员会政权“没有一条正规制度”，要求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正规化。批评当时还处在

游击战争时代的游击队“游击习气很大”，要求游击队要建立红军的正规制度。最后就认为“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之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就认为是“干部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的右倾”。然而实际是如何呢？历史证明了二十六军并未右倾，而是郭洪涛同志太“左”倾了。

郭洪涛同志对于土地问题及对富农政策也是“左”的。二十六军和陕甘党会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而郭洪涛同志就认为这是富农路线，他主张对富农和地主不加区别，一样分配他们的土地。当时许多边境的土地未分，是因为那些地方政权尚未巩固，白军常来扰乱，分了地不能巩固在群众手中，地主来了又讨回去。但郭洪涛同志毫不估计这种实际情况，把一边境区暂时未分土地的事实也看做是机会主义表现。甚至“分地连分了七天”，也是严重错误。郭洪涛不但主张分富农的地，不但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一齐分地，而且主张实行集体农场。看起来郭洪涛同志是非常革命似的，其实他还丝毫不懂得革命的常识。

阎家窑子会议之后，八月间红二十六军主力与第一路游击队(即陕北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围剿”，缴枪二百余支，俘虏一百余名，肃清了数股进攻苏区的反动白军和民团武装，攻占了许多为土豪盘据的寨堡，克服了由于敌人“围剿”所造成的当时群众中的恐慌以至反水现象，将游击队集中扩编为红一团，冬季又在清涧成立了红二团，并在安定成立了陕北第一个革命委员会。这时游击运动开展的局面，向党提出了统一陕甘与陕北党及政治军事的要求，故于一九三五年一，马周家硷会议中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甘与陕北党的领导，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陕甘与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正因为有了这次的统一，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与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当周家硷会议的时候，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二次“围剿”已在开始部署，二次“围剿”的规模，比起一次“围剿”要大的多和严重的多。周家硷会议对于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曾展开激

烈的争论，当时提出了两个战略计划，一个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提出的，主张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这种战略方针之所以有利，就是因为它是靠近山地和我们的根据地，是有阵地的出击；而郭洪涛同志所提出另一种战略计划，就是主张向绥、米、葭、吴进攻，以与神府苏区打通，这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是对我们不利的、带有冒险性质的军事计划。因为绥、米、葭、吴一带，敌人统治较为强固，要进攻势必走到攻坚，攻坚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山西方面的敌人也容易过来给我以威胁，是既不易攻又不易守的。周家硷会议反对了郭洪涛这一“左”的冒险的军事计划，赞成了刘志丹同志的战略计划。郭洪涛同志初回陕北当游击队力量还很小的时候，就曾提出“练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口号，以后他又反对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战争中所执行的正确路线，主张二十六军应当攻坚，应当向城市及平川发展。这次对粉碎二次“围剿”的战略问题，又提出攻坚和向平川城市发展的计划，可见郭洪涛同志在军事上也是一贯的抱有极“左”的思想的。他这种军事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对陕甘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但对陕北某些部队和游击队是起了一些影响的，使他们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败。

郭洪涛同志在干部政策方面，一贯的实行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不从政治上原则上来团结干部，而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凡奉承他的，不论政治上好坏，均提拔之，反之，均排斥之。所以他提拔的干部，有许多品质很不好的，并且有一部分当时就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就采取许多办法来打击不同意他错误路线的同志。郭洪涛同志一回到陕北，就拿富农路线的帽子来打击马明方同志，在阎家窑子会议上又给我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我政治委员的工作，并给我留党查看的处分。又以“白军军官”、“一贯的动摇怕死”等诬蔑来打击刘志丹同志。对谢子长同志也是采取了许多方法来打击的。至于对其他许多干部，不说是“右倾”，就说是“富农”，不说是“土匪”，就说是“流氓”，一样采取各种方法来打击，甚至无辜的枪毙同志，造成党内浓厚的无原则的空气，歪风压倒了正风。

郭洪涛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所有这一切“左”的错误，当时已逐渐为大多数干部所认识，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政治上无原则和幼稚的，是一个“左”倾空谈家，而在品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不正派的。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玉家湾会议上和郭洪涛进行了斗争，严正的批评了他这一切错误，特别是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并调动了他的工作。和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到这次玉家湾会议为止，可以说在基本上结束了。但玉家湾会议对郭洪涛的斗争是不彻底的。因为在组织上只是给以批评和调动工作，并未撤销他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同时调动工作，又是换汤不换药的，所以他以后仍能继续做了许多有害于党的事情。

玉家湾会议后，党在正确的战略路线指导下，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击溃敌人二十营以上的兵力，缴获了大批的武装来武装了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红军有一倍以上的发展，游击队有二倍以上的发展，占领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六个县城，使陕甘与陕北苏区完全打成一片，苏区得到空前发展。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四时期。

(戊)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与反朱斗争

(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十月)

敌人的二次“围剿”被粉碎后，由于红军迅速壮大和苏区猛烈的发展，使得敌人调动更大的兵力来布置新的三次“围剿”。当时军事委员会对粉碎三次“围剿”决定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东线敌人，再打北线敌人，然后打南线敌人。在这种战略方针下，东线敌人被红军击溃了二个旅并消灭了二个团，将敌人赶过了黄河，这是粉碎三次“围剿”的开始。正当这个时候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了陕北。朱理治同志到了陕北后，首先选择郭洪涛同志做他第一个助手，并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发展了。朱理治在文安驿和永坪两次会议所做的报告和决议以及他在“西北斗争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形势是怎样估计的呢？他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

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国民党政权是“民族的社会的武断宣传大大破产了，财政更大的恐慌了，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了，军事上的困难与军队的崩溃大大的增加了，国民党的碉堡政策在群众力量之前必然的会达到失败”。又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国民党最大的困难是“武装力量的削弱，剿匪战线的延长，东至关东，西至西康，北至府谷，南至云、贵，在广大的战场里使国民党军队不敷配备，是白军士兵一天一天走向革命的道路，一般的极端动摇与不愿进攻真正抗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是“国民党的招募新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招募新兵的来源日益缩小”等等，苏维埃政权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区域占有全国的四分之一，苏维埃的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的胜利口号是早经完成的，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因此就认为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面”，不仅是阶级的决战，而且是“我们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对粉碎二次“围剿”后的陕甘形势又是如何估计呢？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定有条约，出卖华北，要在西安设立领事馆，把军队开到西安，亲自出马，直接干涉”。“三次‘围剿’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最凶恶的步骤，冲破三次‘围剿’对于阻止殖民地化西北有决定的意义。”“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二次‘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扩大，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由于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获得了伟大胜利，……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察省侵略西北以迎头痛击，……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形尖锐化”；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因此就认为“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的优势”，“战争的优势是属于我们方面的”，这些就是朱理治同志对当时形势所做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估计。

朱理治根据他对形势的上述估计，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与发展陕北陕甘边区并与陕南的红

军游击队联系起来，建立陕西的广大苏区，更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的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并且要“实行对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保护苏联，为了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同样成为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这就是朱理治对当时陕甘党规定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任务。朱理治为了完成上述的政治任务，在军事路线上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主张，提出“全线出击”和“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持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又要红军“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又要红军“运动用红军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新的‘围剿’未布置之前先行打碎”，更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邠发展，恢复已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能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朱理治同志连地理都没有弄清楚)，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坚决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与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响应，争取这次战役的全线胜利，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联系陕南及四川苏区为一片”。这些就是朱理治同志对粉碎三次“围剿”提出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军事方针，请问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全部不到数千人，有什么办法能执行这样大而且多的军事任务呢?最可笑的是在粉碎三次“围剿”决议中说：“在粉碎三次‘围剿’的战斗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既然要粉碎“围剿”，粉碎“围剿”就要和敌人打仗，打仗首先就要有枪杆子，为什么却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呢?这真是亘古未闻的奇谈关于朱理治同志这一切高超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和计划。当时许多同志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他对粉碎三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计划，在文安驿会议中曾受到刘志丹同志的嘲笑和

反对，说他是“做梦”。现在大家如果把当时的实际情形与朱理治同志的估计和计划对照起来看一下，那么，这不是做梦是什么？文安驿会议后，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执行朱理治的路线，仍是按照我们原定的战略方针行动，于打走了东线敌人之后，又集结力量打击北线的敌人（进攻横山未克）。这时二十五军来了，与二十六军在永坪会师，并由朱理治召开了永坪会议，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三人成立中央代表团，改组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郭洪涛二人为正副书记，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主席，决定成立十五军团，以徐海东、刘志丹为正副军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我为政治部主任，这一切组织上的变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把刘志丹和我从党及军事的主要机关排挤出来了，而郭洪涛、聂洪钧等却被提拔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如果说在文安驿会议朱理治虽已提出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但因有刘志丹同志和我们的反对未能立即执行，那么，在永坪会议后，因为他得到了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们的帮助，就取得了党和军队的全部领导权，所以从这时起，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统治了陕甘的党，使三风不正发展到了顶点。

因为刘志丹和我们对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不赞成的，所以朱理治、郭洪涛就给我们戴上了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请看他们在粉碎三次“围剿”决议中对粉碎二次“围剿”是如何估计的，他说：“总结二次战役中的经验与教训，虽是我们初步的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普遍的发展广大的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的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前面悲观失望，在战略上的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了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没有及早定出军事计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军事行动的迟缓，不得迅速执行。红军没有应有的扩大。白区与白军士兵工作的忽视，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没有广泛的建立起来。这都是我们在二次战役中没有能全线的冲破‘围剿’与得到应有收获的最大原因”。由此种估计出发，朱理治、郭洪涛在彻底

粉碎二次“围剿”后的永坪扩大会议上，就大开展其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以后他又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打倒反党的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说：“在陕甘阶级决斗的前面，有一种不相信革命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我们事业能够成功的人们，便表示了极大的恐慌与动摇。他们主张退却逃跑，主张放弃苏维埃与红军，主张取消白区的工作，主张取消党的领导，他们形成另一条路线——右倾取消主义的路线——来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这是指得什么人呢？他虽然提出了蔡子伟、黄子文、张庆孚等人的名字，但实质上主要的是指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因为朱理治说革命发展的是那样的大，而我们说没有那样大，就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认为全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朱理治说在粉碎三次“围剿”中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我们说还没有占绝对优势，就说我们是“估计不足”，是“右倾机会主义”；朱理治说要把陕甘陕北苏区与陕南四种以至新疆、青海、甘肃联系起来，而我们说这个暂时还没有可能，就说我们是“取消革命”；朱理治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群众，只要党去领导就会革命起来，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陕甘有陕甘的特殊条件，就说我们是“陕甘特殊论”，是“用一种特殊论的说法来掩盖其对革命工作的消极怠工”；朱理治说要大大的加强陕甘工人运动，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我们说陕甘无产阶级不多，这个问题没有像天津、上海那样重要，就说我们是主张“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应当停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就说：“这种主张与策略是在敌人的进攻下，解除革命的武装，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使陕甘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是“进一步的暴露反革命的实质”，是“反动统治各派别在党内的同盟军与应声虫”。既然是如此罪大恶极的右倾取消主义，那当然就“必须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残酷的斗争”，就“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制裁一直到开除党籍为止”。甚至我们在前方已经打了大的胜仗，反说我们“个别的右倾取消主义者，已显露了反革命的原形”。这就是朱理治、郭洪涛当时和我们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

朱理治、郭洪涛在组织路线上是实行极端宗派主义的，朱理治对地方干部只信任郭洪涛一个，对其他许多创造苏区有功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地方干部，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指责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加以打击。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张仲良、朱子休、杨祺等都曾受了打击的。他对张庆孚忽而拉他参加中央代表团和当军委会副主席，忽而又说他是反革命逮捕起来。他在永坪会议上关于党和军事机关的改组，是有计划的把刘志丹和我们一批人从党和军事指导机关赶出来，他成立中央代表团，代表团下又成立小代表团，以这种形式来达到夺取高级领导权的目的。他在提拔工人干部的口号下，打击当地有威信有能力的老干部，如把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委员会主席撤销，而代之以毫无经验的一个所谓“雇农”同志。总之，凡是奉承他和赞成他路线的人(如郭洪涛)就提拔，凡是不赞成他和反对他路线的人，就打击，一直到把他们当作反革命逮捕起来，这就是朱理治、郭洪涛同志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试问这样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与党的原则有什么相同之点？

最后再看朱理治、郭洪涛的各种社会政策。首先在土地政策上，进行了一个查田运动，就是对地主富农实行肉体消灭，对中农也给了打击。好些共产党员在地主富农的名义下受到残酷的打击，美其名曰“深入阶级斗争”，其实是使群众发生恐慌，军队发生动摇，造成很严重的形势。朱、郭在劳动政策方面提出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他不晓得陕北农村只是“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是没有表的，八小时制如何实行呢？这是把大城市的一套搬到落后的陕北来了。朱、郭对知识分子是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政策，对游民哥老会分子是采取消灭的政策。至于朱、郭对肃反的政策，那更是实行疯狂的极“左”的政策，造成了许多罪恶的行为。

永坪会议之后，十五军团南下，于劳山战役中消灭了一一。师大部，并击毙其师长，继包围甘泉未克，复将一。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榆林桥，接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配合下，歼灭敌一〇九师于直罗镇，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三次“围剿”至此时彻底

粉碎，使陕甘苏区的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五个时期。但在劳山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未到之前，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主持下，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以下我就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四、肃反事件

正当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候，陕甘苏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四人的主持与策动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老干部(我也在内)以莫须有“反革命”罪名逮捕起来，并且枉害了好些同志，造成当时陕甘党与苏区极严重的危机，如果不是中央及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这一肃反事件就会引导陕甘党与苏维埃运动到失败的道路。因此，我们对这次肃反事件必须加以深刻检讨，得出教训，使这种错误今后永不重复。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严重的肃反事件呢？其根源何在？

第一，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上面我已讲了这个问题。朱理治、郭洪涛不论在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社会政策及组织路线各方面，都是错误的，形成一条有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一方面却是执行着正确的路线。而朱理治、郭洪涛就以他们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与刘志丹同志等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在政治上军事上及组织上展开各种争论。朱理治、郭洪涛因为要保留与坚持其“左”的错误路线，就不能不推翻我们的正确路线，所以就给我们带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他们在政治上拿这个法宝来打击我们，同时在组织上又实行各种只有剥削阶级才采用的挑拨分化手段，企图拆散团结在正确路线下面的同志。当这些手段无效时，又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从党与军事的主要领导机关排挤出来，以扫清

其贯彻错误路线的障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屈服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于是在二十五军来了之后，当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将这种党内路线的斗争转入党外斗争，于是发生了这次“肃反”事件。

第二，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能否说两条不同的路线斗争就一定要发生“肃反”事件。这样说，从路线斗争转变到肃反的关键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就是说朱理治、郭洪涛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在那里作怪，不然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朱理治在河南、郭洪涛在山东为什么又搞了许多错误呢？这次大会的检讨已经把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完全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个追求的是“钦差大臣”，一个追求的是“土皇帝”，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党的利益服从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一直发展到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个人主义欲望。

第三，二十五军到来与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很显然的，如果没有二十五军的到来，朱理治、郭洪涛就没有军事力量的依靠，就不容易发动肃反，而二十五军当时又是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到陕北的，特别是戴季英同志当时任保卫局长，就把鄂豫皖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应用到陕北来了，所以二十五军到来也是促进这次肃反事件爆发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在这次肃反事件中，朱、郭等的错误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想用肃反的形式来达到其夺取党及军队领导权的目的，肃反只是借题发挥。因为陕甘红军与苏区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创造出来的，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批干部，是与陕甘党及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朱、郭既不能在政治上屈服我们，而又要执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满足其个人主义的欲望，除了利用肃反名义来打击我们外，是很少有其他办法的。肃反事件在实质上正是这样。其次是帮助了敌人。朱、郭既然把党的同志，把苏区的创造者与红军的领导者和干部当反革命逮捕起来，甚至加以杀害，这当然是只有对敌人有利的事，是完全帮助了敌人。肃反是在打垮了东线敌人又在南线取得劳山战斗胜利之后，试问这些胜利是谁领导的呢？正是被朱、郭逮捕起来的这些人。既然这些

人领导的打了胜仗，反而把他们捉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还不是帮助敌人的行为吗？当时大家都已知道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在前方曾经讨论和计划要率领陕甘红军出击以迎接中央红军，但朱、郭等又不许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不是帮助了敌人吗？再次，当朱、郭发动肃反的时候，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北上到了甘肃，既然知道中央红军要来，这么大的事情，又不等中央来解决，自己就动手了，这也是错误的。同时朱、郭在大会上发言中说他们当时已知道肃反是错了，既然错了，为什么不制止呢？为什么还继续捕人呢？可知这些话不是事实。最后就在肃反中采取指名问供和野蛮残酷的方法，朱、郭、戴等把人捉起来，不进行任何的调查研究，不重证据，只想拷打，虚拟出许多名字向被捕人提出，硬打得要他们承认是“反革命”，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次肃反的恶果是很大的，它使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蒙受陷害，使许多创造苏区和红军的老干部蒙受冤屈并进而影响到红军发生很大的动摇恐慌，使红军的力量受到削弱，影响到许多地方的群众逃跑，使苏区缩小。不仅如此，更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酝酿着，如果不是中央到来制止与纠正这次肃反，其前途更是不堪设想的。这样大的错误和罪恶，到底谁应该负责任呢？我以为朱理治、郭洪涛应负第一等的责任，因为朱、郭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不论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并在二十五军未到之前，朱、郭就已确定了这个肃反的方针，而在肃反的全部过程中，朱、郭都是主谋者。在这次大会检讨肃反问题中是完全证明了。聂洪钧、戴季英要负第二等的责任，因为聂、戴不但未能丝毫制止肃反，而且火上加油，协助朱、郭扩大肃反，当时聂在前方，戴在后方，都是坚决的实际的执行肃反的人。至于其他人，都是盲从者，但盲从者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虽是盲，但都从了，也应有责任的，应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好好的反省自己的错误。

五、肃反事件以后

中央来到陕北，及时的正确解决了肃反问题，认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释放，给直接执行这次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戴季英二同志以处分。这时“左”的路线，已被中央纠正了。但朱理治、郭洪涛的宗派主义，并未停止，且在继续发展着。

朱理治、郭洪涛在中央来了之后，把真实情形隐藏起来，想尽一切方法，歪曲历史，蒙蔽中央。朱理治向党表示他曾创造了十五军团，郭洪涛却把自己描写成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把肃反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聂洪钧和戴季英身上去。中央召开保卫委员会，当时郭洪涛是参加了的，但他没有讲一句老实话。当被捕的同志出狱后，中央又召开了活动分子会，在这个会议上郭洪涛还说“我是不赞成肃反的，我早就说肃反是错了”。中央召开两次党务委员会讨论被捕同志党籍问题的时候，郭洪涛一再坚持的说刘志丹和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说我们对反革命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使得一九三五年党务委员会的决议中仍然说我们是有右倾错误的。当郭洪涛负责陕西省委书记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仍在暗地里继续打击陕甘苏区过去的老干部，说这个无能，说那个不行，说这个曾经动摇，说那个过去右倾，于是把他们连降几级，一个一个压到下层去。一九三七年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张秀山同志和我都没有出席的资格，而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但和郭洪涛要好的一些人却反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郭洪涛仍是伪造历史，欺骗中央，当时曾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不赞成把他的名字列入边区党委委员的选名单上。这次会议之后，朱理治、郭洪涛又写了一个关于肃反问题的解释书，表明他们在这次肃反事件中是没有责任的。要负这次肃反责任的仅仅是聂洪钧和戴季英同志，并强制的要我和王世泰在这个文件上署名，企图以之来达到其继续欺骗中央欺骗党的目的。其后在一九三八年中央的两次会议上(一次在蓝家坪，一次在城内)，郭洪涛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不讲老实话，继续欺骗党。今年春天在枣园的座谈会上，郭洪涛还是没有丝毫自我批评精神，隐瞒了事实而吹嘘他的“功绩”。直到这次高干会的

发言，依然千方百计的设法隐瞒真实情况，企图逃避自己在肃反事件所应负的责任。这样计算起来，郭洪涛对中央的欺骗和蒙蔽，已经不下十次了。此外，他还到处造谣、挑拨、诋毁党的领导，破坏负责同志的威信；对中央和西北局，表示不满，公开说中央“不公道”，说西北局有“宗派主义”；说这个同志如何如何，说那个同志如何如何；在这个同志面前说那个同志不好，在那个同志面前又说这个同志不好；利用某些同志政治上的落后，或曾犯过错误，进行挑拨，煽惑他们对党不满的情绪。像这样一类事实，真是举不胜举。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朱理治和郭洪涛虽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还丝毫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还在那里发展着他们的宗派主义。

六、结论

以上所述，就是西北党的历史发展的几个时期。从这个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甲)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造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黄子祥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来，其危害也较轻，因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很快的为党克服了，并且已经做了结论。但与“左”倾的斗争就不同了；与“左”倾的斗争时间很长，范围很大，其危害也极严重，并且至今还没有做结论。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着重的来清算“左”倾机会主义。

根据以上所述的历史，可以明显的看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在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的革命，

必须以武装为主，以乡村为主。就是说，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以乡村为主要的斗争根据地。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反对枪杆子万能”，就是说，反对以武装为主。他们“反对乡下党”，就是说，反对以乡村为主。他们抄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经验，强调城市工作与工人工作，就是说，主张以城市与工人为主。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反对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反富农政策，其结果就必须削弱革命的阵营。

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这个特点，所以在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反映到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否认北方特殊，否认陕甘特殊，就是说，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就是说，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在全国胜利。

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力量，经过多年的斗争是日益强大起来了，这是事实，然而反革命力量还是更为强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此点，他们否认客观的事实，认为革命的力量已占绝对的优势，因而就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游击战乃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的革命武装的唯一正确战术。没有游击战这个正确战术，就不会有今天强大的革命武装。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咒骂游击战是“逃跑主义”，主张阵地战和

平原战。在“肃清苏区中的白点”的口号下主张攻坚。事实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这种军事路线，是只能断送革命武装的。

第二，不了解根据地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样证明了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因为革命武装与革命战争的发展，离开山地与乡村就没有可能。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咒骂在山地和乡村建立根据地是“稍山主义”，他们总是想到城市里去。如果照“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做法做去，那么，根据地是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的。

第三，不了解建军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样证明了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最初总是由这些武装开始，然后建立党的骨干并与农民结合而成为革命武装，并由小的游击队而为大的正规军。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认为“武装斗争一定要群众运动发展到最高点”。所以对利用白军或土匪武装使之转变为革命武装的做法就认为是右倾，是“单纯兵变与土匪路线”，并反对游击队的所谓“游击作风”，希望游击队一下子就变成正规军。这些都是说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完全不懂得建军问题的。

再次，在政策上，在各种社会政策问题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实行一连串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实行极“左”的查田运动，迟分几天土地就认为是机会主义等等。

第二，对同盟军问题是完全不懂得的。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

第三，对知识分子，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

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

采取消灭会门、游民的政策。

第五，对肃反问题，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有错误的革命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把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当做反革命对待，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

第六，对政权问题，是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

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隐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所有这些极“左”的社会政策执行的结果，就是把革命力量缩小与孤立起来，使党与革命力量受到削弱。而在另一方面，却正好是扩大了反革命的力量，帮助了革命的敌人。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上，是完全不正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的拉拢，不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原则的打击。他们对地方干部，不管这些干部如何忠实于党，如何与群众有联系，如何在创造红军与苏区斗争中有功绩，总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总是以钦差大臣的眼光排斥与打击他们。并且在提拔工农骨干的幌子下面，借口成分问题来排斥有能力的干部。这些都是为了达到其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目的，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经过一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断送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破坏了党的工作，但不久就恢复了。第二时期是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也给了党一些损害，但其以“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党的企图，受到了抵抗，未能完全实现，所以

给党的实际损害也还有限。第三时期则是以朱理治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朱理治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为时最短，但其对党的损害最大，因为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统治了党。开始一个时期，军队还未统治到，但在十五军团成立与肃反事件发生后军队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统治。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期。

所有杜、郭、朱这三人的“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路线，是三风不正必然产物。他们对政治军事民运党务及一切政策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的，而只凭书本上的教条子里的空想办事，是标本的主观主义。他们在党内排斥与打击优秀的干部，在党外又拒绝与一切同盟军合作，是十足的宗派主义。他们写文章发表议论，言之无物，夸夸其谈，是典型的党八股，我们从杜、郭、朱三人的“左”倾路线中非常明确的看到三风不正对党的危害，非常深刻的体验到三风不正是足以亡党亡国亡头的滋味。而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则不然，刘志丹同志之所以能执行正确路线，就是因为他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对政治军事民运党务及一切政策之决定，一般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他的正确路线是从无数的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虽然也还有缺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列主义，但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是检讨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所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并对于目前我们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是有实际意义的。

(乙)“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过去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否陕甘地区特有的现象呢？不是的，它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就是说，杜衡、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有来源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北方会议的决议，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一种错误的估计，认为国际一切帝国主义都要进攻苏联，认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而国民党开发西北是要进攻

苏联和外蒙。对当时北方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是过“左”的，如认为北方已到了普遍创造新苏区的时期，提出反对北方落后论和特殊论的口号，认为北方不搞苏维埃运动就是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对二十六军的问题也有不正确的指示，如反对二十六军逃跑主义，要学平原战阵地战等。其后北方代表继续发展北方会议的路线，一方面认为陕甘苏区已超过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另一方面又认为陕甘苏区工作是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特别在陕甘边要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北方会议的决议与北方代表的指示，以及苏维埃后期所谓“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等口号，者直接影响到陕甘，成为陕甘“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据和出发点。

(二)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如提拔干部不是以党性、实际工作经验及与群众关系等条件为标准，而是以会不会在口头上说几句马列主义词句为标准。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及至把这种干部提拔起来，又实行软差大臣制度，委派他们以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的代表之名义，以“统治”某些区域党的工作。于是这些软差大臣们，就是觉得自己有无上的权威，可以不管任何党的原则，对党的干部采取打击政策，以维持其“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从杜衡到郭洪涛、朱理治的“左”倾路线，都是与这种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有密切联系的。

(丙)革命家的品质以上我们对过去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这一点已经指出了，但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这就是说，由路线的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历史上犯错误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而朱、郭则是自觉犯错误的。这十天大会对于朱、郭错误的检讨，完全证明了这种论断。不然，以后路线正确了，为什么他们还继续做坏事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朱、郭的个人品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一切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其个人利益出发的。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目的，甚至不择手段，采取剥削级所惯

用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同志。其党性就可想而知了。同时，朱、郭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无论政治或军事，苏区或白区，党内或党外，这些方面的实际经验都是缺乏的。但他们还要自以为是，到处打听别人，以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而别人都是机会主义。由于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历史上最重的错误。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

另一方面再看刘志丹同志，他不但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他的个人品质，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典型，他一贯的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在法庭上，在无数次战斗中，充分证明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非常熟悉群众的情况和要求。他能独立的识别方向，并为此方向百折不回的斗争。他能遵守党的纪律，又有高度的原则精神。他在这一切方面，都是完全合乎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讲的布尔塞维克干部标准的，他有虚心学习的精神，一切是从实际出发，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的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他不论对政治军事，苏区白区，党内党外，都是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特别在军事方面，他是有天才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刘志丹同志，应当把刘志丹同志做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丁)思想斗争问题

我们这次高于会的检讨，是反映历史上的一场大论战，也就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思想斗争，也有错误的思想斗争。朱、郭的思想斗争是以错误路线来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来达到打人之实，这种思想斗争是错误的。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思想斗争是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是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的两条战线斗争，是治病救人的精神。这种思想斗争是正确的。我们党要反对前一种错误的思想斗争，而提倡后一种正确的思想斗争。这种正确的思想斗争，在目前对于我们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党里现时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我们党逐渐腐蚀下去。因此，我们要提高政治嗅觉，以这次大会对历史问题检讨的精神，来展开反对自由主义

的斗争。我们从这次对历史问题检讨中得到教训并应当坚决相信，正确的路线一定要胜利的，而错误的路线最后必然要垮台的。

(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呢？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的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历史的教训就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有了理论才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抵制与克服错误的东西，为了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文化和一般知识，因为没有文化和一般知识，就不可能学到理论。另一方面，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必须如此，他们才不会重复历史上那种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从两方面努力，使我们的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都能真正学会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党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关键。

尾语

根据以上检讨，我有下列几个具体的提议：

(一)对过去在错误肃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应当替他们申冤，脱去他们“机会主义”的帽子。

(二)请求中央取消过去认为被捕同志是“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干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决定。

(三)希望犯错误的同志痛改前非，继续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治病救人精神对犯错误的同志多加帮助。

(四)对所有到会同志，希望都能认识这个思想斗争，同时也是

教育了我们自己，应该用这个精神来贯彻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和整现在。

(五)提议把这段历史做为干部教育材料。

这次会议对历史问题检讨，时间很长，开得很好，很有意义，解决了边区党的一个大问题。以后，我们必须在中央与西北局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与缺点，以迎接我党当前的任务。边区党在全国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边区工作着的每一个同志，也是有特殊责任的。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前进！

附：西北局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做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今冬工作中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冬季一向是我们总结一年工作，布置来年工作的季节。今年冬季应当做那些中心工作？应当怎样去做？这是环绕于我们许多同志心目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谈到边区的全部建设，一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是更加繁重

和复杂了。但综合起来，仍不外乎民主建设、军事训练、发展生产、干部教育及文教工作这五大项。这些都是我们建设边区的长期工作。其目的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但我们进行这五项工作，并不是同时并重、分头奋进，而是在每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抓住一项两项，作为中心环节，用以推动全盘工作。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今年冬季工作的最中心环节究竟在那里？我们把冬季应做的事情计算一下，为数实在不少。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冬季工作的重心，势必忙于应付，工作不能深入，费力多而成绩少。

我们各地同志埋头工作，又快一年了。在工作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成绩？这些成绩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怎样才能发扬这些成绩？在工作中，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怎样去克服它？在工作中，我们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如何执行？如何理解？我们的工作作风还有什么毛病？有无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怎样发生的？应该怎样纠正？工作有些什么困难？怎样去克服它？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忙了一年之后，应当利用冬季的空隙，很精细地加以思考和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一年来辛苦积累起来的经验，很好整理出来，以供改进工作之用。如果不这样做，把一年来自己做过的工作，不加研究，对于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没有系统的分析，只有笼统模糊的印象，那么就没有办法发扬成绩和克服缺点；来年的工作一定会比今年更加繁重复杂；假若我们还是固步自封，那么对于党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自己则有落伍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应当加以警惕，引以为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深刻了解西北局为什么有这样的指示：“各分区各县今年冬季均应以训练区作为最中心的工作，作为转变与推动一切工作的关键”。（见西北局关于冬训的指示）这就是说，今年冬季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训练区乡干部。只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按照西北局指示的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与实际联系，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与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认真进行冬训，“把区乡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所反映的材料加以分析，综合与充实，区别优点、缺点，区别何者是模范例子，何者是坏的典型，又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况，提出明年的工作计划，展开讨论，批评与修正，做出结论，使大家正确

的认识工作的错误、缺点，接受经验教训，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去为明年的工作计划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和改造我们区乡干部的思想与作风，才能保证明年工作获得更大的成绩。

训练区乡干部，是今年冬季工作的中心环节。除此以外，还有几件重要工作，必须配合进行，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训练自卫军，特别是训练基于自卫军的工作，我们必须利用今冬农闲的机会，把自卫军特别是基于自卫军训练好。训练的方式不要形式主义，不要过分集中，而要切合实际，根据农村的分散环境，一般的以乡为单位，教自卫军学会打手榴弹、埋地雷、步枪射击，以及阻击埋伏等基本功能。

正因为自卫军里面，包括生产能手及乡村中的积极分子，所以通过自卫军的组织，我们可以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如：（一）自卫军不仅学武艺，而且还要学文化（识字、卫生），这样来配合冬季运动。（二）在自卫军里面，可以检讨本村的本乡一年来生产的经验，变工变得怎样？杀虫、防灾等问题有没有新的办法？合作社是否为大众谋了利益？有无摊派股金的毛病？今年怎么办？去年选出的劳动英雄，起了什么作用？有无不好的表现？今年应当如何选举？耕三余一做的怎样，有何困难？不解决植绵纺织等问题，行不行？明年的生产如何等。（三）发动大家对区乡工作提出意见，是否有强迫打骂现象？工作中有无只追求数目的形式主义？应当怎样纠正这些毛病？群众对于这些毛病应采取什么态度？干部如何倾听群众意见来纠正自己的毛病？

只有认真进行冬训工作，才能消除领导上与群众一些隔离的现象，使我们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完全打成一片。

以上所说今年冬季的工作，望各地领导同志，切实注意根据当地情况，适当地配备干部，很好地配合各项工作，并按时检查，总结经验，向下传达，向上报告。

关于建立模范支部的意见

劳动英雄有吴满有、杨朝臣，大家就都向吴满有、杨朝臣看齐；军队里出了个张治国，大家就都向他比赛争模范。去年我在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过要创造模范排、模范连、模范营……许多模范。我们可不可以加上一个模范支部？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今天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曾经唐洪澄同陈正人搞过模范支部，干部也多有七个，时间用了一年，地方叫做襄庄，也没有搞出明堂来，失败了。我记得在张家崖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政府怎么样？对军队怎么样？对人民怎么样？提出了十二条。后来又以这个作为整党的草案、支部的标准，结果党员同支部毫无关系。现在我找任何一个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若能背得出十二条来我就输了。假定按这一套下去就不行，那模范支部就是那一匹布，就是我拿牛偷着把你的地揭了，就是他的创造，我主张搞的模范支部不是那样好，那样科学，那样美妙，那样理想，那叫什么呢？那叫主观主义。我们要确定一点，模范支部就是他能够替老百姓解决问题，老百姓说我们给他办事，这样的支部就叫做模范支部。因此我提出说可不可以搞几个模范支部，不要想一下子就做成什么事，今年给老百姓做了什么事，上月给老百姓作了什么事，这个月又给老百姓做了什么事，共做了几件事。在生产中，在群众运动中，在卫生问题上搞出典型，看应有哪几条，使支部工作就有了一个标准。这是要在实践中创造出来，不是从脑子里想出来的。从实践中创造出模范支部后其他的支部就都向他看齐，这就是具体的领导，提高了干部，也提高了自己，因我们也学习了。是不是每一个分区要创造一个，强的县也可以搞一个，到处演剧，在报纸上登，这就给这个支部就影响了他，支部书记的作风，怎样做工作，柯仲平同志可以写一个剧，到处演，这就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我们要搞这个东西。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支部真正有能力，只要我们支部有能力，工作就能做好，只要支部同群众联系得更好，那打门牌的事就会更多，老百姓拥护我们的就会更多，这是基本问题。我要联系一百五十万老

百姓，有簸箕那样大的飞机我坐上也联不过来，联系广大群众的是支部，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注意。回去要研究一下，召集这样的一个会议。除了搞模范支部以外，还要搞一个最坏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的、站在群众之上，不想办法给老百姓办事，在这样对比之下才能解决问题。将来各县的常委是不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说创造模范工作者，群众里叫做劳动英雄，我们领导上也有模范，叫做模范工作者，模范区长，模范区委书记。县里也有李旺淮，据鲁直、乔木回来说，他硬是算帐，他的合作社怎样一点一点的搞钻。比如我们市委书记，从前在张家崖时我曾批评过他，说他非常浮，这一个年来他就钻，他写的报告有内容了。我们各分区长、模范区委书记，他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本领研究一下，比如李旺淮我们没有要他作什么事，结果他自己搞了几下，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就搞起来了。今天座谈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关于群众团体。在乡区到底要不要？不要。在县里可以摆一个真正同群众有联系的人。假使摆一个像绥德的丁秀那就不行，他虽然很积极，但他就不大懂得想办法，他想的很高的理论，大部分同群众不对头，他搞集体农场就开老百姓的坟，老百姓说这是我们的祖坟，把风水破了，但他说这可以破除迷信，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关于说这可以破除迷信，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关于“三三制”他说豪绅地主都搞进去了，群众团体就要监督政府，掌握政府。他说许多空的大道理，结果群众总不大高兴他。所以作群众工作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邓发同志讲了，群众观点，就是从实际出发，看你是否真正体验到这个问题。念中央党校的、马列学院的都会说群众观点，要从实际出发，王明同志在 xxx

第一次就讲了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看你是不是生长在群众之中，真正的体验到了又是一个问题。在机关里搞群众工作有什么用呢？他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了解群众的情感，他是抽象的。为什么赵峰也是个知识分子，他与别的知识分子不同呢？就是因为他天天在农村里钻，与群众联系，搞妇纺，因此他提出的问题比谁提出的都具

体，妇联会的其他的同志就不行。因此我们不要马马虎虎的把人摆上去。林虹他是专门搞这个的，他写了一个小册子，我看写的很好。我们做群众工作要什么人呢？为什么把老崔摆上呢？因为他对边区的老百姓熟悉，养娃娃他也懂得，他也知道我老婆是女的(笑声)，但他就不会把问题抽出来，许多老干部都是这样的。所以必须配备熟悉情况反映问题的干部，另外要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帮助他总结经验的。只放一个知识分子与群众联系，只放一个老干部，他零零碎碎的说不出东西来，所以在每个县分配人的时候要恰当的配备。这个团体对外就是抗联会，而实质上是党的民运委员会。这些人不要经常的坐在机关，就要像高峰同志所说的办法，拿个车子出去帮助群众，取得一些经验回来，在党委会研究讨论一下，再搞下去这就有力量。单独和系统的线是不要的，分区的由地委管，县的由县委管，不要单独的那些线。

有些地方的农会问题还可以考虑。没有减租的地方地主很厉害，农民没有地主的花样多，就可以组织，甚至是需要的时候就来搞他一下，不需要就不用去搞。我们的群众组织，不是我们要搞什么就去搞，而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的需要。减租时需要农民委员会，就搞农民委员会，可以搞大一点，地主一见这样大的势力就好减租了。到不需要的时候这个组织形式就不要了，如果还要那就是寡妇睡到半夜梦着什么了，旁边又没有睡着你的丈夫，梦着什么了!(笑声)我们的同志常记着一件组织形式不换，那不好。一个县一个到两个人就很恰当，这里有几个人挂一个牌子，办事还是在下面，比如搞妇女工作就搬到安塞去，你搞工厂如果不派到难民工厂、纬华纺织厂去，有什么用呢？我们是党员的委员会，我们坐在这研究，你研究什么东西？要研究就要有材料，没有收集材料你研究什么呢？研究多年也拿不出东西来。有许多人研究出什么来呢？好些同志说我要研究，坐在那里研究，你问他到底研究出什么来了呢？研究多年也拿不出东西来。有许多人说研究抗战，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研究文化，如肖军之类，他研究什么出来呢？甚也没有研究出来。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做工作要是坐在上面，永远也不会进步，会死掉的。我们作群众工作是要在群众之中收集材料，加以研究讨论，过一个时期再下去搞材料。

群众团体的问题就是这样。

高朗山同志提出的青年问题，这个问题邓发同志也讲了。这问题这样来处理，就把学校教育方针搞好，另外是不是还组织儿童团？我看不需要，到夏天党和政府就发动青年娃娃帮助变工发展生产，冬天就集中起来念书，组织识字小组，如果搞的好老百姓先赞成，许多老百姓都是送子弟读冬书的，这是老百姓的习惯。我们要编很多生动活泼的歌子，唱起来非常活跃。过去我和刘志丹到清涧打罢杨家园子，第二天又走了一天，疲劳的很，我们到一个地方听见群众唱歌子“机关枪，咯啦啦响，打死……”，唱的非常好听，大家都站在院子里听。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都是讲话，不是很活泼的。在农村里比如搞秧歌，老百姓很喜欢唱。党委搞了儿童团，不做这些工作，儿童团还是儿童团，阿斗还是阿斗，还是不活跃。青年问题就这样解决看怎样？总之组织形式要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总是要搞生产的，你不能离开党的任务，党是给老百姓做事的，你群众团体不给老百姓做事，人家谁要你呀？过去有些同志说党的任务与群众团体的任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观点。

支部问题。支部书记是不是脱离生产，我看可以脱离，因为这样他可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脱离生产，家里生产搞不好；脱离生产后，只要工作搞的好，给老百姓作事，去一个变工队一下就开完了。变工队组织起来，代耕的问题更好解决了，抗属的地更可以搞好。经费我们是不管的，还是他自己解决，他怎样解决呢？他自己一个基础，你们分区也有一点基础，你们能帮助就帮助一下。支部书记脱离生产这个问题我是赞成的。支部干事我赞成三个人，在绥米地区有的五百家一个村，有的二三百家一个村子，七八十家一个村子，这样的地方一个村子里多一两个积极分子是可以的。一般的宣传、组织我看不大要紧，我主张要一个支书，看哪个工作积极，选择一个，以三个人为适宜。小组的划分还是以地方在一起工作上有联系来划分。编在变工队里，他们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又回去开小组会去，那就麻烦得很，不如编在一起在山头上大家吹一吹。要适合于工作的情形来编小组。

发展党员的问题。首先把登记党员、发展党员过去的标准否定，什么到会、缴费、模范、公道这是抽象的，不要这个东西，还是生产、除奸和反革命作斗争英勇，主要的是这两个条件。发展党员发展什么人呢？这也不要宣传成很大的运动，说边区发展党员，我们要确实确实发展一些好党员。大家说发展劳动英雄，劳动英雄里也有区别，第一是发展战争的英雄，参加游击队，自卫队模范基干连，打敌人时打的很厉害，很坚决，还有在军队里勇敢坚决的人，同特务作斗争和国民党作斗争临难不苟的，战争中的英雄、积极分子是我们发展党员的对象，第二应该发展为公的劳动英雄，他为公家当劳动英雄，他为了公家拼命的生产，这样的人应是我们发展的对象。第三发展群众中的劳动英雄，劳动英雄有为名利之分，有许多劳动英雄回去，比如马海旺就到处跑，他把他的粮食拿出几石来，政治情绪非常高，他只想大家都变好，把一个乡都变好，要发展这样的。还有劳动英雄他叫做劳动英雄，政治上的条件非常差，总是想我怎样搞的多一点粮食，公家再给我加上一点，政治上与敌斗争的情绪非常不够，这种人我们要慎重的考虑。我们一般的说发展劳动英雄那是不妥当的。还有要发展有创造的劳动英雄，谁搞了水漫地，谁挖了井，在各方面有创造性的积极分子。不要说一般的发展。在青年中也是一样，我们要发展政治情绪高的、活泼积极的分子成为党员，还有在青年中有威信的一些人发展他们成为党员。在学生当中我觉得中学要多发展一些，外面的中学我们还发展百分之八十，边区里的更可以多发展一些。高小里我看可以多发展一些。在大革命以后陕北的高小校长、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学生一到十五六岁就都加入了。我们要大量吸收，因他们政治上纯洁，年龄小，加入党以后还可以教育，所以我主张十五岁就可以加入为候补党员，十八岁可成为正式党员。城市里工厂不多。商人党员还是少发(展)一点。城市里的小工厂的好人、学生、学徒、雇工，应该发展这样一些人。估计战争的地方可以多发展一点，比如洛川道口多的地方，在积极分子中多发展一些党员。还可以创造模范党员。哪种党员叫模范党员呢？生产积极的，锄奸积极的。到底有那些模范党员？你们注意研究一下。

我今天就讲这样一些，完了。

号召英雄们推动集体英雄事业

工作方法要按群众自愿与需要，与利除弊。群众赞成的事才办。

高岗同志在昨日群英大会上，号召群英们为进一步推动集体的英雄事业而努力。高岗同志首先指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运动已大大展开，气象一新，比较前年，涌现出更多的英雄，七十二行，行行都有英雄，并创造出更多的模范村、模范连、班等，由于英雄们的带头作用，各方面工作也较前深入了一步。但从每一行的范围内全面来看，这个运动尚在开始，成绩还不够，以农业为例，像吴满有、刘玉厚等耕细作的劳动英雄和植棉英雄还不多，真正能给群众办事的好合作社也不多，工厂、纺织、部队、机关等方面也是如此，模范单位更少。群众对于参加这个运动的热情也还不够普遍高涨。至此，高岗同志提出了今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他说：农业劳动英雄最主要的是：多打粮食、多种棉花。因此就要和群众商量，改进农作法，多施肥、细锄草，除害虫，棉花多打卡，选好种。并发动妇女纺好纱、织好布。目的为了使老百姓吃的更饱，穿的更暖。工厂劳动英雄的任务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因此就要使技术熟练，合理的组织生产力。如瓦密堡产焦炭，把工厂集中在那里，就节省了一笔运输费，由此增加了产量。战斗英雄要继续生产，练兵习武，提高战斗力。模范工作者要提高工作效能，精通业务。高岗同志号召英雄们和群众一起，以自己的事业和经验影响别人，帮助别人，为推动集体的英雄事业，培养出更多的英雄，创造出更多的模范单位而奋斗。

高岗同志接着指出进行工作的方法，他说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总的说来就是要按群众自愿，与利除弊。老百姓赞成的事就讲，否则就不办，好事而老百姓一时还不了解，也暂且不办。什么是老百姓赞成的呢？比方：发展生产、散放农货、减租减息、改造二流子、植树、

安置移难民、肃清土匪等，以后要与这些利；什么是老百姓不赞成的呢？比方合作社摊派股金、强迫老百姓运输，以后要除这些弊；什么是好事而老百姓一时还不了解呢？比方办学校，如果有些地方老百姓不愿意，就慢慢的来，老百姓不愿拆庙，就不急于拆。好事不在形式怎样怎样或者大小如何，而在于不起好作用。比方变工队不是看它所有人都参加了才算好，而要看他能打多少粮，省多少工。能变则变，不能变就不变，能大变就大变，能小变就小变。土地分散的乡村不必组织大变工队，有岌岌一小块土地不必拉十头牛来变工。比方订农户计划，不必家家户户都要填表格，如果他脑子里有个实际计划也可以。耕三余一的口号也不是固定的，目的是要他们多打点粮食、打多打少应按每个农村每个农民的具体条件来决定。

关于进行工作的方法，高岗同志又提出应发扬一技之长，由此使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他说：没有七十二行都懂的万能英雄，我们应该看重每个人的某一点特长，把所有人的特长集中起来，就能创造一种完整的事业。

最后，高岗同志切告诫大家要团结群众，反对自满，“不要英雄一时，而要英雄一世。”在结语中，他说：“改造农村，改造边区，就是建设国家，这是一件极艰巨的长期的工作，要求所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领导同志，时时记住和群众在一起，时时检查自己，不断学习，力求进步，才能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完成集体英雄事业的任务。”

突破一点影响全区

为转变妇运工作方针，影响农村妇女广泛参加妇纺而召开之延属分区各县区妇女主任的联席会，历时共廿四日始告结束。大会曾分别请同志报告中央关于妇运的决定：高岗同志及贾拓夫、杨清等同志报告关于妇运的指示，章伯森同志报告妇纺问题。高岗同志所指示的“突

破一点，影响边区”的工作作风，尤为大家所激烈研讨。各县妇联主任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情形，即相互交换意见，并根据各县具体情形，布置开展妇纺的办法。大会最后一天，由白连同志做总结。在工作作风上，决定不求地区大，而非集中力量于一个地点，把这个地点的妇纺做好后，再延至其个各区。各县妇纺的人数，其进行务须与各县府二科取得密切连系。大会先提出下列数目，作为参劳计划，延县四千、安塞四千、子长三千、郃县一千七百、延安市五百、志丹三百五十、延长一九九。工资一般议定是：纺毛的按米价给工资，纺花的领两斤棉花交一斤线子。目下因工厂纺线太少，故改成线线交付。又为便利各乡妇女领花与交线，大会征得同意，由各地合作社及工厂代收，再前交至本乡供销社，此法可减少手续上之许多麻烦。提高质量，要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形，在妇纺好乡榆横地区放宽，延安、延川，则必须特别注重提高质量，有可能不交三等线子；郃县、延县、延市、子长各区的具休情形，在已有基础的地方着力于质量的提高，在无基础的地方，则着重于推广。纺棉花两斤交线子一斤，纺毛本为斤一两羊毛交毛线一斤(工厂按米折价成钱另付)，这种规定，已妇纺的人，是完全可以到的，此点在已学会纺织的妇女中坚决执行。但在对正学的人，应根据具体情形或斤二两、斤五两交毛线一斤，一到学会之后，则应照统一规定之标准，以免浪费原料。开展纺织比赛，原则上规定由个人比赛转到群众性的比赛运动，但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要实行比赛，各县视实际可情形，或以一个区、乡为重点，以建立工作的核心。如安塞四县区主任，提出与郃县常作个人比赛，并为此而展开乡与乡的比赛的办法等。各个干部在帮助妇女订制个人计划时，尤应考虑各方面情况，不是和她的家庭相对立，而是和她的家庭相一致。根据情况制订各人的计划，再制订全县计划。

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

对于发展边区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春耕时期，已经到来了。今年春耕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经过了高干会，使党政军民对生产运动的注意更加强了；就在于政府实行了大量的农贷与移民，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土地上去；就在于劳动英雄的辈出与生产竞赛的发动，使广大群众的劳动热忱更加发扬。加以最近全边区都落了雨雪，春耕的进行可以格外的顺利。这些都是今年春耕中有利的条件。然而决不能以为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坐待胜利到来了。今年春耕是否能完成预期的任务，除了天地条件外，最基本的将决定于党政军民的具体领导。但是这个认识还并不是在所有同志中都已经普遍了的；相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还有一些很错误的看法。我以为下面三种错误看法，是目前特别需要纠正的。

第一：有些同志想：“群众自己懂得种庄稼，这个又开了高干会，大家情绪高得很，党何必去找麻烦呢？”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去领导，可以睡觉去了。他们不了解群众虽然懂得种庄稼，但要是让群众停止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要是党不努力提高这个水平，则今年的增加八万石细粮，扩大十五万亩棉田，以及发展运盐、组织合作社等生产事业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为要实现高干会发展边区经济的方针，党就必须做一大串的工作。党应该发动农村和部队的领导，像吴满有、申长林那样，不但自己站在生产运动的前线，还要以自己的社会关系，去推动与组织周围的群众积极生产，使生产运动的洪流有确实可靠的基础，党应该经过支部和党员，去帮助每家农民制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如开多少荒，增加多少粮，增种多少棉花，纺多少线子，增多少羊只猪仔等)，要他们把这些计划逐条贴在脑上，以便跟上计划生产。党应该调查群众有什么困难，并且实际解决这些困难。党应该利用一切可能，以党员为核心，像申长林那样组织农民在生产中自愿的变工，使每一村庄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充分发挥。党应该发现每一地区的劳动英雄，把他们的姓名事迹在群众中广为宣传，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同时动员社会群众舆论来反对好吃懒做，不学生生产的二流子，以提高

农民的生产情绪。党应该仿照吴满有与杨朝臣的例子和延安县与安塞、志丹县的例子，在群众有真正的自觉性与可靠的积极分子作骨干的条件下，发动户问，村与村问，乡与乡间，连队与连队间的生产竞赛运动，并使这种生产竞赛有一定的目标，具体的计划，和确切的领导。不要只图表面好看好听，幻想只要到处提出了竞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没有持久的领导恢复，它一定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党还应该保证党政军民各部门在春耕期间少开会，少动员，对于运盐工作也要适当的调动人力，以免违误农时。从此一切工作，都是为保证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那种以为生产可以顺其自然，用不着领导的保守观点，是完全错误而必须立即抛弃的。

第二：有些同志想：“我们的生产计划已经做了，县上区上活动分子的生产动员会也开了，任务都分配下去了，因此，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这些同志不知道开会订计划，虽然是领导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但这绝不等于完全领导了生产运动，因为开会订计划只能表示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并不等于已经做了什么。要使这种计划变为实际，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说，需要把我们的计划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由群众来感觉这些计划是否合乎实际；需要群众完全了解和接受我们的计划，使基础为群众自己的计划；需要定期检查计划的执行程度，看是否发生困难，并研究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需要随时调查研究运动发展的情况，并总结经验，以便选出好的例子，纠正坏的倾向等。在这里，特别需要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使群众实行我们的计划，和学习先进的经验呢？有的同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他的法宝就是开会，就是写指示。但是他们碰了钉子以后，就埋怨起群众“太落后”，埋怨起高干会的群众“太主观了。”他们说：“农民不愿变工，不愿纺线运盐，没有办法。”他们没有看到所倡导的变工，纺织运盐等，都是对群众有利，并为许多群众烈属都愿实行的事，而有些群众所以还表示迟疑，则正是这些领导者自己的工作，不深入的原故。正确的领导，主要的应该是经过群众的认肯，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深信不疑，乐于跟上先锋队的脚步。我们试看：刘建章的合作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他既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凭空订出个

计划，也不是依靠什么公式化的“动员会”，公式化的“宣传”和“组织”。他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提出具体办法，用实际行动从小范围内做起，让群众亲眼看见了好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所领导的南区妇幼，是从移民李国泰老婆一个人身上开头的；李国泰因老婆纺织得穿上一身新的芝麻呢，这就是刘建章的唯一宣传队，而结果证明这却是最有力的宣传队。同样，南区的运输队，也不是在窑洞里开会开出来的，这是他一个人一个人的“瞅目标”，制定了像刘永洋、冯世英出头有经验有办法的脚户，让他们自己由经验证实了合作社合作运盐的厚利，再由他们来拉其他脚户参加，这才发展起来的。再如申长林向党提出组织变工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又是怎样的呢？申长林并不想到群众中去大吹大擂“号召”组织变工队，这样的号召是不会在群众中生根的，他只打算由他自己，他的兄弟，他的姨兄，他的“伙子”，他的伙子的丈人和保人，和他同小组的一个党员，以及这个党员的兄弟，由这样几家人先动手干起来，才能够真正说服群众，才能够真正完成任务。因此，反对那种对领导工作简单化的粗枝大叶的做法，学习刘建章式的具体领导，就成为党在领导今年春耕运动中的一个成败的关键。

第三，有些同志把春耕和整个生产运动看做是可以和和平的进行，而不会遇到什么阻碍的。他们忘记了整个边区是处在抗战环境中，他们把春耕的工作孤立起来了。他们忘记了春耕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一定包含着许多斗争，不但要与党和群众中间的许多错误观念作斗争，并且还要与边区内的敌探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作斗争。对于破坏分子我们是万万不能睡觉的，胜利的春耕，是和消灭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分不开的。最近安定、延安、郃县等地已经发现这些破坏分子有计划的散布“移民就是扩兵”，“扩军就是扩兵”，“今年运盐比去年重几倍”等反动的论言，在别的地方一定还会继续发现。破坏分子的这些谣言虽说荒唐到愚蠢的地步，但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还是可能产生某种影响，减弱他们的生产情绪。因此，各地党必须有足够的警惕性：如在春耕中发现这类谣言与其他破坏活动时，必须一方面揭穿这些谣言，使群众不受其欺骗；一方面迅速调查追究破坏者，

把他们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暴露出来，并予以必要的制裁。这是春耕运动胜利完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些问题，就是党的实际问题，我们同志们思想与作风的进步以及党与群众更加密切的联系，都要从这些实际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

春耕领导的两个典型

(一九四三年三月)

《解放日报》按：四月廿八日，高岗同志在赴志丹县的道上，乘休息之余，找了当地的区乡干部进行春耕工作检查性的谈话，虽然谈话时间短促，但内容甚为丰富。兹由鲁直同志将高岗同志与安塞二区六乡乡长马彩旺同志及志丹一区一乡支书姬海潮同志谈话的记录，整理发表，以供各地春耕工作领导上的借镜。从这两个乡级干部的谈话中间，可以看出春耕领导的深入与否。

(一)与安塞二区六乡乡长马彩旺同志的谈话

高问：你们现在做些什么工作？

马答：在区上开会时，讨论了今年的两大任务——生产与教育。我们乡政府也就照这个讨论去做，目前中心工作，就是春耕工作。教育工作还没有开始啦。

高问：春耕工作你们怎样领导，现在做得如何？

马答：今年春耕我们抓得紧。全乡共有二百二十一个劳动力，区府计划我们六乡今年要开荒二千零八亩。在春耕未开始时，我们就动手把这两千零八亩荒地，和每家每户商量，做了春耕计划。县上发来一种农户生产计划表，照表每家去调查，写成计划后，给老百姓留一半，一半存在乡政府，老百姓就照计划做，我们就照计划检查(说到这里，马彩旺同志把一本很厚的铅印计划簿子拿出来，兴奋的说：

“就是这个，你们看对不对”）。另外我们在每一个农村里，推举了一个热心积极生产的人当生产组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二流子参加生产。因此，我们乡的二流子大部分都在转变的过程中。

高问：你乡二流子是怎样转变的？请你说一说。

马答：好，你不怕麻烦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说一说，全乡共有七个二流子，今年是把他们抓紧了，现在大部分都开上荒了，计有：

一行政村宋家洼沟村的二流子李开元，以前就很懒惰，后来老婆死了，就完全成了一个二流子。过去他还当过战士，后来落了伍，有些兵痞味道，天天东家，西家，今天不管明天，吃一顿，搞一顿，又染有不良嗜好。今年定要他开荒十亩，告诉他再不能当二流子了，他不大愿意，后来他说没有镢头，政府就给借了一把镢头；又说没有土地，政府又给他了土地，又讲他没有食粮，政府又给他调剂了粮食。问题都给他解决了。这时候他就没话说了，只好儿子给人家揽了工，他自己在家开荒，三个牛工，他的十亩荒地估计是可以开完的。该村还有两个二流子，一个叫白德玉，一个叫刘锁子。这两个都是败家子弟，从来没有劳动过，住的又是近川畔，来钱比较容易，这两个人也都有不良嗜好。今年乡政府给白德玉地指定六亩。刘锁子指定也要开荒十亩。现在白德玉完了，又用人工变来四个牛工，准备开荒。刘锁子现在当过二流子比较顽皮些，转变得不快，我看主要因为他，庄稼，逛离逛荡，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他也不管。今年乡政府指定他也开十亩荒地，他心里不愿意，后来逼得紧，他说没有镢头，政府就给他借了一把镢头，现在开过荒地够三亩，还种了二垧熟地。

武家圪台二流子胡生熬，是最难搞的一个。他在旧社会里当过豪绅，又有不良嗜好，又有杨梅疮，一叫生产，就说有病，现在还没有动手。贺家圪二流子刘子谦，才二十多岁，是个没有老婆的光棍汉，又当巫神，曾在旧社会里靠神吃饭，幸而他还没有洋烟瘾。今年禁止他当巫神，劝他好好生产，现在他和他哥哥一犊牛。这人还有志气，

已经开过十五亩荒地，转变得还快。

暖水泉二流子师海玉，他有嗜好，又好耍牌。他有老婆和两个娃娃，衣裳都穿不上，今年我痛痛的把他指教一顿，说得他下了决心，现在变来八个牛工，已开过九亩荒地。前天我去检查时，他说：“乡长，请你放心，我保险完成，我不当二流子了。”

咳！二流子的道理多得很，心眼很稠，你要把他说得没法抵赖，他就再不好“流”了。在这七个二流子中间，五个有嗜好，一个巫神，一个豪绅。现在他们都开始转变上了，以后还要经常监督，否则他明年可能再流起来了。二流子转变的情形就是这样。不对的地方，请你指示。

高岗：二流子你们抓得紧，都要以后教育他们经常下去，不要再犯二流子病。请你再把变工队和运盐队的问题讲一讲。

马答：变工队我们没有像二乡魏家塔(见四月二十三日本报)那样的去搞。但是小变工是做了，如二流子的牛工变人工，就是我们宣传去变的。这个工作，在开荒时我们没有做，在锄草时，我计划要组织七个村工队。这件事一定要搞起来，再不能放纵了。

再说到我们组织运输队的事情。今年区政府给分配了我们八百二十驮公粮，一百八十驮食盐，任务很大。我们全乡统计共有长脚牲口四十六个，里面有十一个驹子，只有组织运输队。乡上人都说：“刘主任能那样干起来，咱们难道就不行吗？”大家纷纷议论，后来有些人说：“干吧！”起先资本有些困难，我们要求得南区合作社投资三万元，再到本乡公社代金内抽了十四万元，其余群众自己入股，至多一人有六万元股金的。现在一月多时间，约了一百万元股金。群众自己商议，定名“民办社”，内设正副两个主任，一个管账先生，一个运输队长，都在群众中自己选出来的。现已买到三十一个牲口了。全年计划运输九次，不足之数，在七八月间再动员私牲口运一两次，这样全部公私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高岗：这样组织运输队和民办社，群众愿意吗？

马答：愿意得很，没有费多少工夫，就搞起来了。主要原因，我估计是这样的：群众自己办，公家来帮助，干部是群众自己的，群众都相信。再就是南路运输队上下当当走，给了群众影响。大家都说：“人家做得好，我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二)与志丹县一区一乡支书姬海潮同志谈话

高问：你是哪里人，现在光景怎样？

姬答：我的老家是横山县人，到志丹县很多年了。我分得土地十多垧，得到革命的利益，现在住在一麻地坪，光景过得还可以。

高问：你乡共有多少村？多少人口？多少劳动力？

姬答：你把我问住了。共有五个行政村，约一百七十多户，人口我不清楚，劳动力我和乡长都没有统计，大约二百多个吧，我不敢肯定说。

高问：你乡共种多少地，今年计划开多荒？支部怎样领导今年的春耕？

姬答：共种多少地，我不清楚。全年多少荒地，乡长知道，大数是五百多亩，支部是宣传动员过今年农耕的。

高问：你们开过会没有？开会时你怎么讲的。

姬答：我们开过会，我说：“今年我们两大任务是生产和教育。”我说：“大家要好好生产，大量开荒”。有些人说：“没有草料种不过。”有些人说：“种上谁来锄地。”

高问：你们今年发动春耕竞赛运动没有？

姬答：发动过，我们一乡和二乡竞赛。

高问：有些什么条件？怎样赛法？

姬答：没有什么条件，就是说，我们要开十来垧荒地。(笑)

高问：你乡有多少二流子？转变了没有？

姬答：大概七八个吧，一家一家没有调查，二流子好好转变，今年都要生产。

高问：现在究竟转变了没有？是哪些二流子？

姬答：宣传了。转变了没有，具体的情形还不清楚。(笑)

高问：你乡共运多少盐？怎样运法？

姬答：不记运多少。区上说要大量组织运盐队，公家都收了代金，准备动员群众牲口去运。

在延安县民众反对日特国特动员大会上讲 词

(一九四三年三月)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早晨到各个山坡的大坪上，看见你们精神抖擞的上操，也看见你们一队队打着旗，扛着枪，背着背包的雄纠纠的自卫军，走进蟠龙镇。现在又来参加你们的大会，使我很高兴。我们开这个大会，是为了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这些坏种破坏我们的边区，破坏我们的生产，他们是奉着日本和国民党内反动派的使命来的。你们知道国民党里有很多汉奸，那个什么副总裁参政会议长，叫什么汪精卫的家伙，现在到哪里去了？(台下高呼投降日本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跑了二十几个，司令军长师旅长跑了六十个，他们还带了好多万军队投降日本了，这是已经跑过去了的。还有许多坏种暗暗的躲在抗战阵营里，就是这些坏种，派了好多特务，来破坏我们的边区！(台下高呼消灭特务……)这些人你们说好不好？(不好！)假使我们办的事不好，做的事不对，派人来破坏还有话可说，那么，现在我来问一问你们：过去鸟阳区、金盆湾、姚店子这些地方有土匪没有(有！)现在呢？(没有！)难道我们消灭了土匪，消灭错了吗？(没有错！)宋应人！穷人有了土地有了牛羊种地过好光景，好不好？(好！)现在当乡长当区

长的是些什么人?(都是老百姓)这些人好不好?(好!)我们发动大家纺纱,开荒,翻熟地,多锄地,安毛坑,多打粮食,穿好衣,吃好饭,禁止抽洋烟,禁止赌博,教育二流子也生产,这些没有错吧?(没有错!)照这样说来共产党是不是替人民办好事的?(是的!)国民党委派的宋应昌、薛生华办过这些事没有?(台下高呼:没有!)我们打日本救中国,但人家还要来破坏我们,应不应该?(不应该!)那么为什么要派人来破坏?(台下齐声高呼:他们混蛋!)反对特务应该不应该?(应该!)既然应该反对,我们就要有反对的办法,过去人家打明枪我们看得见,现在特务躲到里面来撒坏种子这就不容易看清楚,因此现在我们要开大会,要大家注意这些坏种,坚决肃清这些坏种,大家还要明白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是想把边区消灭掉,好安然自在的宰割人民投降敌人。吴满有说得对,我们老百姓给国民党养了几百万军队,原在保国安民,现在他们不把军队带去打日本,反回过头咬主家,真是岂有此理!(高呼:拿起武器,打死疯狗!)

大家还记得吧,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清党”和十年内战中屠杀了几百万共产党员和老百姓,又十二事变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共产党为国家民族着想,不记前仇,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回去,因此蒋介石才免得一死,但是在抗战以来的六年当中,国民党反动派的领袖仍是以怨报德,千方百计的想危害我们,而且越来越毒辣,派特务调军队来抽我们的后腿!(台下高呼:反对抽后腿的!)大家再看我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了三十五万日本军队和极大部分伪军,蒋介石这几年来不但不发一个钱,一颗子弹,一寸布,反而把边区封锁起来,这叫什么道理?(汉奸道理!)这算个什么人!(不算人!)这样的边区能不能取消?(不能!)为什么?(共产党办事好!)该取消的是国民党特务,你们看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如像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这四个县(实际上只有三个县,因其中有一部分地方是归边区管辖的)年年成不好,又是些沙子地,可是去年国民党征收了十万石公粮,每石公粮下面,还要挂一千斤干草五斗黑豆五斗麸子,折合起来就等于二十万石公粮,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简直没法生活下去。河南饿死了好多万老百姓,还有一千多万老百姓将要饿

死。甘肃、伊盟老百姓包括蒙民回民都没法活下去，逼得他们造起反来。贵州四川有好几十万老百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横行暴敛，老百姓说“房子是军队的，土地是保长的，养下个女子是工厂的，养下个小子是老蒋的！”大家看老百姓对国民党愤恨到什么地步！

你们想想国民党反动派是实行什么样的三民主义？过去延安也有国民党党部，他们给你们计划过什么生产没有？（没有！）那时你们有权没有？（没有！）是的，这就是边区过去的情形。现在的大后方呢？也还是大多数人没有丝毫民主权利的，只有那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特务机关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民权”主义。过去你们这地方谁的土地最多？（宋应昌、张家来的最多！）他们给你们减过租吗？（台下喧哗，有的回答说减什么租，欠下的租还要加息。也有的说，种一辈子的地自己吃不饱还不上算，总还是欠人家的。）对了！边区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但现在国民党大后方的情况并不比这好些，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被剥削压迫得要死，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民生”主义。不少司令军长中央委员都投降敌人，最近欢迎汉奸吴开先回到重庆，和敌人勾勾搭搭；对国内少数民族采取欺骗压迫剥削的政策，最近把蒙古的沙王赶得到处逃生，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好不好？（台下齐声高呼：不好！）那末什么是好的呢？（台下高呼：毛主席好，共产党好！）是的，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真正为全中国人民着想，到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边区老百姓在毛主席领导下，光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台下高呼：拥护毛主席！）我们在边区发展生产实行民主，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坚决的打日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些都得到了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同情，引起了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因此国民党内反动派就千方百计的想消灭我们，他们派军队包围边区，从经济上封锁边区，这是大家看得清楚的，但还有一个毒辣的办法是大家不大知道的，这就是特务的破坏，现在大家来看这些破坏的事实吧！

首先就看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杨志功、黄流在你们这个地方是怎样进行破坏的。第一他们拿着上级的名义，利用感情拉拢某些比较

幼稚的共产党员，如他们给崔树贵找了一个老婆，给在病中的鲁世曾送了一斗麦子，在新文字训练班故意给史云才打一百分并答应提拔他当乡长。第二，等到感情拉好后他们就准备圈套来进一步的利诱威胁，如对崔树贵史云才等说：“我们都是知心人，做朋友要做到底，现在时局不对，国民党就要占领边区，那时要杀掉你的头，因此不如现在参加我们的秘密组织(肃反会)，将来国民党军队到了，再以保全性命。”有些不坚定和糊涂的人就被拉进去了，这些特务分子到处进行破坏活动，挑拨干部中问的关系，破坏政府在人民中的信仰，去年我们实行精兵简政，他们宣传要征兵，我们说全边区只征收十六万石公粮，他们造谣说要征收廿万石，引起几百家搬家，他们组织黑军暗杀队，杀我们的好共产党员，好老百姓，组织在坐的高老五、蒋五成、李旺清这些流氓建立秘密点线，准备和国民党里应外合。现在再看绥德安定各县特务的罪恶。绥德有个丁生组织黑军，忠义救国军，反共同盟军到处抢人暗杀人，他自供在今年八月要配合南线顽军的进攻在区区实行暴动。交通工厂的建筑花了好多万，结果一下雨就倒塌了，这也是特务份子搞的鬼。他们到处宣传“时势要反了，边区小不顶事”，来煽动人心。总之，这些特务一心一意的想破坏我们的边区。现在我告诉你们，咱信边区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是几条枪搞起来的，现在咱们有五十万军队，八十万党员，好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还怕什么!你们记着一条，以后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发现他做这些坏事，说共产党不好，说破坏边区的话，做破坏边区的事，你们说怎么办!(捆起来!)对!就捆起来送到政府去。(此时台下众情激奋，人们的吼声震撼山谷：枪毙杨志功!枪毙黄流，用矛子把他们穿死!)请你们静一静，这些人虽然作了这些坏事，但现在他们已向政府坦白了，我们不杀他，只要他真个保状，负责声明以后不再做坏事，为老百姓做事就行了。(台下高呼：所有上当的失足的赶快向政府报告，坚决实行宽大政策!)有的如崔树贵史云才等过去还闹过革命，一时上当，我们应当原谅他这第一遭，可是再一次就不行了。(台下喊再做坏事都要杀掉!)现在不管是谁派来的，只要良心发现，坦白出来，一律从宽处理!但是不报告就一定要严办!(台下高呼：坚决镇压顽固不化的特务分子!)知道谁

是特务分子不报告要关起来，包庇特务分子更要绑起来，我们要把所有的坏种都挤干净，大家才能一条心，才能打胜日本。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自卫军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农闲时要加紧训练，每个自卫军都能够打手榴弹，都能打得还打得准，还要学会用各种枪及一切自卫武器。

第二，在农作时要努力参加生产，保证乡村中没有一个二流子。

第三，把特务分子都搞出来，到处搜一搜查一查，你们回去查不查?(齐声高呼：查!全体自卫军武装起来响应高岗同志的号召!)要严防敌探，捉拿坏人。赞不赞成?(赞成!)回去给家里老婆村里同志乡亲们讲不讲?(讲!)延安县的自卫军不仅要在劈刀刺枪打手榴弹生产中做模范，还要在反特务斗争中做模范，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我们才能够胜利! (台下呼声掌声澎湃不绝；响应高司令的号召动员起来学习使用武器，加强自卫军整训，坚决保卫群众自己的利益，肃清特务分子!)

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

(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

高干会后，各地春耕运动热烈展开；在农村和部队中，竞赛浪潮高涨，劳动英雄不断勇现。自三月十二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具体领导春耕的指示，党政军的各级许多负责同志，均亲自深入农村，深入部队，帮助下级研究实际问题，他们不仅正在积累着领导生产的经验，掌握着领导生产规律，而且也正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着工作作风。今年的春耕运动，无疑都获得了不少的成绩。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春耕运动中，还存在一些领导不够深入具体及形式主义的现象。

首先在生产计划方面：今年各分区、县的生产计划的订定，大都

经过对情况的考察和干部会议的讨论研究，不仅估计到那些事应当办，而且也考虑到那些事是否可能办到的具体条件。一般地说，今年的生产计划，是比较切实具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订定生产计划时，满足于任务的提出和数目字的规定，而没有定出实现它的具体步骤，有了计划以后，便以为万事大吉，从上到下把数目字分配下，从分区、区一直分配到乡，都有了计划，可是对于怎样帮助每一农户来制定目的计划则往往未加注意。有些干部不管农户的条件和愿望，而硬要代他订一个计划，这样的农户计划，是不会有什麼用处的，甚至会起相反的副作用。其实每一农户对于自己的生产，本来是有打算的，如开几垧荒、种多少地、养几个猪等，只要我们和他谈通了，扼要的把他们自己所说的记下来，并和他们商量一下，那些项目可能提高一些，某些困难如何得到解决，告诉他们一些增加生产的具体办法，这样订出来的农户计划，是农户自己所心愿的。有些地方农户计划搞得不好，并不是这样办法不好，而是由于自己的工作作风有毛病。有些同志还以为了解，如果没有农户计划，那么我们领导机关所订出的生产计划，一般的生产方针，变为群众自己的计划。至于农户计划的好处，西北局的指示已经说过，现在再引一段合水县委书记的话，来说明它：“作农户计划，不仅是一个群众性的宣传教育，而且在实际上能够提高生产刺激群众生产，增强干部完成生产任务的信心。比如当二乡布置生产工作时，支部的同志，乡长和行政村主任，对开荒六百五十亩、运盐一百七十驮的计划，信心很差，他们认为全乡只能开荒四百亩，运盐四十驮，但是当我们一百六十九亩计划作成后，总计可开荒一千三百一十七亩，运盐一百驮，这样一来，干部的信心提高了，县长也说，开荒不难，就是运盐”（见解放日报十三日载李子川同志谈农户计划）

其次，在奖励劳动英雄方面，各地劳动英雄的涌现和生产竞赛的开展，对于春耕生产的大力开展有推动作用。例如安塞县生产动员大会，奖励了劳动英雄杨朝臣、张万库，不仅给他们以荣誉，而且奖了他们两条耕牛，同时在动员大会上还惩处了二流子师保锐，这一光荣和耻辱的对照，特别是奖励劳动英雄两条牛的奖励，传遍了安塞，打

动了每一劳动农民的心，使他们感觉到劳力生产，有名有利；而安塞的同志们又能利用这一具体的事件，来推动群众的竞赛。如在该县四区某乡发动了全乡人民向所谓二流子村的刘庄竞赛，因而，大大的激起了刘庄全村人民的生产热情，参加竞赛；在延安、延川、固临等县，也还可以举出这类生动的例子。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有些县还没有发现和奖励劳动英雄。有些县奖励了，可是没有用来推动群众的竞赛。有些地区竞赛是开展起来了，表面上很热闹，可是没有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有些同志把竞赛看作只是劳动英雄的竞赛，而忘记了奖励劳动英雄和提倡竞赛，是为了鼓舞群众热忱，使他们卷入生产竞赛运动中来。有些同志把注意力放在上层领导机关之间，如他们为提出分区间的竞赛条约，而不估计划分区间的状况是无法定出竞赛的统一标准，也不估计划分区间领导机关相互号召，是不能起动员群众的实际作用的。

还有，在组织劳动力方面，各地劳动互助的组织纷纷成立，大大促进了劳动的效率，如在延安，变工每人七天即可开一垧荒，而不变工的要十天；在安塞，变工每人八天即可开一垧荒，而不变工则需要九天，或十天。有同宜耀，一天每人只开荒三分，五人组织起来，一天就能共开荒二亩。劳动互助既然有这样的好处，为什么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有的地方还没有搞起来呢？这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说的“当地群众没有变工的习惯，春耕时期用不到变工，锄草时才需要去组织，”等等。真正的理由，还是领导是否具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延安柳林区念庄阳背庄的例子一下。背庄的劳动力和畜力都胜过阳庄，前者有二十一个劳动力，后者有十二个劳动力，六犏耕牛，可是阳庄的党员能够起核心作用，的向群众讲解变工队的好处，于是变工队组织起来了，我们的同志模范的作用，使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没有一个人耽误过工，上午耕地，下午还用人力刨梢、开荒，这样紧张劳动的结果，除了耕种原来地以外，新开荒一百垧的任务，已经有了把握完成。在背庄，情形完全因为没有具体领导，变工队组织不起来，有的有了人力，没有耕牛，有了耕牛，人力不够，力量不集中，劳动情绪不高：天天高叫“完成任务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而开

一百垧荒的任务”已经是没有方想了的了。这个事实，证明具体领导，是党在领导春耕中的一个成败关键。领导如果不具体，劳动互助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即使组织起来，也是表面，甚至发生相反的作用，如在新正马栏一乡，曾发生集体劳动的形式低于个体劳动的事情。

为什么在春耕运动中还存在着领导不够深入具体及主观主义的现象呢？这是由于有些同志还没有深刻了解西北局指示关于具体领导的真义。这个真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领导与群众密切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研究和综合群众生产实践的经验，并根据当前的情况订出来的；如合作社，劳动互助等等，都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老百姓中间已经有了这些东西的萌芽，我们把他“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整理，规定目前任务，指出发展前途。因此，我们的生产计划，必须是从群众中间来的，必须从总结群众生产实践的经验中产生出来。而领导者的责任是在于不断的抓着普遍运动中的典型例子，研究和总结它的经验，并及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普遍的运动中去。

生产计划制定之后，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组织群众去实现这一计划。例如一县的生产计划制定以后，想着就必须有一个系列的大大小的计划，不仅区县要有计划，而且还要帮助乡村制定它的生产计划，帮助他们自愿的组织变工队，发动户与户间，村与村间，变工队与变工队之间的竞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和群众亲密的结合起来，发挥它的力量。可是，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是极其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它需要脚踏实地，周密细腻的作风；我们再不要保留有了生产计划，便可高枕无忧的观点，而要想出种种办法，使我们的计划能够成为农户生产计划的坚实基础；我们再不要把竞赛运动的重点，放在上层领导机关身上，而是要把它放在直接参加生产的个人农户、村庄和连队身上；我们帮助农户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再不要把我们凭空想像的计划，硬套在农民的头上，而是要细心的启发他们，从他们已有的生产

基础上提高一步；我们再不要对竞赛运动采取草率随便的态度，而要实事求是，认真考虑竞赛的目标和条件，是否适合于双方的实际情况；我们再不要像延安县柳林区念庄的背庄那样空喊口号，无益于实际，而要像阳庄那样具体领导，组织变工队，保证完成任务。

总之，在订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估计到群众生产的经验和可能条件；在实行生产计划的时候，各地同志必须深入群众，随时检查，吸收新的经验，发扬好的例子，批评坏的例子，并在党报上发表，以供大家参考。只有检查，才能发现缺点和错误，加以克服；只有检查，才能发现成绩和经验，把它推出去。这不仅是为目前推动工作所必需，而且也是为了和交换我们领导生产的经验。这就是春耕运动中领导与群众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

现在清明已过，春耕时间只剩下一个月多了，各地同志必须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努力耕种，以保证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 会议上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

同志们，今天无所谓报告，只是对于党的宽大政策问题讲几句话。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过去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干部就害怕、恐慌、动摇、抑郁、痛苦、不安起来，感觉到非常苦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想法：有的人想：“为什么抗战七年了，从前不这样的检查，单单今年来这样一下呢？”也有些人想：“过去我做的那些事情有点污点，从今以后下定决心再不搞了，讲出来不好看，又不好听”。因此他就不讲，把过去历史上的污点埋藏掩饰起来，但是人一追，他就自己不安、苦闷、忧郁、恐慌起来了。还有些人想：“如果讲出之后，到底怎么

办?是不是要杀头?党的宽大政策到底宽大不宽大?”这个问题他们还在怀疑。又有些人想：“今天党讲宽大政策，就是让大家都讲出来，等到讲完以后，将来算总帐，又能不能算党员呢?”他们的这几种想法，都是不对的。

我想历史上有一点污点，你就把它压起来，以为人家看不出来，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办法。但是他们又顾虑在延安九洲方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不讲，将来人家三查两查，总会查究出来，自己又不好办，因此女的找老公，男的找老婆也有了困难，人家会说：“那个人过去政治上有问题”。于是爱人成了问题，工作成了问题，党籍成了问题，做人也成了问题，见了人自觉又比人家低一等，怎么办呢?因此他又用尽一切方法来掩盖自己的污点，但是内心里是发生矛盾，感觉痛苦。

同志们，以上这几种想法，和那一大串顾虑，都是对党的宽大政策的怀疑，和没有真正了解的缘故，因此我们今天来把它再解释一下。今天党确定，对这些人是要争取他们。对这些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办?只要他痛改前非，坚决为党工作，做革命的干部，向党要求解决他的党籍问题，党也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和他老公、老婆的关系，也可以维持，比如有一个女同志听说他的老公不好，她就要求离婚，我说：“你不要离，你应该教育他，争取他。”这里又有些人对宽大政策联系到理论上的怀疑，比如西北党校曾有人提出：“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四、第五两条，五条是党内问题;四条是党外问题，今天宽大政策是把两条一样处理，那么我们岂不是违反斯大林同志吗?同时在中共党章上也没有那么一条，这又不是不合中共党章的组织原则吗?毛主席在高干会对四条五条也不是这样解释的。”我说这是合乎斯大林所讲的，也合乎中共党章的，而应该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重庆比延安大吧，西安比延长大吧，兰州、宁夏、桂林这些地方也比保安大吧，他们地方大，有军队，有学校，有党部，有政府，有财政机关，占那么一个大的局面，那么，青年呢?又都是在

他们统治下，比如西安师范的王玉忱、翟文凤，他们就是特务，青年住在这些学校里，他们又以“左”的面貌出现，要你加入他们的组织，还给你钱花，给你事做，青年开始不知道是特务把戏，天长日久，慢慢的就上了当，其他经济机关、财政机关、党部、军队没有如此，因此，青年的被特务欺骗、强奸，是不足奇怪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经过土地革命；他们求学，教他们的不是马恩列斯，(笑声)而是西师的翟文凤、榆林的杨朴等特务，纯洁的青年，教课以后，要作事，就给事作，又给他钱用，这样的欺骗、愚弄，结果就上了什么 CC、复兴的当，而青年还不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觉得加入了以后，朋友多了还有好处，做事腿脚长一点，到处可以活动。这是开始的一种情形，这是一类人。如果说这些人都是特务，都要杀头，那就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中国的革命，我们要认清是小资产阶级起决定作用的，站在革命方面或站在反革命方面，是重大一个问题，而大多数青年学生，大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其他不论政权、军队、文化、如此的办法，那么他们怎样办呢？如果把这些人征（整）一下，学校各界人就觉得：我们对青年因此这对党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是有矛盾的。另外就是这些人是不是所有的都是死心踏地的给特务作事呢？那是不一定的，他们都是青年，理想很大的，他们不是老顽固，而有可变性，这种青年开始时上了当，人家给他戴一顶帽子，他就不敢了，来延后还偷偷摸摸的给人家作些事。其次另外还有一种斗争经验少的共产党员，作事不慎重，工作方式不讲究，冒冒失失，叫人家知道了，抓去了马上就是盒子枪，问你：“你是革命，还是不革命？”你如说：“我革命”。那他就不客气，请你见阎王。一个青年不一定有那样的阶级觉悟，不一定有那样的坚定性。他想来想去，还是自己要紧，活着好些，这样你就要给他写东西，就要被他强奸了。记得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上讥笑那些左派分子说：“比如你的汽车被强盗拦住了，你在出你的钱、机器、手枪、汽车，你因此才幸免了强盗的愉快的招待’，这无疑是妥协(我给你以金钱、汽车，使你给我完全无恙的逃脱虎口)，但我很难找到一个并不疯痴的人，说这个妥协是根本不允许的，或者说这个算是妥协的人

和强盗打仗(虽然强盗得了汽车之后,可用以打劫他人)”。(见《左派幼稚病》二〇页)。

那些被特务强奸的青年,正是和遇见强盗的坐汽车人一样。再看胡适等文章,有一篇文章上说:有一个学生的姐姐很漂亮,出去被土匪抢去强奸了,后来全校学生骂他:“你姐姐人格不好”。胡适说“这个罪恶,是那个土匪的,因为不从,土匪就会打死她的。”这里另一种干部,如宣侠夫在西安,特务偷偷摸摸的将他搞去了,叫他工作,而宣侠夫经过斗争,有共产党员的坚定性,他坚决的不给特务作工作,后来就把他搞掉了。我们看这个主要的责任到底谁负呢?我可以确定的说:“主要的责任应该日特、国特来负。一个纯洁的青年,他对现实的不满,接受了进步思想,参加革命,人家一下来拿个枪威吓的参加了反革命,他心里上是很痛苦的,非常难受的,因他过去有进步思想,参加工作很积极,现在人家拿着枪“在二个钟头内答应给他工作”,即使答应了,而他内心是逼迫的,不得已的。所以我们党对这些人采取宽大政策,号召所有一时受骗或者过去甘心给人家做了工作的青年,都向党控告,说明过去被国民党欺骗了,强奸了,过去是有些污点的,现在应该勇敢的向党控告国民党强奸行为。党也知道了国民党用什么方法陷害青年,知道了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还他一碗(腕),知道他是用枪逼在二个钟头内不得已自首的,一时的小错,而现在你作了工作,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受过政治的锻炼(炼),难道不能变过来?!我想是可以变过来的。

同志们,讲出了以后,这就是破坏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糟蹋青年,逼写东西,要青年给他们做特务。党可以研究如何对付他。这件事对你本人有好处,就是对党也有好处,也就是说堵死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争取青年站在我们这方面。宽大政策的目地,就是在争取青年站在党的这方面,继续为党工作,为革命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

今天我知道一个被糟蹋了的同志,可怜的很,每月特务津贴他十五块钱,由绥德寄在这里,但是他很小,给人家猫猫狗狗搞一点工作,

现在还未向党坦白说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挂了一笔帐，不敢讲。其实你讲了党可以替你还这一笔帐，你为什么战战兢兢，走起路来还假装着四六步子，内心苦闷，外表笑容，何必呢?很老实，很坦白的讲了吧，把日特、国特欺骗自己的都讲出来，把自己运去的污点讲出来，可以安然睡觉，可以安心工作，努力学习，补尝过去对革命的损失，再不要糊盘乱算。大革命时代，看得很清楚，那时候梦也梦不到有什么复兴、CC，而现在竟被复兴、CC 三搞两搞套上了。这些人，大胆的讲出来。所谓坦白，就是把问题讲出来，把自己全部历史讲出来，把朋友也讲出来。是不是党就会说，这些家伙欺骗党，将来算伙食帐呢?不是的，这有甚么可算的呢?如果延安有二三千人，都是参加 CC、复兴，都做了点事，而把这二三千人都搞掉，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延安我想更不会有这样的事。另外又想顾面子，讲出来以后，怎么做人?人家看见就“吁”一声，(笑声)那你怎么立脚呢?过去叫共产党员、干部，现在讲出来太难看。要知道，只要你痛改前非，以后坚决为党工作，我们对这些人是同情的，痛恨的是日特、国特，这有什么害怕呢?以后就是睡觉也可以睡得好，吃饭也可以吃得饱，干部仍然是干部，党籍仍然是可做党员。这个例子很多，就拿国民党来讲，那个翟文风就是陕西的叛徒，杜衡是陕西叛徒，现在在国民党中央调统室，是很重要的负责人。再看杨朴、孙绍山、马瑞生，在榆林忠实的给人家作事。难道我们共产党开始叫人家强奸了一下，一时身染污点，就不能转变吗?我不相信。事实上是有那么一种人，如果以为不讲出来，反正以后革命就对。殊不知，讲出来，是暴露了日本、国民党是怎样破坏我们的组织、怎样做反革命工作，党应采取什么政策来打击反革命政策，这就是忠实于人民大众，忠实于国家民族，忠实于自己的党。我们号召所有过去被国民党欺骗的，给他做事情的，拿盒子枪逼了的，捉住要你写了东西的，总之身有污点的，现在统统向党控告，党是你的力量，党要替你解决这个问题，替你打这个官司，把所有日本、国特的罪恶暴露出来，党总结这些案件。宽大政策不是假的，所以希望青年知道党是要你们开诚的、坦白的讲出来，不要害怕，如果不讲，我以为今天这个地方来一点材料，明天那

个地方又来一点材料，结果把你愈陷愈深，岂不是害了自己。但是在今天讲的时候也要很诚恳、坦白，不要连累好人，又不要隐藏一个有污点的人，帮助他讲，这样讲了，朋友也安心，又帮助了朋友；如果以为讲出来连累了人，害了人，还是不讲好，那就大错特错。有人讲，讲出来是可以的，就是不愿意分开的讲。这可以向负责人讲，西北党校向赵校长讲，自然科学学院向陈康白同志讲，文协向柯仲平同志讲，西北局向我讲，同时也可以到保安处去讲，干脆就把那根线、那条根割断，变成一个革命干部。所以宽大政策不是假的，是真的，我讲话负责任的。如果讲了以后，还把你捉起来，打屁股，那么你来问我，说我是说空话的人。所以希望凡是开始不论加入 CC、复兴也好，阎锡山的组织也好，托派也好，国民党也好，日伪也好；入党后，半路上叫人家捉住了，给人家做工作的也好，大家都来控告某某人拿枪逼我，某某把我捉去，向党写控告书，控告那些王八蛋。这在中国政治形式上看，对将来争取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为革命出力，是有很大的关系。反转说，就是十年八年的老干部，人家拿着枪，二个钟头就过去了，写了东西，也要讲；讲了，党还是给你工作，因为人家拿枪二个钟头内逼你，而你受了党的十年八年锻炼，难道自愿作特务吗？今天大家都来控告，洗掉自己耻辱，这样使党更加巩固，使这些青年更加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提高青年的阶级觉悟，坚定青年的阶级立场。如果不讲，还想继续猫猫狗狗的给他工作，反复无常，那时候那些人就是大大的不好。或者以为，我不讲你不道，你说知道也是诈我，或吓我，这些都是幻想！难道捉了几百人，没有材料，发了疯吗？吃了小米饭，消化不了吗？不是的，他是有真实的材料，有年有月；共产党的耳朵很长，他有电话，还有电报；驴的耳朵长，但它没有无线电。（笑声）某校有一个人，给汪精卫作工作，一下害怕跑在山上，后被大家追回。这何必呢？你讲了还是在那里学习，汪精卫是欺骗了你，你有污点，讲了污点就可洗掉，党的宽大政策的目的是，就是要争取过去上了当的污点的青年变成党的干部，化共产党内暗藏的国特、日特变成真正的干部。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所以党政军民都是国民党、复兴、CC 所统治，如果我们就专在这里搞，那革命怎么会

成功呢?!他们用孤立政策，我们就要打破这个政策。这些青年，过去被日特、国特贴上一张狗皮膏药，我看难受，现在我们要去掉它，把它撕下来，就是“化国为共”，要把他再化为好的共产党员，这也就是党的政策。我们每个青年应该看到希特勒总要垮台，抗战将要胜利。这几天在报纸上登着北非同盟军的大胜利，崩角也崩了，希特勒也是一定要崩溃。在这个大的变动中，甚至还有人搞法西斯，搞一党专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这样搞，我们就要给他暴露，将来他们就一定也要崩溃。青年都有进取心，自尊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来争取民主，争取人类的解放，我们青年应该是有这个革命胜利的信心，把贴上的狗皮膏撕掉，把扑粉擦上，闻起来也很乍。(笑)这个政策党考虑了很久，毛主席说：这是党坚定不移的政策。因此今天我给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希望有问题的人全部讲出来，控告国民党特务，仍然作党的干部。我就讲这几句话，讲明党的方针，希望大家研究一下。我的讲话完了。

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感言

(一九四三年)

最近中美中英间废除了过去的的不平等条约，而另订新约。这是我国百年来民族解放斗争史中的一个新的胜利，也是我国五年来英勇抗战的结果，值得我们以无限的热忱来欢迎与庆祝。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中国之独立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二十年来曾为此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我西北的党，还在大革命时代就开始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列强在中国之特权的斗争。过去西北人民对于不平等条约束缚最亲身感受的，就是内地外国教会的种种非法压迫。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假传教名义深入了西北的农村。民国元年前后，不仅陕北各县城建立了教堂，就连城川，甘谷驿，文安驿，永坪，瓦窑堡，

张家畔，宁条梁，临镇等镇市，也都矗立着十字尖塔的礼拜堂。这些外国教堂，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来中国传教的，而是来充任其本国侵略中国的尖兵。有些教堂会将我国土地，强霸为教产，收纳租税，并设立法庭，监狱，判理案件，组织武装，设立学校。在其范围之内，中国的主权与法令，丝毫不能行使，俨然自成一个国家。有些教会甚至窝藏土匪，进行间谍活动，干涉政府行政。至于重收地租，高利盘剥等行为，更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形，自然就要引起广大人民的愤然与反抗，而共产党为了取消这种在不平等条约下加于我国人民的非法压迫，为了我国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就起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十多年来，由于我党与广大人民的坚决奋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使它在抗战中成为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已经取消了外国人不平等条约所享受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教会非法获得的权益，在边区范围之内，可以说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老早就已经在事实上彻底废除了。

但我们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狭隘的排外主义者，在边区施政纲领上明确写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因此，我们边区历来对于任何外国人士，只要他尊重中国的主权，遵守政府的法令，是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的。而且给予中国人民一样的权利与自由。抗战前后，曾有过外国的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医生，工程师，银行家，教士，来边区游历参观或工作，他们都受到边区军民最热切最友谊的接待与照拂，都得到政府的最大保护帮助与便利。在我们边区参议会后，坐着有外国国籍的参议员，他们同样享有决定边区建设方针的权利。正因如此，边区自来就存在着一种国际友爱与敦睦善邻的气氛。在中美中英约正式废除与新约订立之后，相信边区及全国人民与英美及一切国际盟友的关系，必将更加亲密与团结，以争取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党中央的决定已经指出：“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天边区党所号召的生产与教育两大中心任务，就是达到抗日战争胜利与建成战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道路。当全边区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期间，我们追抚往昔，已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同时我们要更加为完成当前具体的生产与教育两大中心任务而奋斗。

财经工作的全面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

(一九四三年)

(一)财经办事处成立前的状况

自一九三九年由于国民党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的结果，迫使我们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机关，部队，学校都实行生产自给，解决了很大的困难，建立了初步的家务，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直至四二年高干会以前，边区财政经济依然非常困难，要求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彻底的解决。

怎样才能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困难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极不一致的，因而对当前的工作任务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不合边区实际情况的空洞的建设计划，也有量人为出的保守思想，不顾财政的“仁政主义”，军队中没有根据地思考希望打出去，也打算定家立业，坚持长期斗争，政治中存在着妨碍生产的“选举第一”思想，这影响到对生产运动的积极组织 and 领导，不理智的金融本位主义，把银行和财政经济建设完全孤立起来，相互脱节，一般同志由于认识不够，都重视商业，认为困难由商业可以解决问题，而对农业手工业方面，则信心尊言，这一错误的思考，统治了一部分同志，使实行自力更生的任务，受到阻碍。

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于是党政，军，民就发生不团结的现象，相互掣肘，力量不统一。

首先军队中存在着以军治党的军阀主义残余，对党闹独立性，不尊重政策法规，以致和政权对立。机关学校和部队，为了自力更生，抢做生意，违犯法令，到处走私，闹不团结。

银行与财政经济建设脱节，自成系统，不注意如何发展边区的经济，与各方面的关系也不好，因为上面种种原因，财政收入很少，入不敷出，形成极端困难状态。

此外，晋西北根据地与边区，在财政经济的关系上是不密切的，金融贸易税收等各方面，都没有确定的关系，好多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因此，影响两个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为了彻底克服财政的困难，必须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向下整顿关系，统一力量，使我陕甘宁与晋西北两个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统一为一个整体。因此，财政办事处就奉命成立。

(二)财经办事处的主要工作

财经办事处在高干会前就成立了，高干会的过程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搞通思想，整顿关系，克服了各种错误思想和闹独立行的现象，在财政经济方面，确定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把生产确定为第一个中心任务，办事处执行这一方针，做了下边几件主要工作。

1、建立分区财政，加强军队生产任务，逐渐实现全边区自给。军队主要搞农业，因以上单位才可经营商业，实行领导一元话，各分区设立财经分会，受地委领导。

2、成立物资局，受理对外贸易，实行特货食盐统销，集中各单位经济力量，建立家务。

统一公营商店，集中力量，保障供给和政策法规的执行，因为种种关系，仅在延安成立了南昌公司，陇东成立了联合商店，在对敌贸易上成立了永丰公司，其他各分区尚在逐渐推行。

统一运输事业，因为物资局重视不够，只部分实行，因而作用不大。

3、克服了不理智的金融本位主义，反对了农民银行的错误观点，使银行发展适应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上的临时周转，四三年经济建设投资三万万一千万元，超过四二年的四倍以上，其中机关部队生产投资比四二年增加了三十八倍，对生产自给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4、基本上实现了两个根据地财政经济的统一，晋西北实际上成为边区的一部分特货及其他物资，也同样由西北局办事处统一处理。

5、建立了相当大的家务，由于上面这些努力的结果，自前年高干会以来，我们的家务事扩大了，对今后的生产自给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除物资局的二、三为万万元资产(包括一百九十万万特货和五万万的以上的食盐)以外，单财政厅现存物资即有十七万万元以上，就军队来说，九旅家产(不动产除外)六万万元以上，警一旅、警三旅、三八五旅的财产很不完全的产量也是很大的，单只活动资金和实物，三八五旅一万五千万元以上，警一旅约一万万元，警三旅约一万八千万元，三五八旅和一旅都有流动资金五万万元左右，炮兵团十二月和一月份分红利就有两千五百万元。其他各机关单位都有相当大的家务。

但因办事处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如检查委员会根本就没有进行工作，因之，去年对整个财经部门的工作检查督促，及时了解下面情况，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很不够的，这就使得下半年中由于主观客观上许多原因，发生财政金融上的困难和混乱，直到现在还未能彻底解决。

(三)一九四三年财经工作的全面检讨与今后工作的方针过去一年的工作，主要缺点表现在两方面，就是丰衣足食中的浪费现象和金融不稳。生产运动搞起来了，生活是应该和可能改善的，但因供给标准规定过高，好多日常必需品，如肉类，办公用品，布尺等等，供不应求，物价就要上涨，且因实物供给的关系，物价涨开支就更大，互影响就使物价涨与票子跌，形成赛跑的状态，影响社会生活，使我们

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一方面，生产发展丰衣足食，一方面金融不稳，财政困难，这种矛盾现象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物资局在政策业务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与缺点，没有积极开源，大量推销特货，食盐，因而堵塞了财源，打击了边币。使得财政走上依赖银行发展的错误方向。其次，在财政方面，对于节流问题，没有及早照顾金融情况。紧缩开支，停止银行发行，致使通货膨胀，物价猛涨。

因此，今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应该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

生产第一，其次是节约。

生产节约要和财政联系，既开源又节流，财政才有办法。

生产节约要和精简联系，一方面可以增加生产，工作效能也同时提高。

因此，一九四四年的财经工作任务，应该如下述：

(一)组织起来，开展生产战线上的合作运动。

去年是边区生产运动大转变的一年。

去年的农业，原计划增产细粮八万石，实际上达到十六万石以上，即超过百分之百。去年总生产量约百八十四万石，消费量(公粮在内)约百六十二万石，可余量二十二万石。植棉，原计划十五万亩，超过二万余亩，收花一百七十万至二百万个，足够边区需要(约三百五十万个)之一半以上，去年农业生产运动之特点，主要有四个，第一是人民劳动积极性普遍高涨，这是由于：(1)公家动手生产，人民负担大为减轻，比革命前轻了六倍。(2)租佃条例颁布后，大部分地区减了租，有些地区减租彻底，群众生产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例如，葭县今年挖水窖万多个，开荒数千亩。(3)前后发放农贷三千余万元，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延安柳林区五个乡，一三八户共贷四九〇九五〇元，卖耕牛一三一头，增开荒地九三六垧，因此多打细粮三三〇石，(4)政府奖励植棉，三年不交公粮，允许用棉花代交公粮，一年工夫增加棉田五万亩。(5)优待移难民，增加劳动力九千余个，他们努力生产，

一年翻身。(6)四千五百多个二流子转人生产。第二，是劳动积极性开始组织起来，成为劳动合作。边区劳动力三三八，七六〇个，去年组织在变，札工，唐将班子，朋帮等合作形式之内的，已有八一，一二八个，占百分之二十四，关中(百分之三十六)和绥德(百分之三三)两个分区组织的最好。由于组织起来劳动力强度大大增涨，人工和畜工大大积省，因此就能多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也就有工夫改进做法，提高劳动质量。这是农业生产方面大转变的主要标志。第三，开始实行按户计划，以具体计划实现一般计划，这是指导生产的根据，发放农贷的根据，检查生产的根据。第四，部分的改进农作法，秋翻地，深耕地，磨地，多施肥，多锄草，修水漫地，修埝地，挖水窖，筑水坝，拍畔溜崖。去年，单只大块的修水利，就增产一万五千石细粮，棉花方面，则精选种，劝打卡，增产了棉花，改进农作法，绥德分区最讲究。

关于畜牧业，去年的情况不能满意。虽然增加耕牛一万多头，驴骡五千余条，羊子二十万只，但又死去牛八千头，驴骡三千条，羊子二十万只(三边春雪时冻死压死七万余只)。现在共有牛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头，驴骡十六万七千六百多条，羊二百零一万三千二百多只。牲畜死亡率如此巨大，主要由于草料不足，管理不善，防疫缺乏。定边和靖边的党政已注意改良牧畜，但并没有来得及推广。

关于发展盐业，已有满意的转变。去年产盐原计划四十万驮，由于三边分区党政军的努力，实产六十万驮。质量比较好。运盐原计划三十万到三十六万驮。至十一月底，已运三十五万多驮，估计可能达到三十八万驮。运盐能完成并且可能超出任务，是由于地方党政发动了四万九千九百头群众的牲口，吸收了外来脚户牲口三千头以上，机关部队也参加了二千头以上的牲口。督运的主要特点，是长期运输合作的大量发展。运输合作的牲口，到去年九月底，不过三千七百零六头，至年底可达五千头。长期运输合作的形式很多，从性质上分别，主要为公私合作及民间合作两种。公私合作的牲口占全部运盐牲口的三分之二，已成立运盐主力，目前各县正利用公盐代金发展运输合作，

这种形式会在全边区推广起来，将成为运输合作的强大骨干。这种形式，其有效的合作政策，主要有三：(1)公股少私股多，以便吸收更多群众参加合作。(2)公私两利，私更有利(三七人股，二八分红，或四六人股，对半分红)。(3)私人管理(利用长脚经验)，公家领导(坚持政策执行)。运输合作，尤其长期运输合作，这是今年督运方面，也就是生产方面，极有意义的重大转变。督运方面的主要困难，是人秋后各运输队经受草料缺乏与物价变动影响草料价格奇涨，运盐利薄，甚至赔本，虽采取有盐业公司补贴，保证一人二头牲口获利小米升半，但不是根本办法，现已责成物资局协公粮局于秋收在运输线上囤积大量粮草，用合作形式供给各脚店，保证评价出售。

关于合作社运动，民办发助方针与南区合作社方向，即依据群众具体需要，依靠群众力量，由群众自己办理，政府给以扶助和指导的方针，已在广大地区获得实际的响应，据不完全的统计，全边区已有合作社二六。社，计延属分区一四一社，三边区四五社，绥德区四。社，陇东区二七社，关中七社。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已走上南区合作社道路的四十社，约占百分之十五强(延安五，靖边四，安塞志丹各三，郑县、延川、子长、吴旗、米脂、华池、吴堡各二，甘泉延长、固林、定边、合水、庆阳、曲子各一)，其中有社创立的，有从旧社改造的，新社典型为淳耀，田云贵合作社，四社改造的典型为吴旗二区合作社，第二类开始向南区合作社方向转变的，约百分之六十；第三类是旧社没有转变或新社沾染了坏作风的，亦占了百分之二十四强。由此可见，大多数合作社仍处在进步与落后之间，但方向已开始转变，加以努力，很快可以转到进步一类。去年合作社的一般情况，贩卖总数约六万万元(收买羊毛三万万元，供给生产及日用品约三万万元。)，生产土布约六千尺，毛口袋二千五百条，毛毡三千条，棉麻油二十五万斤左右；组织运盐牲口，三千七百零六头，组织妇纺，单延属这九县(延长未计人)市即新增纺妇七二四四人，发纺车一四三八架，绥德关中分区都有发展，现在全边区纺妇已增至一三七，六五七人，都联系在合作社周围。此外，某些合作社之代交食盐代金，帮助安置移难民等都有成绩。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南区合作社办了一个信用合作社，

定边办了一个牲畜保险合作社，是新的创造，并已获得群众拥护。我们应该很重视这两个合作社的成功，并立即研究他们。因为改良和发展牲畜业需要牲畜保险合作社，而调剂农村金融吸收游资转入生产，则需要信用合作社。

关于政府直属的自给工业，去年同样有了转变，纺织厂，被服厂，纸厂和化学工厂，都完成并超过了任务，质量比去年提高了一步。成本节约和反对浪费，有很大成绩。工厂比以前更巩固了。原因有两方面，春季召开的工厂会议，彻底检查了过去情况，改造了领导，改革了工厂管理(领导一元化，供销统一，经济核算，全面工资制等)。另一方面，各工厂开展了整风运动(检查工作，审查职工)。整风运动是保障工厂会议，决议变成实际的关键。举几个例子可以证明，整风后的生产率和整风前的比较提高百分之百，边区纺织厂提高百分之九十四，振华纸厂提高百分之九十，化学厂提高百分之四百，被服厂提高百分之三十八，其裁剪效率则提高百分之百。整风后之成本节省，振华分厂每领纸的成本(原料费在外)从八斗四升五小米减至六斗七升一，化学厂每箱肥皂的成本从一石二斗四升小米减至九斗八升，被服厂春季裁棉衣浪费布二万五千方尺，夏季裁单衣万五千套，节省布二二，九八八方尺，过去每套单衣制造成本合小米三升四合，现在每套棉衣制造成本反节省二升五合。坏分子整出后，职工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提高，生产就改变了面貌。

关于农业生产，去年实行南泥湾政策，坚持农业第一方针，共开荒二十万六千亩，总达老百姓开荒总数的三分之一，各旅超过原定计划至少百分之十，最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六，从开荒至收获，只花了二个月工夫。去年开荒与过去四年总数比较，超过百分之一二二，若与前年比较，则超过百分之一，一五九。此外，还拥有大量的农业副业运输业与手工业。成绩的获得，由于首长负责，指战员有生产热情，劳动力组织得好。个别部队已能做到今年完全自给，其他部队亦正向此方向努力。一支军队当两支用，又保卫边区又生产自给，何处能找到?值得夸耀，值得人民的拥护。

关于机关生产，也有相当发展，单就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统计，生产总值二十万万元，共种地三万五千八百九十三亩多，打粮六千十一石多，收菜蔬一千四百八十四万九千余斤，私人生产合计八千六百二十余万元，自给比例由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七十六，实现了丰衣足食。但发展很不平衡，有些机关往年基础较好，去年又组织得好，成绩就大，反之，某些机关基础弱，组织又差，成绩就小些。个别机关仍把商业放在第一位，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去年生产大转变大发展的简况，事实有力的响应了毛主席“财经问题”的指示，与高岗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政军民的大多数干部也都学会了领导生产，并有创造性。特别宝贵的，是去年的生产运动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体系，这就是集体互动的农业合作社，其形式是“变工队”“札工队”“唐将班子”等。这就是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这就是运输合作社(运盐队)，就是手工业合作社，就是牲畜保险合作社，而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体生产，也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也是一种合作社，“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个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永远陷于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农民合作社，不过还不是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毛主席)

值得称赞的，是生产运动成了全边区的群众运动，创造了数百个劳动英雄。我们有以吴满有为代表的农业劳动英雄，以刘建章为代表的合作运动英雄，以赵占奎为代表的工业劳动英雄。以李位为代表的部队劳动英雄，以黄立德为代表的机关劳动英雄，以杨朝臣为代表的退伍残疾军人劳动英雄，我们有运盐英雄刘云祥，薛志明等，打坝英雄高仲和等，植棉英雄郭秉义等，畜牧英雄贺保元等，种稻英雄马海

旺等，挖炭英雄蔡自举等，我们又有移民英雄冯云鹏陈长安等，义仓英雄张清益等，锄奸英雄闫开增等，我们还有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刘老婆等，青年劳动英雄李常有等，学生劳动英雄张传，抗属劳动英雄陈敏，工属劳动英雄刘玉峰，而二流子出身的劳动英雄，有刘生海马玉儿等。由于劳动英雄辈出，我们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已经组织起来，各种各式的生产合作运动随着他们生长和发展起来。我们出现了像吴满有吴家枣园，陈德发马家沟，石明德白塬村，刘玉厚郝家桥，张振财城壕村，贺保元贺家圈一类的模范村。那些模范村子里，生产，锄奸，民兵拥军，优抗，一切都活跃起来都做得很好。

一、耕三余一，争取两年完成。这是一个重大任务，要完成它，第一须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去军民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至少十六万石。第二要增种洋芋三十万亩，保证每亩收获八百至一千斤，抵细粮至少二十四万石。第三，提倡改良农作法，深耕，多施肥，多锄草，多修水利，除害虫，选种足苗，保证每亩增产细粮至少一升，共增产十万石。第四在减租未彻底区域，按租佃条例彻底减租，务必保证减租完毕。以提供农民生产积极性。第五要提倡军民节约粮食，多吃杂粮，杜绝浪费，部队机关人员每人节省一斗至二斗。此外，绝对禁止粮食出口，限制煮酒熬糖。

二、植棉二十万亩，尽量利用斯字棉种，认真打卡，争取每亩平均收花二十斤，共收四百万斤。

三、产好盐六十万驮，运盐外销四十万驮，迅速采取有效办法整理脚店，保证有充分草料平价供给运盐队。

四、发展畜牧业，改良管理，增产牧草，预防瘟疫，大家学习惠中权同志研究畜牧方法，保证繁殖的畜牧多数成活。注意发展民间手工业(特别是纺线业)及其他副业。

五、政府直属工业，保证织土布，一万八千尺，毛呢五千尺，毛巾十五万条，造纸七千五百令，肥皂六十万条。

六、部队生产，做到多数完全自给，少数自给大部分。

七、机关生产一般在坚持农业第一方针，其次运输业，手工业，投机商业一律停止，资金全部转入真正生产，建立真正经济基础。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平均每人种六亩粮地，四分菜地。

八、为要完成并超过任务，就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更加组织起来，展开生产战线上的合作运动，达到(1)农业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参加合作劳动，并争取一部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2)移民一万个劳动力。(3)发展运输合作牲口至一万五千头。(4)百分之五十的合作社，完全走上南区合作社的道路，每区一个合作社，每县一个南区合作社式的综合性合作社。(5)提高畜牧保险合作社。(6)发展义仓运动，(7)国营工厂试行合作办法。(8)机关学校的生产也要采取伙种和合股等合作方式。(9)鼓励抗属、工属和退伍残疾军人参加生产。(10)改造百分之九十以上二流子参加生产。

九、要发展生产竞赛，推行按户计划，普及和提高劳动英雄的作用，每一个乡创造一个真正群众领袖的劳动英雄。每个劳动英雄创造一个模范村，现在的模范村扩大为模范乡。

十、各级政府的负责干部要向劳动英雄学习，向模范工作者学习，在今年生产运动中和创造模范村乡运动中，进一步履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天职，使今年生产获得更大的成绩。

(2)坚持发展物资贸易以稳定物价，巩固金融，支持财政的方针

前面说过，发展生产，力谋边区经济独立，是保卫边区，坚持抗战的根本政策之一。边区财政独立，有两方面问题，首先是发展生产，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最根本的方面，没有这方面，其他一切问题就无从谈起，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发展物资贸易的方面。边区财政供给，主要靠发展生产做基础，同时又要靠发展物资贸易来支持，因为边区生产能达到完全自给，但还不能完全直接的自给，还需要以土产换进大量的必需品。边区的物价和金融，不是孤立的，是同外面联系着的，因此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时时受到外面的影响和破坏，要胜利打破这种影响和破坏，又靠以发展生产为基础的物资贸易。所以，

发展物资贸易在争取边区财经独立问题上，是重要的方面，仅仅次于发展生产的方面。

所以我们在坚持“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总方针下，同时要采取发展物资贸易以稳定物价，巩固金融，支持财政的局部方针。

前年，高干会以前，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也就不了解他的局部方针，他们在物资贸易方面主导绝对自由政策(财经政策上自发论的反应)，在金融方面，主张银行本位论(财经政策上保守主义的反应)。结果此路不通。由于这种错误政策又给了汉奸、特务份子以许多破坏机会。从银行系统和贸易机关里走出大批破坏份子，不是偶然的。

去年，我们按照上述的方针办事。在物资贸易方面，我们坚持了食盐和其他主要土产的统销政策，不过由于物资各种政策与工作上的错误未能大量推销土产换回足够的物资与外汇，以稳定金融物价更未能很好的管理出入口贸易。以抵制倾销，打击封锁，致使人超相当严重。金融工作方面，我们确定，银行任务为依一定比例协助经济发展，支持财政预算，吞吐银行以调剂货币，并以吞吐发行为中心，在吞吐过程中实现它在财政经济方面的任务。对于物资波动，也曾采取了某些有效对策。

去年七月以前的大半年，物价和金融的状况，是相对稳定，中间虽然有波动，随即克服，八月以后情况转坏，物价都涨，黑市猖獗。主观方面，根本原因在于，物资贸易未能支持外汇及财政的需要，于是，造成物价高涨，财政支出，增加发行的循环现象，其次在于财政方面，未能及时紧缩开支，停止发行。物价问题，财政问题，金融问题，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连环，各个孤立起来不能解决问题。但这个连环的决定关键，则在于物资贸易，在于把我们大量的物资转入流通过程，发挥巨大作用，做到这一步，物价、金融、财政的一连串问题，都迎刃而解。怎样做到这一步呢？

一、要开阔广泛的群众路线，与广大群众合作，没有群众观点，

不与广大群众合作，而单纯只靠物资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决不能完成任务，只要与广大群众合作，就不愁没办法，办法会层出不穷。但要取得群众的合作，必须使群众有利，即执行“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例如食盐统销，运盐群众只管“运”的一方面赚钱，其利不大，且难保证，如果使他们也从“销”的一方面分得一部分利润，合作一定能更大，六十万驮才可能运出。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要用“公私两利”来推广“公私合作”，如果我们善于广泛的运用这个原则去组织群众，同他们合作，那么，走私一定可以消灭、

二、要依靠地方党政的领导，依靠他们来领导和组织物资贸易系统与广大群众问的合作，群众是信仰地方党政的，只有依靠他们的领导，贸易机构同群众的合作才能广泛的建立起来。过去同地方党政脱节，向他们闹独立性的现象倾向，必须纠正。必须估计到边区地域分散，物资贸易斗争的复杂性，不依靠地方党政领导，而单凭物资贸易机构的孤军奋斗，是行不通的。

三、物资贸易机构，特别是，土产公司和盐业公司必须使自己的作用，从机构转到“商业”化与群众化，没有这一转变，与广大群众的合作，仍是不可能的，某些支分局支分公司的“九不做”必须迅速抛弃。

四、物资贸易是极其复杂的斗争。人家的方针的是要“困死边区，困死边区二百万人民，”办法是配合着政治军事和特务，文的武的，明的暗的，样样俱全，而且来的很灵活。要打退这种进攻，需要高度的主动，如何造成主动呢？第一要了解情况，掌握敌情，第二要针锋相对，随机应变，第三要各方配合，统一步骤。这三条，我们都很差。做好这三条，靠物资总局改进自己的领导，靠各分区的统一领导机关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

五、统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物资与外汇，因此必须严格管理人口物资(统一分配)与外汇(统一调剂)。障碍有两个，一是走私，二是本位主义。走私问题，主要靠地方党政与公私合作解决，本位主义主要

靠首长负责与统一管理，公营商店解决。另一方面，物资分配与外汇调剂，要有合理规定，人民服从政府，局部服从全体，同时照顾人民与局部的需要。

六、农村经济繁荣，合作事业发展，是边区现时经济的特点。老百姓有余粮有余钱，商业流通与金融周转之要求，因此增加。合作社已经满足了一部分，但不能全面的调剂，我们的物资局和银行，应该同合作社联系起来，通过同合作社的结合，一方面使边区内部的物资流通更加畅达，对外贸易更有力量，人民需要获得供给，物价获得调节；另一方面，使信用合作由此推广，民间游资转入生产，并使边币市场扩大，成为全面统制的本位币。这是物资贸易机关和边区银行在边区内部市场上的方针，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之。

边区在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能与敌顽相持，我军一切进攻屹然独立，经济上也应该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边币是边区经济力量的代表，自然能够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而巩固起来，四三年的边币不稳，是因为我们自杀政策的结果。

首先要从思想上搞通，坚持边币立场，坚持边币一元化，反对法币立场，肃清经济上投降主义，通过一切组织，解释教育，提高对边币(即对党)的认识和信心。

克服目前混乱的办法，应该动员力量，使边币回拢，于三个月内回拢，十万万元(税收二万万，公盐代金二万万，盐公司二万万，特货四万万元，还有法币和其他配合)财政开支，除照现在办法紧缩外，应发一部分实物配合回拢。

在实物回拢计划和边币相当稳定的条件下，就严禁法币流通，保存法币到政府登记，银行以适当比价吸收法币，逐步用牌价打击法币，以致根本驱逐法币。

再配合对外贸易，做到超过法币，我们才能完全处于主动地位对法币进行斗争。

(三)整理财政、节约开支、积蓄力量、储荒自卫边区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我们财政的基础，还极不稳固，因为财政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即从正常的财政收入上解决，经费之大部还依靠特货支持，这是非常危险的，今后应该努力做到依靠生产节约和税收解决财政使之走上常轨。

财政上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1、整理税收，一方面固然要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要使税收适应发展经济管理对外贸易，保护土产，刺激出口的方针，同时除公草公粮只能划一部分收边币外，一切收入，都应该收边币稳定金融。2、整理公粮公草被服制度，改善管理和保管制度，避免贪污浪费。3、严格审核制度，节省开支。

因此，关于一九四四年的预算和供给标准应注意下列四个原则：1、生产和节约归公，减少开支。2、去年的供给标准太高，今年应该降低号召建立家务。3、对新来部队和干部，党校和抗大应照顾特殊。4、克服预决算上的简单化和平均主义倾向，应实事求是，全局着眼，具体解决。5、提高党员的觉悟，加强机构，搞通思想，整顿业务。

彻底实行领导一元化，各分区财政经济部门(财政科，物资分局，银行等)统归地委领导；建立各级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政策，审核开支，改善业务，纠正倾向，以期上下一致，完成任务。

党内每一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认识经济斗争的重要，要懂得在边区目前这样环境下，经济斗争，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准备力量应付战争，实有决定意义。自前年高干会以来，我们在办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组织领导人民和机关部队发展生产事业，四三年的努力使我们做到“丰衣足食”，四四年在这方面将会有更大的成绩，如联防军去年农业生产的任务，今年一个旅就可以完成，有的还可以大大超过，这是非常可贵的。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一方面，且是比较简单的一方面，表现在农业和副业，主要的是用劳动力和自然界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真是做的史无前例。但是还有另外的一方面，比较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

一方面，形式和内容复杂好多倍。更需要用脑力和科学知识等等，表现在商业贸易金融交通运输事业上，这里我们就吃了很大的一个亏，因为这里的敌人已经不是死的山林，土地，也不是任人宰割的鸡鸭猪狗等，而是现代化的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顽固的国民党特务，投机取巧的商人。在这些敌人面前，我们就表现的相形见绌，老实可欺，自然要挨打受气，代表我们出场的就是边币。

我们应该立刻对经济斗争有深刻的认识，毛主席已经说过：“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去年工作没做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此问题注意不够，没有动员足够的干部来做这个工作，就是说没有及早学习经济斗争的一套本领，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全党同志都应该注意这一斗争，党的领导机关，从上至下，把经济斗争放在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上，相信今年的任务，一定能胜利完成。我们应该有决心抽调一批坚强的干部到经济战线来，担负这一光荣的任务。

首先就是站稳立场，反对官僚主义，实行群众路线，公私兼顾，工作方式上要灵活，社会化，做什么像什么，不要党八股老一套，发扬创造精神。

整理财经部门工作纪律，严格奖惩鼓励经济战线上的英雄，制裁那些闹独立性的，官僚主义的，贪污腐化的分子，清查做破坏工作的特务。

对外贸易管理工作

内战时，边区的对外贸易机关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下的贸易总局，当时，党政军三方面的一切供给，除粮食及苏区产品

外，概由贸易局向外采购，其他机关概不对外发生贸易关系。当时采办的东西以被服材料为主，文具纸张次之。

一九三七年实现了国内和平，边区所需的物品，一部分系直接由西安采购，当时在西安没有商业据点。采购的主要物品为棉花步尺，到一九三八年最大部分物资，由西安办事处操办，被服则由办事处供给成品。这时一般贸易较前充足。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贸易局改为光华商店，任务同前，这一任务直到一九四零年没有任何变动。惟对外贸易路线则有变动，三八年时，边区的对外贸易四通八达，三九年四零年，大部分货物，则来自磻口，这时公营商店也开始发展。

这个时期的出入口是不平衡的，因为边区处在土地革命阶段。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时期，边区的食盐，毛皮，以及甜甘草的出产，还不很多，棉花耕植及家庭纺织，都在内战过程，刚恢复不久，而抗战以后，边区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购买力提高，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来品，但当时出入口未表现严重的情况，这是由于每年还有一千万以上的法币流入边区，弥补了这个。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特点，是单纯操办性的，因此，当时的贸易机关，实际上是采办处，它的任务是保障公用物品的采办，贸易的方针与管理是谈不到的，对外贸易完全是自流的。

皖南事变以后，敌顽封锁加紧，物资输入较难，当时财政困难，不能保证党政军各方面的供给，因此，他们不得不各自想办法，度过财政难关，于是形成各自对外采购，分散经营的现象。

一九四一年的进口货值，估计约一万万元(延安市全年约值三千万元)进口货以洋纱、布尺、棉花、纸张、文具、五金、颜料为主，输出品全年约值九千三百万元(延市约有一千五百万元)以实验、皮毛、毛织品、肥皂、木材、药材为主。

一九四一年贸易局从新成立，主观上是想相当管理对外贸易的，不过当时在分散经营状态之下，边区对外贸易统一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边区对外贸易处于被动，陷于自流，这是不可避免的，三

我们必须知道，当时处在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之下，各单位不但不能完全保障被服，办公用具，就是吃饭问题也不能完全保证，分散经营确是解决了这些困难，当时统一经营的条件没有成熟，统一经营是不可能的。

公营商店应是贸易政策的支持点，他应该去执行贸易政策来影响私人商店，可是因为公营商店的生产任务关系，有时违反贸易政策去做投机生意，消费合作社亦未团结在贸易局之下，边区是农村环境，农民合作社若组织健全，在商业上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但是，那时的合作社，组织散漫，力量很弱，所以，他们本身没有力量去做对外贸易。

一九四二年提出的贸易方针，是实行计划贸易，求得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实行对外贸易相对管理，实行食盐对外统销，帮助边区出口商品的生产及代替人口商品的生产，以便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组织资本团结商人打破封锁，但当时由于同一经营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财政物资没有保障，思想还没有开通)更由于只提出了方针而缺乏实际合作，因此差不多这个计划完全流产，当时对外贸易的概率是全年输人品价值。

法币八千一百七十万元，出口土产价值六千九百万法币，可是，以延安市为例，半年的输出品，便值六千八百三十九万元，输人品便值一万万零一百二十二万元，人超达三千三百三十二万元，全边区人超无统计，仅就延安一市来估计，人超是相当大的。

根据一九四二年的贸易方针来看，是想向着贸易管理前进的，但因秦炎、李予昂、樊一平等特务份子，把贸易机会作为掩获特务工作的工具，他们不特没有正确的贸易办法，而且没有日常的贸易工作，有许多事实是表示他们破坏金融贸易的，第一，关于食盐专卖问题，专卖的口号是过左的，当时既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又没有具体而适当的办法，更没有足够的资金，弄得既不能专卖又不能统销，而只做了食盐的运载，陡增脚户的麻烦，公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第二，关

于特货统销问题，他们只是代卖照预与私人合资经营，弄的流弊百出，公家没有掌握着贸易主动权，因此，没有掌握着外汇与物资。第三，关于批审外汇问题，他们没有原则，只想主观想人情，乱批一顿，他们能采取的所谓黑市打击黑市，只是捣乱了金融，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使商人获得了很大利益。银行增加了额外的发行。

由于我们的贸易机关本身，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也未组织起一种经济力量，依此来实行对外贸易的管理，当时在思想上也是分歧的，贸易自由论还正在高唱着，因此，贸易管理还未被提高到应有的认识。

这是边区对外贸易的第三期。

一九四二年冬季高干会中，物资局成立边区乃真正走上相当管理对外贸易的正规，这是第四期，这一时期的出入口情形怎样呢？根据物资局去年上半年关于出入口的统计(这个统计是科学的，但材料不完全，因此不是全面的)去年上半年边区进出口贸易总值边币十八万万二十三百万元，进口总值边币九万万壹仟九百万元，出口总值边币九万万零叁佰万元，人超为一千六百万。

进口与出口的各类商品，所值百分比为下表：

进 口			出 口		
布匹	460272625	50%	皮毛牲畜	137917085	1.5%
棉毛	84198706	9%	茶材	4341384	1%
文具	7182496	1%	油	8845279	15%
药酒	14255361	2%	什货	21528036	2%
迷信	743 10352	8%	食盐	255406946	28%
什货	189983694	20%	X 货	475127665	53%

其他	89654111	10%	合计	903, 169.395	53%
合计	919,855.163	100%			

这个不完整的统计，也可反映出去年上半年出人口贸易的情况来，边区仍是入超，不是出超，可是上年年人超也是不大的，因此上年的金融物价才能相当稳定，下半年会正确的统计，不过就现象来看，就法币黑市猖獗情形来看，下半年的人超是相当严重的，所以，出人口的不平衡，仍是边币对外贸易的一个特点。

棉花的入口化，约占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食盐与特货的出口者，约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土布与棉花是边区的大宗，食盐与特货是边区出口的大宗，这是边区对外贸易的第二个特性。

再次，迷信品及烟酒的入口值占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以上，拿去年上半年来说，便是一万万元，这是说明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管理工作是有很大的缺点的，这是边区对外贸易的第三个特点。

因此边区的出人口贸易历年来是不平衡的，是人超的，究竟边区人民需要多少外来品呢？

首先，根据延安南区人民消费量的调查，四三年每人所消耗的输入品，价值八千二百四十元(除去运费及商业利润的后金额)全边区以一百四十万人口计，去年所消费的输入品，便值一百二十五万万元。其次，根据三边八月农家消费调查材料，去年每人平均的消费共值三万三千四百元，其中外来品约占三分之一，因此每人平均所消费的外来品，约值七千七百七十元(除去商业利润百分之三十后的金额)因此，边区所必须的外来品共值一百三十八万万元。

最后，根据清涧袁家沟的调查材料，去年每人平均对外来品的消费，不过二千四百八十元，并且除去运费及商业利润百分之一百，那么每人平均不过一千二百四十元，以此来计算全边区，则得十七万万四千万元，因为该村的布尺与棉花全都自给了，所以，输入品的价值

是不多的。

延安南区代表外来品消费最多的地区，三边代表，中等的，清涧代表最少的，有这三个地区的平均数，我们便可得出去年全边区所需的外来品共值八十万万。

此外，公家所需的外来品，去年约值八十万万(四三年底的价格)，因此，去年，边区的总消费值一百六十三万万以上，这是没有疑问的。

去年公家与老百姓的购存量，至少要当其消费量的一半，因此去年的输入品总价值额当在二百四十五万万以上，我们去年的输出品共值多少呢？

我们去年输出的，共有五十八万万特货与三十二万驮盐，每月特货平均以二万元来计算，每驮食盐以一万元计算，则特货与食盐的出口总值为一百四十六万万，食盐与特货的出口值，又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去年出口总额为一百八十五万万。

所以拿各地人民的平均消费量来估计，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是不平衡的，仍是入超的。

为了改变历年来对外贸易的不利状态，争取出入口平衡，以致出超。

因此去年我们贸易方针里大量推销土产，换进必需物资以稳定金融物价，保证财政供给，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去年我们有充分的物资条件的，在这个方针之下，去年一年中，我们在管理贸易上作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第一、坚持了两个统销事业，奠定可针对管理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不过，因为物资局的种种政策和工作的错误，特货原定计划为六十万，实际只推销五十八万，食盐经盐业公司卖出的仅二十万驮，连同过境盐四万驮，供给二十四万驮，仅占去年运盐数的四分之三○

第二、在一般对外贸易的管理上，曾建立了物资等级制度，颁行

了战时管理出人过境物资暂行办法，对于正当的出入口商人，曾予以各方面的便利，例如首先批于外汇，保证一定利润等等，不过这一工作做的也很差，特别表现在大量土布与非必需品的人口上。

第三、在对敌占区的贸易上，西北财经办事处曾于去年三四月间，指示物资局积极开展工作，以进行反敌方封锁操纵的斗争。但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要工作，尚未就绪。

总之去年物资局的工作，是没有完成任务的，根据物资局的力量来说，它对金融贸易和财政，都有决定的作用。因之，在其成立之初，西北财经办事处给他规定的任务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保证供给，是在四三年的工作中，物资局不仅没有完成上述任务，而且基本精神是与这个方针相违反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错误呢？首先因为物资局的同志，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现实，夸大物资局(国家资本)的力量，片面的强调“统一”，不顾及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及许多公营事业的力量和要求，以致和他们对立起来，物资政策问题充分表现了这样的观点，他虽然提出抽象的原则，说是要“公私兼顾”等等，但在实际政策中，却把边区的大量合作社，公营商店都放在一边，只讲“统一”“统销”“管理”“批审”“定价”等，这样物资局就会从发挥领导作用，而被抛在一边了。

这种不从边区实际情况出发的思想，就是去年物资局一切工作失败的根源，从这里就产生了物资局各种政策和工作的错误。

第一、就稳定金融说，物资局的金融政策是根本错误的，把边币错误的认为是外汇基金制，使边币不能独立，成为法币的附属品，像法币与英镑美元关系一样，因此，主张卖法币不要边币，用边币是一种策略，这是扩大法币市场打击边币与党的政策，政府法令直接对立，特别在下半年政府大量发行购买农产品物资局系统整个拒用边币，直至守信给后勤部卖石油都要法币，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仅使边币失掉引用，而且激起民众的莫大反感。为去年四月临镇一友区小贩，因盐公司拒用边币，公开反抗，一天间把黑市从七元提高九元的例子并不

是个别的简单现象。

第二、就吸收物资平抑物价说，物资局的贸易政策，和物价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在贸易政策上物资局认为出超换得法币，硬币，金子，没有好处，物资事业小册子上曾谈，贸易上所谓出超，就目前情形看来，我们不应报过分希望，同时，我觉得出超也没有多大好处，而且积存一批硬币法币也没有多大好处。

因此，对贸易是被动的消极的，就拿土布一项来说，毛主席所给的任务是，发展纺织业，有物资局规定布的尺寸与质量，并保证其销路，即由物资局收买为自己用，或转卖民间，物资局根据土布发展情况，逐渐限制外布进口，但物资局去年做的恰与此相反，以高价换回整批的土布，棉花等，自己吃了大亏，更不用说保护土布了，土布两尺半换一月特货，商人嫌利单，就布价说已一倍以上，因为八九月以后，土布不过四百元法币左右一尺，特货二千五百元法币一月。

又如不禁止非必需品入口，却实行“搭配制”百分之二十的非必需品随着必需品进来，这大大增加了人口的数量，使奢侈品充满市场。

物资局高价撕下后大批的坯布，还说是“土布倾销”，明明自己认为白洋无用，不愿吸收还说国民党实行白洋倾销，对法币的力量和作用估计错误，所以于八九月间将库存七十万法币一下抛出，这就使得下半年的金融波动愈加无力收拾。物价政策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不顾金融商业情况，死定价格，几个月不变，全边去统一的规定等，如卖特货，全边区各地都是法币二千五百元，卖布到处都是四千五百元等，这种异常不合理的办法，自己吃亏很大，特货下半年，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不合理。

食盐是边区对外贸易的台柱，约占正项出口的半数到三分之二，根据去年盐业公司提供的资料，可知去年边区运盐一百八八万驮，卖出二十万驮，存四万托换进法币五千九百余万元，从六月到十二月换进棉花三万七千一百二十斤，洋纱六千八百十四斤，布九千五百二十七尺，纸九千九百五十三刀，如以十二月份市价计算，至少值二万万

一千万元，加上五千九百多万法币(以十元边币折算)共值边币八万万元。

但是这种交换是极不等价的，这表现在一百斤盐所换到的东西，逐月减少着，请看下面事实(每百斤盐换物表)

延安例子	条铁(斤)	洋布(尺)	东昌纸(刀)	棉花
一月份	32. 8	1. 68	8. 65	5. 34
三月份	12. 3	1	5. 78	4. 14
六月份	22_1	0. 76	5. 43	4. 1
九月份	11. 5	0. 67	4. 08	2. 8
十二月份	4. 3	0. 78	1. 6	3. 8

从上表，可见每百斤盐换到的东西，是逐渐下降的。从一月到十二月换到的铁减少将近八倍，布减少了一半，纸，减少了五倍多，棉花减少了近一半。

为什么产生这样不等价的交换呢?物资局的领导同志，把责任完全推在顽固派的封锁上，这是不对的，主要是我们价格政策的错误，为了向外推销，把盐价定的低些是对的。但定的太低了我们就不能吃亏。本来边区产盐多给人家一点，也不要紧，但估算一下运费，每斤盐就需要八十元，那就未免太不合算了，因此，如整理单料店，减低运费，便利于向外边的封锁做斗争，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第三、物资局的工作缺乏群众观点，对内紧对外松，如依旧四三年代销货(上半年的)平均价格合白洋十六圆四角，机关部队平均只得八元四角，吃亏了一半上下，所以大家叫苦把不少的好货做成贱货卖给商人，商人得了大利。

由物资局沿诸焦盐大道开设驮马店、转运站、缺水处开挖贮水窖，只要有路、有店、有车、有水、运费，即可大省运量即可大堆等等，

但物资局的工作没有积极执行这一发展方针，以致下半年运盐的脚户都叫着赔本，十二月间三边减少运盐驮马每日即达六七百头，盐业公司的牌价与市价相差太远(主要是边币与法币差价)是促成走私的直接原因。

因为物资局的这种政策的结果，使物资局与合作社、公营商店(机关部队)处于对立状态，三边的物资局长绰号“铁公鸡”，关中的物资局长“苍蝇碰到他，要折一条腿”业务上就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被形容为“姜太公钓鱼，来者上钩，不来拉倒。”

陇东部队公营商店一年中两次交物资届时以求统一，不但不予方便和鼓励，接受时还违反地委的正当规定，连本钱也要算掉几百美元(以后很快纠正)这实际要直接破坏统一。

第四、不顾听取别人意见，不了解下边情况，十足的官僚主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眼看把事情搞坏了，还说让他们搞去吧，别人提意见反映下面情况，一头碰回去“你们是真马列主义，我们是伪马列主义。”

对迫切的问题不认真负责的去解决，反以百事大吉的虚夸来遮盖，如十月间西北局找他们研究金融问题，就是这样无根据的单保，年底就会搞好，结果越来越糟。

第五、自上而下的对党闹独立性，不执行政策和决定，自来一套，西北局决定加强食盐统销，物资局又执行一半，变成放任走私，特货代销，不拆成偏要拆，政策是稳当不稳当不管。

如果把毛主席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上给物资局规定的各种任务和办事处所给的具体工作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打击物资局工作的基本毛病是没有老老实实的工作，不执行组织的决定，不照顾群众利益。

以上是我们对过去贸易工作的检讨。

一九四四年的贸易方针，应该是由部份管理到全部管理对外贸易

作到出入口平衡，以至出超，为达此目的，必需完成以下任务：

第一、增加必需品的生产，首先是棉花、布匹、铁、药材等的生产，以减少必需品的输入，今年我们是完全有这种条件的，今年如果能够生产五百万斤棉花，那么，我们就足够用，也就不必要输入棉花了，此外在工业上还要注意减低成本，提高出品的质量，才能抵制外货，以至做到输出。

第二、组织土产品出口，首先是大量推销特货食盐，因此必须坚持特货专卖与食盐统销政策，改善统销事业的业务，彻底清洗官办事业的作风，业务应该商业化，并适合群众要求，这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群众路线广为推销。去年我们只强调了统销的一方面，却忽视了与群众的经济组织密切联系，对地方党政采取妨保态度，闹独立性使物资局的工作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今年必须彻底克服这种脱离群众的作风，采取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照顾党政军国和全边区老百姓的群众路线，首先要与合作社建立血肉相联，休戚与共的关系，其具体计划如下：

(一)经过合作社代销特货，便成为推销。这些合作社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A、组织健全、负责人可靠，能够执行政策。

B、绝对执行土产公司所规定的推销办法。

C、不渗伪不走私，不做金融商业的投机生意，合作社如能遵守以上条件，物资局可批准为合作社代销。

(二)经过合作社大量运销食盐，各地的盐业公司应与运输合作社合股经营食盐运销，四六人股对半分红，分红时主要付与物资，以便推销于农村或与之订立运盐合同，运输合作按时运盐，盐业公司应保证其利润。确实的把握运盐出口量，可代盐业公司运盐出口，但必须遵守食盐统销政策及盐业公司的决定。

(三)与生产合作社订立合同，使之生产外来品的代用品及可以

出口的物口，原价供给消费合作社以物资，要求他收买土产出口，这样物资局经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吸收农村土产出口，另一方面又要调剂人民的必需品，使合作社成为物资局的群众基础。

为了工作配合，合作社的领导应统一起来，成立以分区为单位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其次物资局与公营商店也应密切的结合起来，公营商店有相当长期的历史，过去在供给上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资本相当雄厚，这是国家财富的主要部份之一，但过去的公营商店，组织上，领导上，都未很好统一起来，他们都有很重的和平任务，因此，它们时常违反法令，例如(一)囤积货物：操纵物价(如安泰号当东昌纸缺乏时大批买人)；(二)搞特货生意延市十一家(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二万八千五百多元；(三)倒来倒去的做投机买卖(如鸿茂生)；(四)其他破坏法令、为搞法币白洋黑市、走私漏税、偷进违药品等。据熟悉延市商业的同志说，做过载栈的没有一家不搞法币黑市的，如果他不搞就没生意做，就要关门大吉，因为过往客商是需要法币到外面去买货的，而公开又换不到，不搞黑市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市民设好埋伏后，搞法币的已较少，但复兴栈，复兴永、继兴德三家还在继续搞黑市。

这些事实说明了公营商店必须要进一步的调整与精简，如果对公营商店，加以很好的组织领导，其对边区贸易管理，则是不可减少的一支力量，例如：去年四月间延市金融物价波动，公营商店一般的执行稳定金融物价的决定，如停赔不作金融黑市买卖，又如去年十一月时物价波动，由于南昌公司的存在(组织上领导上，统一的合股公司)在驮马大会时期，对平抑物价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组织并使用这支力量，今年应该做到以分区为单位，统一公营商店的领导小的合并，不起作用的取消。适当分工，清除内部竞争。统一执行政策法令。统一工作发调，好的奖励，坏的批评处罚直到封闭。如果能作到在边区党委领导之下，物资局与公营商店相结合，以群众合作社办下属基础，对外贸易管理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物资局公营商店结合起来，以合作社为基础的而组织的经济战线，是边区经济的主要方面这将使农业与工商业相结合，国家与人民从经济上组织为一体，对发展国民经济，加强对外经济斗争，是非常有利的，但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垄断一切，或消灭私人资本，相反的，我们许多而且欢迎私营商存在和发展，我们只反对那些投机垄断违反法令，囤积售奇的奸商，我们必须与之作坚决斗争，至于正当的营业，我们则与之合作，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因此，商人中的特务份子应该是注意的，审查也是必要的，但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否则会影响社会生活，对外来的客商拘留审查，应该停止，否则，便会便利顽固的经济封锁。最后边区整个经济，特别是商业上，有重大影响的是交通运输问题，边区交通落后，运输困难，这对加强出口贸易等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必须要追上组织一种并有兵站，车料店、商店三种作用的站口，对党政军来往人员和运输队是供给性质，只要一定的收条，按期清理账目就可以，对人民是营业性质，保证较低利润，便利人民客商，这种组织网应该是物资局联系各地公营商店与合作社的脉络，用这根线，把无数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组织形式关中的经验已经证明是非常有利并可以行得通的。

这种组织形式，应由整顿驮马店人手，改造其组织，改善其业务，整顿计划如下：（一）首先在运输集中地点，建立中心驮马店，以公营驮马店为主。无公营驮马店的地方，则以入股订合同的办法，改进私营驮马店。中心驮马店的业务，除经营草料、饭食、住宿调剂与保证沿途其他驮马店所需草料外，还要：A、准备运输脚户的回头脚。B、日用品的贩买，这不仅是设一门市部而是要具有大商店的性质，零售批发，调剂供给沿途所需要的物资。C、各种土产的收购特运。

（二）驮马店所贩卖的物资，应由物资局产价供给，私营驮马店，在加入驮马店联合会，遵守政策法规，响应平仰草料价格的条件下，享受同等待遇。

（三）以分区为单位组织驮马店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检查该分

区以内的驮马店，使之成为便利运输，稳定草料价格的工具。

第三、严格禁止非必需品及迷信品的人口，可能禁用的禁用，不能完全禁用而边区又能生产的，则以土产品代替外来品。

第四、按需要采购，有计划的分配物资，去年物资的供给，主要是由物资局采购并由物资局分配的，今年因特货食盐委托合作社公营商店代销办法，大部分进口货则由公营商店与合作社直接购人，不仅保障公家所需要的物资，同时也保障群众的所需及物价，他们要计划的购人，要保障全边区老百姓所需要的物资，这就需要公营店与合作社必须遵守我们的对外贸易管理原则。公家所需要的物资应由主管机关制造预算，有计划的购进。老百姓所需要的，则有赖于我们的调查研究，有计划的采购。其次，为着分头调剂适宜，公家购回的物资应交与分配机关，统一分配，因此，成立全边区总的分配机构与各分区的物资分配机关是必要的。

第五、争求出人口贸易平衡，不仅是求得数目字上的平衡，而且应该求得人口物资确是合乎我们的需要，因此，这些物资的管理权和外汇的支配权，都要是掌握在我们公家手里，因此，管理出入口贸易物资和管理外汇是不能分开的。

第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加紧封锁，使我们的输出和输入都发生困难。因此，我们除了采用各种有效办法，建立广泛的统战关系，在国民党区域建立民间反特货封锁与争取特货市场的斗争。食盐特货的对外统销取得了主动权，四月间顽方土布倾销经运用，上述方法使入口的土布变为了我们增加出口的推动力，因土布倾销所引起的金融物价的波动，很快就纳入常轨，形成了五六月金融物价的相对稳定，造成食盐特货，特别是特货销量的增加(见食盐特货半年销量统计表)。

附：对内来讲由于业务已有初步的改善和铁面无情的缉私克服了部份的走私现象，并开始管理了物资与外汇，从而也就获得了半年来对外贸易与贸易管理上的些许成绩。

四、关于保证供给与财政：

由于是由半年统筹过渡到全部统筹的缘故，大公家、小公家在供给问题的要求上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如有时只能照顾大公家，不能照顾到小公家，又如在能照顾的地方又为小公家所不需要，这表现有时给与实物，他则需要现款，对于这样的矛盾我们是采用下述办法解决。

其规定供给实物者尽量供给实物，其规定给现款者则尽量予以现款，在不同情况下使物资供给与财政供给适当配合。

半年来计土产公司换进物资送到延安者值 85,725,874 元(存各分区未送来者只土布一项就有四万尺未算在内)，盐公司换进物资壹仟余万元，延市成交值壹仟余万元(该物资中以布尺棉花文具纸张占大部)，分别供给了各系统的需要，另外在财政支付上半年来共付现款 66,306.947 元物资值洋 15,896.261 元，合计 82,203.208 元。此外我们曾拨一二。师购货款六千万元，三边交局支付警三旅货款壹仟伍百万元，关中分局供给警一旅三八布 500 尺粗洋布 200 尺，九旅三八布 300 尺，独一旅三八布 600 尺，关中布署合作社纺棉 940 斤，

犁铲 1000)页(以原价卖给抗属用)

其他各分区以材料未全暂缺。

虽然由于丰衣足食供给标准不断提高被服的增加，由上述物资及现金的支付看，保证供给和财政的任务是完成了，在供给的物资中，棉花洋纱，是未达到要求的。原因是敌顽封锁，运进不易。

向刘志丹同志学习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

刘志丹同志逝世七年了。我和志丹同志前后共患难十年。志丹同志忠心耿耿，艰险备尝，为党为国，十二年如一日，其革命毅力和伟

大气魄，至今回忆，犹历历在眼前。

志丹同志是陕西保安人。于民国十三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四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处处长，积极参加了反北洋军阀的战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下，奔走于鄂皖陕诸省，屡谋起义。民国十七年，与唐澍、谢子长等同志，共同组织了陕西省渭华起义，同年在保安团聚革命力量，打击了贪官劣绅。“九一八”事变起，志丹同志鉴于民族危急，和谢子长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民国二十一年初，建立红二十六军，因遭叛徒杜衡陷害，于廿二年夏，全军失败于终南山地带，旋与王世泰同志等数人化装潜回陕甘边区，重新恢复并扩大红二十六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等三路游击队，更加推动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创造了陕甘边苏区，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五省反革命军队的“围剿”。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民国廿五年，志丹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部东征，北出葭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败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的军队不下数十营团，威声大震，不幸于同年四月中旬，志丹同志在猛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志丹同志之死，实是我西北党的重大损失。

志丹同志在十余年奋斗史中，曾经屡次失败，然而他一心为党为国，从不灰心。记得当渭华起义失败于华山终南山地带时，反革命势力顿显猖獗，到处屠杀工农青年，一些未经过实际锻炼的知识分子，灰心动摇以至于投降反革命，而当时志丹同志等，不屈不挠，继续与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记得民国十九年，志丹同志在彬县遭军阀苏雨生逮捕，在反动的法庭上志丹同志坚持革命气节，抵抗反革命的审判。当他被严刑拷打，逼供“里面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时，志丹同志顽强的回答道：“只有我一个”。反革命把他加上重镣囚禁于监狱，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

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保同志，叫他自己小心。”我还记得在准备打击张廷芝时，志丹同志把全付精力贯注于争取战争的胜利，路过家门而不入。我还记得当反革命把志丹同志全家捣毁的时候，志丹同志闻讯后毫无动于衷。这种公而忘私，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品质，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志丹同志不仅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而且与广大群众有着最密切联系。他善于接近群众，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称呼：“咱们的老刘”。在革命战争时期，西北人民每遇刘志丹部队到来，纷纷开门迎接，慰问备至。志丹同志还善于同兵士打成一片。他经常找兵士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情绪，兵士们对他毫无隔膜，称他为“我们的老刘”。志丹同志的无数轶事至今十传百、百传千地流传于陕甘宁民间，就充分地表明了志丹同志与群众的联系密切，达到何种程度！

志丹同志是西北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一贯地代表着西北党的正确路线。他曾经反对叛徒杜衡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等有害的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旧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战斗中，逐渐体验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因此他号召同志们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后来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成了革命的叛徒。

志丹同志曾就学于陕西榆林中学，品学兼优，毕业时考第一、二

名，深为师生器重。后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考第五名。他的智力胜人，善文能武，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革命斗争的知识，但他从来没有自骄过。他虚心向群众学习，眼睛向下，因此他的工作作风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为人则沉默寡言，长于思考；对待干部大公无私，克己待人，豪爽，诚恳，坦白。

当志丹同志临死时，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志丹同志艰苦的精神。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褥，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荡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志丹同志逝世七年了，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志丹同志学习：学习志丹同志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学习他的艰苦和遵守党纪的模范。

志丹同志逝世七年了。我们秉承志丹同志的遗志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巩固与发展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志丹同志虽然死了，然而志丹同志生前的战友和全党同志及西北千百万人民仍继续着他的事业。

志丹同志精神不死！

向志丹同志学习！

进一步发展生产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

(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

抗战六周年，正值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六年来边区不仅屏障西北，支持前方，成为坚强的抗日堡垒，而且利用后方和

平环境，积极建设，对于建国事业，也有不少的贡献，特别今年以来，边区二百万军民同心协力，致力于发展生产，向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巨大的春耕开荒任务胜利地完成了。在热烈的群众生产竞赛中，涌现出大批新型的人物——吴满有和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妇女群众踊跃参加生产，普遍发展妇女纺织运动。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亦多被改造而卷入生产热潮。变工札工等劳动互助的组织，真正具有群众性的新型合作社的组织和农户计划的制订，广泛地推行着，克服着农村生产的散漫性和自流性，大大增进了劳动的效率和群众的福利。许多改良农业的新方法被创造和实施起来了，如三边的水漫地、鹿县的水利、关中的埝田、边区的深耕细作、延川的广建厕所积聚肥料等等。大批的移民难民安置下了，参加生产，安居乐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上升了，他们不仅衣食改善，而且财富(如耕地、住所、牲口、农具等)也大大增加了。由于边区经济的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程度和抗战情绪，增加了他们对于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和建国途径的认识。以上这些便是今天边区发展生产的宝贵收获。谁都不会否认，边区的建设条件比全国其他地区，是要困难得多。边区地广人稀，素以贫瘠著称，然而今天竟能丰衣足食，欣欣向荣。假若后方其它地区能够利用经比较优越的条件，采取我们在边区已经行之有效的发展生产的办法，那末大后方目前经济的枯竭、民生痛苦和民气消沉的难题，当可迎刃而解。因此，我们边区发展生产的方针的确是值得友党人士的参考的。

边区发展生产，究竟依靠些什么力量呢？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就是因为边区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

孙中山先生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让人民来讲话。”他又说：“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国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仆也。”他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孙中山先生这一崇高的理想，在边区已经

实现了。

在边区，已经真正实现了“以人民为主”的理想。在边区，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不是少数豪贵操纵政权、剥夺大众自由权利，而是在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下，各界人民不仅都有机会讲话，而且都有饭吃，都有事做。正因为边区的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所以它的一举一动能够完全符合于人民的意志，能够领导人民去完成他们所爱好的事业。也正因为如此，今天边区发展生产的运动，就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也就是行动中的民主。

在边区，也已经做到了官吏乃“人民之公仆”的理想。边区政府的人员，不是高高站在人民上面、擅作威福、以至于贪污成风的官僚，而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和人民血肉相联、声气相通、克己奉公、为人民所爱戴的干部。这一点在生产运动中更加证明了。自乡长、区长、县长、专员以至于边区政府的委员，他们终日忙碌，为的是发展人民的生产事业。他们深入民间，帮助农民制订农户计划，组织变工札工，解决种种困难，为的是使农民收入增加，过更好的光景。不仅政府人员如此，军队的指战员也是一样的和人民打成一片，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他们不仅自己生产，减轻人民负担，而且帮助人民生产。军队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拥护军队。在生产运动中，充分表现了政府、军队和人民融洽无间、亲密团结的精神。

在边区，不仅做到了“政汉是人民所共管”，而且也做到了“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在边区，不是少数人垄断专利、多数人负担重重，而是按照五一施政纲领，照顾各阶段利益，使生产的果实得到合理的分配。例如在土地关系上，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又实行交租交息，使农民和地主都有吃有穿，生产情绪得以提高。正因为边区实行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原则，土地经过调剂，阶级关系得到合理的调整，所以生产运动才能顺利的开展。发展生产，以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运动是和民主政治分离不开的。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更有力的支持前方，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只有使人民大众丰衣足食，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于抗战建国的热忱和信心，

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是要发展生产，达到丰衣足食，又必须真心诚意实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反之，一切违反民主、压抑民意、倾向法西斯的措施，只会窒塞群众的热忱，而任何艰巨的事业，离开了人民的伟大力量，是决不会成功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已经为几年来的事实所证明了。

边区的建设成绩，表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只有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认真地实行了，而其实行的结果，使得像边区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一跃而为丰衣足食的乐土；边区的建设成绩，指出了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使全国人民享受自由幸福的光明前途。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和一切爱国志士目睹边区的经济建设成绩，一定会珍爱边区人民艰苦缔造的宝贵经验，倍增“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并努力使边区的正确方向，成为全国的方向。可是不幸得很，一直到今天，在抗战营垒中竟然还有少数人仇恨边区，敌视边区，诬蔑边区为“封建割据”。为了回答这一毫无根据的谏言，我们不妨回溯一下过去的历史。多年以前，陕北的确曾经受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的惨无人产蹂躏。

当时陕北许多德意帝国主义的教堂横行不法，蔑视我国主权；各地驻军对人民生杀予夺，任所欲为；而土劣恶霸得为军阀作爪牙，倚劳作恶，鱼肉良民；加以土匪遍地，几无宁日；人民的人权财权毫无保障；农民没有土地，辗转呻吟于暴政、苛捐难税、地租奇重和高利贷等重重压迫之下，因而破家荡产，纷纷逃亡，土地荒废，生产衰落。这便是以前“封建割据”的一幅惨痛图画！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摧毁了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而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政权，取消了德意帝国主义教堂的特权，扫除了军阀、土劣恶霸的势力，消灭了土匪的骚扰，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建立了革命的社会秩序。正因为边区人民会经用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边区就成为抗战中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三民主义的最忠实的履行者，成为国民政府抗战设施的有力支持者，而在今天，边区二百万人民自己动手，自己管理，努力发展生产，达到丰

衣足食，以为全国倡导。这是边区今天光明幸福的景象!同一地区，在以前封建军阀割据的时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生产力一落千丈，而在人民推翻了这种封建割据，建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以后，则政治修明，人民生活改善，生产力大大增长。二者之间，判若天壤。而今天在抗战营垒内，竟还有人对于历史现实熟视无睹，硬欲以边区人民亲手扫除的“封建割据”的名词，加诸全中国最进步最光明的地区——边区的身上，这种人不是愚昧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他们倘若执迷不悟，必为全国同胞所共弃。

革命党人对于自己所监护的政纲主张是否忠实不二，不是决定于他们口里说些什么，而是决定于他们做些什么和获得些什么结果。我们共产党人早已宣布三民主义基本上与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的最低纲领相出台，因此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贯彻而奋斗。历年以来，我们忠实履行这一诺言，始终不渝。我们在边区所做的一切和获得的结果，便是铁证。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而且以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去，以求三民主义在全中国的彻底贯彻，因为我们坚信这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正确途径。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不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对这些人，只得反问一句：除了今天我们所遵循的正确途径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和解放中国人民呢？如其没有，那末还不如跟我们一起，走上唯一正确的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最令人惊奇的，这些要我们舍正途而他由的人们，自名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口口声声崇奉三民主义，可是其实际行动多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以致造成许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恶果。因此，他们不得不以未来的渺茫的诺言，来慰藉人民的喁喁之望，犹之开一店铺，明明货劣价昂，却偏要揖起“价廉物美”的招牌，只要顾主们光顾一下，便以为万事大吉。我们愿诚恳劝告这些人：这样枉费心力，是于事无补的，因为今天的顾主们——中国人民，已经富有革命的经验，善于识别真伪。倒不如本“见人之美，如己之美”的古训，向共产党人和边区看齐，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互相观摩，增强团结，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

边区发展生产的显著成绩，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决不是少数份子颠倒黑白的诬蔑伎俩所能抹煞。然而我们决不能以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满，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亟待补正。

在我们同志中间，还有些人尚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观点，他们总想做军事家、政治家而不愿做经济工作。为了纠正这些同志们的错误观点，我特举陈宗尧团长的模范例子，来作为说服的资料吧！陈同志亲自动手领导生产，他常说：“一切为了洋芋小米。有了洋芋小米，战士们吃得饱，抗日便有办法。”陈同志不仅领导战士努力耕作，而且还发动本团军人家属纺毛。这样使部队生活改善，保证了整训的物质基础。像陈同志这样一个优秀的军事干部，而能掌握领导生产的艺术，这的确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要懂得搞军事、政治，而且要懂得搞经济。反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懂得一些，而对于经济，却一窍不通，对于如何把老百姓、工作人员和战士的生活搞好，却茫然无知，那末必然脱离群众，空谈误事，真有为共产党员，特别不应当忘记的：在今天边区和平环境中，发展生产，是最能得到边区人民拥护的中心工作，这是为了建设边区，也是为了支持前方，为了克服目前困难，也是为了准备争取胜利，为了今天的抗战需要，也是为了将来的建国需要。我们不仅要懂得发展生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认识清楚它的重大政治意义。

在半年来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有异常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经常地点点滴滴的积累和有系统地整理研究。经济工作的某些部门，我们对它还是一知半解，需要细心揣摩，来掌握它的发展规律。我们要更积极地领导生产，来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理论化，以充实我们的指导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把发展生产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才能把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更密切的联系起来，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并取得建国的经验。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切切实实援助前方和准备反攻。也只有这样，才算是以实际的行动纪念“七七”六周年。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结论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我们的高干会，自去年十月十九日开起，到今天(一月十四日)才完，整整开了八十八天，这是边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费时虽长(在敌后战斗环境是不能开这样长的)，但很多重要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是值得的。大会总结了边区党全部历史的经验，清算了边区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了目前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的闹独立性现象，自由主义现象，及地方工作中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伐主义倾向，纠正了各种政策上的若干纷歧错杂思想、更明确的指出边区今天的环境，基本上是后方和平建设的环境，指出今天边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都要以发展生产，发展教育为中心。我们经过这次会议，达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领导的一元化，使党更加团结，使工作更有明确方向，大家认识更一致，对工作更有信心，有办法，有前途。党外人士也感觉边区有办法，有前途，对我党的关系更好。这次会议，无疑的将成为今后边区工作巨大转变的关键。

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好的基本原因，是由于自去年二月开始的整风学习运动，给了这个会议以一般的精神准备，这是以整风精神来检查工作的会议，是边区党实际整顿三风的会议，并且是在毛主席及中央许多同志直接指导与帮助之下来进行的会议。到会干部都用整顿三风的精神，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用互相学习的精神，深入讨论，务求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相结合，务求每一问题，都从认识上彻底搞通干部的思想。高干会这种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高干会开会期间，正当同盟国尤其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转守为攻获得空前胜利的时候，目前整个形势是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有利的。我们庆祝苏联红军及同盟国在北非与太平洋上的胜利，认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是最近两三年内的事。但是这两三年内的中国，尤

其是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却一定是异常艰苦的。中国抗战虽最早，胜利恐要最迟，这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对于抗战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积极的努力。抗战的主要任务，实际是由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同时整个世界战略，又是要先打垮希特勒，英美暂时不能用最大力量来打日本，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还要熬过最困难的两三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边区的责任是格外加重了。从对于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所坚持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关系来说：陕甘宁边区是他们的总后方，负有给他们保存与培养干部的责任，休息与整训部队的责任，接收与医治伤病员的责任，积蓄与准备反攻力量的责任。从对于全国大后方的关系来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人民所注视的抗日民主模范地区，今天大后方的局面已到极困难的程度，民气消沉，民变四起，使许多人感到没有出路。大家都望着边区的民主进步设施，能够告诉全国人民以如何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胜利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搞得更好，以满足前方与后方广大军民的要求，以提高全国人民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并对抗战胜利后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的建设，创造出一个模范的雏形。

为了使我们的边区今后的工作搞得更好，为了使这次高干会的一切决议在会议后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我的结论还想再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正确掌握边区和平环境的特点与更有计划的，更有效的进行建设工作问题。今天陕甘宁边区的环境，虽然隔河有着敌人，周围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使我们经常处于备战状态。但是他们都有种种困难(一面是敌人与顽固派本身的各种困难，一面是我们有力量足以打退他们的进攻)，至今还未能大举的打进边区来。所以今天的边区，基本上仍是后方和平建设的环境。即令将来敌人或顽固派敢于冒险大举向边区进攻，应该相信我们有力量足以将他们打出去。今天不能因为要防备敌顽的万一打进来，便对建设工作没有信心，不做长期打算，不认真去计划领导。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点是认识不够的，他们在顽固派向我们发动磨擦，发动反共高潮时，常常不能

掌握政策方向，以为国共关系马上就会破裂，内战就会起来；甚至把提高警惕防备磨擦的布置，误解为等待打出去的准备，因而完全放松了在边区内有计划的进行长期的和平建设工作，这是完全错误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我们，不管顽固派今天怎样时时想进行磨擦反共，但我们团结抗战的方针是坚持不变的。在磨擦来时，我们应当采取防卫斗争，使他们知难而退；磨擦过去，仍讲团结。我们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抗战，而不是要一直斗下去，走向分裂，不利抗战。我们不仅在今天抗战中，要尽力争取整个国内的和平，与边区的和平，就在抗战胜利后，也要尽力争取中国是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应该看到今天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与我们主观力量，都有可能这样去做到，我们一切政策的方针，都要从争取这种和平可能出发，而不是从准备分裂出发。我们只有正确掌握今天边区和平环境的特点，与一切政策的方针，都要从争取这种和平可能出发，才能安心作长期打算，去进行建设工作，才能真正把建设工作做好，才能如刘少奇同志、任弼时同志所指出的，使我们的领导不会丧失时机，和能够抓住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第二，是拥护国内和平统一，与坚决保护边区民主进步设施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件事并不是矛盾的，要实现国内和平统一要动员与团结全民族力量去进行抗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只有坚决保护边区民主进步设施，才能有力量，有办法，去坚持全国的团结抗战，去争取真正的和平统一。因此我们拥护全国的统一，是实行抗战，实行民主的统一，而不是走向投降，走向独裁的统一。我们与国民党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建筑在共同实行一定的抗日的民主的纲领上面，若离开了上述政治条件去讲统一会变成无原则的投降，反于团结抗战不利。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天天攻击边区政治为特殊，为破坏统一，天天想消灭边区的民主进步设施，而过去在边区党内，也曾存在过一种无原则的强调统一，损害民主进步势力的投降主义错误，我们对于这两者都要坚决的反对，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统一。

先说反共顽固派攻击边区民主政治为特殊，为破坏全国统一，他

的论据为什么是不对的。今天边区比国民党统治区域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各界人民都能说话，都能做事的三三制政权，实行了能够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利益的五一施政纲领，而这些都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地区所应实行而没有实行的。如果国民党在全国也像我们一样去做，便不会感到我们是特殊的了。并且在抗战更加艰苦的今日，我们诚恳希望国民党只有采用我们边区的一套民主进步办法，才能在他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面前，有办法去克服。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抗战以来，我们是忠实执行自己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一切诺言，我们曾使蒋委员长获得释放，我们把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地方政府，把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在边区所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没有超过三民主义的范围。反之，只有国民党至今未实践它所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未实践蒋委员长允许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诺言。所以今天真正忠实拥护全国和平统一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空叫统一的顽固派。真理在我们方面，民意在我们方面，信义在我们方面，顽固派若再继续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政治，将愈增加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反对，更谈不到能消灭我们。

再说过去党内曾存在过的无原则的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错误。我们现在都知道，要与国民党保持抗日统一战线，就不但要团结，还要有必要的斗争。如果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就会把我们搞掉，不要我们和它团结，统一战线也就统不成了。过去我们党有没有吃过这种只团结不斗争的亏呢？吃过的，大革命时代就吃过，抗战以后也吃过。大革命时代是陈独秀主义，抗战以后也有陈独秀主义吗？也有的。项英同志就是陈独秀主义的一个牺牲者，我们陕甘宁边区也有一个时期受过陈独秀主义的危害。当然，我们党的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抱无限忠心，而丰富有经验，熟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何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向全党警戒了这种新陈独秀主义的危险的，他所起草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就已经说：“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

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的这个观点，从那时起一直坚持到现在，曾经反复多次地向全党说明过。抗战以后，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作过一个报告，专门讲这个问题。他说：“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为了坚持抗战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一定纲领的实行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就变成无原则的举动了，这就是投降主义的倾向。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与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他又说：“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与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表现的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与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的工作中。”毛主席不但在原则上提得这样尖锐明确，而且针对着当时边区的实际，指出了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政权工作中的议会主义倾向的具体例子，加以批评。但是当时边区的党，是怎样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呢？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后来的判徒张国焘，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跑到武汉，在国民党报纸刊物上登启事，做文章，说他对于“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深感如此还是不够”，他认为“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这样的东西，自然不能希望他在边区做好事，希望他来实现党中央的反投降主义的方针。但是当时的边区党委书记是郭洪涛同志，郭洪涛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左”得可怕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在边区的工作又是怎样呢？他并没有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而

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后，党内出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却忠实执行了。我们最好看他自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登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出版的边区党委机关报“团结”第一卷第一期，题目叫做“边区加紧抗战动员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里面怎样说呢？“边区政府不仅形式由苏维埃制度改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性质上也要变成真正议会民主制度。必须使边区成为统一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领土，边区政府必须成为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和邻近友区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交换行政经验。在边区议会开会时，邀请友区政府派代表参加，帮助指导议会的进行。”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放，蒋介石先生在庐山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又经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以来，边区老早就已经是“统一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领土”，“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了，至于怎样使之完满的见诸事实，则是国民党方面的问题，而非共产党方面的问题了。国民党不能实行自己的诺言和决议，让反共的特务机关把持和破坏自己的军权政权，我们共产党虽然很惋惜，但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边区今天的民主制度，是最进步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改变成袁世凯、曹锟式的议会制度，改变了对于边区，对于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至于请友区政府来指导，那末事实上就是请特务机关来指导(友区政府里的非特务分子是不会被派为代表的)，这对于边区，对于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郭洪涛同志的最精彩的文章，还在后面：“统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要严格区别统战区和边区工作的不同，统战区一切工作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开展边区附近的救亡运动。”“我们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在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原则下面，给同盟者以积极帮助，减少过去磨擦。第二，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面，适当的解决人民大众与上层的矛盾，适当的解决地租、捐税、土地等问题。第三，帮助政府逐渐的采用民选或其他方式改换坏的保甲长以至联保主任，使各级政府成为真正领导抗战的机关。第四，统战区八路军不干涉行政，遇事采用协商的办法求得解决。第五，统战区的工作方式，在拥护抗战政府的立场上提出一切问题；反

对包办的方式，推动同盟者内部的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善于调解同盟者内部的矛盾，使之更加团结抗日；反对自大主义，对同盟者采取尊重的态度。采取以上的办法，我们相信上层统一战线有更大的开展。”

这两段话，不加注解是懂不了的。什么叫做统战区呢，原来边区的关中、陇东等等地方，在国内和平实现时国民党还留下一些形式上的政权机关，这些地方既然早已有人民自己产生出来的民主政权，国民党的那些所谓政权机关的存在当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合法，应该彻底取消的，但是郭洪涛同志不但不要国民党取消那些毫无正事可干，专干特务工作的挂名机关，反而把连蒋介石也承认了属于边区的这些地方划为所谓统一战线区，要严格区别与边区的不同，要在那里实行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一切服从特务机关，一切经过特务机关。这不是天大的荒唐事吗？特务机关在这些所谓统战区里面闹得无法无天，包庇汉奸，勾结土匪，压迫人民，组织保甲，贪污抢掠人民的的东西，瓦解和驱逐八路军，杀共产党员，连崔田夫同志的哥哥也给勒死填在冰窖里，这样还要八路军不去干涉他们，还要去拥护他们，调解他们内部后复兴和 CC 的矛盾，不是说梦话吗？郭洪涛同志说要适当的解决人民大众与上层的矛盾，这好像还顾到群众的利益，但怎样适当法呢？“在统战地区必须和同盟者采取一致步调，统一的合法的去组织群众，一般的采用抗敌援会和壮丁队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改正用秘密方式去组织群众的狭隘方式。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在拥护政府抗战的基础上去进行，群众力量的发展，不唯不和上层为难，而且给上层以许多帮助与便利。对于群众生活的改善及民主权利的获得，要依据上层的觉悟程度，适当的提出改良的口号。”郭洪涛同志自信他的办法一定会使上层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开展，那究竟开展了没有我不知道，只知道群众生活没有改善而是改恶了，民主权利没有获得而是丧失了，群众也没有组织好，倒把党的组织(譬如镇原)也联带被特务搞垮了。郭洪涛同志当时在边区所执行的路线的内容，当然还不止这么多，但是只从这一篇文章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所传播和执行的思想和，正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思想，充分实行起来，和张国焘的要求也就差不好远了。

郭洪涛同志在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倾向，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边区所受投降主义的损害，也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后，投降主义在党内得了大的发展，成为路线，这个路线影响过许多同志，也影响了郭洪涛同志，使他有勇气写出这样可耻的文章来，则是事实。不过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这种投降主义领导下面，究竟边区和国民党的关系是不是就很美满，统一战线是不是就牢固和扩大起来了呢？恰恰相反，边区是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危机。第一，边区的领土是大大缩小了。国民党军队肆无忌惮的在边区的边境进行蚕食，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止，我们损失了宜川以北的红宜县、鹿县的榆林桥、直罗镇、张村驿一带，固原以北的固北县，定边以东以北直到盐池县境的砖井、安边、公布井、八叉梁一带，靖边西南的新城县和西北的宁条梁一带，横山西南的横山县(长城区威武区)，和葭县西北的葭卢县。这些县区的被占，都没有经过任何抵抗，有些丢了以后党的领导机关还不知道，有些简直是郭洪涛同志送出去的。譬如他不要横山县就因为国民党已经有了个横山县；附带的说，他还因为怕刺激国民党而取消了志丹县的名称和子长县的存在。第二，在剩下的边区里，又分出了上面说的所谓统战区，这包括整个关中分区，整个陇东分区，整个绥米分区，整个鹿县，子长的瓦窑堡折家坪一带，以至延安、甘泉、延长、延川各县的市区。在这些地方，或者是放弃了原有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承认了二重政权，至少也是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合法的据点。第三，是政治土匪与特务分子的猖獗。国民党顽固派既然占了许多地方，又得了许多所谓统战区，不但不因此满足，而且更加得寸进尺了。他们在边区四方八面组织了四十八股土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在在包头做商会会长的汉奸张廷芝所统率的所谓黑军，以及陇东的惯匪赵老五等，来向边区侵扰。同时又派了大批特务分子假借各种名义，钻进边区来，利用当时边区党内外的无警觉性，造谣言，画地图，偷窥军事机密，勾引落后分子，无所不为。第四，是地主的复辟。边区旧日的地主趁国民党从外部收复所谓“失地”的时候，就从内部从分得土地的农民手里收复失地。他们造谣说共产党投降了，现在又是地主的天下了，又说安塞出了块石碑，刻着“物归

原主”。因为党没有制止，许多农民竟真的怀疑共产党不代表群众的利益了，以至地主抢已去的土地竟达到分过的土地的二分之一上下，志丹有一个地主就收回了二千八百晌。第五，不但农民搞糊涂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当时的领导之下也搞糊涂了。有些农民党员，也跟着落后的农民把地交还了地主，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也向农民要地。有些党员，以受国民党委任，升官发财为荣耀。当时安定的县委书记，为了参加抗战后援会，在国民党发的履历表上填了自己在党内的历史。陇东的党，把党内文件交给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邮局寄到延安来。总之，由投降主义的瘟疫当时的边区和边区党，都陷于一种严重的混乱状态去了。同志们想，我们若不克服这种投降主义，边区还像不像个边区呢？边区还能不能抵抗顽固派的进攻而保卫到现在呢？中国人民现在还能不能有边区这块自由的干净土呢？很显然的，党必须粉碎这种危害抗战危害人民的判徒性的投降主义。因此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在郭洪涛同志离开了边区党委以后，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马上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布告，马上使这种混乱状态停止了下來。这个布告严厉斥责了破坏边区、破坏团结抗战的顽固分子，并且规定了下列四项办法：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之土地房屋及已经废除过之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与发展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众团体等组织，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之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中央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之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之证明文件，而从处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之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时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之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在这个布告以后，老百姓马上说，共产党八路军变好了。他们拥护并且保护这个布告。地主抢已去的地开始又还给农民了。特务的活动大为敛迹。土匪也不敢像以前放肆了。最重要的，是边区的党又恢复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依靠这个正确的路线，我们不但取消了所谓统战区，而且击退了顽固派从那时以来的迭次进攻的阴谋，使边区不但没有像顽固派所梦想的那样消灭了，而且是一天一天强壮起来了。

关于投降主义者如何使边区受到各种损失，我们又如何为保卫边区进行各种斗争，这两方面的事实是说不完的。但是同志们只要拿我上面所引用的郭洪涛同志的文章，和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的布告作一比较，就很可以懂得两个绝不相同的路线了。郭洪涛同志的文章，代表抗战以来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痴心妄想和奴颜婢膝，他们表面上是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描写得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幼稚无知，实质上却是不敢于站在抗战和革命的立场上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他们一般地(一部分没有死心于反共反人民的人除外)已放弃过去对我党及民主政权对立破坏，或怀疑观望的态度，转而采取积极拥护三三制，拥护五一施政纲领，想用合法斗争形式来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二届参议会以后)，但在减租减息未彻底实行，群众尚未积极起来，民主改造乡村政权的区域(如警戒区、陇东、关中某些地区)，地主阶级是绝不会自动实行民主与拥护民主的。地主阶级中有很多人过去因为国民党军队对于边区的封锁磨擦，因为我们财政经济一时期的困难，不敢放心与我们合作，但以后见到我们有力量能够打退磨擦，有办法能够克服困难，并且在国际大局日形好转的情形之下，认识我们是绝不会被人打倒的，日益增加了他们只有与我们合作，才能保持自己利益的信心。六年来我们在团结农民和地主阶级来实行抗战，实现民主，及与非党人士在三三制政权中实行民主合作上，已经获得了很丰富的

经验。今天我们在边区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是为边区全体人民所拥护的，边区是现在全国人民所羡慕的自由幸福的乐土。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目前工作中，还在一些地区存在有严重脱离农民群众的现象，需要赶快去纠正。这种脱离农民群众的现象：第一是在边区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多数还未彻底实行减租，地主用各种方法，如撤换佃户，假典假卖，抽回土地，名为收回自耕，实则暗中出租，和变定租为活租等，来抵抗政府减租法令，威胁农民不敢实行减租，政府注意保障了地主的地权，却没有切实保障农民的佃权，切实制裁地主的违法行为，以致影响群众不仅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且对民主政权冷淡，怀疑我们的政权已经变质。怀疑我们的政策不是帮助广大群众的了。今天对于这些区域的农民，只有切实保障佃权，彻底实现减租法令，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减租斗争才能提高他们发展生产与参加民主活动的积极性。第二是在这六年长期的边区和平环境，我们的工作内容与工作作风很多还是继续战争时期的老一套，缺少创造，缺少改变，许多干部只会做粗枝大叶的动员工作，没有抓紧精细组织的建设工作，不认识今天新的环境(和平环境)的特点，不研究今天群众新的需要(发展生产)。真正群众所要的我们不去做，而群众所不需要的(如许多空洞的组织，与空洞的会议)，我们偏做了很多，既不能有实利于群众，反而妨害群众的生产。这种情形，只是发展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只是使我们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因此，今天必须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掌握和平环境，正确抓紧建设工作，认真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具体帮助群众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各种困难，使边区人民生活日愈富裕起来，才能消除我们与群众间的某些隔离，才能使群众更加拥护我们。

第四，是如何实现发展生产，达到全边区丰衣足食的目的。这次高干会使大家更清楚的认识，发展生产是今天边区和平条件下，最能得到边区人民拥护的中心工作。这是为了建设边区，也是为了支持前方；为了今天需要，也是为了将来发展；为了克服目前困难，也是为了准备争取胜利，当前必须抓住的中心工作。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曾用了很大的力量，亲自动手，搜集各方面历史的和现在的材料，为大会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小册子，总结了边区五年来经济建设

的经验，研究出教训与规律，解决了五年来我们在财经工作中聚讼纷纭的许多原则问题与实际问题，给我们今后发展边区经济以自觉的明确的方向。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提供了今天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具体发展的范例。无论党内同志，党外人士，读了毛主席这个文件后，都对于边区经济建设，对于克服困难迎接胜利，感觉有信心，有办法，有前途。对于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在我们边区全党干部，都要把经济工作，看作第一位的工作。我们号召干部和党员，一定要大量转入生产和普遍参加生产，一定要扫除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极端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最好的干部，不仅要懂得搞政治，搞军事，搞文化，并且要懂得搞经济。如果共产党员什么都懂得，但恰恰不会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那末我们就会陷于灭亡，我们所谓革命，岂不成了空谈。今天对于农民党员的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能在生产中做模范。

毛主席号召全边区今年要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必须很好的去领导人民的生产，领导部队的生产，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很好的去把一切公私可以用在生产战线上去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给以充分的利用，来实现毛主席所提出的号召。在领导人民生产方面，首先要去提高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要打破那种“生产多，负担多”的想法：说明今年公粮的负担，只微十八万石，多生产是多增加人民自己的收入。要去帮助每家农民订立生产计划，帮助各种不同情况的农民，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具体困难。积极的提倡和组织劳动互助运动(例如变工队，扎工队)以调剂劳动力及提高劳动效能；开展吴满有运动，奖励劳动英雄，奖励生产竞赛，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消减乡村游民。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又必须彻底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尚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这种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只知向群众要东西，不知给群众想办法；只知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知向群众学习与总结群众经验；只知强迫命令地完成上级的指示，不知深入群众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当着执行某项任务发生困难时，常常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自动性，创造性，所拟的工作计划，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的经

验而产生的，因而常常是些空空洞洞不能实行的东西；在执行某一计划时，也不善于脚踏实地的去研究一定的例子，将其经验推广到普遍的运动中去。总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它在过去所以能存在与发展，是与我们没有抓紧和平环境的特点，没有抓紧和平建设的工作，长时期停留在战争时期的老一套动员工作方式有关系的。我们必须从今天具体深入领导群众生产中，去彻底产除那种“老一套”的脱离群众作风，改变为实事求是密切与群众联系的作风。在领导部队生产方面，应当先在思想上，使所有的指战员都懂得部队自己动手进行生产，向自给自足的目标迈进，是一个非常伟大与光荣的革命任务。我们为了援助前方抗战，达到最后胜利，为了使部队能够丰衣足食，使整训工作有物质保证；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都必须自己动手，致力生产，参加边区建设，作长期打算。因此，在这里生产任务，就是战斗任务。我们八路军的战士，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个个年富力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军队的组织又是严密的，生活是集体的，因此部队本身，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强大生产力量。若把这个力量充分的发挥起来，不仅可以实现本身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可以推动人民发展生产，可以为公共利益建立起很大的革命家务。部队发展生产的方向，应该是实行“农业第一”，实行朱总司令的南泥湾政策。过去三五九旅是执行农业生产最有成绩的，我们号召边区各旅，都向三五九旅看齐，把自己的驻地都变为南泥湾第二。领导干部也都能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在领导机关学校生产方面，重心应放在每个伙食单位以农业为主的集体生产上，辅之以部分人的工商业生产，和私人的生产，来解决我们今年丰衣足食的任务。同时只要每个人肯从事劳动，在替公家工作与替公家生产之余，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允许归自己所有，去增加个人的零用。如果今年我们能把整个发展生产的任务完成，我们在全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不仅使边区更加牢固，并且将在全国发生巨大的影响，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是有办法，有伟大前途的。

第五，是如何增强教育工作问题。这是目前边区建设的中心工作

之一。但这次高干会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详细讨论，已指定专门委员会在高干会后继续研究。我在这里，只简单提出一些意见。我们的增强教育工作，首先应该是增强干部教育，我们准备反攻力量的最中心任务，就是要教育干部，提高干部；而目前边区的条件，又是提高干部最好的时机，如果轻于放过这个时候，无论对于党，对于个人，都是非常可惜的。过去边区干部教育的缺点，主要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工作自工作，学习自学习，两者不相联系。各级宣传教育部门的干部，很多是不懂实际情况的新知识分子，领导也有缺点。同时，有些干部自身也缺乏学习的信心、决心与学习习惯，那种“有事干，无事串”，不好学习的现象，到处都可以看到。干部学校(如党校行政学院)也缺少得力的干部去参加领导，教育方针不明确，教育内容不联系实际，不注意教员与学生质量的选择，使学校成了“收容所”，学习的物质生活也很坏，影响学习情绪不高。这种现象，是不容许再继续下去的。对于今后边区干部学习的意见。西北局已经决定，今年一年仍以贯彻整风学习为主。整风以后，对于各种不同情形的干部，应采取以下不同的学习方针：地委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需要注意学理论，以研究中国党史为基础，并逐渐熟读毛主席所指定的三四十本马列主义书籍。一般中级干部，需要学习掌握政策，以研究边区施政纲领及各种具体政策为主，联系到自己的实际工作。凡文化不足的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要有计划，有恒心的先学好文化，再去学理论。普通知识分子干部，一定要先到下面实际工作中去经过一番锻炼，取得各种实际工作经验。西北局又为了有计划的培养与提高边区老干部，决心抽出一批人送中央党校学习，这对于边区，对于全国的将来，都是十分需要的。在中小学教育方面，今天已看见的缺点非常严重：比如有些中学师范的教育方针，是主张向外边办的学校看齐，课程制度极大部分是旧的一套，不是准备为边区人民服务，并公开容忍反共分子在校内进行反共活动。国民教育的缺点，是强迫动员学生，教育内容不切农村需要，使学校和家庭完全对立；教员质量低下(来自小学和私塾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与成分复杂，政府教育机关，只注重追求数量的发展，不注重质量的

健全，没有看到我们的学校，已经发生变质的危险，且成为特务破坏分子最易藏身之地。因此今后对边区的中小学教育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审查与改造，应当是主重质量，有目的办理。同时，今天青救的中心工作，应当是把干部派到完小普小去当教员，把小学办好，使特务破坏分子不能混迹，应当是到中学内去组织与引导学生向进步的方向走；过去他们不是这样做，今后应当向这方向努力。关于延安各种高级学校(延大，鲁艺等)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师生状况，都要重新检查，重新改组，缩小数量，提高质量，精简的原则，是培养为目前，为边区，为抗战实际需要的干部，而不是无目的的什么都办，浪费我们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关于如何增强部队教育工作，另有专门委员会在研究，我不再多说。

第六，是要提高警惕性，加强锄奸保卫工作的问题。边区虽然表面上是有着相对和平的环境，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全国抗日战争当中，我们是处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当中，今天敌人和国民党对边区公开的武装斗争虽然暂时没有，但隐蔽的特务破坏活动，是更加强了，敌人和国民党都有庞大的特务组织，庞大的反共计划，正在尽力打入我们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当中来，进行暗害破坏活动。康生同志在高干会的报告，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年来敌人特务破坏活动的猛烈，土匪及武装便衣的骚扰，组织暴动，组织兵变，及勾引我干部逃跑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的内奸工作，已深入到我党政军学校机关内部，我们领导薄弱的经济与文化机关，更易被这些破坏分子混入。过去由于我们一些干部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在组织上的闹独立性，在制度上的松懈散漫，在执行宽大政策中，对于那些应当镇压者的错误宽容，都给了敌人及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以极大便利。必须认识，我们的发展生产运动与整风学习，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绝不是可以和和平平地去进行，不会遭到敌人及国民党特务用各种方法来破坏的。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是最容易由内部夺取的”。我们应当看到特务活动，是今天敌人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边区的主要斗争形式。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睡觉，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锄奸保卫工作。要反对对反革命分子活动采取自由主义与麻木不仁态度；要教

育干部党员，认识特务破坏活动的严重性，并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方法，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去清查暗害分子；要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更加严密，领导更加统一与一元化，不给破坏分子可以利用的间隙；要依照客观实际，依照斗争的需要与形式，来严密规订各种制度(如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出人请假制度，会客制度，文件收发保管移交制度，以及户口的清查，人民居住迁徙的登记，各种集会结社的呈报，批准，自卫军检查路条等等)。制度既经订立后，任何人都要遵守，首先是高级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才能保障贯彻执行。各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干部的审查与防奸的领导，不可专门依赖组织部与保安处。只有这样，才能使坏分子不易躲藏，不易活动，才能使革命工作不受损失。

第七，是把高干会各种决定的传达与贯彻执行，密切和今年的整风学习相联系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有了明确的决定，但要把这些决定传达到下面去，使每个县区乡干部，每个党员，以至广大群众都深刻懂得这些决定的精神，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认识，在自己的工作中正确的实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要经过一个教育说服与具体帮助实践的过程。再则，这次会议内容如此丰富，也绝不是开几天会传达一顿所能使干部弄清楚的。因此，我们决定把高干会各种决定的传达与贯彻执行，密切地和今年的整风学习联系起来。今年整风的任务，就是根据高干会的精神，在全边区范围内，有系统的进行文件学习，工作检查，和干部审查。今年全边区干部整风学习的文件，除从中央指定的整风文件中选择一部分外，就是高干会的几个重要报告与决定。现在各县参加高干会的干部回去后，可以县为单位，分别召集十天到半月的全县干部会议(地委驻在地由地委主持召集，军队及政府干部均应参加)，传达这次高干会的一般的精神。这次传达，绝不是简单的照文件重复一遍，就算了事，应当联系当地实际工作来传达，要增加新的更生动更丰富的内容，要能联系本地工作的热烈讨论。在这次传达会上，又要实事求是的制订该县今年发展生产的计划；然后干部即分散到区乡去，深入领导春耕运动。一直到四月间群众春耕已经发动，已经自觉的照计划行动起来

时，干部便可再回到县上集中学习，精读若干重要文件，根据文件精神，去反省与检查各个人及各单位的工作。并从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中，去认真的审查干部。在学习期间，仍应当有计划的派干部下去检查发展生产的工作，及时解决生产运动中的一切具体问题。

我们准备在今年冬天，再召开一次高干会，来检查我们执行这次高干会议决定的结果。我们要求那时全边区党内党外，有一番新的气象：完全实现了全边区丰衣足食的口号；我们同老百姓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提高；我们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牢固；使边区抗战力量更加增强。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这些。

在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同志们、劳动英雄们!

今天我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欢迎大家，向大家致崇高的敬礼!

劳动英雄中有许多我们是认识的，我们过去都一块儿跑来跑去，十几年以前就在关中和大家一起跑来跑去，以后在陇东、在延安、在三边、在警备区也是一样，我们好多人一起闹革命，反对黑暗势力的统治。那时候我们不是都穿着破羊皮袄、头上络着烂手巾儿，冬天没有棉裤穿，穿着烂裤子过冬吗?不是一年四季都吃不上饱饭吗?在关中的什么石门关、谢家寨子、龙家寨子，那些地方非常苦，包谷夹洋芋，就是好吃的东西了。可是刚才听大家讲，现在光景都好了，衣服有了，粮食有了，牛羊有了，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老百姓和劳动英雄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的闹革命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赶走关中的什么杨模子、陈日春、陇东的世林，三边的张廷芝、张廷祥，不赶走这些黑暗势力，我们的光景就过不成。延

安各县如果不赶走安定的黄子、保安的曹创业，甘泉的马兆仁，安塞的薛生华，不赶走这些恶棍，事情也不好办。因此共产党老百姓和劳动英雄大家起来，把这一伙人推翻了，自己管理政权，当区长、当乡长、当自卫军队长，这是我们的光景才能过好了。我们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领导？是毛主席领导的。因此我们就要牢牢记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大鼓掌)。毛主席这次在杨家沟给我们讲的那些话，指出的那些方针，那些办法，要时时记在心里，回去照样的一条一条的去办，一定不会错！

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现在我就来讲讲，怎样组织起来，怎样完成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最近我们派了一些同志和诸位劳动英雄谈话，得到了一些材料，现在我们从这些具体的材料中，来看看我们应该怎样组织。我按着一个一个地区来讲。

先说关中。关中有个白塬村，白塬村有个石明德，是富平人，在外边给人家揽工，吃不开，前年才逃到边区，接着两年过了好光景，当了劳动英雄。在石明德的领导下，全村七十二户人家，凡是劳动的组织起来了，不但把全部壮年人都组织起来变工，而且老汉和老汉变工，婆姨和婆姨变工，娃娃和娃娃变工。做什么呢？扫院、打场、扫圈、拾肥、锄草、做饭、纺纱、织布。连牛也都组织起来，十八头牲口组成一个运输队，按照需要运粮送粪。他们集体开荒，集体夏耘，集体秋收。天黑了，大家鼓起劲儿努一把力，就顶一个人挖好几天。还有个张清云，今年创办义仓，发动大家开义仓田，打下的粮食放在仓里，谁没吃的就去借，借粮时，参加义仓的只出五合利，没参加的就要出三升，这就推动了全乡全区都搞起义仓来。他们的方法很好，这样劳动情绪劳动力都大大的提高了，白塬村就成为模范村。移民老英雄冯云，今年安置了一百七十四户移难民，把孟家湾廿里长十里宽的一座大荒山变成了良田，创造了四个行政村一十四个自然村，过去稀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变成了繁荣的农村了。他还有一套办法帮助移难民清查坏人，他会看来人的面色是不是面黄肌瘦的难民，看他手上

有没有“死肉”，看看他日常动作像不像庄稼汉，看他讲话是说边区好，还是专门挑拨离间，看他对边区的心热不热，看他生活节省不节省，用这些办法来辨别好人坏人了。关中还有个田云贵，他是合作英雄，他从一万元的资本发展到八百万，从一个镇的合作社发展到一个县的合作社，他用边区的土产去交换外面的东西，他真正懂得经济学。他懂得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群众愿意干才干，和大家商商量量，结果你人一点，我人一点，就组成了一个三百多头牲口的运输队。大大的发展了运输合作事业。青年劳动英雄李长清，今年才二十岁，在外边挨冻受饿，到边区有地方发挥他的本领了，他领导了一个唐将班子，成绩很好，影响了其他地区也都组织了唐将班子。因为这些劳动英雄的模范作用，关中的劳动互助，变工队唐将班子大大的发展了，因之今年的粮食也就增加了很多，关中从马栏到杨家店子及其他地区，土地都很好，明年再努力开荒种庄稼，粮食会增产的更多。

陇东有个英雄叫张振财，他把他村里的七犏牛、九个劳动力、九个妇女，都组织在变工队中，结果节省了一百四十个牛工，三百八十个人工。还有个老孙万福，他一垧地打三四石粮食，他怎样搞的呢？就是施肥有办法，他天天拾粪，月月拾粪，他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压在地里变成粪，把骨头烧成灰制成黑黝黝的肥料，土地肥了，粮食自然多了。

警备区有个阎开增，是个鼎鼎大名的英雄，他组织变工队积极参加生产，特别是值得表扬的是他反对破坏分子有办法。他团结了广大群众和特务作斗争，平时注意侦察放哨，不让一个坏人混进来，对本村里暗藏的坏人也有办法揭发他们。有一天从边区外来了几个破坏分子，暗里带着盒子枪到边区来破坏，他看见这事情怎么办呢？他就给区政府报告，他问：“来的这些坏人能不能捉？”区上答复他：“能捉！”他就在沿路布置上人。一切准备好，告诉沿路的人说：“假如破坏分子在村里有什么事。你们就扬一把土。大家都扬一把土，坏人在那里就立刻知道了”。阎开增回到村里，遇见了这四个坏蛋，他就跑去和他们啦话。问他们吃饭没有？有公事没有？这些坏人看他是个

好老汉，就没介意，跟阎开增到了村里。结果阎老汉一吆喝，来了很多人把这几个家伙的枪也拿走，人也捆上。还有一件事，破坏分子到边区来捣乱金融，那些人拿着法币，问他调换不调换，他说我调，就组织了些人跟他去调，结果连钱带人都搞过来，送到政府里去办。这样的英雄是好英雄，值得表扬。米脂民丰区的冯光祺也是一个防奸英雄，他同特务斗争有成绩，值得表扬。清涧任家峁有个老英雄叫白德，他把全村所有的老婆婆、年轻的妇女都组织起来纺纱织布。在他的谋虑(陕北方言，布置的意思。)下，他一个村子就成立了五个粉房，养了五十个母猪，这五十个母猪又养了好多次猪娃，连老带小就有七百多，结果他们粉条子多了，布多了，粮食多了，肉多了，你们看这是不是丰衣足食？绥德沙滩坪有个安锦成，他组织妇女纺织，最初那些人不干，说没米吃没棉花，他说我给你们想办法，没米的调剂米，没棉花的想法解……结果把他们那地方附近六十里内的妇女都组织起来纺棉花，一共赚了二百多石米。佳县的劳动英雄高志谦，为了组织全村变工，他自己首先去找人变，人家说他是老汉不跟他变，他坚持要变，就夹在两个廿七八岁的后生中间锄地，那两个后生见他是老汉，满不在乎，可是他拚命的锄，一上午就把两个后生摔在后面，实际上他早就累了，但他硬撑住锄了一天，回去两天休息不过来，虽然这样，但由于他的模范作用，全村的变工队就组织起来了，使今年的比往年增加了许多。还有米脂的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他不仅种地好，打粮也好，她还给人家揽工。揽工不是容易事，要平圪崂、填水沟、留苗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妇女是能种庄稼做事情，如果全边区妇女都向郭凤英看齐，咱边区就更能打更多的粮食。至于延安农业中的吴满有、申长林，他们都用很多好办法，他们都是全边区最著名的英雄，这过去已经讲得很多介绍得很多了。

安塞马家沟的陈德发，把十六个壮丁组织起来变工，结果挣了八十石粮食，平均每个人得到五石。那一村的妇女也组织起来实行纺织了。延长王生贵种棉花，每亩地收五十斤，如果大家都这样，全边区现有十五万亩棉田，就能收七百五十万斤棉花，不但解决了边区人民穿的问题，并且还有剩余。假若明年种到廿万亩棉花，就更不得了。

他种棉花的办法是籽种好，上粪多，作务好，下苦心经营，晌午大家都睡午觉的时候，他到棉地里去打卡，说晌午太阳红，打卡水不会流出来，棉花就容易长得好了。

我们各方面都有英雄，在三边有打盐英雄。我们的打盐英雄高仲山，是去年才从榆林来的难民，来时只有一件烂皮袄二升小米了。我们政府帮助他钱和粮食，给他分了四个要他去招盐。他计划打一千五百驮盐，结果打了二千五百驮，换粮食能换一三〇石，他还拿了三万块钱来搞合作社，减轻了边客对盐民的剥削，大大帮助了盐民日常用品困难的解决。他组织打盐变工，一个人打盐打得少打得慢，几个人一起，打的打，担的担，扒的扒，就快了。他改良技术，过去晒池的水用人挑就打不成盐，现在他在盐池旁边打井，由井里把淡水弄到盐场子里，再把盐池盐水洒出去，这样就可以晒成二寸盐，这样，天不下雨也可以打盐了。这是高仲和对于打盐的很重大的新创造。吴旗还有个二流子刘生海变成劳动英雄。他过去是一无所有，好吃懒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过党政几次劝说，他下了决心搞地种，结果种了三十垧地，发展了二头牛，七头犍骡，五十只羊，变成了小康之家，他连帮助政府改造了两个二流子。

合作英雄也是到处有，在关中要向田云贵看齐，全边区就应该向刘建章看……刘建章搞合作有办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他是全套。

尤其值得赞扬的，在我们部队里还有很多劳动英雄，最著名的如李位、张治国、胡大嘴等，他们过去也都是受苦人，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起来干了，他们一面拿上枪杆打敌人，一面拿起锄头来生产。像“团结”的生产热忱就非常高，他们甚至忘记吃饭还在地里锄地，本来规定饭后十五分钟是休息时间，但他们一分钟也不休息，这些劳动英雄去挖地，大家都想多掏一点，把镢头做得又大又宽，他们中间有很多像李位一样一天挖三亩六的劳动英雄，他们自己种谷子，种糜子，种洋芋，种黑豆。在工业方面发展了四十二种，解决了他们的许多困难。

部队劳动英雄不仅打仗勇敢，保卫着整个边区劳动人民的生产果实，而且他们也是生产运动中的出色人物；他们的开荒成绩，竞超出任何地方劳动英雄之上。部队劳动英雄一放下镢头就练习掷手榴弹，打机关枪。他们生产时，镢把子捉得最紧，是劳劝的能手，他们作战时是消灭敌人的射击手。部队劳动英雄，不仅在战斗中生产中是英雄，在军民团结上他们是模范的战士，在练兵习武上他们也是群众核心。他们丢下了婆姨娃娃来打敌人搞生产，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中国找不出第二支这样的军队，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军队。因此我们就要好好的帮助军队，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工厂里在赵占魁运动下也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难民工厂的袁国华是带过七次花的老战士，他反对浪费提倡节省，特务暗里打击他，而他始终坚持立场和特务斗争。被服工厂一天锁六七套衣服，她一天锁六十套，像这样的英雄还很多。机关里的劳动英雄过去介绍的不少了，我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英雄，他们会生产，有本领，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会管理国家。他们创造了变工的办法，创造了打盐的办法，创造了妇幼的办法，创造了安置移难民的的办法，创造合作的办法，使得我们大家有衣穿有饭吃，生产提高，丰衣足食。我们应该学习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好办法好好研究推广到全边区，用他们的好办法，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

我们的劳动英雄，今年在生产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成绩，但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天天要打扫，不扫就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模范，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因此我们就要经常看看有没有毛病。比如组织变工队，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强迫人家参加，组织合作社就要看看是不是有本位观点，随做随看。搞运盐也好，搞别的工作也好，要看看有没有不妥当的或不够的地方，有不妥当的就要去掉，不够的便要增加些新的东西，使我们能经常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自满不虚心是有害

的。事实上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看到还有大部分劳动力半劳动力，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起来，选种还不普遍，如狼尾杀、马兰包、美国洋芋还没有普遍推行，棉花每亩产量还不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还不多，农作法改良也还不普遍，水利发展还很不够，运盐合作还不够，工厂生产的管理还不完善，生产的技术还不高。我们劳动英雄不仅不能自满，我们要努力克服缺点，我们还要更加前进一步，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旗帜举得更高一点，仅仅我们这二百个英雄还不够，我们还要在边区内发现创新的人物，团结在已经成为劳动英雄的周围，譬如郭凤英同志就要团结很多妇女，参加纺织，参加农业生产，大胆创造模范村和模范乡。

同时我们边区的工作人员，做政府工作的也好，做经济工作的也好，做党的工作的也好，做群众工作的也好，都应该清楚了解这一点。不管做党的那方面工作，都要把这些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到群众中学习到丰富的知识，你们才有办法，有力量。把这些人团结好，就可以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进行生产和武装训练，和破坏分子们作斗争。生产时一条心，反对破坏分子时一条心，坏蛋就不敢进来。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村一个乡以至全边区巩固起来！（大鼓掌）如果一个劳动英雄领导一个行政村甚至一个乡，那我们就能完成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组织起来了！（大鼓掌）不仅我们劳动英雄自己，而且要使全村全乡全区的人民都成为生产防奸和打敌人的能手，这就真正的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是最坚固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种地过光景，我们在自己生产合作基础上搞起来的组织，是根深的，拔不动的！我们许多劳动英雄，应成为群众中的骨干，成为群众里最勇敢最坚决的领导份子。

你们这个会是群众中间的高干会，劳动英雄是群众选出的，你们又是劳动英雄中选出的优秀份子，是群众中的“圣人”！（鼓掌）你们来这里开会，大家商量大家研究，我们还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回去要好好的组织，变工队，唐将班子，运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打盐合作社，水利合作等。水利合作很少，譬如三边无定河上

游，也可以和群众合作，大家合伙做；个人能修就自己修也很好。打盐合作也可以变工，不变工一个人打的，比变工打的还不多。植棉也要研究，有些地方可以搞水地，你来几垧我来几垧大家投资，找个有经验的人试试看，组织这样的植棉合作。如果我们这样做，变工队，妇纺小组，运输合作，消费合作，打盐合作，水利合作，植棉合作，并把更多的妇女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还有机关工厂边队里的集体生产，大家都这样组织起来，都参加这个运动，老有老的事，小有小的事，男有男的事，女有妇的事，大家各有各的事，这样本村本乡保证它明年要大大的变样子，丰衣足食搞得更好。

劳动英雄组织大家生产参加合作，并且要学会捉坏人，学得像闫开增一样的本领，把坏人搞干净，挤得他无孔可入，学会打手榴弹安地雷，保证我们的丰衣足食!(鼓掌)因此，我们劳动英雄的标准，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学习、打仗、防奸等这些条件为标准。我们工作人员，不管当务方面，政权方面，群众工作方面，也都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要和群众一起组织生产，总结他们的经验。你们回去就实行一下，和群众一起生产，一起打敌人，一起捉汉奸特务。闫开增说得好，我们这样做，进行这种组织，群众就喜欢这种组织，就真正组织起来。因此我们的工作，应当把这里作为基地，作为开步走的地方。只有这样才不是清谈，才不是官僚主义，才能洗掉我们脸上的灰尘。无条件的为群众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我们的群众这样做，我们的劳动英雄这样做，我们的干部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一方面生产，一方面学习技术，准备战斗。我们的劳动英雄要帮助所有的群众，在群众中取得经验。尊重政府法令政策，更好的搞合作社，那么我们的事情一定办得好，我们的革命一定能胜利!(大鼓掌)

边区和大后方两种道路两种结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次参议会总结了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各参议员在大会中的发言，说明边区面貌的大大改变：“荒山变成熟地，梢林沟里建起了许多工厂、医院、学校”（高愉庭老先生），“过去有粮无油，有裤裆的人，现在收下很多粮食，买下骡子”（房文体参议员），“人们生活大见改善”（安副议长）。过去边区粮食仰赖外面输人，在已完全自种了。一九三七年边区只产粮一百三十五万石，今年产粮二百一十五万石。一九四二年边区种棉五万亩，收花七十五万斤，今年种棉三十一万亩，收花三百万斤。由于棉织业、毛织业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布及各种必需品逐渐走向完全自给。人民有吃有穿，于是文化教育亦有新的开展。总结边区近年来的建设成果，边区的生产能力提高了，负担减轻了，生活改善了，团结加强了，各阶层之间、军民之间亲密合作犹如一家，因此边区的抗战力量就大大加强了。

和边区的繁荣相对照，国民党统治区的悲惨状况：在农业方面，地区日益缩小，征负却年年增加，苛捐杂税不计其数。以陕西棉业而言，由于国民党当局强以低价收买（每百斤成本在万五万以上，据十月一日秦风日报及工商日报联合版所载奉蒋介石批准每百斤最高发价一万一千元），结果棉皮减缩了十分之八。在工商业方面，“生产萎缩，关厂停工”（生产局长若文氏语），囤积居奇，市场萧条。据房文体参议员所说，在耀县边境，每亩负担四斗九升，而我区每亩负担只二升二合，相差约二十二倍。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革命尚未成功天有眼，同志仍须努力地无皮”。某地几百家人民自动打破门牌，要前来依靠边区。榆林镇川堡百余商家大部关门，有的抛弃房屋土地移入边区。宁夏等地回民移至三边者，亦有四百余户之多。地方贯彻了减租减息，但有些过火之处，应予纠正，以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一是民主作风还发扬得不够，以后更应提倡各阶层人士共同商量，亲密合作，大家负责的精神。

二是运动月即将到来，要认真慰问抗属，切实检查优抗工作，配合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

第三，关于改进区乡干部作风。绝大多数干部，艰苦工作、为人

民服务，力求完成任务。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方式比较简单，以及不良习气的影响，以致发生有些干部强迫命令、摊派数字、甚至打人骂人现象。改正这些缺点，必须加强区乡干部教育，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平，纠正过去对区乡干部指示多，教育少的毛病。明年选举时，还要展开人民对干部的批评，发扬民主精神。

培养大批边区子弟，为边区服务，为抗战建国工作，乃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全场鼓掌)

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 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棍子的、拿剪刀的人们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现在他们也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但是就我们全中国来说，除了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十几年前，我在西安看过一场戏，叫做“三回头”，说有一个姑娘不肯嫁给一个耕地的农民。在中国的旧小说里、旧戏剧里，在旧社会的一切著作中，农民一向是被贱视的，这就是说，中国旧社会一向是看不起工农的，看不起劳动者的。然而现在在我们这里，劳动者却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

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创造，许多发明，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现在吃得好，穿得暖，去年一周只吃一次肉，今年一周能吃七次肉。现在大家都穿上新棉衣。这就是丰衣足食。这是什么人搞的？就是这些劳动英雄们手里拿着镢头、斧头、鞭子、剪刀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他们，便没有丰衣足食。离开了他们，就不能生活，他们有本领、有办法，人数又这么多。离开了他们，便没有社会，便没有国家。劳动英雄的代表们，只有你们才配被人尊敬，被人爱护，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才，人人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不仅保证了我们全边区的丰衣足食，而且由于你们和全边区人民在后方努力生产，衣服多了，粮食多了，还使我们能更好的援助前方抗战。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如今年延安的变工队，首先在一个地方组织起来，别的地方也跟着组织起来。吴满有那个村子，除了老得不能动手，小得不能做事的外，全体村民都参加了变工队，因此吴家园今年比去年增产细粮百分之八十(鼓掌)。这是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创造。又如劳动英雄赵占魁，以身作则影响全厂工人，结果今年全厂出品比去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鼓掌)。这是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创造。在农业、工业、运输业以及在纺织业中，都有许多成绩，值得我们大大奖励。这是我们全边区劳动英雄们的伟大创造。一年前毛主席总结了过群众生产的经验，指示了生产运动的方向，经过边区党政军民全体干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收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在我们边区，老百姓掌握了政权，这就是民主。我们边区的民主，是有充实的具体内容的。这些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计划的发展生产，组织变工队，工厂合理化，发展合作社，提倡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人人都有事做、有饭吃，人人丰衣足食。这就说明边区老百姓不仅得到了政治上的民主自由，

而且得到了经济上的物质果实，他们自己创造，自己享受，所以他们的劳动热忱和积极性就更加高涨起来了。譬如关中新正一区九乡一个七十九岁的老汉王世英亲自开荒三亩，新宁县三区一个六十九岁的老汉王伯强开荒八亩，庆阳三十里铺一个五十七岁的瞎子叫他孙子牵他到地里开了四亩五分荒(大鼓掌)。全边区不论男女老幼都积极参加了生产，达到丰衣足食，这就是民生主义，也就是真实的民主。他们努力生产，所以更有力量帮助前线打日本，这就是真实的民族主义。

这些都是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血汗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换得来的果实，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一切力量，拿起自己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这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之，只要协力同心，我们会有办法的，像古话所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办什么事情都要和劳动大众一齐搞才搞得好的，不是一个人包办得了的。

最后，我们要求劳动英雄回去的时候，把明年生产计划搞得更好，并且推动他人努力生产，使明年生产所增加的粮食棉花等要比今年所增加的数量还多一倍。今年吴满有一村增产细粮百分之八十，如果全边区都能如此，就可增加细粮一百五六十万石。我们要奖励劳动英雄；今年最好的劳动英雄，我们要奖他一头大犍牛，让他们牵着牛回家去，号召大家都努力生产，个个成为劳动英雄，来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大鼓掌)

在“三八”妇女节集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同志们：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讲的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

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我今天讲的话还是那一套，在我们的军队中有的同志讲，讲话还不是那一套，老讲那一套，就是说给“灌米汤”，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懂，你没有新的东西，就是老一套，我们不大愿听。满挖苦人，我也是不懂，还是讲去年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的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的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的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作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他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的肥肥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给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

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的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的没有了，作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同样是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过去有一种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她们怪得很，总是把女子和男子分开，大家想一想，男子离了女子不行，那还有人类吗?同样的女子离开了男子那也不行，那还有人类吗?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从十八岁以上到四五十岁这中间，要有一个伴侣才好过，如果没有伴侣就觉得很孤单，那些人把女子放在一边，把男子放在一边，开会也是如此，“三八”是妇女节，男同志不准来，甚至于像李卓然、杨清、贾拓夫他们都是西北局的委员都不准来，她们说今天是妇女开会，不准你们男同志来;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她们说在会上已经宣布了，不准男人参加，大家只好把马一勒就回去了。这样是不好的，应该男女合起来反对封建压迫，反对贫困，这个方针就对了。但是她们不这样做，她们把男子和女子分开，谁有本领把男女分开，我看很难。谁有办法把白茜和贾拓夫分开，我看就很难。怎样能够分开呢?那种人她们搞错了，她们的思想没有搞通，她们的工作方向搞错了，她们的工作方法停止在一般号召，一般的提问题。但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用这个办法达到达不到?她们就不懂得，真正妇女需要什么东西，真正要解决边区妇女的问题从什么地方解决?就是要妇女生产，这就搞对了。我们看一看白茜同志讲的，高宗正之妻作了劳动英雄，谭文保的老婆陈敏同志作了劳动英雄，马家沟出了劳动英雄，那劳动英雄就很多。大家都生产起来，结果问题都解决了。在我们陕北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不同，我

在十几年前到过河北，河北那里的妇女纺纱织布很高明，陕北的妇女就不懂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到过关中，关中那里的妇女纺织也不错，我到河南也是这样。怪得很，就是陕北、绥远、甘肃、宁夏这些地方，晋西北有一部分地方，就不大纺织，这里的妇女干什么呢？在绥米葭吴清的妇女，到了夏天，家里很干净，那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不同，那里没有荒地，猪狗也少，家里很干净，好多妇女就坐在炕上说笑话，纳鞋帮子，绥米的鞋很出名，除了这个以外，就不搞其他生产。要搞生产就怎样呢？说女人的两个脚片子跑来跑去，人家叫“辱家败坏门风”，就是我们这一家叫她污辱了，她败了我们的门风，他们把生产看成是最下贱的事。我们都是做高尚的事，不搞生产，都是念书的讲漂亮话的，他们穿什么？吃什么？要光着屁股讲话，就很不好看，他要不吃小米，他讲话就没有气力。只有生产，才能讲话，只有生产，才能穿衣吃饭，只有生产，才能有房子住。但是，他们认为生产是下贱的事，掘地是下贱的，挖煤的是下贱的，织布的是下贱的，妇女生产是下贱的，这是剥削阶级，我是作官的，都作官怎样行？在国民党区域，作官的拿着鞭子打着工人做十二小时的工作，叫他们作奴隶，他们就是剥削工农大众，如果那些人不搞了，他们的官也做不成了，就没有饭吃，没衣穿。你不生产，天上也不会掉下钱来。在过去很多小说上说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王母娘娘、观音菩萨就掉下东西来了，我就没有见过王母娘娘、观音菩萨掉过东西，给我掉一个羊皮袍子，拿给我看看。不会掉的，只有用自己的手，才能搞出来。就是大家动手丰衣足食，如果大家不动手，丰衣足食就丰不成了。生产好，但是我们要反对一般的号召，反对把男女对立起来，思想搞通了，就要纺花，就要组织变工，就要喂猎，但是我们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是不能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就要我们自己动手，自己动手名堂就多得很，假如我们边区有一百万妇女，有八十岁的老婆婆，有小娃娃，一共算起来，当然五、六岁的不能算在内，因为他们还不能搞什么东西，但是在这两天我看到吴堡、关中两个报纸上有七岁的小孩子一天能纺二两纱，这在报纸上我们也看见过了，你看七岁的小娃娃她就能纺这样多，还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她们都在那里纺起来了，有

些人种地，有些人纺纱。但是我们一百万人把小的和老的折合一下还有二十五万人，除过男人之外女人就有二十五万个劳动力，假使他们手里都象我们今天到会的这些同志一样，都搞起来，纺毛、做鞋，那就好了。

我们还要种棉花，种棉花一个人可以多增加五石粮食，二十五万妇女一共算起来那增加多少粮食呢？那就要增加一百万石粮食，假如全边区增加一百万石粮食，你看吃得好不好！穷困可以不可以消灭？当然可以消灭的。这样做我们就有办法，不做就很难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这二十五万人，今天我们这些人可以在这个大礼堂大家商量一下，但是农村里怎样办？有朱家沟、任家园、大边沟，那里老百姓就是人少地多你怎么搞法，那就不是一句空话，空话不能解决问题，要组织起来。怎么样组织起来呢？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要靠我们的干部，假如我们延安的干部思想搞通了，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比如任弼时的老婆，有一次任弼时同志和一个地委书记在那里谈话，他的老婆琮英同志在旁边就拿着一个车子在那里纺毛，地委书记就说你这样搞可不得了，他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婆都纺纱，我们的老婆应该怎么办？我们的老婆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我说自己动手，但是现在还没有动起手来。假如我们到会的干部都组织来，都动手，在报上我们也看到，人家来了也这样说，我们陕北有句话，就是叫“热火朝天”，现在报上登的就有许多是“热火朝天”，陕北的土话叫做“日乎朝了天了”（笑声），搞的凶的狠，就是把日头搞的朝天了。假如上边都这样搞起来，一下传下去，下边也搞起来了；假如我们上面没有动起手来，只说我们要纺毛，要纺纱，那还不是空谈？空话连篇人家都不相信。但是我们自己搞起来，人家一看他就说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的干部要自己动手，这个一动手就影响到全国去了，影响到各个区、县、乡、村。专员公署专员的老婆、地委书记的老婆，区长乡长的老婆大家都搞起来了，他们就说人家都搞来了，我们也要搞，自然就可以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就向你看齐，那就组织起来了。比如李国太的老婆她会纺线，就是说她纺线纺的非常好，纺的非常快，她这一个积极分子有很多本领，她自己会搞，她自己会纺，纺了以后织成布，结

果她的吃的问题、穿的问题都解决了。老百姓看见了就说，你们能搞起来我们也能搞起来。还有一个工厂就是难民工厂，还有许多合作社，有大光纺织厂，有一个老百姓在那个地方领了棉花，纺了线，织了布，她就赚了钱，结果其他老百姓就说我们也来，天天在那里搞，不是就组织起来了。干部做模范不是讲一些空话，就是要干部做模范，要积极分子做模范，要找典型，搞起来自然就可以扩大。比如种棉花，我们大家都种棉花，种棉花有利，今年我们也种棉花，我们机关也种棉花，我自己也种的两垧棉花，我们西北局要种棉花，我们西北局现在已经有八十辆车子纺起来了，种棉花织成布有吃有穿，我们不从外面去买布。老百姓说：我们也搞，老百姓搞起来了，所以这个组织起来不是抽象的。我拿一个黄型的例子来说：比如安塞四区二乡有一个陈家湾，叫申玉凤，这是一个女同志，她是一个乡长的老婆，有四十岁了，这个人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人，她在那个地方他自己纺纱，还教老百姓纺，她组织了一个变工队，这个变工不是女的变工，她和她的丈夫商量了一下，就搞了这个变工队。在这个变工队搞起来以后，就把她选了一个变工队长，有些男人就说，你当了变工队长，我早上睡下就不想来，我看你怎么办？女的也跟人家变工，上山，假如我们每一个女的都像女劳动英雄一样那就起了领导作用，有些男人早上睡着不肯起来，她当了队长以后，每天清早拿着棍子到男的门前去敲门，叫他们起来，说你们这些懒汉还不起来，我们女的可以和男的来比，还领导了男的。我们作妇女工作的同志，我们的女干部应该向那些有本领的妇女，向那些女劳动英雄吸取经验，利用他们经验去发展别的方面可不可以呢？我看可以的，比如马家沟他们听到石明德把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后，他们感到也应该把妇女组织起来，如不组织起来不能同人家竞赛，也不能作模范，以后就组织起来了，一个妇女被选为队长，成立了个变工组，一共有十七个妇女。她们参加变工队作些什么呢？她们种了十五垧棉花，十五垧洋芋，每一个妇女种三百个瓜，一窝瓜结两个，一年要收六百个，她们这个计划非常具体。她们还种了一些棉花，怎么种法呢？棉花长头，女的时常去打卡，打十几个妇女打来打去就把棉花搞好了，种棉花把纺纱的问题也解决了。

他们组织起来还解决些什么问题?妇女中有十七八岁的姑娘,若是她一个人在路上走,碰到二流子就会同她捣鬼,如果组织起来了二流子碰到也就不敢捣鬼了。再就是她们那个地方有狼,她们都是有娃娃的,出去种庄稼去还怕狼把她的娃娃吃了,一个人怕狼吃,组织起来狼就不敢吃了。这样一来,男女就都组织起来了。

那个村子有一个男二流子,还有一个女二流子,她们说,以后我们要讥笑他们,一次那个男二流子到女二流子的门上,那些组织起来的妇女都去笑他,结果使那两个二流子感觉到难于做人,以后,他们就不当二流子了,这样也就改造了二流子。要经过具体的工作,去组织他们,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是说组织起来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在龙儿湾有一个妇女还没有组织起来,这个人叫老安婆,是米脂人,岁数也相当大了,她说我也组织起来了。她怎么组织起来的呢?她就是看这家的姑娘和那家的商人,中间起穿针引线作用,一天可以搞一块钱、两块钱,她就是作这样的组织工作。以后有同志说我们不要她这样的组织工作。、要她纺毛,她说,纺毛我腰酸腿痛不能纺。像这样的女二流子我们要反对。

还有一个妇女叫兰花,是十八岁的姑娘,她也组织起来了,她把什么组织起来了呢?她把周围的商人,推磨的、杀猪的组织起来了,我们西北局一个杀猪的叫口口生,就被她组织起来了,团结到她那里去了,她做的是这样的组织工作。她穿着一件红袄子,头梳的光光的,穿了一双红缎鞋,有时候穿一双黄缎鞋,裤带还留下五寸长。有些男同志劝她好好生产,她听了就这样一下(表情)以后男的不劝她了。有些女的劝她,她就这样一下(表情)。像这样的二流子我们也应该反对,她自己不生产还把其他的人拖在她那里,不去参加生产,也不去参加变工,这样的人我们要坚决的反对。

还有一种人是机关工作干部的许多老婆,听到延安丰衣足食了,她就从家里跑到延安来,丰衣足食可以不生产,可是来到这里就一定要纺毛。叫她们纺毛,她说我在家里可以纺毛,或者是我在家里就不

纺，在这里还纺什么呢？在家里还有人给我代工，帮我砍柴担水，我还怎么能纺毛呢？我要纺毛的话为什么同干部结婚？像这种人非常可怜，也愚昧的很，她说，我的老汉是科长，我是科长的老婆，我不能生产，这种人真是可怜的很，对这样的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还有一种，他说我念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的马列主义书，我是搞政治的，现在要我纺毛那不行，我也不干。马列主义是什么呢？也是研究生产，研究货币，研究交换，假如离开了生产还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成了空家伙。假如我们没有这一年的全边区的生产运动，我们边区不会像今天这样。你们看，过去我们的大米是从武汉来的，现在我们的大米都是南泥湾、槐树庄来的。过去我们的布、棉花都是从外面来的，去年我们一年的生产收入二百二十万斤棉花，收了八十万斤羊毛。全边区的妇女如果把这些棉花纺成线，织成布，那么，我们全边区人民的吃穿问题不是解决了吗？组织变工队、扎工队可以增加二十多万石粮食。今年我们军队要完成十万石，机关学校要完成十万石，除过工厂，老百姓耕二余一，有的耕三余一，粮食搞多了，菜也多了，运输业也开展了，沿路上都种了苜蓿，牲口吃的也解决了，运输的问题解决了，穿吃的问题也解决了，过去我们的经济是依靠外来，现在我们是自给自足了，而且形成了出超，过去是人超，什么都是依靠外来，现在我们自己生产，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不要他外面的东西，我们有牲口、食盐、碱，皮毛、甘草经常出口。经济学上有人超出超，这就是经济学的出超。经济学的人超出超从哪里来呢？它不是抽象的一套，所以我们发展经济是要使人民有吃有穿，达到丰衣足食，那不是一件大事吗？假使我们不是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在生产中间采取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要采取公私兼顾合作形式这样的办法，变工也是合作，合作社也是合作，我们要用这些形式增加财富，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也要照顾公家的利益，这样去发展边区经济。我们边区经济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我们是用一种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不是这样讲而是实际在做。有些人说我们要搞一个什么组织，这种想法只是主观主义的，因为这不是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不是你坐在躺椅上所能设想出来，而是要从实际中去创

造，的确是符合于群众的需要，要用这种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我们有些人并不是顽固，比如我们妇联会过去也是有些形式主义，每次她们都搞，但是真正的新的生动活泼的形式他们就不会搞，所以我们要研究怎样创造新形式去代替旧形式。但是有那样一种人，他说我是要做一个政治家，我们怎么能搞生产呢？但是在这方面他混淆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我们一定要吃有穿丰衣足食才能做政治家，我们的政治家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昨天我在西北党校讲了一个例子，有六个老百姓把国民党的牌子打了以后挂上八路军的牌子，西峰镇的人去向他们要东西，他们说：“你看我挂上了八路军的牌子”。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因为那里的苛捐杂税搞得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但是在这里有共产党领导大家生产，过好光景，因此他们就来了，这还没有政治意义吗？当然有政治意义，西峰镇的人跑来找我们，他全家都搞完了，他们说那里简直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们来找我们，他恨我们八路军为什么不把他们搞进来。他们为什么要进来呢？因为我们这里光景过得好，这在全边区和全国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很大的，在抗战当中我们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粮食多了，手榴弹多了，布匹多了，肉也多了，那时候打仗才好。老百姓都是这样讲，去年吴满有不是说：“过去我没吃的，没穿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现在光景过好了，什么都有了，谁来抢我们的，我们就要和他拼命，拿起锄头剪刀和他拼。”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现在他们的经济生活过好了，他们自然要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这样保卫边区的情绪就提高了，假使人们大家都搞，那不是都发了财，都变成了资本家吗？过去不是提出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吗？新市场有这么一个要饭的人，什么也没有，假使都像他一样，那都是无产阶级，那不是很好吗？假使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干部不是蜕化了，贪污腐化了，那共产党不是就没有基础了，那不是失了阶级立场吗？不是。讲这种话的人，他不懂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革命就是为了老百姓穿衣吃饭过好光景，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们边区土地分配、减租减息，给老百姓分配土地，给老百姓耕牛贷金，青苗贷金，假使你没有土地，你叫老百姓做什么？现在我们这样一搞他当然会发财，还要养牛养羊，这样生活就改善了。过

去有人反对共产党的屁股坐在牛、羊、猪和小米身上，他说不压在这些上面，要压在什么上面呢？那就要压在新市场的叫化子身上，要像那个鸿鸾禧上的叫化头一样，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嘛！他们这些人不了解，如果我们不参加生产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所有的干部大家都要坐在猪、羊、小米身上，大家都可以住洋房子，吃面包，大家都普遍化，那时候革命成功了，那大家的经济都提高了。从前有人说西北局为什么搞一个吴满有，吴满有是个富农。他虽然是一个富农，但是他是雇农变化的，现在他的经济地位提高了，生活水平改善了，因为他经济地位提高了，政治水平也提高了，所以他前天来要求我办一个学校，曾要我为他请一个教师，我说好请一个教师。现在他就不同了，从前他说他儿子顾不上念书，现在他粮食打多了，光景过好了，就要他的儿子去上学念书，他的文化提高了，他就懂得要卫生，什么是微生虫了。过去不知把窗子打开放些空气进来，过去人家说不敢喝冷水，冷水里有许多微生虫，结果他和人家说不敢喝冷水，冷水里有好多的精虫(笑)。这他是不懂得、不了解，因为文化提高了，经济地位就起了变化。今天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推翻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因为经济提高、文化提高，男的压迫女的也就起了变化，这样男的也就不能压迫女的。假使光是空喊男的不要压迫女的，女的要起来独立，和男的站的一样高，那还是空话，你经济地位不提高，你怎能和男的站的一样高呢？过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所以我们要从思想上去解决。我们的工作作风要老老实实的，要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机关里的干部，你们要注意老百姓中间在生产中他们有些什么经验，我们要多多的去吸收他们的经验，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一看他们有些什么好的本领，我们有些什么好的本领，大家多多的提出来交换交换。比如纺毛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西北局开始纺毛的时候就搞不好，唐明同志就把大家组织起来集中的搞，但是技术总搞不好，以后她就到兵站纺的好的那个同志那里去参观去学习，在那里问一问，看一看，回来之后她也搞的很好，以后又把纬华工厂纺得好的一个同志请来教大家，结果老百姓生产情绪也提高了，他也很高兴。我们自己的技术也提高了，也教育了群众，我

们干部和群众也联系了，这就是从群众观点出发，向群众学习。过去什么叫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我们就不懂得这样一套，结果就不能从群众中间去学习，也不能提高教育群众。还有一个就是联防司令部张科长的老婆，今年过阴历年以后她就纺了十六斤毛线，为什么她能够纺这么多呢？她觉得她虽然是科长的老婆，但是她不要人家给她代耕，他说我自己是边区的；人，我有两双手我能够劳动，应该自己动手。因为她思想上认识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就纺出了十六斤毛线，就挣了一石多米。她还有娃娃，没有奶吃，她就把黄米蒸成馍馍给孩子吃，还要给孩子穿毛衣毛裤。像我们干部里头生产上模范的同志，模范生产工作的同志，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全边区有这样多的妇女，我们多积些棉花，大家都织布纺纱，我们穿衣布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在农业方面多种地，我们的粮食也可以解决了。在农业方面多种地，我们粮食也可以增加。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妇女，大家都要纺花织布，都动起手来。今年我们准备搞三百五十万斤棉花，增加一百五十万斤羊毛，我们把它纺成线再把它织成布，我们就不要在国民党区域里去买东西，不买他们的布。我们自己动手，我们的粮食、布、石炭都有了，穿衣吃饭烧炭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织出来的布都是白布，老百姓不喜欢穿白布，大人小孩都喜欢穿一点有色的布，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看也很好解决，今年我们边区就多种一些蓝，蓝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会光穿白布，就可以穿上很漂亮的衣服。再一个就是吃肉的问题，我们每一家老百姓喂一头猪，我听清涧的县长黄静波同志谈，他说清涧的老百姓每一家都喂一头猪，我问他喂不起的怎么办呢？他说喂一头猪也要不到多少钱，小的时候可以喂米糠、布菜，喂上几个月到最后三个月的时候再喂上一点黑豆，或者洋芋，猪就可以长的很大很肥，就可卖很多钱，所以家家都喂一个猪，这样我们吃肉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人他光讲一个礼拜要吃十四次猪肉才好，但是他就不懂得喂猪的本领，就不喂猪。我打一个比方说，我们边区有十二万六千人，一个人一月就打吃三斤小秤的猪肉，一年就要吃三十六斤肉，十个人就要吃三百六十斤肉，光我们机关部队一年就要吃五百万斤猪肉，还有老百姓也要几百万斤，一共算起来我们一年

就要一千万斤猪肉，一年就需要很多的猪。如果我们老百姓妇女都搞一些灰茶、米糠或其他野菜，多喂一些猪，我们吃猪肉问题也就解决了。不但有了肉吃，而且油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办公用品如纸线等，但是纸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可以解决，这样一来我们边区就可以自给自足，我们的经济就可以独立。边区的经济独立了，对于全国的妇女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才真正的是给国家办事情的，给全国的人民作事情的，所以今天我们到会的干部不要光停止在口号上面，我们要实际的去做。无论纺纱也好，变工也好，都要组织起来，不但是光上面的组织起来，而且要下面的所有的人都真正的组织起来，我们要拿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代替那种旧的组织形式，我们的组织要成为适合群众所需要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比如去年一年的生产就改变了边区的面貌，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正确了，所以对于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从他某一个关节某一个运动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什么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停止在一般的号召，停止在那个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要形成自流的现象，这样要想组织起来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环节上去解决问题，那才是真正的组织起来，我们的工作应该这样去做。

其次，我们今天应该提倡节约。我上面讲过，今天我们全边区大家都节约，老百姓也节约，各机关部队都节约，那就节约很多东西。联防司令部就节约了十五万万。我曾想我过去抽纸烟，一支纸烟一百元钱，一天连待客就要抽四盒烟，那就是四千元，那怎么得了，其实不抽也不会死人。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衣服，今年不要公家发，自己看一看有什么需要发就发，大家为了节约，为了积蓄，积蓄下东西为了再生产，把边区的资本搞大。我们大家为了节省，这样一搞，我们就积蓄了几十万，一节约就是二十多万，再一生产就是三十几万、四十几万。比如你生产了两石粮食就给你一石，你生产了三石粮食就给你一石多，这样把你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公家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我们边区的机关、部队、工作人员这样的搞，那我们就不和老百姓要了，老百姓也感觉到这个边区他们这样生产，他们这样好，他们还和我们要求什么？这样我们就和边区老百姓团结的更加亲密，老百姓和我

们的政府团结了，那么就达到了军民关系更加团结，那么我们的力量就更加稳固。因为我们的基础已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就是因为我们从经济上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这是一件大事。节约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我们从经济上深入到群众中去了！我罗罗嗦嗦就讲了这些，我的话完了。

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

同志们！

今天我上任，今天我就下任，因为我过去没来过，说起来有点官僚主义。这个学校从前刚开始时是唐洪澄同志负责着，以后是李景林同志，以后是习仲勋同志，以后又是赵伯平同志，再以后是白栋才同志。我呢，其实只去过一次，记得还是去年斗张宣的时候，他说把党的文件丢到抽水马桶里去了。大家很多人不懂抽水马桶，也没看见过，我去了把张宣斗了一下，从以后我再没去过。所以说今天我上任，同时今天我又下任，这证明我官僚主义相当浓厚，也没去学校帮助大家在一些问题上讨论讨论研究研究，我很抱歉。

西北党校今天改为中央党校第五部了，为什么要改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学校与过去有些不同了，几乎有百分之六十是全国的干部，已经不仅仅是西北的范围了，看呀，今天已经有很多干部是从华北、华中各地来的。西北局对于陕甘宁边区范围内的事物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华北、华中各个地方的情况则不甚了解，因此在联系实际方面则会老鼠跳在面缸里白瞪眼，合并在一块就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多联系实际。

在领导上，中央党校校长是毛主席，副校长是彭真同志，这样的改为中央党校第五部比过去的领导是加强多了，使得我们能够更多地

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习彭真同志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不论那里的干部，华北的也好，华中的也好，西北的也好，都这样来学习，对党说来这是有利益的一件事情。实际这些学校，都归党来管理，比如象抗大吧，也是党校。所以今天我们合并起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把全国各地经验都交流起来难道还不好吗？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竭力主张改西北党校为中央党校第五部。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了解这句话，也很不容易接受了这句话，所以说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那么，究竟怎样学呢？毛主席叫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又是什么呢？我这样想也不知对不对？讲出来看看，比如打个比方说，国民党的区域里，在陇东那边有五个乡的老百姓把门牌打烂了，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到我们这来说：“你们给我们门牌挂吧，给我们组织自卫军，以后国民党再来向我们征粮派人，我们说已不是他们那里的人了。”倘使遇到这件事情，我们不调查一下为什么他们把门牌打烂了要跑到我们这边来呢？一定要查一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然后才能出政策来对付。也许有同志遇到这事并不去调查研究，很快就决定立刻发给他们二十支枪，可以搞回几个乡过来不是很好吗？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这样做则不好。经过调查研究，原来当地老百姓已经被国民党刮得很干净了，生活负担相当重，于是想往边区跑。他们跑来，我们应当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不要一下子把门牌打烂了”，我们应当先是朋友，以后再慢慢地来，不能一下子就发枪给他们打算弄过来几个乡。再比如国民党的军队又三三五五往我们边区跑，这就是一个新的事情呀！为什么过去把土这挖得深深的，机关枪打得那样重，这就应当要研究了。土壕填平了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来打我们了吗？这就要去调查了呀，经过调查研究才知道他们不是要来打我们，好，你来吧！我就准备打你狗日的。过去国民党的军队是嫡系的，现在则是杂牌的

了，这些人只要有洋烟抽，有白洋，不搞起来当然好，实际轰上一炮也就垮的。再看他碉堡，又在搞地下堡垒了，目的何在呢？也就要调查一番。三三五五往这边跑，一调查原来是他们的保安团，他们还在调军队来，是胡宗南嫡系军队，甚至于是马鸿逵的军队，同时到处还在搞秘密组织，在西安有杜衡，杨玉铎摆在榆林，瞧瞧这都是些什么呀！特务工作也搞起来，军队也摆在那里了，这都是专门对付八路军共产党的，倘使你不调查研究这些，就会上国民党的当。

再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种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八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的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比如发展边区经济，充实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吧，毛主席讲的要发展呀！要充实呀！在高于会上毛主席为这个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大家都在响应呀！前方也是如此，不是邓小平同志要大家靠唯物辩证法办事么！就比如我们生产中的变工吧，大家把劳动力都组织起来了，遇到天下了雨，怎样来使用这已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呢？大家为着这场雨都要抢着耕地，这就是没有组织起来，因为还不能使用组织起来的力量，所以说组织起来本身就带着许多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一一都解决了，我们才组织起来。再比如合作

社吧，大家都组织起来搞合作社事业，可是有人总想把他们自己单位的合作社搞好，因此也不顾违犯不违犯政策和法律，结果他把这一方面合作社事业搞起来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破坏了政策和违犯了法律，这样的组织起来行不行呢？也还有这么一种人，他说：“组织起来矛盾多，麻烦多；大公与小公有矛盾不好搞。”若是好搞，又不叫组织起来了，当然是不好搞，有麻烦，有矛盾呀！我们应当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看看矛盾在哪里？大公小公是有矛盾的，公私是有矛盾的，这些同老百姓利益有时也有矛盾的，这就要解决才行。我们要公私兼顾，又还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干，大家主要是同国民党，同日本敌人的经济做斗争，一切都是如此，一切矛盾要在这下面解决。有一些人故意夸大和强调公私矛盾，降低对国民党和日本敌人的矛盾，这是非常不对的。大家要看一看呀，为什么国民党要把一些我们不需要的物品搞进来，什么花露水呀，洋线呀，粉呀，这些货物我们今天是不需要的，以后呢？以后也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要，可是国民党偏把这些搞进边区来，边区真正需要的他却封锁不给。同志们要看一看咱边区都需要什么呀？比如我们要粮食，过去还要靠一靠外面进来，现在便不了，我们多开荒多打粮，自己解决了。再调查调查我们还缺什么？我们缺棉，缺布，于是就要发展种棉事业，比如去年我们把二百二十万(斤)的棉花，八十万(斤)的羊毛全部变成布，解决了我们穿衣服的问题。我们不靠别人，自己动手，没有布，就解决布，瞧你国民党还封锁我们什么？现在我们自己可以解决布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要调查研究一下，没什么，就搞什么，同国民党封锁我们经济做斗争。再比如，我们缺地雷、炸弹、枪炮、锄头、镢头、铡草刀、锅、叉叉，我们没有铁来造这些，国民党又封锁这些，那怎么办呢？于是就要调查边区是否有铁？哪些地方有？调查了蟠龙、瓦窑堡、关中有铁，是否可以搞成呢？这又要调查研究了，若是搞成，我们的地雷、枪炮、锄头、镢头、铡草刀、铁锅这些就完全自己解决了，还怕他封锁个什么？其次，我们还要多关照老百姓的需要，比如我们自己有布了，但没有染上色，夏天穿白的还可以，冬天也穿白色，老百姓认为是穿孝不喜气，于是就需要染

料，三丈白色布放上三两染一染。这地方老百姓们主要穿的布色是黑和兰，我们首先设法种植这样染料，问题也就解决了，看他国民党封锁我们不？我看他封锁个卵！总之，我们应当从积极方面多调查研究，调查一下，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就出来了任务，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也无怪乎我们可以做到丰衣足食呀！为什么国民党就不能做到呢？国民党的经济和一切都是向下发展的，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经济是向上发展的，所以无怪乎国民党区域的老百姓打烂了门牌要往边区跑了，我们经过各方面调查和研究就会明白其中道理，然后也就才会有政策出来。就拿今天毛主席这个号召“组织起来”而说吧，实际上这绝对不是教条主义者坐在椅子上就能把一切劳动力组织起来，而是从农村中摸索出来的。教条主义就顶喜欢号召，一个号召毕了，又来一个号召，夸夸其谈，一串空话连天，一个具体问题也做不上。你不信，倘若问他：“你们组织起来没有？”他会说：“我们老早几天就开过会了，号召了，动员了，写了决议案了，我们完全组织起来了。”这就是教条主义作风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学彭真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比如象他在华北就搞得很好呀！华北的民兵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征粮工作是怎样做的？都是经过了调查研究，从一个问题提出另一个问题，在事物变化中把握新的变化，再从新的变化中创造新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各个问题，这才叫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

但是，有一些狭隘经验主义者他们便不这样做事情，总是片面的瞧见自己过去所做都是好的，他不大瞧目前的发展和变化。也有一些人总把自己小小的周围看紧，不往远看，把小部分人团结在周围，什么也不管了，“人云亦云”，自己对事物发展的真正规律一满不清楚，事物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一点没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这样的人，我们是要反对的。我们当用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观摩一切事物，我们要学习彭真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处理一切事情。在他们领导之下，我们相信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成绩的。在座的同志，有些是参加过华北战争的，有些是在陕甘宁边区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大家都要把思想搞通，将来是党的一笔财富。

过去总想欢迎前方来的同志们，一天推一天总没欢迎成，说起来有些事务主义。今天五部开学，我们来欢迎大家了。现在前后方的同志汇集在一块了，这很好，咱们大家可以交换交换互相的经验，比如怎样搞经济呀，怎样搞金融贸易工作呀，怎样丰衣足食呀，问题很多，都可交换研究。也曾有过那样个把同志，从前方来到边区，他说好了，可以给我丰衣足食了。听说有个团，从平原地带调来这里，也在进行生产，有个士兵就说了：“在平原都没开地，现在调我到这开荒山，开荒山就可以丰衣足食了吗？要我开到边区来保卫党中央，开到梢山里保卫啥呀！保卫梢山吗？”这是极少的个别例子，他还不了解情形，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怎样欢迎大家呢？我欢迎大家的礼物就是我刚才说的要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主法和彭真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的话完了。

答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国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六月)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国记者曾两次向高岗同志提出书面问题。

第一次问题：

- (1)中共西北局与军政机构及中共中央之关系如何？
- (2)中共西北局对于边区各种建设所提之号召为何？
- (3)边区各级参议会之现状及其成立方式如何？
- (4)边区参议会历届大会之重要决议及其实施效果。
- (5)“三三制”之构成方式及其各方面实施情况如何？请予见告。

并请列举“三三制”中若干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之人士。

第二次问题：

(1)在日本工农学校曾看见关于日本人参加参议会的统计，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参加中国的参议会呢？

(2)在“三三制”政权中说明有国民党员参加，有在什么地方？都是哪些人？他们是否与中央有联系？

(3)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将来革命的发展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共产党还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非无产阶级政权？

高岗同志答复：

上述八个问题，综合为四个问题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西北局的问题。

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处理西北工作。

西北局与军政机构的关系，是经过这些机构中的党员或党团把党的主张政策提出去，经他们用民主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讨论采纳或不采纳，共产党只能命令自己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不能命令非党员和非党的组织机构。

西北局对边区各种建设所得之号召，就是本使中央的号召在西北具体化起来，如去年到现在，就是把中央的十大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具体执行(中央十大政策：1. 对敌斗争；2. 精兵简政；3. 统一领导；4. 拥政爱民；5. 发展生产；6. 整顿三风；7. 审查干部；8_日寸事教育；9. “三三制”；10. 减租减息。)

第二个问题：关于参议会问题。

边区各级参议会，均是由边区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之差别，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出来的。

边区各届参议员本身都是老百姓，除边、县两级有极少几个常驻议员外，其余均生活在人民中，人民意见很容易由他们反映上来。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重要决议有：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拥护蒋委员长讨伐汪逆精卫等十二件重要提案，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等五个条例。

第二届参议会重要决议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保障人权等八个条例，及军事、政法等六个重要提案。

一两年来边区工作之大进步，就是他的效果的表现。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曾聘请一位日本人森健为参议员。这位森健一九三八年四月就到了八路军，思想进步，做了很多对抗战有益的事业，如组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他是华北委员)、瓦解敌军工作等等。我们的对日抗战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反对的日本法西斯，而不是所有日本人民；日军士兵觉悟过来坚决与我们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我们应该欢迎。我想我们聘请森健为参议员，于抗战、于将来日本人民解放是有利的。

第三个问题：“三三制”的问题。

“三三制”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团结各阶层更多的人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具体政策。但在边区执行中由于人民对共产党的历史与信仰的关系，所以在选举时共产党员当选常常要超过三分之一，因此我们常常要去保证非共产党员当选，共产党员则采取各种方法退出。

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共产党员一百五十一人，国民党员三十五人，救国派一人，基督教一人，无党派及其他一百零四人。边区党驻会及边区政府委员会中则共产党员均只占三分之一。

边区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党员名单我们手边是有的，先生们如愿与他们见面也很容易，在延安的几位，先生们可随时约谈。至于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有无关系，我们不很清楚。

至于县乡两级的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的超过三分之一，有的不足三分之一，我们不机械算数目字，但是始终坚决执行这一政策。

第四个问题：关于将来革命发展问题。

革命将来之发展，不是取决于某个政党某个人之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条件与人民的要求，比如当地主阶级极端压迫与屠杀农民时，农民起来武装反抗，实行土地革命是必然的；如果地主阶级不压迫不屠杀农民，则和平的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就可以调整地主、农民间的关系，满足农民的要求，则武装反抗自然就不会发生了。革命将来的发展，是否需要推翻非无产阶级政权，是取决于将来之具体条件及那时统治者之政策。

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

去年一年，合作社有很大的进步，那就是打烂了旧的合作社，创造了新的合作社。大部分合作社都有了进步和发展。过去曾有过一些合作社专门搞消费，专以赚钱为目的，而不以为群众服务为目的，它的特权是不管放账也好，采买青苗也好，总是想多赚几个钱，至于和老百姓的关系，则可有可无。这样的合作社有没有成绩呢？它的成绩是在群众中间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你不给我办事！”除此以外再没有了。因此老百姓就都不赞成。凡是老百姓不赞成的合作社都不是好合作社，凡是老百姓拥护、赞成的合作社才是好合作社。

我所说的这些不好的合作社，怎样错的呢？党和政府也没有发指示说一定要办个“老百姓不信仰的合作社”，办合作社的同志事先也没有说：“我要办个群众不赞成的合作社”。那末为什么会错呢？就是这些同志不知道如何办合作社，他们的思想总以为合作社就是做买卖，赚钱，再没有别的事，至于群众有些什么需要什么困难，从来不想办法去解决。

去年我们就把这些旧的没有办好的合作社改造了许多，并出现了新的合作社。绥德石峁有个张丕元，过去是红军老干部，他办了一个很好的合作社，把乡间破锅烂铁收集起来，成立了个铁匠铺，生产切菜刀、锄头、锄头、铡刀。老百姓说：现在不用到城里去买铁器了，咱们合作社的又便宜又好。婆姨拿起切菜刀切菜时，就想起这把刀是合作社打的，男人们铡草时，就想起这是咱们合作社打的，这样合作社就和群众发生了联系，他们就拥护合作社了。

我们要调查研究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办个什么，同时还要看有没有办的条件，不能主观。假若我们办个铁路合作社把甚一下子都运过去，

这不很好吗?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技术,没有原料,没有工人,这就是空想。因此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比如志丹老百姓盛水用的盆子,是大树根挖槽做成的,非常笨重,如果在那里办个瓷器合作社,生产瓷盆子,老百姓一定非常赞成。既然这样,我们在三边也办个瓷窑合作社好不好?这就不一定合适,首先那里缺乏烧窑的煤炭。那么三边搞什么合作社呢?那里出小麻子,籽可以榨油,油渣是顶好的肥料,我们就搞个榨油合作社;那里可修水利,就搞个水利合作社;那里出盐,就搞个盐碱合作社。根据老百姓的需要,又估计到客观条件的可能,这样去办合作社,一定不会错。

合作社在今天一定不能单纯做买卖。那么,合作社做什么呢?就是要组织边区老百姓的生产事业,组织他们的经济文化生活。合作社要帮助老百姓搞碾头、搞纺织、搞变工队、搞油坊等,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有帽子戴,有鞋子穿。把他们组织起来,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件大事情,不管任何科学家技术专家,都要为了这个目的,工作才有意义。只要给群众办事情,群众就会拥护合作社,合作社才有力量。刘建章的南区合作社到三边去驮盐,有时差价好几十万元,盐池上的人一听说是南区合作社就满不在乎的说:驮去,不要紧,刘主任的腰粗得很。其实刘建章同志的腰并不粗,这是因为他给群众办了好多事,他有群众力量。另外有个合作社在三三年就办起来,但这个合作社一直搞了十几年,到现在还仅仅是卖一些布尺一些杂货,那时有一千元白洋的资本,现在的资本是一万元边币,不但没有帮老百姓搞碾头、搞棉花、搞篦梳,搞切菜刀,而且把老百姓的股金都快弄光了,老百姓说:“我们不要这样的合作社!”这是应该的。对于这个合作社主任,我们应该说服他、教育他,这样下去前途很危险,老百姓有取消他的趋势。如果教育说服还改造不过来,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撤换他!告诉他不要挡着路,叫好的合作社也办不起来。他说:“我辛辛苦苦的干了十多年,为什么叫我走呢?”我们说:“是的,你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可是你也辛辛苦苦的把老百姓妨碍了十多年。”(笑声)开完这次合作社大会以后,下次再来开会,假若发现还有专门作投机生意、采买青苗,把老百姓的股金花光

了也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合作社，我们就拿支笔在他脸上画乌龟(大鼓掌)，叫他走来走去的在大街上出丑。(全场笑声)

合作社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有些干部觉得合作社工作没有意思，这是不对的，现在刘建章在延安县再讲一次话，老百姓都非常拥护他，和县委书记县长讲的话同样有威信，这就证明过去的那种观点是陈旧的。应该了解我们理论经验的创造，是从群众中来的，而合作社又是最的群众经济与文化的组织，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到合作社中去，而不是站在一旁。研究边区的经济形式，研究边区生产当中经济建设的一切组织与方法，这是一件大事情，搞好了这件事，我们边区的经济文化才能更大的发展，因此所有做群众工作的同志们，都要到合作社中去，把老百姓真正的组织起来，把合作社办好，老百姓粮食多了，棉花多了，铁器多了，医药多了，边区的力量就更大了。老百姓吃穿不愁，人也不死，牛羊也不死，文化自然可以提高，大家都能识字，每家门口种上几株桃柳，真是桃红柳绿，窗子开得大大的，窑洞刷得白白的，你说老百姓赞成不赞成?一定很赞成，这样边区的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

我们边区合作经济的政策，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方向，长期的压在老百姓身上的封建经济剥削的重担，必须拿下来，老百姓的光景才能过好，合作社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为老百姓办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叫做群众观点。

我们的合作社是可以自由入股自由退股的，农民入一千二千，商人地主人三万五万，都是一个社员，民主的合理的分红，但是不论你人多少，你都不能操纵这个合作社。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和各阶层团结一致，只要不是搞封建剥削，搞高利贷，搞投机生意，不论是地主、商人、农民的资本，都可以自由的人进来，目的是建立民主的经济，人民大众的经济。

最后，我要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边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办合作社当成一个重要任务，你要组织人民生产，不经过合作社又有什

么办法?党的支部要有合作社的共产党员来参加做支部委员，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实际，面向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种对经济工作的错误看法。各级党委都要把合作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经常和老百姓讨论研究，但党不是包办，而是指出方针，研究办法，纠正缺点。

我们边区有很多模范合作社，大家应该向他们看齐，但这些合作社没有理由可以自满，应继续向前发展。落后的合作社，也不能灰心，而应改正缺点，赶上先进的。我希望全边区合作社来一个大竞赛，看谁把合作社办的更好一些，经过合作社不仅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而且要把他们提高一步，我们边区的事情办好了，对于全中国都是件大事情，希望大家努力。(热烈鼓掌)

在西北局办公厅欢宴政府委员及 常驻议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

这次联席会议一定会开得好，因为大家都抱着有什么讲什么的态度，都是热心把边区的事情办得更好。从各种提案及会前座谈记录中就可充分看出这种精神。大家对许多实际问题的批评和意见都很好，我现在只对某几个问题略述已见于下：

(一)近年来我们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边区的面貌为之一新，譬如，三边我曾在那里很久，以前二流子很多，现在在政府发动帮助之下搞水漫地，组织妇纺，组织扎、变工队，二流子中有当劳动英雄的，群众都开始丰衣足食起来。我们应继续这种一切为老百姓打算的方向，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给老百姓搞生产、搞文化、卫生等等，然后老百姓以所获的一小部分帮助公家支持前线，那老百姓自然就很愿意。

(二)经济发达了，文化还很落后，我们应该注意群众的卫生工作，宣传和帮助老百姓开大窗户，安烟囱，打水井，搞卫生合作社，使老百姓少得病，有病请医生，不请巫神。

(三)今年部队生产十万石细粮，机关学校生产五万石细粮，共十五万石细粮，这不仅保证了部队的给养，同时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样的军队在世界上都是模范。我们应该宣传军队的功劳苦劳，更加巩固军民团结，准备反攻力量。

(四)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一定要贯彻执行。因为减租减息可以提高群众生产情绪，增加粮食收获量；交租交息使地主同样能丰衣足食，大家团结影响全国支持抗战。但是，我们在减租减息当中，要纠正两种毛病，一种是过“左”的毛病(斗争过火，减额超过规定等)，一种是过右的毛病(迁就地主不减或明减暗不减等等)，这都是不对的。

(五)在实行民主“三三制”方面应力求扩大和深入，为此，我提议(1)今冬由地委、专署负责召开乡级干部会议训练一个半月，使大家在民主政策的了解和作法上得到一致；(2)各县可召开参议会讨论关于扩大与深人民主政治问题，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大家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很好(如最近米脂县参议会开得很好)；(3)明年春季普遍进行选举，更换不称职的，推选有为群众所信仰有能力的人出来做事，团结一切力量；只要不是破坏分子，都应团结。

(六)贯彻合作社真正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实行自愿入股、按期分红的原则，绝对禁止强迫摊派、投机取巧的办法。

(七)司法问题，应多采合理调解方式，解决案件要迅速，不要耽误老百姓的时间。

(八)在去年审查干部与防奸运动中我们获得很大成绩，但戴错了特务帽子的人，应即脱帽，并向他解释，恢复对他的信任。弄错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特务分子的陷害，但某些干部对此操之过急、粗枝大叶的缺点与错误也应承认作为教训。

(九)和外国记者谈话的问题，我想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在总的方面是进步的，是有成绩的，但我们不否认在这进程中尚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的长处就在于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有信心和办法纠正，谈话原则，应以真实为主。

在边区仓库主任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

同志们讨论粮食问题，这是大事，特别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粮食；我们要训练军队，装备军队，准备大规模的打日本。兵要吃饭。大家看到，前天去了一架飞机，昨天又来了一架飞机，不久还会来飞机，就是说，现在外国人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去，要和我们商量商量怎样打日本；把日本打败以后，世界和平，东亚和平。怎样和平？要把共产党、延安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说，世界大事要和延安商量一下，不然就不好办。这个问题，蒋介石过去没有想到的。蒋介石对王云五说，我过去很有本事，我说德苏必战，德苏就打起来了，我说日美必战，日美也打起来了。日苏必战我也讲了，但是没有打起来，很奇怪。蒋介石这一宝没有压到，蒋介石还想美帝第二条战线不可能开辟，苏联必败，德国的力量和苏联的力量拼，英美要德国把苏联消灭，他压了这一宝，但第二战场开辟了，英美打德国，德国要垮，蒋介石这个投机生意没有搞好。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时候，挟了一包文件，向罗斯福、邱吉尔讲共产党不好，苏联不好，罗斯福调过脸去，不听他，这些话没有味道，蒋介石弄的莫名其妙，跑回来又打电报，又写信，一直到华莱士来华，公开告诉他，任何同盟国之一，如果反对另一同盟国，这就是消灭自己的力量，罗斯福是不做的。蒋介石骚情，这个事情没有搞好。还有中国的问题、打日本的问题，要把共产党放在里头。华莱士到中国来，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威尔逊、赫尔利来中国，要经过莫斯科，奇怪！打日本，开一个会议，苏联不出席不行；

美国到中国来，解决中国问题，先要到莫斯科商量好再来。他莫明其妙，很奇怪。蒋介石这几宝没有压到。解决世界问题要把苏联摆进去，解决东西问题要把延安摆进去。大家看的很清楚，一些记者、军事使团来来往往，必须要和延安商量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看到，前天蒋介石耍了一个花枪：民主、宪政时期可以提前，就是说，早点实行民主，政府也可以开放，农林部长、铁道部长、不管事部长，也可以摆几个。现在把盛世才搞去当农林部长；铁道部长，中国的铁道光了，他也可以请别人去做。基本的统帅部，反动的堡垒，是不会放弃的。蒋介石在参议会上开始说军事危机已经过去了，河南战争结束了，湖南衡阳的战争结束了，日本人前天打到桂林，他又说有危机了，美国把飞机场也碰了，参议会上开始的时候讲危机过去了，现在危机又来了。日本人要打昆明，他看到屁股后面被人抄了，很危险，他的军队不经打，一打就烂了。这是日本人的压力，日本人打得他没有路走，他一打就垮。美国人、英国人批评他，说他不民主，不好，也是一个压力。还有一条，我们打的好，前几天在冀东我们的区域里，打下来十一个飞行员，他们以为是在日本人的区域里，结果却是在我们区域里，华中华南都有，有四五十个落在我们的根据地里。他们到处打电报，告诉许多人，说我们能打仗。最近有二十多个美国飞行员，在晋西北被救出来，到延安来，记者来了，消息搞出去了。我们有五十万军队，现在还不止，有五十四万，九千万人口，很能打，天天打。这里一个是军队能打，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大家生产。有民主政治才能生产，老百姓也能够打，军队能打，才能够坚持。他那里不生产，民主吗？他叫独裁，打仗一打就溃。英国有一个报纸，叫《星》，提出要考虑延安是合法政府，还是重庆是合法政府。蒋介石见了，大吃一惊，“父亲连我这个大儿子都不要了！”这是我们的力量增长，还有地方实力派，小党派。蒋介石把陕西十二个军长撤职了；许多地方军队，今天一个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过几天搞去做什么部长，地方军队被他吞并光了。没有光的就很不平，要想办法。地方实力派也好，小党派也好，中国人民都反对。现在威尔逊、赫尔利来了，他便不得不表面上答应编十二个师也好，承认边区也可以，民主可以早

点搞，政府里可以请几个客。这是一个样子，给英国人美国人看。把四百八方的压力，利用这个方法解决，这是蒋介石企图。但是我们要知道，统帅部不改造，政府里参加一个农林部长、一个铁道部长不能做什么，基本的关键要改造统帅部。“军令统一，政令统一，”统一于你？河南一个月丢了十五万支枪、二十八万人，统一于你？不但河南统到日本人那里去了，桂林也要给日本人。我们要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抗战，真正为国家民族服务。把反动的司令部改造以后才能统一；统一于你，我们就统丢了，不行！要统一，军令政令统一，必须要把反动的脑壳彻底改造；不改造，还有什么统一？蒋介石这一次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政治统一，外交统一，一方面是对付我们，一方面是对付美国。美国把飞机这样飞来飞去，到延安来的军事考察组，美国报纸上叫做军事代表团，他们说来的是兵，我们也以为是上校，但其中许多是直接归美国统帅部管的，叫做军事代表团，蒋介石便不高兴，认为美国这样做，把我们搞得不统一。他开参政会，一方面是对付我们，一方面是对付美国：“你这样和延安直接搞，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呢？”有点吃醋的味道。要解决反攻日本的问题、战后和平的问题，要把我们摆进去，道理就是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军队，军队能打，我们的区域里老百姓和政府、军队是一致的。美国记者说我们有什么力量，他们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到太平洋，嫌脏，不自由，打架闹街，到延安来，从来没有讲一句。这个地方很好，实事求是，进步，没有贪污，没有抽鸦片的，说我们很不错，和美国差不多，这里很自由。美国人也感觉这里好，美国报纸上最近登了好多关于延安的东西。重庆的报纸骂福尔曼，说他是疯狗，见了什么也送出去，大概福尔曼登的东西多点。他们骂福尔曼、斯坦因，说明我们进步，有力量。外国人认识这样的力量，他们感到这个力量有前途，有希望，不是没落的，他们希望这样的力量打日本。打仗不是容易的，假如武装一个现代化的师，一百架运输机天天运，要一年才可以；武装现代化十个师，要多少时间？大家知道一个炮，一个山炮，一个野炮，本身并不重，一个炮弹就相当重，一个炮不能只打一个弹炮，要打几千万。假如英国美国和日本打，飞机全部集中起来，欧洲战争结束了，要把日本的飞

机打掉，把日本的海军打掉，往岸上爬，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日本有一万万人口，陆军有相当的数目，海军也保存着，如果美国要武装一百个师团，要一九四九年才能运输完，日本还有四年的时间可以称王，那不行，因此必须要装备中国的军队来打。听说美国这几年有九千八百五十万吨钢(苏联是二千八百万吨)，是最厉害最多的，他的飞机坦克那样多，过去一个月搞五百万汽车，现在把汽车改成坦克，坦克搁下有没有用？德国垮了，必须要东西用在打日本上，他将来生产的东西，全世界变成他的市场，不然他的繁荣就成问题。因此美国必须要打日本，必须要装备中国的军队。美国机器那样多，枪炮那样多，中国的人来打很好，他不要死人，这样的事也划得来。武装中国的军队，蒋介石要用来进攻延安，他就不许，因为世界的问题，不能打。世界上要反法西斯，这就要共产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芬兰、波兰，不和共产党商量，不经过苏联，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蒋介石看到买卖不好做了。我们的力量增长，世界潮流所趋，他就不好搞。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军队要搞好，五十万军队，现在开代表大会，练兵。去年打；手榴弹、刺枪、射击，今年就不是了，掷弹筒怎样打？高射炮怎样打坦克怎样用？也要想象的学习一下，将来用的时候可以熟练。五十万兵练好了，一个顶两个，能不能？完全可以做到。兵在精不在多。五十万兵，如果他们政治上坚强，情绪很高，勇猛果敢，技术熟练，练的好，能当一百万人用，我们装备起来，力量就很大。

练兵也需要条件，除了我们本身的，要干部，要教育设备，要有训练的东西，重要的是要吃。延安如果有六个旅，毛驴小驼小米，要多少毛驴子？还要吃油，青油。练兵必须要米，必须要肉，必须要草。我们仓库便是管兵吃的米，马吃的草。历史上大家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家也看过岳飞。宋朝岳飞打仗，牛皋大将管粮草，你们就是延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牛皋，这个责任非同小可，很大的一件事。粮食搞好了，有粮食，有草吃，不发生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一年穿的布，加上各种办公费用，要多少钱？大概七十万到八十万，要吃的米要一百万，你想这件事大不大。其余的人

管多少?叶季壮也好,南汉宸财政厅(除过粮局)也好,贸易公司也好,整个合起来才七十万万到八十万万,而你们管一百万万,你看你们的责任大还是小。你们是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牛皋,命脉在你们手里,粮食在你们手里,将来打仗的粮食在你们手里,今天各机关吃的粮食在你们手里,很要紧。工作性质要搞清楚,我们军队的命脉、机关部队的命脉操在你们手里。

诸位过去做了许多工作 0 那些工作不错的,我们应该表扬。但是我想我们工作里头还有许多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大负责,马马虎虎。“我是管仓库的,收粮支粮,盘来倒去,没有大的味道。”还有什么事有味道呢?管一百万万。将来打仗要吃饭,哪个不吃饭能走路?你们不吃饭就不能走到延安来。人一辈子吃饭是大事,不吃饭就不能活。每家老百姓有一年余粮,就轰动全中国。边区老百姓长一年粮,这是大事,他长一年粮,腰就硬了,跌下年成也不要紧。没有粮食,没有穿的,冷的不得了,搞一个农具也没有铁。边区短啥,啥就要搞好。粮食现在够吃,如果保管不好,顶什么呢?为什么费这样大的劲,不如打扑克、跳舞、看看《逼上梁山》、闹秧歌、下围棋,不要叫老百姓生产。生产下来的粮食,为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争取战争的胜利。我们对于粮食要保管的好。在我们的保管工作中有毛病,而且毛病很多,负责的人把这件事看成不要紧,马马虎虎,这样,我们县委区委,一年搞变工队生产,转变二流子,辛辛苦苦,搞的粮食保管不好,岂不是白费吗!搞的东西要保管好。领导的同志,在脑子里要划一道。我们天天搞生产,生产的小米,收的公粮要保管好。这是一条,领导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检查这个问题,慎重的配备干部,保管好,达到保管粮食不浪费,不霉掉,保管的好,二科长也好,仓库主任也好,就是说我们的官,管仓库的人,对于仓库要多注意。这个仓库是好,还是坏,还是象这边挂的有三个人的好仓库,还是有那边画的有驴子的坏仓库呢?还是有三个人的第六七号的好?还是那边的一个个坏仓库?大家看一看,仓库很潮湿,那样多的老鼠洞,门窗也不好,门槛下面有很大的洞,猪娃可以钻进去,雀子从洞里飞来飞去,里面老鼠洞六十八个,老鼠吃了也不管,地下潮湿,就把粮倒下,

沤了三千石也不管，人偷去了也不管，总之不大管，不负责。浪费了两万石，要值八万万元。甘泉的老百姓可以吃两年。这是我们的官僚主义，戈尔洛夫。前线邮政局里有官僚主义就要他来舐沟子，假使我们的仓库里有官僚主义，不管，粮食来了一倒，人了多少马马虎虎，出了多少马马虎虎，帐也不记，仓库里有多少粮食不知道，怎样管呢？人家拿去多少石，也不知道。假使仓库主任卖掉一点，贪污一点(就有一个人贪污跑了)，这是老百姓的血汗。贪污了，你说这个罪是什么？这是危险的，脑袋搬家的事。老百姓的血汗，你贪污几十石，这是很大的事，这样的毛病要克服纠正。这是第二条。仓库要搞好，什么叫做好仓库，不管是窑洞是房子，在离地五尺高的地方开几个洞，上面铺石板，下面风可以流通，就不会潮湿，一沤三千多石？地上开个洞，铺上石板，然后倒下粮，根本不潮湿。石板的缝要合起，象这地上的砖一样，要对齐，老鼠搞不进去。第三，你们选择粮食窑洞，不要选择老鼠、瞎鼠、鼠多的地方。选择老鼠少一点的地方；还可以喂两只猫，一个仓库喂两只猫，给它吃点肉，吃点小米，放在粮食窑洞里，让它跑来跑去，不叫老鼠吃。第四，不要靠水；同，看水不容易到的地方做仓库。老百姓家里放粮食，也不让水进去。这几件事，一年三百六十天，吃了饭做什么？一天搞一件事，也用不了。老百姓的仓库，也不要有一人天天照仓窑，只要稍微注意下，就做好了。窗上糊纱布，麻雀飞不进去。这些问题要搞一下。你们大家研究怎样好办，找一个典型，谁的仓库是典型，没有烂，没有老鼠吃，没有短了粮食，账目清楚，谁的仓库好，就照着办。收粮的时候要注意，小米一下送来很多，征收公粮，一个人办不下，区县干部这个时候都可去帮助，这是中心任务。仓库主任、二科、县府的人这几天要帮助把账搞好，入了多少。收粮的斗要公平，不要大斗，对老百姓多搞点。收粮必须要放在热锅里炒一下。老百姓有这样的毛病，八升米，倒进四马瓢水，拌起来，放在院里一冻，收公粮多是在冬天，冻好早上驼来，看到颗子很好，结果老百姓省了两升，我们不注意，往仓库里一倒，一沤就是几千石。这样落后的老百姓，在米里拌水，我们发觉了，说老百姓米里放水，喊出来，老百姓就不敢再拌了。不要倒在一起，

另外放起，马上就吃。把帐一项一项的写得很整齐，你们讨论一下会计制度，不是一问有多少粮我不清楚。当仓库主任，仓库里多少粮也不清楚？谁有借粮，也不准，有人说你这个话不对头，今年借出了五六百石荞麦。这不同，老百姓没有荞麦子，借给他几百石，可以收几千石，你把粮借给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自己做生意更不得了，仓库的粮食不能借。收粮收的好，保管保的好，出人帐清楚，还有什么事情呢？经常去看一看，把粮食看一看，不浪费，周围看一看，不浪费，你一个人一年吃多少？吃一石八斗，也不要紧，并且一个人实际吃不了一石八斗，一斤三两一天，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但是仓库一定要管好。浪费两万石就不得了，罪恶大极了，老百姓要恨死你。老百姓辛辛苦苦搞的，我们征收来，你沤两万石，怎样得了？你说我没有沤这样多，你这里十石，他那里十石，合起来就多得很。每一个仓库要做到不沤坏一升，不短一升，不浪费一升。我保管的好，大家向着这个道路做。这个工作，各县要检查，要彻底的检查。

还有库仓设在什么地方，哪里装运粮多的地方。向哪里运去要注意，比如青化砭的粮，送到蟠龙，蟠龙又送到延安，这样就把老百姓害死了。要照顾粮食的用途，军队驻扎在什么地方，学校、机关在什么地方，哪里需要多少粮，从哪里运来？向延安运，还是向绥三边运。粮食消费在延安，仓库设在川口，又要从川口驮回来，过去这样的事很多。仓库合理化，要以运输力不浪费，节省老百姓的劳动力，又吃粮方便为原则。研究哪里需要粮食，需要多少，大家负责搞好，不要浪费。窑洞铺石板，那里都有石板，清涧、延长、延安石板很多，要搞好，今天把粮食工作彻底地转变。

草也是大事，延安吃一斤小米多少钱？一百三十元，一斤草也是一百三十元，怪不怪？一斤洋芋才五十元，一斤西红柿多少钱？我想也不过百多元；一斤白菜十元，一斤干草一百三十元。天下有这样的事？十斤草就等于吃十斤小米？牲口吃草没有办法，将来练兵，驮口还要多，我们是一个四万人的城市，有三部烂汽车，老爷坐的，大车还不是橡皮轮，是铁轮子，载不了多少。要毛驴子驮，不驮吃不上饭，(边

区三千个驮口)。草远的地方不行，三边有草，绥德也有草，到这里要一礼拜，一天牲口吃十斤，来回十六天，驮的还不够吃的，这还不是浪费吗？草运不来，没有办法。

“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草的问题是大事，如果不解决就不能运输，饭也吃不上。我们的盐运出去，换进来布匹、棉花。盐在家里也是放着，驮出去可以换进白银黄金(要有资本，要驮出去才能换进来)。我们运输组织起来了，没有草吃，这还不是大事？是很大的事。没有草吃，盐不能运出去，棉花、布换不来。我们要出入口平衡，今年高干会算了半年账，我们要多少棉花呢？四百七十万斤，值三十八万万元，要解决。今年种了，但下雨多了，棉花到现在没有开。还有打农具要铁，需要四百五十万斤，我们现在在蟠龙、永平炼铁，中央委员陈郁同志在拐峁搞了一个火柴厂，一天可以出三、四箱，可是没有硫酸钾，因为国民党封锁。还有染料，过去老百姓穿白布不好，福尔曼到米脂，给美国许多报纸写文章，说他到米脂看老百姓穿的白衣、白裤、白鞋，还很干净，因为没有颜料，国民党封锁。今年我们种蓝，老百姓没有经验，种的不好，也不够，还要向外边买，今年没有办法解决。工业必需品也没有解决，特别是一年来我们丰衣足食，国民党专意封锁限制我们。人家封锁我们，我们去买要多出钱，边界的军队你给一点钱，东西才可以过去，我们要多出钱。我们必须要把边区不要的运出去，食盐不要，石油、羊毛用不了，可以送出去，能换进来东西，换来必需品，我们的金融才巩固。边币调济，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边币是交换东西的，这才有作用。我们的边币拿到西安，他说这是奸区的，伪区的，要打屁股，坐班房。他要封锁，我们的物资不够，必须要买。基本的是要生产，我们没有工业基础，原料缺乏，没有解决以前要向外买。我们把盐运出去，把要的东西换进来。运输没有汽车，没有运输机，有一架运输机，在飞机场烂了，只有毛驴子，“得啾，得啾”，必须要吃草。我们割草一大堆，有什么用处？这关系于外国人参观的问题，关系于新民主主义。有了草才运输方便。我们发动种苜蓿，许多人不种，他们说西北局、边区政府吃了饭没有事做，搞这样的事。再想一想，种苜蓿都是不大好的地，种了几年苜蓿，开

过便是顶好的荒地，多种一点苜蓿就不得了。我们发的苜蓿籽沤了，丢了，不种，损失了好多。种了锄一下，不锄也可以，只种一年就可以割草。地刨一刨，放上种，盖二三分厚的土就成了，有什么不得了？但大家不种，我们运输没有草吃，运盐贵，就要赔钱。种庄稼，一垧谷子至多能收一石六斗，谷草也不过十大把，六十小把，没有二百斤。种苜蓿可以得多少钱呢？一垧地可以割三千斤，一百三十元一斤，要收多少！东西多了便便宜，西红柿前年那样贵，去年，我们山底下有一个菜园，姓高，他骂我，跟我的勤务员说，你们高司令就做坏事，前年我种西红柿卖了多少钱，去年卖不掉烂了。东西多了就便宜，过去铁二千元一斤，现在各样都涨，我们的铁反而便宜了，一千元一斤。东西多了就便宜，我们苜蓿种多了，运盐的驮口就多，运输队就发展。你们回去想一想，研究一下，不种苜蓿，对于边区是多大的损失，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割野草，今年雨水很旺，什么白莠子、白草……割一斤便是一百三十元，十斤一千三百元，一百斤一万三千元。这件事很可以做，对于边区是很大的收入。

第三是公草，各农场可以收许多草，自己的牲口可以吃，剩下的堆起来，放着有用。

第四，老百姓的草，有的地方鬼不生蛋，根本不去人，你把草收起放在那里做什么？堆草必须要在大路两旁，才有作用。不是好坏一堆便算了，草底下要挖一个十字沟，上面放上高粱杆，堆成人形。老百姓家里也都有草，保管的非常好，头向里，根朝外，下面有沟，上面盖高粱。公家的草一堆便算了，有多少不知道，谁领了多少也不知道。草要集中在有用的地方。必须要照这四条办，经常检查。草要过秤，不然人家偷了也不知道，交来就一堆，领去多少也不知道。要建立制度，怎样收，怎样保管，怎样发，要登账。怎样搞好，我们都可以发表意见，搞好了对于练兵，对于全边区都是大事。粮草历来就是大事，我们看苏联打仗的时候，莫洛托夫还小吗？粮草是很要紧的，我们管的不好，对于公家的损失不知多大。希望大家保管好，不浪费，

使得军队供给不发生问题。大家讨论，谁搞的好，做一个典型，大家照着做；那一个不好，大家小心注意。粮食草料贪污，最近发现了一个，大家要负责，一个老鼠坏一锅汤。我们以后要保管好。最近有一个消息，外国人来和我们谈判，国民党卑鄙齷齪，搞了一些人，到处破坏，在外国人中间破坏，在边区破坏，我们正讨论对付这个问题。粮草要注意，他放一个瓶子在里面，过半个月才发火，把粮草烧掉一点。你们要警惕。总而言之，我们在南厅长、黄局长的领导下，把粮食工作一定搞好，不要马马虎虎，我的话完了。(大鼓掌)

干部教育头等重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

各级领导者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延大、各中学、完小、各区乡干部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一律办干部文化夜校，为长期建设边区打下基础。

高岗同志于九日上午在文教大会上讲话。他本着毛主席日前宣布的方针，在工作方法上予大会代表们以具体的指示。他特别强调干部教育为开展文教工作的决定因素，并对新老干部的学习问题，作详尽指示。

高岗同志首先称述此次大会的准备方法，即先组织各分区工作队，由负责干部领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获得经验，并由群众选出有实际经验的代表来开会，这样就便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各代表回去以后，对边区的文教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高岗同志说：大会的方针，毛主席已有指示：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为战争生产服务，打日本、反汉奸、反封建迷信。这种工作的基本队伍是诸位代表。你们许多人都是群众选出的模范，大会将表扬你们的成绩，但是你们自己的任务却不是争锦标，出风头，不是的，你们是要在这里

搞通思想，研究经验，解决问题，以便回去更好的为老百姓办事。大家回去，要本着毛主席指示的群众与自身原则，在群众运动中防止强迫，把握住为群众所喜欢，能够解决问题，并能长期坚持下去的方式，去推进文教工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在群众中的不卫生、文盲、迷信与封建文化的残余，应采用具体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自己起来克服它。简单的否定或强迫命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追求数字的形式主义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指出开展边区文教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教育。这些年来，外来知识份子对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不能永远在边区的，因此培养边区本地的知识份子干部与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就成为边区今后一切建设事业的关键，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予以第一等的注意。为此边区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应该到延大行政学院和党校五、六部上课，各工作机关应该研究业务，总结经验，作为训练干部的教材，以保证他们学用的一致。各分区领导同志亦可以同样精神与办法，亲自动手，办好本分区的中学、地干班等，为本分区或全边区切实训练出一批有真本领的干部，此项工作应列为各分区的主要职务之一。在各级除应注意办好好完小外，目前尤应特别集中力量，办好各县的区乡干部冬季训练班，集中半数以上的干部到县上，从他们本身的任务起，用座谈方式、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的方式，和他们讨论商量，然后提出好的和坏的典型，向大家报告，使大家真正能够了解政策，知道方法(包括此次大会所决定的文教工作中的政策与方法)。这才是具体的帮助干部，培养干部的方法。应该训练，如果所有区乡干部，不了解群众的问题，不教育，那么任何工作都是不能作好的。

特别指出要消灭区乡干部文盲、迷信、不卫生等。他号召各级政府(从边区政府到各区乡政府)和学校合作社都办夜校或读报识字组，于两三年内消灭工作人员中的一切文盲，各区乡政府的夜校并可吸收群众参加。要克服干部中的保守性；认为没有文化也能革命、或是怕丢脸，怕批评的坏作风。领导上应该善于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巩固他们的情绪，使他们知道有了文化、有了科学，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丢脸是丢旧社会的脸，错误是谁都有，问题是对错误的态度要正确。应该向别人学习，听取别人的意见，克服“弋而夫思想”。

号召新老干部互相学习，工农与知识份子互相学习。无论什人都要学习一套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不要务虚名，资格。高岗同志说：有一个自满的人，以为自己满有学问，满有格，遇事可以凭主观预先设定一个办法。这行不行呢？高岗同志答说：如果不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这是行的，如果要为人民解实际问题，这就不行。应该知道，必须是一贯为群众做事，在实中得到成效，而且群众说你好的那种希望，才是真正的，可靠的西。个人的小聪明，或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希望，不能解决人民的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包袱”丢得远远的。丢掉背上的包袱，打开脑筋的机器，使脑子里觉悟的部分挤掉不觉悟的部分，一毛主席的这个宝贵指示值得我们终身受用。我们今天边区文教工作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人民解决生产和救命(医药卫生)两个大问题，也就是物质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学习至少一个群众所需要的本领，如工业、医药、会计、助产都好，去为人民服务。我们必须坐稳屁股，安心进行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学习和工作。

“永远为群众服务，永远依靠群众。”高岗同志在热烈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讲话。

在党务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组织工作的 基本总结与今后方针的指示(摘要)

(一九四四年)

(一)对过去组织工作的估计：

几年以来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以来党的组织工作，首先由于对边区党的作用与对党员干部质量的估计不足，因此所采取的方针办法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九四一年以来的干部政策上提拔干部、使用与培养干部、对党员的登记与处理、对支部工作的研究，特别表现得明显的是一九四三年高干会议时的整党草案上，如对边区党的作用估计认为边区党执行中央政策决议不彻底，对党员干部的估计认为“它是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因而多数党员和一部分干部文化异常低落，且受着封建残余思想的某些影响，对于他的政治提高与思想的改造比较困难”，认为多数党员在思想上自私自利，在政治上对党今天的政策还不了解，在成份上包含着投机、蜕化落后等不良分子，因此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不足党员的条件，百分之十的落后与不良分子。在干部上认为有少数干部(区级与某些中级干部)表现落后疲惫，在政治上不愿前进或倒退，工作勉强，对党的政策执行不关心，熬不住长期斗争的困难；这些干部阻碍党的政策的贯彻，党与群众的联系。对支部认为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等。这样的估计是与实际的情形完全不合的。在去年的实际情况就根本粉碎了这种不正确的估计与认识，去年实际工作中表现支部的作用、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干部的工作绝大多数是好的，干部是有能力的，能掌握政策能贯彻政策的执行的，由于这样对边区党的作用、对党员干部的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在组织工作上采取消极的方针与办法，不会也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方针与办法。

由于在组织工作上的方针与办法是消极的，因而在干部政策上不是设法培养与提高边区内的干部，而是用外来的新知识分子干部(所谓新鲜血液)去代替本地干部的错误办法。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底，在西北局组织部就使用了十四个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任科长、科员，本地干部只剩下五、六人。在警备区任县委书记的就有三个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全边区任县委组织、宣传部长的或副部长的有二十几个，任宣传部长的有二十多个，任区的宣传科长、区文书者有十八个(关中警区不在内)。这样一种对外来知识分子的使用、提拔是不对的，在去年审查干部与工作当中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在这问题

更大的错误方面就是在使用这些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之后，没有把原来的本地干部大量的送人中(=央党校去培养与提高他们，而是任其生长的不管。由此就停止了对本地干部的提拔(一九四一年之后本地干部的提拔是停止的)，在整个边区看这时期干部是下降的(精兵简政实际是精简了本地干部)，这就影响到边区某些干部觉得自己现时吃不开了，认为边区干部“只能打天下，治国是要士大夫”的一种想法，某些干部产生了消沉的思想，觉得没有前途。

在党员问题上不是发展党员，而是“精党”政策，而是大量洗刷党员，延安与安塞近三年以来减少了二千多党员，这样现时党员在年龄上绝大多数在三十多岁以上(据估计占五分之四)，青年党员则很少，影响到党要提拔干部无对象。

在支部工作上，不是去研究典型表扬与奖励好的，批评不好的，使旁的支部来学习。

在组织形式上不去具体的研究现有的各种组织形式是否适合于人民的需要能否为人民服务，能不能执行党的政策，而是抽象谈论组织形式的问题。

由于组织工作的方针与各种政策的错误，形成了今天党务工作(组织工作)落后于旁的工作的最严重的现象。

(二)今后组织工作(党务工作)的方针，是把边区的党提高一步。

如何提高?有以下的方法:

1、总的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把干部、党员的思想打通，方法搞对。

(1)今后在一定的政策与方针之下，发扬党内民主，下级干部、党员有批评领导机关、干部的权利，上级有纠正下级错误的责任。

(2)抽调大批的干部到党校去学习，搞通干部的思想方法，把干部提高一步。

2、干部政策上，是使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打破资格，提拔与培养大批的干部，提拔的标准是看他为党工作呢还是为地位与个人。

3、发展党员，吸收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及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而且发展党的工作是一种经常工作。

4、对支部工作的研究。研究好与坏的典型，研究支部如何实现党的政策与决定。

5、对各种组织形式的研究。是要具体的研究哪一种组织形式能为群众服务，适合于群众需要，能否执行党的政策以此为标准。

(三)现时立刻需要做的几项工作：

1、具体的准备抽调大批的中上级干部到党校去学习。

2、研究如何发展党员，发展什么人，哪些地方发展，什么人去发展，给予下面以指示。

3、派人或去电各分区组织部调查研究几个典型的支部整理发表，并要剧团编成戏剧到边区各地排演。

4、研究合作社、骡马店一些党的工作，他的领导、组织形式。

5、收集材料，研究后重写整党的文件。

6、研究如何对干部党员的教育的方法。

边区的主要任务和作风问题

(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对我说是上了一课，也是“将了一军”。经过这次会之后，可能使西北局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指导工作更实际一些，更慎重一些。这次开会的方法很好，各地委、县委今后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来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

我讲两个问题：一是一九四五年边区工作的主要任务；二是工作作风问题。现在先讲第一部分。关于一九四五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毛主席已有指示，大家也讲了很多，现在我再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生产问题。

(一)粮食增加多少?数目不作规定，办法就是大家所讲的，要多施肥料，如积粪、搞沤泥、收草粪、搞骨灰、安厕所等；要多锄草；要除害，如用挖穀槎办法把虫除掉；要修水利，如修水漫地，打坝，打井等等。在可能开荒的地方，就应该开荒，一般的应该注意深耕细作。这些办法都是你们讲出来的，看各地具体情况，什么办法能多打粮食，就采用什么办法。

关于“耕三余一”，这个口号提出之后，有些地方已经做到了，个别的人还有超过的，像吴满有已达到耕一余三，但也有的地方还没有做到。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出发，如果你那地方没有荒地，也没有牛羊，做不到耕三余一，只能做到“耕四余一”，就按耕四余一去做；如果你那个地方条件好，不仅能做到“耕三余一”，而且能做到“耕二余一”，“耕一余一”当然更好。总之我们要想尽办法多打粮食，年年有余，达到储粮备荒的目的。

劳动力的组织，变工、札工也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地方、条件来做。能变则变，不能变则不变，可大可小，不能强迫。如春天下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情形各有不同。收割的时候一家男女老少都可上山，如有不需要也不愿意变工的，就可以不变。还有牛犊变工也要看具体情形去组织，像张家畔那样太平滩，可以十几犊牛变工耕地，

但如果只有三两垧地，也要组织那样大的牛犊变工，那么，不但农民不愿意，同时也是不应该的。锄草时候如果老百姓愿意变，就可以组织更多的变工队。总之，我们的变工是为了提高生产，适合群众需要，能变则变，可大可小。一切要按当地具体情况决定。那些机械的方式和强迫命令的办法必须坚决改正之。

农户计划有的地方不是根据老百姓的需要与自愿，而去用生硬的方法勉强老百姓订出、或代替他们订出，结果，搞的老百姓很麻烦，作用更是不大。农户计划决不可徒具表格或形式，而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因此就要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谈心商量，用什么方法多打粮食，用什么方法解决穿衣问题，用什么方法，防止牛羊发瘟。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最重要的在于帮助他们了解订计划提高生产的好处，使计划合乎实际，并有实现计划的具体办法，最好能在一个农村中找出经济情况不同的各种类型，并在他们中间找出一两个显著的例子(如贫农中农的上升，二流子的转变等)，和他们商订计划，并以这种计划的实例去影响和推动其他的人，不要用摊派的方式，到处去订。我想，用这种办法来代替普遍的订计划，群众不会感到麻烦，也不致流于形式。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际中继续研究和改进。

大家提到“不违农时”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在农忙时期应少动员，尽量的少开群众会，一般的不应集中训练自卫军。像延川分区某县去年六月锄草时集中训练自卫军干部，那就不好。有人问，为什么去年农忙时候动员几县的自卫军运粮呢？要知道这是因为从前方回来的一部分部队，住在深山里，若是不帮助一下，要他们自己的米，就不能同时进行生产，第二年打不下粮，问题就难解决了。所以去年那次的动员，是为了减少以后的动员。

关于培养劳动英雄的问题，首先要注意纠正给他们过多任务浪费他们时间的现象。如果什么工作，什么会都找劳动英雄，把他们的生产耽误了，那就很成问题。所以要注意，使他们把自己的生产搞好，才能给群众做榜样，给边区建设服务。对于劳动英雄，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经常帮助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做出成绩来。如果

他们发生了偏向和缺点，就要很诚恳的向他们说，你过去很好，但是某一点上还是有毛病应该改正。对区乡干部还要讲明，在你们区乡出现了劳动英雄，这正是你们的工作成绩，劳动英雄的光荣，给劳动英雄打锣打鼓，也就是给你们打锣打鼓；不要以为吹手不到你们门上，县长不来看你，就觉得“老子干了十几年革命，还吃不开，你倒吃的开”。劳动英雄和区乡干部要团结起来，不应对立起来，双方互相尊重，团结，和气，事情就好办了。应该知道，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结合起来才有力量，工作的效果才大。这点，要在区乡干部训练班上好好讨论。

(二)种棉织布。政府提议今年边区种棉四十万亩，这个数目字的提出，不是命令，而是和大家商量。去年边区种棉三十一万亩，棉花还不够用。请大家考虑一下，像陇东和关中的许多荒地，是否可以多种一些棉花。如果我们的棉田扩大到四十万亩，大体上棉花就可以全部自给。种棉是边区的一件大事，如果我们不种，边区就必须从外面输入棉花，这样，国民党内反动派就可时时捏着我们的脖子，阻碍我们经济发展。对于种棉要具体领导，不是把棉籽发下去，棉田数目一分配，就等于完成任务了。要和农民商量，使他们懂得种棉有利。不会种棉花的人，要请指导人。“打卡”很重要，去年打卡好的，一亩有收二十斤，以至四十斤以上的；打卡不好的，一亩只收三两斤。棉籽问题，特别是陇东和关中，要设法解决看哪种棉花适合，汉花呢？洋花呢？斯字棉呢？要事先准备好。

有了棉花，这要纺成纱，织成布。要组织人民纺好纱，织好布。比如老百姓为了自己穿，纺的纱织的布就好。为了出卖，纺的纱织的布就差。比如集合一批人，脱离家庭办小型织布工厂，就不如当成家庭副业自纺自织自用更适合。这些要按各地情况研究解决。我们的任务是要用很大力量帮助人民解决穿衣问题。

(三)产好盐四十万驮，由三边王、罗负责。这是有关边区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必须规定数目，并保证完成。

(四)积极合理的发展自给工业。我们过去办了不少纺织厂、纸厂、火柴厂、肥皂厂、军人铁厂等等，今后还要继续合理的发展。所制合理，就是要从各方面想办法，求得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比如原料出在那里，就在那里办工厂，麻出在三边，就在那里办纸厂，瓦窑堡办纸厂，瓦窑堡有铁矿又有炭井，就可以那里办铁厂，这样就可以节省许多运输费。目前我们办工厂的经验还很少，因此在开办时，要很好的研究，看这个地区有没有条件，办这件事合算不合算，办这件事对于边区经济能起什么作用。已经办了的今后可以办得更好些，以求不断改进。

(五)部队机关生产问题。去年部队收了八万石细粮，实际上不止这些，加上机关学校，十万石是有的，还有菜蔬和手工业，这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机关只工作，学校只学习，部队只练兵打仗，都不能搞生产，那么，我们最低限度就要再给人民增加十五万石公粮。今年公粮十六万石，再增加十五万石，一共三十一万石公粮，那就会使群众哇哇叫，事情不好办了。因此，机关部队的生产还要更加努力，不能放松。如果以为我们生产了两年就差不多了，那是不行的。战争时期还很长，要打败日本，没有吃，没有穿，什么也向老百姓要，那还行吗？如果我们解放区九千万人民都能丰衣足食，干部党员都整了风，我们永远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站在一起，那就有足够的把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分崩离析，我们这里则欣欣向荣，其根源就在这里。因此部队机关都要记住一条：哪怕明天出动，今天还要生产。因为我们的生产是为着自己的丰衣足食，为着减轻人民的负担，给人民做好事。假如有人以为自己生产的果实只能归自己享受，走的时候可以一脚踢掉，不移交公家，这是完全不对的，一个革命的同志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

关于某些医院、学校或训练班，就可斟酌的情形适当训练。

(六)关于节约问题。陈云同志已讲的很好，我只提一下，我们不但要爱惜公物，而且要反对各种浪费，假如说，我自己生产的，自己建设的，就可不加爱惜，随便挥霍，那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革命

的长期性，要看到人民的利益，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有长期的打算。

第二，民主问题

今年准备选举。选举的方法和时间，政府另行通知。选举的目的是为着更加健全我们各级政权机构，推广与深入三三制，使各阶层人民更加团结。应当选举什么人呢？应当选举为人民所拥护并能为人民服务的人，旧社会里那种马马虎虎，应付讨好，表面圆滑迁就，内心自私自利的，是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能选举这样的人，这是应当同区乡干部和老百姓都讲清楚的。

共产党员应当和一切赞成抗战与民主及热心服务于边区的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参加到三三制政权中的党外人士，不是摆样子，“坐冷板凳”，而是要经常和他们商量办事，倾听他们的意见，共同挑担子。假如有些事他们不赞成，我们还要和他们商量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要很好的接受，如果不对，也要耐心解释，不要马上给他们泼冷水。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在经济方面，减租减息一定要贯彻，另一方面也应照顾地主，要交租交息，负担过分的；也应酌量减轻。另外还要帮助他们办工厂、合作社等，使他们在经济上能有新的发展。

还有党内民主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作风，才能使党内生活更加活跃，使全党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加提高，思想行动更加一致，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中的民主生活，得到更有力的推动。这些问题，大家已开会座谈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今年党内各级组织是否普遍改进还要看情况决定，但是最低限度可举行部分改选，以取得经验。

此外关于练兵，统战工作，培养干部和文教工作，这几方面已经开过好多次会，还作了决议，发过指示，按照具体情况去办，我也不

讲了。

第二部分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当前主要问题，是今天要讲的中心问题。

首先应该估计一下，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中间，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某种缺点和错误。比如合作社摊派股金，群众不赞成硬要摊派，这就是主观主义作风的表现，就是错误的。我们许多同志承认自己有主观主义，但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如何，性质如何，程序如何，我们应当衡量一下。我们做的事情是人民赞成的，合乎大众利益的，所以是正确的，人民拥护我们，这是事实。但是也有一些事情人民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为什么人民还有不满，为什么我们费了很大力量，想替人民谋利益，而群众反有不赞成的地方呢？这就值得我们反省了。我们不能自满，不要以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不错，就宽容自己，而应该不断努力，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

区乡干部一般地说都很努力，很负责任，但还有不少叫苦的。叫苦有两种：一种是没办法，“解不下”；一种是事情多忙得很，一件事未完，另一件又来了。这个责任主要由谁来负呢？应当由上级来负，我是西北局负责人，应当首先由我负。下级“解不下”，应当帮他“解下”，这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迫使他们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性。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任务多，使区乡干部对整个工作抓不住中心。例如上面头脑多，部门多，一下子发下去许多指示表格，就使下面无从做起。要知下边的干部和老百姓，识字的很少，白天忙于生产，晚上还要睡觉，如果任务多了，他们除了随便敷衍应付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二)会议多。比如去年边区开了很多会，一般的说，这些会议

都开得不错，各有它的作用。但也有些会议不是采取慎重的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态度，会议应当解决什么问题，应当怎么开法，大家的准备酝酿还不深刻，以致效果不大。

(三)调查多，研究少。我们应当怎样调查?派一批人下去专门作调查是一种方法，各级干部平时在每一件工作上都注意调查，把本县、本区、本乡的经济、政治、文化、干部的情况和群众的情绪等等材料经常积累起来，这又是一种方法。如果县长、县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平时在工作中注意到各种问题，农村中怎样增加粮食，发展纺织，怎样养牛、养羊，怎样种棉、植树，干部情况怎样，群众有什么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过一个时期大家座谈一下，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就会很有帮助。如果只靠上边派工作团调查团下去，不是直接担负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并不实际参加解决问题，结果会使上边下去调查的人很苦，下边的人则感觉对他们没有帮助，或很少帮助，甚至反而增加麻烦，也不满意。当然这不是说调查团、研究室没有作用，不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应当以担负实际工作的同志，从日常工作中日积月累的调查研究为主，才更有裨益。

(四)跑腿多，用脑少。上边给的任务多，缺乏中心，接到一件又一件，有什么事就跑一跑，完全失去了主动性。这就是四多四少：任务多、开会多、调查多、跑腿多，主动少、检查少、研究少、用脑少，这中间最主要的是主动少，用脑少。

这个责任主要是上级的。但下边是否也有责任呢?不讲清这一条也不对，这叫偏向，假如上边有指示，在我这里行不通，就应当申辩。如果上级指示行不通，一不申辩，二不打招呼。采取应付态度，是不对的。上级的指示，除对个别问题的具体指示外，只能照顾一般的主要的情况，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各地的具体情况，因此接到上级的指示时，必须根据本地情况布置工作，党的政策要拿到群众中问去实现，假如行得通那就好，行不通就要改正，开始行通，以后又行不通，也要适当改正。毛主席说：“我们要坚持真理，随时准备改正与修改自己不确当的意见，不适合情况的言论、行动，政策要随时准备修改”。

就是这个道理。

上级指示要慎重，要估计到当时的具体条件，群众的需要以及干部的经验，最好先酝酿商量并仔细研究一下，再发出去就会少出乱子。另一方面下级服从上级是应当的，但服从组织不是盲目的服从。党的一切指示，都是给群众办事。其中可能发生毛病，有毛病就应当提出来，提出问题并不等于不服从组织，相反，这才是自觉的服从组织，我们对谁负责？为谁服务？如果一个指示对群众没有利益，就应当立刻改正，或者指示再好，群众还不觉悟，也要等待一下，这是正确的等待群众的觉悟，而不是“等待主义”的“等待”，在这种情况下给上边打一个招呼，是对党负责，不是闹独立性。

我们的区乡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参加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他们为了革命，离开自己家庭，生活很艰苦，工作很多，又有许多困难，如果还要骂他们，他们肚子里自然有气。所以我们对区乡干部应该寄予无限同情，应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多给他们以政策教育和工作方法上的指导。但是不是区乡干部所有毛病都要由上边负责任呢？那就不然，如下面个别的贪污，要私情，不讲道理，乱没收等，上边总没有教他这样做吧。另外一些老干部自以为主观上忠实于革命，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讲究工作方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常常采取强迫命令的简单办法，结果事与愿违，脱离群众。也还有一些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在主观上虽也愿意为群众服务，但他们常常把“为群众服务”的观点抽象化，而不能在实际行动中具体贯彻。这两种人也或多或少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的缺点，必须在帮助教育和提高觉悟之下，求得改正。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把一切责任都往上边推，那就会出偏向，于工作无补。

我同几个地委书记和专员座谈过两次，他们说对党的指示照抄、照转、照办的多，而仔细思考研究分析的比较少，西北局的指示有不切合实际，包含主观主义的地方，我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分区一级，县一级在接到指示的时候，是否仔细的研究过，并讨论如何在自己地区具体实现这个指示。如果没有这样做，那就是不对的，应当改正。

我们在工作作风问题上，单拿缺点错误来说，所犯的主观主义错误，其根源何在呢？就是由于我们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不了解或者说很少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甚至于不了解我们的干部。我们连我在内，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于农村环境和农民的情绪懂得一点，开始我们不很了解我们的干部。如果都懂得，为什么那时还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呢？在抗战初期也有一些同志不懂得农村，不了解依靠农村支持抗战的条件与重要性，更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所以，他们看不起农村，不赞成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不爱惜民力财力，以致过分消耗，引起后来财政经济的很大困难。我们许多同志，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对于边区的一般情况是了解的，对于内战时期的那一套也颇熟悉，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今天的边区环境在抗战时期领导农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必须了解边区是分散的农村，个体农民的生产技术非常低下，交通非常不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工作，假如我们性急，想一下子就把全边区的合作社和各种工厂都搞起来，结果是会办不到的。虽然从土地革命到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在农村中工作，但对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还很少，应该虚心学习，不要以为自己参加过长期的革命工作，当过什么什么，就觉得了不起，故步自封，不求进步。

别人把边区看作整个解放区的排头，但是我们自己要承认，建设边区的各项工作我们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我们，连我在内，千万不要背上包袱。包袱有各种各样，背上，就不会正视现实和真理，就会难于前进，或不能完全正视它们。把错误当成包袱背上，就不会改正它，把功劳当作包袱背上，也会阻止自己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富于热情和朝气，这是好的，但如果不重视实际，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热情和朝气这类的优点，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老干部有斗争历史，有实际经验，这是可宝贵的，但是自满自足起来，不学习，不求进步，那末，过去的经验和好的历史，反而会变成累赘。有的人，对自己所管的工作，好比太岁头上的土，不许别人动弹丝毫；有的人，强不知以为知，或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自以为是，故步自封；还有人，在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问题很多，但总是装一个没有问题的场面，把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挡回去。这类情形，也是思想上背着包袱，不去掉它，等于自己的双眼蒙蔽起来，看不见现实，发现不了真理的。所以必须去掉包袱。

此外，我们对于所有的干部，民政厅也好，组织部也好，各个部门也好，是不是那样清楚了解，如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情绪，他们心里有什么不满，如何提高他们等等，如果不清楚了解这些，我们怎样能把工作做得好呢？

今后怎样办？为了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干部，是不是边区一级的负责同志都跑到农村去呢？当然跑一跑也有好处，不过中心关键决定于你是否下了决心去了解，前天我找了几个地委书记座谈了五个钟头，我们谈到目前老百姓最赞成的是哪几件事？不赞成的又是哪几件事？为什么不赞成？这些都谈的很好，这是了解情况与检查政策的一种有效办法。有人说，我文化低不能了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否了解情况，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文化也有关系，但不是主要的。文化程度高的人，也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我们的干部主要的是要求他们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不断的努力学习中提高文化、提高自己。

第二，我要讲兴利除弊。就是说，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兴办，有害的事，我们就除掉。据几位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反映，老百姓称赞我们做的好事很多，主要有：抗日保卫边区好，生产好，没有土匪好，禁赌好，改造二流子好，减租好，农贷救济好，安置移难民好，机关部队生产好，看病好(医院给群众看病)，和气好(八路军不打人骂人)。老百姓既然赞成这些东西，每个同志就要看一看，你那个地方还有那样没办好，就办起来。除这些好事以外，在你那个地方老百姓还需要什么，还有些什么好事现在还没有办，就应该提出来和他们商量研究，看怎样办好。比如有些地方老百姓的娃娃养不活，县长、县委书记直到乡长、支部书记就要想个办法，把这件事情搞好一点。又比如老百姓的牛羊死的很多，就要想办法使牛羊少死一点。如果这样办，老百

姓一定喜欢。办的方法主要靠下面的干部，召集有经验的人谈一谈，我们上面办事也要听你们传来群众的意见，如果没有各级党、政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那我们就会悬在空中，无从着手了。总之，我们要解决群众新的要求，新的问题，要和他们商量解决，而不是强迫命令的解决。

目前边区内的事情，人民不赞成的，据说主要还有三件：

(一)不赞成合作社摊派股金。我们费了很大力量，召开合作社会议，想给人民办好事，办合作社，但是人民反而不赞成，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合作社容易不容易办？我们承认合作社是不容易办的。在分散的农村，个体经济的农民，他们还没有得到合作社的实际利益，就要他们拿出钱来，交别人替他们办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再加上我们的干部又没有经验，不了解合作社组织人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不会办合作社。这个时候提出家家人社，人人入股，必然要形成强迫命令，引起人民的反感。现在怎样解决？人民不赞成的合作社，股金应一律退还，并从此取得改进合作社工作的经验。有人说我们合作社已经办起来了，股金也集起来了，确是老百姓有些不满，还是继续搞下去。这种办法还是不妥当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条件，还不可能把所有的合作社办好，迟延不退，老百姓吃亏更大，他们将更不满意。自然，某些好的合作社群众不愿意退股的，应继续办下去，并设法办得更好。并于摊派股金一事，请你们回去对老百姓讲，这是过去我们搞错了，对不起大家，现在我们决定根据大家的意见来改正。

(二)不赞成某些税收机关和检查机关乱没收的现象。我收到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有些老百姓来延安控告说：他们从外边带进来的几块白洋及私用的镜子或几条毯子等因漏税，或违禁，也被没收了，表示很不满意，我想这类事情的发生，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个别税收人员和检查人员不懂政策，贪图小利；一是税收条例和检查条例上或许还有毛病，应当研究改正。我们坚决反对乱没收的现象，但食盐、粮食、棉花等是不是让它们走私不管呢？这几样东西如果任其走私，就会影响到全边区的金融和人民的生活，使我们不能战胜日寇和国民

党内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所以要严格禁止走私，不过在特殊情况下，一个贫苦的老百姓，因为不知道政府的法令，运一点粮食、棉花出境，如属初犯，也不应立即没收，但要向他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要禁止走私，不禁止对人民有什么害处，使他懂得不要再犯禁令。在区乡干部训练班、自卫军训练及春节闹社火时，都可讲明这些道理。

(三)不赞成有些地方的运盐运动。我们过去动员运盐对不对呢？过去是对的，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的生产又没发展，若是不驮出盐去，边区的部队和机关人员，就要饿死冻死，所以那时的动员运盐是不得已的。现在我们边区的经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对食盐的产、运、销诸问题，都有了一些经验，和过去情况不同了。今天老百姓不赞成动员运盐，我们就取消这一条，要他们自愿地运。

除此以外，要时常问老百姓，看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政策还有什么不满。人民是我们的上司，我们是他们的勤务员，是给他们办事，给他们谋利益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我们就要考虑，并设法改进。

第三，领导干部要打开脑筋多想问题。我们的工作有许多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更冷静、更清醒的去研究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和偏向，必须记住我们的工作，有许多缺点，还有错误，不能有丝毫骄傲自满和粗心，对每一件工作，都不能草率从事，首先要估计到“民情”：民间的情况如何，人民是赞成还是反对，是否适合于当地情况，即使适合而人民的经验又如何，觉悟程度如何，他们能否接受，有无困难。其次要估计到“己情”：自己的主观力量如何，干部的认识和能力如何。第三要估计到“上情”：上级如何指示的，为什么这样指示。最后还要估计到“敌情”：就是敌人所给予我们的困难和破坏。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去，就可少犯错误，把事情办得更好。打开脑筋的另一重要方法，是每一问题的讨论，要经过酝酿和准备，一个大的政策，大的问题，不忙于由一个人心血来潮的做一篇大报告。这样往往会不切实际，发生毛病，最好先经过不拘形式的交换意见。设想我们这样做，人民会持什么态度，非党人士会怎样，尤其要让别

人多提反面的意见，多谈、多想、多酝酿，就会深刻、周到，更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这样酝酿成熟的问题，再拿到大会上讨论，就会更适当更有效果。所以各种大会，要先有少数核心经常钻研问题。过去那种在会前无充分准备，临时集中几百人去找材料摸经验，结果不仅会议本身工作做不好，而且会打烂一切，妨碍其他部门的经常工作，这种方式应当改变。

对于党外人士，必须诚心诚意的同他们商讨工作，研究问题，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到共同负责，实际上有职有权。凡是党员干部中在这方面有缺点，都须自动改正。

第四，今后工作我们只指示一般的方向，如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任务，就交给你们放手去办，孰先孰后，由你们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自己决定。你们的手脚是放开了，担子也放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不断观察情况，多想办法，在工作过程中时时倾听群众意见，发现偏向，立即纠正，当然这并不是说上面发出指示后，就不管了，我们和大家一样，都要时时注意工作的改进，这种办法不是减轻领导，而正是加强领导。

第五，去年在靖边、米脂、郃县等处都开过一些村民大会，这个办法很好。村民大会是我们决议和指示的一面镜子，决议和指示是否正确，必须拿到群众中间去实践，才能看得出来。要使村民大会开得好，首先要求领导开会的干部，懂得开会的作用，并作事前的酝酿；其次要老百姓把心里的话，满意的不满意的都讲出来，满意的事情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不满意的我们应该改正，发动群众尽量批评工作中的缺点；要使村民大会真正能解决群众中的实际问。

有些同志觉得村民大会上让群众随便批评，会丢掉领导上的面子，以后不好办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要提倡人民来“顶”，我们要准备丢掉一些不适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共产党是给人民作事情，给人民谋利益的，凡是不合乎人民的利益，人民大众不赞成的决议、指示，都是错误的。如果错了，老百姓“顶”是对的，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上司，他们不要这东西，提出意见来了，我们就应该接受，在干部中间要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要和老百姓商量办事，随时准备抛弃自己不适当的意见。比如延川某区的老百姓自己办了一个轧花合作社，那里的干部一定要另外摊派股金办一个大合作社，这就不对。我们应该丢掉摊派股金的大合作社，赞成轧花合作社。如果这样是不是就会丢了干部的面子，将来工作就不好做了呢？那是不会的。

共产党除了真理和老百姓以外，再没有不可丢掉的东西；我们给人民服务，人民不赞成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丢掉呢？你把事情办错了，老百姓批评你，就把你的面子丢掉了，那么你这是什么面子呢？这是假面子，在人民看来是很丑的面子。把这个面子丢掉，另换一个面子，那才是真面子，人民所喜欢的面子。如在这次会上我自己和林主席、罗达同志等都进行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我们准备把一切不合乎实际，不合乎老百姓要求的东西丢掉，丢掉这些东西，就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好起来。要知道我共产党员是不怕揭露错误的。只要能改正我们的错误，在错误中示是否正确，必须拿到群众中间去实践，才能看得出来。要使村民大会开得好，首先要求领导开会的干部，懂得开会的作用，并作事前的酝酿；其次要老百姓把心里的话，满意的不满意的都讲出来，满意的事情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不满意的我们应该改正，发动群众尽量批评工作中的缺点；要使村民大会真正能解决群众中的实际问题。

有些同志觉得村民大会上让群众随便批评，会丢掉领导上的面子，以后不好办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要提倡人民来“顶”，我们要准备丢掉一些不适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共产党是给人民作事情，给人民谋利益的，凡是不合乎人民的利益，人民大众不赞成的决议、指示，都是错误的。如果错了，老百姓“顶”是对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上司，他们不要这东西，提出意见来了，我们就应该接受，在干部中间要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要和老百姓商量办事，随时准备抛弃自己不适当的意见。比如延川某区的老百姓自己办了一

个轧花合作社，那里的干部一定要另外摊派股金办一个大合作社，这就不对。我们应该丢掉摊派股金的大合作社，赞成轧花合作社。如果这样是不是就会丢了干部的面子，将来工作就不好做了呢？那是不会的。

共产党除了真理和老百姓以外，再没有不可丢掉的东西；我们给人民服务，人民不赞成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丢掉呢？你把事情办错了，老百姓批评你，就把你的面子丢掉了，那么你这是什么面子呢？这是假面子，在人民看来是很丑的面子。把这个面子丢掉，另换一个面子，那才是真面子，人民所喜欢的面子。如在这次会上我自己和林主席、罗达同志等都进行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我们准备把一切不合乎实际，不合乎老百姓要求的东西丢掉，丢掉这些东西，就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好起来。要知道我们共产党员是不怕揭露错误的。只要能改正我们的错误，在错误中学习，并力求进步就好了。

第六，听说某县某区一位负责同志骑马去检查工作，摆着架子意欲表示：“上级来了”，使下面好尊敬他，但结果下面的同志反而感觉，你又不是“团总”，何苦这样呢？过去团总下乡，才耀武扬威地骑着马、背着枪，吓唬老百姓。若是我们的干部这样做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所得到的不是尊敬，而是鄙视。试想一下，对老百姓摆“上级”架子，有多大味道呢？另外听说有人下去工作要吃中灶饭，要吃偏食，但下边是没有中灶的，我想高粱饭吃一点也不会死人。从前有一个什么皇帝，出去吃了一顿高级饭，觉得很好吃，回来叫厨子又做吃了一顿，但总不如那次好吃，于是说厨子不好，一连杀了几个厨子，以后有人告诉他，第一次好吃是因为“饥不择食”的缘故。我看我们的干部，如果到乡下吃不惯老百姓的粗米淡饭，就饿他们两天，管保吃下去了。

本来与老百姓艰苦，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由于情况的变化，与边区的经济的发展，在少数干部中发生了一种不愿吃苦、脱离群众的偏向，要求我们警惕，注意帮助和教育这些干部，纠正这种偏

向。

总之，各级干部都要了解情况，打开脑筋想问题，时时刻刻替人民兴利除弊。

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

各位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战斗英雄们：

去年一年，由于你们的带头和推动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使得粮食棉花的增产，机关学校和工厂工作的改进以及军队的练兵生产等各种运动，都有很大的成绩，并且发现许多创造。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比较前年更前进了一步，深入了一步。各方面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大的增加了，模范单位也相应出现。

目前我们能不能说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运动已经普遍展开了呢？如果按各种业务看，七十二行，每行都有英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雄运动已普遍展开。但从每一行每一业范围的全面来看，那么运动又尚在开始。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如果说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三十万以上，其中像吴满有、刘玉厚、石明德、张振财、贺保元等农业劳动英雄并不多，还不是每乡都有，每村都有。像杨正兴、郭秉仁等植棉英雄更少，有些地方群众还不种棉花，不会打靶，甚至有一垅只收几斤的。而工厂生产中像沈鸿、赵占魁、袁广发等英雄多不多呢？在部队练兵运动中像张治国、段全才等英雄多不多呢？在妇女编织事业中像刘老婆等英雄多不多呢？模范工作者像张子良、仝万明的多不多呢？模范乡村和模范的班、排、连多不多呢？应该承认，都还不多。

所有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其事业的性质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为建设边区服务的，对边区建设都有功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各种模范单位，都是十全十美，毫无缺点了，相反的应该看到，我们的事业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各方面的缺点还不少。因此我们绝不应自满而应常抑制自满继续努力。

大家在这里开了会，回去以后作些什么事呢？我提一点意见请你们考虑和研究：

农村里的劳动英雄，最主要的就是要增加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推广纺织，解决穿衣问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改进新作法，多施肥，细耕，多锄草，除虫害，修水利，以及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开荒，扩大植棉面积。选择适当的棉地和种子，对没有种过棉花的地方，应请有经验的人去指导，教会群众如何种法，如何打靶，争取今年全边区生产棉花四百万斤，有了棉花就要动员自己家庭的妇女纺纱，织好布，以推动普遍的妇女纺织运动，逐渐做到布疋自给。

工厂里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要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目的，就应改进技术，把劳动力组织得更加合理。如瓦窑堡焦煤，有铁矿，就应在当地采煤，开炼铁厂，以免运输力的浪费。一切工作都要多和工人商量，订出计划，经常检查研究经验，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部队的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要组织生产、练兵习武，更加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要更加亲密团结。

机关的模范工作者要精通业务，学习政策，提高工作效能，爱惜公物，厉行节约。

所有的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都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稳步前进。以自己的事业去影响别人，以自己的经验去带动别人，创造更多的模范乡村，模范工厂，模范班、排、连以及各种模范单位，推进集体的英雄事业。

怎样进行工作，用什么办法完成以上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建设边区，替人民谋福利，因此首先必须注意群众情绪的反映，他们有什么要求，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必须善于从当地的情况出发，具体的给老百姓办好事，去掉工作中的毛病。总之，就是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比如我们帮助老百姓多打粮食，多种棉花、纺纱、织布；制造血清疫苗，防止牲畜疾病，减少牛羊死亡率；提倡卫生，修厕所，刷窑洞，开大窗户，人畜分居，公家医院给群众看病，办助产训练班，到农村中去接生，减少婴儿死亡率等。一般的讲，这些都是好事，需要兴办。并且一定和群众商量，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决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办合作社也是一件好事和大事，但是我们处在分散的农村，群众的私有观念很浓厚，干部又缺乏经验，合作社的好处许多老百姓目前还不相信，如果我们要家家入股，人人入社，强迫指派股金，结果是事与愿违，引起群众的反对的。因此凡是对老百姓有利又为老百姓所赞成的事就办，不赞成的就不办；有些好事如果老百姓一时还不赞成，也暂且不办。总之我们要善于等待和提高群众的觉悟。至于工作中的毛病一经发现就应认真改正。今后合作社绝对不能摊派股金，已摊派者，群众愿意退股的应坚决退股。为群众服务，不决定于主观愿望，最重要的是检查效果；不在于表面铺张，也不在于形式的大小如何，而要看他的实际作用。比如组织变工队，不只是看有了百分之九十或者全体劳动力参加，就算成绩，而主要的是看变工队能增加多少粮食，节省多少时间。变工队应按照一定的地方、时间、条件去组织，能变就变，不能变就不变，可以大变，也可以小变，如春耕、夏耘、秋收情况各不相同，秋天收割时，群众习惯，全家男女老少都上山生产，不愿变工时，就可不变。夏天锄草时可以较普遍的组织变工。春天组织牛犊变工也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如在张家畔草山梁的平滩上，土地集中，可以组织大变工队。而如果只二三垧地，也要组织同样的变工队，就是浪费劳动。同时还要照顾到牛的好坏，如安塞一个地方好牛和弱牛在一起变工，变了三天，把弱牛变垮了，病了半月，不能耕作，所受损失比变工得到来的利益更大。再如农户计划，有些地方由于方式不好，

使百姓感到麻烦，甚至认为又是政府要给他们增加负担，采取应付态度，不愿讲老实话，结果只是照样填表，流于形式，作用不大，今后是否普遍的逐户制订，还可研究。最好多用商讨的办法，如把生活状况，劳动力及生产条件等大体相同的农户分为几种类型。在每种类似的人家中找出典型，研究他用什么办法，增加了粮食、棉花的生产，使生活能逐渐上升，然后再把全村或每种类型的附近群众集合在一起座谈商量，用生动的如何能把贫农变成中农，中农变成富农等发展生产的具体事实，使大家了解订计划的作用，影响大家学习模范典型的办法，提高生产，这就是在实际上给他们订了农户计划。有了好的榜样，就可以发动群众自愿起来这样做。

其次，在工作方式上要发扬一技之长，不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以及普通群众，只要有一点长处，一点创造，就应表扬，更加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世上没有一个七十二行样样精通的万能英雄，只要积累成千成万群众的各种创造，就会更加推进全面建设边区的事业。如果相反的，事实把许多英雄的创造集中起来，定出一个最高标准，限定时间，要用高的标准普遍比，要所有的群众都向这个标准看齐，结果就会使群众望而生畏，不能提高他们情绪和信心，势必产生强迫命令。因此主观上希望一下子把一切事情都办发，结果一定是“欲速不达”，实际上也是一种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群众的工作作风。

第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要更加团结，不能骄傲自满，不要以为自己当了英雄就和群众不同，就能命令群众，指挥群众。去年有个别英雄在边区开了劳动英雄大会以后，以为自己得了奖，和毛主席握过手，于是背了一个“劳动英雄”包袱，不和群众商量办事，不尊重边区干部，盛气凌人，甚至群众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把群众捆了起来，使得群众害怕，因此今年群众就不再选这些人来当英雄了。英雄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才能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英雄是群众公认的，而不是自封的。英雄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不要英雄一时，而要年年当英雄，英雄一世。

最后，我们的干部和领导同志应该深入下层，懂得改造农村，提高农民，建设边区，建设国家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不断的摸索，时时注意情况的变化，照顾到当地的情形，干部的经验 and 能力，以学习的态度，慎重的加以分析研究。对任何工作，不求表面的形式的铺线，而在检查其效果和内容的。我们要常常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发扬群众的民主，使他们敢于大胆的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意见。我们除了真理和群众以外，没有任何不能丢掉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培养和教育英雄，更加发挥英雄的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使领导者和英雄及群众更加结合起来，共同前进。

关于一九四五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毛主席已有指示，大家也讲了很多，现在我再说明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 生产问题

(一)粮食增加多少?数目不作规定，办法就是大家所讲的；要多施肥料，如积粪搞沤泥、收草粪、搞骨灰、安厕所等；要多锄草，要除害，如用挖谷槎办法把蛤虫除掉；要修水利，如修水漫长地、打坝、打井等等。在可能开荒的地方，就应该开荒，一般的应该注意深耕细作。这些办法都是你们讲出来的，看各地具体情况，什么办法能多打粮食，就采用什么办法。

关于“耕三余一”，这个口号提出之后，有些地方已经做到了，个别的人还有超过的，象吴满有已达到耕一余三，但也有的地方还没有做到。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出发，如果你那地方没有荒地，也没有牛羊，做不到耕三余一，只能做到“耕四余一”，就按耕四余一去做；如果你那个地方条件好，不仅能做到“耕三余一”，而且能做到“耕二余一”、“耕一余一”当然更好。总之我们要想尽办法多打粮食，年年有余，达到储粮备荒的目的。

劳动力的组织，变工、扎工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地方、条件来做。能变则变，不能变则不变，可大可小，不能强迫。如春天下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情形各有不同。收割的时候一家男女老少都可上山，如有不需要也不愿意变工的，就可以不变。还有牛犊变工也要看具体情形去组织，像张家畔那样大平滩，可以十几犊牛变工耕地，但如果只有三两垧地，也要组织那样大的牛犊变工。那末，不但农民不愿意，同时也是不应该的。锄草时候如果老百姓愿意变，就可以组织更多的变工队。总之，我们的变工是为了提高生产，适合群众需要，能变则变，可大可小。一切要按当地具体情况决定。那些机械的方式和强迫命令的办法必须坚决改正之。

农户计划有的地方不是根据老百姓的需要与自愿，而去用生硬的方法勉强老百姓订出、或代替他们订出，结果，搞得老百姓很麻烦，作用更是不大。农户计划决不可徒具表格或形式，而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因此就要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谈心商量，用什么方法多打粮食，用什么方法解决穿衣问题，用什么方法，防止牛羊发瘟。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最重要的在于帮助他们了解订计划提高生产的好处，使计划合乎实际，并有实现计划的具体办法，最好能在一个农村中找出经济情况不同的各种类型，并在他们中间找出一两个显著的例子(如贫农中农的上升，二流子的转变等)，和他们商订计划，并以这种计划的实例去影响和推动其他的人，不要用摊派的方式，到处去订。我想，用这种办法来代替普遍的订计划，群众不会感到麻烦，也不致流于形式。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际中继续研究和改进。

大家提到“不违农时”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在农忙时期应少动员，尽量的少开群众会，一般的不应集中训练官卫军。象延属分区某县去年六月锄草时集中训练自卫军干部，那就不好。有人问：为什么去年农忙时候动员几县的自卫军运粮呢？要知道这是因为新从前方回来的一部分部队，住在梢山里，若是不帮助一下，要他们自己背米，就不能同时进行生产，第二年打不下粮，问题就难解决了。所以去年那次的动员，是为了减少以后的动员。

关于培养劳动英雄的问题，首先要注意纠正给他们过多任务浪费他们时间的现象。如果什么工作，什么会都找劳动英雄，把他们的生产耽误了，那就很成问题。所以要注意，使他们把自己的生产搞好，才能给群众做榜样，给边区建设服务。对于劳动英雄，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经常帮助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做出成绩来。如果他们发生了偏向和缺点，就要很诚恳的向他们说：你过去很好，但是某一点上还是有毛病应该改正。对区乡干部还要讲明：在你们区乡出现了劳动英雄，这正是你们的工作成绩，劳动英雄的光荣也就是你们的光荣，给劳动英雄打锣打鼓，也就是给你们打锣打鼓；不要以为吹手不到你们门上，县长未来看你，就觉得“老子干了十几年革命，还吃不开，你倒吃到（得）开”。劳动英雄和区乡干部要团结起来，不应对立起来，双方互相尊重，团结，和气，事情就好办了。应该知道，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结合起来才有力量，工作的效果才大。这点，要在区乡干部训练班上好好讨论。

(二)种棉织布。政府提议今年边区种棉四十万亩，这个数目字的提出，不是命令，而是和大家商量。去年边区种棉三十一万亩，棉花还不够用。请大家考虑：象陇东和关中的许多塬地，是否可以多种一些棉花。如果我们的棉田扩大到四十万亩，大体上棉花就可以全部自给。种棉是边区的一件大事，如果我们不种，边区就必须从外面输入棉花，这样，国民党内反动派就可时时捏着我们的脖子，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种棉要具体领导，不是把棉籽发下去，棉田数目一分配，就等于完成任务了。要和农民商量，使他们懂得种棉有利。不会种棉花的人，要请指导人。“打卡”很重要，去年打卡好的，一亩有收二十斤，以至四十斤以上的，打卡不好的，一亩只收三两斤。棉籽问题，特别是陇东和关中，要设法解决；看哪种棉花适合，汉花呢？洋花呢？斯字棉呢？要事先准备好。

有了棉花，还要纺成纱，织成布。要组织人民纺好纱，织好布。比如老百姓为了自己穿，纺的纱织的布就好。为了出卖，纺的纱强的布就差。比如集合一批人，脱离家庭办小型织布工厂，就不如当成家

庭副业自纺自织自用更适合。这些要按各地情况研究解决。我们的任务是要用很大力量帮助人民解决穿衣问题。

(三)产好盐四十万驮，由三边王、罗负责。这是有关边区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必须规定数目，并保证完成。

(四)继续合理的发展自给工业。我们过去办了不少纺织厂、纸厂、火柴厂、肥皂厂、军工铁厂、瓷窑等等，今后还要继续合理的发展。所谓合理，就是要从各方面想办法，求得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比如原料出在哪里，就在哪里办工厂，麻出在三边，就在那里办纸厂，瓦窑堡有铁矿又有炭井，就可在那里办铁厂，这样就可以节省许多运输费。目前我们办工厂的经验还很少，因此在开办时，要很好的研究，看这个地区有没有条件，办这件事合算不合算，办这件事对于边区经济能起什么作用。已经办了的今后可以办得更好些，以求不断改进。

(五)部队机关生产问题。去年部队收了八万石细粮，实际上不只这些，加上机关学校，十万石是有的，还有菜蔬和手工业，这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机关只工作，学校只学习，部队只练兵打仗，都不能搞生产，那末，我们最低限度就要再给人民增加十五万石公粮，今年公粮十六万石，再增加十五万石，一共三十一万石公粮，那就会使群众哇哇叫，事情不好办了。因此，机关部队的生产还要更加努力，不能放松。如果以为我们生产了二年就差不多了，那是不行的。战争时期还很长，要打败日本，没有吃，没有穿，什么也向老百姓要，那还行吗？如果我们解放区九千万人民都能丰衣足食，干部党员都整了风，我们永远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站在一起，那就有足够的把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分崩离析，我们这里则欣欣向荣，其根源就在这里。因此部队机关都要记住一条，那怕明天出动，今天还要生产。因为我们的生产是为着自己的丰衣足食，为着减轻人民的负担，给人民做好事。假如有人以为自己生产的果实只能归自己享受，走的时候可以一脚踢掉，不移交公家，这是完全不对的，一个革命的同志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

至于某些医院、学校或训练班，就可斟酌情形适当调剂。

(六)关于节约问题。陈云同志已讲的很好，我只提一下，我们不但要爱惜公物，而且要反对各种浪费，假如说，我自己生产的，自己建设的，就可不加爱惜，随便挥霍，那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革命的长期性，要看到人民的利益，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有长期的打算。

第二、 民主问题

今年准备选举。选举的方法和时间，政府另行通知。选举的目的是为着更加健全我们各级政权机构，推广与深入三三制，使各阶层人民更加团结。应当选举什么人呢？应当选举为人民所拥护并能为人民服务的人，旧社会里那种马马虎虎，应付讨好，表面圆滑迁就，内心自私自利的，是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能选举这样的人，这是应当同区乡干部和老百姓都讲清楚的。

共产党员应当和一切赞成抗战与民主及热心服务于边区的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参加到三三制政权中的党外人士，不是摆样子，“坐冷板凳”，而是要经常和他们商量办事，倾听他们的意见，共同挑担子。假如有些事他们不赞成，我们还要和他们商量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如果对，我们要很好的接受，如果不对，也要耐心解释，不要马上给他们泼冷水。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在经济方面，减租减息一定要贯彻，另一方面也应照顾地主，要交租交息，负担过分的，也应酌量减轻。另外还要帮助他们办工厂、合作社等，使他们在经济上能有新的发展。

还有党内民主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作风，才能使党内生活更加活跃，使全党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加提高，思想行动更加一致，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中的民主生活，得到更有力的推动。这些问题，大家已开会座谈过，这里就不多

讲了。今年党内各级组织是否普遍改选还要看情况决定，但是最低限度可举行部分改选，以取得经验。

此外关于练兵，统战工作，培养干部和文教工作，这几方面已经开过好多次会，还作了决议，发过指示，按照具体情况去办，我也不讲了。

在历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这些问题都是十年以前的事。十年以前的事，为什么现在又提出来呢?不是很奇怪吗?但是，这问题不得不提出来。因为高干会做了结论，除了几个未参加的，其余的大家都很清楚，对于路线搞清楚了。高干会以前许多人是盲目的，因为那时候人家把以刘志丹为首的路线叫“右倾取消主义”。

高干会做了正确的结论，把这个帽子抹掉了。但高干会后，仍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这个正确的结论，就不同意这个意见，说什么“不是路线斗争”等等，就到处讲。结果，使大家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怀疑。没有到会的人说，“这个历史总结是不是有错误?是不是歪曲历史?是不是历史问题解决了?人事问题解决了?作风问题解决了?”就是说：西北局今天路线有错误。过去只有朱、郭是正确的，刘是错误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处来讲；一直到七大，还发生了很大的风波，还有说什么不敢开座谈会等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据，以混淆视听。因为这些问题，不得不座谈，所以有了这次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弄清是非，搞通我们的思想，克服分歧，以求达到团结。

座谈会开了三十六天，开得很好。开的方式，采取了“放手的民主，不集中”，使大家无论有什么都可以讲出来，只要不骂人，不发

脾气，尽量的讲。开得结果，大家都认为高干会的结论是正确的。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一般的都有了自我批评与反省，检讨了自己从前怎样钻空子，怎样搞的不对，也认为是对的。正确的同志原来就知道这一回事，因为亲身参加了这个斗争，更清楚认识了历史斗争的过程。结果，使正确路线更加阐明，错误路线更加揭露，使党内团结更有保证。

我的讲话是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问题，加以概括的说明。

一、 历史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有人提出：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企图想推翻历史的结论。他们提出了什么论据呢？其论据，郭洪涛提出四条。

一种说法是：

历史不公，朱未来以前，我的路线正确为主，错误是次要的……，不然为什么红军能扩大，苏区为什么能发展呢？这证明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还有一种说法：

他说，刘、高接到北方局的三万五千字的一封指示信，拍手叫好，并称“伟大”。还说：你们执行的还不是和北方路线一样？我们也执行这个，还不都是这指示里的一大堆。（这些都是他在党校支部讲话中

讲的，记录上有，不是我捏造的。)

第三个论据是什么呢？

是闫家瓜子会议，说刘、高到了闫家瓜子，自己报告了几天。在党校也说过，“刘、高报告他自己如何是右倾取消主义，如何是富农路线，如何是逃跑路线，如何是机会主义。”讲的这些，那不是见鬼了吗？谁愿意给自己带上一个机会主义帽子？不是这样一回事！他说：“你们自己讲的，我们只是收集起来，把本子交给北方局，我并没有做坏事。”

第四个论据：

“王家湾会议，刘、高批评我们为富农路线，你们这是右倾”。

从这四个论据里看出，他们不敢公开的提出来，说高干会那时候路线“我不同意”。他不这样提，他是找这个同志谈一点，在这个会议上扯出来讲一些，又在那个会议上讲一些，这些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事实。我在下面会讲到的，他自己不讲，他说“不是事实，是钻空子。”又有一种说法：

“过去有什么正确路线，西北红军搞起来，还不是糊里糊涂。什么政策，路线，我就不大懂。”同志们！怎么样就是盲目性？不自觉，乱干起来的？！那很难设想。何况你不自觉，会有人自觉的；还有人这样的主张：“高干会以后，我就不承认什么正确路线”。

还有人说：

“高干会是‘御用’的，中央走以后，陕北党会分家的。”就是说，中央是宗派主义，高干会是中央“御用”的高干会；现在中央在

这里，不能展开争论，中央走后，可以展开争论。说“高岗不敢在七大以前召开历史座谈会，怕当选不上中央委员。”这个话，说这个历史里头有鬼，我脑子里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梦。还说“历史自然会给高干会的结论作总结的。”所谓高干会的历史，就是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抹掉，换了一顶帽子，给朱、郭带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们的总结，就是要解决这个东西，想再把这个帽子还给刘、高、张、习带上，来作为他们各方面活动的理论根据。

照这样说来，郭洪涛还这样说：“我们并没有完全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只是有不得当的。我们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群众工作是正确的，我们想，今天的中国革命主要是军事斗争，那么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北方局的指示，我们没有先全执行，相反的，刘、高拍手叫好，并连称“伟大”。那就是说，刘、高是错误了，变成了左倾机会主义，我们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过去你写的文章，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军事路线，你们是对的。那么现在又没有“什么路线”，那也很奇怪。

照你这样的说法，或者他们对，或者刘、高错，或者大家还是糊里糊涂，历史上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那么，高干会就不存在这问题。也就是说，高干会的结论是冤枉了好人，打击了好人，那不是中央御用的宗派主义吗？问题是这样的提出。

但历史实践证明：两条路线过去是存在过的，斗争是千真万确的。今天的分歧，实质上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红二团以前的路线斗争：

这里只简单扼要把几个关键地方讲一下，以及在关键地方双方的争论，提出来就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大家就可以清楚。琐碎历史的问题不讲，什么沟沟、渠渠、三道川啦、二道川啦，闫家飒子会议，大

家就会说我们就不懂你们这些，大家感觉到麻烦。关于西北党的斗争史(或称西北革命斗争史，或称边区革命斗争史)也搞了几年，以李卓然为主编，现在已有了初稿，比较详细，且不讲他。现在就讲有没有路线斗争。

他们说：“西北党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我们看，在大革命后期反对陕甘边党委书记耿炳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叫不叫路线斗争呢？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这叫不叫斗争呢？那时刘志丹、邓小平在西安，刘伯坚作政治部主任。虽然这样，但我们不懂得拿枪，只害怕拿枪把冯玉祥搞垮怎么办。冯说：革命的左边来，跟总司令来，而我们就实行了这个东西。后来在郑州会议，来了一个叛变，便杀的一塌糊涂，这不是耿炳光的投降主义吗？我们也和他做了斗争。还有，反对李立三路线，以杜衡为代表的，是他们曾经要在陕北组织一个军，给赵伯平一个指示。当时，我也在那里工作，秀山也在那里。在这里组织一个军不成，为什么呢？因为有渭华暴动的失败，清涧暴动的失败，旬邑暴动的失败，整个的这几次暴动都失败了。怎么能够成呢？比如，一个驴子，你赶上它，到××路跟前，你吆喊一声“嚯雌！”他就回过来的(笑声)，何况一个人搞了三四次，所以感觉到那时没有把握，什么改成行动委员会，难道这不叫斗争吗？还有以后反对张文华、张资平、李庚的右倾。在三一年时，杨虎城入关，名义上说陕人治陕，这时农民经济稳定，因为二八年遭了最大的年馑，蒋、冯、闫战争在继续，国民党搞什么合作社，井惠渠……(未听清楚)；你们搞游击战争，就是土匪流寇，这不叫斗争是什么呢？在这个斗争中，陕西省委决定在桥山建立根据地做基础，以五个旅，王志远的一个旅，石子筠的一个旅，刘保堂的一个旅，这时还有秀山、贺晋年、习仲勋一个旅，冯钦哉一个旅，还有刘志丹利用一个旅的名义(苏雨生把刘志丹放出来，到陈国璋部下编了一个十一旅)。刘利用苏雨生和陈国璋的矛盾，编一个旅后，省委派了大批干部建立组织，在军队中活动，准备建立桥山根据地；建立好以后，准备几路暴动。以后被土匪高广仁打垮，但是部队还存在。假使不反对他们，就不能打游击战争。这事能不能成功？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叫反右不叫呢？在反帝同盟军以前，

有些同志说“我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他把整个的人民斗争都不管，却把“我”字放在第一位，要把最小的距离，放在第一位，红彦同志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人。

(一)红二团时代：

三一年十月底成立反帝同盟军，到三二年二月改为陕甘工农游击队，到三二年十二月杜衡来改为红二团，三三年六月间，二十六军主力失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从三二年十一月到杜衡到达，到三三年七月，这时是不是路线斗争，我讲几件事。杜衡当时怎样的估计。杜衡及部分人主张，日本人打进来，九一八事件以后，杨虎城派人找我们。而我们说这是投机分子，因此以后他便和四方面军订立协定，便看不起我们，因我们只有二百来人。那时四方面军开去西安，离城只有五十里路，离的很近。另外他说四方面军联合共同来搞胡宗南，但是他们又说是军阀投机。在赵××、孙××在陕西省委当书记时，今天看来，他的主张比较明确，而杜衡他们犯了左的毛病，不主张和抗日这些军官联络，而主张打倒一切。张汉民、王泰吉、吴勉之，这些人都是比较进步的，过去和我们有关系，他们认为“勾结军阀”，说长说短，反对保护我们伤兵的、给我们送子弹的、配合我们作战的，并且反对民团夏老儿，反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说我们是“勾结军阀”。这样模糊群众的认识，象这些例子多的很，在政治上打倒一切，不要说统一战线。

在群众运动中的过左政策，分中农的粮食。所谓发动五县人民到香山寺去分粮，周围老百姓都来分粮，结果分的没有了，杜衡便把中农的粮分了。恐怕与群众的情绪有关，结果把中农粮一分，中农便都跑了，结果使苏区搞垮。还有那时候要破除迷信，便火烧香山寺，使得很多老百姓都不满意。寺里边能驻一个师，进在山里头，都找不到，有很多漂亮的松柏树，结果都烧掉了，使得以后老百姓说，红军不好

的很，对我们表示不满意。

在军事政策上是攻坚，打庙湾，打碉堡战。这次秀山挂花，曹盛荣打死，后来没有打开，有带彩的伤兵都杀掉。另外，还有这样的布置，要打通国际路线，这打通国际路线根据什么呢？自己已有三百多人，要从耀县打到莫斯科(笑声)。自己就不估计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山里头老百姓对立起来，和同盟军没有搞好关系，一方面老百姓都不满意，另外，又不能立脚。要立脚是很困难的，不要说打到莫斯科，就打到边界也是很困难的。

他们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他们要在新字区、武字区、里马、高门建立根据地，这些地方是一块很大的平原；他们说这些地方人烟稠密，有党的工作。的确新字区、武字区是人烟稠密，可是离西安仅有二十多里地，人家的汽车每天到处开，你就不能立足，但他们说山地不能建立根据地。

杜衡对干部在组织上采取的是打击政策，红彦同志讲的是事实，但是有一点讲的不老实。首先就是打保安，队委决定志丹、红彦打保安，把部队打垮了。杜衡把我调回来，叫我去做特务工作，叫红彦他们四个人领导部队；他第一是先打击的我，以后便打击的他们四个人。这个问题，邵式平说是我把闫红彦、谢子长赶走了几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是杜衡先把我赶走了以后，又打闫红彦、杨重远、谢子长同志他们的，这是事实。这时张秀山、王世泰他们来了，他们是不是篡军？不是的。三〇年一开始搞军队的时候，他们就参加了军队(在三道川参加的)；有人说：“他们是三二年参加革命，说三〇年人伍是吹牛皮的”，这话讲的不对。他们参加的时候，谢子长同志不在，闫红彦同志也不在，他们自己搞的，收了黄二子的枪；以后张秀山同志到平凉工作。张秀山同志一贯的是在甘肃、宁夏军委工作，一贯的在那个地方当兵，搞兵运工作，曾搞过一个旅的暴动，这都是事实。他们回到红军来当营长、当团长，是全体战士选举他们当的；如果这是篡军的话，是全体战士选举他们篡的，是全体党员选举他们篡的。那样的选举他们篡军很好嘛！他们讲的那个不是事实。说杜衡是宗派

主义，打击这些干部倒是真的。杜衡过去在陕西省委就是宗派主义，比如他打击贾拓夫、曹长清、焦维之，差不多没有不被他打倒过的，只有他老婆没有被他打击过。在杜衡这个左的主张、政策下面结果怎样呢？从三二年十二月到三三年六月，在南山就把二十六军的主力全军覆灭了。在杜衡错误的军事路线下，使汉南二十九军全部失败了，省委派去的几个委员杜润之、朱芬洲、陈清伦、李良，结果在汉南全叫人家拿石头打死了。在杜衡错误的政策下面，王泰吉的耀县义勇军兵变失败了，整个省委被破坏了，逃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人，贾拓夫找中央苏区去了。这不是偶然的事，就是我们没有把杜衡的错误路线战胜，特别是他参加了北方扩大会议，说北方党决定他当政治委员，决定他统一领导西北党的工作，把他那一套搬来就害死人。当时我们就承认了他，不承认他我们又讲不出很多的道理来，只感觉到他这一套行不通。他很会讲，很会写文章，我们讲不过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失败了。失败后把我调到陕西省委，以后又调到陇南去搞陆大昌，在北马关、广源搞兵暴工作，以配合四方面军的活动；把贾拓夫搞到吉福去，把焦维之搞到陇东去、结果叫人家把他的眼睛挖掉了，这是个很好的同志。总之杜衡把凡是不满意他自己的人，就把你分散开；最后到我们准备斗争他的那時候，那天敌人就把他和小张抓走了，他就叛变了。他叛变后把陕西党搞垮了，省委被破坏了，义勇军失败了，二十九军没有逃出一个人，二十六军失败了，曹盛荣也死了，只留下闫揆要部队里的几个党员。国民党在报纸上天天登，出布告说我们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死了……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右的情绪，就是以二黄兄弟为首的右倾。那时候渭华、照金还有游击队，义勇军由八百多人降到了七八十人；这时候应该是怎样想办法再干起来，二黄说不成，他说“省委被破坏了；华北抗日同盟军垮的很厉害。”他两人主张把枪压起来，当时过了半个多月，他们又说：整个党被破坏了，也不能搞，这样大的局面都失败了，象我们这几条枪还不会被人家打掉？还是压了枪吧，保存几个干部。我们设想杜衡叛变了，我们压了枪能不能保护几个干部呢？不能的！杜衡他是个头子，他知道你党员有哪些人，什么地方有组织，他会天天来破坏

你(他到今天还在国民党调统局)。他把你捉到一个个都杀掉了，所以说压枪是不能的。陈家坡会议上，我们坚决的反对他这个右倾，我们要搞，不在平原搞，在山地搞。要搞，就要找些人，找些干部。这个不叫斗争这叫什么?!在红二团失败以后又恢复了，那时我们一方面检讨杜衡，一方面反对二黄。杜衡的失败，我们认为是左倾所致；郭洪涛到于家崖子时说是右倾的失败，他认为杜衡还不够左。我们检讨杜衡有这样几个问题：

1. 选择地区建立根据地。

那时我们就研究，渭华平原虽然靠山但不能建立根据地。西庄兵暴打韩城、打宜川时，我们不懂得游击战，也不懂得建立根据地，结果搞光了，赵伯平也搞光了。旬邑许才生的暴动也失败了，以后我们就研究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就考虑是在武字区和四村塬建立根据地呢?还是在桥山建立根据地；在山地建立根据地呢?还是在平原呢?杜衡很喜欢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红彦同志也讲过这个问题，开会讨论，第一他就主张“打通国际路线”，我们不同意，我们说绥远我们没有红军；是不是我们在白军里的工作很好呢?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光靠我们这几条枪怎能打通国际路线呢?第二，关于建立根据地，是在山上呢?还是平原呢?这时事实已经很明显，无疑的是要在山上。但是，原来山上有山主，民团、土匪、哥老会大爷，比如有著名的罗大爷、夏老么、蔡老五等人，他们都是山主、民团、哥老会。平原去不成，人家国民党打，进山有山主，这怎么办呢?就发生了问题。杜衡说“打山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山主就乱打一气，结果打的山里也不行，山外也是不行，因此杜衡就想打通国际路线。他在自首书上说：“我在打宜川的时候就动摇了”，这话是真的，是他的实话。以后我们觉得打山主不行，你打他们，他们和国民党一结合就要消灭你。因此，我们就看哪个山主不同，好一点，山主当中也有区别；我们就和他们

交朋友，打是不行的，那时候交朋友叫拉拢拉拢，来来往往。我们一到了就拉拢李连成、翟老五、谭德山、罗大爷；我们和国民党打起仗来，他们给我们枪，给我们买子弹，在他们家里寄存伤兵。如果我们不和他们拉拢，过早的说他们是反动民团，一打，他们就会马上和我们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山里不能站，山外有国民党，那就不好办了。那时我们不懂统一战线，没有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是懂得和他们拉拢拉拢。

那时在桥山建立根据地是对的，但是建立一个呢，还是建立几个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建立一个被人家搞掉了，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就在照金、马子庄、太儿塬、南梁这四个地方建立四个根据地；你搞掉一个，我们还有三个，不但他们搞不完，同时还可以互相策应，被搞掉的还可以恢复。这四个根据地在桥山的中段，以后民团也和我们的关系搞好了，这是关于建立根据地对地区的选择。

2. 建立政权的问题。

建立政权，一开始是分配土地。开始分配土地老百姓不要，我们要我们把地主的契约烧掉。为什么呢？因为红军经常是时来时走，分了地老百姓也不敢要，所以老百姓要求把地主的契约烧掉就行了。分粮，他们也不敢要，那时我们扛着布袋给他们送去，他们不要，他们怕地主，又给地主送去，以后我们的根据地搞巩固了，再分给他们就要了。根据地巩固了以后我们怎样分配呢？分土地这件工作困难的很，因为桥山地多的很，那个地方是一片大森林，地质又好，荒地又多，开也开不完，所以我们的分法也不同。分川地不分山地，边境区不分，中心区分，中农、富农的地不分，地主的分，出租的富农也分；但老百姓都认为好的、自己劳动的地主，也分给他一些，因此他(指郭洪涛)就骂我们“与地主勾结”。因为那个地方地多的很，老百姓对分配土地的问题不大迫切，所以光分好地，坏地就不分，红军的家属分好地。边境地区不巩固，我们也不常在，老百姓说“你们分给我们，就是害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地主就向他们收回，不饶恕他们。这是关于建立政权、分配土地问题。

2. 经济建设问题。

那时有很多的粮库，粮食都是地下藏着。敌人时常窜进我们根据地来，他们拿根棍子到处敲敲，地下如果“咚!咚!”地响，他们就知道是空的，里面一定有埋藏的东西，就被他们挖出来了。这样逼得没有办法，于是就动员老百姓搬运粮食，把那个地下仓库变成流动仓库；敌人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时的经济政策就是搞一些粮食，这是主要的。搞粮食是外面去搞，比如从南梁搞进来，因为这个地区富庶一些。除此以外，还发了苏维埃的票子，成立了很多集市，保护小商人，打通小商人的关系，比如对张成志的打通，很多有关系的小商人来苏区。

4. 对知识分子。

以后说从西安来的都是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从西安来，有组织关系，是党、团员；一些干部，他们来了那时我们都是叫他们先当兵去，在实际中去锻炼。

5.对军事上。

我看那时主要的是打游击战，也袭击过几个县城，比如袭击旬邑、三水、毛家沟门；打了几个胜仗，采取奇袭的办法，基本上这几个战斗袭击也是游击战。对地方游击队怎样搞呢？我们就分了很多的游击队，有合水、邠县、保安、洛河川、庆阳、镇宁、三水、耀县、镇原、宜君等游击队都是这样。杜衡说要壮大红军，他把这些游击队都编到

红军里边了，结果红军一失败就不好搞了。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乡土，如果在他们原来的每一个县里，老百姓就愿意，也好搞。以后又采取分几路的办法，共划分三路游击队，第一路是关中，第二路是庆阳、合水，第三路是安定、延安、安塞、保安；每一路有一个总指挥，一个政治委员，派干部到各路去，建立部队里的核心领导。郭洪涛同志说没有分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不对的。在历史上是有的，并且孔原在《火线》上还有文章批评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划分；如果没有，他批评的是什么呢？这都是郭洪涛同志钻空子。成立赤卫军，训练赤卫军，每个县所有的队长，都是经过训练的。开办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同志当校长，我是政治委员，但实际上是由吴岱峰、马文瑞领导。因为我们在前线，校址在豹子川，在这个学校里培养了很多干部，陕北也送来了不少的干部在那里去培养。

军队内部关系，那时叫极端民主化。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我们有错误，就批评我们，打仗也得经士兵讨论。以后看这样不行，那时是因中央红军来了，说“你们要成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这样就搞错了，我记得我们吃过一次亏。他们说：“总指挥、总政委吃亏，那还了得！”弄得不得下台。

在军政关系上，军队对政权是重要的。习仲勋同志是主席，有一次部队正上操，他来了；刘志丹同志见他来了，就喊了一个“立正”，全体战士向他敬了一个礼，弄得习仲勋很难以为情的。习仲勋同志说：“老刘你怎么这样搞呢？这不是开我的玩笑吗？”志丹同志说：“不是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应该尊重。”

官兵关系，那是我们不懂的当官的打人。在座的郭述申同志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参加抬伤兵。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看到他们把士兵打了几巴掌，感到很奇怪，说中央红军还打人？我们那时的军队非常团结。

不杀俘虏，为什么不杀俘虏呢？红彦同志知道。他在32年未走之前，我们在刘家硷打民团杀了六七个俘虏，在任家铺子把俘来的一个营副打死了，俘虏一个个的杀死了，因此引起老百姓的反感，说“军

队见人就杀!”；民团见我们杀俘虏，恨死我们了，就更加顽固，和我们作对了。郭述申同志知道，打仗的时候抓来了很多俘虏，晚上叫我去活埋他们，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活埋和杀这些人呢？杀了就能解决问题吗？相反的倒造成了恶果，所以以后就不杀俘虏了，我就讲了这一些，这都是事实。

关于怎样建军，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根据地里需采取什么政策，什么原则，政权怎样建；军队里头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干部关系，对俘虏政策等就是这样。

对统一战线，对杂牌军队怎样呢？如同孙殿英的部下来和我们联络，是由南汉宸、葛仲云写信，经过党的关系(马文瑞三边工作派人送来)。我们说他既是抗日，同时又经过党的组织，我们可以设法和他们联络；但是说我们这是“勾结军阀”。另外吴勉之他是燕大学生，过去在台安当军长，大革命时的党员，过去和他关系也很好，他也很同情我们，又说我们是“军官路线”。许多事明明人家帮助我们，送子弹、送粮等，还说这是勾结人家。

对土匪、民团的政策：对土匪如果是老百姓最恨的，像杨谋之一类，我们就消灭他；但所有土匪要一齐消灭，那是不行的。

对会门的政策：在闰家峒子下面，毛家沟门一带，有许多信佛教的会门。怎么办？打？杀？但因为老百姓脑子里对他们印象很深，因此就在群众中留下坏的印象，在庙湾曾烧庙，老百姓真恨死你，所以这是不应该的。

对商人政策：保护小商人建立集市，允许小商人来往；而他们不允许，主张赤白对立。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杜衡把省委搞跨，二十六军失败，二十九军失败，义勇军的失败，断送了很多名干部。经过我们这样的方式和原则，恢复了根据地，建立了红军，建立了老三团，老四团，骑兵团；成立了陕甘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了干部；建立了特委组织，发展了地方党的工作；分配了土地，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时郭洪涛回来(象他前天讲的)，这是我们

建立根据地过程。在建立根据地时有没有斗争?有斗争，和黄家二兄弟的斗争。所谓反右，开陈家坡会议时他主张压枪，说不能干了，要干还要失败，发生右倾，遭到我们反对；到西庄子时，他又搞南北分家，全党斗争的结果，他又失败；以后他到外面活动，后来他又从西安跑回来，要建立陕西临时省委，叫王林、李杰夫、张文华、黄子文，还有不知道有些什么人来组织，叫我做头子。我一看不对头，就不准你出去，因为这些人过去参加过筹备会，同时一贯是反党，所以我们就准你出去，也不准你组织临时省委。后来这是中心斗争的一条，还有我们派王井泉给孔原送信，他们是拥护扩大红军，这一次的指示信错是错，比较所有的还好一点；但是我们派人去，他们说：“刘、高是希特勒法西斯专政!”另外我们省委被破坏了，只剩下我一个，现在又出来了一个省委，我们怀疑。这时张慕陶跑到西安，被黄子文派通讯员捉住，那时黄还不是反革命的，还是党内问题。蔡子伟来前已知张慕陶的情况，说什么“联日反蒋”反右派宣言，反对成立临时省委，慕陶的当，郭洪涛对这个最清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写过一个号召不要上右派的当，不要上张到闫家瓢子以后，这些人因为是反革命，就把他们关起来。在这中间，是真正反张慕陶，向这些人进行了好几次的斗争，但从来也没打他们，烧他们的屁股。因为张慕陶的一封信，我们还派人监视蔡子伟，这是恢复的时期。这时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郭洪涛在陕北工作怎么样?高干会上已讲的清清楚楚。我们说郭洪涛未回来前，陕北党已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已经开展了游击运动。陕北党有了长期斗争的历史，和群众有了联系，所有游击队主要干部，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六军派的。安定的枪、人全部是，清涧的白雪山，吴堡的马丕雄，神府的王兆相、杨文谟，这都是吧?所以我们说陕北党在二十六军领导下，直接在这几个人的帮助下搞起的，二零年刘志丹在那里搞，三一年山西的游击队过来，三二年大规模的搞，延安、宜川、安塞、吴堡、郃县(编者注：1964年汉字改革时期，因“郃”字生僻，经国务院批复，改为富县。)等地方到处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郭洪涛钻空子就在这里，把红军的行动，人民运动，红二十六军影响下的都不提，而说陕北根据地是他回来拿三条枪创造

起来的(笑声)，否定了人家。啊呀，真高明!事实上陕北党已经开展了游击战争，领导群众斗争有长期斗争的历史。

郭洪涛是什么人?家里是小地主又是商人，十七岁上出来，到太原坐了六年监，以后到北平找到党的关系到陕北来负责，也难怪他。但这怎么样就比上刘志丹同志呢?你能创造红军吗?你能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吗?你打过一枪放过一炮吗?(笑声)请问你经过军官学校吗?你懂得游击战争吗?参加过游击战吗?他三四年一月回来，三月里开了两个会议，(未回来前有一点补充：他说他在天津开了党团联席会，这个会是非法的、错误的，因为没有陕北一个领导同志参加，只有他，一个李铁轮，一个李华生。李华生根本不知道，李铁轮刚入党三个月，和这里毫无关系；另外是在陕北党被破坏后跑走了的一个，陕北党开除了的两个，一个是鲁贲，一个是崔运。他说这就是党团联席会议，我们说这怎么能叫做团联席会？这里的党团员负责人马明方，马文瑞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会是非法的。)据他讲，说孔原同志分配他回陕北工作，他自己告诉马文瑞说组织上要他做组织部长。真正讲，崔田夫是老实人，真正陕北的政策、路线他今天也不懂，那时把他分配为书记，陕北所有同志都知道“掌柜是掌柜，掌不了柜的。”郭洪涛自己做组织部长，开了曹家棚和王家畔两次会，一回来就打人。奇怪!人家马明方是组织部长，马文瑞是团的书记，后来他回来把这两个人打的一塌糊涂。他提出什么理由?批评陕北党是“富农路线”、“机会主义”、“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他在一九三七年还编了一个陕北红军发展史，说他回来拿三条枪创造起来的，他怎么样搞暴动；其实人家这时已搞起清涧、安定、神府三个支队，吴堡也搞起抗日义勇军；人家领导了游击战争，我们派了大批干部，派了枪搞起来，陕北特委领导下搞起来。他说“消极怠工”，那么那些游击队是天上掉下来的?第二个说“不领导群众斗争”。当时清涧领导了几千农民，响水领导几千农民，恰恰都是派党员去的，你说这不是党领导的?完全是相反的。过去我们说笑话，说“听郭洪涛的话听反面”，他说没有反帝组织，这里有反帝同盟军；说没有士兵、党员少，没有县委，这里有几个县委，几千党员，开展了游击战争；说这里是富农路线，而我

们分富农剩余的土地。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就是说一切是他回来算起，历史就是我，我就是历史；郭洪涛是盘古，盘古就是郭洪涛，我是上帝，上帝即是我，一切从我开始。(笑声)这样就打击马明方为富农路线，说他动摇；这一次“七大”说马明方不敢出来，崔田夫镢头掏出来的，还说他动摇，要审查；实际上当时党里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这些人，真正是特委上有思想的领导同志，当然高长久、崔田民、崔田夫，他们比较幼稚。这是郭洪涛否定了陕北。

到了闫家塬子会议，我们说我们采取了那样的布置，恢复了党，恢复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而郭洪涛第一天来，就总结了一下，真是笑死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傻瓜。派了好多人都被杀了，我们天天找党，找中央，贾拓夫去中央苏区找中央没回来，曹盛荣叫人家杀了，王井泉没有下落，以后又派了两个没有回来。后来听说郭洪涛、谢子长回来，我就带了一个骑兵团跑到安定迎接。我们当时带了一个驳壳枪，九支长枪，背了大烟、元宝；回去又派刘约山接。这一下三支游击队会合起来，一百多人，五十几条烂枪，老谢总指挥，郭洪涛是政治委员，会合于南梁堡，时间是三〇年七月一日。第二天就开会，我们就讲：我们怎样怎样搞起来的部队，杜衡怎样断送党。郭洪涛当时对正确路线批评了一番。郭洪涛在党校说：谢子长当时做了一个报告，说谢子长冒充特派员。事实是你，而你凭什么这样搞？想一想，假使你是特委代表，我是省委代表，你是特委委员，我是省委委员，你是五十条枪的游击队政治委员，我是二十六军的政治委员，这你怎么能撤我的职？因此，你冒充中央特派委员，对不对？这真是“疙抵打了角装狗哩”，是假的。当一个党员，胡扯冒拉是不应该的。你说老谢冒充中央代表，报告了全国形势，事实正是你自己(孔原给我送来材料可证)。因此，你这人钻空子的事，太多了，能找一万件。

“说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和陕甘边党委是右倾取消机会主义，说我把这个东西整理了一下送给北方局”，我自己说我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你讲就是你讲，错就错，不应该给人家压上！以后

王泰吉当总指挥，他说“不能”，这为什么不能？我们说根据地要建在山里头，他说是“梢山路线”，我们说打游击战，他说打阵地战、平原战……。北方局怎样指示你游击队打阵地战？游击战，我们说打不过时转移阵地，他说这是“逃跑路线”。我说富农的土地分多余的，他说这是“富农路线”，所有这些，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经验与失败》，给北方局报告了，这里边他是很巧妙的歪曲事实。审查孔原时，他对孔原说：“这些东西你就说是贾拓夫文章里边说的”。当时那个东西是有缺点的，那时省委杜衡领导也有缺点，但你是钻空子无根据，你总想把错误推托给人家。我们那时与孙殿英、民团、张汉民等来进行联络，（今天看来这是统一战线）你们说这是勾结军阀，军官路线。我们在武字区不能立足，敌人有八个团围剿，离西安只有一百二十里路的一个平原；我们游击队钻在窑里头的一个地窖子里，并且在那里吃饭，一个婆娘坐在那个地板上缝褥子，假使不要是这样来转移，不是被人家杀了吗？所以他就是给我们找岔子。于是留党察看，撤销职务，打刘志丹同志打的一塌糊涂；这样不管错误如何，（我相信我们也有错）但为什么给这样的处罚，有什么原则？真是岂有此理！这样一搞，同时撤了两个职。他说我把刘志丹拉拢了，刘是军委主席，他是参谋长。他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那时他钻空子，造谣、挑拨、离间多极了，对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另外再看对黄子文、张文华、蔡子伟怎么样？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分配了工作，他有张慕陶的信，他说我们是法西斯专政。关于南北分家的材料多得很，我们有很多的根据把他们关起来，你把他们放了，恢复了党籍；要是说反对右派，张慕陶是右派，给你写信，你为什么反他们，而把他们放了？另外你在陕北打击了马明方、马文瑞和其他的一些老干部，你把入团三个月的李铁轮代替了马文瑞，把马文瑞派在三边去当兵，说马明方动摇怕死，这是郭洪涛自己讲的。洪涛说这些人当时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对他，那么为什么程子华打了一个电报说：“朱，郭说‘假使二十五军不来，刘、高这些人脑袋都要掉一’，那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且看下面的事实，洪涛同志说：“朱理治没回来之前，我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然红军怎么样发展起来的？”

苏区怎么样开展的?”你在闫家塬子虽然把我撤职，开除党籍，但还有志丹、杨森、杨琪、习仲勋、张邦英、张仲良、王世泰、马明方等这样一批坚强的干部，和陕北大多数的干部支持，没有被你搞下去，他们和你对立。你又说“我是陕北的创造者!”谁不知道你的底子，陕北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不是你的创造。你回来做了许多坏事，你开展了哪一个地方?游击战争怎么样?那时撤销了我的政委，决定叫老谢任政委，老谢在这一点上支持了你，他同意了你的意见。这时候红军到底怎么办呢?刘志丹不去，我也不去，怎么办呢?后来叫我当临时参谋长，王世泰带着老三团到陕北去，这就是所谓主力红军粉碎了一次围剿；打了四仗(张家圪台，邓家棚，榆口，井五台)，结果配合了陕北特击队。陕北游击队一百多人到南梁，当时有四五十条枪，到南梁后增加了一些。这次粉碎第一次围剿，应该是主力红军作主，完成了任务；大大的开展了游击运动，到处搞了好多游击队，镇压了群众的反水，成立了红一团，贺晋年为团长，马佩雄为政委。陕北在宋家河建立了第一个赤源(安定)革命委员会，把群众的情绪大大的提高了。是不是事实?这就是你创造的吗?请问你给红军打过一个仗吗?你坐在那里用你那一套政策，就能把天下搞下来吗?不是的!洪涛所以那样讲，因为他每一个问题都想钻空子。那时你还未来，你就能看见这些事吗?

关于反对立三路线。你在邓家棚搞集体农场，我就给志丹、秀山、仲勋写信，我说：“陕北和过去立三的路线差不多”。以后秀山、仲勋他们开会讨论了一下，给陕北特委写了一封信，说“立三路线在陕北复活了?”这样造成以后肃反说我们“是反革命”之根据。我们怎么样讲的“立三路线复活”呢?有四个根据：第一他说：“我们的力量等于井岳秀、冯钦哉之和”。我们看当时游击队只有五十多条枪，再加上我们给的一部分枪，顶多二百来条枪，就把以后所缴的枪加起，顶多也不过五百条枪，这就等于井、冯之和吗?第二说：“我们的红军已成为铁的红军”，这样就扩大我们的力量，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胡写一气。第三是左的肃反政策，乱杀人。第四是搞集体农场，不分土地，大家一块劳动、一块吃，搞搞社会主义，就是根据这

样一些事实。

关于干部政策。他那时说马明方动摇，怕死等，我感觉到这是不对的，就写信公开的批评。那时陕北特委有《西北斗争》的一个刊物，陕甘边特委和二十六军的部队有一个《部队生活》，边区特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刊物，我就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了这个东西。他就说：“党内斗争，那里有谁对领导机关这样的批评？”那时我调查清楚，他是陕北特委的组织部长，我是省委政治委员，他比我的职位还小，我可以这样斗争，于是我就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了文章。这说明红军的领导权，实际上他没有得到手里；在陕甘党打击了我一个人，但是还有许多人没有受打击；马明方、张达志是反对他的，是对他有意见的，马文瑞也在内。但是以后马文瑞被他排挤走了，马明方当时也有些害怕，他的左倾路线在陕北特委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但下面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因为他要慢慢的酝酿一下，在军队里是根本没有占优势，以后斗争他有他的一套政策和主张。洪涛到究有些什么主张呢？对于政治形势他怎样讲的？他在《西北斗争》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北的政治危机和西北党的紧急任务”，和“五中全会”的那些东西差不了多少。在土地政策上，所谓集体农场，他说“不是我支持的！”在清涧搞了半年，范围那样大，难道你睡觉去了吗？老实讲，那天我和你当面也谈过，“老兄，你回来时是十七岁的小娃娃，坐了六年监，坐在南梁天天抄那个土地政策本本，但你还不知道土地政策怎么样分配？你的土地政策是：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侵犯了很多的中农利益。本来老百姓不满意平均分配土地，但有些地方是平均分配了土地，引起了老百姓的反对。”

当时的肃反政策有三条，王达成传达的三条原则：第一，三个党员商量一下，就有杀人权，或三个赤卫队员商量一下，就有杀人权。第二，觉得可能反动者，就杀掉。请问你既怀疑，为什么要杀掉呢？第三，左比右好，这是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这样的讲。对于干部，他说“朱理治未来之前，我没杀干部。”请问李光白是谁杀的？他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生，很好的同志，那时一些新的陕北小调都是他编的；

因为一个二毛子皮袄没有给你，骂了你一顿，你就把他杀了(会场听众发出惊异咂咂声)；但是你还告诉他们家里，南下做了工作，被国民党暗暗的活埋了。王士杰是五团团长，这是谁杀的?你还说我和老刘商量的把他杀了，后来你又说“看到张达志和杨琪他们的报告，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军事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当地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我和老刘知道这些人乡土观念很厉害，就把他们送到了后方；你在后方，我在前方，你怎么和我商量?你和我的影子商量过?这是你在党校这样讲，和我这样商量过。当然这个会议上你不敢这样讲，你说的是八十一师、二十六军那里的人讲的，因为那两个干部也是二十六军派回来搞游击战争的，王士杰是重要的干部，还有其他的干部，这都是谁杀的?你应该想一想。还有杀干部的家属，这也很奇怪，难道真的不杀这些干部的家属，这些干部就不坚决吗?如那时把秀山(师政委)的父亲杀了，王兆相(师长)的父亲和毛凤相的父亲，乔钟灵的叔叔，杨林的父亲都杀了。他们的儿子都是革命的，非常坚决，至于说他们是富农就应该杀吗?其他人的父亲杀了还情有可原，而为什么把这些人杀了?同时把所有收猪毛的小商人，以及乡下的“半开门”(破鞋)和二流子，要饭吃的都杀光了。在清涧就杀了一千七八百人，这就是朱理治未来前，你未肃反吗?崔田民是保卫局的局长，也应该想一想，当然我们也曾反对过你这个政策。

现在讲一讲洪涛的干部政策……你在朱理治来时，就把我的党籍停止了，把黄子文等的党籍恢复了，这是很奇怪的，这是什么干部政策?并且说刘志丹、王世泰、张秀山、习仲勋、杨森怎么样怎么样，说老谢地主出身抽鸦片，和刘树清勾结，贪污腐败，当支部书记都不行，是一个样杆子。对刘志丹怎么样，昨天大家都听了。说贺晋年政治上没有保障，把马明方派的当兵去了，你是特委的书记?在三四年六月，你提拔了王达成和高长久，你把人家挤兑走了，叫人家做兵运工作，他觉得在你那里站不住脚，就跑到二十六军；又说马文瑞动摇，开小差；说张达志是崔田夫拿镢头掏出来的，是动摇的；甚至还说马明方和绥德的肃反会有勾结。你这个人还有良心吗?这样的造谣。在一九三七年开苏区代表大会，你活动我和马明方把你选成中央委员会

的候选人；我们当然不选你，同时把这个话报告给了中央，因此你就说马明方和肃反会有勾结。你自己想一想，一个党员应该不应该这样讲？难道所有老干部都是坏的？但我们另外看一看你提拔了一些什么人？你说人家地主出身，请问你：王达成是不是地主出身？你排斥知识分子，他(王达成)是不是燕大的学生？至于说没有党的关系，你说王达成有没有党的关系？怎么一下就提拔在神府做特派“老张”？你的理由何在？用意何在？请问：你说习仲勋不好，把他关在监狱里，叫王生玉做陕甘苏边的主席，这个好不好？你自己问一问良心。你说人家历史不清，我再问：你提拔的这些人历史清楚吗？曹乃勋是延长人，家里是地主出身，三五年从榆林回来，说有问题；以后经老百姓报告，把他关在保卫局里，后来放出来介绍入党，以后就当了省委秘书长。我们说一个政治面貌不清、有反动嫌疑的人，就提拔他当秘书长？你不是曾说过“有反动嫌疑的人应该杀”，那么为什么不杀这个人呢？你的干部政策的原则在哪里？还有艾南楠(你的姐夫)，三四年不是党员(以后是不是党员我还不知道)，一下来了就当了财政部长。三七年边委后选名单上都是这些人，我和张秀山以及其他一大批干部都没有参加，你的干部政策的原则是什么？这是不是事实？还有高耀光，一个年轻的娃娃，什么也不懂，就做了粮食部长，你的干部政策对在哪里？老齐是挖炭出身，什么都不懂，就当了劳动部长，你的干部政策原则又在哪里？高长文是雇农，当劳动部长总比老齐恰当一点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是举不完的，我现在只举这样的几个例子。你自己在西北局会议上也讲过：“不管什么人，凡是拥护我的，不管路线正确与否都提拔，反对我的就搞掉，”这是老实话。你的干部政策，可以叫王达成没党的关系做区委书记，这是事实吧？不是我造谣吧？还有在神府提拔非党员做连的指导员，人家说指导员要管支部工作，他说不是共产党员也可以管支部，(笑声)还有这样的提拔干部？王兆相去了，把王兆相派在夏老么那里去当兵，做土匪工作，这是你的干部政策？你把这些人搞出去，并且你说“我是创造苏区的头子”。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搞这一套？对张文华、黄子文又是那样的，这样搞我觉得只有一条道理，就是不把这些人的搞下去，终究“小脑老孙”脑小，

带不起王帽。把这些人压下去，把黄子文等搞起来，可以给你抬轿子。朱理治说：“陕北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刘、谢，只知道老孙。”(笑声)他们打仗那么多还不知道，就知道你“小脑老孙”？你参加过一次战斗吗？这是关于肃反政策。

至于战略上的争论，那真是可笑！他说：“我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我上面也说过了，你到底懂得什么战略？刘志丹和别人，歪好还住过两天军事学校，苏联的毛子也给讲过两天课，他们还放过几枪，甩过手榴弹，他们有正确的军事和正确的军事思想；而你从那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给你造出来的正确军事路线吗？你自己心里做出的一个正确军事路线吗？(笑声)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你主张阵地战，平原战，你是正确的吗？不是的；到底是刘志丹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所谓周家硷会议，你主张打碉堡、打县城；我们和你在战略上有争论，反对你这个路线，要把陕甘打通，反对打阵地战；反对你战略打清涧瓦窑堡，你说延安不好打，有宝塔山，清凉山，有河，人家还有飞机大炮不好打，你主张打外面的碉堡。粉碎第一次围剿你根本没有管，红军垮了，第二次又是那样的主张，第三次你主张什么呢？你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吗？刘志丹他们是正确的路线，他们是红军的主力。在玉家湾会议上，反对你这样的主张，反对你，不要你做组织干部，但是我们还照顾了你，仍叫你做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张秀山做组织部长。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我们不正确，同时在这个会议上批评我们是富农路线，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讲的；好在今天参加会议的这些人，今天还在，如果这些人都死了的话，这个历史问题就弄不清楚了，但是这些人没有死了在闫家棚会议上，有很多的斗争，但是在领导机关里边主要的人还没有被驱逐出去，比如刘志丹、张秀山及以后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几个委员——马明方、张达志、崔田夫(他是没有什么本领的，在领导机关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这就是说，“在朱理治未来以前，我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发展的”，其实是他不知道人家是没有执行你的路线、你的政策，这时在领导机关里边正确的是占主要地位的，因此你没有办法反对。当时我们说：“你是立三路线”，假如没有陕

北这些干部的抵抗，就没有红军的打延长，搞了五个游击队，打到靖边……。而你们是在家里坐看的，我们是搞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你那个政策是贯彻不下去的。我们把延长打开，把延川、安定的敌人也怕跑了，当时你老兄住在两个县之间，延川的敌人跑了以后，你老兄把延川那样大的柏树都烧的干干净净，大火半月未熄。

崔田民在安定县的肃反，把人杀的一塌糊涂，这是不是事实呢？我说你这个人最不老实。他说：“朱理治未来以前我的路线是正确的！”我说：正确的不是你的，而是陕北人民的功，是很多好的党员干部抵制了你这个错误路线而得来的，因此说功不是你的；如果根据你那一套去做，就会搞的干干净净。我们是反对了郭洪涛的错误路线与错误政策，我们坚决的进行了斗争。在这个会后，才胜利的粉碎了第二次围剿。第一次围剿，红军主力在我们手里掌握，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粉碎围剿(粉碎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在闫家塬会议廿天后，就休养去了)，时间的过程就是这样，以后他就更没有办法了。我就说郭洪涛同志他的几个理由，他说“我的路线是对的，我的工作还能开展，军事路线对，群众工作也是对的”；他说他的各种政策对，其实这个政策在领导机关改组以后就粉碎了。红军走到那里，把你这个路线带到那里，把你这个路线粉碎到那里。老兄你利用了很多不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你钻了空子。你说：“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刘、高拍手叫好”，难道我们自己给自己戴机会主义的帽子吗？你造了这样一些谣，所以我今天要揭穿。这说明，在朱理治未来以前，我们和郭洪涛进行了反左反右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党外的方式，只采取了党内的方式，比如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时候，他老兄还是西北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斗争是为的揭穿他的思想，他的路线是不行的，斗争的性质是这样的。以后北方局就派来了郭洪涛的大哥哥朱理治，朱理治来以后他对朱理治说：“你们不来，我就危险得很。”正如朱理治讲的，郭洪涛把我们画了一个花脸，那是真的。

我们和郭洪涛斗争以后，粉碎了第二次围剿，红军、苏区有很大

的发展：所以占了六个县城，一直发展到廿一县，其余的县没有占；红军到了长武、韩城、白水，大关中，骑兵团，步兵团在那里牵制敌人。接着敌人就进行第三次围剿，闫锡山的军队，张学良的军队，马鸿逵的军队，杨虎城的军队，这许多军队都上来了。这时候在战略上需要建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因此就提出一个方针，在三五年的六月，首先把闫锡山打垮，把北线的敌人给以创伤，我们这样就把闫锡山的常旅、马旅，打垮了一个，消灭了一个。

以后就到了文安驿，这时候朱理治就来了。第三次围剿，刚打了胜仗，三五年的七月就在延川文安驿开了一个会议。朱理治是在这个以前来的，他和郭洪涛在一起开了一个会。他们自己也讲：“他们商量了很久，郭洪涛给他供献了很多的材料，他们还开了扩大会议”。这个扩大会议也可以讲是合法的，也可以讲是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北工作委员会的一些主要同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些主要同志没有参加，红军里面的将领没有参加。开了这个会以后，朱理治到了文安驿又开了一个会，所谓反对右倾取消机会主义。所谓文安驿会议，永坪扩大会议，军事会议，和两个省委联席会议的结论是什么呢？朱、郭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都写了文章，写了决议案，提出了纲领，提出了政策。朱理治写的文章是：“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再就是郭洪涛署名写的“论扩大会议”，还写了扩大会议的决议，和粉碎三次围剿的决议，这个东西朱理治帮郭洪涛改了一下，郭洪涛还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表现”，这个东西是在思想上的动员。

文安驿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对形势的估计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说“陕北不能决战，反对陕北的特殊论，完成并超过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现在是争取全国胜利，进到和帝国主义直接决战时期”；力量的对比：“我们的力量已经超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之和”，(笑声)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加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还没有我们的力量大。发展的计划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有文件)？以马栏为中心向东潼关发展(应该向北潼关发展还可以，但是他们要向东潼关发

展),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陇东发展,(本来保安是我们的苏区,以保安为中心还可以)和四方面军会合,和青海、新疆打通,会合新疆的伟大革命!这不是吹牛皮吗?(笑声)新疆到底有个什么伟大的革命苏区呢?军事路线,提出了新的军事行动方针,要肃清苏区的白点,要打瓦窑堡、打清涧、打延安。三七年到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延安的碉堡密密的,瓦窑堡有什么米粮山、文常山,还有一个不知叫什么山,这三个大山都有碉堡,在城外挖有一丈宽的沟壕,边上有的枣刺,里边有的水,城墙上也有碉堡;清涧有的起子山,同时住有一个旅的军队,瓦窑堡住一个团,延安住一个师。你们要消灭白点,这白点怎么能消灭了呢?并且要寸土不失,但是敌人走一步就是三尺五(笑声)。要打通国际路线,要全线出击,这样搞以后,刘志丹就讽刺了他们两很坚决的共产党员,也被赶出去了。当时在党的机关里边,红军里边,苏维埃政府里边,家庭是富农成分的都要往出赶,这是新增加的一条。还增加了一条查田运动,这是他新增加的两个东西。

这样的斗争,就搞得不得下台,弄得很凶。程子华曾经打电报:“一回来郭洪涛说,我和朱理治不来,他就危险的很”。我不赞成你这种主张,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采用你那种野蛮的手段来对付你的;我们是讲道理的,只是要你把道理讲通,如果讲不通就不干。这个斗争以后怎么办呢?结果我们就很危险;我们不赞成你的路线,你就说我们“是反革命,是右倾取消机会主义”,以后就进行肃反。

为什么肃反呢?因为我们不投降。所谓肃反,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结果发展的必然性。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倔强,所以也不投降,不论是红军里边,党里边,苏维埃政府里边,所有的领导机关绝大多数是不妥协的。

郭洪涛他自己也讲:“我个人的品质是很恶劣的。”他前天不是这样讲的吗?这时候廿五军不来他也很难搞,因为他手里没有枪,就是廿五军来,他只有一千四百人,他怎么能打胜仗呢?这时候就不可设想:廿五军来了以后,他们五、六个人商量了一下,背地搞的一个名单。

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肃反呢?是在粉碎三次围剿,闫锡山被打垮,在一、二次围剿完全取得了胜利,敌人把瓦窑堡放弃。郭洪涛说:我打横山打的不好,说这里边有问题。我现在解释一下,把闫锡山打垮以后,就叫黄罗斌带一个团到稻草堡牵制敌人;贺晋年带了两个营爬城,结果没有把铁杆穿在竹筒子上弄好,半途就垮了下来;第二次又搞又垮了下来,第三次就被敌人发觉了。当时城外的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就是没有打好嘛?这就是反革命的阴谋吗?这就是打劳山取得两次围剿胜利以后,就进行肃反。廿五军来了,他们没有轻机枪,没有重机枪,当时我们有六十挺轻重机枪,朱理治写了一个条子,叫把轻重机枪给他们;当时我写了一个条子,叫把轻重机枪一律都给他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肃反的。这时候,军委的主席、副主席、总指挥、政委、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全部干部,都被驱逐出去,我们当时连屁也没有放。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肃反的。劳山战斗胜利以后,我打扫战场,郭述申同志在座,你说“打劳山战斗有鬼?”。很奇怪的,打劳山是什么人打的?是刘志丹、杨森、贺晋年打的,打的时候刘志丹在最前线,贺晋年把衣服脱了在西面打,我在东面打,这样把敌人消灭了。取得胜利的时候,廿五军才出来了,这叫有鬼吗?打死了一些什么人?谁消灭的敌人?

那时候听说中央红军到了×××一带(敌人叫毛泽东、朱德是朱毛),说朱毛“残匪”到了×××一带。这时候鲁大昌、马鸿逵在后边尾追,北面是杜基,东面从平凉、环县一带,陇东也有敌人来。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在石门子那个地方提出来的。我们主张:迎接中央红军,把部队集合起来,迅速的出击,从正宁打到长武,正面派两个小团。他们认为:“这是反革命的阴谋,和杨虎城有关系,出卖苏区”。在高干会的时候,郭洪涛说:“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郭洪涛在三七年写了一个西北革命发展史,(材料上说)在内部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取得胜利迎接中央,你是不是这样写的呢?我们说迎接中央红军,你说“是出卖苏区”,你们不是迎接中央红军。你们知道中央红军快要到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肃反,你们就把我们捉起来了。你们知道中央红军快要来了,但

是你们不等中央红军来解决问题，你们就把我们捉起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我再问你：你写了信，有要抓刘志丹、杨森等七十八个人的名单，所谓三个人签了名，后来就推；有的说“郭洪涛写的”，有的说“戴季英写的”，有的说

“朱理治写的”。

刘志丹在安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刘志丹，还不知道有什么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当时叫把那个信送到保卫局，因为老百姓只知道刘志丹，就把这个信给了刘志丹。他把这个信看了以后，叫把信好好的封起来，给老高看一看，再谁也不要给看。我那时候在王家坪(即洛河川王家坪村)住，看以后交给聂鸿钧。刘志丹看了信以后，就骑快马从安塞一直跑到瓦窑堡。到了王家坪，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肃反的。他们对志丹自己回来怎样讲呢？他们说：这是反革命进一步的狡猾、进一步的阴谋，他看了信还不跑，叫我们相信他。你这样说有什么办法呢？志丹回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志丹没有原则的话，如果他是反革命的话，他可以骑着快马到延安找王以哲去，谁敢挡呢？如果他再积极一些的话，他是军事主席，我是总政委，我们又在前方，俩个人来商量一下，把二十五军一千四百多人一下就搞掉了。志丹他为什么不这样搞呢？为什么他跑到瓦窑堡呢？据志丹同志讲，说郭洪涛派一个人叫他去谈话，把他叫到戴季英那里。朱理治讲他不知道，洪涛说他“保了志丹的警卫员，没有保志丹”，这说明志丹被捕他知道吧！为什么保志丹的警卫员不保志丹呢？还是志丹要紧？还是志丹的警卫员要紧呢？大家想一想。肃反是在洪涛把我们画成高俅、把他们画成林冲的条件下进行的，朱理治不是讲了嘛，说志丹怎样怎样，我怎样怎样，说习仲勋是第三党，这些人都是反革命，都画成了高俅。我们过去所谓右派——黄子文，蔡志伟，张文华，他们来了以后，把他们恢复了党籍，分配了工作，说他们把我们供出来，就把我们捉起来。当时证明张文华在西安自首了，但还不是反革命，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真的。我们把他关起来弄清楚了再讲，可是你放了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就吊就打，在二十五军没来以前，你们预先就把名单搞好了。

你给我们画了花脸，你怎样能说志丹不是反革命等等？你想想，你说“我动摇了，我对你很好”，同志们到底怎么样呢？我来讲几句。脚上带着八斤半的镣，手上带三斤五两的铐子，就是这样的软禁。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大便一次，小便一次。每人这样一个砖砌的行行，给我搞了一个站不起来、坐不下去的地方住着。我身上的衣服都剥光了，我犯了什么罪，对我这样。我当时作了诗说“上绑麻绳下带镣，身上披着烂麻包，赤着脚片满院跑”。在冬天没有鞋穿，红铁锨烙、刀子刺，既然是怀疑，为什么天天晚上拷打呢？当时我听了鄂豫皖的讲话就头痛——“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教育”。还有这样的怀疑？还有这样的党内斗争？把这些人关起来，头都要杀掉吗？这正如郭洪涛，朱理治所讲的：“中央不来或者迟来，那就不可收拾了，这些人就完了”，这倒是老实话。他们在肃反问题上互推责任，你推我，我推你，总而言之，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肃反的。抓起来以后，就每人发了一份自首书。我没有什么自首的，所以发了以后就把它扯了，于是他们就用刀背砍，说：是“法西斯头子呀，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既然是怀疑，为什么还叫自首呢？说我们的主要领导者受了正确路线的制裁，必然不满，而形成反党、反人民、反苏维埃的政权；他们在部队里，在群众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要进行刻苦的解释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唤醒群众，才能消灭这些人，些后才能保证粉碎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他消灭什么人呢？还不是这些人。他说是张秀山供的，这次在七大风波中又说张秀山是变节分子。我们被搞起来的这些人不讲就拷打，他说这是戴季英搞的。你是省委副书记，你就睡觉去了？你是个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呢？你们预先开了名单，还说你不知道吗？把张秀山捉起来，四个人站在腿上压横子，鼻子里灌辣水，打的死去活来，胡里糊涂四次；朱理治就向说：有名单在这里，你讲了不得活，不讲也不得活。张秀山说“是！是！是！都是我”。以后张秀山醒来说，你要杀就把我杀了，我认为是反革命；二十六军的创造不容易，像志丹这样的领袖千万不要这样。听了这话以后，郭洪涛说他动摇了一下，朱理治也说他动摇了一下，那么为什么郭洪涛在七大时又说张秀山是变节分子呢？你的用意何在呢？

当时肃反中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服从组织讲道理，接到你逮捕的信就回来进行原则的斗争；另外一种看到信以后就回去，把军队集合起来我来同你干，把朱郭都扣起来。因为你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就可以扣起来怀疑怀疑你。我们采取的是第一种态度，假使来取第二种态度，那损失会更大，事实证明第一种态度是好的。当然，也可能中央不来或迟来几天，我们这些人的脑袋就没有了。结果中央来了，这些人没有杀，红军也没有消灭。如果中央不来，就搞光了，迟来也就搞光了。但是他们在中央在瓦窑堡召集的会上，欺骗了中央，说没有这回事。郭洪涛在肃反解释书上说：我从来对肃反怎样正确，怎样正确，请问是谁供给的资料？肉体消灭是谁写的？请问谁说在下七湾习仲勋(苏维埃主席)、刘景范(军委主席)给反革命做报告，叫李景林把他们开除党籍的呢？你见了贾拓夫说“刘、高是反革命”，贾拓夫说“有没有证据”，你说“有证据”，你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博古同志到了保安接到一封信，是用省委名义写的，说刘、高是反革命。这信到底是什么人写的呢？我们被押起来，总不会说刘、高是反革命吧？到释放以后，郭洪涛又说“他从来没有杀这些人的心”，郭洪涛说“他同罗迈同志讲过”，罗迈同志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这个信，我就知道了，但事实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反肃的。我们看在内战时期所有对形势的估计，战略的主张，以及各种政策上都是针锋相对的，这个斗争一直发展到肃反。这到底是不是路线斗争呢？我们就很清楚了。郭洪涛还讲，他在党校小组会，他说“我在抗战时期什么路线都是博古、洛甫搞的，不是我的”。我看郭洪涛在内战时期是那樣的路线，也很奇怪在抗战开始，一变就变成了“右”了。在抗战开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无原则的提拔了许多干部当军事部长，象李仲英同志三四年冬才出来参加的部队，三五年就叫他当了军长。说刘志丹不能当军长，说李仲英是创造红军的头子，这也害了李仲英同志，背了个大包袱。那种干部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还是这样。抗战时期洪涛同志怎么样呢？他自己写了文章的，他说边区政府不仅在形式上由苏维埃制度改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实质上也变成了一般的议会制度。就是说，我们不要无产阶级领导了，这不是

很明显的吗?他说边区要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割据，因此就把边区变成合股公司。什么县专、专员、巡回教师、电报局都来了，邮政局也取消了。我们成立群众团体时，要高钟祥做抗敌后援会主任，要呈请西安何绍南批准；结果批回来说“查该高钟祥历史复杂，耐难照准”；在呈请的表格上有高的履历，他曾任过苏维埃的主席，县委书记等，怎么能批准呢?我们的军队不能干涉政权，人家叫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成立群众团体，要何绍南同意赞成才行，他一辈子不同意怎么办?这是有文章为证的，是你自己写的嘛?土地失掉了多少呢?我在高干会时画了图的，葭芦县全部失掉了，郿县，枸邑、横山、靖边、定边、陇东都失掉了，失了许多的地方，真是丧权辱国，这不是事实吗?内部地主纷纷起来收回土地，农民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谣传说，×××地方挖出一块石头，写着四个字“物归原主”，一切过去分的都要给地主，甚至有的共产党员也出来收回土地。他说这是博古，洛甫搞的，不是我的。好的就是你的，坏的就是人家的，这个文章是谁的呢?允许人家在边区建立反动据点，许多土匪特务闹的非常厉害；农民糊里糊涂，对党非常怨恨，党内的思想模糊。这情形一直到三八年五月以后，毛主席才出了布告纠正了，这叫路线斗争不叫呢?在学六大文件时，郭洪涛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这样说“过去没有路线斗争，过去就是糊里糊涂的搞”，这不是彼此利用叫什么呀?没有路线斗争，你怎么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既说是右倾机会主义，怎么又说没有路线斗争呢?这不是奇怪吗?同黄子文的斗争、同杜衡的斗争叫什么呢?我讲了这些事实大家就清楚了，到底历史上的争论是原则的争论，还是无原则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还是不是路线的争论?是为人民的争论，还是糊里糊涂的争论?大家就很清楚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高干会议的结论问题

高干会的结论，大家同意了，这次大家又同意的。但是，高干会以后为什么还有一些问题呢？因为郭洪涛同志搞了歪风战线向党进攻，这是洪涛同志自己谈的。高干会以后，就是同歪风战线的斗争。高干会后边区内绝大多数，真正老实的，没有个人主义的同志是清楚的。边区内只有洪涛同志等很少数的同志，提出各色各样的意见。在路线上，他们是以宗派的立场来看历史问题，来看现在的问题。他们自己是宗派，他们以反宗派的口号在党内进行挑拨。他们的斗争方法是采取隐蔽的、两面派的手段，比如他同我谈，总是说“老兄你要好好的帮助我”他从来不说是路线错误。过去开高干会时，他说“老兄，党籍问题保留着吧！”我说“党籍问题是个形式问题，根本问题是你能不能觉悟，共产党员不共产党员还不是个名义！”另外他又采取两面派的手法，隐蔽斗争的方法。因为领导权不在他手里，他就采取运动战的方法，游击战的手段，他不敢来阵地战。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又说“我知道错了，一定要把我的党籍保留定，无论如何我要改，我再不改就开除我的党籍”，他在防空洞里可以唱秦腔、唱二簧，可以唱什么片子，到太阳地就变成一把灰了，采取隐蔽的方法，非法的活动。有意见应该向党、向中央写报告，应向中共党校提出来。为什么不提呢？在这里讲是这样，在那里讲又是那样，采取非法的、无组织、无原则、无纪律的活动，用两面派的手段到处挑拨离间，提出历史问题，人事问题，某一个、某一个……其实质量是什么呢？企图路线一条两条，人事这样那样。谢子长怎样，闫红彦怎样，这个怎样，那个怎样，其目的企图推翻高干会的结论。这是他反对正确路线的新花样，并且向大家表示这个问题，说“我是对高岗有意见，我不是对其他什么人”。如果是高岗错了，全党都应该反对；如果高干会的路线是对的，就不应该曲解。高干会是在弼时、康生、陈云、总司令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指导之下召开的，结论是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对高干会的路线不满，就是说对中央的路线的不满，对党的路线的不满，你真大胆呀！对高干会怎样曲解呢？他说高干会是“御用”的。高干会是中共四个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书记处批准的，就叫御用会议？说现在有中央在，中央走了以后西北党要分家，实际上是一肚

子气。现在这些干部都在嘛!三八年兰家坪会议上不选郭洪涛作中央委员,少奇同志那次也参加了。我当时说“这是生死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洛甫同志也没有做这个结论,只是批评郭洪涛同志,说他“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欲很坏”。历史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事实,党内的原则需要搞清楚。为什么说是“御用”的呢?相反的倒是当时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毛主席一再制止这个问题。又说“高干会是不民主的,火力太强”。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难道还是一个人的意见?这次新的党章,是由七大通过了叫民主呢?还是少奇同志起草党章以后不经怪大家看、一下就发下去叫民主呢?在高干会时,大家都站起来喊“要枪毙、要镇压”,因你杀的人太多了,太可恨了。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等中央红军来了就这样胡搞?”这就不叫民主吗?民主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的。如果说洪涛同志是布什维克,就是民主?大家说你不对,你错了,你是机会主义,那就不叫民主吗?民主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你一个人的利益呢?

他给白如冰讲, “什么干部政策,还不是打击人,你在延长的处罚,就是高岗打击你”。那不是发了疯吗?人家知也不知道。他又说: “现在的干部政策,打得人爬也爬不起来,只说我打击了人,我们打死了谁呢?”你说你没有打死人,你究竟要打死多少人呢?你说高干会的火力怎样大,都是陕北人,何必那样厉害!陕北人就不应该批评吗?我们又不是封建集团。过去有这么一种同志,他说“算了吧!都是陕北人,我也搞不清楚你们的问题。”这种人认为,思想斗争可以马虎;他们主张一般的思想斗争,不主张具体的思想斗争;他们主张抽象的思想斗争,不主张命题的斗争、山头主义。一般的抽象的帽子,他戴上一句话也不说,如果要给他画像,他就赶快说“那不像样子”。思想斗争不画像嘛?你存在有这种思想嘛?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讲“我有脱离群众、打骂群众”,这不要紧,但是你说这个性质是军阀主义的,那就不可以的。你要具体的说什么样子,什么个人主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家,他就不可以了。你如果把刀子磨的很快,割掉那些非无产阶级意识,他总是掩护,赶快埋藏起来。我们把

这些东西揭发出来，这就叫过火吗？思想问题可以马虎吗？他们不主张彻底的思想斗争，不主张挖根；他们主张剥皮，皮稍微剥一点不要紧，但是不要挖根。因此他们在思想斗争当中，在火力强的面前，就表示畏惧。这样讲一句，那样讲一句，他不是明确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不是有原则的。因此这些人对于陕北问题，他说“陕北里边争什么，还不是狗打架，管球他！”人家清算路线，清算历史，他说是“狗打架”，还说什么“霸王要纳粮，汉王也要纳粮，管球他，我是采取中间立场”。这还有什么中间立场？还不是嘴里讲中间立场，心里却说“都是陕北人，何苦呢？”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同情郭洪涛，认为不应该清算这个思想，实际上便是取消思想斗争。因为不弄清路线，就是无原则的团结。这种思想是害党害人的，也不能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进步，所以我们高干会就清算了这个路线，就是为了更好的团结。结论中央作了，中央还做了决定，我的报告全体通过，这次座谈会上大家又同意。当然高干会也有缺点，就是民主放开，大家很气愤，不能很镇静，以致这个一问“你到底怎么搞的”，那个也问“你到底怎么搞的”，这样一问问得你不得了。同时高干会对四中全会估计不正确，因为那时中共没有做结论，也只能那样估计；今天中央已经作了结论，再是那样估计就错了。高干会上还说刘志丹同志是朴素的唯物论者，那是瞎驴碰草垛，那样估计是错误的，因为志丹同志他一贯是自觉的。还有二十七军为什么不写？因为主要是写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性质，所以许多问题未能一一说明。二十七军是在志丹亲手领导下，在陕北党与人民斗争的基础上创造起来的，不是郭洪涛领导创造的；这一点他过去欺骗了中央，也欺骗了人民。你应该想一想，这是对高干会的问题。

其次所谓历史问题没有解决，分歧意见也有一些。他们讲领袖问题，有的同志也和我谈过：应该是谢子长、闫红彦、刘志丹。因为这些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次七大的风波就闹的相当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分歧是说红军的前身问题。阎红彦说：山西游击队是红军唯一的前身。我在高干会结论上所写的，是以刘志丹的部队和阎红彦山西过来的游击队，二者都是反帝同盟军的基础，而阎红彦认

为主流是后九天、晋西游击队到南梁堡，这是不妥当的。我看阎红彦同志在党校历史报告有夸大的地方，有不确实的地方，比如他说清涧兵暴是他领导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样的事。他以为审查他的人不清楚，可以骗过去。他还说后九天那一连都是共产党员，是他在那里搞的，这也不是事实。还有到下马关时，他去找高岗和张秀山，但是这些人不和他合作，这是错误的，也不是事实。后来我问他，他说这是笔记的错误。每一个关键都记错了，那就错的太多了。我们说到底红军主力在那里产生起来的，应该说是刘志丹，他从一九三〇年就搞起，昨天阎红彦同志讲他和老谢、志丹在三道川失败，这话讲的不妥当，是不对的，我知道的很清楚。你说的“后九天的党是我去组织的”，在座的李立光、谭生彬也去了，谭是组织于事，李是宣传干事，赵得洛是书记；那里一个连都是党员，那里是你搞起来的？至于在三道川，有的同志讲“你不同意子长的意见，跟张天之去干”，你说你是张天之人，因为你哥哥周维奇这样主张，你没有办法，所以老谢说还是你去比较妥当，因此你就到了下马关。为什么说高岗、张秀山不和你合作呢？以后你和张天之结合起来打徐团，又叫张天之把你的枪缴了，以后把你哥哥的枪也缴了。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职田镇开展游击战争，老谢离开了部队，这个过程你没有讲清楚。是不是应以后九天黄龙山为主？就打上后九天是事实，那里究竟是党领导，还是英雄领导呢？功劳是谁？应该进一步问一句：以后省委领导下，很大的兵运工作，如邓宝珊部队的兵暴失败算不算？王子元一个旅，石子俊部队的兵暴算不算？两党兵暴，灵右的兵暴，这些兵暴算不算？难道只有你搞的就算。这些没有汇合在南梁，你就说“我怎样怎样”，你那历史写的非常不妥当。刘志丹在省委领导下，做了多少兵运工作！他自己在桥上搞了一个旅，我、秀山、杨成森大批人都在他里面，等他活动起来再搞。以后又失败了，我回到蒙古找到赵伯平，搞了许多土匪，带到安定，你们过来二十几个人，是游击队。省委决定叫志丹做副主席，子长做总指挥，到南梁我当队委书记。到南梁这里有一个问题，邵式平同志说我把阎红彦长啦，短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那天讲有三种意见：一种主张枪毙，一种主张开除军籍，一种主张撤职，他自己

材料上写了。高岗不同意，怎么说我打击了他呢？这根本不是事实。我过去不认识他，我只到后九天去过一次，听说周维奇是他哥哥，我便在延安活动了王维多把他救出来，是为了争取他哥哥。我没有见过他的面，怎么说我打击了他呢？当时我说不应该开除军籍，也不能枪毙，并且在每一个土匪里抽出枪给他，把土匪的枪减少，叫他再组织一个队，这不对吗？当然有人要投陈国璋，你是坚决反对了，因此你就说：“我来了，我的队伍为主”。前天你讲“我给刘志丹一支枪，慢慢的他又活动起来了”；刘志丹在那里搞了多少年，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暴动了多少次，又失败了多少次，你说你是给他几支枪慢慢搞起来的，你那儿几支枪怎么几天就搞起几百人、一两百支枪呢？怎么能够这样快？那不是奇怪吗？你又说他部队里面尽是土匪，怎么尽是土匪呢？韦长寿是党员，白光伍、石正才、刘景范、马福金、刘约山，这些算不算党员？好多党员，里面有党的组织，怎么能说都是土匪呢？你说队长也是土匪，队长杨培胜他是小商人出身，被土匪抢了，他很气愤，以后就参加了红军，选用小商人搞了洪老五，这怎么能说他是土匪呢？人家打开了合水寨子，组织了游击队，搞了很多活动；一直到廿五军来了以后，说这个人“筋断了”是国民党割断的，肃反时把他清洗出去了，现在在南泥湾。你还说贾生财是土匪，他办兵团是刘志丹派去的，以后国民党捉住杀了，把他的头挂在城墙上，你说这叫土匪吗？人家部队里面有党的组织奋斗了多少年，你的就是唯一的前身，人家就不叫前身，这难道是省委领导错了吗？只有你才是唯一的领导人吗？不是这样的，还有过去的黄子文，杨仲元，胡廷俊等，他们是怎样来的？就是你是唯一的前身，那些都不能算前身吗？到底应以刘志丹在桥山活动多年和多少次的暴动以及他和群众的联系，从他这个主流为基础，还是以阎红彦为唯一的基础？我们应从历史上看他们和群众的联系以及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我在结论上所写的是以两者为基础，这难道写错了吗？你以后缴刘志丹的枪缴对了吗？他不是土匪，你把他枪缴了，就不算他前身吗？那你说杜衡在南山失败了那又怎样解释呢？问题不能这样讲。你们对刘志丹估计错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没有通知他，就把他

的党籍搞掉了，你亲自把他的枪下了，把他搞在一个窑里；我们去了，门口还站着卫兵；当然你说怕刘志丹自杀，志丹见了我们就哭，你这枪是缴得不对，是带有宗派性质。

还有历史上的问题，他讲过我“开小差”，说我“组织秘密队委”，还说“高岗没有做过队委书记，是他吹牛的”。以后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参加队伍？”他说“我也记不起，这些问题我不大清楚”，应该老实一点。你到达××峒时，十九人叛变，把我绑起来，绑在一个梢沟里，是第四国际高朗亭救了我的命。高朗亭问我是不是老石杰的人，那时他搞起来了游击队。我看见里面有几个青年学生是四中的(因为我民国十八年在这里工作过，我知道)。我问他归哪里管，高朗亭说“归第四国际”，我说你们是什么番号，他说“西北总指挥”。我听了，我说这糟糕了，怎么找到了第四国际？以后他才说：过去领导他的常黎夫(边区政府秘书处长)，为了要搞枪搞游击队的事，把他的团籍停止了；他说第三国际革命，大概第四国际更革命，所以就说了个第四国际，其实是他不懂得。以后我又问了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狡猾的很，我就骗他：我说我们那里有七八千红军，有六七个女看护，因为他受伤了，正在养伤，我给他做工作想骗他到边区来。我说你向韩城这些地方走，我就说追史巨傑，心里是追红军。追了两天没有追上，结果到了安条岑，队伍被包围了，一打就打散了；因为里面有很多土匪，我在那里天天扛伤兵，他们又不打人又不骂人，又碰到高朗亭，给我一个三号盒子枪。在木头沟一仗，把我搞到山底下，高朗亭和那些土匪都跑了，结果我晚上就到了沟门村，上张达元那里养伤。伤好以后就到庆阳，又跑到盘克、吴龙，阎红彦给我一枝套枪，叫我当兵去。我是队委书记，我什么话也没有讲，因为一讲你就动枪。你想想你过去的作风，什么党性，原则性就比较差一些。我就到三原当兵去了，我把我从国民党那里哗变过来的一营人，以及高朗亭给我的抢枪，我都告诉了你。你以后也派人去接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相信我吧！我是党的负责人，你就交给我一枝套抢枪，叫我去当兵，我到四村园当兵去了。以后所谓组织秘密队委是怎么回事呢？他在三村园，我在四村园，秘密队委是李良组织的，这个组织是错误的，

但是这个同志以后还是为了党牺牲了。李良是因为你们骂他是杨虎城派来的奸细，所以李良走时便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不管他怎么样不好，他总是省委派来的，你们用那样的态度对付他也是不对的。以后我由四村园转到了黑牛坞，知道金巨花、杨森、韦广平组织了秘密队委，韦是书记，叫我参加。我说你们这样搞是很危险的，被阎红彦知道了，你们都会要杀掉，于是我把这情形给省委报告了。以后浩如来了，他同意我的意见，这叫我组织秘密队委吗？应该老实些。阎红彦同志这两件事是搞的不好，给我一支枪，叫我当兵去。以后又给弼时讲，我从国民党那里把军队拉过来，你反说我带了一营人叛变，我被绑走了也是事实，你就不应该在弼时那里讲“高岗带了一营人叛变了”！你怎么讲这样一些无原则的话呢？另外阎红彦同志在反帝同盟军陕甘支队里搞了一年零一个月，难道在这一年零一个月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路线吗？就把这些路线除去，就能算形成了完整的路线吗？你自己也学了六大文件，你说你这个人过去是糊里糊涂的，你是糊里糊涂的，难道刘志丹也是糊里糊涂的吗？阎红彦同志对他个人估计过高，有许多地方不是事实，有许多无原则。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他参加山西游击队，领导山西的一部分兵变，以后到陕北他当了十天到二十天的队长。黄子文动摇跑掉了，但是他坚决，打仗很英勇这都是事实。他反对了南北分家，这也是对的，他说要合拢起来，这也是对的。他反对死守吴顷园子和李庚的斗争，这都是他的好处。但是他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这阻碍了他的进步。他自己这样讲，他的致命伤就是这个东西。他不大守纪律，缺乏组织原则，在过去的时候作风是很蛮横的，这是他的缺点。他不能像刘志丹一贯的正确路线相比，也不能同王世泰、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张达志这些人比，我是最清楚的。他自己讲，“事情没伤着我的时候是自由主义，事情伤着我的时候是个人主义”；“我过去不懂得什么路线，大家是糊里糊涂的干，所以是谢、阎、刘这样排”。所以红彦同志他对历史的前身问题，手枪的问题，秘密队委的问题，叛变的问题，三大领袖的问题(刘、谢、阎)，这些问题郭洪涛说“红彦利用我，我也利用他。但是我主要是利用他”，这个问题值得非常的警惕。郭洪涛到底是不是路线宗

派?纠缠不清，态度不明，他说我有时候支持他一下，那么这就不对了，不应该这样，事情总是有是非的。

第二，关于二十七军的问题。为什么不写二十七军呢?为什么高干会不提二十七军呢?这不是有宗派吗?高干会叫路线总结，一个是机会主义，一个不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换了一下。中央来了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搞清楚了，但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是带着的，高干会以后帽子给朱、郭带上了。二十六军是反革命封建集团等等，那些人都已经牺牲了，主要是以路线来说的。就算不写二十七军?是不是二十七军是你郭洪涛创造的?二十七军还是刘志丹同志亲自领导创造出来的。你去讲过一次话?开过多少会?你自己想想，那样的会钻空子。过去你给洛甫同志讲，“二十七军是你回来从三条枪创造起来的”，你怎么敢这样说?!人都还在。当然这次写整个历史的时候，应该把二十七军写进去，她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力量。

第三，为什么写刘志丹为代表，而不写谢子长呢?过去关于谢子长有个地方提到过，感觉到有些地方不便于写。这次大家都讲出来了，谢子长他做为一个完整路线的代表是不妥当的，比方收刘志丹的枪的问题，在杨家园子站起来积极讲话，这都是不对的。你叫杜衡打了，你又回来打这些人。他赞成了左的路线，这怎么写以刘、谢为代表反对杜衡、朱、郭的路线呢?他和朱、郭(应为他 and 郭洪涛)站在一起打击过刘志丹。同时在郭洪涛来后有十天到二十天的功夫，他便病了，以后就病故了。他没有反对过朱、郭的路线，而且是支持了他们的路线。老实说，如果没有老谢支持他，就是郭洪涛一个人，大家都叫他小脑，他也搞不起来。他是人民的领袖，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党应该尊重。他虽然是在那两个问题犯了错误，但是他过去在党的斗争中是好的，他参加了部队，陕甘游击队的领导，领导过清涧的暴动(那时有阎揆要、史唯然、没有红彦同志)。清涧的暴动，不是打的工农红军旗子，是为第六旅复仇。他领导清涧暴动的时候，是工农红军副总指挥，他参加过渭华暴动。一贯的活动是好的，群众叫他“谢青天”。他是人

民的领袖，我们爱戴他。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路线代表也好，领袖也好，不仅是能够解决人民日常的利益，而且是能够代表人民最高的利益，能够看的远，路线站得稳。要从和人民的联系，要从他的事业看，是不是能够代表人民最高利益。不能说我和他有感情，就应该这样摆。郭洪涛说：老谢是领袖，如果老谢不死的话，那里挨得上刘志丹！（他在学校的发言是这样写的）我们说把他做为路线代表，不如刘志丹完整，高干会之后，所以写的是刘志丹，同时也不能写几十个。现在中央是以毛主席为代表，为什么不把少奇也写上？不能写那样一大堆。郭洪涛就是在这些地方挑。

关于取消子长县的问题，郭洪涛同志他给王若飞讲，“高岗有宗派，他把子长县也取消了”。这是他自己住在城里南山上取消的，他还说他去清涧了不知道，是我取消的。是你取消的，怎么说是我取消的呢？

再就是说不给子长修陵，子长的陵是第一个修的，在三八年九月就修了。他又说修的不如志丹的好，这就难说了。过去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大礼堂是陕公修的，窗子是那样的，现在又是这样的，进步了。过去我们到安塞修了一个大礼堂，那和现在杨家岭的大礼堂简直不能比。子长的陵是第一个修的，三九年开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说高岗对谢子长好，对刘志丹不好，所以在这个会上就决定给志丹修。现在又说志丹修的是新式的，比子长的好，这不是宗派吗？郭洪涛的名堂真是太多了！我们逼的没有办法，两次开会之后，林主席说再破五千万修。现在金融涨价，由三块到十八块，是不是可以迟一个时候，要修就修，这是宗派吗？

关于挂相片的问题。说为什么挂志丹和我的，不挂子长的。开始发现我的相片的时候，我就给李卓然同志说“不要这样搞”，要他给各书店写信，我亲自也到各书店去，叫他们不要这样搞。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这样多，为什么要把我的挂出来呢？滑稽得很。过去练兵的时候，搞什么高岗刺杀手，这叫什么东西？我曾给报社、延安市委、的肖向荣、谭政都写过信，要他们不要这样搞。我这一脸麻子，画出

来象个什么样子(笑声)?以后我也给景范讲过,谁的也不要挂。参议会大礼堂说是议长也在挂,这个名堂真是滑稽的很。

又说不给子长写传……志丹的传记我们写了没有?他们两个都是领袖,现在柯仲平到处在找材料。难道我每天就是管这些事?张秀山同志说郭洪涛是无孔不入,大小孔他都能钻进(笑声),真是这样的。

西北局的人事问题没有解决。上面我说过了,郭洪涛他对人说:他“过去没有把人打死,现在竟有人把人打死了”。李仲英说:“在部队改编的时候不提拔二十七军的”;又说高干会之后到现在,陕北没有一个一元化;他又说,“对于老干部现在是杀牛的办法。过去在内战的时候是开荒,现在荒开下了,粮食打下了,有了蒸馍干饭了,没有菜吃,所以现在要杀牛做菜吃”。他是一个老牛,他还写了一首诗,也不知道是谁帮他写的:“揭竿相从十数秋,桥山遍走垮阵游。昔日同甘又共苦,今何豆箕不相容?”“揭竿相从”就是说刘志丹和我有“十数秋”,这个大家都回答了他,你就没有揭竿,你是三四年冬出来的。“桥山遍走垮阵游”,你就没有在桥山上垮过一步。

“昔日同甘又共苦”就是说过去在一起共过患难的。这是他写的诗,他还说干部有“红中”、“白板”、“发财”,“东、南、西、北风之分”。在宗派下面的是“红中”、“白板”、“发财”,另外就是东南西北风,“没有翻”(笑声)。又说新干部惠中权不应该提拔,黄静波不应该提拔,刘秉温不应该提拔,康天民也不应该提拔。说他们是新的,资格不够,没有受过战场法庭的严格检验。郭洪涛又说:在我领导下的干部吃不开了,受打击了,“老子吃不开了,儿子也吃不开了”。什么我的干部,你的干部,新娘后娘之分,就是说过去郭洪涛提拔的干部今天都受了打击,受排斥;有些同志一时的生活照顾不到,在招待所没有给他老婆吃饭,也是宗派主义。又说在高干会时表扬了一些人是不公道的,不应该表扬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说王世泰抽大烟、流氓。不应该表扬,霍维德、李景波不应该表扬,说高干会是以宗派反宗派。李仲英又说:“盲从为德,拍打为才,服从个人为资”。我们现在看看西北局有无此事,我们使用的干部政策不是

以你是这个地区，我是那个地区，你是这个军队，我是那个军队的，不是这样的。这样提倒是一个小集团，倒是宗派。干部政策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他能够担任这个工作；还要有德、有才能，是以给党有得，给人民有利益为前提的。当然是要照顾到老干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进步慢，就不要新干部进步，说你等着我，你不要进去，你进去把我的位子抢了怎么办？不能这样想。我们要看他能不能胜任，能不能把工作做好，对于人民有没有利？即使我做一个军长，坐在那里要人家来加冠，这有多少好处呢？想想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出门就带着八、九个驳壳枪，这到底有多少好处？自己反省一下。一个革命军人，还有封建的意识，要想一想。郭洪涛提拔是害了你，三四年出来参加的部队，当排长，连长，营长，代理军长，一下就当军长。刘志丹都不能当军长，你比刘志丹还强？！人家提拔你是有目的的，是害了你？自己有嗜好，现在把大烟瘾丢了，在党校好好的提高一下，难道这叫做打击吗？在党校把你的理论学好，政策学好，这叫做打击吗？说你好的很，这对你个人，对党有什么好处？提拔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为标准，如果从个人关系方面来说，你是我的学生，我更应该提拔你了。我们不是从个人出发，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还有说对刘约山，追随十六年之久……自己要反省一下。要你当参谋处长，财经办事处副处长，贸易局长，但你都没搞好，林老、谢老批评你，说你不成。即使说我打了你一拳，也是应该的，你不成。只是说我老，应该摆在这里。你老是你老，你要给人民“老出”东西来！我们都是三十多的四十以上的人了，如果说你们都不要来，我们死了共产党就断根了。人家进步有能力，为什么不拿能力德性来比？他能够给人民办事办得好。惠中权不如谁？总是不比进步的，总是背着一个包袱。你过去参加了革命这是好的，但是今天有缺点。过去有功，也有缺点，功应该表扬，缺点应该改正。给党多做一点事。“我就是这样，老子什么也不怕”，你多说几个“老子”，这样对党有什么好处？不比进步的，不比有德性的，能给人民办事的。过去那个宗派提拔你，满足了你个人主义的欲望。今天不成要学习，要把个人主义的毛病取消一下，再提高一步。当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个人主义便感到了满足，但是一旦转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能满足个人主义的欲望了。这样，蹄蹄爪爪就都暴露出来了。我们拿事实来比，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不应该吗？三边王世泰不应该吗？陇东段德张不应该吗？关中的张德生不应该吗？张是榆林人，也没有参加过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不应该，外面的也不应该，就是郭洪涛宗派主义下的应该。李景膺是那里来的呢？现在的高峰是哪里来的？自治民是那来的呢？整个的地委书记有几个是二十六军的？有没有一个？少奇同志几次的和我谈，叫我狠狠地调一批老干部去党校学习，再提拔一批新干部出来。那时调王世泰去学习，但是贺晋年他要去学习，张秀山也去学习了，黄罗斌也在学习。决定习仲勋也去学习的，调一大批干部去学习。

说没有一个一元化。现在有几个一元化？都是我的“嫡系”吗？自治民是那来的？高峰是那来的？李景膺、段德章、李合邦、关中的张德生，能不能说都是二十六军的呢？二十六军一个也没有。能不能这样讲？简直是毫无原则。他到处钻空子进行挑拨，对干部的提拔有宗派，我们拿这几个分区专员来看，陕北的有几个，陕甘的有几个。比如绥德的袁任远是广西七军来的，杨和亭、罗成德、张鹏图他们是那来的呢？照你的看法二十六军不能做，外来的不能做，陕北的也不能做，就是你郭洪涛提拔的能做？再看县长、书记，绝大多数是陕北干部。军队方面，二十七军少是因调了一些人在党校学习，李宗贵、李仲英、贺吉祥，我们调他们学习的原因是为了提高他们一步，调其他人学习也是这个目的，而不是像一些人说是打击他们。张邦英、张秀山、黄罗斌等都调在党校学习，难道我们是为了打击他们吗？不是的，我上边讲过了，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因此，我们说把调学习当作打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王世泰是二十六军的一个老同志，他当团长时你还没有参加部队。王世泰同志以后当了保安司令，部队达到八千多，他从来没有想保安部队是他的，不让编制。在留守兵团领导下，把他的部队编入留守部队，他没有说一句话。保安司令只编了一个旅，由贺晋年当旅长，他当三边地委书记。现在他一不是保安司令的旅长，二不是政委，今天派他到关中领导一个新的部队。文年生

帶了两个主力团出去了，留了一部分新战士由王世泰去领导。照那些人讲，这又不是打击了他吗？这些人总是处处进行挑拨。我们这样分配他的工作，是因为他军事才能强，对党对边区有好处，因此这样分配了他。我们的一切应从人民、党的利益着眼，这样看问题才是对的。

二是新老干部问题。我们看新知识分子干部，到底提拔了多少。有人说我们对新知识分子干部注意了，对老干部提拔培养不够。其实，在高干会后，我们是更多的注意了提拔培养老干部，大批的调到党校学习。当时也可能对个别干部注意不够，但这也不能就说是打击老干部，我们对一些老干部很早就注意了培养他们。比如刘约山调他住过马列学院，党校这不叫培养吗？难道党校是监狱吗？叫你到党校去提高理论，等局面开展好出去工作，这还叫不培养？这还叫打击吗？这样的讲法自己应该想一想。你完全不学理论，不学政策，不学路线，在那里摆老资格是不行的。我们提拔老干部，能不能单以资格老为标准？是不能的。在现在状况下，是否需要提拔新干部？是需要的。你说你老，那些新知识分子他们往前钻，他们进步很快。我们说你进步呀！我怎样办，我们不应该眼红妒忌他们，相反的我们应该帮助鼓励他们好好进步。新知识分子干部有朝气，他们在加速的向前进步，我么自己也应该努力赶上去，而不是眼红妒忌他们。当然被提拔的干部，应更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和建议，绝不能有一点骄傲摆架子。如果个别同志因提拔而骄傲起来，摆起架子，浪费等，我们是要严厉地纠正他。有些人因不提自己而发牢骚，实质上是一种地位观点。我们是要给人民谋利益，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益的，我们就这样办，如果对党对人民没有利益有损害，我们是不干的。但是还有一种人他不是这样去想，只要把他摆上去就对了，如果不照他这样办，不提拔他自己，他便发牢骚说怪话，这种人自己应该好好想一想。

三是干部表扬问题：表扬过的人也可能有缺点，未表扬的不能说不是好干部。我们表扬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推动工作。霍维德、李景波的表扬提拔，郭洪涛等人说“不应该表扬提拔他们”，李景波原来就是你的秘书长，霍维德原来就是苏维埃主

席，你在时他便当关中专员，他现在是财政所副所长，怎么说提拔他快了呢？反正你老兄总是钻空子。比如对刘秉温的提拔吧，你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不提拔刘秉温，这些人是宗派”。刘秉温是十几年的老苏维埃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给我们转来；我们提拔了他，但你说我们提拔刘秉温是宗派。你是怎么样搞的，郭洪涛你老兄太不老实了。你说对李景波的表扬，是因为李景波在高干会上反对了你；实际上李景波是把你肮脏东西都反映出来了，因为他是你的秘书长，他知道你的底细。霍维德很早就不同意你的意见，他给洛甫写了很多信。这些干部有没有缺点，霍维德在害病当中肯定有一些缺点，我叫组织部去查看，但是也不是像他那样的夸大。

当然，今后表扬干部，应经过群众，应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配合起来，全面的了解干部。

根据上述各点，西北局是不存在宗派主义，但并不是说西北局的干部政策就无缺点。有缺点而且不少，不仅现在有缺点，将来还会有缺点，比如对个别环节的干部配备上，个别的使用提拔上，也有不少的缺点。但是，这是不是就叫宗派主义呢？是不能这样叫。有缺点我们是不否认，我们的提拔干部是有原则的，比如刘约山他追随我十六年之久，他是拥护我，照一些人讲我应该给他一个位置。那是不能的，我们配备干部是要以党、人民利益为前提。我们表扬干部是为了推动工作，表扬他的经验，不是给这一个人的表扬，把他抬到天上；受表扬的人也不要骄傲，是表扬你的经验、你的方法，为了推动工作。有人提出没有宗派，正是他自己有宗派；他拿宗派的立场，宗派的口号，来达到他的宗派目的。郭洪涛那一天也讲过，他说：“他现在还是进行宗派的活动”，他这句话真是千真万确。

关于领导方式和作风问题，有人提出西北局领导方式问题未解决。我们承认有许多毛病，但是我们基本上已解决了问题，在高干会后有进步。经过生产整风，和群众的关系有进步，党内民主作风有进步，指导方法上有调查研究的风气，党、政、军、民间的关系是有了大的进步，以及领导上一元化的建立都有很大的进步。不管别的，问题是

人民说好。关于领导作风问题，西北局过去有过一次座谈会，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这里就不讲了。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许多缺点，比如还存在有强迫命令，自流现象，党的民主不够，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本位主义等缺点。

四是关于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有人说：“提张秀山、王世泰、习仲勋，不提阎红彦是不公平，是宗派”。张、王、习不是我提出的，而是经过各个组提出，后经主席团把名单搞出来的，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就算是我提出来的，是不是宗派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比你强。还有人说：“高岗有山里山外的宗派”，“七大前不开历史座谈会，是高岗怕当不上中央委员”，“中央走后陕北党员分家”。并对张秀山、王世泰、习仲勋造了许多谣言：说他们“吸大烟”，说张秀山“变节”，说“习仲勋是个小娃娃，没有做过工作，糊里糊涂，吸大烟等”，这一切都是造谣挑拨；说：“王世泰是空中堡垒”等。这次历史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讲的好：“你说人家是空中堡垒，你是炸弹、地雷吗？你不是别的，你才是一个空中气球？”（笑声）这句讲的很对。他们在七大开会当中，造成一个很大的风波。他们拿宗派的立场，用反宗派的口号，利用这些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和山头主义的思想相结合。毛主席提出：“我们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郭洪涛认为有空可钻，他企图发展山头，建立山头，进行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他说“你看两方面军，四方面军，有贺老总、徐向前领导在开山头会，就是我们这没有，刘志丹死了我们没有山（头）”。他企图想恢复一个山头，建立一个山头；他说毛主席还承认山头，毛主席说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最后达到消灭山头。这个山头本来不是好东西，我们党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山头，但是他老兄却想搞许多个人主义山头，小资产阶级山头，宗派山头。搞好这些山头，他好在这些山头上边转一转，打好游击。他从来不想方法消灭山头，他希望存在着许多山头，他好钻空子，实际上这叫破坏党的团结。因此这次风波：是郭洪涛为代表的宗派主义的残余，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回光返照”，他们反对正确路线的最后挣扎。他们企图在七大来搞一个鬼名堂，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边区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他

在正面不敢这样讲。郭洪涛上次也说过，“这次大风波，我在先就布置好了，我先把炸弹埋好，然后把门关上，在家里打麻将。”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手里拿着炸弹，对付国民党还是对付共产党？把这个炸弹安在共产党的营垒里边，还是安在国民党营垒里边？应该清楚的回答。郭洪涛这个炸弹使用的方向是错了，应该安在国民党营垒内，而不应该安在共产党营垒内。为什么你在七大这个期间搞这个东西，你的目的何在？在七大当中搞，这个性质就不是简单的。他自己说他造成了这个歪风阵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三、分歧的性质与根源

1、性质：是两种历史观的分歧。高干会是一种以人民为基础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陕甘红军，陕甘苏区，党员在这里头领导，当作发展的过程来看的历史观(集体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从大革命，清涧兵暴，渭华暴动，二团时代，南梁时代，到陕北陕甘汇合时代，是一个发展过程。在各个斗争当中，人民和党领导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区域，是集体唯物主义，不是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志丹在这中间的作用是相当大。另一种人是以个人作为基础的历史观(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如郭洪涛说：“我拿三枝枪暴动起来创造了陕北苏区，创造了二十七军……”我怎样怎样。阎红彦同志他那个历史自传，也是从个人出发，当然他和郭洪涛根本不同了，他有功也有过。郭洪涛说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因此把自己描写成盘古、上帝；我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我来了制造了历史，这种主观主义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有两种检讨历史的态度：一种是总结历史，从历史斗争当中取得经验教训，教育人民教育党；一种是从历史当中贪功，为个人争功劳，我是怎样怎样。要摆位置，这是两种人，他们的目的不同，是两种思想方法的分歧，是无产与非无产的分歧。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人民大众服务，一种是为个人服务。在组织上，

一种是有原则性的，一种是无原则性的，采取宗派反党的活动，反对正确领导。郭洪涛上次也讲过，他造成了歪风阵线，向党进攻。

2、社会根据与历史根源：他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但是也有很多同志不同意这样的说，他们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家，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研究。小资产阶级，他主观上想革命是很好的；他这个人不一定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他表现出了一些什么呢？我只举一件事情：他对唐洪辰等人讲，“陕北红军比哪里的也多，中央却不给编一个师”，这不是闹宗派吗？红军还分陕北的，这里的那里的，它都是党的人民的。就是编上一个师，试问你能担负起这个职责吗？你和刘、贺、林这三位师长比嘛？你能担负起这个师长职位吗？你说这个话有什么好处？你挑拨陕北干部对中央不满，还有一些同志和郭洪涛有同感，说“不给陕北编军队”，这样的来闹。大家看这不叫宗派叫什么呢？造成党内的不团结。

三是宗派主义及个人主义者对党的危害：这些人从来不是把自己当作党的工具，而是把党的一切当作自己的工具；不是把人民作为他的上司，而是把他当作人民的老爷。一切为他服务，一切从我字出发，不管党和人民的利益。

四是一般的社会历史根源外，应区别以下几种人：

第一、极少数的人，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宗派主义思想的残余，他们对历史有成见。他们“吹、骗、装、打、钻”，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式，进行挑拨离间；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山里山外进行活动。招兵买马、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生动活动，极其灵巧的利用一切机会，利用一切不满党的人，向党进攻。他的这些讲话，他的这些活动，不是从正面正式提出；他在这个场合巧妙的讲几句，在那个场合巧妙的讲几句，采取这样的手法来到处钻空子。他总的目的，企图想推翻党的正确领导，反对西北局现在的领导。朱、郭在以前讲“中央不办事，中央不主持公道”；还有个别的人也这样讲，当然他们和朱、郭

不同。他们企图推翻现在的领导，这种活动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能允许，他们虽是极少数的几个人，但对党的危害却很大。

第二、一些人带有个人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同志，他们是宗派活动的市场，是雇主。有一些人，他的个人主义很浓厚，有一些人他的个人主义差一些，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山外的，他不知道情况，他有盲目性，他受了这些人的利用，上了这些人的当。思想方法上的盲目性，利用这样几种人。朱理治、郭洪涛是一类人，但朱理治在高干会后和郭洪涛不同，他没有这样搞。阎红彦同志个人主义比较厉害一些，还有一些有个人主义的，还有利用一些山里山外不满党的人，山外的主要利用盲目性。他们采用这样的手法，在七大这样挑。如何克服这种风气呢？如何克服这样看问题呢？思想上原则问题毫不退步，这是无产与非无产的斗争。无产阶级刀刃磨的非常快，割掉你这东西，你要用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就不可能。比如他想提拔非党员——如像黄子文、张文华、蔡子伟之类做为党的干部，建立这样的党，那就不成，思想上组织原则上不能让步。有些人也许会这样问：你是不是要保护人呢？毛主席提出要保护人，不打死人。是的，不像过去肃反，一个一个把脑袋杀掉，但是我们不能保护错误思想非法活动，要揭穿他们的企图。他们企图用保护好人的基调，来掩盖无原则反对有原则的斗争。他们说不要斗争，把组织上反对非法斗争当成不应该。我们说保护人，不是保护少数人的错误思想非法活动。

要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残余，特别是残余的山头主义。说“刘志丹死了，这里应建立一个山头”，好多同志这样讲。你是哪个山头的，我是这个山头的，他总不能融化在这个总的山头里面。

还有对思想斗争，认为开一下会就解决了，把他简单化，看成很容易的，都是偏向。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十年，到今天没有解决，今天以后是不可以解决呢？那也不一定。毛主席讲的，不要垫高了枕头睡觉，高枕无忧，党内思想斗争不是那样容易。这种思想斗争，我看不仅是边区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其他边区以至全党范围恐怕也存在着。因此边区的同志也好，其他同志也好，都不要高枕无忧。

但是我们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呢?洪涛同志也提出说他“在七大时候是搞了这样一个炸弹,造成歪风阵线向党进攻”,党籍能不能再保留一次呢?这个问题当然还是要交给中央处理。不过党籍不党籍这是个名义,问题是在自己能不能改,能不能下决心挖老根,能不能把自己品质思想意识彻底改造,这决定于自己。你的党籍就是保留了,你再搞,还不过是个形式?相反的就是不保存你的党籍,如果你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党还是要你,这要决定你自己的努力。我这样说以后,大家也许会说:“为什么把郭洪涛的错误,什么都端出来了呢?”同志们,不端是不成的啊!他天天给你钻空子,只得端。郭洪涛同志怎样讲呢?他说这次看吧,“我再在党的面前搞无原则活动,我就怎么怎么样!”他反省我们欢迎,他说他怎么拍,怎么吹,怎么偷,怎么搞歪风阵线,在七大造成大的风波……。他反省,我们对他这种态度是欢迎的,希望他能够兑现,真正改造自己,为老百姓做事。我们应该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在这个会议上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明,过后不要冷嘲热讽,或见而远之。应该很热烈帮助他,见他犯了毛病就告诉他,“洪涛,你怎么味道又不对呀!你不应该这样搞呀!”

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正如毛主席说的,推了车子总是怕翻了,小心谨慎,列宁也讲过,“战败之士易学习”。没有犯过错误的说,“我过去就没有错误”,岂不知自己过去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在渭华暴动时口号叫“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经过多少风波才慢慢摸索到正确的方法,骄傲就不得了,说我马列主义怎样怎样,那一定要栽跟头。应该虚心检讨自己有多少错误,毛主席淳淳教诲我们“戒骄戒躁”,多检查自己的缺点。

边区很多同志存在着很大盲目性,他们不知道到底真实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应向客观学习,要搜集论据加以分析。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郭洪涛说一套,阎红彦说一套,究竟哪是真理,哪是错误?我们要辨别一下。应该有立场,站稳人民的立场,学习的立场,不骄傲的立场。搜集论据,加以分析,比较、判明是非,不然事情未弄清楚,也不向客观学习,便乱扯一气,事情一定不会搞好。只有这样才

能去掉盲目性，坚持原则性，只有这样才能全党团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干到底！（热烈鼓掌）

如何转变作风完成土改 在热中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革命高潮中争取胜利的关键

同志们！今天我们到底在一种什么形势下面呢？我们正处在新的革命高潮当中，这个高潮，主要表现在我军的全面反攻。表现在我军的不断胜利，士气高涨，愈战愈强，愈打愈大。表现在蒋匪军的不断失败，到处失败，士气低落，愈打愈小，愈打愈弱。表现在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人民奋起。表现在蒋占区的不断缩小，人民反抗。力量对比，士气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使敌我双方阵营发生剧烈变化，不能不对国际国内发生的深刻影响。蒋匪帮内部的信心，现在是愈来愈低了，又妄图玩弄新的阴谋花样来。美帝国主义对蒋匪帮进行反革命的无能，日益惊慌不安，正急着筹谋新的援助了。在革命力量剧烈进攻剧烈发展下，在革命新高潮的冲击下，全国各阶层都在发动，都在打算自己的出路。中间阶层对蒋匪帮空前不满，全国农民工人和一切民主分子，对共产党的信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信心空前提高。高潮从哪里来？是解放军打出来的。解放军又从那里来？是土地改革这个母亲生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主要是贫雇农军队，他们为保卫土地，民主独立和正义而战。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农民拿起枪打封建势力，打美帝国主义走狗，打卖国贼。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是建立在空前广大的土地改革基础上的，没有土改就没有大反攻，就不可能胜利。在土地革命上才能开出胜利之花。农民(工人也莫不如此)从来是当前翻身现

实利益出发的，有了土地和耕牛，农民就愿意去打蒋介石了。没有人打仗是不会有高潮的，高潮建立在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基础之上。前方军队打胜仗，这当然是高潮，但是我们后方有没有高潮呢？我们住在这些什么的“营子”，什么“窝铺”，还有高潮吗？当然有，而且一定要有高潮，没有后方的高潮，就没有前方的高潮。没有土地改革的高潮，就没有反攻胜利的高潮。自然，军事胜利的高潮会促进土改高潮更顺利发展，我们所有的人，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农民工人，都不是站在高潮之外，都是站在高潮中的战士，都与高潮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不是高潮中的空谈家，不是看高潮听高潮的人，而是高潮的积极工作者和组织者。我们的岗位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争取群运新高潮迅速全面猛烈的发展起来，取得彻底完成土改的胜利，组织力量供给前方。前方打仗，后方土改，这是分工合作，一个任务的两方面。前方打大蒋介石，英勇战斗，牺牲流血；后方消灭小蒋介石，也是剧烈的战斗。认为后方是和平环境，这是错误的。后方同样是战斗的环境，只有土地改革这一仗打好了，前方的仗才能打好，土改不彻底，拳头只这么大，打敌人就没有力，而且会愈打愈小，高潮来了也会退下去。土改愈彻底，拳头愈强大，胜利就愈大，高潮就愈大。我们必须驾起东风，与波作浪，迅速推动高潮发展，迅速建立有力的拳头，比现在大好几倍的拳头。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解放东北和华北，争取全国胜利的早日到来。

二、彻底改变我们的作风

最近两三个月来，在中央土地会议的精神与分局领导下，晋察热辽解放区若干地方(如热东及热中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一个群众性的摧毁封建、平分土地、搞垮假农会、假干部、坏分子，贫雇农起来掌权的伟大运动。许多干部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这种新的群众高潮，有些地方正在酝酿，将要到来。新收复区或蒋占区的广大农民，期待我

们快去解放。高潮已经到来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掌握，没有到来的地方，需要我们快去推动。新的形势和广大人民都要求一个普遍的、猛烈的群运新高潮迅速展开。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通常时期，不能停止于通常状态，通常观念。因此，一切不适合于今天形势的思想组织和作风都要改变，一定要建立完全适合今天新形势的思想和组织作风。一切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寿终正寝，一切两面派阳奉阴违的活动必须根绝，一切过时的、老一套的、慢腾腾的支应差事的摆摊子、维持前面的陈旧保守作风，都必须立即休息。官僚主义作风坐而论道多，亲自动手差，纠缠于日常事务，抓不住中心环节，不了解下面情况，不随时下去检查，不能认真发现问题，惯于坐在房内要数目字，作主观的估计，因而助长客里空的作风。据最近各地和报纸反应的实际情况，是假农会极多，是地主狗腿当道，是一部干部蜕化变质，是贫雇农翻个空身，是土地改革基本没有完成。可是，过去许多地方轻易收集数目字，轻易估计“基本完成”，作这种假报告的人，党性不纯之至，对人民不负责任，只图个人表功，与革命事业危害极大。这种不负责任，欺骗上级，反受鼓励的人，应深自惭愧。一个革命者要受得起批评，也要受得起鼓励，决不要因鼓励而昏昏头脑。鼓励的意义主要是鼓励一种作风，一种方法，一种积极性，个人总是极次要的。同志们！必须切记，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是阶级和人民而不是个人。要反对个人邀功，应该鼓励的是贫雇农、工人整个阶级，是忠诚与老实，是贫雇农万岁，是实事求是万岁，忠诚与老实万岁。过去没有下去的同志，现在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不为晚。但下去也有几种下法，直接下到那级这不叫下去，到下面听干部汇报这不叫下去，走马观花，这里看看，那里听听，不发现问题，不解决问题，通不叫下去。所谓下去是到农村直接和贫雇农见面，是到农村直接和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碰头，只有这样，才能纠正自己的脑筋，才能指导运动前进。所谓的机关，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同志，今天都应该想一想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完成什么中心任务，如何来完成这些任务。那种强调部门，各自为政，样样重要的做法，今天也必须令其休息。我们有许多地方领导思想很保守，总是墨守成规，积习难除，畏首畏尾，知难而退，小手小

脚，不敢放手。对新形势新任务往往失掉知觉。例如，想当普遍的交穷朋友，花去很多时间，偷偷摸摸，天天替老百姓扫地担水割麦子，精神可嘉，群众却莫名其妙。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这是“唯一重要的基本工作”，这是完全违背今天形势和群众要求的道地手工业方式。还有所谓“训练论”，说地主富农经验多，花样多，群众积极分子不会斗争，要去“训”练一下，我们是老师爷。还有“调查论”，一切都要调查好，贫雇农、地主的祖宗三代都要搞清楚，然后才进军。“我不是乱说调查研究不对，真正确实的农民调查材料，是只有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经过群众才能得到的”。还有“组织论”，不打好架子，好像就犯了法似的，要把贫雇农小组、翻身会、妇女、儿童、村干部组织好后方能行动。还有“阶段论”，这是过去最普遍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理论”，一定要先经过个别酝酿诉苦一番“许多贫雇农”不满地反映(“挨饿诉苦，诉苦挨饿”)，然后大小斗争，挖财宝、评成份、分果实，而最重要的一项分地却放在最后，前紧后松，弊端百出。大家要知道群众习惯的是一锅烩，我们这套“阶段论”是学校里的东西，是我们强迫群众接受的。总之，以上这一套已经有的已经过时，有的是干部的强迫命令，并不是真正群众的产物。我们同志搞惯了自己的一套，从主观分析出发，而不是从群众普遍大量的迫切要求出发。如果我们仍就做在屋子里等数字，发号施令，不下去研究发现问题，那也许还觉得能够“维持维持”；但问题是现在已经了解了一些下情，而形势是不等人的，那怎么办？我看要干脆、要斩铁断钉，明令宣布，把那些“交朋友”“阶段论”，把那些过时的老一套的东西全部送到历史陈列所中，停止它们的活动，宣布它们的非法，不然总是会有人留恋的，总是有人三步两回头的。现在大喝一声，再有人这样做，就是甘心落伍。

三、怎样整顿队伍

为适应新形势，贯彻新作风，必须先整顿队伍。现在可不可以将干部按级集中，反省坦白，坐在房子里开小会大会，开两个月解决一切问题呢？这是不可以的，也不可能的。在静止的状态中整调一切毛病，这是一种幻想。延安整风好几年工夫，有成绩，请问一切同志整掉一切毛病没有？延安学校学了好几年的东西不少，但是请问现在贫雇农路线这一套学过没有？整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整。我的意见：县以上干部可以先站一下队，开五天八天大会，不要一个个整，整最突出最典型的，有重点的整。主要整掉对土改的障碍，整掉地主富农思想，整掉立场不稳，整掉严重的官僚主义，整掉欺骗上级，整掉假报告，整掉独吞果实，把新形势的作风讲解清楚。县以上的先站一下队，不是解决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而是选择重点，选择突出的整。不过大家必须了解，整思想整队伍主要是行动中整，在群众的大风暴中整，去在贫雇农伟大进军中得到教育，得到改造，过去犯过错误的，思想有毛病的人，只要今天真正认识了错误，在行动中真正积极，证明确实愿当群众的长工，就要指出其光明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增加其努力向上的信心。整思想作风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要认为整一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要知阶级和党存在，整思想整党即存在。党内不纯的问题要解决，组织上必须清洗那些所谓“开明地主”，“劳动富农”，“三朝元老”，一切披上合法外衣的阶级异己分子，假装分子，都要清洗出去，半个不留丝毫也不留。我们各级政权、学校、经济机关中以及党内这样的人还在摆来摆去，这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是我们某些同志头脑中的“民主人士”，而是群众的眼中钉，难道我们的机关还要成为这些人的防空洞吗？有些同志对站稳立场一事实在是很模糊的，现在应该好好整顿一番。我想特别谈一下我们部队和土改关系问题。队伍在前方英勇战斗，解救蒋区人民，保卫人民的翻身，功劳极大。但另一方面，部队破坏群众纪律，阻碍土地改革的事情仍相当普遍。我在乡下跑跑，就碰到好多位解放军的指战员，可以打翻身农民，可以和正在被斗争的地主女儿勾勾搭搭，可以武装干涉土改，可以骂群众“爷爷在前面流血，就是你们这些穷小子在后方捣乱！”把地主富农的大车从群众手中夺过来，和地主富农合伙生产等等事实

现在还不少。这成什么传统，成什么样子，简直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谁生出来的，谁养活大的，为谁而牺牲流血的！我们是什么军队？我们是贫雇农工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是保卫人民、保卫土地、保卫民主、保卫独立而战的军队，我们是阶级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如不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不深入查阶级查思想，不把坏分子清洗出去，就将失去战斗力，失去人民的拥护，不能前进一步。为了保护贫雇翻身，为了让革命胜利必须大大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区村一级怎么整？区村干部蜕化变质的很多，假农会假干部很多，地主户的积极分子很多，流氓伪警的武委会主任也不少，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今天都是土改的绊脚石，妨碍贫雇农翻身。唯一的办法，是抛斗他们，把他们摔在一边。如果是化形地主富农恶霸，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的仍可以吸收一道工作，如果对这些搞来整顿整顿那就会吃亏。区干部好的还很多，他们过去办法少，很苦闷，要交给办法，在工作当中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真正坏的交群众处理。总之，我们要直接和贫雇农见面，在大进军中整顿区村一级。

四、大进军

工作团的组织可以县为单位，打乱党政民学的架子，统一各种力量，不要摆摊子，不要像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要大胆废除旧的一套组织形式，按当前工作需要建立部门，包办一切总揽一切，制定人负责。主要负责人不要坐着不动，要深入了解下情，及时交流经验。这不是一个平常的队伍，而是一个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队伍，一个立场坚定、纪律严明、令出如山、方针明确、势如破竹的队伍。工作团这么多干部下去，是不是叫大进军？还不是的，这不叫大进军，土改的主力军是贫雇农，只有把他们都动员起来，这才是大进军。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作风新方法，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求广大贫雇农(包括妇女，妇女在反封建和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直接见面，把土地法大纲交给

贫雇农自己掌握，让贫雇农自己起来动手动脚。这样就有人提出困难：天气太冷，穷人没衣穿，关不了会，但是贫雇农难道不正是因为冷要求分衣服吗？还有说：穷人嫌开会太多，麻烦的很，误工不起。过去开会是人当道，贫雇农懒洋洋，这有什么奇怪？提出这些困难，都是由于对今天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对群众觉悟估计不足，同时没有工作方法所致。在召开贫雇农大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和政治目的要非常明确，把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生动通俗讲解几遍(不是条条念)。说明地主的非法，地主的非正统，农民的合法农民的正统，号召全体贫雇农行动起来，把地主富农的地分掉，把粮食牲口房屋拿过来(给他们也留一份)，把印把子拿过来，把枪杆子拿过来。要强调这是国策，国家法令，全国如此，地主富农不照办就是违抗国法，就得严办。对于阶级的划分，也要通俗反复讲几遍打击的方向，中农不动的原则，都要很好交代清楚。对当前形势也讲几句，鼓励群众斗争勇气，许多地方经验证明，这样进行鼓动，稍加启发，广大贫雇农即自己行动起来，英勇坚决向地主富农进攻。这样让贫雇农自己行动起来是不是会搞乱呢？会不会发生偏向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点毛病不出是很困难的，切记不要将事情看的容易。可能发生两种偏向：一种猛雷猛雨，雨过天晴，冷冷清清；这是由于贫雇农的优势没有真正的独立起来。一种是放弃领导，说是走群众路线，听其自流；这是不懂、没有掌握运动发展的重要。错误总是难免的(共产党员先锋队还常犯错误)，问题就在防止大偏向。运动主要在正道上前进，领导人更要清醒一些，不要自满，切不要以为差不多了。一自满，一差不多，就发现不了问题，就会变质。要敢于怀疑，勤于下去检查，确实发现问题，不是天官赐福万事大吉。领导者要在大风暴中自觉的受锻炼，要注意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要腿勤眼尖嘴快，要常问常要，要及时交换经验，及时指导，随时发现偏向，随时加以纠正。不要过几个月再总结，放马后炮。大家要很好利用报纸，作为交流经验改进工作的主要武器。各地工作团要特别警惕新的包办代替，要时刻注意：如何使贫雇农取得经验掌握政策，如何更加提高贫雇农的觉悟和能力，对广大贫雇农的教育，也要采取新的方法，主要在行动中抓紧每一个关键，善于用生

动的话教育群众，如“挖出小米吃饱肚子，挖出衣被不挨冻”等。不要一般讲空洞道理，让老一套，不要天天开会，使群众生厌。对于坏人的教育要在广大群众面前进行，当群众把坏人撤职查办，让群众知道过去为什么是假的，其根源就是大家没有起来。有一个营子的群众撤换了地主狗腿子后说：“过去大家都隐瞒公家，现在都是公家人了！”这句话是极其深刻的，过去把民主教育，阶级教育抽象化，神秘化了。这种生动通俗的教育方法，才是提高阶级觉悟最好的方法，各地可以普遍推行。群众斗争再不要划阶级，应该是齐头并进，挖财宝的挖财宝，打地的打地，“老王打狗一起下手”。流氓坏分子混进来怎么办？不要怕流氓进来，主要的不让其掌握领导权。群运深入后，自然会淘汰下去的。选拔头行人总是要注意粗手笨脚的纯朴贫雇农，群众起来后，宣布几条什么样的人才能掌权。这样一个狂风暴雨中，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可以完成许多任务，微量扩军等，群众都会自动超过，但是绝不要幻想解决一切问题。运动的目的是要求解决主要的基本问题。土地产物真正彻底分了，地主威风彻底打垮了，假的坏的东西也整垮了，贫雇农真正应拿起印把子枪杆子掌握大权。其他农村中一些次要的问题：破鞋呀！阴谋呀！婆媳纠纷呀等等，则不要让其喧宾夺主，冲淡主题，拖延时间。在广大运动当中，发现和培养大批积极分子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不单是巩固本区工作的问题，同时可带一批积极分子，帮助其他地方的群众翻身，这就解决了干部问题。各区工作团都要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准备不久带到新收复区去。地主垮了，土地平分了，就要领导群众提出新的任务。村小队建立了没有，坏根挖尽了没有，地主翻把怎么办？特别要发动大家讨论明年大生产问题，工作告一段落，可召开大小规模的农代会，在这个会上着重阶级教育，检查政府和工作团的工作，检查干部的作风，检查政策上的缺点，解决贫雇农其他问题，讨论今后的任务。号召基本群众贫雇农的团结，鼓励阶级的向上心，防止地主阶级的反攻。

五、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总是讲来讲去讲的疲塌了，神秘化了，有括号的“群众路线”多得很。有的说“群众说啥算啥”，这是尾巴主义。有的是“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这是伪造民意，强迫群众接受自己的东西。还有“开各阶层联合会”，“通过群众”等等，都名之曰“群众路线”。到底农村中的群众路线，党的领导路线、组织路线是什么？我以为主要的就是贫雇农路线(中农要联合过来)，因为在我们的区域，贫雇农占农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他们是反对封建的主力，斗争的主力，当兵的主力，掌政建党都要依靠他们。所以说，农村中的群众路线就讲贫雇农路线好了。对于中农的团结要特别注意。一般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贫雇农绝不可以孤军奋斗，我们工作一开始就要找贫雇农，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给他们解决问题。组织路线经过贫雇农积极分子，工作路线通过广大贫雇农。在经济政治翻身中，再教育他们，提高他们，这样才能巩固农民土地、牲畜、公平和民主四大要求。贫雇农真正掌握之后，一切假农会、假积极分子、土皇帝、地主狗腿子才无法窃权夺利。

大家在土地会议的精神下，两三个月来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不少经验，旧的一套现在我们抛弃了，新的作风新的方法还待我们很好学习与建立。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紧张动员起来，以非常姿态完成非常任务，积极争取在明年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这是我们一切的中心工作，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就可迅速建立更大的拳头，打更大的胜仗，争取胜利早日到来。

在内蒙古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云泽同志在这个会上的总结报告很好，东北局完全同意。我在这

里讲五个问题。就是内蒙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工作的现状；内蒙党当前的政策；加强蒙汉干部的团结；今后的任务。

一、内蒙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

大家的发言说明一个问题：内蒙解放那条路走不通，那条路才走得通。内蒙人民几百年来，受尽了民族侵略者残酷的统治压迫。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者，都以各种残酷毒辣的办法，向内蒙人民刮油水，而内蒙的封建统治阶级则帮着刮。这就将一个历史上以强悍著称的民族，弄成皮包骨头、衰弱不堪，一天天走向衰亡的道路。扫除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压迫，这是内蒙人民多年来的迫切要求。但是为什么在过去老是达不到目的呢？这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像大家所说的，主要地是由于内蒙的封建统治者引狼入室，打着“自治”的招牌，勾结异族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以巩固其特权地位。如德穆楚克(德王)、李守信、白云梯、吴鹤龄等蒙奸，便是这种人物的代表。每个朝代出卖内蒙土地的是他们，叛变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是他们，和张作霖、吴俊陞结亲家的是他们，到蒋介石门下去做官的是他们，帮助日寇奴役内蒙人民打外蒙兄弟的也是他们。大家可以想想，内蒙的这些封建统治阶级，除过制造落后、愚昧、贫困、困苦、衰弱，除过搜刮民脂民膏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生活外，有没有真正替内蒙人民办过一件好事呢？

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依靠封建统治阶级，内蒙人民决不可能得到解放，相反的，只有日益走向被异族侵略者消灭的道路，内蒙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只有坚决与人民站在一起，方能有光明的前途。

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内蒙为什么又能获得解放呢？为什么又能建立东西蒙统一的自治政府呢？内蒙人民几百年来迫切要求为什么能一下达到目的呢？

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外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帮助，特别是内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结果。没有与外蒙出兵，日本帝国主义者能不能迅速打垮？东北和内蒙能不能迅速解放？显然是不可能的。帮助弱小民族求得解放，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天职，是列宁、斯大林规定的国策。外蒙经济上比内蒙还落后，然而他们已解放了二十五年之久，这就是由于有强大的苏联的援助。对于这个外在援助的重大因素，大家应有清楚的认识。在苏联和外蒙从内蒙撤兵以后，蒋介石匪帮就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向中国人民开火，其中也向内蒙人民开火。他们把德王用飞机载到重庆和北平，又把李守信送到东北。傅作义、杜聿明同时向东西蒙进攻。这时一切大小蒙奸，都蠢动起来，一切反动分子仍想继续坐在内蒙人民头上。可是，这一次蒋介石匪徒和内蒙的反动分子却没有达到目的。人民解放军在长城内外粉碎了蒋匪军的进攻，使得内蒙局势稳定，能够顺利进行各种民主改革。毫无疑问，没有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华中的胜利，内蒙将继续被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和内部封建统治者所侵略和奴役。单独依靠内蒙人民自己的力量，要粉碎国民党匪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第二个外在援助的重大因素，也应有清楚的认识。

当然，没有内蒙人民自己的努力，选择了正确的解放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与人民解放军合作，从而迅速发展了革命力量，内蒙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生动的历史教训是：内蒙只有在苏联与外蒙击败日本的援助之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只有在内蒙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当家的条件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大家应拿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来广泛地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从内蒙解放的道路证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一贯正确始终不渝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统一的内蒙自治政府，就是经过逐步发展而成立的。内蒙许多盟旗在其先后解放过程中，

都曾成立过地方性的自治政府，如抗战时期的绥蒙政府，“八一五”后在已解放的东西各盟旗普遍成立的地方自治政府。现在因为战争的原故，有些盟旗还需暂时委托解放区其他地方政府管理。但是随着形势的开展，内蒙自治政府的统一性必更加强。在全国解放后，则将按照自愿和民主的原则，由中国境内各民族组成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内蒙自治政府，将是这个联邦在国境北部的主要组成部分。

前面讲过，没有先进的兄弟的带有决定性的帮助，内蒙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现在是否可以不需要帮助了呢？毫无疑问，内蒙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还需要长期的大力帮助。例如：王爷庙发生了瘟疫，就必须由外面派防疫队去；游牧区的畜瘟、花柳病，没有近代医学，是不可能治好的，这就需要外面的帮助。总之，内蒙在各方面都与国内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决不可能幻想离开同国内外友邻民族(如汉族、苏联、外蒙等)的团结帮助，而能够孤立地求得自己的巩固发展。内蒙如果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努力追上汉族，那么所谓民族平等，也将是落空的。如果内蒙的经济状况，老是停留在“茶布水烟糖，牛马骆驼羊”的水平，那么，经济上的长期依赖，必然造成政治上的长期依赖。这样，内蒙民族实际上就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只有从经济、文化上真正提高，才能有实质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只有这样，内蒙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才能自由发展，内蒙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这就是我们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内蒙党的每一个同志，都应深刻了解这一点。

二、内蒙工作的现状

内蒙工作的现状，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成绩很大，但基础还不够稳固。

广大内蒙人民，自己选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确的民族解放道路。这就是“八一五”以来内蒙工作中最基本的收获。因此，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

首先是冲破各种障碍，经过自治联合会的一个准备阶段，终于成立了几百年来未有过的东西蒙统一的真正的人民的自治政府；并创建了内蒙人民自己的军队。这个政府和军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解放的战争，配合东北、华北解放军作战，肃清了内部的土匪，并保卫了内蒙人民胜利的果实。

其次，培养了三千多干部，训练了几千知识分子，发展了四千党员，和几千青年团员。在这一基础上，胜利地打破了内部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抵抗和妥协投降的阴谋。

再次，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土地与耕牛，有了自由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其他半农半牧与游牧区，也在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从此，内蒙的经济发展，开始得到了广大范围的自由。

在多年的曲折战争过程中，内蒙人民找到了他们自己真正的革命领袖——云泽同志。内蒙任何一个假仁假义的封建上层人物，在云主席的革命立场、光荣历史和工作成效的面前，迅速失去其影响。

内蒙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现在是空前提高了，历史造成的蒙汉民族的隔阂和对立，也在逐渐消除。

这是内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是全内蒙人民、内蒙军队、内蒙共产党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这个胜利奠定了内蒙自治政府今后发展的基础，帮助了全国的革命事业的前进，并且给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树立了求解放的榜样。

但是，现在是否一切事情都办好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很显然的，还差得很远。内蒙工作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还有许多问题。

首先是群众的组织性与觉悟性还差。经济文化方面积极的发展还待极大的努力。游牧区的工作刚开始做，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工作很

粗糙，发生了许多偏向，有的地方搞乱了，西蒙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

其次，干部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还很低。老干部少，经验也差，能掌握一个局面的不多。新干部提拔快，掌握政策更困难一些。至于管理财政经济建设，以及各种专门技术的干部更为缺乏。西蒙局面进一步打开后，也要准备派一批干部。因此，在干部的质量与数量方面，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努力提高。

此外，内蒙外部与内部的敌人还存在。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和蒙奸反动分子，对内蒙是决不会死心的。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很看重内蒙这块反苏反共的“前进阵地”。他们在内蒙附近设立了专门的特务机关，想尽千方百计，来破坏内蒙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想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来进行各种挑拨阴谋，分清敌我，防止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破坏内蒙人民的胜利事业。

三、内蒙党当前的政策

你们替内蒙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但在平分土地运动的很短时期(约两个月)内，也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比如半农半牧区和个别游牧区，也照样平分土地，工商业也有被侵犯了。个别地方，群众在反对蒙奸恶霸斗争中，掌握不清，有错杀了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曾发生拆庙焚经打喇嘛的行为等等。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领导干部，对内蒙的情况了解很差，犯了主观主义急性病和尾巴主义的错误所致。有的同志有所谓“顺手牵羊”的思想，斯大林称此种急躁病为马上共产主义化的骑兵式的袭击。对内蒙具体的经济环境、阶级结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一切特点以及人民的心理感情，缺少深入的了解与分析，机械地搬运汉人区的一套。而蒙古新干部更缺乏经验，盲目性很大，有的由于自己的家庭成份的顾虑，不公开提意见，有着严重的迎合性，

不能采取对人民更负责的态度。这两种情况一结合，就不免火上加油，事情更易于办糟。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在实际工作中碰的钉子，教导我们：在内蒙实行党的各种政策，每进行一项重要措施，必须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使之适合各个具体环境。必须照顾民族特点，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采取慎重的、缓进的、有步骤的、先后的工作方法。否则“有好心，无好报”，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不革命。例如宗教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历史性的问题。甚至苏联到现在也还有它的残余。而我们有的同志，竟强迫蒙人毁佛像。结果，群众在墙上挖洞，将佛爷藏在里面，外面用泥幕泥土，照旧磕头。这些同志不明真相，还自夸这一下破除了迷信。这是何等幼稚的行为！这种幼稚的行为，这种主观主义的急躁轻率现象，今后必须力戒。

关于在内蒙打击谁、团结谁的这个根本问题，有许多干部过去是没有搞清楚的。内蒙的基本革命队伍是工人，贫困中农、牧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一切劳动人民，这是内蒙民族的主体。但拥护内蒙自治政策、赞成民主改革的人，都应团结在一起，以便建立广泛的内蒙民族的反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大蒙奸、恶霸分子。

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经过内蒙党委和大家的研究，内蒙现阶段革命的基本政策，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承认内蒙境内的土地与牧场，为内蒙民族所有。扫除内蒙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与牧场所有制。

(二)废除封建阶段一切特权(不承担公民义务、强迫征役、无偿劳动、私买公地等)，废除奴隶制度，一切奴隶宣告完全解放，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

(三)废除土地改革前农村中一切地主、王公、高利贷者对贫苦农民与牧民的一切债权。但雇农中农与牧民间的债务，商业买卖间的债务，不在废除之列。

(四)农业区实行耕者有其田，原来一切封建地主与庙宇所占有的土地，一律收归公有，按人口统一分配给所有无地和少地蒙汉人民。对蒙古一般富农的土地不动，坚决保护中农。土地分配后，应即承认各阶层人民，对于其所分得与保留之土地，有自由经营、买卖与在特定条件下出租之权。

(五)牧畜区实行保护牧农，保护牧场，放牧自由。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的改善牧民的经济生活，发展畜牧。

(六)在半农半牧区，发展农业，发展畜牧，适当地提高贫苦农民与牧民的生活。

(七)取消蒙租。蒙汉人民对于自治政府，应有同等的公平负担与公民义务。

(八)蒙古人民信教自由。喇嘛不许有公民以外的特权。

(九)加强蒙汉人民的团结。在内蒙境内的蒙汉人民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律平等。

此外，在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农业区地主的土地耕畜财产没收平分，同时必须留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大蒙奸恶霸只本人不分。出租户口地之小地方，其财产不分，其土地一般不动。蒙人除恶霸大富农外，一般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已分者维持现状。中农坚决不动，只分进，不分出。半农半牧区农业占优势者，大地主的大垄地与耕畜，实行平分，小地主与富农不动。漫撒地一律不分。牧业占优势者，大牧主的耕畜分给农民，但耕畜与牧畜必须严加区分，并严禁分散牧群。个别大蒙奸恶霸的土地、牧畜、财产经政府批准没收后，土地可分给农民及愿种地之牧民。但对于牧畜，应作到不拆散牧群，由政府统一管理，组织牧民放牧，适当改善农牧民的生活。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方向为农业或牧业，依据群众自愿与自然条件决定，并应保护牧场。游牧区废除王公贵族上层的一切特权，废除奴隶制度。在牧民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畜牧经济，保护牧场。

以上这些政策，主要是根据今天内蒙主客观情况，民族特点，经济性质，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提出的。忽视这些，我们就会犯错误。

四、加强蒙汉干部团结

这次会议，反映蒙汉干部中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对待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尚有偏差。这种偏差，在形式上表现为蒙汉干部关系问题，以及领导关系问题(内蒙若干盟旗党的负责人多是汉人老干部)，而在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倾向问题。如何在思想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内蒙党当前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其他一切工作，一切问题就都不好解决，内蒙的革命车轮，就不能顺利前进。

在内蒙工作的汉人干部，绝大部分是努力的，有成绩的，蒙汉干部关系，基本上也是团结的。但是汉人干部容易有大民族的优越感，容易习惯汉人区的一套作法，容易看不起或不相信蒙古干部，觉得蒙古的新干部“未经过考验”，不善于对他们采取遇事虚心商量和耐心帮助的态度，而往往包办代替，不尊重蒙古干部，甚至给他们乱扣帽子。平分土地时，在左倾影响之下，有的旗政府无形中取消了，只挂县政府的牌子，出完全汉文的县政府的布告，蒙古小学也有停办了的。后来在纠正偏向时，又有个别地方补偿中农时，不补偿蒙古中农。有一个地方的负责同志，甚至认为蒙古人不会种地，主张好地分给汉人，坏地分给蒙人。蒙汉联军部队里面，发生不许蒙古兵说蒙古话的事情。这些虽属个别例子，但值得我们严重注意。此外，汉人干部不安心，“五日京兆”、“作客”思想相当严重。因此就不能积极沟通与蒙古同志的关系，不能专心研究蒙古情况，不愿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不能细致体会蒙古同志的心理感情。

以上这些情况，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不同，不论其程度的轻重，其思想实质可说都是大汉族主义的残余，或受了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斯大林曾批评过这些大民族主义思想说：“在边疆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强国’民族生存条件之下长大的，不知有民

族的压迫。因此他们往往缩小了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是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些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未考虑到某一些民族的阶级构成、文化生活、过去历史的特点，使党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这种情形，其结果便弄成曲解共产主义，倾向于大国精神、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方面”（联共十次大会民族主义报告提纲）。这一指责，就好像是对着我们今天许多同志的情况说的。

我这样一说，许多同志也许会很不舒服。当然犯这些思想毛病的同志，一般都是不知不觉犯的。他们过去长期在解放区生活，有了一套现成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其中有些在一般解放区本来没问题的，但一用到内蒙来，就发生问题了。汉人同志首先应该去掉作客思想，一心一意为内蒙人民办好事，长期的服务。毛主席规定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分汉人、蒙人或回人的。“共产党人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论联合政府）。“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地积极地帮助被压迫的或依赖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汉人干部应了解你们工作的伟大意义，要安心工作，同时应坚决克服上述各种思想的偏向。学习蒙古语言文字，注意民族形式，深刻领会蒙古群众与蒙古干部的心理感情，研究分析内蒙的社会情况，耐心帮助蒙古同志，并向他们虚心学习，把工作做得更好。

蒙古新干部一般地有许多优点。他们一般地工作积极，艰苦奋斗，能够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他们作了许多工作。内蒙党今后的发展，主要依靠他们，因为内蒙的老干部数量有限。但他们中间有的同志在思想上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其中基本的一条是阶级立场模糊，容易把民族与阶级对立起来，说什么“民族斗争光荣，阶级斗争狭隘”，说共产党是“汉人党”，内蒙共产党是汉人建立的等等，对汉人同志的帮助，有时不是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这些思想都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真正的

民族斗争，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中间最先进的阶级，它是代表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而劳动人民是民族的主体。内蒙民族的主体是工人、贫雇中农、牧民和其他一切体力与智力劳动人民。党是阶级的代表，也是民族的代表。内蒙党的任务，就是为全内蒙的劳动人民办事，办好事。只有这一条，别无其他。因此，每一个忠于内蒙人民的革命者，都应对内蒙共产党无条件信任，去掉一切怀疑。关于内蒙的解放与发展，必须有外力帮助的问题，前面已经讲了许多。内蒙同志之所以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些不正确的狭隘的思想，主要由于长期受异族侵略者压迫统治，自然造成对本民族一种“保护本能”式的思想感情所致。这些思想感情，对异族侵略者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对这种情况也曾加分析。

“当地共产主义者，他们曾经过民族压迫的困苦时期，还没有完全解脱民族压迫的梦魇，往往夸大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放弃了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是简简单单地把该民族的劳动者的利益跟该民族的‘全民’利益混为一谈，不会把前者从后者之中分别出来，而根据劳动者利益去建立党的工作，这种情形又弄成放弃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方面”。

此外，有些蒙古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容易自满自骄，遇事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大家应当了解，工作有成绩是应该的，把工作做好，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一切功劳应归功于人民。没有群众的劳动，试问单单几个共产党员的能办好什么事？我们决不能学统治阶级在人民之上观点，个人、我，总是渺小的，只有人民才是伟大的。我们应多向群众学习，多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育自己。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不要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内蒙知识分子少，很可贵，作用很大，内蒙党很重视，但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农，应该与工农一道前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应切记站稳阶级立场，切记着是替工农劳动人民对党无限忠诚与老实的人，才会很快进步。

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倾向，目前在蒙汉干部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它成为我

们前进的障碍物，我们必须坚决与这两种倾向作斗争。汉人干部应自己坚决担负起反对陕隘民族主义的斗争，把它进行到底。应该指出，前一种斗争，关系更加重大，因为在若干地方党的负责人，目前还多是汉人同志。只有把这两种斗争进行得好，蒙汉干部的团结，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五、今后要办好哪几件事？

关于内蒙党今后的总任务，前面已讲过，现在提出当前几件重要工作谈一谈。

(一)目前不再扩大部队。内蒙解放军现在的任务主要的是如何提高部队的质量，使内蒙人民解放军更加成为一支有阶级觉悟的，并有战斗力的，有严格纪律的毛泽东式的人民军队。为此，除把内蒙军政大学办好外，各师还必须办短期训练班，轮流训练在职干部，并特别注意工农干部。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和学会做农业工作。不是硬搬汉人区的一套，而是通过内蒙的民族形式，用生动活泼具体的材料进行教育。军事教育应着重实战经验，发扬蒙古骑兵骠悍无畏的优良历史传统。建立这样一支精干的忠实为内蒙人民服务的军队，对内蒙的解放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办一个党校，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新老干部从政策理论上，从实际工作上提高一步。要克服下面不愿抽调干部学习的偏向，眼光要放远一些，即使工作暂时受些影响，也必须忍受。各方面要多多培养提拔人才。要有计划地训练一批迫切需要的技术人员，可以输送一批知识分子到东北各种专门技术学校学习。高级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并与内蒙当前各种具体政策相结合。须知干部质量的提高，是今天内蒙一切工作的决定关键。

(三)加强经济建设，切实为内蒙人民兴利除弊。内蒙人口约四分之三在农业区和农业占优势的半农半牧区，因之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使蒙人耕作技术能逐渐赶上汉人，增加农作物产量。此外，要

用很大力量发展畜牧业，用各种方法繁殖牲畜，如改良畜种、训练畜医、防疫、打狼、割草盖圈棚等；同时严禁宰杀母畜，反对不适当征收牲畜。政府应有组织地发展蒙汉间公平贸易，由上而下地切实办好合作社，廉价地供给蒙汉人民需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公道地收买蒙汉人民所有的商品，以便逐渐消减汉人私商中那些不正当的过份的中间剥削，毛、皮革等轻工业要依据可能条件，开始在几个地方认真办好和开办几个工厂，取得经验训练干部，逐步推广各种经济建设。要防止下面的假报告、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要坚决反对各种各样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切记不要硬搬汉人的一套，不要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在经济方面，我们办不出好事来，牛羊照样死，蒙人买东西照样吃商人的，仍旧吃不饱穿不暖，试问内蒙人民为什么要拥护自治政府？

(四)加强文化建设，多办国民学校，办好几个中学。必须广泛应用蒙文蒙语，多出一些蒙文的书籍刊物，向轻视民族语文的倾向作斗争。加强医务卫生工作，多培养些医务干部，改造喇嘛医生，提倡医院、医生下乡，到游牧区去，减少游牧区人口的死亡。

在做好这几件事的基础上，内蒙自治政府就会更好地发展与巩固起来。统一的自治政府，是内蒙人民奋斗的结果。内蒙党应在各方面来加强各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建设，使之从内容与形式更加为内蒙人民所衷心爱戴。

党要求大家的，就是全心全意为内蒙人民服务，就是把以上这些事情办好。要保证这一要求实现，必须干部在思想政策上加强锻炼，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因此，目前在领导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浮在上面、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粗枝大叶，各种各样官僚主义倾向，需要大力加以克服，我们要提倡干部和知识分子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农业区去，也到游牧区去。去真正埋头干，研究如何组织教育蒙人种地和汉人一样好，学会各种农业生产，学会办工厂，研究牛羊如何繁殖，娃娃如何能养好。你们不要作空头的政治家，而是要做真正有本事能为广大内蒙人民具体办好事的政治家，能为内蒙人民

今天和明天办好事的政治家。

相信内蒙党和自治政府在云主席领导之下，全体党员紧紧团结在云主席的周围，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在潘阳人民纪念“五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工人同志们!武装部队同志们!机关工作人员同志们!学生同志们!
各界同胞们!

今天全东北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议来进行纪念并庆祝南京的解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反革命的国民党拒绝了毛主席提的八个和平条件再一次破坏和平谈判，拒绝了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蒋介石准备把战争打到底，于是毛主席与朱总司令代表中国人民共同的意见，发布了英勇的进军命令。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在一夜之间就横渡了长江天险，在千里长的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渡过了百万大军。三日内解放了反动统治的中心——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国人民欢腾，举世鼓舞，六天内包围聚缴敌人的十二个军，敌人已溃不成军，大批的投降，大批的逃散，大批的掉队，丢盔卸甲，整个的军队没有战斗意志了。如最近在嘉湖以南的一次战斗中，我军一团消灭敌人两团，而我只轻伤一人，敌人全部把枪放下。现在南京反动政府已经正式宣告灭亡，那些极少数怙恶不悛的野兽们，如像蒋介石，何应钦之流，已经东逃西散，乱窜台湾，厦门、广州、桂林、重庆，企图逃避人民解放军的捕捉，现在已没有什么统一的国民党政府，只不过剩下很少的一些垃圾堆，重庆一堆、台湾一堆、广州一堆，桂林一堆……。

现在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的，把这些垃圾堆打扫干净，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把革命进行

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这就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因此我们应向中共中央与伟大的毛主席致敬！

其次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摧毁了一切反动军队的抵抗，因此我们应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朱总司令致敬！

这一伟大胜利的获得，还由于我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后方机关工作人员等勤劳奋勇的生产与工作，热烈的支援了战争，积极地进行了和进行着伟大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因之我们应向工人阶级，向劳动人民、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致敬！向后方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致敬！

同志们！同胞们！

在伟大的苏联红军打败日寇解放东北之后，我们东北人民，三年来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进行了英勇无比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凶恶进攻。我们已经清灭了美帝国主义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一百零八万军队，肃清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解放了全东北，并欢送了一百万子弟兵——英勇善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配合华北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华北的敌人，执行着毛主席、朱德司令的进军命令，彻底消灭敌人。

今后我们后方全体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我们的工业与农业，特别是恢复与发展工业。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

因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恢复与发展工业，因之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与大中城市，就应作为我们工作的中心，并加强城市对于乡村的领导作用，建立与发展新的城市关系，达到城乡结合，工农合作，工

业与农业相结合。

要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便有效的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依靠工人阶级。

我们解放区的工人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贱视，而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领导阶级，成了社会国家的主人，所以我们应以主人翁的劳动态度，积极生产，吃得苦，做得好，成为全体人民的模范，使生产能迅速恢复与发展起来，使我们工人和全体人民的生活都能逐渐地提高起来。

我们的农村工作者与劳动农民们，要勤勉耕作，多打粮食，增加副产，多生产工业原料，为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与改善生活而奋斗！

我们的全体技术人员与智力劳动者们要发挥你们的技术与智力，与工农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加紧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学习，忠实地给人民当勤务员。

我们的男女青年学生们，要努力学习文化技术与政治，为新社会的建设服务。

我们的妇女同胞们也一样的参加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为东北经济建设而服务。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武装部队同志们！你们要学习政治、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掌握技术，使我们的部队不仅成为有高度政治素质的，而且能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部队！以便更加有力的消灭国民党残余反动劳力，与随时发出向我们进行偷袭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制造侵略战争的分子。

同志们！同胞们！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有伟大的斯大林所领导的伟大盟友——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堡垒苏联，以及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广大人民与我们亲密的站在一起，英美的劳动人民亦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因此，那些企图组织新的世界侵略战争的只是

极少数的战争贩子，他们是极端孤立的。只要我们与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团结一致，我们就有充足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而世界持久的和平亦就能实现。我们坚决拥护在巴黎与捷克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和它的一切决议。我们坚决的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的世界侵略战争和组织者，他们如果胆敢玩火，就小心烧掉他们自己。美帝国主义者会以四十万万美元和许多坦克，飞机，大炮，培养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蒋介石，但是三年来战争的结果这些反动军队已经被中国人民打的头破血流，狼狈不堪，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从这里看，我们有完全充足的信心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干涉和蒋介石残余军事力量。我们一定能解放全中国。我们亦有这样的信心，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力量定能战胜一切敢于挑拨新战争的帝国主义分子。

最后我们高呼：

全世界和平的堡垒伟大的苏联万岁！

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世界人民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掌声、口号声持久不息）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人民政府
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开幕，我谨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庆祝会议成功，并向会议提出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供各位代表讨论。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领导之下，已经根本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各路大军正在西南西北扫荡残敌，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了。

解放战争的目的，毛主席早已明确告诉我们：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

东北解放区，是全国最先获得全部解放的地区。在东北解放区内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剥夺封建地主以及敌伪与官僚资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业已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新的条件与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这个时候，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是东北人民的一件大事。

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与即将产生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任务，就是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动员与组织一切能劳动的人民，以大力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为全国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并从而逐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以巩固与建设新的东北。

东北是全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之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由于东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高于全国各地，因而它对支援全国战争与创造全国工业化的条件所担负的任务，也就特别重大与艰巨，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东北的完全解放，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及东北内部封建残余势力对于他们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无疑的他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可能的阴谋破坏来反对东北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警惕，彻底

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以保证建设工作的胜利进行。

为了更顺利地完成新的建设任务，必须认真的向苏联学习，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领导之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艰苦奋斗了三十二年，粉碎了国内外敌人各种的进攻与破坏，已经建设了一个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全世界人民解放的灯塔。苏联人民所走的道路也正是中国人民要走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与苏联人民结成亲密的友谊，学习苏联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技术和管理方法，以便克服困难加速我们建设的过程。

东北人民政府今后的施政方针，分六个方面来说明。

一、 全力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经济

东北人民从敌伪手中所接管过来的经济基础，是殖民地性质的，并且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因此我们应该首先以全力有计划地进行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

东北经济建设的第一步目标，我们拟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的三年中间，以全力争取把工业生产设备和农业生产量，恢复到一九四四年的水平，并适当的改造原有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求，以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经济与为全国工业化准备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纠正现存的和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

工业方面

应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如钢铁、煤炭、电气、机械、化学及有色金属等，这是全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为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及帮助重工业发展，也要注意轻工业的恢复与提高，根据东北条件并配合全国生产情况，特别要注意造纸、油脂、制材、纺织、日用化学等。要加强经济工业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把国营、公营与私营的工业统一结合起来。加强经济方面的统计的、计划的机构与工作，要认真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贯彻生产企业化与管理民主化，是目前国营公营企业管理中亟待彻底解决的问题。生产企业化，当前应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经济核算制，实行定额管理，减低成本，提高质量，实行节约，克服浪费，使生产与供销密切结合反对保守主义。管理民主化，即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及技术人员搞好生产，当前主要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使其经常化，并充实其工作内容，发展民主，改善领导，克服官僚主义。

为着工业的恢复、改造与发展，必须：一是坚决依靠工人，加强工会工作，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发展生产而努力，开办职工技术训练班、职业学校，培养技术工人。同时从生产的发展中改善工资制度，逐步提高工人生活待遇，加强劳动保险与工人集体福利设施。二是提高现有干部水平，认真培养管理与技术干部，延揽与团结各种专门人才，提高与改善其待遇，奖励发明与创造。扩大与加强工业大学及工业专门学校，认真培养工厂专门人才。三是加强工业部门的研究与实验设备，有系统的进行地上和地下的资源调查。四是尽量发挥与使用私人资本在恢复与发展东北工业中的积极作用。

根据上述方针与现有情况，在设备与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到一九五二年底，国营重工业达到下列生产设备水平：

发电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100%；

采煤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92%；

制铁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100%；

制钢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104%；

钢材制造：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200%。

改造原有机构工业的落后状况，力求发展，使之与其他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根据上述工业发展的情况，三年内国营企业可增加新的职工四十万人。

农业方面

今后的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量，扩大棉蔗种植，发展畜牧业、林业，改善农民生活。

为此必须发展劳动互助合作组织；改进耕作方法，提倡施肥；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结合防汛；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制定资金，安置移民，预计三年内移民十万人，并保护牲畜，奖励繁殖。

三年内有步骤地普遍地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畅通城乡交换，为社员的生产与消费需要服务，并从而扶助劳动生产互助的提高与发展。

着重保护森林，节用木材，有步骤地进行造林，伐木与护林结合，林业与农业结合。

根据上述方针，预期到一九五二年底，东北农业生产达到下列水平：

农作物总产量比今年预计生产量增加 16%；

耕种面积比今年增加 5%；

棉田增至三十万垧(“八一五”前为二十二万垧)；

蔗类种植增至三十万垧。

完成上述农业生产任务的基本关键在于很好组织劳动力，就是用一切努力，把所有农村可能从事生产的人都组织到农业生产战线上来，

动员男女老幼，各尽所能，参加生产。我们必须以很大的力量做好农村工作，必须很好地领悟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因之任何放松农村工作的观点，与在农村工作中的自流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面都是错误的。

商业方面

新民主主义商业应成为发展工农业的纽带，为发展生产保证人民需要服务。为此，必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国营商业网，扶助合作社发展，领导私人正当商业，取缔投机非法行为，了解市场需要，正确掌握物价政策，以发展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把商业工作向下列三方面发展：

第一，组织东北境内的城乡交流，实行向公私工业及农村合作社的定货制，掌握工业农业生产产品，提高商品质量；并根据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需要，推锁成品与原材料，从而有计划地掌握市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保障原料，发展生产。

第二，研究全国市场的需要，在生产与供销上，与全国取得分工合作，以便畅通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

第三，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实行管制与保护政策，首先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贸易关系，以便取得他们对东北经济建设的友谊援助。

这里决定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业干部要学会为人民做买卖，学习与提高业务，发挥商业为发展生产与保证人民需要的作用，以加强对私人正当商业的领导并与帝国主义及某些奸商作斗争。

私营工商业方面

对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必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指导其经营与发展的方向。特别指导他们面向农村与农业及农民需要结合。帮助它们克服目前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的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原料供给、成品推销、采购运输与转业的困难；改正过去对私营工商业自流态度与某些不适当的限制，扶助它们的正当发展。在劳资关系上，需要健全与加强各级劳动局的组织与工作，实行劳资双方协商订立的集体合同制。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与生产情况，适当的解决工资、工时、解雇、厂规与劳动纪律、福利待遇等问题。一方面保障工人必须的生活与福利，一方面使资方有利可图。

发挥私人资本在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在工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政策等各个方面引导与节制私人资本主义，同时对于投机捣乱的奸商以及一切从经济上捣乱国家建设的行为，则应采取有效办法，予以取缔。

根据以上方针，由东北人民政府制定工商管理办法具体实施。

交通运输方面

发展交通运输是发展生产的条件之一，在铁路方面，三年之内修复东北已有的铁路，特别要恢复各重要企业的铁路运输，修复机车及添造货车，改善铁路营业制度。

加强公路干线的修补，建设永久性桥梁，组织人民加强保护工作，发展公私汽车大车的运输事业，便利城乡交通及短距离的客货运输。

统一与加强航政建设，发展造船业与海军。发展内河航行。邮电

工作主要是提高技术，熟悉业务，巩固与加强现有设备，使邮电畅通无阻，并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增加邮电的新设施。

教育人民爱护与参加交通建设工作。

财政建设方面

财政建设的方针是巩固与发展东北的财政金融，适应东北经济建设及支援全国的任务，其具体措施：

①建立人出计划、及预决制度，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用，严格审核监督一切行政上与生产上的收支，保证扩大与合理使用国民经济的投资，首先是基本工业的资金。

②实行发展生产与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现行农业与工商业的税率不变，简化税收手续，改善税收制度。根据国民财富收入的增加，扩大财源，减轻人民负担。

③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加资金积累。

④在统一方针与计划下，加强各省市地方经济活动，节约地方财政开支，减少国库对地方财政及企业供给与拨款。

⑤银行的业务中心是扶助生产，应扩大生产贷款，减低利息，实行信托保险及其他金融事业。

⑥发行必要与可能的建设公债，吸收社会游资转入生产，提倡节约储蓄，办理折卖存款。

⑦确定编制，实行精简，严格制度，逐步实行薪水制，废除供给制。

根据以上措施，今后三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及生产的发展，保证逐年增加财政收入与工业投资，从而更充裕支援全国的力量。

二、提高与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目前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及工农干部，为发展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

为此，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人才)；同时注意改进中学教育；普及国民教育；交流中苏文化，开展中苏友好工作；开展工厂及农村中的文化卫生运动，逐渐扫除文盲，切实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

高等教育应根据精干与正规化的方针，统一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教育任务与招生计划，贯彻最近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各中等学校，应根据今后经济建设、高等教育及小学师资的需要，改善师资，提高教学质量。小学应予劳动人民子弟入学以方便条件，小学在自愿原则下奖励人民自力兴办，由政府统一规定课程与学科，并加以领导。提高与培养各级师资，团结与改造旧有教师，到关内聘请大批有知识有经验的进步教师来东北，尽可能改善各级教师的生活待遇。

加强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以达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之目的。

广泛开展职工及农民中的社会教育，进行培养劳动观念，遵守纪律，爱护国家财产，勇敢保卫人民祖国，严重警惕中外反动派破坏阴谋，注重卫生健康等新国民教育，并通过各种适当的方式，逐步扫除文盲，首先应加强工人的识字运动。

加强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巩固与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宣传苏联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介绍苏联各种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推动学习苏联运动，在中学以上学校规定俄文为必修课。

贯彻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加强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

开展工农群众的文艺活动，健全东北文协的组织与领导，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及文艺团体深入实际，创作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奖励优秀作品加强文艺工作者对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开展文艺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加强报纸、电影、广播及书店工作与城市、工厂及村镇的广泛联系。目前急应改进发行工作，加强大众读物的出版，统一管理出版的登记审查工作。发挥东北电影厂能力，多出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建立与加强各地首先是城市工矿区和部队的医药卫生设备，协助与指导各地人民进行防疫卫生运动，加强妇婴卫生及儿童保育工作，有计划地培养医务人员，团结与改造旧有各种中西医务人员。

三、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

我们在东北已赢得了和在全国即将全部赢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是绝不甘心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放松人民军队的建设，相反，我们要加强它。我们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下，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边防军的任务，藉以保卫国家、保卫和平、保卫经济建设、镇压反动，我们在军事建设上的具体措施为：(一)加强现有部队，增加各种特种部队，使我们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二)在军队组织上确定正规编制与制度，加强各级军事组织，克服游击习气及无组织无纪律的残余。(三)加强现有军事学校，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提高干部质量，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对部队实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加强文化与技术教育。(四)加强政治工作，提倡爱国主义的英雄主义，提高与发扬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战斗意志。(五)加强人民武装的组织与教育。(六)各级政府要注意荣军与退伍军人安置，组织他们就业，从事生产，贯彻实行政府优待军属条例。

四、加强公安司法工作保护人民利益

我们加强军事建设是为着加强人民的国防，我们还必须加强公安司法工作的职能，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革命秩序，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与人民的法庭，藉以保护国家和保护人民利益”。

(一)公安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大中城市、工矿地区、铁路海港，同时不放弃小城市和乡村。我们的除奸政策是：“首恶者必惩，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处理案件重视证据，不重口供，严禁刑训。处决人犯，必须经过一定的政府批准。

依靠人民力量，教育组织人民，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翻把地主的阴谋破坏，镇压其捣乱行为，清除盗匪，巩固革命秩序。

公安管理工作，要特别注意实行法治，简便执法手续，在城市及工矿区并应整顿交通秩序，加强消防工作。

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提高公安机关的效能，培养干部，整训公安武装，改造其成份，提高其政治与业务水平，贯彻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各县公安队改为保安队，城市公安队一、二年内转化为人民警察，同时注意教育组织人民，逐渐实行民警制。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自觉地同反革命斗争。

(二)司法工作重点，在于坚决制裁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各革命阶层人民的合法权利，调解与仲裁人民内部的纠纷。

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司法工作，注意配备与培养干部，健全司法机关，统一司法制度。

提高法院工作，发扬陪审与公开审判的司法民主制度。要使人民的法庭，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武器，而且成为教育人民的讲坛，并使审判受到人民的监督。受审人如不服的，可按级上诉。

彻底改造旧的监狱，贯彻惩罚与教育改造结合，生活与劳动结合的新的监狱制。

提倡法治精神，保障人民政府的法律、法令的贯彻执行。

五、贯彻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坚持与贯彻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以达到全东北境内汉、蒙、回、朝鲜各民族人民亲密团结的目的，因此必须实行：（一）东北境内的全体人民除帝国主义走狗、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及未恢复的公民权的地主以外，不分性别、民族、种族、信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与生活习惯，并保证各民族用自己的语文创办学校与刊物，同时各学校必须设置中国语文为必修科。（三）各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应由各该民族自由选择其行政及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员。（四）严格禁止任何种族或民族仇视的宣传或行为，教育人民克服大民族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六、政权建设进一步民主化

为了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除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与坚决贯彻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身体的自由，实行男女平等，以及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进行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外，今后必须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建设的民主化。

为此，目前应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第一，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基本形式，它是推进工作，克服官僚主义，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各地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立即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县区村则在今年秋后建立，并在一定条件下早日建立省人民代表会议，并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各地的权利机关，选举各地人民政府。纠正任何忽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错误观点。

第二，精简政府组织，主要是减少层次，革除一切繁文冗节，实行简政，加强集中统一，以便政府密切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高工作效能，改变城市中区街政权组织，提高干部质量，训练工人、农民、妇女、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发挥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贪污腐化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现象。

第三，建立人民监察制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动人民纠正各种渎职乱纪现象，并向之展开坚决斗争。监察工作重点，目前应放在保护国家财产与保证经济建设上。

第四，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是党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倾听群众意见，要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的原则”。我们在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谨记并贯彻毛主席这一英明的指示。

上面所提的东北人民政府今后的施政方针，如为代表会议所接受，则将在即将成立的全国民主联合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求其实现，各主管部门还要把它具体化，订出实施计划。我们在进行各种建设中，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客观条件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只要我们紧紧跟着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走，只要我们能

善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破坏进行严肃的斗争，同时注意克服我们内部的盲目保守与自满情绪，紧紧地依靠东北人民并根据确定方针和计划，进行细密的组织工作与政治动员。我们认为有了全东北人民的坚强团结，再加上国内各解放区人民的帮助，及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援助，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困难，稳步前进，在建设新东北支援全国这一伟大事业上，完成我们所担负的光荣任务。

我们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与正式的东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来迎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与全国统一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荣誉是属于谁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同志们！

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同大家研究。

我们现在是由战争转变到建设，东北全党与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一切其他工作都是为搞好经济建设服务的。过去我们也搞过建设的工作，但那是一面战争一面建设，现在却完全转变到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在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中，在广大群众中，就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党来解决。

东北广大群众受了日寇十四年的掠夺，随后许多地区又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并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现在胜利了，群众要求恢复原气，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认真解决东北群众这样的要求，把经济建设任务和群众要求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学会新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同志，来担负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闲起来，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虽然我们党内大多数

干部对于革命事业是积极努力的，并在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中曾经为人民做了不少的可贵的工作，但因为对新的经济建设任务，对当前具体的经济工作与其他建设工作，一方面是还十分不熟悉，另一方面是还缺乏精神上的重新准备。因此，对于新任务，新的工作，还使不上劲。很多干部还未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真安定下来，真正用心去钻研。这就产生了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某种不很正常的、动荡的现象，缺乏像在土改与战争时期那样高涨的热情与劲头。而和平的环境，城市生活的某些不良影响，也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发展，并且有个别的人因此走向堕落和腐化。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密切注意的。

经济建设，与过去时期的土改与战争任务不同，它是长期的永久的任务，同时又是很复杂、很细致、很艰巨的工作。这不是喊口号的工作，也不是出风头的工作，而是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如果没有全党与全体人民的非凡努力，没有一种新的气象新劲头与新的事业精神要搞好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所有干部，都要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树立对当前具体的革命事业的进取与钻研精神，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发扬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完成国家与人民的重托。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翻天覆地的伟大理想的，是自觉的献身于革命事业，为人民忠诚服务的战士，我们对于任何贪图个人名誉地位与物质享受的腐朽思想，都是极端鄙弃的。在我们的思想中，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民的、国家的、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统治一切。而绝不能掺杂有为个人打算的思想与行为。谁不认识这个真理，谁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必须要有高度的革命精神，忘我的工作，撤掉一切个人的打算，为人民、为国家工作的愈多愈好的，以做一般人民群众的表率。如果拿这样一个要求来检讨我们东北党内干部的情形，那便可以发现，还有若干同志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还没有发挥他们所应起的作用。而有些同志对于荣誉、地位、物质待遇等问题，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阻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

就对于新的事业精神来说，现在东北党内干部的情形，有以下三

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积极努力，生龙活虎，能在实际工作中克服困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并创造新的经验。他们时时刻刻，钻研工作，不讲空话，不喊困难，埋头苦干，很准确地完成并超过工作计划。他们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誉、地位或物质待遇，而把自己的全部思想集中在如何做好工作，如何更好的完成与超过国家与人民所托付的任务，至于人民根据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所给予荣誉、地位与物质待遇，对于我们这些同志来说，乃是“身外之物”，并不是这些同志所斤斤计较的东西。他们能把事业推向前进，他们能在摸索与钻研中创造经验，提高自己并帮助其他同志进步。这类同志是党的骨干，是党的荣誉，人民的荣誉，也是他们自己荣誉，我们应该表扬这类同志的新的事业精神，表扬他们的经验和成就。但是这类干部，在目前东北党内还不很多。非党的干部中也有对事业具有这种积极性的人，但为数也不甚多。

第二种，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安于一时一地的微小成就，工作条件顺利时，也可做出若干成绩，但碰到困难，便缺乏勇气，不能挺身而出，而是束手无策或知难而退。他们也有抽象的做工作的念头，但是遇到问题，办法很少。其工作方法经常是一般的、抽象的、而不会真正钻研问题，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成天开会，不落实际，不能从解决问题当中得出新的经验，以教育干部，推进事业。他们一般的服从组织，但也盘算个人利益，在不“如意”时，就不能踏踏实实，专心钻研事业。这类干部的数量，目前在东北党内还是不少的。

为什么产生这种状况呢？一方面由于这些同志对转变没有足够认识，对新的工作不熟悉，而对过去已不适合于今天条件的工作方法却舍不得丢弃。主观上缺乏坚强的事业进取心，因而缺乏克服困难的精神，不会分析困难，找出办法，解决问题，从战胜困难中求得愉快。另一方面领导上在转变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同志的帮助、教育、启发，引导，做得不够。这些同志基本上是好的，也有进步的愿望，是可以

教育的，我们党应该在这方面加强教育与组织领导，动员这类干部向第一类干部看齐。采取各种办法，鼓励他们，他们每一微小进步，都应受到适当的鼓励，以便造成一种竞相追求进步的风气，以进步积极为光荣，以安于现状为可耻。我们若能使这一类干部向第一类干部看齐，而第一类干部，更能戒骄戒躁，奋勇前进，那便会使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一切工作的进展也将获得无限的新的动力。

第三种，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专门讲大话、说空话、赶浪头、处处表现自己，甚至摆老资格，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质享受。能力不大，个人的欲望颇高。供给制的常想自己是哪一级，但从不考虑自己的贡献事业，值得算那一级，不是把事业提高一级，只是想把自己地位提高。薪金制的常想自己该得多少分数，却并不计算国家与人民收入的分数，即如何爱护国家财产，改进工作方法，使国家的支出节约几分，使人民的利益增加几分。这类人常常斤斤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工作却不甚用心，很少或从不考虑国家给予自己的任务应如何方能更好的完成，抱着“干不干，一斤半”的敷衍塞责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认为资格老，就应该荣誉大、地位高、物质享受多。对革命工作分贵贱、讲兴趣、图舒服、出力越少越好，享受越多越好。当他们私欲不能满足时，反而抱怨党，要党经常提拔他才高兴，工作一久，就表示厌倦，甚至压制新生力量，看到后起的干部进步了，不是鼓掌欢迎，而是气愤嫉妒，挡路阻碍，认为党对他不公平。但愈是醉心于个人的得失，追求个人的地位和享受，则愈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愈加不能很好地完成国家与人民所付托的任务，同时也就愈不进步，也就愈加不应获得荣誉、地位、和较高的物质待遇。因为党和人民决不能允许不顾国家的人和人民的利益，而去迁就某些个人的利益。

同志们：牺牲人民利益去迁就个人的利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像我们所说的第三类干部，目前在党内虽是极少数，但并非个别的，如果他们不改，便会变成革命前进的阻碍，甚至

有堕落蜕化的危险，而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以及已有的“地位”也会丧失掉。因为革命不是“封爵”，革命的地位是没有“世袭”的。革命事业是不断前进的，对于这种邪气，我们的党必须坚决克服，不能允许留存在与滋长。不然对革命是很大的危害。

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就是说我们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与品质，可以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为革命事业奋斗，并克服一切工作中的困难。那末，为什么还有对人民事业不起劲、不热情，而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贪图享受，甚至渎职乱纪、贪污腐化的现象呢？这是由于某些腐朽的封建残余意识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相结合及其在党内的反映，而我们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点，也是使这种恶劣现象滋长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这种现象在近来反映较多呢？这是由于东北没有战争了，并在大城市住下来了，而又未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更伟大、更艰巨的建设任务。因而不少同志在精神上松懈下来，而让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侵蚀着自己，侵蚀着党，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我们必须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而与各种侵蚀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严肃而适当的斗争。

当然，这只是就东北党内干部对于新的事业精神所持态度的大体分析，这还远不能概括全部的情形，有许多干部与以上三种类型还不尽相同。

同志们！我们的荣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应该是属于谁呢？

说到这一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认识，这些东西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大家知道：如果不依靠人民大众，我们共产党员是什么也搞不成的。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动力，我们革命与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位可说。我们的革命与建设，是要使人民大众获得更好又

更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如果不去努力发展建设事业，从发展建设事业去一步一步地使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向上改善，使群众首先得到革命与建设的果实，而只关心我们的个人物质生活，如要不首先去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而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那末，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完全是可耻的，是可鄙的堕落。我们个人的物质生活问题，是不能够同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孤立出来的。

只有人民大众获的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之后，我们方可以把工作搞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个人的得失。从我们必须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高的利益，这是我们利益的最高准绳，除此这外，别无其他。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则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待遇”则是人民根据你对具体事业的贡献而给你的适当的酬劳。这种酬劳不是平均的“供给”的，也不是靠吹嘘与蒙哄，而是要看你对人民事业的实在的贡献大小而定的。你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愈大，人民给你的荣誉地位物质待遇也就愈高，这是成正比例的。

比如沈阳机器一厂钻盘工人赵富有，于一月底以三点零九分，制造车“丝杠”新纪录，这种“丝杠”作业，在别的工人第一次试验时用二十三点，第三次还用了十三点，而车“丝杠”“理论”标准作业时间一般为六点四十五分，赵富有的创造，比第一次试验时缩短将近二十点，比“理论”时间节省了三点又三十六分，因为赵富有有专心事业，有了新的创造，因之他应该享受应得的荣誉，所以报纸用头条消息表扬他的英雄事迹，工业部还准备给他以物质奖励，因为他对人民有贡献，因之人民给他以应得的荣誉地位与物质待遇。所以我们说应该得到荣誉、地位与较高的物质待遇的人，必须是积极苦干，努力钻研，克服困难，完成并超过国家的任务与人民的托付的。我们考核一切干部，党的与非党的工厂管理人员，商业贸易人员，教育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党务工作人员等等，都要用这个标准，而不能有其他的标准。

我们党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德、才、资。德是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才是完成人民委托的能力，资是他的斗争经验和他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规模和密切的程度。这三者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才固然要看具体完成任务的能力，但德与资也都不是抽象的，要看其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假若没有贡献，就是不能为人民忠诚服务，那如何能称为有德？斗争有中国特色固然可贵，但其所以可贵，是在于对人民有贡献，这种贡献不能使之中断，应继续保持与发扬下去，为人民做更多的更加负责的工作，党与人民都是这样殷切期望我们的。但若停步不前，对人民又无贡献，那就没有什么可贵之处了。

一切党内干部都应当明了：任何一种革命岗位，任何一种革命工作，都是高贵的。不能说那种工作是不重要的，因为离开其他工作配合，任何工作都不能孤立的解决问题。每个革命同志应该珍爱自己的岗位，站稳自己的岗位，积极地、负责地、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要看那一种工作“吃香”，都去“赶浪头”，或者因为赶不上而灰心丧气。这是一种个人的情绪，必须克服。

我们要想一些具体的办法，把各种党的与非党的工作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发扬起来，组织起来。首先，要教育干部和党员，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新的事业精神，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努力完成与超过自己负担的任务。党的干部应首先作群众的榜样。要强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要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在整个社会生产与事业的发展与提高中来提高个人的思想能力、工作能力与生活水准。其次，要检查和改进我们现在的组织机构与各种制度，使之完全适合新的要求，真正收到能推进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真正收到奖励好的，批评坏的作用。在组织上要实行按级分工，个人负责制，在制度上要实行干部的升降制度，根据干部对人民的贡献，实行大胆的提拔和使用，不要过分去迁就“资格”，因为这样是与事业不利的。要有正确的奖惩制度，表扬与奖励好的，批评与惩罚坏的，奖励不仅有荣誉奖，同样要有物质奖，使那些对人民贡献较大享有较高的物质待遇，这是完全合理的，要在社会上及党内高度发扬进取精神，提倡

创造，使人民的英雄到处受尊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要开展反贪污浪费与渎职乱纪的斗争，对于严重的渎职乱纪行为应予撤职查办，对于严重贪污及浪费国家财产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此外，要规定与实行薪水制度，休养制度等。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这就是事业第一，完成人民与国家所托付的任务第一，国家与人民所赠予的荣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地位与物质待遇，也应该给予那些对人民的事业有创造精神的，完成任务最多最好的同志，这些同志，将受到党尊敬与人民的尊敬！

同志们！我希望东北全党、全体人民，尤其是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站稳自己生产与工作的岗位，树立新的事业精神，创造新的生产与工作的纪录，为国家与人民的收入增加分数，将我们的经济建设进一步推进，把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一步，以便更有力的支援全国战争，将东北建设成全国的工业基地，这就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代表人民解放区讲几句话。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获得基本的胜利，全中国将要完全解放。我们回顾二十二年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是一九二七——三七年的土地革命。那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能不拿起武器，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建立了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达到抗日战争的前线。

第二是八年抗日战争。在抗战中，不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汪精卫等勾结，用断绝接济、武装封锁、军事进攻等无耻行为，企图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但我们终于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一切进攻，使人民解放军从几万人的队伍发展成百万大军，使不到二百万人口的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及其他游击根据地)发展到日本投降时拥有近一千万的十九个解放区，并使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

第三是这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援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空前大规模的反对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剩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不久将被肃清。这是中国人民的空前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什么原因使我们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如果没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关于农民，关于土地改革。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不可分开的问题，是和人民解放军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就是说，领导农民翻身，是我们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关键。

中国农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我们受了几千年的压迫，特别近代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如果不领导他们站起来，中国事情就办不好，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坚持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因此，农民才会自觉起来，觉得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踊跃参军，英勇地作战，不吝惜地支出粮食，担负必需的作战工作。没有农民在政治上并逐步地在经济上的解放，就不可能争得农民来积极参加解放战争，这是很显然的。

解放战争需要依靠解放农民，建立农民制度也需要依靠解放农民。如果没有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那么，我们要建设民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国民党党棍、土豪恶霸继续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么，所谓“民主”就必然是完全的假东西。

经济建设也要依靠农民的土地改革。显然，如果没有提高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的人口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我们要真正发展工业和农业，也是不可能的。土地改革正是提高广大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办法。

我们进行了二十几年的解放战争，和敌人的反复相持，这种过程是很残酷的。但我们终于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地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使解放区从小变大，从许多小块的解放区发展为连成一片的全国性的大地区。这并没有什么神奇秘诀，而是由于我们紧紧地和广大人民在一起，特别是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民主制度和发展生产，获得广大农民的忠诚拥护。

至于工人阶级，则不但在这种伟大革命中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在前线上，在生产战线上，对于解放战争和克服困难，都尽了极伟大的贡献。当然，无疑问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国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都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应当指出：解放区，特别是华北、华东、西北等老解放区以及东北解放区，关于积蓄革命力量，支援前线，关于训练和培养干部，关于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以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将来应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的。

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打败，全国完全解放就要到来，过去被敌人分割的局面早已结束，全国即将出现一个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局面。当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加以封锁、破坏、捣乱等活动；但我们只要继续依靠工人，依靠农民，依靠全国各

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大团结，继续有步骤地消灭残余敌人，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粉碎敌人的各种捣乱行为，而且一定能把新中国建设得很好。建设中不是没有困难，但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中国人民是善于克服困难的，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谨此代表全国解放区人民，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

搞好生产，搞好供销，搞好农村人民民主专政，为完成一八〇〇万吨粮食而奋斗！

我准备三个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农村工作的全部问题，只是一些有关农村生产的主要问题。

(一)东北农村新的情况

东北农村，是经过了土地改革的农村，除新区的极少部分外，都已废除了封建与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建立了新的人民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这些地区在土改后，有的经过了两年的生产运动(如北满)，有的经过了一年的生产运动(如南满某些新区)，虽然在敌伪十四年的残酷压榨与三年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与各种天灾作斗争的情况下，但经济的恢复是相当快的。两三年来广大群众积极生产，各级干部领导生产

是有成绩的。目前农业总的产量，虽还未达到“八一五”前的最高水平，但由于农民负担的减轻与地租的废除，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开始上升，有些县份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八一五”前的最高水平(如榆树，这是东北产粮最多的县份，占全部产粮的3%)，有的地区已接近于“八一五”前最高水平(如克山今年总产量虽较“八一五”前少六万吨，但平均每垧产量则超出伪满三〇斤，减少之数是耕地面积缩小了，因日本开拓团走了，扔下了耕地，一部恢复，大部还未恢复)。这是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积极提高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自满，我们的农村经济还在恢复中，农产品的总生产量与生产工具还没有达到“八一五”前的最高水平，也说不到超过，在新条件下从事农业建设的时间还短，生产力的提高还很有限，所以农民还很不富裕。

在两三年来，特别是全东北解放后一年多来的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在土改时贫农与中农间的某些不协调现象，经过纠偏与生产运动，得到了解决。在土改时期将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之后，在新的解放了的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新的生产关系也已逐步地建立了。新的城乡关系，在东北全境解放以及与关内打通联系的条件，也在日益发展着。国家商店、合作社已在农村经济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伪满及国民党统治时被剥削被摧残的以及在战争被分割的农村及其与城市的关系是根本不存在了，商人与农民的关系，在国营商店与合作社逐渐发展的情况下也有了某些改变。城乡结合城乡互助的新条件在逐渐形成，但这方面的工作，还做的不够。

总的来说，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是除新区的一部及少数灾情严重的地区外，一般群众的经济普遍开始上。(一)绝大多数农民，目前的经济生活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刚刚实行土改之后的情况(如松江上升户占六〇一七〇%，吉林占三分之二，龙江上升比较显著的户占五四%)，最普遍的是粮食都有增多，因之生产所必需的牲畜大车衣物房子也均有增加，其中的一小部分(龙江为一二%)，除了添车买马之外，有的并已开始雇起长工，并发生“单干情绪高，发了财没用处”

的苦闷。(二)一部分保持原状(实际上也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三)一小部分人或因缺乏劳动力或因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与马力,或者好吃懒做,经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一小部分人出卖土地(如龙江九村调查有八%户数有租佃问题等),开始借贷(如龙江九村调查有十八%的户口。均有借贷关系)开始去做雇工了(如富锦全县有二六二户雇长工,长工数为二六五人,其中贫雇农占八十八%,这自然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当然出卖出租土地与借贷的农民,并不都是经济下降的,但其中有一些是因为经济下降而出此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民群众中,在农村党员中,在农村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中也就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党给以明确的解决。

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在农民群众中:少数经济之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的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没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他们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因之认为把他们组在互助,是为了“拉拔”穷人,是因为他们发有些人苦,发了财有啥用,少数进城吃“白肉”,要“再来一壶”,有的买了绒帽子,不将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他们还没有看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心怀苦,影响到生产的积极性。或者生产不积极,认为够吃够喝就行了。

但那些经济虽然上升,而因车马不够拴一副单独犁的农民,谁对某些换工插犊违反自愿两利的缺点有意见,但他们仍愿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地就种不上,他们有些人希望在变工组把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买车,实行单干。他们之中,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差的仍有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有的人欠了别人六百斤粮食,还说:我虽短你的粮,但过不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走人“共产社会”。甚至看到别人

买马，他说，将来走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吗?!

在农村党员及一些村干部中，问题也多，有些党员开始雇长工，要求退党，开通一个屯子二十一个党员明年有八个准备雇长工，群众有七个准备雇，两者合计占全屯户数的五%，再如延寿村干杜青山，因马多想雇劳金，扩大经营，但又觉得党员不应剥削人，结果把马分散，参加互助组，说自己好好工作，生产上自己不准备发展。又该组团村支书到县里受训，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人的课后，回家全家大哭，出卖牲口，解雇长工，感到没有前途。许多党员不了解许多不许群众雇工，许不许党员雇工(因为不少党员经济发展很快)。

也有的村干不让上升户买马买车拴独犁，怕他们单干，有的不让农民单干，强迫参加互助组，认为参加三马组，不算组织起来，名为“耍奸头”非参加六马组、八马组不行，有的不参加就罚手巾、肥皂，也有的组织起来让有马户吃亏。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也还不少。

在农村领导工作的县区干部中，也有若干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有的问：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如何?农民应该经过怎样的道路走向富裕?什么叫提高一步，什么叫组织起来，除了组织起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等等。

我们同志领导生产虽然有成绩，但不少同志对“转变”，对城市领导乡村，城乡结合了解不够，以为住在小县城小乡镇不下农村，企图搞所谓工业或忙于机关工作，以为这样就是城市领导乡村，就是“转变”与“结合”，结果城乡两丢。也有同志对经济建设中心任务了解不够，认为那是工业与城市的任务，以为在农村土改之后就是建党，要公粮等等，而不太了解搞好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搞好国营商店与合作社，使国家经济与群众直接见面，搞好城镇的农具，大车及皮革等手工作坊，使中小城市面向农村，为发展农业服务，推动农业与副业的发展，就是今天为群众服务的最好的方向，就是搞经济建设，就是具体转变具体的城乡结合。

也有的干部认为农村就是单纯为城市服务，农村永远是吃亏的，

而不了解我们的农业生产给工业集资资金与供给原料，以发展工业，而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两者是相互结合的。

更多的农村工作领导干部关心明年我们在农村中干什么，有那些具体要求，如何实现这些要求。

(二)明年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

明年全东北计划产粮一八〇〇万吨，其办法是按常年产量要求每亩地多产十四斤到二十斤粮，提高农业技术与开荒、增修水田，以及增加副业生产的收入，此外棉花与特种作物亦必需按计划完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各地必需克服一切困难想尽一切方法来完成。也就是说明年我们在农村主要的要做好三件事情，就是搞好生产、搞好供销、搞好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

农村的党要积极参与与领导这一任务的实现。并从而巩固与提高自己。

(三)为了实现上述要求，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呢？

(1)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毛主席早有明确指示，根据毛主席指示并经中央批准的东北局去年十二月的决议中也有明确的决定，这一决议，在今天仍是完全适用的。这个决议中说：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地方，在一方面，应该是奖励农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在向集体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在生产劳动方面发展变工互助，而且需要在供给工具、种籽、原料和运销农产品方面，普遍地有系统地建立供销合作社，以促进农民生产的发展，使农民由少受以至不受

商人的剥削。这就是说，我们在领导农业经济的发展时，一方面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的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应该是逐步地——起初是在供销及生产互助方面，然后是在农产品集体生产方面——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说，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对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其目的是为了使绝大多数农民成为丰衣足食的农民。

但这是不是说不允许“单干”，不允许雇工呢？

不是的，我们是允许单干，允许雇工的。这在去年的决议中写的很清楚，问题很明白，农民富裕了，是买马拴车，扩大生产好呢？还是把它浪费掉，不积极发展生产，大家都安于贫穷好呢？

有的同志说：这样他就会自己拴独犁，自己单干，而不能加变工组织，岂不是违背了“组织起来”的方向吗？

这里的问题：不是允不允许单干的问题，而是如何改进变工组，如何使参加变工组比单干比雇工打的粮食更多的问题，如果变工组织真正搞好了，自然会有绝大多数农民参加的。对他有利，为什么不来？如果对他不利，他是不会来的，硬让他来就是强迫，就违反了自愿两利的原则。即使变工组搞好，与正对农民有利，也还可能有人不愿参加的，这是长期的事实的教育与农民切身体验的问题，因此对于单干，我们绝不能禁止，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就应在一定条件下(如遵守劳动政策，订立劳动契约，尊重雇工政治权利，尊重雇工的雇佣自由，适当改善其生活等)允许雇工。

但这绝不是说，让大家单干好了，我们不用领导，不用组织，去让他自流吧！绝不是这样。而是要我们组织的更好，真正使参加变工组能更多打粮食改善生活。真正使变工组胜过单干，明年我们可以发动一个互助组向单干的比赛运动，看谁生产的好，打的粮食多，节省人工多，副业生产多。这里不但丝毫没有减轻对组织起来的领导责任，而是更加重了领导的责任。明年将不是检查组织起来多少(百分之几)，而是要检查组织起来多打了多少粮食，超过了单干的多少。

二、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党员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如何办？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但党员在土改后因劳动生产而上升为新富农者，按中央组织部的规定执行。

党员要雇工时，应说服他不雇工，多买车马参加互助组，搞好互助组，提高生产，增加自己的收入，并带领其他农民，提高生产，增加自己的收入，并带领其他农民，提高生产，增加收入。

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党在农村中组织起来提高生产的方针，是必需依靠农村党员去带头实现的，如变工组不好，党员更有责任参加进去，把他搞好。

但以上问题，主要采取教育方法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用组织手段。

2、借贷问题：

应当允许，以活跃农村经济，但一般利率不要过高，以目前情况，一般可参照：借粮春借秋还借一斗还斗半，借钱月利多少分，还在研究，总之太高了不对，太低了也借不出来。

3、土地买卖

原则上应该允许，但地富及游惰分子不参加劳动而出卖土地者应受限制。土地买卖应收税契，税率应高一些。

4、土地出租：按新华社信箱所提的原则处理。新华社信箱指出：“第一，对于一般分得土地的人应当不允许其出租，但是例如分得土地的人是孤寡痼疾，或者是革命军人、革命职员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等，那么就应当允许其出租。第二、对于这种出租者的土地应当由当地政府规定适当的租额，使出租者或承租者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除此之外，根据东北当前的情况，应补充以下内容：凡流散在农村的工人回厂，或农民与农村知识分子进城当工人当职员、或因分到的地不够种，从事其他劳动或职业谋生者，应准予出租土地，但地富及游惰分子不事生产而出租土地的，应予禁止。

(2)关于生产与供销合作社问题：

一、关于生产变工互助：

1、它的性质在现时还是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它与苏联今天的集体农庄不同，那里的社会主义的，我们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我们现时这种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

2、它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与副业生产，而不是追求形式，他要负责组织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战线，把一切能劳动的人都组织到生产战线上来。

3、它的形式：应该按各地不同情况，但均以小型为主(即北满三马的趟犁组与六个马的扣犁组，南满即为一两马的趟犁组为基础)。根据当地农业与副业生产的需要，根据群众的要求与干部的强弱等条件，依据群众自愿的原则，逐步的提高为职组，但必须以一付犁，事实证明毛病很多，不能提倡与推广，但由于特殊条件群众自愿组织起

来者(如“跑腿子”自愿组织起来的),亦不能强迫解散。至于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合伙组则是错误的应说服群众改组。处理以上问题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同时又是积极地加以引导,任何勉强或强制都不对,放任自流也是错误的。

4、明年应该采取各种办法对变工互助加以具体帮助:

A、农贷除水利、防疫、农业建设之外应全部贷给好的,但生产上比较有困难的变工组。

B、新式农具,应首先贷给变工组。或变工组自购时给以优待。

C、各种优良品种及国家可能对农业的扶助,一切变工组应有优先权。

D、劳模的奖励基本上应奖好的变工组。

E、各级领导机关应研究如何克服目前变工组存在的毛病,提出胜过单干的有效办法(如组织起来易使农业副业结合,力量资金集中,生产有计划等)。有了国家的具体帮助,加上对变工组的领导的改善,在变工组与单干的比赛中,变工组的优越条件是充分存在的,变工组是能够胜过单干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努力工作如何。

需知,国家今天帮助了参加变工组的这一部分农民,扶助他们上升,也就是真正依靠了贫雇农,促进了绝大多数农民的上升,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二、关于农村的供销合作社与城乡结合问题

1、要认识供销工作的巨大重要性。

商业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也可以破坏农业。目前有些地区(如不在铁路沿线的地区)私商经营还占极大比重(如榆树:人民从私商买进占全部五九%卖出占七七%)。我们的国营商店与合作社虽做了很

多事情，但发展不够，还有缺点，私商利用我们的供销不及时钻空子(如买菁)。但我们是充分力量胜过私商的。

因之要求国营商店(百货公司、土产公司、粮食公司)，银行与合作社密切结合，结成一体，这里要求县级党政加强对这些部门的具体领导，不能“单打一”。今后各地可试行组织一种城乡互助委员会以县长书记领导，吸收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粮食公司、银行、合作社、工商科同志参加，定期讨论与解决有关问题。

2、目前的农村供销合作社还应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业务，经营不良的合作社需要加以改造与整顿。加强现有的合作社，培养新的合作社的干部，所有干部均要熟悉业务，并在现有的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地点有步骤有计划的发展一些新的合作社。农村的合作社在可能条件下应试行办理信贷业务，以吸收农村游资，活动运转。在这方面应与银行结合，银行并带动其发展。

3、实行合同制：

合作社与国家商店及银行的，合作社与群众的，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均可订立供销合同，这将促进合作社业务之发展，及生产与供销的计划性与组织性。

目前合作社工作的关键在于党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使合作社的一切活动均符合政策。国家应给予合作社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使合作社能迅速胜过私商。

(3)提高农业生产力，改进农业技术：

技术问题很重要，技术不提高，生产的提高是有限的，这里主要提出几个问题：

一、新式农具，有把握，群众欢迎，能提高生产力的，可以多加制造推广。如马拉双轮犁，马拉播种机，马拉收割机，脱粒机，脱机，产趟机，改良耙，锄草机等。要由县政府省农业厅、学校与农业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后按级分工迅速制造。农贷今后在若干地区以贷农具

提高生产力为主。

二、畜力要设法增加，治马病，防疫血清要大量制造。

三、提倡深耕施肥。

苏联专家说通北农场耕一〇——一二公分太浅了，应为一八——二〇公分。多造各种肥料争取把一切肥料送到地上。

四、修水利、治水、巩固大河堤坝，修理小河，疏通低地的水道。

五、改良品种，在县范围内注意调剂与推广，但要场与农校必需注意研究，并作更大范围的搜集与改良。

六、防病虫害(解决农药，发动群众捕灭害虫)。

七、县区村干部都要学习农业技术，深入生产过程，要像工业一样，熟悉业务，参加生产，不要只是叫喊“三产三趟”。注意对县的农场的领导，将它与指导改进农业技术品种相结合，在农场领导之下搞好一些示范的互助组。每省真正办好一个农业学校。

(4)普遍召开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

一、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最近颁布的三条例与东北人民政府指示(后者与中央有出入者照中央的办)。

二、目的是进一步巩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亲密团结，发展生产加强对地主阶级的专政与一切明的或暗的破坏分子作斗争，在农村中应以贫雇农与中农(包括新富农)及乡村其他劳动者的亲密团结为基础，团结农村的知识分子，小作坊主，商人，组成农村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通过县区村人民代表会改进农村干部的作风，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一切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那种以为“民主了，就不好办事了”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认识人民代表会就是上司。

对于被打例的地主阶级，也要加以具体分析，以便决定正确的对策、以现况看公开进行破坏，杀人放火的，还是极少数，对于这种人

我们必需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另一部分地主，心怀仇恨，但不采取公开的破坏活动，而转入秘密特务活动，这种人虽也很少，但对我们危害甚大，我们应提高警惕，加强公安保卫工作，有计划的进行隐蔽的斗争，找到其线索，予以逮捕法办。还有一种人，虽然心怀不满，但见大势已去，只好勤劳生产，等待时机，这是目前地主阶级中的多数，对于他们之中表现好的，我们的干部不要在群众面前表扬，但可个别找其谈话，指给他们正确道路，鼓励其安心生产，过好日子。

三、要改变某些地区以党代政的现象。

代表会是人民的权力机关，不仅是布置工作，而是讨论决定工作的，改正某些干部轻视代表的现象，改正党代表会与人民代表会的不分现象，人代会中一般的党员最多不超过五〇%。

四、代表着重讨论人民赞成我们什么，反对什么，展开批评。克服害怕批评的情绪，并在代表会上展开生产大动员。

五、村干部要参加生产。

要像吉林保安屯韩恩那样，虽然担任村支部书记与区委委员，但他不脱离生产，把全村的生领导得很好，粮食打的多，副业生产好，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也改善了，群众很拥护他。而不要像个别村干部那样手提木棒满村转，这会脱离群众。要克服那种“党群干部成天跑，政权干部填表”的现象，要成天生产又要多给群众做好事。区县干部应以大部的时间在村屯工作。

在沈阳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集会来热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的签订，这是由于这些条约与协定，不仅对于进一步巩固中苏友好与合作，对于进一步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对于发展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与经济繁荣，有极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于巩固远东与世界和平的事业，也起着伟大的作用。这些条约与协定表明：中苏两大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都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与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都知道：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就存在了极为深厚的友谊，苏联一贯地以其热情而无私的援助给予中国人民，这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的签订，则将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谊与团结用新的条约固定下来了。这个条约不仅表现在共同反对侵略与保护和平建设的政治活动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与文化的互助上。这个条约乃是中苏人民永久合作，真诚友谊的伟大指标。

这个条约关于中苏反对侵略的同盟作了这样明确而有力的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同时对于中苏这种同盟的真诚无间，条约上又加以规定：“缔约国双方根据

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中苏同盟乃是兄弟的同盟。

在经济与文化的互助上，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显然，这个条款对于现在革命后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的。苏联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的协定，以及不久即将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就正是这些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的条款之初步的具体实施。

这次签订的两个协定中，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乃是一个重大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在一切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切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同时，在这一个条款上也规定：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如上所说，这个协定特别表现了苏联的伟大道义，表现了苏联热情地无私地援助中国人民。

因之中国人民、东北人民热烈拥护与欢迎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

东北人民特别感谢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领导下的苏联底崇高无私的援助。因为东北是由英勇的苏联红军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解放出来的。苏联在打败日本侵略势力，解放东北之后，就把东北的主权，从日本侵略者手中交还给了中国人民，并严格地运行着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国人民共同防御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侵略者的威胁，从未超过条约的范围，一贯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去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前，东北人民政府同苏联所订立的一年贸易协定，以及苏联专家受聘来东北参加经济恢复工作，对东北工业建设帮助很大。现时，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我们的祖国已成为新兴的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们的伟大盟邦苏联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表现了伟大的道义。又决定对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诸问题作了适合时宜的解决，这难道不是崇高无私的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援助，又是什么呢？

让那些美国帝国主义者艾奇逊之流在其新闻俱乐部大造谣言吧！让美国国务院发表所谓“背景材料”，所谓“哈尔滨协定”，所谓“莫斯科协定”无耻诽谤吧！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其侵华政策惨败，国民党反动统治可耻地覆亡之后，对于伟大的新中国的强盛与中苏友谊的日益增进，除了造谣与诽谤以发泄他们的恼怒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事实很无情，东北人民和中国人民从无数次的事实中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无耻和可憎，而同时更加认识了苏联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因为事实上不是苏联要使东北从中国分离，而是苏联把东北从日本侵略者手中交还给了中国人民。不是如谣言公司美国国务院制造的所谓“哈尔滨协定”“莫斯科协定”中无耻捏造的什么一派胡言，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贷款协定，根据这些条约与协定，苏联将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签订的中苏条约所享受的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且，“一

切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大连的行政，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凡此种种，不是充分说明什么是诽谤，什么是真诚无私的友谊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的签订，再一次严正地警告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他侵略分子，你们在政治与军事惨败之余，想以造谣诽谤来破坏中苏人民的友谊，来挑拨中国人民的团结，来以谣言为烟幕，装腔作势，企图顺手掠取台湾、海南岛或是西藏，那你们就要小心再一次的惨败，一切帝国主义者应该知道“欺侮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经随着国民党的灭亡一去不复返了。中苏两大国在友好同盟互助的新条约的基础上巩固的团结起来，乃是完全无故的。

我们也要正告那些抱有民族主义情绪与对帝国主义国家怀着幻想的人们，要他们清醒一些，以便从无数的实际生活中认清谁是自己的朋友和谁是仇敌。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一切友谊是中国人民所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东北人民深深懂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中苏关于中长路、旅大协定、贷款协定、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于我们东北人民当前全力所从事的经济建设与其他各种建设有何等重大助力。我们在伟大毛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并珍贵地接受苏联给予我们的伟大援助，把东北的经济建设提高一步，把东北人民的生活改善一步，为完成我们的建设计划而奋勇前进吧！

最后，我们欢呼中苏友好合作万岁！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

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提出的报告,是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党的工作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次代表会议的主题。我们需要把这—个主题研究清楚,以便我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能够明确而负责地站在东北人民的最前面,而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新事业引进到新的胜利。

一、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

首先,我想提到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大家差不多都是明白的,但我在这里还要提到,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要着重说明它和我们东北全党同志的责任或任务有关系。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

根据一些还不算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一九四三年为例,东北煤的生产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九,生铁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七左右,钢材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三,电力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八,铁路线占全国百分之四十二。重工业的若干部门,东北方面的数字,完全是压倒的。不但工业,即在农业中有的部门,例如东北的大豆,是在全世界闻名的,根据一九三八年的数字,它的生产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去年党的二中全会上说到,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把东北工业也计算在里面,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这是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落后。但如果就东北范围来说,情形又不同了。同样地根据一个还不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一九四三年为例,东北工业生产占东北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就是说,从东北这—个局部来说,它曾经有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规模。

同志们!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使得全国人民都注目于我们东北

的重建工作，并希望我们的援助。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经常指示我们，要我们好好地努力，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我们东北人民说来，对于我们东北全体党员说来，都是极其光荣的。

我们的工业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呢？能够不能够实现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所给我们的伟大任务呢？虽然我们东北经过几年战争的破坏，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抢劫，但是，我们的党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的集团的党，我们东北人民是在这样的党领导之下的战斗的人民，我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就毫无怀疑的余地，我们必须和东北人民在一起，勇敢地挑起重建东北经济和发展东北经济这一个重大的担子，戒骄戒躁，稳步前进，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东北的完全解放，是在一九四八年冬天。我们在东北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重建经济的工作，是在一九四九年便开始了的。我们有过关于这一年的恢复工作的计划，并为此投下二百万吨粮食的资金。我们这一年恢复工作的进展，可由工业部所属厂矿开工状况看出。我们接管的初期，开工的工厂是很少的，到四月份有了一百九十一一个工厂开工，九月份增加到二百四十三个，十二月则增加到三十七个。

一九四九年工业部系统的生产总值为七百九十六万吨高粱(军工生产在外)，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四点二。其中，炼铁、炼钢、炼铜、采煤、炼焦、发电、机械制造业等主要重工业，都超过原计划。有些轻工业部门(例如棉纱、棉布、纸)，则没有达到原计划的数字。铁道运输计划，是提前完成了的。农业生产，则因为南涝北旱，实收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副业生产二百万吨在外)，只达到原计划的百分之十九。

私人资本的工商业，因为国营企业和农业的发展，有了订货和市场，也有它的发展。以沈阳一地为例，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十二月，私人资本的工业，由九千七百二十七家，增加到一万二千零零七家，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而其工人数则由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人增加到五万零四百十三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我们的恢复工作，就国营工业的生产量来说，在一九四九年，达到了该项所恢复的一九四三年日伪工业的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业已破坏而很难或不能恢复的企业，不在计算之内)，农产物则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左右。这是极其值得注意的速度。特别是我们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过于原有工业设备恢复的速度。例如：炼铁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代最高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纱锭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六，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代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〇这就完全表明了我们新民主主义国营工业的优越性质，表明了我们生产力可能迅速发展的伟大前途。

在这一年，工业与农业的比重是这样的：即工业生产由一九四三年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农业生产，则由一九四三年的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四左右，进而为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工业的恢复工作，还大大地距离我们应达到的目标。但是，由于我们工业上恢复的方向是首先着重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一九四九年我们生产手段的产品总值，等于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左右，而消费资料的产品总值，只占百分之二十六左右)，按着这样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还加上其他顺利的条件(例如购买工业设备能够如期实现的话)，就能够造成东北国民经济改造的基础，能够使我们可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手段，以扩大国民经济，加速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可能争取于较短期间内，根本变更现在工业与农业的比重。而我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工业给农业提供了很多新的农具以及农民新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也必将随着大进一步。

我们的恢复工作，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但使我们得以支援了人关南下大军，而且是与改善人民生活相联系的。一九四九年工业就业人数，仅公营企业，全年增加了二十四万人。职工实际工资，由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的平均一一零分，到十二月底增加到一四零分，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并实行了劳动保险。国家为职工支出的，除工薪外，劳保、医药、文教等费，约占工薪总数的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一。粮布的交换比值，一九四八年冬天，一吨粮只换一疋又四丈布，到一九四九年末，则可换到二点八疋(北满、中满)，同时布的质量也提高了。物价达到相对稳定。前年，平均上涨八倍，而一九四九年平均只上涨百分之八十。农民负担，则比前年减轻了。一九四八年，征收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三，而一九四九年，仅征收百分之二十。

国家商店和合作社，供给了消费者以价值近三百二十六万余吨粮食的主要必需品，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四，并购入了各种粮一百三十八万吨，其他土产价值三十余万吨。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在商业活动上比重的增大，就打击了商业资本投机捣把和操纵物价的各种危害人民生活的活动，保证了市场的相对稳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志们!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去进行土地改革与革命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并摧毁其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的国家，搞好经济建设事业。这件事情，虽还只是开端，但却是事实，而且应该说，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相当规模的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事业，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新的艰巨的事业。一年来，我们的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与土地转到了经济建设的战线上，并提拔和派遣了上万的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有许多已经开始学到了一些管理经济管理城市 and 知识，过去不懂的事，现在初步懂得了，过去不会做的事，现在开始会做了。正像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与战争一样，新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同样是可以学会而且能够学会的。这一事实，不仅大大地鼓舞着全党为搞好经济建设事业前进的热情和信心，而且有力地说服着那些只看到眼前工作中的一些困难，而对新中国伟大的建

设事业怀抱杞忧的人们，证明他们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另外，这一事实，也给中外反动派指明了不管他们的罪恶愿望如何，我们不仅取得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将取得经济建设工作的胜利。

显然，我们经济的恢复比较迅速，乃是由以下的几个主要的条件决定的。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国家，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已被彻底打碎，我们的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也在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第二、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又推翻了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使农民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农民在伪满时代每年“出荷粮”八百万吨，而在一九四九年所出公粮为二百三十万吨，负担极大减轻。除此而外，农民原来缴纳的地租已全部取消。这样，农民就出现了空前的生产积极性，并获得了农业为工业准备粮食与原料的优越条件，而由国家所征收的公粮又大部分投在工业上面，转化为与建工业的资金。

第三、我们人民国家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各种企业和财产，握有关系整个经济命脉的大工业、铁路、银行和大的商业机构，而使这一切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并得以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步步地进行国家经济的计划和调节，虽然我们这种计划在起初几年还只能是粗枝大叶的。

第四、工人阶级在解放之后的伟大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伪满时代煤矿全员日工的生产效率，平均为零点三六吨。而一九四九年，我们煤矿局以及本溪、抚顺诸矿的合计，全员日工的生产效率，则为零点五四吨。就是说，现在生产率，为伪满时代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根据工业部系统部分厂矿的调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与六月份对比，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三〇一百十六个厂矿出现了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二件新纪录，并涌现了大批先进分子，他们既能带头生产，又在群众中有威信，是

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成为今后各厂矿生产中最宝贵的骨干。

第五、我们党曾经有二十几年的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增养了相当大量的干部，不论他们的经验是如何的不足，然而那些经验使他们获得了在新条件下处理事情的一定能力，因而在重建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同时又是具决定意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一切正确的政策及其一切具体的指示，使我们能够按照正常的轨道前进。

第七、苏联专家的帮助。

我们相信，上述这些基本条件，不但决定了我们这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也必将决定我们全部经济建设的伟大将来。

至于这一开端中，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不少的弱点，我准备在第四个部分说到工作问题的时候，再去提到它。

三、一九五〇年的工作

我们要从一九四九年所已准备的良好开端出发，并根据业已确定了的发展方向，来继续我们的经济重建工作。

关于国营工业方面，今年主要产品计划为：生铁七十七万吨(去年为十七万二千吨)，钢锭五十四万吨(去年为十万吨)，钢材七十四万吨(去年为七万二千吨)，电解铜四万吨(去年为一千八百七十四吨)，电解铅四万吨(去年为二千零六十二吨)，煤一千七百万吨(去年为一千一百万吨)，发购电量二十亿电字(去年为十四亿电字)，制造电动机六千八百台(共十万千瓦，去年为一千一百零九台)，工作母机三千三百台(去年为四百九十七台)，水泥四十三万吨(去年为二十一万八千吨)，各种纸五万吨(去年为二万二千八百吨)，各种布五百七十万疋(去年为

二万疋), 纱二十三万五千件(去年为十二万件)。

根据这样的计划, 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那么, 我们在一九五〇年的国营工业生产总值是要求达到二十三亿元(一九四三年东北的货币), 等于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价值(近十二亿)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 约达到一九四三年伪满时代工业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七。而生产手段的生产价值(十八亿), 则占这工业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七十九左右, 消费资料的生产价值(四亿九千万)占这工业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就是说, 比起一九四九年, 我们又提高了生产手段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如前一部分所说, 这点对于全体人民都有利益, 这里不用再多说了。同时, 在这个计划中, 我们关于消费资料的工业生产, 就实际数量来说, 比起一九四九年又几乎增加到五分之二(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四九年是三亿, 一九五〇年是四亿九千万), 这样, 就使得我们能够比一九四九年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给人民。

关于农业方面, 今年的生产计划, 拟耕地一千七百二十万垧, 其中种棉二十三万四千垧, 种麻九万七千垧, 要求粮食的生产量达到一千八百万吨, 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计算, 为三十亿元, 等于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价格(近二十二亿)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约达到一九四三年伪满时代农业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

林业方面: 今年计划采伐五百九十二万八千立方米(去年计划采伐四百六十万立方米, 采伐任务已完成, 输送任务只完成四百一十立方米), 同时注意育林与护林的工作。

很明白, 如果我们今年的计划能够全部实现, 那么, 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就将发生初步的变化, 即工业的生产总值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变为百分之四十三左右, 而农业的生产总值则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变为百分之五十七左右。这点当然是大进了一步, 这一步要以今年极大的努力来达到。但这还是工业的比重落在农业之后, 而且这还远没有恢复一九四三年工业与农业比重的水平,

工业还只能恢复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七。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水平，这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在这一年，我们还准备作新建设的投资。

我们在今年的收入，可能有以下的数字：农业税收为二百四十万吨粮食，关税、盐税与城市其他各种税收为三百十五万吨，国家企业利润为六百一十六万吨，合计为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吨，加上公债及上年结转，则为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吨。我们在这样的数字中，准备以六百六十五万吨作恢复与建设经济的投资，即约占全部出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其中，工业部投资则为五百万吨，占全部出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中，生产手段的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消费手段的工业投资占百分之十五〇和去年的工业投资比较，今年工业投资等于去年的两部半。为恢复工业所需要的修建工作，将是今年的一件大工作。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什么而工作，从我们算出数字中，也可以看出来。

关于商业方面，我们计划今年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零售总额为五十一万九千七百余亿元(现在的东北币)，约占社会零售流通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这是根据我们关于工业农业生产计划的可能实现与我们公家可能掌握的物资而计算的。为着继续打击投资者，为着使得我们公家掌握到的物资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和比较恰当地落人普通消费者的手里，并达到农民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而工业又能供给农民以必需的工业品这两方面相结合的目的，我们准备把一九四九年的国营商店三百七十二处增加到一千五百处，分配的零售额为二十六万二千余亿元。同时，在一九四九年九千个合作社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和有步骤地加以发展，分配的零售额为二十五万九千亿元。

预计今年秋收购粮二百万吨，另外收购其他土产约需值现在的东北币十七万亿，照国营商店现在情况，还缺乏不少物资以与农民交换。

因此，除了计划中预定扩大的轻工业外，还必须鼓励地方公营的轻工业及私营的轻工业之发展，并向关内订货，同时引导私商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以扩大供给人民所必需的物资种类。

对外贸易，今年计划进出口各一亿六千万美元(比去年约增一倍多)。方针是争取工业机器与必需原料进口，扩大剩余物资输出。

同志们!关于今年我们经济重建的工作，大致就是这样。比起去年来，这个计划算是进了一步。当然，事情的发展免不了会有一些出入，但这是比较可靠的计划。它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根据真实的物质条件的计算而制定的。由可能到实现，是一个重大的斗争过程。我们必须认真地善于工作，同时，又必需充分估计到我们还存在着的困难与可能发生的困难。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说，在工作中必须准备遇到困难的方面，准备克服困难。如果有的同志以为什么事情都能一帆风顺，对于困难丝毫没有警惕性，那是错误的，是极端有害的。

四、关于我们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下，我想说明关于我们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计划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已经有过一次计划，我们现在又有一个准备在今年实行的计划。我们的经济是朝着计划的方向走，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像前面所说，我们的政权性质和我们政权握有国民经济的命脉，给了我们这种计划可能性的基础。一年来在经济活动中的试探，完全证明了，我们的经济计划一旦变为有组织的行动，一旦和大众结合起来，就能成为引导生产力前进的力量，而没有计划的领导乃是盲

目的。

一九四九年的经验也证明，我们的计划性是很不够的。我们的计划是有很多缺点的。当然，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大工业方面)的经验不够，统计材料不够，我们不是神仙，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出十全十美的计划来。许多重大的东西，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的。

例如，我们要指出：我们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是配合得还不密切的。工业与农业之间，这个工业部门与那个工业部门之间，这个企业与那个企业之间，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如此等等，都还是配合得不够密切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我们的上级政府与各个下级政府之间，这个地方与那个地方之间，国营与私营之间，它们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也是还不密切的。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用比较恰当的形式把各个经济部门与各种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点乃是我们经济上进行计划的活动所必需的。

可是，我们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一年来的经济活动，不但在东北，而且在关内，在这方面，已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少很有益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的是合同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关于劳动的合同，另一方面，是有些经济部门之间，关于产销与订货的合同。

例如，在东北，我们国营企业内部的劳动合同，已经普遍采用的有联系合同，重点试行的有集体合同与包活制。另一方面，在国家商店与农村供销合作社之间已经采用的有产销合同，在工业部门与商业部门之间，国家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公私企业之间，都曾有过订货合同。通过上述各种各样的合同，已经部分地克服着我们在生产与供销中的彼此脱节现象，使得计划的执行更有组织性，并从而促进与加强了计划性。这种合同制，可以把我们经济各个有关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并且可以经过劳动合同与订货合同，或产销合同，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而加强各经济部门、各企业内部制定计划与实行计划的责任。这种合同制，不但可以把国营企业更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经过与合作

社订货的合同，还可以把小生产者的一定生产范围纳入到我们的国家计划里面，而私人资本的企业经营也可以经过订货的合同，在一定范围内，纳入到我们的国家计划里面。这种合同制，是现在我们组织或联系各方面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方法，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准备把这种东西，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加以推广，即把已经初步存在的合同制变成为在整个国家计划领导与调节之下的有组织的合同制。

为着有意识地来推广这种合同制，同志们必须具体地注意研究已经存在的经验，研究它有过的优点和缺点，而发扬它的可用的优点，克服缺点，对于有过的错误，力求不要再犯。同志们并且必须在推广中，实行中，反对形式主义，注意取得新的经验。不难明白，当我们的计划还不十分精确，生产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的时候，签订长期的合同是有困难的。因此，有许多的事业不妨从短期的合同开始。经过这种种丰富的试探，我们就能够有充足的经验，有可能来不断地审查我们的计划，审查我们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具体关系，并随时随地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合理的调节。同时，这就是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地与更广泛地取得组织我们经济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来计划我们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

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就是具体领导的问题。我们会不会领导我们的经济前进，不能只看我们会不会制定一般的计划，而且特别要看我们会不会实行具体的领导。这种具体的领导的基础，就是企业管理。

我们在这里准备说到我们现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三件事，就是：建立责任制，贯彻管理民主化和贯彻经济核算制。

同志们!我们大概都懂得这个大道理：我们共产党是对工人阶级

的事业负责的，对人民负责的，对我们的祖国负责的。是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说。但是，在我们队伍中，也有这么一种人，只愿意有抽象的“负责”，而并不愿有具体的负责。说起天下大事业，可以头头是道，“慷慨负责”，但是，把他放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他又觉得那不过是“小事”，不值得负责了。这种人在我们革命过程中，曾经发现过不少。现在在我们的经济事业中，同样也发现不少这种人。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大事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事联结起来和积累而成的，在经济事业上更表现得特别明显。没有做好经济工作上的许多“小事”，无数“小事”，我们是做不好什么经济建设的，而考察每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究竟如何，就是必须看他对于种种“小事”采取如何态度，对于这种种“小事”采取如何态度，对于这种种“小事”负责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随便举些在经济工作上所表现的不负责任的例子。例如，抚顺龙凤矿有一个斜井修理系长，破坏保安规程，打开“密闭”，致使瓦斯爆发，结果死十五人，伤十二人，造成严重损失。又例如，鞍山炼钢厂二号平炉修理时，急需氧气，虽然堆满了氧气瓶，但都是空的。平炉的人说，氧气厂发给他们时就是空的。氧气厂的人说，平炉用空了，又来赖他们。彼此推诿，严重的影响了生产，但还查不清责任。又例如，哈尔滨的鸡鸭公司曾经存有一九四八年出口不合格的肉，价值在百亿万元上，本来可以内销，可是竟然积压到半年以上。该公司一九四八年宰猪留下的鬃毛，不及时出卖，到第二年春就坏了一万斤，值三十亿元。又例如，几年来在森林方面火灾发生了多少次，一九四九年一年即发生二百七十次之多，损失木材约五百万立方米，超过一年的采伐数量，每次火灾都表现无人负责的现象。

同志们!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对于责任的任何疏忽，时常会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变成了罪过。不负责，同时也就转而对于坏事，对于罪过，要负责任。特别是现在我们各方面的经济联系已经这样的密切，一个责任的疏忽，可以影响到许多方面。例如，一个车床的工作如何可以影响整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工作如何可以影响整个工厂，

一个工厂的工作如何也可以影响整个企业，或其他。因此，我们在各种经济部门和各种企业里面，必须积极建立起管理企业的责任制度来，而消除很多地方存在着那种(大家负责而又无人负责)的现象。从一个机器一个工具起，不论事情的大小，我们都要做到有人负责，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规定。这样，就便于我们能够在企业上有效地组织起来，便于我们能够经过责任制来保证我们计划的实现，而且可以经过责任制来发挥每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锻炼出每个工作人员的本领，并从而得以不断改进我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鉴于过去的损失，厂矿的行政负责人员对于厂矿的安全设备，必须积极地检查，便于找到工作的好坏的负责人，表扬好的、处罚坏的。而对于坏事情要负责任的人，就要看他们的情节轻重，可以由撤职一直到送法庭。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已经胜利，我们的国家已经稳定下来了。根据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我们的国家订下那一系列的制度，以便从事我们伟大的建设，而责任制便是我们的建设——更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及其重要的制度，我们必须在一切企业中认真建立这样的制度，而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力求成为负责中模范工作者。

再说企业管理民主化

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我们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改造为人民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方法。目前，管理民主化的中心工作，是真正搞好工厂管理委员会。这种管理委员会，必须是该企业内的共产党组织的职工会的代表参加，目的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经过工人群众中、技术人员中和职员中的积极分子与先进分子，去团结全体工人群众，全体技术人员，团结职员，集中群众的意见，解决工厂中的重大问题，促进大家在政治上与生产上的自觉与积极性，而和破坏生产与怠工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并不是现任制度相冲突，而是和责任制相结合的。我们企业的责任制，必需建立在群众积极性性的基础上，不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好的结果的。我们的企业责任制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责任制，而企

业管理民主化乃是有责任制的民主。我们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以厂长为首的、又民主又集中的统一的领导机关。有人以为责任制与民主化这两种东西是相互冲突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厂长是由上级的国家经济机关委派并对上级的国家经济计划负责的，是对上级负责的；但他必须倾听厂中各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并把它反映到上级，采纳正确的意见或建议。厂长必须把工厂中的生产计划放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讨论，凡每年、每季、每月的计划，还要在职工代表会上讨论。谁要是拒绝或忽视管理依靠群众，不肯依靠党和工会，而一味独断独行，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们的个别同志中，存在了一种意见，认为可以由企业内的共产党委员会(或支部)的书记代替厂长负责制，这种意见竟然是错误的。共产党委员会或支部并不是工厂的行政机关，它是该企业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领导机关，它应当号召党员站在生产的最前线而成为完成生产计划的模范，它应当监察和促进工厂生产计划的进行，及时提出必要的建议，而不能代替厂长，不能代替厂长负责制。

在各个企业单位内的共产党员必须知道：每个国家企业，必须在整个国家经济计划下面工作，而这整个国家经济计划是在我们党中央或我们党中央的代表机关的领导下由国家机关制定下来的。厂长是由上级国家机关付给责任的，厂长负责，不但是工厂所必需的，而且是国家经济计划一元化所必需的。如果使厂长不对上级的国家领导机关或上级的企业领导机关负责，而是对一个工厂内的党委会或支部负责，又如果使该厂的生产计划不由上级的国家领导机关或上级的企业领导机关制定，而由该工厂党委或支部制定，那么，这就将不是什么(领导一元化)，而恰是分割了和破坏了领导一元化。必须了解，共产党的机关是不应该也不能够代替国家机关的。

曾经有人在某些方面把工会工作去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大家知道，这也是错误的。工会的责任和工作，在于团结和广大的工人群众教育工人群众，使全体工人群众了解自己主人翁的地位，提高他们关

于劳动纪律的自觉，发动他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和关心，互相交换生产经验，学习管理生产，并为保证工人的利益而工作。如果把工会变成普通行政的机关，结果就形成了几个并存的行政机关，阻碍了责任制的建立，这是很明白的。

在厂矿职工中搞过多的会议，当然也是错误的。过多的会议，将浪费和损害职工的业力，而招致损害生产的结果。工厂管理委员会必须善于爱惜职工的时间与精力，对于工厂中各种必要的会议，进行恰当的调节，禁止过多的有害生产的会议。

因为目前我们这里已发生了关于企业内行政、党委和工会这些工作互相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所以我在这些问题上多说了一些话。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拟了一个草案，请大家研究修正。

以下我要说到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我们企业管理问题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了一个时期，引起了全党的注意，收到了若干的效果。现在我还想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也还只能说是开始，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知道，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过了供给制的生活，而在供给制生活中，往往就是有什么算什么，收支的计算是没有或很少的。历史、资格或老弱，在待遇上的分别是有些的，但工作的成绩如何，在待遇上是不占地位的。懒人也横竖有顿饭吃(干不干，一斤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则过去我们也经营过一些经济工作，开办过一些工厂，但是大概说来，都说不上有个么真正的经济核算。特别是那些工厂，绝大部分都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只要对于战争是需要的话，我们是完全不计较成本的大小如何的。这点很影响到我们一起去经济工作的同志，使他们的脑海中长期缺乏成本观念，以为只要能够拿出东西来，还计较什么成本呢。

我们的供给制对于支持我们长期的革命事业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就是现在一定时期内，在我们有的机关里面，也还是有益的，

在军队中更仍然是必要的。同样地不成问题，我们过去那么不计成本的大小，如何而制造解放战争的物资，是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

现在的情况在于已发生了大变化的情况。问题是我们现在在经营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在经营现代性的经济如果没有收支的计算，如果没有工作成绩的考核与工资的等级，就是说如果不计较生产成本，不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企业的经营。我们就不能知道该企业的现在，也不能计算该企业的将来，该企业对于我们将是一堆混乱，我们就没有法子计划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真正的精确的经济计划，在这种情形下是无从说起的。

和上面所说的推行企业责任制和企业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推行经济核算制。因为如果哪里没有责任制，那里就没有真正的经济核算制。同时，如果哪里没有管理的民主化以发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出现群众的监督，而只有一套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那里也决不能有精确经济核算制。

现在经济核算制问题的中心就是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即根据我们企业的技术设备的水平，浪费的克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在我们新纪录运动中所达到的成绩，而规定出一种可能的合理的生产定额，以便由此可以初步地或大致不差地实行生产成本的管理，即实行初步的经济核算制，然后又可以在进一步改进管理、提高技术和群众生产竞赛的基础上，力求逐步地提高生产定额和逐步地减低生产成本费。

为经济核算制而斗争，也就是为节约而斗争，为扩大我们的生产力而斗争。

(三)关于新纪录运动

在解放之后，东北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工人阶级鼓起了新的劳动

热情，出现了新的劳动态度，因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我在总结一九四九年的经验那一部分中业已提到了的。东北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有意识地展开了新纪录运动。现在证明，这个运动的意义是极大的。这个运动极明显地表现出了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的生产力，比起过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优越性，表现出了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前途是无限的。

新纪录运动改变了我们厂矿的面貌，教育了，同时也教育了工人阶级自己。有的厂矿，找到了新的合理定额。可以说，运动的今后的计划生产，改新的工资制度，实行定额经济核算制，以及改善人民企业的种种管理制度，很大的帮助。

新纪录，大致是由两种情形来达到的。一种人们改变了过去“磨洋工”的态度，合理地提高，达到了按照现有技术条件应有的生产水平。是部分地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以至部分地改变。在前一种情况下面，应该指出，那是完全应该。但必须注意，劳动强度的提高，终究是要受上的限制的，如果超越生理的条件，那就不是。就是说，我们今后在推广新纪录运动中，达到按照现在条件所可能的合理的劳动强度，达到按照现有的生产水平。除此以外，我们必须鼓励工人们与技术人员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法，改造技术条件。这样，就使得有些新纪录只为少数人在一定时候可以达到。

几个月来的新纪录运动，也发现了一些错误，重量不重质，这是较为普遍的。甚至个别的破坏程度，因而造成损失。例如，机械三厂，虽则有绩，但是该厂所出车床，每台都需要重新加工一次，即运动的盲目性，有的为创纪录而创纪录的很多，总的任务反没有完成，把创造纪录停上，运动发展起来后也没有及时引到解决定额。其次，运动的发展在各个企业与各个工厂之间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改进或发明以配合工人的新是很少，或很不够的。上述这些错误或偏向，很难避免的，在今后运动中必须引为教训。

同志们!有系统地有步骤地推广新纪录运动形式主义，是我们发展生产、完成生产计划的一种运动，是和我们建立合理的生产劳动组织，度，贯彻经济核算制，实行合理的等级工资制的奖励制度等一连串的问题，分不开的。我们这个伟大的运动，善于领导工人阶级为创造生产力而前进!

(四)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关于工业上的问题，我已经说得很多。现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去年十二月的一个问题的座谈会上，我曾经有过比较长的发言，会议上我还可以简略地说一说。目前东北的农业经济，主要有四种形态：

一、个体经济。

二、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上的)劳动互助组织与农村供销合作社。

三、新的富农经济很少，但是已经有了着。

四、国营农场。除国家农场外，省县至少有几个。有的区，也有国营农场，但规模较小。

除上述四种经济形态外，当然还有少数群众等造出租土地为生者，也有资本家向国家租用农场菜园者，但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所起。

党的政策，总的是以普遍发展农业生产中多产工业原料，提高农民大众生活水平。

毫无疑义，我们必须保护和发挥农民从产制度解放出来之后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鼓励生产工具，添购马匹及其他牲畜，增加肥料。扩大耕地面积，修建房屋等等。忽视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或者挫折这种积极性，特别是如果对于中农的这种积极性有任何损害，那必

然是很大的错误，是不能允许的。这点，大家必须明白。

但在同时，我们必须用很大的注意力去发展和组织变工合作。问题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农民(土地改革时的贫雇农与中农的一部分)，不经过变工合作，地就很困难以至于根本种不上(在北满，至少需要两个马的一付犁杖，才能种植耕地，五个或六个马犁才能种和耕地)，更谈不到农民经济的发展与富裕了。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与上升，离开了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农与下中农的上升，是根本谈不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在当时，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现在解放区的变工队，形式与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是农民群众为党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争取富裕生活的表现，现实就是这样的。党和人民政府，应该在物质条件及其他条件上，着重援助农民这种变工互助的组织。

但是谁愿参加变工组，或者不参加变工组而去单独耕种，必须保障完全有选择的自由，而群众是要根据实际利害与经验，来作选择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变工合作所提出的两个原则，即自愿与等价交换(或叫两利)，完全是正确的，是不许违犯的。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急性病，反对一切主观主义的想法与做法。还是一个群众的觉悟问题，是一个我们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强迫命令的粗暴态度对待中农，就是犯了不可允许的错误的。我们的做法如何，是一个测量我们关于“组织起来“的工作做得好坏如何的问题。事情不在于形式主义的数字，而在于组织起来之后农民所得到的农产物的生产值。如果我们把变工互助搞好了，粮食真正产的多了，参加的人就会越多，反之就会越少。我们还必须了解：就是变工搞好了，粮食产的多了，有人不愿参加，也完全有这种自由，我们决不能强迫。同时，更不能因为任何农民只愿意单干(单独耕种)，而轻视、打击、排斥他们，给他们戴上“尖头”的帽子，而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去团结他们。如果那样，也就是很大的错误。单干的人同样是劳动人民，我们应该耐心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以事实证明给他们看，要由生产变到富足，单干是不如参加互助组快。这样，可以根据

其自觉自愿，逐步地引导他们参加到互助组来。

对于新起的富农，不是排斥，在目前也不要实行限制的政策。我们是允许他们的存在和发展的。关于雇工，借贷，典押，买卖和租佃土地等，在遵守政府规定的条件下，是允许的。

关于国营农场，过去组织机关多余人员去生产，增产粮食，解决机关经费方面，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改良与推广优良品种，推广改良农具与新式农具，推广农业科学，从而指导与影响群众的生产工作上，做的还很不够。今后，在这些方面要多做些工作，首先要与其周围的互助组与农户取得联系，以便使国营农场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多起作用。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准备多组织几个有拖拉机的农场，作为给农民看的模范。

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关于农村四种经济形态的一些根本政策。

党应该教育农村的支部与党员积极参加变工互助组，与参加供销合作社，从中起带头骨干与商业作用，以推动广大人民经济的发展，并从而发展个人的经济。

但农村的党员有的要单干，不愿参加互助组与合作社时，应该看成这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变工互助工作做的好坏的问题，但不能用命令的方式去解决。

党员家庭，在土地改革后，因劳动生产而发展成为富农，其愿意自动退党的，党给以同意和批准；其表现对党消极者，党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停止其党籍；但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做一个好公民，同时也不干涉他们的经济经营。至于有的不自动要求退党，又和“消极”态度有分别的，可按中组部规定，根据具体情形处理。当他尚能执行党的决议，遵守人民政府政策法令，且在群众中尚无恶劣影响者，保留其党籍；但如果在思想上蜕化，在政治上变质，确已失去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时，自应依照党章开除其党籍，保持党的纯洁性。

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同志们!我们今天集会来庆祝我党诞生的二十九周年。二十九年前,我党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今天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发展成为拥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且已领导人民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了。为着胜利地完成党现在所面对的艰巨建设任务,党中央已决定在全国展开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东北局已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出了指示,想大家都已看到。我现在想就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大家知道,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

毫无疑问,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从整个党的斗争历史看来,我党始终是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并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也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打倒了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即长久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东北,我们继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全部完成后,又有了经济建设的良好开端。我们在东北的工作有进步,我们在各种建设事业中都获得了成绩,这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已经完满无缺了呢?人民对于我们在东北的各种措施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都已称心满意了呢?就是说,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都已十分密切而毫无疑问了呢?决不能这样说。我们共产党人丝毫不应该因为已有的成就和人民群众的赞许,就自骄自傲起来,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须知我们所做的还只是

人民伟大事业的开端，我们在各种主要工作中的成就距离我们奋斗的目标还很远，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因而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妨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这就是我们提出整顿党的作风的根据。

同志们!我们东北全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这次整风就是为了搞好经济建设。为要从各种建设工作中来整顿我们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从经济建设中来整顿我们的工作作风，而不是脱离当前实际工作，或从书本出发抽象地去整顿党的作风，因此，我们准备认真地来一次全党的检查工作的运动，主动地揭发我们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各种毛病和错误，检讨阻碍我们工作前进与影响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源，及时改正缺点和错误，把全党(首先是各级主要负责同志)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把党的工作作风加以整顿，更加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与提高党的纯洁性，使全党的同志明确而负责地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与东北全体人民紧密联系，搞好东北的经济建设及其他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次整风的基本目的。

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主要危险何在呢?什么东西妨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呢?

我想，最主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的缺乏政策观点，和一部分同志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及随之而来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恶劣倾向；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甚至很久得不到纠正，则是同高级领导机关中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倾向分不开的。现在我们的党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我们党在人民中威信很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假如我们不能迅速去掉这些恶劣的作风，那么，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建设事业的危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些恶劣的作风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同志们!我们有哪些脱离群众与违犯党的政策的严重现象呢?从我与各部委各省市负责同志五天的座谈中，以及由东北局派到下面检查工作的同志呈报的材料中，可以举出以下的一些例子：

比如贸易工作方面：

在我们的贸易部门完成国家的商业计划时，对于如何加强计划性、打通对外销路与活跃内地市场的物资交流、正确地掌握价格政策、扶助合作社与团结正当的私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缺乏具体的贯彻，因而发生了以下的问题：

(1)有些地方不按当地人民需要，强派推销与收购任务。因而发生货物供给不及时，品种、质量不合人民需要以及某些争销争购的现象。

(2)某些单位调拨物资缺乏计划性，因而形成货物旅行的现象。如黑龙江省历来生产大量面粉，行销东北各地，东北产的面粉，已经感到不好出售，但贸易部却从关内购来面粉三十万袋，并拨给省一部；龙江产的火柴早已过剩，但又从别处拨给省火柴。由于盲目调拨的结果，本来价值八十万元的马蹄表，拨到龙江乡下只卖十几万元；还有工业修建中大量需要的瓦坭铁，拨到龙江乡下并限期贱价卖给农民，但因贸易部不能满足工业部修建的需要，又从农民手中以高价收回。因而给国家造成了毫无意义的损失。

(3)价格政策的规定，不是按照经济情况，不考虑到还有很大的自由市场，而是简单地按行政的区划来规定。如果龙江全省三十多个县份，只有两种物价(即齐市与北安)，靠近哈市的绥化县的物价，不是跟哈市走而是跟齐市走的。加以个别地区以行政命令的办法规定当地的人民和合作社只许在该地的国家商店买东西，不准本省本县本区人民到其邻近的外省外县外区购买东西，其结果就发生违反境内贸易自由政策的现象，对物资交流，反而起了阻滞作用。此外，收购土产的价格，也多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以致随着外部市场的急剧变动而忽高忽低，这样一方面造成政府的损失(仅今年三、四月份收购鸡蛋、活猪、小麻籽、野鸡等在价格方面的损失即达九四七亿元)；另一方面在跌价之后，政府不收购，又形成产品的滞销，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情绪。

(4)我们的贸易部门，在某些城市不按需要与可能设立了过多的零售店。如在哈尔滨市，出了一百多个肉床子。此外，还有个别地区发生错误地阻碍正当私商下乡与合作社进城的现象。

(5)在贸易工作的经营管理上，缺乏经济核算的具体措施，有些单位只顾卖货不顾赔赚。如沈阳百货公司今年的推销冷货工作，明明赔了一二九亿元，但在总结时还说是很有成绩的呢！至于商品积压与严重的耗损现象那就更多了。如沈阳百货公司就有六千斤烤胶放在暖气管附近烤坏，一万支盘尼西林因过时失效，水龙头不关，把近千斤的白糖湿化，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在有些贸易部门的机构上，表现了严重的机关化。如沈阳信托公司二三二人，其中直接经营业务者原为七人，现在增加到二十六人，也只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

所有上述现象如果不迅速改变，国家与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在工业方面，广大职工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并有苏联专家的各种帮助，我们工业建设应得到更多的成绩。但是，目前却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缺点，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例如工业部系统下的一些厂矿，只注意到完成生产的数字，缺乏具体检查与验收，生产出不少不合格产品，比如一厂第一季生产的三一台六尺车床全部不合规格，生产的自行车因质量不好，卖不出去。由于质量不好，或不合规格，形成了生产中严重的浪费；同时，使产品成本加高，在市场不易出售，形成积压，妨碍生产。其次，今年基本建设工程很大，但有些修建的材料(如红砖、石棉瓦、木材等)与工程的质量不好，浪费了国家巨量的金钱。沈阳工学院一万四千平方米的三层大楼建筑，经检查发现：该大楼柱座，有百分之八十位置不正；还有吉林造纸厂按装“蒸煮罐”，事先未作调查，打了三米多地基即行安装，后来打房基时，打至七米深处，发现下部均是流砂，因而蒸煮罐工程不得不返工重做。

工业工作中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问题。本来我们企业中的技术人员与职员的数量就是不够的。我们的产品质

量不好，经营管理不善，也同我们没有做好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的工作有关。我们有些企业的领导，对于技术人员与职员采取了轻视态度，还不能很好地团结他们工作。有些领导人员还没有充分地使技术人员与职员有职有权，使他们到实际工作岗位上获得改造与提高；还没有制定合理的技术规程与管理规则，作为全体职工共同运行的法规；还没有切实地具体地解决技术人员与职员生活居住的困难；特别是还没有在工人中进行充分的重视技术与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的教育，因之技术人员与职员工作的积极性与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工人的劳动创造与技术人员、职员的科学指导、合理经营，未能很好地结合，而且职工之间还有若干不团结的现象，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工业的领导方面，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落后于我们工业发展的现状，我们的许多企业还缺乏具体的精确的经济核算，缺乏资金管理，缺乏成本计算，缺乏科学的计件工资制度。而这些乃是我们当前办好企业的首要工作。

当然，为了搞好工业，除了上述各点之外，首先是要根据可能与需要，制定比较精确的稳当的计划，并规定各个部门各个人对实现计划的责任，把它形成系统的制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缺点还是很多，同样需要认真改进。

在农业方面，我也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如一九四九年的浑河灌溉水利工程，是东北水利总局在一九四九年自己办理的唯一的工程，去年春天开始动工时，水利总局就把这样一个大工程，交给两个技术人员去负责，从未深入检查，结果工程完竣，不能使用。其中大房身排砂节制闸，在涨水的时候闸门拉不起来，以致淹地更多，今年就不得不反工重修，这样不仅浪费了国家财富，而且给人民以不好的影响。此外如饶阳河治水工程，据水利总局报告，已基本完成，但经检查结果，六个水闸，还有五个没有完成。

再如推广新式农具问题。据一些部队与地方的反映，新式农具质量不好，坏了不少，而且成本很高。但我们管理这一部门的机关，认

真的检查和及时的纠正很差。

再如林业问题。由于乱加采伐，不注意护林与造林工作，致使不少林区好的红松木都砍了，差的杨木桦木都留下；有些部门不该用红松木，也禁用红松，造成了“大材小用”的浪费。最近农林部调查了三百万平方米的森林，其中病腐木竟占三分之二。

再关于发放农贷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当做例行公事，一年一次，而没有很好地研究东北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两年大生产之后已经发生的新情况，因而对老区与新区，有灾区与无灾区，生产上有困难的户与无困难的户，缺乏具体分析，一般化地发放农贷，其结果对农业生产作用不大。个别地方的农民，甚至将领得的农贷去买烧酒喝了。

在财政方面，我可以举出征收公粮与税收的例子。

关于公粮方面。我们各个地方，在春耕总结时总是报告耕地面积如何广大，如何种的好；产垧中总是报告如何产垧的好；而秋收时，则报告年成如何不好，甚至耕地面积都比春耕时缩小了；但在国家收购粮食时，报告的数目则又多出来了。这种情况，几乎成为一种通例。同志们应该汲取去年的教训，去年秋收开始时各地报告：南涝北旱，仅五成年景；收粮后有些地方说不是五成而是六成；以后有的省份说实际有八成年景。这样不仅影响国家难于正确掌握征收政策，造成了畸轻畸重的现象(如松江的通河去年仅负担百分之九)，减少了国家收入；而且影响到政府收购工作的必要准备，这是我们今年四月以来物资滞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结果使自由市场粮价跌落甚多，使农民同样受到了损失。

在税收方面。各地税收工作同志积极负责，工作精神很好，但有些地方他们只顾超过“任务”，缺乏政策观点，因而形成离开政策与畸轻畸重的现象。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安东市的例子：该市三、四月份营业税，省税局根据资本周转率及交易额布置任务为一五零亿元。按该市商人自报材料可完成八十七亿元，机关生产企业估计可收二十多亿元，查账补报一、二月份营业税估计可收二十多亿元，三者合计可

收一三零亿元，较规定任务仅差二十亿元；如再组织力量检查账目，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但市税局只求超过任务，将小组自报数目普遍增加一倍，以致还犯了党的政策，引起了某些商人的不满。

此外，在工会工作方面，由于对当前工会工作的具体历史条件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工会的任务，对于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对于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与责任，未能全面的了解。在少数公营企业中部分工会工作人员不是深入生产过程之中，而是站在生产之外；不是努力学习技术，钻研业务，使自己逐渐成为内行，而是袖手旁观，笼统领导；不是主动地协助行政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共同搞好生产，而是消极地埋怨与指责多，积极负责的精神少。因之这些同志对于教育组织工人学习技术，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帮助行政改善经营管理，亲密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以及克服工人流动现象等工作，没有起作用或没有起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同志们!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决不只是这一些。因此，无论党委、政府、军队以及群众团体各个部门都要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认真地深入地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地改正缺点和错误，以利党和人民事业的前进。以上我说的，主要是东北一级各部门的一些情形。

我们知道这种脱离群众违反政策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各省、各县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必须同样进行深入检查与彻底改正。我现在也不妨在这里再举一些例子：有些地方为了所谓“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参加互助组。松江的汤原密山等县的某些村子，甚至对于退出小组实行单干的农民要罚钱、罚工；龙江的某些区村，强迫互助组一律记账、订公约，使得群众造假账、造假公约，贴在墙上，名为“抬头见喜”。

再如：黑龙江绥棱县森林区发生山火，一开始就有人报告县长，但县长不慌不忙地说：“绥棱年年着火，烧不着啥。”结果山火蔓

延，从原野烧到森林，从绥棱快烧到铁骊。这时县长才下通知，派人救火，结果因火势太大，又加对救火无组织、无领导，没有救下，山火延烧达半月之久，烧毁森林长达百里以上。汪清县也有类似的情形。请看！这种官僚主义竟发展到对国家、对人民何等不负责任的地步！

官僚主义在工作中表现的另一种形态是形式主义。

如上边的指示或决议公布之后，不少地方不结合本地情况加以认真地研究与讨论，规定具体的执行办法，而是依样画葫芦，一级一级照例地开会传达，如桦川县动员借耕，在县上开了大小十三次会，共开四十七天，会后未作任何具体布置。下边干部说：“任务一大本，办法自己想。”群众说：“县里一大本，区上一块纸，村上一张嘴，屯上只剩两条腿。”还有的地方动不动开会，召开几天群众大会，七天村干部会，群众反映说：“三天两头会，开的真遭罪，开到五月五，铧子不沾土。”

同志们！上述这些恶劣作风，当然是会遭到群众的反对的，但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有的甚至坚持不改，在听到上级或群众对他的批评时，不是表示欢迎的态度，而是采取拒绝的态度，这种人只愿意听别人的颂扬，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遇到领导上有什么批评时，他还会说：“请上级对我的工作做一个基本估计吧。”这些同志不了解，工作中的成绩就是不讲也是抹煞不了的，而错误若不批评改正则会造成革命事业的更大的损失。

最后，我还要提到少数同志的铺张浪费以至贪污腐化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而且如不痛加改正，对于这些同志本身的政治前途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最近东北局组织部与各地党委已经处理了一些这类的案子。今后我们要经常动员全体同志和广大群众向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政府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揭发这种犯法的行为，以便将这些肮脏的东西，从我们队伍中打扫干净。

我向同志们讲了这许多例子，目的就是要大家警惕，不要因胜利冲昏了头脑，采取万事大吉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而要锻炼兢兢业业，

认真检查工作，勇于承认错误，并善于加以改正。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只是个别的现象，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带普遍性的问题来，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以下几个：

(一)党内政策研究与政策教育不够。

大家知道：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的拥护，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同人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就是因为我们党有着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基本利益的正确政策，这就是毛主席与党中央所制定、我们所执行的各种政策。政策就是我们行动的方针，政策执行贯彻的好坏，就是衡量我们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好坏的根本标准。离开了党的政策去讲任务，或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数字上的任务，其结果就会脱离人民群众。

但是由于党内对于政策教育与政策研究不够，因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少同志往往只注意完成任务的数字，不注意掌握政策，因而把所谓“任务”与政策对立起来。我们也有不少的同志不是在严格遵循国家的和党的政策的限度内去完成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任务，而是采取粗暴的方法进行工作，不去注意具体的情况，不顾及事实上是否可能，不去虚心地和当地人民商量，只是简单地完成任务，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还有不少的同志，只顾自己局部需要与局部的利益，缺乏全局观点，因而把局部与全体对立起来。这样，就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违反政策的现象。

(二)钻研业务与精密计算不够。

有些同志心中无数，又不肯下苦工夫去作调查研究，业务不懂，又没有决心去学习；有的同志甚至想打“退堂鼓”。

这些同志忘记了毛主席所告诉我们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

不要摆官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三)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满足于完成任务的数字，害怕自我批评。

凡是害了这种病的同志，应该很好地重温一下毛主席在七大时对全党所说的一段话，毛主席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沾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

(四)官僚主义态度。

第一种：不是准确地本质地一个个地解决重要问题，而是粗率地、形式地一般地应付问题。

第二种：成天埋在办公室的纸海里，不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认真检查工作，发现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

第三种：命令主义，不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群众的觉悟程度去行事，而是主观地蛮干。

正如毛主席说：“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的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发生是与旧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我们的

事业发展得很快很大，新党员新干部大量增加，党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系统地教育；而老干部对于今天这样新的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又多缺乏经验，有些人又习惯于过去的一套，这些都是原因。但最主要的，我想还是党的领导机关未能有系统地给以政策与作风的教育，及时检查与总结工作，因而就使这些问题未能及时地得到完全的解决。从领导和教育的责任上说，首先是东北局没有做好。这里我要负主要的责任。

这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有领导地认真地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

如何进行这一次整风运动呢？

第一、这次整风，是从检查工作中整风，而不是脱离工作进行整风。就是说，要来一次全党的检查工作运动，从检查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整顿党的作风。因之，每个部门，每个同志，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严肃的检查。反对一般地泛泛地检查，要一个个地发现与研究政策的与业务的具体问题，并一个个地解决，而不是清谈一番，谈完了事。

第二、整风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把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整好，再整中级机关与中级干部。对于下属干部，主要是帮助他们总结工作，从而训练与提高他们，他们不懂的东西，要帮助他们学会，群众不喜欢的东西，要帮助他们去掉，培养他们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但要注意新老干部结合，上下结合，防止脱节的偏向。

第三、整风的方法是广泛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方面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保证被领导者有完全的批评自由，绝对不许压制与报复；另一方面，又要加强领导，防止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

第四、这次整风，一般地不进行查成份、查历史(这是组织部门的经常工作)。整风中发现错误严重，需要给以纪律处分；或有政治问题的，应分别由有关部门按正常手续负责处理，以免发生偏向。

第五、各级党的整风，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各企业部门的整风由各该部门的领导者负责。支部应积极地发扬民主，广泛吸收机关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意见。在整风过程中，要提高各级党委的与机关的支部的工作，建立起学习政策与检查工作的经常制度。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这一次全党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后，我们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和作风上的各种毛病，一定会被克服，党与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一定会进一步地加强，因而也一定会使党的工作与人民国家的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

在东北总工会执委扩大会上 就工会工作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一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之下，而且绝大多数工人是在人民的企业里工作，这是和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工会工作有着原则的区别的。第二是处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会工作，与过去战争时期根据地内的工会工作不同的。第三是在工人阶级队伍发展的非常迅速的情况之下的工会工作，仅仅在今年半年之内，新的工人就增加了二十万人，而我们从事工人运动工作的干部却十分缺乏，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工会工作的经验，根据这三个工会工作历史环境与具体条件，我们面对着近代的大规模的复杂的企业，新问题一大堆，事情千头万绪，这也就决定了工会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我们就要发挥工人阶级最勇敢，最坚定的品质，不怕任何困难与麻烦，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关于东北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彻底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

布的工会法。东北总工会要根据工会法和东北的当前具体环境，教育和组织东北工人阶级，与东北人民一道，迅速恢复与建设东北工业，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化的基地，并从发展东北的工业建设中，来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与巩固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工人阶级忍受一切痛苦与困难，发展工业，才有今天幸福生活；大连和东北解放以来，随着工业发展，逐步改善了工人生活的经过，说明改善工人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中国人民公认的国家的政权领导阶级，我们工人阶级怎样才能把人民国家建设好呢？最基本的就是要搞好工业。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这就是工人阶级最大的利益，也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所以工会要加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与主人翁的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工会要团结与组织工人阶级，以积极姿态，负起责来，搞好生产。

要搞好生产，在国营企业的工会应该如何进行工作呢？首先是要深入生产过程之中，而不是站在生产之外；其次，不是袖手旁观，一般领导，而是学习技术钻研业务，经过不断的努力，逐渐使自己成为内行；再次，不是埋怨这个或那个，而是具体的协助行政，共同搞好生产。工会要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帮助发现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不是空喊，或消极指责毛病。饭是一口一口吃，路是要一步一步的走，工作也是一件一件的做。做一件事，就要做到底。特别是省市工会的领导干部，必须到工厂中去摸案经验，要搞好生产，光靠行政是不行的，还必须依靠工会，所以工会工作者必须钻研生产中的问题，研究如何把生产计划，广泛宣传，使每个小组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工会要研究如何组织计划的实现与超过计划？要帮助行政如何改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科学的组织劳动力，提高出勤率，确定主要产品的合理定额，如何做好成本计算，实行计件工资制，订立合同等等。经过钻研，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办法来。但是，过去工会工作，切切实实的解决几个问题较少，说空话较多。就拿工人福利问题来讲，需要做和可能做的事很多，工会干部特别是省市工会与产

业总工会的干部必须克服坐在机关不管实际，或虽到下边去了，但只只是走马看花草了事，而应该亲自下去，踏踏实实的搞些工作。把工人阶级丰富的创造，把下面工作同志的宝贵经验，及时总结起来，加以推广。

私营企业中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组织与教育工人阶级贯彻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通过签订劳资集体合同与组织劳资协商会议等方法，以达到上述目的。无论公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必须监督行政方面或资方切实执行保护工人利益的一切法令。

工会干部如不依靠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去团结全体工人阶级，技术人员、职员、新老工人，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就不可能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因之，工会要注意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教育工人学习技术并尊重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指导。要使工人懂得劳动必须与科学结合，才能创造一切，此外还要注意到新老工人的团结，公私企业工人的团结，技术人员之间的团结，消除工人之间的某些行会帮口观点。

党政工在国营企业中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搞好生产。所以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密团结，互相支援配合，而不是互相制肘，互相抵制，对立和埋怨。工会要主动去帮助行政解决困难，行政同样要主动帮助工会解决困难，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才能统一解决开展生产中的障碍。行政的计划，应该在工人中讨论，一切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都要经过工会去做。从工会与党的关系说，工会就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党要善于通过工会进行工作，党委对于工会的工作采取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办法都是错误的。各级党委都要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会、行政和党的干部，都要钻研和平，研究业务，在党的领导下，把工人运动工作做好。

要老老实实安心负责地去进行工作，不要着急，稳步前进，做了一件算一件。相信在这次会议之后，大家一定能满怀信心，安心工作，团结一致，把工作做好。

实施共同纲领的伟大一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我们以无限愉快的心情，庆祝我们第一个伟大的国庆日，庆祝我们过去一年的伟大胜利，庆祝我们民族无限光明幸福的前途。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重要一员。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一致为我们的胜利而热烈欢呼，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贩子们则在我们的胜利面前日益表现出仇恨。

东北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过去的一年里，团结一致，为实现中国人民大章——共同纲领，发挥了自己的勤劳与勇敢，开始了艰巨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如众所周知，在东北经济建设面前，是存在着严重困难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原有的经济基础的殖民地性，原有的工业设备，又遭受了敌伪的严重破坏，在恢复与改造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缺乏资金、缺乏装备、缺乏技术、缺乏干部，特别是缺乏经验的困难。东北人民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组织了东北经济建设的高潮，特别是工人阶级忘我的英雄劳动，工业干部的钻研与技术人员的努力并得到苏联专家崇高友谊的帮助，克服了并将继续克服着这些严重困难。同时与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东北经济建设以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速度在前进着。

从下面的几个主要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东北经济建设的进展概

貌：

按照东北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的计划，今年工业生产总值要达到去年的百分之一九三，今年上半年计划完成全年的百分之四一点七，实际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四点一。以劳动生产率来看，今年上半年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四点一。同时产品成本在不断降低，以几种主要产品为例：今年第一季煤炭类降低百分之十点五六，钢铁类降低百分之七点九，化工类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一八，纸张类降低百分之九点五三，纺织类降低百分之七点四。

铁路运输，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百分之五四点一。

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出现了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今年计划连内蒙东部地区共产粮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查和各省报告，可能超过计划七十五万吨。今年一垧地平均产量可能比一九四三年超出二百零四斤，比今年计划产量超出一三二斤。

工业投资今年计划为去年之两倍半，上半年实际投入了全年的百分之五十点三〇

随着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国家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年来推销了农民商品粮食的百分之六十七，副业产品的百分之四十二，推销国营产品十一万八千亿。在供给方面，解决了人民纱布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食盐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煤炭需要量的百分之七十一，并供给了工业必需的原材料与城市人民的食粮。国营商业在东北区内供给社会需要的商品包括批发给合作社的在内，约占社会需要的全部商品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四。

同时合作社也有了很大发展，到今年六月已有一万一千六百多处，占行政村百分之三十二，社员九百六十八万人，占东北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资金到今年六月比去年十二月增加百分之七十六；零售总值为去年十二月的百分之二百六十。

由于国营经济和农业的发展，私营工商业也有了显著发展，以沈阳市为例：私营工厂家数今年六月比去年十二月增加百分之八点八三；资金增加百分之八十七点六；职工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八五；生产总值今年六个月比去年全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三〇。私营商业的家数因转向工业等原因虽较去年略有减少，但资金在今年六月较去年十二月增加百分之十八·八，今年六个月的贸易额占去年全年贸易额的百分之八十一·八，这说明了商业正常发展的状况，即正当商业发展了，为人民所不需要的商业转业了，而投机商业则减少了。人民政府为扶助正当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会帮助他们解决了原料、销路等困难，并适当调整了劳资关系，全市有二十五个主要行业签订了劳资集体合同，因而劳资争议去年十二月份为一一三件，而今年四月份则减为四十五件。

从上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之发展”。为东北人民政府在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事业中所贯彻。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提高，今年以来，物价稳定。工人薪金今年四月改为八工资制后，比去年十二月平均提高百分之八，技员则平均提高百分之三十八·九，此外，国家支出连医药、文教、安全设施、卫生等费在内并已开始有利事业费的实际支出，约占工薪总数百分之十八，尚不包括在内。农民生活也有显著的提高，据克山典型村调查，农民每户购买力，前年为一〇〇〇，去年为一三六，今年为二六三〇。目前农村除热河辽西部分灾区外，很多人民添车买马，新开荒地，不断扩大生产，大多数农户家中，衣被一新，耕畜肥壮，猪鸡成群，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建筑房屋，兴办学校，改进卫生，呈现人财两旺的新的景象。

正如毛主席所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东北人民的文化要求正在日益增长。东北现有高等学校十六年，学生一万七千七百余人；现有中学比去年

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七，学生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教师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现在工农中学及工农班学生有五千余人，这是去年所没有的。现有小学三三八〇七所，学生四五七六一人。去年冬农村冬学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四；上冬学生数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四五，工人文化夜校据不完全统计，现有三千八百七十四处，有学生二十九万七千零九十六名。东北的出版事业亦有了空前的发展，仅最近半年间东北新华书店，就已出版各种教产书一千四百二十六万余册，各种书籍四百八十九万余册，各种杂志二百四十三万余册。在群众文艺方面仅戏剧一项，全东北即有业余剧团七千多个，参加的群众共达二十余万人。上述文化建设是紧紧配合着经济建设进行并为它的需要而服务的。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对于经济建设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群众政治积极性与民主生活的发展。东北六省有五省开过人民代表会议，并按共同纲领的规定，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五十六个城市(包括三万人口以上的县城)均开过两次到五次。部分城市并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百六十七个县已普遍开过两次，有十五个县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一八七七个区中有百分之八四点六开过；三一四六七个村中有百分之七一点五开过。在这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发扬了民主，贯彻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解决了城乡生产中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发动群众生产运动，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促进城乡交流，调整人民负担等等，均有了成就。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在东北地区实施伟大的共同纲领一年来的主要成就。

一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同解放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完成分不开的。是同经济建设的前进与胜利分不开的。而经济建设的前进与胜利，又与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分不开的。东北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了：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面，人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各种经济均可能而且已经获得相当的发展，而国营经济愈发展，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

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愈加获得适当的发展机会和条件。经验又证明：这种发展，必须是以国营经济领导的、各种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并相互密切结合的，如果那个地方片面强调了发展私营经济忽视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或那个地方孤立地强调国营经济而放松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密切结合，则各种社会经济都不能获得很好地发展。

为了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之发展，根据我们的经验：就要加强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性，通过计划将各种经济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但经验又证明：要做一个完全准确、全面结合的经济建设计划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必须经过反复考察研究，经过实际执行中的修正，才能于完善与正确。实际的生活说明：如果我们的计划定的低了，它将失去任何指导作用，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如果不计主观力量的大小，不管客观条件是否可能，把愿望当做计划，那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而给人民国家造成无谓的浪费。因之，我们必须一方面耐心说服某些“热心家”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特别是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稳步前进”的方针。

一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

在工业方面：首要的问题亦在于掌握生产及基本建设计划。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制订一个比较周密的正确的工业生产计划，关键在于如何求得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互相适当的配合，使工业产品和市场需要密切结合，并规定合理的机器设备，劳动效率、原材料、水、电消耗的定额，以发挥工业的内在潜力。在制订和执行基本建设计划时，最主要的是必须考虑我们主观的条件。在今天我们技术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要确定任何一件较大的建设工程，都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设计能力、建设力量和设备来源。以便把国家的有限财力，集中使用；同时有重点有把握地进行。而在具体施工以前，必须经过地质勘测，水源电源调查，在一切设计工作及必要的材料和技术上的准

备成熟时，再正式施工。

在东北荣军劳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同志们：

我十分热烈地欢迎你们，祝贺你们健康！祝贺这次大会的成功！

(一)你们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曾经以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的精神，战胜了敌人，为国家与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你们在光荣负伤之后，又在农村、工厂、农场、荣军学校和各个工作岗位上，成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忠实战士，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在东北荣军中出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如像黑龙江省潘铭有，过去是战斗英雄，左臂负伤后回家生产，不仅不要代耕，而且领导互助组，使用新农具，改进农作法，提高产量，因而改善了全体组员的生活，带动当地的荣军，积极生产，同时给农民讲时事，使广大群众认识美帝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前训练民兵，巩固地方治安，由于他的勤劳和勇敢，光荣地获得了八枚奖章、一个东北解放纪念章。他的爱人在他的积极影响下，也成为劳动模范。辽东省的于德深也同潘铭有一样是东北荣军中的农业劳动英雄。如像吉林省的金泰，在光荣负伤后现在是民兵模范，他是村武装委员，积极组织民兵，训练民兵，护青护场，防止地主富农翻把，建立了模范自卫队(现改称民兵)。如像抚顺煤矿的王志良，现在是工业生产模范，他提高了电镐装车效率，节省了用油，创造了新纪录，建立了模范组。如像李传仁，现在是松江省伏而基河荣军农场的劳动模范，播种收割，都提高了效率，学会与推广使用新农具，获得了“飞刀手”的光荣称号。如像辽东省

荣职校邓昌平，吉林省荣职校辛善根(朝鲜人)这样的学习模范，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学会具体的业务。到会的所有代表以及许许多多没有到会的荣军同志，都创造了光荣的业绩，推动着我们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向前迈进。我们要号召全东北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同志向你们学习!

(二)伟大的祖国，正待我们建设；人民的幸福生活，正待我们创造，而美帝国主义却将侵略战争的火焰引向我祖国边疆，企图重新夺去我们的胜利果食，妄想重新来奴役我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帝的侵略。曾经打败了美帝走狗蒋介石的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同志们，更加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努力生产，努力学习，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农村中的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应该动劳生产，打更多的粮食，积极支援人民志愿部队，积极参加与组织人民武装，鼓励与教育青年参加抗美援朝的斗争，坚决打击农村反革命活动。

工厂中的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应该积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创造新纪录，积极参加防奸、防盗、防火、防空保护工厂。

荣军农场的同志们，应该加倍努力，提高明年的产量，并认真学习驾驶拖拉机，为建设荣誉新村和成为祖国农业建设阵线上的技术干部而奋斗。

荣军职业学校同志们，应该加紧学习，努力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学好业务，提高阶级觉悟，随时准备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

工作在其他岗位上的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应该加紧工作，提高业务能力，增加工作效率。

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同志们!你们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曾洒过你们的鲜血，你们是人民忠实的战士，人民都敬爱你们!但是你们千万不要骄傲自满，尤其不要沾染旧社会的恶习。谁要在人民面前蛮横无理、惹是生非，谁就不是真正的荣誉军人，谁就辜负了人民对于

你的期望。同志们你们是有觉悟的战士，你们曾受过革命军队的锻炼，受过党的教育，你们应该永远保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与高度的纪律性，遵守政府的法令，服从政府的领导，做人民的模范，永远保持与发扬你们的荣誉！

你们的身体虽然残废了，但是不要悲观失望，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游手好闲靠人养活。你们应该保持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要有十分坚强刚毅的意志，只要有头脑可用，有只手可动，就要发挥革命的英雄主义，将你们的智慧和能力，贡献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全体荣军与复员军人们！在你们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敌人底无数坚强的堡垒都曾被我们攻破了，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困难不能克服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作者和无脚飞将军就是榜样，今天到会的同志们就是榜样！同志们！我们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

(三)最后，我希望各级政府和荣军工作者，对荣誉军人与复军人要很好地进行教育与组织，必须热心地安置他们，具体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必须办好荣军农场与荣军职业学校，并做好优待军属，组织军属生产的工作。在这方面，任何敷衍塞责，不确实解决问题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全体荣军与复员军人同志们都会不惜以他们可贵的生命去换取人民的解放事业，难道我们可以忘掉这一切而不去尽一切努力做好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的工作吗？因此，妥善地安置荣誉军人与复员军人，帮助他们参加生产与参加工作，是全体人民尤其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今年经济建设计划讲话

(一九五〇年)

工业系统全年生产总值(其中生产手段总值占百分之七十四)超

过原计划的百分之四点二；农业生产因南涝北旱，只达计划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强；国营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的速度是极值得注意的，而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出了工业设备恢复的速度，尤其说明国营工业的优越性，并表明了我们的生产力可能迅速发展的伟大前途。私人资本的工商业因国营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人民购买力之提高，也得到了发展，如潘阳私人工业家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雇用工人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由于东北经济的发展，不但得以支援了人关南下的大军，而且已经开始改善了人民生活，一九四九年，国营工业就业人数增加了二十四万人，职工实际工资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国家为劳动保险和各种福利措施支出占工资总数百分之九至十一。粮布的交换比价改变了粮贱布贵的状况，物价达到了相对稳定，农民负担也比前年减轻了。国家商店和合作社供给消费者主要必需品同时购人各种粮食和土产，致使内部市场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开始改善。这虽还只是一个开端，但确是初步良好的开端。这些工作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都是有成绩的。

一九五〇年的经济计划。根据这计划，一九五〇年国营工业生产总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其中生产手段的生产将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农业生产要求产量达一千八百万吨，等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此计划之实现将使工业和农业比重发生新的变化，工业的比重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增至百分之四十三左右。财政收支预算平衡，并将以全部多出的百分之五十四作为对恢复与发展经济的投资。商业方面的计划，今年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零售总额将占社会零售流通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较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六，国营零售商店将增加到一千五百处。为扩大供给人民所必需的物资品种，除计计划中预定扩大国营轻工业外，必须鼓励地方国营轻工业及私营轻工业的发展。

一九五〇年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数字后，着重说明了下面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关于计划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是朝着计划方向走，必须使我们的经济计划变为有组织的行动，和广大群众的生产运动结

合起来。促进和加强计划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广合同制。第二、关于企业管理问题。有了责任制就便于我们在企业上有效地组织起来，保证我们计划的实现，并从而不断改进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责任制与管理民主化是互相结合而非互相冲突的。我们的企业责任制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责任制，而管理民主化乃是有责任制的民主，实行管理民主化当前主要的工作是搞好工厂管理委员会，责任制与管理民主化，必须为贯彻经济核算制服务。为经济核算制而斗争，就是为减低成本和节约而斗争，为扩大我们生产力而斗争。第三、关于新纪录运动，新纪录运动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提高生产的运动，它改变了我们厂矿的面貌，教育了干部，也改进了工人自己。今后推广新纪录运动。必须用主要注意力去引导和鼓励工人们与技术人员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改进作业方法，改进技术条件。过去运动中的错误和偏向，主要是重量不重质，运动中的盲目性，今后必须加以改进。第四、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根据目前东北农业经济四种主要形态，他提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对于农民个体经济，必须保护和发挥其积极性。对于劳动互助组织与农村供销合作社，必须用很大注意力去领导与具体帮助，但谁愿参加变工或单干，完全有选择自由，不得强迫；发展劳动互助关键，在于参加变工真正能多打粮食；对于单干的农民，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对于富农经济，是允许其发展，而不是排斥，在目前也不宜采取限制政策。对于国营农场，今后在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农具、运用农业科学上，应多作些工作，以指导与影响群众的生产。

计划订了之后，从可能到现实还要经过艰苦奋斗，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要去克服。于此，各级政府团结一致，和工人阶级、农民、技术人员及一切知识分子紧紧站在一起，在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旗帜下，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努力学习，纠正缺点，为完成一九五〇年的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而奋斗。

讨论中，高崇民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宁武等十数人相继发言，一致赞同高岗主席的报告，又一致表示，决心各从自己岗位上克

服困难，坚决贯彻一九五〇年计划。各委员的发言中同时均简略报告了本部去年的工作及对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高崇民副主席就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问题指出必须将高岗主席的明确意见深入传达给各级政府遵行，并向会议报告了一九四九年司法工作和提出一九五〇年司法部门努力的方向。

宁武委员发言时对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将带给东北人民的新景象表示无限快慰，并指出在工作中要加强警惕，严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残余的阴谋破坏。

接着，朱理治、余光生、顾卓新、杜者衡、王与让、车向忱、陈先舟、刘澜波、于毅夫、罗成德、杨易辰、周持衡、饶斌、朱其文、乔传珏诸委员先后发言，各就本部门和本地方如何保证计划之实现，发表了具体意见。

林枫副主席最后发言。他说：高岗主席的报告在东北发展的历史上以及全国经济建设史上都将发生其作用和影响。他的报告总结了一九四九年的工作，说明东北在具体进行工作中是体现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和政策的。由于正确地贯彻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九四九年工作收到很大成果，也在群众中得到了好的反映，照群众的确话说就是：粮贵、物贱、公粮轻。关于一九五〇年的计划，他说：“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方向下，根据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施政方针，在去年的工作基础上，依据今年的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中国人民要巩固最后的胜利，把人民的国家建立起来，把人民的生活提高起来，必须把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林枫副主席于此兴奋地说道：中国人民想望很久的愿望、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二十余年来奋力斗争的目标，现在已不是遥远的远景了，我们已经有了具体开始的计划了，我们终于开始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具体工作了，过去憧憬的远景，现在已开始变成实际的数目字了。这是重大的任务，但又是如何愉快的任务！接着林副主席指出：一九五〇年的工作计划应该变成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的努力方针。他强调说明要贯彻计

划必须做好三件事：（一）把一九五〇年东北经济建设计划变为东北全体人民的计划，使东北人民在一九五〇年的任务与计划下组织与行动起来，而不要使计划停留在东北人民政府或各省各县政府，首先要动员起人民中的骨干，为实现计划而奋斗。各级政府要使计划和广大的人民见面，和人民的代表见面，同人民和人民代表商量实现计划的具体办法。领导上要注意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开好人民代表会议，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要注意领导与研究典型方法，才能在计划实行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二）要健全干部工作要有计划的培养训练干部，尤其要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区村干部，因为他们是干部的主要泉源。（三）上下之间，各部门之间结成整体。各级政府各部门在接受计划时所谓从实际出发应该是从整体出发，要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结合，要具体化，但不能闹本位主义，最后必须服从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利益。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对于高岗主席的报告，一九五〇年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一九五〇年财政预算、人员编制草案和合作社章程均已作基本通过，交由东北人民政府作最后修正后，呈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查，经批准后即公布实行。

高岗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为会议作总结。他说：会议开得很好，委员们都发表了宝贵意见，特别在发言中，大家都指出了毛病和困难并表示了完成计划的信心。大家重视困难但并不在困难面前低头，而且都看得清楚：我们的困难是胜利地开始经济建设的困难，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接着，他指出克服困难要依靠群众，使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发挥出智慧，贡献出力量，来创造更为美好的生活，这也是政权的根本问题。依靠人民群众克服困难的思想，必须在一切干部中牢固地树立起来。要教育一切干部：过去我们依靠人民赢得了战争胜利，今天，我们要依靠东北人民赢得经济建设的成绩。这是完成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关键。克服困难的另一方面是要端正局部与全体的关系。局部服从全体，地方服从国家这个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去组织者划要经过斗争的。

最后，他着重指出，一切机关，部门、企业在执行工作完成计划中要注意：(一)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既要从群众今天与明天的利益出发，又要根据广大人民今天的觉悟与明天的觉悟，不要脱离群众，但又不能迁就群众中的落后思想，而固定步不前。(二)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我们要对谁负责？上级是谁？高主席说：“我们的上级归根到底是工人、农民、劳动者和一切人民。”他说明，这与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没有丝毫矛盾，因为中央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办事的。于此，高主席恳切告诫工作人员，要在工作中经常对人民负责，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人民利益。必须十分坚定，十分艰苦，十分认真地把工作作好才不负人民委托；对人民不可只报喜不报忧，发现毛病和缺点便要检讨和改正。

他于结语中说：“计划不等于现实，把计划变成物质的现实是艰巨的工作，我们对人民负责，人民是有权利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把计划变为现实就要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投入实现计划的行动，就要在实行过程中严格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想：只要我们大家面向生产，虚心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团结全东北人民动手、动脚、动脑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发挥出伟大力量，胜利完成我们东北人民的建设计划。

巩固国防发展经济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各位政府委员、各位出席会议的同志们：

兹提出东北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工作基本总结与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

东北人民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斗争中，光荣地完成了一九五。年的经济建设计划。经过这一年的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国防力量也更加巩固了。

一九五。年东北区国营工业及农作物的生产总值，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一。七，其中工业提高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三，农业提高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九五。年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十。就工业部系统而言，超过了计划的百分之十一点六，全部三十四种主要产品中，有二十七种超过了原定计划(如生铁、发电、原煤、电机、水泥、纱布、纸张、橡胶制品等)，未完成计划的有七种(其中有平炉钢锭和工作母机)。工业部的开工厂矿到一九五。年底比一九四九年底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〇职工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二。

农业生产也超过了计划。全区总产量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六。每垧产量平均超过计划一百四十九斤。棉花播种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四，种麻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六。

铁路运输超过了全年装车计划的百分之九点二。

由于国营企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贯彻，私营工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以沈阳市为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该市共有私营工业一万二千零七家，从业人员五万零四百十三人，到一九五。年十一月，户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二，人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四。

以上是一九五。年东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概貌。这个概貌说明着我们的工业水平比一九四九年又提高了一步。在工业生产方面，尤其着重了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一九五。年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中生产资料占百分之七十七，生活资料占百分之二十三〇很显然的，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为了扩大我们工业的基础，必须采取首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放松了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供应，在这一年中，只就工业部所属工厂的纱布纸张等产量来看：与一九四九年比较，棉纱等于百分之二百五十点四，棉布等于百分之二百四十六点五，纸张等于百分之二百二十点五。同时国家商店供给人民必需品，超过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其中经过合作社推销者，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六。仅就纱布一项来说，一九四九年供给人民四百万捆，一九五〇年即供给了九百零二万捆，一年之内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在收购方面：采购农民余粮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三点五，采购农村土产品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三十一。区外推销相当于一九四九年五倍半。为了便利商品流通，国营商店扩大到一千七百二十一个，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六百六十一个，合作社则扩大到一万零三百三十五个，社员发展到一千零七十万人(第三季度数)。

经济发展的结果，大大地开辟了财源，从而保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保证了国防费用与经济建设的投资。一九五〇年的实际收入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支出则实现了合理的紧缩与节约。

经济的发展，不仅保障了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一九五〇年工业部各厂矿不仅增加了就业人员，而且增加了工资，增加了职工住宅及其他福利事业。就重工业部门说，每人平均工资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的一百四十分，上升为一百五十七分，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二点五。整个工业部系统并为职工修建了一百五十六万余平方米的宿舍(包括俱乐部及医院等)，并适当地改善了劳动条件。农民生活的改善，尤为显著，一九五〇年农民的购买力，约较上一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如单从纱布说，一九四九年平均每十个人买一疋布，一九五〇年则平均每四个半人就买一疋布了。但粮布交换的比价，与一九四九年末情况大体相同。特价基本平稳(物价总指数一九五〇年底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十三点七，但上涨的主要是油料、五金、黄金等，与群众生活关系不大。这些工业原料物资的供应，我们已在设法解决。)因之，许多农民添车买马，

修房盖屋，添衣换被，猪肥马壮，鸡鸭成群，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经济建设的成果，又给文化建设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一九五〇年文化事业费的开支，占东北全区全年支出的百分之七点五。全东北的小学生发展到四百五十七万六千一百一十一人，中学生发展到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人(上半年统计)，大学生发展到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在教学质量上也有所提高。新发展工农速成中学七处，学生二千五百五十人。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三处，学生三千三百一十一人。受补习教育的职工约有三十六万人，农民常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约一百八十万人，一九五〇年参加冬学的农民则达四百五十万人。另外，农民还自己兴办了村学二千六百七十三所，学生二十万六千余人。报纸、出版、广播、文艺、电影及其他群众文化事业方面，在密切结合当前中心任务下，均有新的发展和新的成就。文化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培养了经济建设人才(现在工业大学及高级职业学校共有学生一万二千一百二十六人)，同时也为加强国防培养了后补力量(仅去年下半年即有两万三千余学生参加军事学校及国防建设等工作)。

在卫生事业方面，一九五〇年已有二百七十三个县属卫生院或医院，九百廿三个区卫生所，二百四十一个妇婴保健站和三百三十一个农村接生站，改造旧产婆一万九千三百二十八人，工矿中还有二百六十五个卫生所、四十一个救急所和二十二个医院。对改进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人民群众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伟大胜利和英勇行为，大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政治积极性。他们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行动，热烈地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这种爱国主义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溶合在一起的运动，在东北全境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

当着东北人民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时，美蒋及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破坏。针对此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针，

对坚决反革命的分子给以严厉的镇压，但对某些罪恶较轻，并愿意改过自新的分子，则从宽处理，结果使社会安定、匪盗敛迹，人民高兴，生产积极。

同志们!一九五。年东北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这主要是由于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各级干部的积极工作，苏联专家的帮助，特别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英明领导的结果。同时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工业建设主要是处于恢复过程中，而农业又是丰收，这些则是客观的有利条件。

同志们!我们是向前看的人，我们不仅要总结那些已经做了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与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并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我们的国防力量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与强大；我们工业中的制造业还落后，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办好工厂与如何采取企业化的方法进行基本建设；我们的农业还没有很好地同市场配合起来，而且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村的换工互助，供销合作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商业还落后于生产的发展，还需要大大地开发内地市场，活跃物资流通；我们的运输业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的财政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中求得改进；我们的计划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种经济的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方面。劳动人民的生活，虽有一些改善，但还很不够。这些，我们必须有计划进一步加以解决，我相信是一定可以解决的。

以上就是。一九五。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基本总结。

(二)

当我们在进入一九五一年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对我伟大祖国的侵略还在继续进行，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

大行动正在胜利发展中。因此，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一九五一年的任务，就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因为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的目的。

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将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根据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更加壮大我们的国防军，训练新的技术兵种，加强我们的空防与海防，有计划地训练公安武装和民兵，改进我们的后勤、军工、卫生的建设，以适合于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并加强对伤病员和荣誉军人的政治工作，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以巩固部队。

其次，在工业生产和建设方面，根据国防与经济建设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积极地有步骤地发展制造业。今年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主要的将用于建立若干个分散的工业基点，主要的将用于建立若干个分散的工业基点的初步工程。今年工业部系统的生产总值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八，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值将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一，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将随着人民经济生活的上升而适当的提高，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一九五一年要求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达到如下的数量(略)。

再次，在农业生产方面，今年每垧地要提高产量百分之六到七，粮食的总产量将要求达到一千九百万吨。为了适应工业需要，今年要扩大特种作物种植面积：棉花扩大到四十二万垧，产皮棉九万吨，各种麻扩大到九万六千垧，产麻六万五千吨。

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西满造林防护地带的种植工作，并计划地采伐木材三百万立方米。对于辽河水系的治本工程，要在今年开始勘测工作和准备计划。

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在发展城乡交流的中心任务下，今年区内贸易

卖钱额，国家商业要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八，合作社要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交通特别是铁路部门,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完成国家所提出的运输计划。根据国防与经济的需要有计划的整修公路，提高电讯工作。

一九五一年的财政，主要是从发展经济中加强与改进城市的税收，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扩大国营企业的利润，以及公平合理地征收公粮，以保障国防费用与经济建设的投资以及文教卫生等建设事业的经费，并保障物价的平稳。

根据上述计划，一九五一年东北国营工业与农作物生产的总值，将比一九五〇年提高百分之一十三点八。

以上就是我们一九五一年在巩固国防的总目标下，加强国防经济建设的梗概。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一方面要民政、公安、文教、卫生、司法、劳动等各个部门围绕建设强大国防力量与建设强大经济力量的总目标，来制定自己的计划，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善于根据去年的经验，进一步教育和动员全体干部和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实现一九五一年的计划而奋斗。

(三)

从一九五〇年的工作中，我们得到哪些基本经验呢？在完成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时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这就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充分认识了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那种离开国防需要“埋头建设”的愿望，事实证明是一种完全不合实际的空想。因之，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在一切工作中保持

清醒的头脑，以忘我的勤劳和勇敢，充分发展国防与经济力量，完成全国解放，并随时准备粉碎美帝侵略者及其走狗对我祖国的任何挑战，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必须了解我们的国防力量愈强大，我们的经验建设的成果，我们所致力争取和平事业，才愈有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同时我们的一切建设事业与工业基点的建设，必须从国防需要出发；我们的生产成果必须优先的分配给我们的国防军与国防建设的需要；一切为了加强国防的动员工作，必须与发展生产密切配合起来。

第二，一九五〇年工作的经验证明了发展生产乃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如前所述，由于我们全力发展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结果就使城乡人民的购买力大大地发展了、商品流通量扩大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财政税收增加了、文化教育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更加巩固了、国防力量日益充实与强大了。在人民的政权下面，只要生产发展了，一切工作就好办了。因之，进一步发展东北的工农业生产，以便更加壮大我们的国防力量，更是一九五一年东北全体人民与东北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

为了做好工业生产，除根据国防需要和现有设备能力，合理地组织军工、军需与民用的生产外，当前主要问题是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1)改进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学习与掌握新的技术，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如新式采煤法与高速度切削法等)；(2)改进财务与成本管理，加速资金回转，减低生产品的成本；(3)在实行八级工资制的基础上，凡条件具备的单位，有步骤地推行计件工资，在暂时不能实行的单位，则推行计时奖励制。以上三项工作，都要定出制度，以便有系统地加以贯彻。这三项工作又是相互联系的，各个厂矿可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当前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其他。解决这些问题，也就给组织职工劳动竞赛创造更好的物资基础。其次，在基本建设方面，应将投资集中使用于能很快转入扩大再生产与增加国家新能源的方面去。一切基本建设的部门必须彻底实行经济核算制，工程公司与工程队同其他生产单位一样，均应实行企

业化的方针。再次，地方工业，在国家统一的计划要求下，除完成一定的军需任务外，主要应面向农村，解决农民扩大再生产与活动的需要，克服单纯的财政观点。最后，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必须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很好地组织与领导已经广泛开展起来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使之成为工人阶级为完成与超过生产计划经营的自觉的活动，成为工人阶级参加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农业方面：一年来农业生产有迅速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中农已成为农村的多数，北部老区约占农户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南部新区亦占百分之五左右。多数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少部农民虽还不及中农的生活，但亦有某些上升。下降的仅是懒惰或病的极少数农户。此外农业人口向城市工矿、手工业、商业、运输业转移的现象亦已开始；土地的占有与使用，群众亦在便利耕作的条件下，以经济方式，开始自动调整，这些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我们在农村经济上的基本政策，除继续贯彻去年三月东北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所决定的方针外，应积极发展劳动互助，供销合作，发展商品经济，组织农民扩大再生产，改进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使目前还赶不上中农生活的农民迅速上升为中农，已成为中农的更加富裕起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应积极发展商品粮食与工业原料的生产，除种植一定数量的民食军需与有把握推销的粮食外，北部应多种大豆及其他商品作物，南满应多种棉花、洋蔗其他工业原料，西满则应扩大畜牧业，以发挥各地生产的特点，保证产品的销路，增加农民的收入与刺激工业的发展。为奖励商品粮食与工业原料的发展，应正确地规定收购价格与公粮征收的折合比率。土地等级在正确评定并经上级政府审定之后，不要变动，以奖励农民改良土质、改良技术、种植特种作物的积极性。

其次：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来充实“组织起来”的内容。过去我们采取换工的方式，解决了广大农民缺乏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

资料的困难，发展了农业生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仅仅这样已经不够了，应该通过劳动互助，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副业，有条件地实行分工分业，以便合理使用劳动力，从各个方面创造财富，加速农村经济的上升。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地区特点，季节不同，以及群众觉悟与领导力量，有步骤地解决以下问题：(1)扩大劳动互助的范围，把副业、手工业、运输业等内容加进去；(2)组织资金，解决农民生产资料的困难(如车马、农具、房木料等)与组织人力，解决改良技术的困难(如兴修水利、治水、修防护林带等)；(3)由于技术量增加，劳动互助范围扩大，因而需要更广泛地组织各种男女劳动力到互助组中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把劳动互助组的工作与供销合作社的工作更好地配合起来，特别是在信贷合作方面(关于供销合作社问题，我在讲到分配问题说不再说了)，在实行劳动互助时除了目前一般小组采用的评工记分办法外，可根据群众的习惯，采用实物或货币工资制，以适应分工分业的需要。

私劳企业方面：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特别是农民生产资料需要的扩大，因之对私营的生产，应该在加工政策与统一的计划与组织方面给予更好的领导，以减少盲目与畸形发展。

第三，一九五。年的经验还证明了，与发展生产同时必须解决分配问题，否则，整个经济就不能顺利前进，我们的分配工作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首先是国家商业。主要是活跃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除做好对外出口外，主要地应以大力研究与开展内地市场，扩大与加速商品流转，以推进生产的发展。这里，第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了解各方面生产与消费的需要，具体研究商品的种类、来源与推销办法，通过国家商业将各种经济力量结合起来，使国家商业真正发挥在经济交流上的纽带作用，国家商业那种只顾自己的片面观点，是不对的；第二，正确地制定与掌握价格政策。稳定物价，以便利发展商品的流通与推动工农业生产之发展；第三：在国家贸易部门中严格贯彻经济核算制，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反对贸易企业中的供给制思想与做法。

其次是合作社。必须贯彻基层社为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方针。东北农村中大量存在着的供销合作社，必须为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与供销需要服务，除继续努力解决社员群众的生活资料的要求外，应将下列任务，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并有计划地逐步地加以解决。即(1)供给社员生产资料；(2)推销社员土产；(3)发展农村的信贷合作事业，以适应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同时应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营，使合作社能够更及时地供应社员以更多更好的廉价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再次是私人商业。根据商品流转的需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积极引导私商参加城乡贸易，帮助它们解决困难，克服城乡交流中的某些人为障碍，但对某些私商违法的投机捣把活动，则应给予取缔。

为了搞好生产及分配工作，还需加强与改进我们的运输工作，严格执行运输计划。除继续提高铁路的周转率，扩大装卸车的数量，发挥铁路运输的潜力之外，还需要组织公路运输及内河航运，以发展运输事业。

第四，为使生产、分配、财政收支以及国防建设的工作能够密切配合，并遵循着一个总的目标前进，必须加强计划性。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的经济计划是整个的国民经济计划，因之它必须具有全面观点。当然计划的主体是国营经济，但如果对于合作社经济，农民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情况不加研究与掌握，不能在我们的整个计划之中，扼要地规划出它们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则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就会产生某些可能避免的盲目混乱现象。其次，我们的经济计划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即从发展生产、发展市场中求得计划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那种停留现状，消极平衡的观点是不对的。同时我们的经济计划中，生产计划常常易犯保守性，但基本建设的计划，则易发生某些冒险倾向。对于我们管理生产与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不足，而情况又常发生变化，因之现时制定较长期而不变更的计划是比较困难。较长期的及年度的计划是需要的，它给我们规定指标，指出

一个总的奋斗方向。此外，对于月计划，季度计划，则应很好的规划与掌握。计划既定之后，就要定期认真检查，总结经验，并根据计划，与有关部门订立执行合同。我们有些部门在执行合同时，不够严肃负责，因而影响到整个计划的实现，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今年计划的重点在于编制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物资供应与储备，商品流转，交通运输及现金收支等五种计划，中心关键是从发展观点中来解决物资平衡，现金平衡，运输配合等问题，以便使整个经济更加活跃与发展。

最后，为了胜利完成我们所肩负着的繁重而复杂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老干部与大量培养新干部，特别是培养具有科学知识与管理能力的经济建设干部。为此，我们应有计划地发展和提高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普通大学、中学及小学，加强工农文化教育，以培养国防及经济建设的后备力量。同时应认真地在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组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及进行政策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继续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培养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和向人民群众随时进行宣传的作风，防止任何骄傲自满麻痹急躁情绪的滋长。我们还需要更加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除继续提高工人农民的政治觉悟与尽可能地改善其生活条件，增进其健康水平外，并应亲密团结一切反美爱国的人士，开好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要时刻警惕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我们坚决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东北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任务。

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一九五〇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发言中对完成任务有高度的信心。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将由办公厅收集分交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里我想解答几个具体问题，并着重讲一下我们的工作作风问题。

一、解答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少数民族问题

凡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区域，就实行区域自治。如一个区少数民族占多数，就实行区的自治，仍归县人民政府领导；如果一个县少数民族占多数，就实行县的自治，仍归省人民政府领导；如果一个专区少数民族占多数，就实行专区自治，也仍归省人民政府领导。

关于培养民族干部问题，民政部、吉林省、松江省、辽东省、辽西省、热河省都要注意。今天朝鲜民族干部缺少是事实。朝鲜在打仗，东北的朝鲜民族干部志愿赴朝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正义的行动，因而必须更加注意培养朝鲜民族干部。中国人民有责任帮助朝鲜解放。东北与全国已经胜利地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任何民族的利益应当与国际主义的利益一致起来，不能片面地从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

负担问题，各个民族都应该一样公平。

(二)不要提“中农化”口号

同志们在发言中提到“农村中农化”，一、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在土地改革前东北农村的雇农贫农，有的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六

十，有的则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现在农村里中农占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中农多一点不好吗？中农增加一点，农民生活好一点，这是好的。但不要提“中农化”的口号。到了中农生活水平，可不可以再提高？中农化就达到了革命目的吗？不是的，还有集体化哩！中农增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是农村经济上升的一种表现，但不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的。因为中农化并不能免除农村阶级的分化，使农民最终地摆脱贫困。农民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条件具备时，经过农业经济的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之，农民要摆脱他的贫困，要充分提高他的生活，是集体化而不是中农化，这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所以，必须遵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即：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关于问题的解答，就说这一些。

二、关于作风问题

有了正确一致的方针和共同的任務，这仅是事情的开始，还不是执行任务的结果。任务能否很好实现，要看我们努力如何。同志们都要是勤劳奉公很辛苦紧张地工作着。但是，我们有不少同志往往对于怎样做好工作不很自觉。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做好工作要有自觉，要考虑是否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愿望一致。毛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联系群众，要实事求是，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只有贯彻了这样的正确作风，才能很好地完我们的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一定脱离群众，任何工作都做不好。

那么，看看我们政府(包括东北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作风是什么样呢？大家检讨一下，们有那些类型的人和事值得表扬？那些做得好？那些做得不好？我哪些需要批判？哪些值得我们警惕？

我看大体上有四类：

第一类：

相当一部分同志，在工作中认真研究情况，钻研问题，能抓住工作关键，注意学习，注意总结经验，注意对于部的思想领导和政策业务领导。凡是这样做的，那一部门就工作情绪饱满，任务也就完成得很好。各部门各省市、各种工作岗位，要发现这种人物，这种经验，这种事业的成就，加以表扬，介绍和推广，把这些人的经验系统化，巩固起来，鼓励他们积极前进。报纸、广播、戏剧、文学、美术各方面，都要找这样具体、生动的例子，不论是军事的、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合作事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例子，都要好好进行宣传。其目的在使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成绩，这样的经验，增多起来，以便各种工作岗位都出现这些积极的典型，增加积极因素，把工作提高起来。

这种人，目前虽还不很多，但是在政府工作上则是很得力的，因为他们最能联系群众，发现问题，搞出成绩来，所以应该奖励这些人。

第二类：

有相当的一部分干部，事情很忙，但处理事情的把握不大，经常处于应付和被动状态。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还可应付，也有若干成绩，任务“照例完成”，但是质量不高。他们不精心研究上级指示的目的和意图，不精心研究当地的情况，而是上边交来的工作就照办，因此，形式主义和革命主义就不少。不研究上级的指示决定，就不能稳当地掌握政策；不研究下面的情况，就不能发现新鲜事物。革命工作是不前进的，新问题不断产生，一切工作方法就不能拘泥于过去一套。这些同志如果不精心研究上级的指示与不深入地了解当地情况，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发现新鲜事物，因而就不能有预见，工作一定

陷于忙乱被动。

正因为不精心研究上级决定和下面情况，对问题就搞不清楚，往往随风倒，这个人讲的对，那个人讲的也对，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没有定见，摸不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处理问题没有决心，没有魄力，摇摆不定，抓不到工作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工作就很难有生龙活虎的气概，工作的情绪也很难牢固。很多工作顺着他，就苦得很，就难以深入下去，也就容易出乱子。对这些同志，我们要进行教育，用检查工作，总结工作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各省市的宣传教育的领导机关，应当特别注意帮助这些同志。

有些同志说：上面发的文件很多，下面看不了。这是值得注意的，以后发文件要简单扼要，要及时。开会也一样，要真正使到会同志都明了，不要把问题搞一大堆，而是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开会如果一讲一大堆，使干部不知道先做哪件，后做哪件，这样对干部的教育作用就很差。开会应该只找确实有关的人参加，最怕开“陪绑”会议。比如，开发行会议，把炼钢的、化学的、电气的都找来，问题和他无关，结果耽误了他的时间，就行成“陪绑”会议。开会一定要有充分准备，要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要能告诉干部如何做工作，先做那一件，后做那一件。要很具体，不能抽象。毛主席在其天才的著作“实践论”一文中教导我们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他又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之，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实际，并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把工作的主要，次要摆好，以便一件一件地钻研，一年三百六十天，钻研三百六十件不可能，那就钻研十二件也好。一年钻研十二件，十年就能钻研很多，这就变成内行了。在运动中摸得的经验，把它写出来，加以修理化，系统化，提高一步，那就有了自觉性，克服了盲

目性。领导上要帮助他们总结工作，总结新的东西，指出新的发展方向，而把不正确的东西抛掉。

这类干部占了很大的数量，把这些人提高了，工作效率就会普遍地提高起来。

第三类：自满骄傲情绪在一部分同志中是存在的。这些同志往往在局部的、一时的在一地的工作中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他把成绩夸大了，因此只看到成绩，而不精心研究自己的工作是否还有缺点。本来他的成绩是七分，如果再把缺点纠正就加大二分，可达到九分，可是骄傲自满妨害了他的提高。这种人觉得自己搞得不错满足于已得的成绩，对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对新鲜事物，就不去注意和钻研，甚至认为老百姓不懂得什么，他不知道一切事业都是人民创造的。对上级的指示，认为“不了解我的情况”觉得还不是那一套，没有什么新东西，而不去认真研究。这种对待群众和对待上级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懂得：离开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东北人民，我们这些人能做什么？一切事业都要是人民创造的，无论铁路、工业、农业、商业，成绩都应归功于人民。但犯有这种错误的人往往只觉得自己高明，眼目中没有人民和上级的领导。还有，这些人对同级同志的不同意见，不考虑也不研究，不懂得同志们提出不同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也好，都能从各方面帮助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使自己进一步发现问题的本质。毛主席经常说对不同意见要展开讨论，反复研究。然后再作出正确的决定。在原则上不随风倒，经常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乃是对人民、对政府的负责态度。骄傲的人，往往把事业看成是个人的功劳，对上级、对群众，对同志的关系不正常，看不起上级，群众和同志。他不自觉，本来有病，却不医治，结果病倒了，又要吃药，又要打针，那就很难过。与其那时候难过，就不如早点预防，及时医治。

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责任就是为人民服务，得到成绩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应当懂得：我们作的工作还很少。假如我们各个部门的所有干部，都把自己的工作检查一下，改正了缺点，会把今天的成绩

更提高一些。工作天天在发展，在变化，有许多新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如果骄傲，就不能前进，这对本身、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发现有人骄傲，就要进行教育，进行批判。我们常讲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但是遇到实际问题就不大会用，受到批评很不舒服，觉得还不是“整”我！我们要告诉这些同志，进行批评，是为了把错误思想方法去掉，换上好的东西，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四类：有极少数工作人员，作风极端恶劣，是人民政权所绝不允许的。这种人，损人利己，脱离群众，是官僚分子和贪污腐化的蜕化分子。他们为数虽极少，但对人民和人民的政权为害很大。他们自私自利，天天给自己打主意，而不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打主意。

这里所说的官僚分子，不是指一般的文质主义，事务主义者，而是指那种成天发号施令，摆架子，抖威风，不办什么好事情的人。我们有些人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新的习惯不熟悉，往往以旧习惯办事，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作风，甚至被其所腐蚀、溶化。这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些人，要告诉他们去掉这些肮脏东西；要号召干部坚决和这种现象作斗争，肃清这些坏现象。这就要依靠教育，依靠法令，依靠群众，依靠检查工作。检查不是泛泛地进行，而要深入地认真地进行，从重要的部门，从具体的工作业务中去检查，要发扬民主，发现我们工作上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和毛病，切实加以解决。

我们有了大政方针，有了实施计划，我们干部又具备高度信心，再加上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作风，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因此，要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想一切方法，把第一类人加多，把第二类人提高，把第三类人的毛病去掉，把第四类人的肮脏东西扫除。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实现我们所担负的光荣任务。

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全体政府委员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一九五一年，一定能把积极因素增加，把消极因素去掉，胜利地完成我们各项工作任务。

在沈阳市“三八”节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

今天举行这样盛大的集会，是为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大家都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妇女，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

东北妇女和全体劳动人民一道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支援了解放战争，参加了国家的各种建设工作。大批妇女参加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贸易、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和保育保健等工作，参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妇女群众更高度发挥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各方面均出现了许多先进的妇女，我们热烈地向一切爱国妇女致敬，向一切先进妇女致敬！

在中国人民革命获得伟大胜利之后，广大妇女群众的潜在力量，正在猛烈地发挥起来。她们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表现了她们力量是无穷的。她们的政治积极性与劳动积极性的发扬，她们的智慧与创造才能的发挥，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大大推动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已成为国家的主人，祖国的积极建设者，成为保卫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深怀仇恨，它蓄意反对和破坏和平，它不仅发动侵朝战争，而且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正在武装日本，扩大向亚洲各民族的侵略战争，妄图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请问：我们哪一个中国人还愿意再当亡国奴？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再回到妇女受严重压迫的旧时代去？

因之，今年纪念“三八”节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体妇女和东北

人民及全国人民一道,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坚决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全体妇女,应该积极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巩固我伟大祖国的国防,发展我伟大祖国的经济,把妇女解放事业,更加推向前进!

全体女工们!要勇跃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为完成与超过国家生产计划而斗争!为精通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质量,降低成本,盛行节约而斗争!

农村妇女们!要努力参加到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中去,积极参加劳动互助,改进农业技术,为争取农牧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发展牲畜与增加副业产品而斗争!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卫生而斗争!

女学生们!要提高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

贸易机关的女工作人员们!力求精通经商务,为发展人民的贸易工作,推进生产而努力!

文化教育方面的女工作人员们!积极发挥你们的才能,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后备人才,把科学应用到经济建设中去,进一步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

保育和保健事业方面的女工作人员们!为爱护我们祖国新的一代而努力,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而努力!

机关、团体的女干部们!努力精通业务,学习理论政策,做好工作。

主妇们、母亲们,勤俭治家,教育子女,热爱祖国。

各阶层、各民族、各界的妇女,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积极参加祖国建设。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亲密国家,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

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向东北全体工人的广播讲话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

工人同志们:

我们庆祝五一劳动节,庆祝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庆祝中国人民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庆祝我们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成就。这是中国人民的功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功劳,是毛主席的功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劳,是工人阶级中的劳动模范、工作模范与先进生产者的功劳。

让我在这里向你们祝贺!

在我们的工业、交通及其他企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先进生产者与模范工作者,他们之中,有工人、有工程技术人员、有职员。他们是完全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劳动和工作,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使技术改进,劳动组织更加合理,并且有一些科学的创造发明。这些建议,技术改进和创造发明,对提高产量、改进质量、节省原料、减少废品、改进安全等等都起了推动工业前进的重要作用。广大工人阶级智慧的发挥,成为我们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有力因素。因之,每一个先进生产者和模范工作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工人阶级中这样的人物,在伪满时代,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不会出现的;即使他们有了某些创造,也不会被重视的。我们希望全体工人同志们,工程技术人员们,职员们,都向先进生产者和模范工作者学习,认真地研究技术,改进技术,提出更多的建议,努力创造发明,出现更多的先进人物。

我们的企业中,有大批新工人,他们还不很懂技术或者还不很熟练,而老工人中间也有不少还不精通技术。技术水平不高是我们企业中的一般现象,这种状况是阻碍工业前进的,我们一定要想一切办法迅速

予以改变。工厂、矿山、交通、企业及其管理部门都应该办好技术学校、技术训练班、夜校，应该提倡技术工人带徒弟。每一个工人、技术人员都应该积极学习技术，只有技术提高了，生产才能增加，工人的生活也才能更加改善。为了学习技术，为了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和学习管理企业的本领，同时必须认真地学习文化。

工人同志们必须学习政治，提高阶级觉悟，热爱祖国，时时刻刻警惕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工厂、矿山、铁路和一切仓库。每个人应该清楚，我们的生活幸福是和生产提高分不开的，也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巩固分不开的。

我们企业的领导同志们!希望你们依靠工人，努力学习技术和经济业务，办好工厂，为完成与超过国家的生产计划而奋斗。

一切企业部门都必须十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希望一切产品的质量都是优良的，不要有一件质量低劣的产品。

许多工厂、车间、小组在完成与超过了他们的生产计划之后，写信给我，这些信我都收到了，我在这里深深地感谢这些单位的工人、技术人员、职员同志们!

预祝大家在经济建设事业中新的成功和新的幸福!

在沈阳人民庆祝“五一”节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

工人们、各界同胞们、同志们!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热烈庆祝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祝贺我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成就，祝贺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祝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保卫和平力量的无比强大。

我们是从来热爱和平的，我们正在解放了的国土上建设人民的新生活。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却在西欧、日本、东南亚、朝鲜、台湾加紧准备和扩大进攻人民的侵略战争。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进行对日单独讲和；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美国侵略朝鲜；美国侵略台湾；美国派遣军事使者到台湾帮助蒋匪残余；美国训练与指使特务间谍进行破坏活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企图劫掠我国，重将我国变为殖民地吗？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每一个中国人现在都更加清楚认识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死敌。同时也认识了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是一定会被彻底打败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朝鲜人民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定要失败，我们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胜利！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祖国，保卫和平，我们必须广泛地、深入地将抗美援朝的运动推向前进，在广大人民中进行深入的抗美援朝的教育，同时必须用大的努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工人们！两年多来东北的工业与交通及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均有了良好的成就。几十万新的工人和几十万新的技术人员参加了工业建设的队伍。主要部门的劳动生产量已经超过了东北以往任何时期的记录。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增强了巩固国家的力量，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改进了劳动条件与福利事业。这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在祖国企业中劳动创造的果实。但是工业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障碍，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科学水准不高、技术能力不足。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战胜这个缺点，工业生产将会停顿于现状，劳动生产率不能继续提高，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继续改善。因此，工人们！工程技术人员们！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改善生产方法，改善劳动组织，向马恒昌式的先进生产者看齐。

同时我们一点也不能疏忽，除了帝国主义公开的侵略之外，还有

敌人派遣来的特务破坏分子，随时随刻都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建设，如果不消灭这些危害分子，我们千万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会在顷刻之间被毁灭。因此，全体工人阶级要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警惕，肃清隐藏的特务匪徒，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党和工会、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们!你们的一致任务是为着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你们在一致的立场上分工合作，团结一致，共同为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为改善经济管理，改善保安制度，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为逐步改善工人生活而奋斗，创造出更多的模范厂矿。

农民们!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美好起来了，农村的面貌正迅速地由破旧转向崭新，这是农民得到了土地后，在民主政权下，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大家想一想，什么一贯道，九言道，后天道之类，除了取财物，添加灾祸之外，会给了我们什么呢?农民们!再不要听信他们的鬼话。封建统治给农村还留下的贫困、愚昧与落后，要说靠我们自己的劳动来消灭。只有积极生产，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巩固我们的祖国。农民们!组织起来是由穷苦变富裕之路，经过互助合作，把庄稼耕作得更细致，逐步提高农业技术，发展创业，战胜水、旱、虫各种天然灾害，争取丰收。农民们!要学习政治、识字、讲究卫生，逐步建立起富足的、有文化的进步的农村。同时还要提高警惕：农村中公开的封建统治虽被打败，但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完全消灭，一部分被打倒的地主还想复辟，封建会门、坏分子，时时企图进行破坏，我们要坚决肃清这些破坏分子。

东北地区部队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们!你们神圣的责任就是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害，因此就要用百倍的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威力。各兵种的指战员们!加紧学习军事科学，精通战术，掌握技术，要十分熟练地使用手中的武器。政治工作人员们!深入到连队去，到军事学校去，到后勤单位去，为建立有坚强意志和高度技术的，热爱祖国的无敌的武装部队而奋斗。

文化教育工作者们!我们十分需要科学人才、知识分子。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要教育我们的青年,积极培养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人才。加强科学研究,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

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增强祖国的力量,为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斗而奋斗。为保卫和平与反对侵略的胜利而奋斗!

向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员致敬!

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员致敬!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向朝鲜人民军致敬!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万岁!

中苏伟大民族的永久友好团结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

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

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大家知道，我们党经过了三十年光荣伟大、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正在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

大家也知道，几年来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经济建设工作是有成绩的，各个岗位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毛主席的光荣，党的光荣，无数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同志们的光荣！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等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肩负的责任是愈加重大了。

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任务是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就是说要建立强大国防军与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将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巩固起来，使其免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的国家；也只有如此，才能将我国的社会制度稳步地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奋斗的目标。

但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的机关、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而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没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堕入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的队伍，妨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

这些贪污分子中，严重者已深堕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盗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蜕化分子，为了掩盖其卑劣行为，争取“同情者”，正在制造各种借口。如说：“由乡村转入城市，为适应新的环境要讲究一些”；“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应酬”；“机关家务是我搞生产弄来的，个人用一点不算什么”；而如果批评他们，他们又会说别人是“农村观点”，“注意生活小节”等等。他们害怕民主，他们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理由”来压制与打击群众对他们盗窃行为的批评与揭发，广大的党员与干部当然不会承认这种“理由”，但也确有少数幼稚的同志为他们这种“理由”所俘虏，而不能对之进行必要的斗争。

某些党员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地主、买办、封建官僚与其他非工人阶级的庸俗文化的观点和作风。他们对革命胜利的看法，不是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而认为是革命的“尽头”。因而骄傲麻痹，在政治上丧失警惕，敌我不分。极端无原则地任用私人，以致把反革命分子也拉进革命机关中来，并包庇这些人。如我们东北人民政府有一个部长，不经组织批准，先后录用了十六名亲戚、朋友为干部，其中有叛党分子四名，反动党团及有严重政治嫌疑的分子三名，被关的逃亡地主两名，原在他处工作的因品质不好被洗刷者三名，而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形事先是完全知道的。又如还有一个在政府里担任副局长的干部，也私自介绍了六名亲友到他工作的局里工作，其中有四名已查明是有政治问题的；如他的弟弟是有重大血债的“清剿”队长，但他却委为该局供应科员，并拟提为科长。又如沈阳市人民政府的一个局长，把犯人改造队介绍来的一个原蒋匪炮兵营营长张汉杰分配为工程队长，张在工程队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枪决，他尚表示留恋地说：“张的工作真积极”；他同时还包庇与伪中统特务有密切关系、表现很坏的王某，硬说他“不是政治问题，是思想落后”。

这种观点还表现在某些党员干部中所产生的忽视政治的倾向。他们不愿过党的生活，不重视理论学习，说：“开党的会议是闲事，

哪有时间搞这些闲玩艺?”甚至拒绝做党的工作，被分配担任党的支部工作时认为是“欺负老实人”，借口学习技术，忽视或反对理论学习，说“不学习政治可以工作，不学技术不能吃饭”。正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讨厌政治和憎恶党的组织生活，因而他们的许多错误思想也就难以纠正而愈加发展了。

同志们!你们看这些人的共产主义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请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可以允许的吗?

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

它的性质如何呢?它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的党内来了。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它是腐蚀党的毒素，是党与人民的敌人喜欢的东西，如果不能及时给以克服，而任其发展，将会腐蚀党的战斗力，并使党的事业无法前进一步。因之必须组织全党同这种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彻底克服它。

为什么这种严重现象能够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存在呢?这里除了一些不纯分子混入了党的组织，同时在人民政府的各部门中留用了不少思想上未经彻底改造的人员而外，还由于极少数较老的党员思想情绪发生了变化(如居功自傲和享受思想的发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组织不严密，马列主义教育进行的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很好的展开，检查工作很差，因而对上述思想倾向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对于那些贪污蜕化分子，采取“慢慢地教育他们，不要着急”的姑息态度，这就给了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以可乘之机。

这里我准备说一说东北一级某些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情形。

我们有这样一些机关，有这样一些领导同志，他们沾染了浓厚的官僚主义的习气，他们注意形式的装璜，例如沈阳街道上的美国、英国汽车增多起来了，送礼、请客的情形也多起来了，似乎不乘英美制

的汽车就不能工作，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而开会如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一样。

至于说到工作的情形，那么，我们某些单位就不如对于汽车、请客那样“积极”。

我们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机关，一件渔民组织工会的法令，在机关中旅行了四个月还没有公布。

我们一个部队的参谋长，经他自己签署发下去的一个命令，既不加检查，而且连这个命令都忘了。

有一个卫生机关，那里的若干箱医疗器具都生了锈还不知道，药品坏了也不知道。

我们一个飞机场的场长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其实机场根本没有淹，因为他是“据报”的。同志们想想，做场长的住在飞机场里还在“据报”呢，请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至于机关随便添人，随便添家具，随便接家眷，随便雇保姆的情形那就更多了。某些单位，对公物之不爱惜更达到惊人的地步。而在某些机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敷衍塞责、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滥发文件表格，不检查、不解决问题，以致把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创造、谈空话、滥发号令的官僚机关的事实，也不胜枚举。

这些官僚主义者，对盗窃国家财富，侵吞公产的事实，简直是熟视无睹，他们从不对这些罪恶行为加以起码的检查和追究，他们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好像瞎子一样，看不见这些事实，以为‘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但这些同志们是大错而特错了的。也如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一样，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如果说资本家当时用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办法，而达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就更加应当宣布公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巩固一切生产部门与商业部门方面的

社会主义新经济形式。容许偷窃公有财产，容许侵吞公有财产，不管是国家财产也好，或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财产也好，而不理会这种反革命的胡行，便是帮助敌人来破坏我们这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五七六页)

同志们!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容许盗窃国家财产，容许贪污浪费的胡行，就是容许破坏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就是容许破坏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种行为，这种作风，难道是可以容许它继续存在吗?

同志们，肃清我们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必要，难道不是很显然的吗?

为了肃清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应该进行下列措施:

(一)要在所有机关中，无例外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来揭发本机关内部以及有关部门和一切人员中的贪污蜕化的思想行为与官僚主义的作风。这个运动，应该由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即先搜集材料做报告，号召犯有这种错误的人自动坦白改过，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务使全体人员彻底认识贪污蜕化是革命队伍中最丑恶最可耻的行为，并认识这种思想与行为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性，使大家了解“大敌当前，有打倒之必要”，从而使任何一个贪污蜕化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无藏身之所，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这样，才能将这个斗争进行彻底。各个机关的负责同志(特别是财经机关)，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不许中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健康，事业前进。

要使这个运动开展得好，必须做好教育工作；必须把这个运动与整党教育联系进行。要在党员群众中结合这运动中所揭发的事实，具体说明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党性应当如何；说明贪污蜕化分子所喜欢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所憎恶、所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东西。用登报、广播、演戏、漫画、好坏对比的方式说明每个党员、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应当如何同盗窃行为作

斗争，如何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有力地推动这个运动，大大地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爱护公共资财的责任心，就可改进我们机关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机关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这个工作是长期的，应该反复地去做。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我们必须与盗窃行为，与我们国家机关、合作社、职工会中的所谓‘快乐的’盗窃行为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如报纸上所说的，有可耻的隐蔽的盗窃行为，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不久前，我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讲了奥古涅夫论‘快乐的’盗窃行为的文章。似乎有这样一个潇洒人物——有着小胡须的青年人，他在我们的一个机关里快乐地偷东西，他有系统地经常地偷东西，并且偷得很成功。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贼本人，而是这种事实，即周围的群众，明明知道贼，不仅不和他斗争，相反的，拍拍他的肩头，称赞他的巧妙，因此贼在人们眼里成了一种英雄。同志们，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最危险的。当捉住了一个敌探或叛徒的时候，群众的愤怒是没有界限的，都要求枪毙。而当贼在大家眼中活动，盗窃国家财物的时候，周围的群众却限于慈祥的微笑和拍肩称赞。很明白，盗窃人民财物，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时候，也是敌探及叛徒，要是不更坏的话。最后终于逮捕了这个有着小胡须的潇洒的小子。但逮捕一个‘快乐的’贼，你依靠国家保安部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需要另外的、更有效更严肃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贼周围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周围群众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精神的气氛，这种气氛排斥偷盗的可能性，使偷窃人民的财物的盗贼，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与存在。消灭盗窃，乃是防护我们积累，避免耗费的手段之一，任务就是如此。”（斯大林：论苏联经济形式与党底政策；列宁斯大林论社会经济建设下册六十九至七十页）。

同时，为了吸引广大的党与非群众参加这个运动，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要把这个运动成为一个民主的检查工作、检查思想、检查作风的运动。应该宣布所有党与非党群众均有向一切

机关、一切负责同志控告任何党员与干部，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表现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

此外，为使这个运动进行得正确并收到最大的效果，在进行中还必须教育一切党与非党的群众实事求是，方式要恰当，防止夸大与诬陷，并警惕破坏分子乘机活动。

(二)对运动中所揭发与检举出的证据确立的贪污蜕化分子，必须以极端严肃的态度加以处理，任何迁就与原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革命的罪恶。因为如果不这样，就等于放纵坏人，鼓励人们做坏事。

对待这种不可救药贪污蜕化分子，必须学习列宁的严正态度，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民众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决心而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群众保持紧张心情而能无情镇压腐化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长久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这样不巩固，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上薄弱，而且有无产阶级(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是唯一能够将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穷人)吸收到自己方面来，能够充分长期地执掌政权，来完全压服一切剥削者和一切腐化分子。”(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三二页)

在那些犯了贪污腐化错误的人的面前，摆着两条道：一条是悔过自新，重新为人民工作；一条是继续坏下去，为党和人民所唾弃。何去何从，须要他们自己选择。但是，既要做好事，又想装模作样，不丢掉“党票”，这是不可能的，利用党员的地位、国家机关的职权去做坏事是党和人民所绝不能允许的。因此，对那些情节严重，不可救

药的分子，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给以严格的制裁，并开除党籍。其余应按情节轻重与本人改悔的程度，根据党纪、法纪分别处理。凡自动坦白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一贯贪污腐化或贪污数目甚大经检举而仍不坦白悔过者，从严惩处。对赃物的处理，原则上必须追还，其已浪费一部不能全部追还者，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今后凡是需要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贪污案件均要送司法机关处理，不能仅由本机关批评一顿，马虎了事。

今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检查这一问题，在最近时期内要集中力量来与贪污蜕化及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人民创造财富的战斗英雄、先进工人、模范农民、模范技术人员、模范青年、模范妇女、模范革命工作人员、模范的党与非党干部。对于这些人，我们要积极鼓励他们前进，敢于提拔他们到适当的岗位上来。对于这些先进模范人物的提拔，应该像撤职并惩罚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一样的坚决，借以伸张正气，肃清歪风。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话，他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三）在这个运动中，应该无例外地对于各个机关的工作与领导作风来一次严肃的检查，必须向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开火，因为它是贪污腐化这种毒菌之所以能够滋长的温床。要肃清贪污蜕化的倾向，必须同时肃清官僚主义。有些机关中那种应付差事、只说空话、不切实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象，必须让它寿终正寝，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因之，对于各个机关的

工作，都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加以检查，加以裁判。在检查工作的实际结果，要检查各种制度的规定是否妥当、贯彻的情形如何，从而并修改、充实与建立各种必须建立的制度。

今后制度一经制定，就要坚决执行，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比如：与商人来往、机关生产、生活待遇、用人行政、使用汽车、接家属、用保姆等，都要有一定的制度，不能各行其是(今后经过批准接来的家属，除老弱外，均要参加劳动，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

规定了制度，还要实行各级负责制，不得相互推脱责任。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就是官僚主义埋没了隐藏在我们系统中的无数可能，不利用他们，企图把群众的创造性化为乌有，关在事务房里，使党的每种新的发端都变成细小无聊的贪欲。第二，官僚主义的危险，就是官僚主义经不起关于执行情形的审查，它企图把领导机关的主要指示变成纸上的、和实际生活完全脱离关系的空话。不懂那些在我们机关中的旧官僚分子也是危险的，并且比旧官僚更危险。至于在苏维埃的官僚分子也是危险的，并且比旧官僚更危险。至于在苏维埃官僚中间，‘共产党员’的官僚分子还起很大的作用。我说的是有些‘共产党员’，他们用办公处的命令、吩咐(他们相信这些东西的力量，好像相信偶像一样)的方法，去代替几千万工农群众的创造性和自动性。这里要说的是把我们工作中官僚主义消灭，把官僚主义的‘道德’和‘习惯’肃清，好去利用我们系统中的可能，发展群众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的工作向四方面进行。发展自我批评，审查各种工作执行的程度，清洗机关，从工人阶级中自下提拔忠实的工作人员到机关中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四七三至四七四页)

关于检查工作与批评的重要性，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据说，对于胜利者是不应裁判，不应批评，不应检查的。这话不对。对于胜利者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批评和检查。这

不仅对于事业有益处，而且对于胜利者本身也有益处；那他们就会少骄傲一点，而多谦逊一些。……若是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会没有多大价值了。……”（斯大林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也正如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行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发生灰尘的。也应该打扫与洗涤。‘洗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的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错误、缺点这类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与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论联合政府）

最后，要在这个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党内理论教育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经常检查工作的制度。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进行“三反”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年来，全国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各种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奠定了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基础。这个斗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力量保卫祖国，也使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得到鼓励，更加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作了卓越的贡献。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外，将在一九五三年内全部完成。这些伟大的胜利，增强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推进了经济建设和各种建设事业，使金融物价继续保持平稳，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但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战争还没有停止。因此，我们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必须继续进行。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示我们：“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我们东北地区，必须更大规模地全面展开增产节约的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目前主要是在工业系统中展开起来了，今后我们要把这个运动在一切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中毫无例外地开展起来，在工业生产部门中要继续使运动深入，争取超额完成计划，已完成或即将完成计划的单位，要重订新的奋斗目标。在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中，要运用工业部门开展这个运动的经验，认真进行清理资财、登记财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深入开展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发挥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工业部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在今年五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口号后展开的。到目前为止，各国营厂矿(包括地方企业)所订的增产节约计划，已超过一千万吨粮食，而据八月底的统计已完成了四百五十万吨，从九、十两月各厂矿增产节约数字逐月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整个计划是可能完成的，现在的奋斗口号是争取超过计划。

各厂矿增产节约的进展情况，大约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增产节约计划的，这在目前还是少数，如五三厂、冶炼厂等。第二类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计划已经深入到车间班组中去，有把握完成计划。这在工业部系统的厂矿中占多数，并且在非工业部所属的企业中还占相当大的数量。铁路系统就属这一类。第四类是根本未动的，这也是少数。

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按企业系统来说，工业部较好。按地区来说，沈阳、抚顺、鞍山等地较好。

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得更好，要针对四种不同的情况给以具体的领导。

第一类的厂矿，要巩固与发展已有的成绩，进一步发动群众，增订计划或提出超额计划作为新的奋斗目标，防止领导上自满和群众松劲。

第二类的厂矿，要向第一类看齐，争取提前完成计划，用签订集体合同、组织竞赛、修订爱国公约等办法，发动群众去找窍门、提高技术、推广先进经验，防止可能的“万事大吉”的思想发生。

第三类的厂矿，要把计划迅速传达到车间和班组中去，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职员，立即下到车间去，跟工人一起研究发掘潜在力量、订计划、找窍门。

第四类的厂矿，上级领导部门还未提出任务的，应当迅速提出，具体进行布置。已提出任务的，要召开各种会议，说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意义和方针，克服思想上的各种障碍，使所有人员都动员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地方党委和工会，要对他们加强领导和帮助，深入进行检查，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怎样才能把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真正变成群众性的运动？过去说这一时期的主要经验是：第一，说明方针；第二，挖掘潜在力量；第三，制订计划；第四，找到窍门，组织竞赛，订立集体合同，进行奖励。

现在，我来讲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们从九月初开始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由于发扬了民主，广泛发动了群众，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倾向。以往在某些公务人员中存在的若干错误思想，如：“厚俸才能养廉，薪水这样低不能不贪污”，“从公家那里捞一把是可以的，只要查不出来就行”，“农民经济上升、工人增加工资，自己发点财不算什么”，“不会贪污、不会捞一把是傻瓜”等，因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严厉批判而有了重大的改变。本溪煤铁公司基本建设处一个职员曾打算携款潜逃，故在任职时假报籍贯，经过这一运动他把这一罪恶的想法反省出来了，认为“反贪污运动挽救了自己”。还有的认为：“要是早点反贪污，我也许不会有这场贪污啊！这回可明白，以后一定廉洁奉公”。总之，“贪污是最丑恶、最可耻的行为”，已经成为党与非党干部所公认的新道德观念了。

(二)大大提高了干部与群众的觉悟，加强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有的干部过去认为：“我是供给制，人都是公家的，

多用点公家东西不算什么”，现在则认为除应享受待遇外，不应再侵占公家丝毫。本溪煤铁公司许多工人过去随便把公司东西拿回家用，以为没有什么不可，现在却普遍认为这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本溪市公安局有人要拿公家椅子回家，群众就出来制止“别动公物”。还有一个技术人员说：“我拿几个月薪金却没有做工作，这也是一种浪费”，因上要求多分配他一些工作。许多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与人员反映：“幸亏参加了这一运动，不然难保以后不犯错误。”更为普遍的是学得头脑清醒了，警惕提高了。

(三)揭发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各级领导深刻的认识到若干干部不自觉的陷人贪污的泥坑，也正是因自己不检查工作，对干部缺少原则立场的教育所致。由于许多领导同志在运动中向群众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没有丧失领导威信，而且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办法，更加提高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因而工作做好了，成绩更加巩固了。这样，某些因疑虑重重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领导同志思想搞通了，从而增强了依靠群众的思想，加强了工作，大大提高了领导水平。

(四)培养了干部，涌现了大批的优秀的积极分子。

(五)机关开支大大紧缩了。

总之，由于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的结果，洗掉了我们机关中的不少灰尘，加强了领导，提高了群众，进一步发现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大地推动了工作的前进。贸易部某些职员过去说：“我每天只卖给公家八个钟点，其他的时间干什么，公家管不着”，另外一些工作人员经常迟到早退，但现在却完全改变了；最近该部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外出，内部工作却比过去做得还好，而许多原来作风正派的工作人员则更加积极了。也正因为如此，就促使运动更加深入发展。群众接着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大大超过了反贪污斗争的界限。如“工作手续不严格”、“不安心工作”、“自由主义”、“闹地位、闹薪金”等许多不良现象，几乎都被提出来了，从而发展为群

众性的检查工作、改造思想的民主运动。许多同志看到这些成就后，感动地说：“过去我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回可见到事实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才能这样，中国真是前途远大，无限光明。”

这些成绩，是那些领导有决心、群众发动得较好的单位所出现的新气象。

但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一些单位，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被发动，那里存在问题，也还没有被暴露、解决。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或者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依然认为自己部门没有什么贪污、浪费，对于开展这一运动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而少数单位则是由于领导上决心不够，存在顾虑，害怕自我批评，不敢甚至不愿发动群众所致。

综合各地开展这一运动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使运动收到最大的效果。为此，应该吸收一切党与非党群众参加，并反复向他们说明运动的意义，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的文件，充分进行酝酿，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觉悟。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决心把运动搞好，并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要针对各种思想顾虑，给以解释。如贪污分子不坦白，主要是怕丢人、怕倒脏、怕撤职、怕法办；群众不敢检举主要是怕得罪人关系搞坏、怕“穿小鞋”（领导上给找麻烦）、怕现在只刮一阵风将来报复。经验证明：运动开始时，群众往往不敢公开讲而采取密告的办法，对此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以鼓励群众大胆揭发，运动真正展开之后，顾虑就少了。第四，掌握教育和挽救的政策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凡自动坦白的，减轻处分，小的贪污，经过坦白并查清之后，可当众宣布这次免罪，以后再犯，加重处分。第五，根据运动的发展与群众

的觉悟，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如开始时群众只讲小的，不讲大的；只讲过去的，不讲今天的；只讲下面的，不讲上面的；只讲一般的，不讲具体的等，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典型报告与讨论，引导他们由小而大，由过去而现在，由上而下，由一般而具体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六，以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做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两个月来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还发现：在我们不少机关、不少部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极为严重的浪费现象，根据初步揭发的材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因工作不负责所形成的损失。如若干企业部门在生产缺少精密的计算，以致积压资金、物资，未应用于扩大生产；某些工矿企业因缺少严格的管理与检查，发生损坏机器、浪费原料的事件；保管不负责任，使物资霉烂、损失；因采购马虎而使国家遭受损失以及因制度松懈而遗失国家物资、公款等。

(二)修建不经周密的勘察设计即行施工，在修建中经常修改计划、停工待图、返工重修，以及因计划不周修建规模远远超过修建能力所形成的中途停工的损失。今天各机关的修建中，许多是不必要的补修，以致国家为修建的支出很大。

(三)以国家资财作为“小家务”，随意在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之外额外开支。

(四)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如某单位，今年七月比去年年底增加人员百分之八十四。据估计他们如抽调出四分之一的人员，工作仍可以照常进行。

(五)生活铺张。如请客、送礼、任意购置家具，以及衣、食、住方面随便超越制度等。

由于对这些浪费现象的揭发与批判还不够，不少干部对浪费给予

国家财产的严重的危害性尚认识不足，其中有些人认为这些浪费是“难于避免”的，或者以为这些“开支”是“合理”的，而有些任意浪费国家财富的人和官僚主义者，也正是以这些“理由”为借口，不正视与纠正他们的错误。事实证明：恰恰是因为这些浪费现象的存在，才使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得以混水摸鱼，得以大量盗窃国家的资财。

两月来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无数事实证明：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这些贪污现象不能肃清，不但断送了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无法积累资金进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因此，必须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事业和积极性，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为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一切单位必须立即学习并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开展一个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把工矿部门的增产节约运动经验推广并贯彻到一切部门中去，充分地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智慧，对各种工作加以精密的组织，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提高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并发动全体工作人员拟订在工作和生活中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具体办法，并贯彻实行，建立切实朴素的工作作风，为国家创造更多的成绩，积累更多的财富。

其次，鉴于我们对于普遍存在的各种浪费现象的揭发、批判与纠正还不够，因此凡是那些群众已经发动，贪污蜕化、官僚主义已经大体揭发的单位，还应再继续搞十天半月，集中力量反对铺张浪费。而在对贪污腐化揭露不深的单位，则要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同时应注意：（一）对问题比较严重的部门加强具体领导。（二）尚未发动的单位均应迅速发动。（三）采取教育和挽救的政策，正确地处理自动坦白的分子和被检举的分子，并提出具体处理的方案。审订原有的衣食住行、录用人员、机关生产、财务等问题的制度。提倡朴素的作风，今后一切内部往来，一概不准请客送礼、不准购置沙发地毯，除已经批准的国防与生产所必需的设备和修建外，非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不得

修建。

而在群众发动得不好或没有发动、问题还未暴露或暴露很少的单位，中心则是根据运动中已获得的经验，认真地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把运动深入开展起来。最近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若干反革命分子与投机商人勾结蜕化分子盗窃国家财产的事件中充分说明：投机商人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蚀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则不很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纪律外，还必须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及时地表扬一切廉洁奉公、爱护国家财产的模范人物，严厉制裁一切贪污蜕化分子，以保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真正树立新的道德，新的工作秩序。

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东北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各种贪污浪费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好的东西生长起来，把坏的东西克服下去。这样，我们就会给国家和人民一方面创造了无限的财富，一方面节约了大量的财富。我们用这些财富去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去巩固国防，去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都会产生无限的力量。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建设西部防护林带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很重要，讨论了一件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一件为广大人民热烈欢迎的大事。

东北解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经济迅速上升。但是，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遇到了一些障碍：这就是水灾(去年辽河泛滥最为严重)，风沙(东北西部与东蒙的风沙，年年向东南侵略，将良

田变成沙漠)和旱灾。而森林的被破坏则是造成这些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森林的被破坏是同反动统治的罪过分不开的。任何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牟利,为了建筑宫殿、王府、高楼大厦,历来都是任意砍伐森林,不加保护的;尤其在反动统治阶级所进行的罪恶战争中,对森林的损坏更大。这些反动统治者们,除了点缀他们的宫院与游乐场所,种植一些所谓“风景树”之外,从来没有为了农业与工业的需要,为了消灭自然灾害,解除工人与农民的痛苦而有计划地建设森林。以近年为例,大家都知道,在封建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时代,不仅没有建设任何新的森林,反而对原有的森林作了掠夺性的采伐。这种情形,就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社会主义以前,这一直是毁灭森林,当时所作的全部护林与造林,若与这种破坏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以不顾建设森林,长期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不大的劳动时间),和与此有关的周转期的长度,使造林对于资本主义企业不利。因之,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替他们的主子辩护说:“森林先行于人类,人类带来沙漠。”这种说法是歪曲了事实,事实是:反动统治阶级带来了沙漠,带来了洪水,给人类带来了灾害。

现在政权已经属于人民了。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我们不仅不允许破坏森林的现象再继续下去,而且一定要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大规模地建设森林,消灭自然灾害的根源,不使它继续为害。解放初期,由于战争和土地改革尚在进行,还不可能着手这项工作。到了去年,东北人民政府就根据东北西部风沙、水、旱的严重状况,作了“计划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这个防护林带北起黑龙江省的甘南、富裕、南迄山海关,是我国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的创举。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成功地建设了许多防护林带,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想像会有这样伟大的建设。正如毛主席所说: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

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同志们，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不仅能够战胜任何敌人，而且能够战胜自然界的灾害！

现在建设防护林带的计划已经制定了，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营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

防护林带的建设是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是征服风沙，消灭水灾的斗争，是向自然夺取耕地，争取丰收的斗争，是为农民取得安全居住条件和健康条件的斗争。也是为着今后工业、交通和各种建设事业大量需用木材准备条件。如果不能完成这一建设，东北西部和辽河流域大部地区即使做了其他许多工作，也还不可能实现提高单位产量与扩大耕地面积的希望。相反的，耕地将会逐年减少，产量将会逐年下降，而使农民遭到更大的灾害。因此，建设防护林带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是丝毫不能忽视的。政府和林业部门应该细致地做好具体计划与准备工作，认真地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并进行严格的检查与注意植树技术，提高成活率。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劳动模范、互助组员要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当地的人民一起，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提前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除了营造西部防护林带外，还必须立即注意长白山林区的保护与抚育工作，这一林区遭受敌人长时期不合理的采伐，面积已大为缩小，林区已受严重破坏，如不即时有计划地抚育更新与营造新林，松花江流域将严重地受到水灾的威胁，甚至危及沿江的堤坝。林业部应率领辽东，吉林两省的农林厅立即进行勘察，迅速作出计划，教育农民，准备树苗，以便明春组织群众进行造林。同时必须立即在松花江上游划定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严禁开荒。其他已经采伐的林区，亦应有计划地抚育保护。除此之外，要在辽河、柳河、太子河、浑河、嫩江、牡丹江、乐河、西喇木伦河、昆都河、鸭绿江等江河沿岸，有计划地营造护岸，有计划地营造护岸林和水源涵养林。要公路、铁路两旁和城市、村庄有计划地大量种树，争取在二十年内，城市、村庄与道路两旁完全绿化，以改变气候，调剂雨量，增加收入。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十分注意保护森林，防止火灾。几年来，火灾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必须切实建立群众的防火组织，进行防火的教育，使群众认识保护森林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利益。为此，必须严禁烧荒严防林区的火灾与严重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纵火。凡造成森林失火的，都是犯罪行为，应予严惩。各地人民政府如果不重视教育人民保护森林，甚至对于这种行为放任不管，则是严重的失职，同样应受到处分。去年少数下级政府工作人员，为了“照顾”农民利益，允许农民烧荒开地，以致造成巨大的火灾，给了我们十分严重的教训，这种狭隘的观点，必须彻底纠正。

同志们!我们必须认识造林是长期的建设工作，只要人类存在，造林工作就不会停止。它的意义，不仅为了眼前，更重要的是为着今后若干年代的长远利益。目前东北的森林，虽占全国首位，但是如果只采伐，不建设，若干年后，不仅招来灾害，而且建设所需用的木材也会断绝来源。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大规模的森林建设。这种建设是为广大人民所拥护的。但是从局部来说，由于在开始几年内不能立即见到利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另外防护林带要占去一部分耕地，可能引起这些土地的所有者一时的不满。因此，除应对占用的土地进行调剂外，必须进行普遍的教育，对于上述两种人，尤其要耐心地说服教育，使全体干部和人民都能认识这一改造自然的伟大意义，为胜利地完成这一伟大建设工程，而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

在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总结摘要

(一九五一年)

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东北国营工业的恢复发展情况作出如下估计：第一、生产不断提高。工业部系统的生产总值，一九五〇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三，一九五一年计比一九

五。年增加百分之千八，主要部门劳动生产率已超过伪满最高水平。第二、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职工工资一九四九年底与同年初比较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五〇年提高百分之十二点五，最近还准备提高一些。附加工资一九五一年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一至十三〇修建职工住宅一九四九年为七十万平方米，一九五〇年为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第三、国家已实行了对工业生产的初步的计划管理及经济核算制度，并取得了一些经验。第四、加强了国家管理工业的专业机关及企业的行政机构，初步地实行了专责制的管理。第五、在厂矿中已建设了党的组织(党员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四)，青年团百分之四十一.八)及工会的组织(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产业工人人会)，并得到一些党和工会工作如何搞好生产的初步经验。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依靠全体工人阶级，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新的经营管理制度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全体干部与职工努力的结束。

根据上述情况经过研究分析的结果：东北工业生产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工业的潜在能力，争取今年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价值等于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解决的办法是：一、加速流动资金周转，缩短周期四十五天，节约二百万吨的投资。二、将各种产品的实际成本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十，争取超额积累一百五十万吨。三、提高设备运用率，改善操作方法，减少废品，提高质量，争取产品总值较原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约计增加一百五十万吨。以上三项除节约数目之外，可给国家增加财富利润一百七十万吨(即降低成本一百五十万吨，提高产量的利润二十万吨)。

这个严峻的政治任务是厂矿中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共同任务。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以下几点最主要的问题：

第一、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以便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便利推销，为此必须：一、正确地制定产品的技术标准及质量规

格。二、制定、审查和组织产品的设计工作。新产品一定要经过试作试用之后才能大量生产，以防浪费并保证质量。三、全面审查与修订技术操作规程。其原则是发挥设备效能，保证质量，保证职工和机电设备的安全。四、加强独立的检验工作。从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以至每个工序，都进行严格检查。五、确定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责。六、规定恰当的价格政策，以刺激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加强财务管理，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为此首先要合理规定原材料的使用与储备的定额(数量和时间)，周密地组织生产过程，缩短生产周期，减少原材料与产品的积压。其次要搞好产品的分配计划，认真执行合同制，积极开展推销工作。

第三，加强成本管理，争取降低成本。办法是：一、正确制定计划成本，反对保守思想；二、根据成本计划及定额实行财务管理；三、经常进行成本的分析与研究，找出关键问题改进工作；四、把成本核算推行到车间，把降低成本变成为每个职工自觉的行动。

第四、搞好基本建设工作。为此必须：一、加强设计工作，严格地按计划与设计进行施工反对盲目性与冒险性；二、采取经济核算制的经营方法进行基本建设工作；三、组织工程现场检查，加强技术管理，保证质量。四、加强地方党及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检查、监督及保证的责任，地方出售的基本建筑材料(如砖瓦等)，应保证优良的质量。

第五，改善劳动条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职工生活。厂矿中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应在现有的可能条件下，以最积极的态度定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特别是有关改善职工劳动条件的设施首先解决。其次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推广集体合同、联系合同和小组集体公约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完成国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争取更多的厂长基金，从而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

第六，培养和提高干部，特别是大量培养技术干部与技术工人。各生产单位，要迅速拟出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计划。

第一、为了依靠工人阶级更好地完成与超过国家的生产技术财务

计划，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群工作与实行统一领导。为此必须：

实现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以实行国家经济计划为中心的統一领导。实行統一领导的前提在于統一思想統一认识，最基本的就是依靠工人阶级与坚决完成和超过国家经济计划的思想，也就是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立场一致、利益一致、总的任务一致的統一认识。因此必须坚持厂长负责制与管理民主化结合的方针，克服将厂长负责制与管理民主化对立的观点。坚持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的方针，克服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的观点。坚持在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方针，克服发展生产与改善工人生活对立的观点。坚持工人的劳动创造与技术人员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针，克服职工对立、劳动与技术对立的观点。必须继续树立与加强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面整体观点。

第二、加强工矿企业基层党组织对行政生产工作的保证监督作用。根据东北当前的情况与一些厂矿的初步经验，确定党的保证监督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为实现国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而斗争，是党的基层组织实行保证和监督的中心内容。为此，党的组织要讨论厂长所提出的计划，研究执行计划中的方针步骤，掌握生产的关键问题，制订党如何保证与提高国家经济计划的具体工作计划；动员党员与全体职工为其实现而斗争。以此为中心，统一企业内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思想。二、检查监督企业对上级党的政策和上级政府、上级经济机关的指示决议之执行情形，特别是关于经济核算制及劳动保证法令的贯彻情况，批评与纠正执行不力和执行中的偏向。三、保证与监督厂长负责制与管理民主化的正确实施。四、了解培养干部，协助行政正确配备干部，贯彻奖惩条例，贯彻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的政策，清查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

五、与违法乱纪、破坏政策、破坏生产劳动纪律、贪污浪费、曲解国家政策等行为及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弄清国家的计划，讨论研究本厂的具体计划和订出党如何保证

的计划之后，党就要以政治工作的方法动员行政、工会、青年团中的党员定出自己的计划，带动群众、带动生产小组和车间做出竞赛计划，抓住关键，克服困难，完成和超过计划。为此，要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强党在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

第三、企业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基础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主要是工会工作，因之必须搞好基层工会。在这一问题上，着重两点：一、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充分发扬民主，用说服动员的方式，搞好生产、生活、教育三件事情。二、改进工会的组织领导，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建立组织，反对形式主义。减少会议表格及一切不必要的文版事务。加强地方工会对产业工会的领导，以统一步调，贯彻当前的中心工作。上级工会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经常深入基层组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典型，推广先进经验。

第四、关于地方党和政府对国营工矿企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方面有很大改进，但以下两点应予克服。即地方党政机关把国家企业生产好坏视为上级经济机关的责任，自己可以不负责或少负责；某些国家企业的领导干部强调垂直领导，不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及当地政府法令。不主动取得其领导与帮助的现象。

为此，一切企业的领导人员应主动取得当地党委的领导和帮助，教育全体职工模范地遵守与执行当地政府的法令与各项规定外，并确定地方党委要对国营企业负如下的工作责任：一、有计划地经常地讨论及检查当地国营企业对于国家生产计划的实施，以及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和上级经济机关决议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形。二、正确地领导企业中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统一制定有关工厂党和群众工作的计划，统一党群各系统所布置的工作，统一步调，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超过。有计划地培养与创造典型，推广典型经验。三、组织城市各方面的干部，系统地对工人阶级进行基本的革命知识的教育，组织与领导企业干部的学习，提高企业干部政策思想水平，纠正某些干部中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协助上级的企业行政机关正确地选择与配备企

业的干部。四、统一领导当地国营企业中的保卫工作护

地方政府应对当地国营企业负如下责任：一、监督及检查国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国家法令的情形，特别是关于劳动政策执行的情形。二、在市政建设上，必须贯彻为工人阶级为生产服务的观点。如在厂房、上下水道、电力、消防、住宅、道路、交通、卫生等方面，应首先照顾当地国营企业的需要。三、负责解决当地国营企业进行可能的产品推销及原料采购工作，并组织公私间的加工订货工作。

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 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同志们!

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抗美援朝工作和增产节约运动是有成绩的。据工业部、财政部、贸易部、铁路、地方工业局等单位至去年十一月底的统计，已增产节约价值等于一千四百五十八万吨粮食的财富。在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方面也是有成绩的。这个斗争暴露了党员干部思想中许多严重的问题，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更加清醒地认识资产阶级是在如何猖狂地采取新的花样来侵蚀党的队伍，党内右倾思想的严重危害，并加以坚决的克服。不这样做，不仅不能贯彻中央“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而且会使我们已取得的成绩也不能巩固。

东北地区的党内的右倾思想，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方面；一个是在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方面。

一、关于对待资产阶级问题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七届中央第二次全会上，已经向全党发出警告。毛泽东同志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此后，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决议，曾多次地向东北地区的党的组织发出警告。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对于党的侵蚀，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是有加无减。

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的右倾，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斗争以及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因而与资产阶级的接触日增(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我党的领导，一面则在各方面尽量扩大其思想影响，并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全国的胜利，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中发生了错觉，产生了若干糊涂思想，他们以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是意味着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加剧，而以为是阶级斗争的缓和。他们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让步，欣赏资产阶级的捧场。至于有些党员本来出身资产阶级的，当然更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并在党内散布这种影响。这些人就构成了党内的右倾分子。其中少数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盗窃国家财富的叛徒了。

我们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薄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不够，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政治倾向的批判不够，对加重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的危险性。

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方法则是两条：拉过去，派进来。

所谓“拉过去”就是腐蚀我们的干部。我们在去年的反贪污的斗

争中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干部中(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的贪污现象是严重的。这些贪污事件,特别是财经机关和企业中的贪污,绝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勾引下进行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勾引,这些贪污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关、人民企业中的暗盗。他们盗卖商情、盗卖资材、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本家追逐暴利。资本家为了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例如长春税务局一个职员叫韩慕文,每月挣私商九百分,一次即包庇七户私商漏税一亿二千万元。资本家向他们说:“公家如果开除了你,我养活你。”资本家同时和这些贪污分子订立合同,规定“各守据点,掉头不谈,谁也不讲谁,攻破谁算谁。”

资产阶级另一个侵党的办法就是“派进来”。根据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吉林的材料,我们的国营商店与合作社有相当多的人员是资本家带着他的商店一起变成为国家商店或合作社的。大连百货公司有六个营业组长都是大商人(如钟表部、照相部、食品部等)。该公司共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二百人是经过私商介绍或招聘的,并准备提一个大商人任公司副经理。该公司管理物价的共三十五人,其中十二人受贿,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报员,物价一变商人即先知道,并争先抢购。该公司的钟表部组长,即为大连有名的钟表商,在被邀任组长时与公司订立条约言明: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参加学习。其任组长后以自己商店的坏表,换走公家的许多好表,甚至把人民捐献的好表也换走了。大连的粮食公司、土产公司、花纱布公司的营业组长中即有五个是在大连同时开商店的大商人。也有资本家派其子女、亲戚或亲信分子钻入国家商店或合作社的,他们进来不是为国家商店与合作社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一些地方的国家商店与合作社被其篡夺领导,倒换货物,偷窃商情,囤积居奇,捣乱市场,把国家的企业机构,作为资本家盗公肥私、投机牟利的工具。而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资本家这种阴险恶毒的办法,欲失去知觉,甚至还有这样糊涂的同志,认为,“资本家真开明,连自己的商店都社会主义化了!”“资本家会做买卖,懂业务,我们必须依靠他。”

同志们!依靠资产阶级,就会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大众,就会亡党亡国,这个定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党内除了一些人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斗争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竭力壮大与搞好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天天盘算“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他们不准备成为人民的企业家,而要追求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以供少数人,甚至几个所谓机关“首长”的挥霍浪费。更甚者,则要当商人或工厂老板,以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让私商占便宜。还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级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家庭,通过亲戚,或投资私人的商店、工厂,为自己谋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受到国法党纪制裁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应该赶快回过头来,向党坦白,改正错误。

至于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工作作风上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这里就不说了。

资产阶级这样地侵蚀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以下是几个重要的例子。

(一)在贸易政策上。有些地方对私商向国营商业抢地盘和投机违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帮助;而对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开展业务与扩大零售比重,则很不积极。这就助长了私商的投机活动,使他们能够利用国家零售商业薄弱,顾客拥挤的机会,抬高物价。

(二)对于委托资本家加工和向资本家订货时,资本家偷工减料、获取暴利和勾结公家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应得的惩处。

(三)在税收政策上。商业税轻于工业税,而行商税又轻于座商税,这就助长了资本家的投机倒把活动,将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座商转为行商。

(四)在私人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政策上。对于私人资本家虐待工人、分化工人(欺骗工人人身股,扣留工人工资的一部分,美其名曰

“投资”）、违反劳动法令的行为，很少制裁。有些地方的劳资协商会议，甚至成为资本家蒙蔽国家、蒙蔽工人，偷工减料、投机漏税的工具。

(五)无原则地提倡私商联营。

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思想缺乏严肃的斗争，忽视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也是政策上右倾的重要表现。由于同样的错误，我们的许多组织，在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上，滥用私人，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各机关部门，同时对于留用人员与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人员，放弃思想改造和政治领导，致使他们各种敌对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由泛滥而无人过问。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常常说对资产阶级不要“左”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左”。我们既不随便没收、封闭资产阶级的企业，又不超过国家的规定去增加税收，我们允许私人资本家在合法范围内、在国家经济领导下经营他们的工商业，这就不是“左”。相反的，如果对资产阶级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置之不理，对奸商投机违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熟视无睹，对奸商勾引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不敢予以惩罚，那么，右倾都是毫无疑问的了。

为了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使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获得全胜起见，应把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法行为，予以彻底揭露、处理。各城市必须迅速召开协商委员会、人民代表会和工商业者的会议，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号召他们限期坦白和检举；凡坦白彻底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检举他人者以功折罪，证据确凿而不坦白者，加重处罚。处理的原则是：一般的“回扣”等恶习，经过对资本家批评后加以废除，不作处罚；但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等犯法行为，则根据坦白或被检举的不同情况及对于国家的危

害程序大小，认真严肃地依据国家的法律处理。

在这一运动之后，应当号召工商联按行业组织资本家订立以后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

过去东北地区四个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有成绩的，打击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教育了干部、人民，节约了国家财富(机关经常费开支减少约三分之一)，惩处了少数不可救药的分子，挽救了一批干部。但运动的范围还只局限在机关内部，未成为广大群众参加的社会运动。运动发展不平衡。上面搞的好一点(但也有被动的)，还未深入到下层，税局、商店、工厂、矿山、专卖机关、粮食机关、合作社、银行、修建机关、建筑公司和仓库、以及县、区、村各级政府和城市的。派出所有的只是动了一下，很多的单位还没有动。

总体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比较彻底的；(二)不彻底的；(三)未动的。这三种类型的情况和任务如下：

(一)比较彻底的：首长带头，群众动了起来，贪污揭发的多，浪费和官僚主义揭发不甚彻底，已揭发的问题，有些还未处理。这种单位，要组织所有人员彻底揭发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严肃处理揭发出来的问题，在处理中继续发现漏网分子，并在思想上检查资产阶级影响，定出改进工作办法。

(二)不彻底的：首长被动，群众积极性未充分发挥，坦白和揭发了一些贪污现象，但很不够，大的贪污犯未动，或者已经发现，领导畏首畏尾不作处理，以致运动陷于僵局。这种单位，行政首长，必须在今天的会议之后(各省市在负责同志回到本地之后)两天之内动起来，否则不是手面不净，就是官僚主义，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

(三)未动的：各单位都由行政系统迅速布置，五天之内行动起来，否则，那些单位的首长也一律撤职。地方党员对本地企业部门要负责领导和督促检查。这是今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的重点。不论哪一种单位，都要召开党员大会、团员大会、工作人员大会党代表会议，讨论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并按照指示行动起来。压制民主，压制批评者和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者，不论担负什么职务，都要严予惩处。

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应当带领一批得力的检查团进行检查，各省要抽出力量帮助和检查所属的县。要少发文件、少开会、少坐机关、深入下层，面向工厂、农村、商店等基层单位。各地运动进行的情况要经常向东北局作报告，通电话的地方，要用电话联络。

(一)肃清各该部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于贪污浪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我们已将劳动部长唐员超撤职，开除党籍。沈阳工商局长韩永赞、卫生部药政处长李廷琳、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撤职送法院，东北盐务局长余坚、对外贸易局长杨勉、大连商业局长朱华撤职，其他人员正处理中。

(二)积极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工作的，如军队的周桓、周赤萍、以及这一运动进行的比较好的单位，如军区政治部、政府办公厅等，生活艰苦朴素的干部如张子良、宋彦昌，较朴素的机关如公安部、东北日报社等，都要加以表扬。

(三)经过实际斗争和宣传，树立一种新的道德，使正气上升，邪气敛迹。

(四)贯彻最近规定的各种精简节约制度(与私商往来制度、财政审批与会计制度、生活制度、用房制度等)。

二、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发展中，既然

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也有的同志认为：农民的自发势力，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加以适当的限制。因此，他们认为农村共产党员的现任不是提倡农业生产互助及用农业生产合作的示范作用，逐渐地吸引农民一步一步地走向集体化。相反，他们认为农村共产党员的现任是在经济上升之后带头雇工，使自己达到富农的地位，让农民感到有奔头。

这种说法实质何在？这是否认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这就是说让农民自流的发展吧，经济下降的让他们下降去吧，总之，让我们的农村去走资本主义的老道路吧。

由于这种自发思想的支配，就发生了对党内某些剥削思想发展的放任(如龙江克山系十一区即有百分之四点三的党员雇工，其他省也有类似现象)，对农村经济领导的自流。

这是一种“自发”论。因为几千年来农民都是走的个体经济的道路，他们所看惯的是高利贷者、投机商人以及后来的富农，这些人是当时社会最吃得开的。而对于经过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没有走过，所以也就不懂。我们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就要教会他们走新的道路，而不要重复历史道路。这里的关键在于把互助合作的工作做好，使农民参加合作社真正可以得到利益，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把几千万农民吸引到合作社来，而使他们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前在一部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自流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一)农村高利贷的迅速发展和商业投机的增长。据龙江、松江等地调查，发生借贷关系的户口，已占农村全部户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借人户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二。这些借贷绝大多数是高利贷，有的农民甚至把土地、马匹卖掉放高利贷，这些是对生产起破坏作用的。

有一部分高利贷者转入了商业投机活动。有一些共产党员也参加与放高利贷和农村的商业投机活动。

(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党员雇用工人的发展，个别雇用工人的党员甚至于发表谬论说：“雇工就是互助。”因此对于农村雇佣劳动的过低的工资及很差的劳动条件没有很好注意。根据典型调查：雇工在龙江省海化、讷河等六村统计点总户数的百分之三点六，吉林省扶余县占百分之二点七。雇用工人的户数，龙江省肇源县的统计约占户数的百分之一点三(有的占百分之一点七)，吉林省蛟河县井尚村的统计，竟占百分之六点三〇

(三)在合作互助组内人、马不等价换工，使无马户吃亏(主要是人马工交换，不按季节作合理分配)。互助组的领导没有充分的注意到如何协助贫困的无马户，使无马户在互助组中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此外，还有些党员不愿参加互助组，自己单干。

(四)对劳动模范只重物质奖励(有的过多)，缺乏经常的政治教育及必要的批评，使一些劳动模范脱离群众，失去示范作用。

(五)在农村中不敢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不懂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直命令可以达到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教育说服的工作。

(六)对互助组领导的自流，致使有些互助组变质，发生雇人和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

(七)村干部经济上升后，滋长出单干情绪，对资本主义思想熟视无睹。部分区村干部的贪污腐化(村合作社不少人均贪污)倾向的增长。

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情况规定若干具体政策，我这里只讲思想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对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必须经

过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论。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在农村工作问题上的具体化。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的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

如果不是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成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村党。这就将是人民政权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前面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之下，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向着什么道路发展呢？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就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组织起来”）“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也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是完全符合列宁和斯大林所提出的关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经济发展的原则的。

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在我们国家里，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按什么道路发展呢？农民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而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即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

级专政的条件下所要发生的情形一样。”(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中文版二一九页)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同志说：“列宁在他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指示说：我们俄国的农业应当按新道路去发展，即经过合作社吸收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将集本制原则逐渐灌输于农业，起初灌输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灌输于农产品生产方面的道路去发展。”(同上书七四页)

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无论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产品生产方面，合作运动都有了发展。关于农村的供销合作中的问题，我这里暂时不谈，只谈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基本形式在目前还只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集体劳动，但是它的发展趋势，已经表明它是引导农民在生产上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东北地区，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在一九四八年的决议上，一九四九年冬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一九五〇年三月党代表会议上，都曾反复地强调提出过发展这种合作的问题。

但是一个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志采取消极态度对待合作互助运动，甚至违反党的方针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出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已经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错误的思想。

保证农村逐步走向集体化道路的根本力量是党的领导。我们党不仅要有计划地领导工业发展，而且要有步骤地领导农业实行社会化。而要实行社会化，其首要的任务就是逐步改变目前的小农经济为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济，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关于社会主义和集体化的教育，用农民自己办好农业合作社的切身经验，并且用各级政府大量办好国营农场的经验教育农民外，还必须有计划地在五、六年之内，农民普遍使用新式马拉农具和部分的拖拉机，改变过去的耕作方法。由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实现这个任务的条件已

经开始具备。如果我们不认真进行这个工作，就会发生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就会发生跛足的现象。

因此，农村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在整党过程中，必须明确地认识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反对党内对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采取自流态度的右倾思想。农村的党员和党的工作干部，必须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兢兢业业地办好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发展合作社的经济。为此，必须做到下列几点：

(一)共产党员要积极参加和努力搞好当地的各种合作组织，并逐步加以提高，以便在条件具备时，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共产党员有责任说服单干的农民参加合作互助，共产党员的个体农民，原则上不能雇人。

(二)共产党员有余钱余粮时，要投资在互助组、供销合作社和信贷部中，扩大生产和供销。共产党员不允许放高利贷，不允许做商业投机倒把的反动行为。

(三)共产党员在实行劳动互助时，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照顾生活困难经济上升慢的农民。共产党员不应该和旁的农民作人马不等价的交换，必须反对排斥和不照顾经济上困难的农民。

但是，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上，还有另一种错误的倾向，如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进行组织，歧视单干的农民，或者以急躁的态度，不愿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需的条件，不愿农民的政治觉悟程度，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认为现在在农村中就可以一蹴而达到大规模集体化。这些是“左”倾的错误思想，也是应该反对的。

总之，无论在城市工作中或农村工作中，我们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在我们党内必须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党农思想，必须反对在党内思想斗争中的非原则态度，反对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在社会上，我们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并不使一切国家领导机关和思想工

作机关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至于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还是“节制资本”的政策。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运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既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也不是任期自由泛滥，而是实行“节制”的政策。目前在执行这个政策中的主要偏向，不是节制过多，而是对应该节制的缺乏必要的节制，以至造成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条件。毫地疑问，只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严格整顿党的队伍，战胜党内的右倾危险，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开火，向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犯罪行为开火，向农村某些党员的蜕化现象开火，我们才能争取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的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让我们一致动员起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向着新胜利前进啊！

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

(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

同志们！今天的会，是一个全面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大会。不几天前，我们都热烈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离开了劳动人民，如果我们不劳动，人类便不能够生存和发展，社会便不能够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正在为争取和平劳动、反对战争威胁，为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法西斯政治奴役，为争取劳动人民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而斗争。在我们国家里，劳动人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是为自己和为自己的伟大祖国而劳动，因此应当劳动得更好。去年我们东北的国营公营工业中的职工们开展了爱国

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了价值一千六百万吨粮食的巨大财富。为了使今年能够开展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我想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一、 我们今年在工业方面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东北区今年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就是基本上完成恢复工作，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并开始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按照国家的计划，国营、公营工业的总产值，今年将比去年的实际产值提高百分之四十一·五，其中工业部所属工业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其他各部局所属工业，提高百分之四十三，地方公营工业提高百分之五十九。同志们！将总产值提高百分之四十一·五，这是表示国营公营工业的巨大增长，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去年国营公营工业的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一，就是说，今年我们差不多以加倍于去年发展的速度在发展我们的工业。在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美国全部工业的生产量，从一八九〇年开始到一九一〇年，每五年每年的增长百分比是：八点二、五点二、二点六、三点六；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点二，每年平均增长不足百分之四点四；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零点三），这充分显示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公营工业的优越性。因此，虽然就全国范围说，我们的工业比重还是很小的，我们还比那些工业先进国家在经济上落后很多年，但我们一定能够以最的速度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它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完成今年国家的工农业增产计划（农业总产值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点六，即今年计划产粮食两千万吨，棉花十万吨），有着多么重

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意义，从下面几个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东北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超过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其中工业(包括私人工业。)超过百分之十。一九四三年是伪满产量的最高水平，我们虽然在某些设备上和某些重要产品上还未完全恢复那时的水平，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某些新设备的添制，今年将要超过那时的总产值。(二)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工业产值比重，将由去年的五十二点六提高到五十五点九，工业的比重进一步增长了。(三)国营公营工业产值中，生产手段所占比重，将由去年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三提高到六十七点五，我们在工业中着重发展的是重工业。(四)国营公营工业在全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由去年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三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一·五(当然私人工业的绝对量也有相当的增长)，工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比重是更加强大了，更加成为占压倒优势的決定力量了。

不仅如此，今年国家在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总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在工业的基本建设中，重工业的比重占百分之八十二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反对那种从局部观点出发的所谓“平衡发展”的理论。全部工业基本建设中，恢复部分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改建部分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新建部分占百分之三十。这些，说明我们已开始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工业的基本建设是决定工业发展前途和发展速度的，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今年基本建设工程总量的迅速增长，显示着东北工业发展的新情况，我们必须把领导和管理基本建设的工作提到显著的重要地位上来。

随着工业的巨大发展，贸易、合作、运输、财政、税收都要大大地发展，这些方面也都有了计划。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今年也要大大扩大，预计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七。企业职工的工资今年提高百分之十，另外又发了工资百分之二十的房租水电费。可以预期，随着今年工业生产的发展，明年的职工生活还将进一步改善。

那么，今年东北区国营公营工业全体职工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呢?(一)保证完成国家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比去年要增产百分之四十一.五,降低成本百分之六.七,这是一个比去年经过增产节约运动所达到的水平更加先进的计划,所以完成国家计划就是最大的增产节约。(二)超过国家的计划,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国家的计划之外,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节约流动资金不计算在内),其中要求工业部完成五百万吨,其他各部局及省市工业完成三百万吨。增产节约的内容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成国家计划,并为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

同志们!这是一个十分光荣的任务。关于今年国家计划的重大意义前面已经说到,现在我再说明一下八百万吨粮食具有多大的价值,使我们大家了解今年增产节约运动的意义。八百万吨粮食,将近东北全体农民去年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若用以投资建设我们的工业,则可以建成发电能力十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七个;或者建成年产母机两千六百五十台的新型机器厂十三个;或者建成年产五十万千瓦的透平发电机制造厂三个;或者建成年产三万辆拖拉机的工厂四个;或者建成具有五万纱锭和两千台布机的纺织厂十五个。若用以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则可以建成五百万平方米的住宅;或者修二百三十所每个有五百床位的医院;或者换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疋灰斜纹布。如果用于充实国防力量,则可以购买战斗机三千三百架;或者购买大炮五千六百门。这些数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领导作用,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能够领导与团结全体农民并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进而团结其他民主阶级,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将来也一定能够领导与团结全体农民及其他一切愿意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当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形成一个深入人心的群众运动。

铁路、贸易、合作等部门,也应当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增产节约计划,像工业部门一样的行动起来。我们要在全东北范围内普遍开展

一个增产节约运动，以全东北劳动人民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以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加速我们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进一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二、实现这一光荣任务的条件

完成国家的计划，并超计划地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我们有没有条件去实现呢？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是因为：

第一、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全体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运动以前，有不少的工人划不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有些新从其他阶级参加到工人队伍来的，还保留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经过运动的教育，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检讨与批判了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明确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前途，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工人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劳动积极性大为增长。“三反”“五反”运动，同时也推动了技术人员和职员的思想改造，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种种严重违法行为，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震动，这就更便于克服某些技术人员和职员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对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严肃态度，使一些对共产党抱有误解的人也发生了转变，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大公无私，称赞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伟大，并相信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至于工厂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领导干部，在运动中都普遍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改善了作风。这一切，就给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准备下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

第二、“三反”运动从组织上巩固与加强了厂矿企业的领导。经过“三反”运动，清查出一批贪污盗窃分子，纯洁与巩固了企业的

组织，增产节约的成果得以巩固。运动中新提拔的积极分子，都是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思想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工作积极负责，虚心倾听群众意见，生气勃勃，即使业务一时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但只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也一定能够逐步提高并把工作做好；事实上，这些新人物接替了贪污分子的工作后，到处都表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工业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领导作风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他们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业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了，或者说：“再也不敢官僚化了！”“三反”中暴露出来的企业内部各种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也正在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堵塞，以求得企业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这样，就在企业的组织领导上，准备了有利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

第三、全国物价的降低，以及职工工资的增加，劳动保险条例又做了补充规定，进一步改善了职工物质生活，提高了全体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全体职工已经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伟大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内，工人阶级的个人利益是如何同国家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他们已经进一步体会到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不仅巩固与壮大了我们的国家，而且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是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劳动热忱更加提高，并精神百倍地迎接着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对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地估计到。

第四、去年增产节约运动中积累的经验，特别是运动以来出现的大量先进生产经验与先进工作方法，乃是我们今年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条件。应当承认，去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都或多或少地积累了一些经验，学会了如何去制订增产节约计划，如何将计划变为群众的行动，如何引导群众挖潜力找窍门，并运用科瓦列夫的先进工作方法去综合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推广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等等。这些经验都是很成功的，今年应当继续加以发扬。

第五、我们的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如设备运用率仍可提高(这种情况在地方工业更为显著)，废品率仍可降低，产品

的质量仍可改善，原材料的使用仍可节省，劳动力的浪费仍可大大减少，劳动组织仍可大大改善等。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苏联专家的帮助。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今年将要同去年一样，会使我们的工业生产取得巨大的成成绩。

三、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条件是充分具备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发挥这些有利的条件，抓紧时间，迅速地大规模地将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呢？

第一、必须立即将我们工业战线上的工作重点转到组织生产基本建设上来，“三反”的追赃结案工作应指定专人负责，并结合在完成总的增产节约任务的运动中进行。应使一切直接领导生产的企业干部与全体职工了解：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就将影响整个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影响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影响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如果我们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完成了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任务，又将如何改变着我们国家的面貌，使大家认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刻不容缓的意义，打破各种思想障碍，解决“三反”的追赃结案工作与组织增产节约运动的矛盾，迅速将运动发动起来。为此：（一）对贪污分子的追赃结案工作，应抽出部分干部专门进行。各省市应即将各方面主要干部调回到组织生产领导生产的岗位上来，厂矿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除定期参加追赃定案的某些必要的会议和定期检查这一工作外，应集中全力领导生产，组织生产竞赛运动。这对于一些大贪污案的主谋者，某些案情很重一时不易定案的大贪污分子，必要时还可采取集中整训的办法，以解除企业领导上的负担。（二）对厂矿企业内工人群众中所存在的某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鉴于东北的工人群众经过了献纳器材运动，生产新纪律运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竞赛运动，质量检查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去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及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阶级

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历史上遗留的偷盗与占小便宜现象已大为减少，因此不宜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普遍的坦白与检讨，进行普遍的交代，而应采取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加强热爱国家财产与反对浪费反对损害公物的教育，加强新劳动态度与反对纪律松懈的教育中求得解决。(三)工会与青年团基层组织中的“三反”补课工作，主要是整顿作风方面的工作。为了集中力量领导增产节约运动，不要专门普遍发动一个运动去解决，可以结合着增产节约运动，结合着传达工会二届代表大会决议，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组织上的定期改选以及在正常的民主生活中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求得解决。(四)“三反”建设阶段的工作，应结合增产节约运动的思想教育进行，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阶级界限的工作，做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直接的思想准备和政治上的推动力。(五)“三反”中清查贪污分子较多的部门，如经理部门、材料部门，必须迅速地提拔新的积极分子补足其缺额，以迎接增产节约运动的新任务。

第二、必须组织全体职工讨论今年的生产、财务、技术计划与讨论如何保证完成基本建设任务，提高工程质量。降低成本的计划，并制订出每个单位与个人的增产节约计划。为此：(一)应根据今年前四个月完成计划的情况，提出本企业单位以及各车间今年在产量、质量以及成本上超过国家计划的具体奋斗目标，以及基本建设单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具体计划，指出每个厂矿车间与工程单位新的潜力所在；然后，发动与组织全体职工想办法找窍门，制定单位与个人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方面的措施计划(即本单位与个人的年季月的增产节约计划)。在讨论计划时，应当使职工特别注意到国家制定的产品的质量计划，研究出保证完成与超过国家制定的产品质量计划的具体办法，以求不断地改善我们产品的质量，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增产节约计划的实现。(二)根据增产计划，作好原材料、工具及其他消耗物料的供应计划与节约原材料的计划。企业的上级领导机关须协助厂矿及时解决困难，保证按增产计划进行供应。产品推销计划，亦须根据增产计划具体拟定，并注意加强经理部门的工作。(三)充分地研究企业内职工的各种劳动条件与福利事业的情况，特别

是场房通风安全设备的情况，及其他可能解决的集体福利事业，并作出具体计划，认真加以解决，以改善工作条件，保护职工身体健康。此外，对于职工的奖励，亦须拟定计划。根据上述内容，企业行政与工会应签订合同，贯彻执行。

第三、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生产经验，这是完成今年增产节约计划的主要方法。各省市各产业的领导机关，应将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做出比去年更大的成绩。在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中，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必须抓紧几个有决定意义的先进生产经验，大力加以推广。如机械工业中的高速快速切削与多刀多刃切削法，按生产指示图表有节奏地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杨守训翻砂造型法；煤矿工业中的崔国山掘进队的经验，马文治探钻经验，西安竖井平行作业法，施玉海安全生产经验；钢铁工业中的平炉快速炼钢法；电器工业中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基本建设中的苏长有砌砖法及传鸿宝的铺灰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法；电业中的调整负荷办法和快速检修以及燃烧劣煤经验；造纸工业中的快速蒸煮法；食品工业中的李川江车间和张文富小组的制油经验；被服业中的姜万寿经验等等，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先进生产经验，应当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力宣传与推广，并订出具体的推广步骤和目标，定期检查和总结。（二）要注意发现与推广各个部门、各种工种、各个方面新的先进生产经验与先进工作方法，重视工人群众的每一个合理化建议，工人创造的点滴经验、大小窍门，都应及时地给以鼓励与推广，以发扬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创造性，开展群众性的挖潜力找窍门运动。同时，应发动技术人员与老工人学习科瓦列夫工作方法，综合群众的多种多样的经验，去粗取精，给以提高，以便普遍推广。（三）要使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成为有领导的经常性的工作，定期评议和奖励，召开专业会议，进行技术表演，举办短期训练班，组织参观和互教互学等等。（四）奖励是很重要的，每出现一个先进生产经验和先进工作方法，经过实用有效者，均应根据价值的不同，分别由厂矿、管理局、部和省市政府及时地给以奖励，重要者由东北人民政府给以奖励。

第四、必须注意改善劳动条件与集体福利事业，特别对于场房通风安全设备，必须作出具体计划，认真加以解决。今年的企业奖励基金，按照中央财委的规定，除了一部分用作技术措施费和奖励费(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主要的是用在集体福利事业困难者亦应适当补助和救济(占百分之五)。工业部门与工会组织须根据企业奖励基金的使用原则，切实检查，严禁乱用。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关于“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既要反对离开生产去空谈改善工人生活的作风，又要防止与反对只注意生产不注意工人福利的偏向。像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劳动保护部所反映的纺织管理局沈阳麻袋厂职工宿舍的严重现象必须纠正。今年除按照计划完成职工宿舍建筑外，沈阳市再修三千间简易平房，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各个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应当经常到下面检查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到车间去，到工人宿舍去，彻底转变“三反”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

在东北工业部和东北总工会联合召开的 先进生产经验推广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

从五月七日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运动的进展是迅速的，广大职工已经热烈地行动起来，大多数厂矿已经制订出自己的增产节约计划。根据初步的统计，全区国营公营工业增产节约计划总值已经超过了一千万吨粮食，这个数目在经过巩固讨论后，还将超过。干部和群众对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很高，对自己制订的计划满怀着“只能超过，不能落后”的胜利信心，并纷纷想办法找窍门(去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后仅三个月出现四千五百个)。这些，都说明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在许多新的有利的条件下，比去年发展得更为饱满和富有生气。但是，运动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按

系统说，工业部所属单位较好，其他部、局及地方工业较差；按地区说，潘阳地区的较好，鞍山、大连等地较差。有的地区和有些单位，要到六月底才能讨论和订好计划，在讨论计划中，有不少的厂矿没有具体地讨论提高质量的问题，也没有具体地讨论安全福利问题，增产节约和推广先进经验中也还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和组织问题。

为了使增产节约运动更深入地和更饱满地开展起来，把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保证产品和工程质量，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

我们每个同志必须清楚了解，完成国家计划和超计划地增产节约，其具体要求是：1、不仅要按照各工业部门来平均完成和超过计划，而且要每个企业、车间、小组和机台都超额完成计划；2、不仅要按照生产总值完成和超过计划，而且要每种产品(特别是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计划；3、不仅要按照数量指标完成和超过计划，而且要在质量和成本指标上超额完成计划；4、不仅要按年按季完成和超过计划，而且要按月按周甚至按日超额完成计划。

在讨论国家计划和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许多先进的厂矿都做到了按照上述要求全面地讨论计划，注意完成各方面的指标，并规定出具体的措施计划。但也有一些厂矿，没有具体地讨论提高产品质量问题，没有规定产品质量提高的指标，更没有制订具体的技术措施计划，这样就会使改进产品质量的窍门出现的少，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不能很快消灭，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鉴于我们的工业产品质量不高，而产品质量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当前的生产建设，也关系着今后我国的长期工业建设基础，因此，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都在去年曾大力开展质量检查运动，并有了很大的收获，但某些产品的质量问题的，在质量检查运动中，尚未完全解决；而“三反”运动以来，有些厂矿对检查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贯彻执行有些松驰，以致有些产品

的质量又有些下降。因此，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认真注意解决质量问题，不论哪一个厂矿企业，凡是讨论计划时没有很好注意质量问题的，应对已经制订的计划实行覆查，进行一次“质量补课”。，发动全体职工讨论质量指标，订出具体的技术措施计划，严格贯彻检查制度和操作规程，普遍重视改善产品质量，防止和反对“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偏向。

至于基本建设，则是当前国家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做到按期完工，并特别注意保证质量，而这就是基本建设中最大的增产节约。因此，必须使进行基本建设的全体职工充分认识保证质量和按期完工的意义，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制订增产节约具体计划，以保证工程做的“又好、又快、又省”。

二、注意保安工作和职工福利

从工业部所属厂矿的情况来看，有不少单位对今年的保安工作是做得不好的，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五个月已发生重大火灾二十五次，损失约三百七十亿元，这些情况是严重的，必须引起注意。各个厂矿均须认真讨论保安工作，订出安全措施计划，列入厂矿、车间、小组的增产节约计划中，指定专人负责，限期完成。要在全体职工中进行保安工作的教育，加强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做好防止事故的措施，保证安全生产。主要行政干部要加强对保安工作的领导，并继续严格责任制度，对一切失职者要给以法律制裁。

对于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凡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均应积极设法解决。各级党委、行政、工会组织，除检查生产情况外，必须同时注意检查职工的生活福利，重视职工的反映与要求，迅速研究改进的办法，订出具体计划，指定专人负责，限期解决，不应当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于总务科、医务所、食堂、合作社等部门的人员，应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改善他们的

工作作风，使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好地为工人阶级和国家的工业化服务。

所有厂矿的党委、行政、工会均应专门讨论一次保安工作和职工福利问题，以改进这一方面的工作。

三、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先进生产经验

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开始时，我们就强调要注意先进生产经验的推广。许多厂矿在组织职工讨论国家计划和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就注意了在职工中同时进行“挖潜力、找窍门”的教育，因而从运动开始以来，出现了大量的窍门，使生产获得改进和提高。工业部、东北总工会以及各个地方党委，又注意了有领导地推广带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先进生产经验与先进的生产管理方法，如基本建设施工中的苏长有砌砖法，机械工业中的高速与快速切削及多刀多刃切削法，以及此次推广的“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等，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但有些厂矿的领导同志，至今对这一重要工作还不很重视，在职工中宣传找窍门和学习窍门做得比较差，这样的厂矿一个多月来出现的窍门寥寥无几。也有一些厂矿的领导者，当职工中出现了一些窍门时，没有及时组织技术人员结合工人去加以综合提高，并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力和加以组织推广，而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放任自流态度。这些态度当然是不正确的，应当加以改正。目前，同属于一个管理局领导的各工厂而不知道相互间的成就，却忙于“发明”别人早已发明出的东西，是常有的事；而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企业互不知道先进单位的经验，更是普遍的现象。因此，在东北全区范围内和各个省市范围内，按产业系统组织先进经验的推广，已成为一个迫切的工作。

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把每一个先进生产经验变成大家的经验和社

会的财富，是经济管理机关及工会组织最重要的经常的任务。所谓领导生产竞赛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只限于进行一般的政治鼓动，不去具体地组织先进生产经验的推广，显然的，这样的竞赛是不能持久和经常的，今年的增产节约竞赛，应当完全避免这种毛病。为了很好地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一切企业机关的领导者，必须学习经济知识和通晓自己的业务，首先使自己懂得企业中每一个先进生产经验的性质和作用，懂得群众每一个合理化建议的意义，敏锐地对待生产中的一切新事物，才能更有效地去推动和组织职工学习先进生产经验，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领导，而不是所谓“一般地”领导。

推广带普遍意义的重要先进生产经验与先进的生产管理方法，应当订出具体的计划，规定进度，并按期检查，决不能采取自流的态度。这个工作应当由企业机关和工会组织的领导同志亲自负责，并指定专人进行日常工作。

为了保证先进生产经验的顺利推广，必须贯彻执行正确的工资和奖励政策。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额政策解决定额问题，不许随便频繁地修改定额，影响工人生产情绪。对于组织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有规定适当的奖励办法予以奖励。

四、推行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

随着生产技术上各种先进经验的出现，要求我们的企业生产管理方法进行新的改革，以便更好地组织各种先进生产经验，调节生产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充分发挥各种先进生产经验的先进作用。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正是这样一种生产管理方法的重要的改革。一九五〇年石岷造纸厂最早学习了这种先进经验，随着我们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在生产管理最复杂的机械工业中，机器三厂又学习了这一先进经验，这是我们企业管理方法上的一大进步。

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一方面，加强了生产管理中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依靠这种科学的方法，使领导者和全体职工都心中有数，避免了生产中的盲目性，因而也就彻底克服了由于生产不均衡所形成的忽松忽紧现象，而这种生产中的忽松忽紧，既损害了职工的健康(要加班加点突击生产)，又常常影响了产品质量和增大了非生产的开支，是企业生产中的灾害。特别是先进生产方法出现的越多，就越容易发生生产过程中的不平衡，(因为有的部门前进了很大一步，而另一些部门还未跟上来)，因此越是提倡先进生产经验，就越需要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生产管理方法，又可能使劳动分工专业化(实行定机器、定人、定活的“三定”)，便于提高职工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并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学会了这一科学的生产管理方法，就能够充分发挥各种先进生产经验的作用，就能够不断克服生产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保持前进中的均衡性，做到有节奏地生产。正像一个乐队的指挥者一样，当他真正掌握了一个乐曲的复杂的节奏时，他才能充分发挥每个演奏者的技能，而又不至于发生不合谐的音调。

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既是一个生产管理方法上的重要改革，就应当在一切生产企业推广，并不是只在机械工业中适用。相反的，既然在生产管理最复杂的机械工业中可以学习和推广，那就说明今天的管理水平，已有条件逐步地在所有生产企业中组织学习和推广这个先进生产管理方法了。

五、继续深入政治工作，充分发动群众

通过“三反”“五反”及去年增产节约运动，广大干部及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大大地提高了，这次增产节约运动的迅速开展，思想障碍较去年为少，计划的大大超过和窍门的大量出现，已经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们相信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还会不断提

高。因此，任何对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估计不足的保守思想，任何对新鲜事物(如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畏缩不前的消极情绪，任何不适合运动要求的“阶段论”的做法，都要批判改正。群众正在积极地大踏步前进，我们必须努力地经常走在前面。

但从这里决不能得出结论说领导上可以自流，可以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群众中的各种新的思想动态，生产中的各种新的问题，随时解决，以提高群众觉悟，推进增产节约运动。譬如：目前有一部分工人当中存在着“潜力挖光、窍门找绝”的保守思想，有些工人还有所谓“四怕”(怕掉点，怕调动，怕计划高了完不成，怕增产后材料供应不上)，干部中有所谓“两怕”(怕材料供应不上，怕生产不平衡)；技术人员和职员中有四种顾虑(原材料供应不上，生产不平衡，推广窍门对个人没利益，管钱管物沾包)。不扫清这些思想障碍，增产节约运动就不能顺利地前进。

因此，应当随着运动的深入，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对职工进行新的思想教育。有些先进工厂在这次运动中，创造了一些深入思想教育的经验，培养和树立先进人物的典型，通过典型思想报告，展开讨论，收效很大，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方法，值得推广。但有些厂矿在讨论制订计划中，对职工深入进行思想教育不够，群众发动的不充分，所有这样的厂矿，应当结合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再认真对职工深入进行增产节约运动的教育，务求把每一个职工都发动起来。凡是没有开始进行思想批判和民主补课的厂矿，应当在六月份进行一些准备，取得试点经验，以便在七、八月份有领导地展开，以提高厂矿干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东北一级机关的经验证明，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思想建设工作，应当认真进行。

在中央代表团访问东北欢迎会上的致辞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

亲爱的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们!

你们代表毛主席来访问东北各民族人民，传达毛主席对东北各民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慰问，我谨代表全东北各民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谨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东北各民族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团结一致，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迅速地转入了紧张的经济建设，由于工人阶级和各民族人民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并在伟大的苏联友人无私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加强了各民族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巩固了东北地区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国防，胜利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各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改善，这就是说，东北人民更深切的体会到只有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够得到更美好的生活。

北的各民族人民在伟大的“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执行着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正在热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在工业生产上我们将进一步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并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在农业生产上我们正在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多打粮食，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为争取农业丰收而斗争，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有利的基础。

中央访问团即将深入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各级人民政府将尽力协助，我们相信中央访问团必将完成光荣的访问任务。各民族人民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关怀和鼓舞之下，必将进一步提高爱国热忱和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我们各民族人民一定团结一致，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保卫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为彻底粉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

对肇源县增产经验总结的批示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

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同志、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同志关于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新的经验的总结，给我们各省、县、区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根据肇源县委的报告，该县今年大量推广了“等距宽播，问苗保苗”的种植方法，并适时追肥，因而在全县出现了近万垧高额产量的丰产田，在这近万垧的丰产田上，每垧地的平均产量可能提高一倍到两倍。肇源县的经验说明：东北农业生产中的潜力极大，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发现当地农民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根据农业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总结，然后予以推广，就可以使农业中的潜力逐步发挥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肇源县的经验有这样几个新的值得重视的特点：

第一，他们是在大片土地上做到了合理经营、多打粮食。因而该县的丰产运动就能够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取得群众热烈的拥护。目前有些省、县所提倡与推行的“丰产田”的做法，虽然也多少创造了一些高额产量的经验，但因为对这些经验缺乏总结，尤其缺乏推广，仅仅停留在一小块土地上，有的甚至不计成本，所以就一直没有成为群众性的丰产运动。这些地方应当学习肇源的经验。

第二，他们的先进丰产经验的推广是在合作互助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没有大量的合作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

现，是不可能使丰产运动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的；而先进丰产经验的推广，又充实了合作互助运动的内容并推动了它的发展。因之，要把推广先进丰产经验和进一步发展与提高合作互助运动密切结合进行。

第三，他们的增产办法，还只是在旧的耕作基础上加以改良，就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倍到两倍。这就是说：如果采用新式马拉农具，从根本上改革耕作方法，并把新旧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增产数量更不止于此。因此，今后我们一方面应当继续重视总结推广农民固有的优良经验，同时更应十分重视推广马拉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及其他农业科学技术的工作。

各省、县、区的同志们应当很好地研究肇源县的领导方法，在今年秋收之后，总结本省、本县、本区的爱国增产运动的经验，特别是适合当地条件的高额产量的先进经验，然后召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类生产合作互助组的积极分子加以讨论，以便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提出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各个生产合作互助组明年提高产量的计划与实现计划的办法。

全体文艺工作者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东北三四年来的文艺工作是有成绩的，战争的胜利与土改的完成，无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摄影、舞蹈及文艺工作组织者，都是有其一份功劳的。今天东北已进入了新的经济建设的阶段，希望全体文艺工作者挺身向前发挥自己的天才与智慧，迎接毛主席指示我们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一九五〇年度在工业方面是按照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方针，首先完成基本工程的主要修复工作，特别是以恢复重工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气，机械，化学工业为重点；在农业方面，计划生产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争取每亩地较常年产量增产十四斤到二十斤。其次着重搞好城乡合作社，普遍开好城市的与省县区

村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密切政府与人民联系，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到会的六百多位代表及全东北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东北的建设。人民的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与文艺工作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人民经济的发展，又同时要求文艺运动的有力配合，发挥它对经济建设运动的推动作用。为此高岗同志提出了对下列问题的意见，供与会同志的讨论。

第一，文艺工作者努力的岗位，正如毛主席所早已指示过的。首先就是工厂、农村与部队。为工厂、农村与部队服务，帮助发展工矿、农村与部队中的文艺活动，面对着广大的工人、农民与士兵，广泛地鼓舞他们的热情，提高他们的认识，发动他们无限热忱地参加生产建设、国防建设与政治建设。

第二，文艺工作者要更好地担负起培养人民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我们的一切创作、一切文艺活动，要唤起人民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无限忠诚与无限热情。培养人民这种崇高的品德，发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又必须经常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学习，提高自己、充实自己。

第三，加强文艺的战斗性，使我们的文艺真正与实际运动相结合，既不是脱离运动，也不是尾随运动，而是在运动中去积极组织与推动运动前进。为此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在运动中去发现主要的、关键的事物与思想，加以研究、集中典型地表现出来；同时要提高创作的思想水平，彻底肃清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残余思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危害群众的反动思想。

第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生活在群众中，不是作客，要参加实际的运动，搜集运动中的材料。只有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创造性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是群众创造性的集中表现。这样的作品才能发生指导运动的作用。用什么形式呢？什么是民族形式呢？民族形式应该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具有反映人民大众斗争与丰富生活内容的。这样的作品，必然是为广大运动群众所欢迎的。

第五，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与学习十分重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包括各个方面的，他们由于环境的关系参加革命有先后的不同，他们的政治觉悟与认识也有所不同，他们从事工作的方面也有所不同。觉悟高的应该帮助觉悟低的，艺术低的应该学习艺术高的，真诚帮助、亲密合作、相互学习。同时，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文艺的思想性，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必须反对相互妒嫉、嘲笑、讽刺与门户之见，但也不应该是无原则的迁就，而应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高岗同志恳切的向大会表示：党与政府当更进一步关心与爱护文艺工作者，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与教育，有效地替文艺工作者解决一些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最后并祝大会胜利成功。

掌握技术精通业务 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要我对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工作提些意见，我对这方面的情况研究得很少，恐怕不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必须经常了解党的工作任务，并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努力。我今天主要是讲目前党在东北地区的新任务问题，同时也讲一下青年团的工作问题。

第一，党在东北地区的新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改造工作的基本完成，以及大规模建设的即将开始，东北地区将由今年的重点建设转入大规模建设。在开始大规模建设时期，掌握技术和精通业务，已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新任务。

为了要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就经济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简要地谈一下。

首先讲工业。为了要实现毛主席关于“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发挥现有工业的潜在能力，并继续尽可能地运用新的技术装备来改造现有的工业基础，使之更加合理化与近代化；但更重要的，则是建立我们所没有的而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新的企业，并以最新的技术将这些企业装备起来。因此，工业的基本建设，就提到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在工业生产力方面，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水平，仍大大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新的以最新的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更需要从头学起。在基本建设方面，从勘查、设计到建筑和安装，都遇到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发生的各种损失和浪费，比较生产部门更多。这一切，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要大量培养掌握技术和精通业务的干部。解决目前工业建设中这一最迫切任务的办法，除了国家继续开办各种技术学校外，对于我们一切在工业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来说，就是要从工作中加强学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群众的创造发展，不断充实自己的经济知识和技术知识，以求在若干年内成为自己工作部门的专家。我们必须懂得：在我们国家的各项政治改革工作已取得伟大胜利，大规模即将开始的时候，学习与掌握技术，就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党与青年团的组织，应当在工业战线上发动一个学习技术的热潮，以便能够培养大批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

其次，在农业方面。为了进一步发展与提高我们的农业生产，也必须把我们的领导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一方面，要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继续推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东北全区今年重点试办了约一千二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都是成功的，已经显示了比普通互助组合的优越性。明年计划再发展五千个，每个区都要试办。但必须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比普通互助组更为高级的经济形式，需要我们的农村工作干部，懂得帮助农民科学地计划和组织劳动，合理地分配红利，才能保证办好。至于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农业经济，经营规模较大，技术条件更

高，更需要加强领导。这就在我们农村工作干部的面前，提出了进一步学习农村经济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要注意从农业技术上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注意开展群众性的农业丰产运动。这就是说：除了要大力整修水利和营造防护林以外，要抓紧推广新式农具，改良耕作法，繁殖优良品种，消灭病虫害，普遍积肥和施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很显然的，一切农村工作干部，要能积极领导农民提高生产，不落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后面，都必须学习新的农业技术，掌握农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会使用新式农具，懂得宽播、密植、平作等新的栽培方法，懂得王铜拌种和温汤浸种，懂得种籽纯化和苞米难交，懂得扎扎菌造肥等等。农村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应当成为农业技术上的革新者，农村工作干部还应逐渐成为掌握农业科学的各种专家。

最后，再讲一下国营贸易企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商业工作。

国营贸易企业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某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与经营方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肃清供给制的残余，树立经济核算思想和制度。国家储备物资与市场供应的商品要做到适当地划分，上面要更好地根据下面的需要拨货，清理仓库减少商品积压，贯彻银行结算制度，取消不合理的商业信用，以加速资金的周转。特别要加强财务管理工作，消灭各种浪费现象，贯彻定额管理，以降低商业成本。贸易企业部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绩，但在经营管理方面，应当说，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经验。苏联的国家商业，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全体贸易工人答应要好好学习；贸易部门自己的先进经验，更应当随时总结，并有领导有计划地推广。总之，必须大大提高贸易工作的业务水平，才能适应大规模建设时期的要求。至于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为了很好地实现党在农村推行互助合作运动的助手作用，也必须在业务上进一步大大改善。除了继续满足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注意农民新的需要；并配合国家粮食公司，努力完成国家的购粮计划

外，要更多地注意对农民生产资料的供应，现在政府已决定由供销合作社负责给农民供应新式农具，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必须切实做好。供应农民优良种籽、化学肥料和各种农业，都很重要。在组织农民发展副业生产方面，供销合作社与互助组的主要方法。就是双方订立结合合同，这一经验应当大力推广，供销合作社要能顺利地完这些复杂的任务，也必须十分注意提高自己干部的业务水平，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内行。

其他方面，如交通运输、文化教育、财政金融等，同样要求在业务水平上提高一步。

要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使各种经济和文化事业，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方针有条不紊地前进，又必须加强国家的计划工作，充分显示我国计划经验的优越性。而为了加强计划，又需要有大批懂得计划工作的业务的人才，需要提高现有的计划工作干部的业务水平。

我们一切工作部门的人员，必须充分认识：“一知半解”的水平已不能适应大规模建设的新情况，掌握技术和精通业务，则已成为目前最具有迫切意义的新任务。因之，扫除文盲以提高文化，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是提高业务与技术水平的前提，党与青年团的组织，均应重视这一工作，只要消灭了文盲，才能够造成普遍学习技术高潮的条件。

同志们!我这里强调要求掌握技术与精通业务，决不能了解为可以忽视政治，任何忽视政治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没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不可能学好技术与业务，道理是很显然的。不论工业、农业、国营贸易、供销合作及其他经济部门，均须继续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贯彻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方针，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重视群众的先进经验，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够贯

彻党的各种政策，胜利地完成我们面临着的新的任务。

第二，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工作问题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团中央三中全会认真检查了青年团的工作，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团中央的决议，切实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贯彻这些指示和决议，把团的工作提高一步。

关于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工作，我只谈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对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工作估计问题。我认为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东北地区现有青年团员七十万(不包括军队)，在各种工作中起了党的助手的积极作用，这是党与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坚持不懈地对青年一代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提高了东北青年的政治觉悟，协助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给党与国家不断输送了新生的力量。青年团的组织建设也是有成绩的，团的组织一般是纯洁的。青年团的各级领导，有两条好的作风，一是能够主动取得党的领导；一是工作很积极。这些，均必须肯定下来，继续加以发扬。

当然，青年团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同这次会议中所检讨的，主要是助手作用发挥得还不够，也发生过某些与党的中心工作不协调的毛病；再一个缺点是领导有些一般化，深入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不够。这些缺点应当改正，因为改正缺点正是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前进的一个经常必要的条件。

其次，讲一下如何把团的领导提高一步的问题。东北地区青年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关于自己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规定上，一般说都是正确的。但正如斯大林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一个领导机关决不能停留在只是发布正确决议上，而必须将这些决议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

动中去。特别是青年团的组织，所起的是党的助手作用，每个时期的任务和各项工作的方针与政策，都是党所规定的，青年团的任务就是依靠自己的组织，在青年群众中宣传党的这些决定，并在党的领导下与其他组织一道，为实现党的这些决定而积极活动。青年团的工作决不可以同党的整个工作分离，任何分离的做法应当毫无特殊地同成年人一样担负起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任务。毛主席又指示我们青年要特别注意学习，因为各方面的知识不足，正是青年人的共同特点。青年团肩负着教育培养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的重大使命，应当经常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领导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主席思想意识；同时，应当领导广大青年学习生产知识和技术，以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要把鼓励青年学习技术与学习政治的热情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为了把团的工作提高一步，在团的各级领导上，我认为应当着重注意下面三个问题。

一、进一步注意主动取得各级党委的领导。就是说：要经常讨论党的各种指示，明了党在每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具体任务；要经常向党委反映自己工作的情况，及时取得党委的具体指示，要在党委的具体指示下，善于将上级团委布置的工作与党委布置的工作结合起来。青年团的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各种政策，提高政策水平，这是青年团做好党的助手的最主要的条件，忽略了这一条是做不好的。从各级党委方面说，则必须加强对青年团的具体领导，定期讨论青年团的工作，特别在布置党的工作时，给青年团规定出具体任务，并检查青年团对这些任务执行的情况，帮助青年团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党委要善于发挥青年团的助手作用，才能圆满地实现党的各种任务。

二、深入基层，总结先进经验，以加强具体领导。青年团如何才能做好党的助手，应当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原则以外，具体的经验则必须到基层组织中寻找。有许多先进的青年团基层组织，他们一定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领导的责任就在于去发现与总结这些先进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这样，一方面可以丰富自己的领导，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下面的具体帮助。只要你们能够不断地总

结下面的先进经验，你们就一定能够提高自己的领导，逐渐摸出一套比较成熟的青年工作经验。以后你们总结出这样的先进经验，不仅要在团的刊物上登载，也要在党刊和党报上登载，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引起各方面重视。

三、有计划地训练新干部，是青年团的一个经常的重要工作。因为不断地向党输送各方面的干部，是青年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常造成青年团干部相当程度的流动，如果不很好地注意这个特点，也就很容易影响青年团各级领导经验的积累与提高。从党委方面说，在抽调干部时要适当地抽调。但从青年团方面说，最重要的还是有计划地训练新干部，做到主动地输动，这样就不仅不会影响青年团的工作，而且因为不断地增加新的血液，还会加强青年团与青年群众的联系，从而加强了青年团的工作。有的同志讲青年团的工作如同训练二线兵团，训练好一批就送走了，又得从头做起。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我想二线兵团的工作也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这样的比法并不会降低青年团工作的意义。如果青年团加强了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团员的教育工作，又注意了有计划地培养新干部，也就不会因为输送干部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希望经过这次会议，青年团的工作能够提高一步。

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年中，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紧紧依靠着工人阶级，团结了全体农民和其他民主阶级，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有计划地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改造工作，并从今年开始了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由于全体劳动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努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其中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实际侵略行动)，到一九五二年底，东北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总值(按固定价格计算)，已经可以预料，将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一九四三年超过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其中工业超过百分之十，农业超过百分之四十八点二。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点九。在工业生产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工业)占百分之八十一·五，而在国营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值，又占百分之六十七·五。今年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新建和改造部分已占到百分之七十·四。这些情况，说明东北经济建设的恢复阶段已经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东北地区将在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之下，走向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大规模建设的时期。

三年来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确信：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它比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优越百倍。这一社会制度给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虽在抗美援朝和内部社会改革的严重斗争中，我国经济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仍能较预期为早地达到了根本的好转。特别是国营工业，首先是作为国营工业基础的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强了我国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政治地位。而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国防力量的增强，国家各项政治改革工作的完成，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我国国家就具备了从事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条件。特别是由于有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伟大的苏联的经验的指导和经济的、技术的援助，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和苏联开始经济建设时相比，更有了莫大的便利。因此，在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前进，“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我们面临着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当然，如果以经济的恢复时期来比较，我们今后的任务要艰巨百倍。我们经济的恢复工作虽已基本完成，旧有的工业设备虽已差不多充分加以利用和进行了不少的改造，并开始了重点的大规模的建设，

但是，这些成绩与我们经济建设的远大目标之间，还有极大的距离。我国旧有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不仅技术落后，基础太狭，而且主要地只是轻工业。东北地区的工业虽较他处为多，重工业比重地较大，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长期实行掠夺政策，形成了旧时代东北工业的殖民地性质；工业主要是原料采掘业，机器制造业则很微弱。因之，我们必须大大扩展我们现有的工业基础。我们要继续尽可能利用新的技术设备来改造现有的工厂，尤其要建立我们所没有的而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工厂，即建立新的制造厂，开辟新的矿井，并以最新的技术设备把它们装备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前最根本的任务。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工业的基本建设放到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我们党和政府，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要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担负起来。

问题是这样明显，如果没有工业的基本建设，如果不把基本建设做好，那么，国家的工业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国家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和真正的独立，也就不能设想社会主义的前途。

首先，工业的基本建设，乃是国家的百年大计，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因之，加强国家的计划工作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建设计划，就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和步骤的蓝图。

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从轻工业开始，依靠轻工业的积累来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一般道路，是必需数十年乃至百年才能命名工业真正发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从重工业开始，从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开始，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这是困难多而发展快的道路。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的道路来建设我们的工业。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从重工业开始，从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开始，以便迅速地求得经济的独立，增强国防力量，来消除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论人民民主专政)假如有人幻想

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

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首先和着重发展作为工业生产领导力量的国营工业，把国营工业放在第一位。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才能带动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一切与此相反的做法，例如企图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随着国营工业的发展，私营工业在符合国计民生需要的条件下也就会得到一定的合理的发展。东北三年多来的事实，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东北的私营工业，一九五一年的生产总值已达到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百零五点一，超过一倍以上。

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其他经济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的配合。工业不仅要供给农民以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要供给农民以生产资料，供给农民以机器和肥料，以便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改造农业，使小生产的农业逐步实行合作化和集体化。我们如果不注意在发展工业中同时逐渐从技术上改造农业，不仅将使农业停留于小生产的落后状态，而且也就会破坏了工业发展的条件。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以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又给工业进一步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扩大工业品的市场和供给工业以原料及粮食。因之，我们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要积极引导农民按照党所领导的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去发展农业。如果没有农业的配合，我们的工业建设就会跛起脚来。

工业的发展，又需要把市场组织好，需要发展壮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验证明，只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市场上起了其应有的领导作用之后，才能更好地推动私人商业作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活动，才能对工业生产有利，对人民有利。任何轻视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做法，就必然造成私人投机商业在市场上的自由泛滥，并损害正当私人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活动，其结果必然大大破坏工业的发展。因之，我们要有计划地去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切实改善和提高这些部门的业务，并发挥正当私人商业的作用，以减少和打击私人投机商业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

上述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国家的经济计划来实现。因之，加强计划工作，将是我们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

要正确制订我们工业建设的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分析需要和可能。既要反对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估计不足、对群众的创造力量估计不足、对后备力量增长的速度估计不足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应反对不管主客观条件和可能只按主观愿望的冒险主义的倾向。

其次，有了建设的计划，还需要执行计划的人才。经验证明，没有精确的资源勘测，就没有正确的设计，而没有设计，就无法施工和安装设备。资源勘测和设计工作，谁都知道是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准的人才的。有了正确的设计，我们还需要有掌握技术的干部和工人，这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大批的施工和安装人才。而为了管理好现有厂矿和新建厂矿，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又需要大批的工业管理人才。正因为我们需要采用苏联的先进技术标准来建设我们的工业，按照苏联的先进方法来管理我们的工业，我们就不能单纯依靠仅仅掌握比较落后的技术的旧的技术人员，而必须大量地培养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的新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因之，培养勘测人才、设计人才、施工和安装的人才，训练掌握复杂技术的各种技工，以及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正是我们在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这样的干部，他们不仅要工人阶级的事业抱有无数的忠诚，把自己完全献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而且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熟练的生产业务。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全党来学习苏联经验，学习经济业到工业的基本建设部门中去。过去我们曾经这样做了，也培养了一批经济建设的人才，但比起我们今后的需要，却是极其不够的。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掌握技术和业务的程度，也大大落后于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基本建设是首要的任务，而基本建设

需要的技术水平，则远远超过工业恢复时期。我们目前实际上已再一次遇到“不熟不懂”的情况。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到来，不熟悉的事情和不懂的事情还会大量增加。如果现在不努力学习，如果不动员全党来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经济知识，学习苏联经验，将来我们会发生更多更大的困难。技术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克服技术落后的现象。

为了培养干部，我们必须开办从初级到高级的技术学校，特别是高等技术学校，大量招收职工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我们不仅要大量开办这样的学校，而且我们要把学校办好，派遣优秀的干部到这样的学校里去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尽可能快地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人才。我们还必须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技术水平，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学习技术，以解决我们的技术落后的困难。我们必须使每一个较大的工厂或矿山，都能设立这样的技术学校，并在广大职工中造成学习技术的热潮。但学习技术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应首先学习文化。因此，应该用极大力量有计划地在职工中推行速成识字法，扫除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并把职工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到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的程度。

对于现有的残留着较多的旧的政治观点和技术观点的技术人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政策，即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一方面，必须善于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国家的财富，使他们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必须继续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和技术上进行自我改造，用启发自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除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技术的水平。

我们必须重复一遍，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

再次，要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建设新的工厂、矿井和革新我们旧有工厂的设备，我们还必须有巨额的资金。

我们工业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呢？

斯大林一九二六年的“论苏联经济形势与，为多次指出过，乃是我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列宁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在中国也完全适用。毛主席向全国劳动人民所号召的增产节约运动正是这样一种积累建设资金的道路。

我们应该尽可能积累和利用国家工业内部的积累。由于国营工业的恢复，已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利润，而且随着工业的发展，这种利润将会大大增加。按照东北的情况，今后五年内国家工业的内部积累将占国家工业投资的大部。因此可以说，工业内部的积累，是我国工业建设主要的一项来源。但增加国家工业的利润，这并不是说靠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来达到目的，而必须靠增产节约来完成。发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时和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是增加企业内部积累最主要的经常的任务。我们将厂矿中由于增加生产、减低成本所创造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以提高职工的物质水平(不关心职工生活福利是错误的)，这是完全符合于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事情。

我们还必须经过国家预算，尽可能积聚和利用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收入，如城市的税收、农业税和国营商业利润等等。城市资产阶级向国家交纳其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税金，不仅为国家建设所必需，而且对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领导下的正当发展也是有利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也可有一部分作为国家工业建设的基金，必须加以充分地利用。但我们必须经常注意适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工业品和农业品的差价，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和增加农业税的办法去加重农民的负担。因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依靠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为基础的，我们国家工业的发展，是依靠国内广大农民购买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还需要供给农民廉价的工业品，特别是充分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农业合作化和集

体化的发展。为了扩大工业建设的积累，我们又必须进一步发展国营商业，改善国营商业的经营状况，使我们的国家商业既能为国家的建设、为人民的需要所服务，又能为工业建设积聚一部分资金。

我们还有这样的可能，即利用人民的储蓄来积聚建设工作的资金。我们应当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鼓励人民在银行存款，付给一定的利息，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批资金来投入工业建设。

但积累资金，这还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正当利用我们有限的资金，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使积累的最大部分用于工业建设的需要。斯大林同志说：“善于合理地、有计划地支出财力——这是一件最主要的艺术。”这就是说，必须按照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积累速度，正确地制定国家的建设计划，防止百废俱兴，处处照顾，失掉重点的偏向。这就是说，必须和贪污现象、各种铺张浪费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严格财政统一制度和财政纪律，精简机关编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用经济核算的办法达到节约的目的。

最后，国家工业化能否以最大的速度进行，能否正确地进行，决定于党的领导作用。

中国今年天的经济，还是五种经济成份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合法地存在，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还必然有其一定的发展。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由于其固有的追逐利润和盲目生产的特点，如不给以国营经济的强力领导，就必然会影响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正确实施，以及影响到国营企业本身。同时，由于广大小生产的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未得到改造，也就经常地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计划。这些情况，正是说明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放弃和放松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经济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其可能的恶果之一就是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让广大小生产的农民经济自流发展。如果是那样，我国的经济就要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

而不是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如果是那样，就必然要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破坏工农联盟，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我们国家就会违反历史发展的道路向后开倒车。谁不愿意使中国社会倒退，谁就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从我们国营企业内部来说，我们是否可以放弃或放松党的领导呢？当然，我们的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内，没有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剥削，不论是企业的领导者或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只有一个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只有一个共同任务——为国家发展工业和建设富强的祖国的任务。但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就不必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就不必在企业内部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我们应该正视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国营企业内部，在工人阶级内部，还有各种旧的思想影响的残，还不断遭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并且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大，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例如，在我们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虽然他们在解放以来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有一些人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技术上保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问政治。又如在我们的企业管理干部中，虽然他们几年来已学得了一些管理人民企业的知识和先进经验，但其中有一些人，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依靠工人阶级，不重视先进生产经验，不深入下属，不重视党的政治工作，不依靠党、工会、青年团的组织，旧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管理工厂的方法还未彻底清除，并发展着某些自满情绪。在企业的党和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干部中，也同样存在着忽视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和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人群众中，解放以来觉悟有很大提高，劳动热情高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特别是不断从非工人阶级队伍中扩大的新工人，曾经受资产阶级思想以至封建思想的蒙蔽，带来了旧社会的不良影响，旧的劳动态度尚未彻底转变，不爱护国家的公共财产，不能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划不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因之，在各种工业中加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肃清人民企业内部旧的思想影响的残余，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克服官僚主义和自满情绪，乃是党在企业中为着保证实现国家计划所必须进行的经常的和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实现党的领导，发挥党在国家经济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每个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丰富理论知识，为“稳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斗争。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建国三年以来，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斗争，实现了工农业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已经极大地巩固了。这对于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说来，毛主席所昭示的方针，紧紧团结和充分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力量，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我们一定能像过去所取得的种种胜利一样，战胜新的经济建设任务中的一切困难，胜利地完成工业建设的任务。今天的一切状况都已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已不是渺茫的远景，而是放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我们应该努力奋斗。

在东北亲赴机器一厂检查工作讲话

(四月二十三日)

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使工人阶级枉费了三个月的辛劳，而且耗损了国家的巨量资材。这是一种对人民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该厂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领导与群众脱节，生产计划与准备不周，工序组织紊乱与到处无人负责的现象。我们一切企业的管理人员都要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并谨慎而负责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来，完

成国家与人民的付托。凡是我们自己不懂的事，就要同工人商量，同技术人员商量，同工厂中各个方面的人员商量，向上级请示，同先进的厂矿商量，不要害怕暴露毛病，必须敢于检查自己的毛病，敢于改正毛病，千万不要存在那种庸俗的“不好意思”与“差不多”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会埋葬我们的事业的。至于我们的工厂，生产什么成品，事先应有缜密的研究与计划，凡是我们没有做过的或没有把握的，要先试制，先做准备，做好一台，有了把握，才去制造，否则宁可不造，决不能粗制滥造。我们的各级领导者，无论行政的、党的或工会的负责同志，应该深入现场、联系群众、具体领导；我们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应该精研业务，勇于负责，保证质量；我们的机械局应该经常深入检查，并集中力量搞好一两个厂子，取得经验，作为具体领导的根据。我们反对那种一般化的领导，也反对事务主义。只要我们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学习，善于具体解决问题，并大大地提高工作的责任心，使我们的领导与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相结合，使工人的劳动创造与技术人员科学研究相结合，我们的事业是一定可以成功的。机器一厂的领导同志们如果真正能够这样做，我相信一厂目前这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就一定会改变。

关于工资控制数字向毛泽东报告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日)

中央前会指示：因部分农村地区发生灾情，原来调整工资的方案，应予改变，并且决定今年各部门的标准工资不动和不进行全面的调整工资，取消双薪，厂矿企业职工暂不实行休假制度，但已经中央批准调整工资者，仍可调整，个别企业工资太不合理必须调整者，须提出方案，经中央批准，方得调整。对中央这一指示的原则，各中央局及中央各部均完全赞成，但有若干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同时，工资基金的开支也需加以适当控制。谨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今年二月间，各部门根据中财委颁发的工资控制数字：即在去年十月份的工资水平上增加百分之十，编制了一九五三年工资计划草案，即然中央决定今年不普遍调整工资，原编的工资计划草案就不能实行。但没有工资计划，就无法控制工资基金的使用，并妨碍企业计划管理工作的改进和财务成本计划的准确性。因此，各经济部门、各企业单位，必须根据中央处理今年工资问题的原则，重新编制一九五三年工资计划。

二、由于今年的工资标准不动和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今年的工资水平必然与去年调整后的工资水平相去不远。因此，今年的工资计划，应参照去年调整后的工资水平进行编制。但应考虑到：随着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而引起的晋级(如由四级工人升为五级工人)，计件工资制度及某些必要的对生产有利的奖励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以及经过中央批准的个别企业的调整工资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增加一些工资，但这种增加，应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使之既不影响今年工资标准不动的规定，又能收到鼓励职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

各工业、交通等部门今年将增加许多新的职工，新职工的工资水平较低，因此，增减相抵，平均工资的提高还是有限的。

在商业、贸易、文教系统及政府机关等部门的工资问题与工业、交通部门不同，这些部门工资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大区财委具体掌握。今年发给这些部门的工资控制数字主要用在少数干部提拔后工资等级的调整及职工的困难救济上面。至于某些单位工资水平较低，因机构合并或干部调动引起的工资特殊和供给制改薪金制等问题，今年一般暂不解决，个别单位必须解决者，须经过大区财委及有关部门的批准后，方得解决。

由于今年工资标准不动和不进行全面调整，要想在今年改变长期造成的不合理的产业序列(按各产业工资的高低排列成的次序)和许多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是不可能的。分给各部门的控制数字只是用以解决各该部门工资方面最主要的和最紧迫的问题，因此，各部门及各大

区财委应妥善掌握。

三、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一九五三年工资控制数字的意见是：为了反映各部门现在的工资水平和便于计算起见，我们采用一九五三年一月份的平均工资作为基数。在此基础上中央六个工业部提高百分之一。八，铁道、交通、邮电三部提高百分之一。五九，基本建设(因季节性的原因，以去年十月份平均工资为基数)增加百分之一。现将各部分分配数字列表如后：

(1)部门工业部工业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五七点七六，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零八，其中：燃料工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九一点〇〇，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百点八三，重工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五七点一三，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五五，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五五点八二，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〇〇，第二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四九九点六〇，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一二，纺织工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七七点三八，一九五三年计划为的百分之一〇〇点八〇，轻工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一四点五二，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〇〇。

(2)部门基本建设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四九三点四七，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〇〇(民工在外)。

(3)部门农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三五六点七〇，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〇点八六。

(4)部门交通运输及邮电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五六点八一，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五九其中：铁道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五八点一〇，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二点〇〇，交通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五〇三点五四，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

点〇〇，邮电部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六〇五点七三，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〇点五〇。

(5)部门商业、贸易、粮食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四一〇点三〇，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〇点九五。

(6)部门文教、卫生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三三四点三三，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一六。

(7)部门行政机关、金融部门及社会团体一九五三年一月平均工资（千元）四九八点八〇，一九五三年计划为一月份的百分之一〇一点〇〇。

文教、卫生部门和行政机关、金融部门及社会团体的工资增长控制数字主要是按政府发给这些部门的福利费（共二千三百八十六亿元）折合得出的。

林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工资问题，因缺乏具体材料和精确计算，换个别解决。

按照上述控制数字计算，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月平均工资将达到四十七万八千七百元，比一九五二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九点八三〇其中，工业为五十三万三千九百元，增加百分之一〇点九二，基本建设为五十二万六千一百元，增加百分之六点六一；交通运输、邮电部门为五十七万三千六百元，增加百分之一二点三三〇一九五三年平均工资比一九五二年上升速度数大的原因是因为许多部门去年下半年调整了工资和物价的变动（今年一月份工资分值比去年平均约提高百分之四点五，今年五月份又比一月份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九）。

一九五三年上述国民经济各部门工资总基金为五十六万七千亿元（如加上公私合营工业、林业、合作社及基本建设民工工资估算数在内为六十四万亿元）。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二二点二四，较一九五二年增加约十万三千亿元。其中由于增加约一百万新职工而增加的工资基金约为五万五千亿元，因物价变动而增加的工资支出约为二

万八千亿元。按控制数支出的全部总工资基金比二月份编制的一九五三年工资计划草案约减少四万亿元。

四、中央各部、局应根据一月份工资水平，并按上述控制数字编制工资计划。因今年各地工资仍以工资分折成货币支付，工资计划应以工资分为计算基础，但以货币表现。估计今年六月以后至年底物价平均不会有大的变动。故确定五月前，按实际工资分值计算，五月以后，均按五月份工资分值计算列入计划，以便在计划上能切实掌握工资的货币支出。如今后物价上升，工资分值相应提高时，可按实际分值折算货币。

年终变薪及变相年终变薪性质的年终奖金不在工资基金范围内，且今年已决定取消，故均不应列入一九五二年实际及一九五三年计划之内。取消年终变薪后，少数职工生活特别困难者，可采取其他方式，予以补助。考勤奖未取消者，可列入一九五二年实际及一九五三年计划。

上述工资控制数字如中央批准，中央各部须根据中央批准的控制数字于十日内布置到所属单位，并告大区财委。各单位应即按上级颁发的控制数字控制工资基金的开支，并即着手编制一九五三年工资计划。一九五三年工资计划须于七月份编制完毕，报送中央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备案。但如计划超过控制数字时，须报请中央批准。企业的财务计划及成本计划应将其工资部分作相应的修改。妥否，请指示。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编》、《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委文件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汇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刊》、《解放日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等有关报刊、期刊杂志。

后 记

一、文集共收录了高岗同志从 1939 年至 1953 年 70 多篇讲话、报告、演讲词、谈话录等。有的首次公开、有的曾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教材，有的在《解放日报》、《群众日报》、《人民日报》、《东北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发表，有的在图书期刊刊登。文集内容为研究西北、东北革命提供宝贵资料。

二、为了保持材料反映时代特征原貌和尊重史实，对现在看来不符合“语法”和标点符号新要求的方面未作改动。

三、对个别标题进行调整，对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对个别明显欠妥的章节与序号亦作简单处理。

四、部分文集资料大多来自档案方面，对所有提供资料的单位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对搜集工作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五、由于资料有限与搜集工作等诸多原因，文集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二〇一三年四月

高岗文集

■ GAO GANG WEN JI

编辑 薛骏富 白浩亭

开本：787×1094 毫米 1/16

字数：420 千字

印张：39

版次：2013 年 4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962-870-288-6

定价：119.00 元

高岗文集

GAO GANG WEN JI

编辑



薛骏富 1953年8月14日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石湾镇史家洼桃杏渠村，中专文化，中共党员。1973年靖边县青阳岔中学高中毕业，曾任乡镇副乡镇长、乡镇长等职。1999年至2009年任县科技局党支部书记、副局长。

工作中曾多次受上级表彰奖励并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和中共榆林地委宣传部、《榆林报》社“优秀通讯员”荣誉称号，曾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文章200余篇。现为高岗研究会会员、高岗研究理事会顾问、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理事、榆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榆林市黄土文化研究会会员。

为了抢救、挖掘和保护陕甘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缅怀先辈，弘扬历史，教育后代。2000年以来在西北东北到北京行程万里，踏遍了一块块红色革命足迹。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采访搜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2008年，精心设计陈列了“高岗革命历史纪念馆”高岗故里“高岗旧居展室”。2013年编辑出版了《高岗革命历史画卷》、《高岗文集》、《高岗书信电文选集》、《高岗的故事》。



白浩亭 1963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镇窑美沟村，大专文化。1984年部队退役。

返乡后一直从事煤炭行业工作。现为横山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横山县崇德中学名誉校长，榆林市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曾为崇德中学多次出资助教累计达余万元，先后向社会各界募捐累计达

1200余万元。现任榆林市沙海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榆林市慈善协会常务理事。

校对 马鹏伟

ISBN 962-870-288-2



定价：119.00元

「榆林記憶」

钰钊文化公益項目
www.0912jy.com

